

論

壇

四國外長會議二甚麼

四國外長會議已經在四月廿八日揭幕於巴黎了。討論的主要是意大利和約問題。在這問題中，雙方爭持不下的關鍵在於特里雅斯港和的黎波里。關於特港問題，蘇聯提出由南斯拉夫統治，但後者却在前者勢力範圍之內，由她來統治，就等於使蘇聯對中歐獲得歷史性的出入門戶，以完成其對波、捷、匈及巴爾幹各國的控制，并得特港良好港口設備，在蒙法爾康取得造船廠（聯合社八日電）。

但以外長稱這些要求為「切斷英帝國之咽喉」（路透社三十日電）。因為牠們是大英帝國在地中海、巴爾幹以至近東和中東的生命線之一，而美國也正在這些地方逐漸擴展其勢力，臥榻之旁，當然不願蘇聯聯睡。因此，雙方一直爭持了十多天。經過整夜曲折的討價還價之後，蘇聯是讓步了；她贊成意屬地的黎波里仍由意大利單獨代管。美國也同意法蘭西的提議，給予蘇聯賠款一億美元（意聯最初討價二億美元）。英國當然唯美國馬首是瞻，「贊助貝爾格羅之議」。如此一來，雖然對特港問題蘇聯希望「英美退讓一步，方可成交」（聯合社

三日電）。

然而，不管「成交」結果如何，黎波里重遭奴役的命運總是被決定，殖民地獨立的諾言也被背棄了。種分贓式的「弱肉強食」，揭去了「自由平等」的虛偽外衣，喚醒了被追的另一羣。據路透社十二日電：阿拉伯聯盟秘書長阿柴姆十一日稱：若以的黎波里交意大利托管，吾人亦當與英人戰——分割的黎波里與蘭尼加，足以摧殘當地經濟，吾人不容許。同時，的黎波里之阿拉伯族，似有不惜發動革命以反抗該地由意大利托管之意——英當局與阿伯領袖已為預防措施，防止暴力反。

從被壓迫民族的角度看來，我們張每一殖民地弱小民族，都應該脫帝國主義的統治而獨立自主。此外我們反對在賠款的名義下，加緊搜戰敗國人民的血汗，使他們窮窮兵武的統治者做贖罪的美羊，至於奪戰敗國的工業設備，使廣大人民窮困，失業和飢餓的深淵中，也是絕不容許的。（唯度）

怎樣解決糾纏不清的內戰

站在人民的觀感和場，無論內戰雙方怎樣自圓其說，殘酷可怕的內戰，總是絕對應該止的！這內戰，從日帝被服以來，實際上沒有停止過。所有判、調解、協定……到頭來還是暴了相互間的口是心非，形成了「上厭籌交錯，下層血肉橫飛」的現局。

這內戰帶給人民的只是痛苦和犧牲。特別是東北人民在日帝漢奸的蹂躪下，十四年來已不堪言了。他們渴望勝利後有一個復創傷的機會，但殘酷的現實還是使他們重遭戰禍！以前的犧牲是為民族獨立，現在當處灰又為的是什麼呢？要解決國內的矛盾和紛爭，要底解放人民大眾，都決不是單純的軍事行動所能達到的。戰爭只能加重人民的痛苦，加深矛盾的嚴重性。在史上從沒有靠單純的軍事行動，來解決社會結構的。

固然，東北問題是其問題之一部，同時，國共關係與國際關係又是息息相關的。假如英美將出賣中國權益的「雅爾達秘密協定」送給蘇聯，以後就不會有牠的轉的中蘇條約；假如不簽訂這種不公平的增糾紛的中蘇條約，則東北問題不致像目前那樣的複雜而僵持。明白說：當前中國那愈來愈兇的戰，始終是離不開國際間的強權政治。底影響響的方法，來補償大戰中損失和防衛

殘及廣大無辜的「通」？但「池魚

的局面，以此意圖留給中共執行而退出東北；當然美國為了確保遠東的市場，更不能接受軸底劍鑿要求，因而必須支持國民政府；順便利用蘇聯當局的行徑，在弱小民族及各國工業間破壞蘇聯的威望和信譽。

因此，為要獨立地解決本國的，切問題而不要國際間的決定性影響，必須有國內的內戰以第一切的戰爭，具有依託。國民衆自己。但必早中民會議，具有這個代表全國民衆意志的力量而進行的內戰，才能流既有力量的制止內戰，并解決一切的內戰問題。（元度）

最近，由於魯春之滅佔，東北局勢分明有利於中共了，所以中共代表團發言人表示：談判重開應以東北停戰為條件，但，此舉即與方代表亦不贊同，故僵局難望打開。（五月十四日新聞報南京長途電話）

不過，由於馬歇爾的極力調停，誰能暫時獲得新的折衷妥協辦法，但兩黨間的根本矛盾依然存在，國共問題（包括東北問題）決難得到澈底的解決。像上次商談和協定之無效，便是例證之一。同時，馬使的調停甚至干涉，恰好證明中國問題不能自行決定，而要壽命於「盟邦」！這種不能獨立自主的依託性，是極端危險的，雅爾達協定便是最新鮮的明證，證明被支配的「弱肉」必然被支配者所「食」！

『五五憲草』宣佈後剛滿十年，由人民養活他們，但在生活高壓上海警察局就宣佈了警管區制，定六下，一般民衆連自己也養不了，又怎月一日起先在京滬滬施行，然後推及能而且爲什麼一定要再養活這樣多的全國，牠由每一警員管轄八十至一百人呢？今天的『父母官』，如果真要廿戶，或四百至六百人民，經常到所消滅『宵小匪跡』，便應從產生宵小轄各戶『訪問』一切，不但一草一木的根因着手，解決物價和失業問題，一舉一動，且連幾個月怎樣開關，清除一切貪官污吏。但警管區制的實也應『瞭如指掌』；而『訪問』時間行却走了相反的路：『人民公僕』的，不僅自責，即在深夜，『如遇必要權力無限量地增加，人民自己的負擔，可視情形而定』。這種『補救保甲無止境地提高。結果，無力負擔的都制失敗的好辦法』，比諸古希臘羅馬挺而走險，不是宵小也要做宵小了，管理奴隸的辦法，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誠然，殺雞不用牛刀！宵小從來。這樣，單從警察權力方面看來，中已有，毋須乎用這種捉襟見肘的辦法國確已壓倒德日意而成爲『五強』之『首』了。但這是以摧毀十年前的五

如此民主

五憲草爲代價的，因爲這憲草第二章第十一條規定：『人民有居住自由，其居住處所，非依法不得侵入搜索或封鎖』。現在隨時出入各戶，而且；跟着，前幾天，在『保甲區督察』要出入全中國每一戶，彷彿全國每一戶，上海的市民們又驚地緊張了一天戶都有『宵小匪跡』似的，這究竟是依什麼『法律』呢？難道不經人民同意，不願人民反對，某一『公僕』便可頒一佈告，作爲法律而隨意『侵入搜索』嗎？

據前幾天報載，單是湖北省，就有三十二個縣長被控貪污罪。由此可想到：中國目前的貪污枉法，已達到如何可驚的地步了。現在上海的警察們，前身既然是過去敲詐勒索魚肉人民的巡捕和偽警，如果待遇低劣，則大權在握，便可爲所欲爲，這黑誰能保證？不然，『待遇從優』，則『毛出在羊身上』，自然要和保衛團一樣

『在受襲擊時，也引起水花來的，這論是人，千千萬萬人？』

一把掃帚，阻住海潮的進程。想『萬世爲君』『要書坑儒』，可是『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結果總是存夢一場。由此可見不能隨便被人姦污，一切有關人的事情，應由全體人民作主。公僕力養得起太多的『公僕』，甚至不願自己養的僕人隨意進出，幹『無法無天』之寃探和干涉阻撓『文大美味報評語』，這乃是『民主主義基本權利之一』（字林西報評語）。（光）

選舉

代書人指作主張選民原意，連幾十張同姓名同號之無效票被發現！一句話，全十個選舉場的『唯一特點是：橫行進，無法無天！』這一切不擇手段的選，有兩區在難解難分中閉幕，另定日期再選。事後，三民主義青年團六，十一分團主任曾登報聲明：『……有區公所某職員指示某區投寫某人，該選民不甘盲從，某時乃將選舉票撕毀！』其他如代書人依選民意志書寫因此衝突者甚多。三日報載楊志『在大西洋英社招結者時，被榆林區三十四保保長林富稱，榆林區區長田信於選舉前表示，市府內定該區由……四候選方區活動……』

年團六，十一分團之報導全非事實，但無論如何，大公報對此次選舉作的結論是很中肯的：『候選人成敗之關鍵，第一在區公所保甲長身上，第二關在代書人身上。』不過，代書人乃由區公所保甲長指派，所以兩關實應合而爲一。即：成敗關鍵。明白地說，把持操縱，完全在於區公所保甲長手中。至於選票何以能變無派而且派出若干，全市選民若干，投票者又有若干……這些最易舞弊的問題，除當局及區公所外，只有天曉得，『同斗』們能過問！

像這樣舞弊和包辦的醜劇，如果在落後的窮鄉僻壤中演出來，許會沒有什麼反應，但在全國最大的文明都市上海，就不能不引起強烈的抗議了。因此，除了個別的路訴外，今天又有律師多人聯名控告市政府及區各區公所違法操縱舞弊。這些控訴也許無大效果，但這種醜劇畢竟演得太拙劣了，以致給幕後操縱人新演出：『即使是木頭似的，阿斗，也會明白；所謂『盛況空前的民主選舉』，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此舉日偽統治時代衣鉢的『民主選舉』，今天在選舉中又一次暴露出其虛偽面目；人民不談民主自由權利則已，不然，首先就非摧毀那束縛民衆的保甲制不可！（廣）

五卅運動的歷史教訓

韻寬

『五卅』——這個暴風雨的日子它曾掀起了中國民族革命的巨潮，它是中國歷史上永遠不能磨滅的一個日子。如果『五四』運動是一個對外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對內反對官僚軍閥的運動，那麼，『五卅』運動，便是這一運動的延續和進一步的擴展。其不同之點，在於『五四』是以學生及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主主義的，善於思想方面的啓蒙運動；而『五卅』則是以勞動階級為主要骨幹，用直接行動來反抗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

『五卅』運動的爆發，決不是出偶然，而是有其深遠的客觀原因的。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即逐漸陷入了殖民地的地位。致使國民經濟在長期間趨於衰頹停滯的狀態。第一次大戰，由於歐洲帝國主義國家無暇顧，中國民族工業一時獲得了相當的發展。但日帝國主義却又窮兇極惡地乘機向中國進攻，拚命在擴張其勢力，并以其種種特權壓抑中國的民族工業，大肆開設工廠，盡量剝削中國的工人。已使中國感到不能忍受，因而發生了『五四』運動。尤其自第一次大戰後，歐洲的英法帝國主義又重回到東方來，與日美等帝國主義在中國大爭，更使中國新興的民族工業陷於困境，中國的工人階級愈受剝削。但在一方面，中國的民衆，特別是知識青年們，經過了『五四』運動的經驗，逐漸覺醒起來，組織起來了。又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強烈影響和刺激，般會在『五四』運動中扮演過主要角色的激進分子，由民主主義的思想轉趨傾向社會主義（這從『五四』後新青年介紹社會主義即可證明）。中國的動者也開始覺醒，開始起來進行爲自身的利益而鬥爭，如一九二二年的赤大罷工和一九二三年的『二七』鬥爭，都是勞動者覺醒的具體表現。由於爭的經驗，他們體會到自己團結的必要性，於是產生了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組織，勞動運動也隨着開始發展，而代表他們利益的政黨也開始活躍起來，勞動運動和一般的民族民主運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這一切，便是造成『卅』運動之一般的客觀因素。

因此，在『五卅』運動尚未爆發，到處都預示着『卅』運動的風潮。日就巴相當普遍，是勞動運動也迅速地開展起來了。如全國鐵路總工會，中華海員總工會及沿海總工會的相繼成立，上海和青島日本紗廠的總罷工，學生運動的突起一般小資產階級的左傾，以及國民會議促進會運動的發展。這一切，都表了『五卅』事變未發生之前，各地民衆的組織及其運動都方興未艾地進行着。民族革命運動的火種，已經開始在各地燃燒起來。尤其五月十五日顧維鈞被日帝國主義的警察工頭打死的事件發生後，接着勞動者便集合起數千，到街上示威，遊行演講，反抗帝國主義，學生羣衆也熱烈地參加演講，此而遭逮捕。

當五月三十日一天，上海各校的學生，都組織了演講隊，分頭出發於公共租界各繁盛的路，散發『打倒帝國主義』的傳單，演講隊正紅被殺和學生被捕的經過情形，並且反對工部局所提出的『印印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註冊，解軍工法案等四項提案，獲得市民熱烈的同情和響應。當學生演講隊到南京路老開捕房，要求釋放被拘留的一百餘學生和工人時，市民也熱烈地參加，愈聚愈衆，滿街街頭，英捕即命印捕開放排槍，於是發生了南京路著名流血慘案！

當慘案發生的一天，上海大學的學生使全體動員到各校要求罷課，結果學校首先罷課了隨着工人罷工了，而商人也以罷市來響應。到第三日——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全市罷市了。從上午九時起，南京路上，充塞了散發傳單，演講的學生，人和市民。所謂黨國商團，四捕和印捕，持槍荷彈，如臨大敵似的全體出，先以自來水沖射羣衆，繼則開槍射擊，死傷比第一次還多。經過這一次屠殺以後，南京路上，戒備森嚴，儼然陷於戰鬥狀態。但經過這一次屠殺以後，民衆反帝的情緒，不但沒有減低，反而更爲激昂起來。因而反的熱潮隨着民衆情緒的激昂，而就愈益高漲起來。即連外國人所奴役的內務局，也實行罷工了，甚至一部分巡捕也罷起崗來了。

幾十萬工人的總工會，各界馬路聯合會，也組織起來了。他們一致向

事或到南京路一帶來。七月七日，上海各界發起反帝學生運動，由王雲五、曹聚仁、

事裁判權等十四條。尤其勞動階級表現勇氣最熱烈，到四日為止，罷工的總數，已達二十萬人。

南京路上的槍聲，震盪了全國各重要市。這一澎湃的巨浪，不到幾星期，就激盪於全國。北平和天津的學生六們首先起來響應。在武漢，湖南，九江，都相繼發生了學生工人與兵警兵和流血的慘劇。在廣州發生了特別驚人的六月廿三日的沙基慘案。因而引起了香港工人的大罷工，組織了省港罷工委員會，於是發動了普遍的反帝運動，尤其是反英帝國主義的大運動。從此，全國各大城市，都燃起了民族解放運動的火炬。不但各重要城鎮為這種革命的火炬所照耀，就是窮鄉僻壤，到處都能聽到『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不平等條約』的呼聲。在這種全性的反帝狂潮中，確實給了帝國主義者，尤其是英帝國主義以嚴重的打擊，使它們不能不在中國民族面前，表示讓步和低頭。而且這一偉大的運動，但震驚了全中國的人民，就是世界各國的勞動者也深深地寄予同情和援助。他們發動募捐運動，來援助我們的罷工工人。於是，以勞動者為主要動力的『五卅』運動，便成爲一個國際性的運動了。

『五卅』運動，在初期，無疑地是由全民族性的民族運動，不但工人，學生，一般小資產階級都踴躍參加。資產階級也有參加的。但其主要動力，却是勞動階級配合着學生羣衆。這運動是中國勞動者第一次指起頭來，開始大規模地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取自身利益和民族利益的解放運動。他們經過這次事變的教育，他們的階級意識大大地提高了；他們曾以自己的力量，行使他們的權威，如上海工會所領導的罷業，自動地沒收日貨，阻止外人需要的日用品運入租界；罷罷工糾察隊，用羣衆的力量來封鎖香港，來制裁對香港走私的賣國奸商。而一言之，這是羣衆運用自己的力量，以直接的行動去反抗一切帝國主義統治和壓迫，而成了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先鋒和主要動力。

不過，運動愈向前發展，階級的矛盾就愈益尖銳起來。帝國主義者一方面用『關稅會議』和『法權會議』來威逼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時又採用停止供給馬達電力於中國工廠的巧計來威逼資產階級，逼着他們去壓迫工人。在帝國主義這種威脅利誘的分裂政策之下，在中國資產階級的忠實本質所決定的條件下，他們開始動搖起來，開始對國主義謀取妥協，向勞動者進攻了。到了六月下旬，他們就主張復市，緩和復課。於是總商會代表着資產

階級的利益，而首先在月初實行復市了。隨即反對罷工工人，這就無異直接壓迫罷工的工人帝國主義者屈服，企圖瓦解這一運動。不但如此，而且他們還進一步地與海外僑商會妥協而暗示軍閥封閉上海總工會。如此，軍閥官廳得到上層階級和帝國主義的指使和暗示，就更奮勇起來，開始封閉工商學聯合會，員工會，洋務工會了。漢口的資產階級也跟着要求復市，停止罷工，軍閥和他們一鼻孔出氣，猛烈地壓迫工人和民衆。天津，青島，濟南的工人和生運動，也隨着遭受直系軍閥的摧殘和壓迫。這便是軍閥官僚資產階級在民族解放運動中所表現的態度，同時也自行揭穿了他們本來的面目。

於是，這一帶有全性的民族運動，已經分化了，各種勢力，逐漸形成了兩個對立的營壘；一面是工人，農民，左傾的知識分子，學生，小店員；另一方面，是帝國主義者，軍閥，豪紳地主和買辦式的資產階級，以及一般沒落的小布爾喬亞的識分子。

『五卅』運動，雖然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摧殘，資產階級的出賣，而受了挫折，但這不過是大浪中的一個低波而已。革命的潛勢力，還在不斷地向上滋長着。在『五卅』運動的過程中，幾十萬勞動者的組織，如上海總工會和省港罷工委員會所經鬥爭，使勞動者漸漸地體會到自己偉大的團結力量了。他們在這個運動中表現得最堅決最勇敢，起了急先鋒的作用。其次，是學生羣衆及一般左傾知識分子，他們的行動，表現出在這一運動中是一個極大而有力的輔助隊。在運動的末期，農民也組織起來，行動起來了。尤其是廣東，兩湖的農，都起而反抗地主及土豪劣紳，開始打擊他們了。這幾種龐大的民衆力量合起來，便釀成了中國的二次大革命運動。如果不提機會主義者領導的，勞動者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大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來主宰自己的命，完成民族民主的任務，走向徹底解放的道路了！

由於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以及一切反動勢力的排殘和鎮壓，更由於領導者過分相信上層資產階級的謬誤觀念，二次革命流產了，千萬革命的健兒，英勇地被犧牲了，他們血，足以匯成一條河流。從此，中國的歷史車輪，被這一逆流拉向後轉。果，遭到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八年的苦戰；同時受到二次世界大戰的節，使中國的人民大眾，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無法自拔！戰後的中國，雖然表面上是『五強之一』，然而實際上，却是滿目瘡痍，充滿矛盾和陰霾。國的人民大眾，尤其是工農大眾，（下接第七頁）

關於國民大會

劉乃光

國民大會在中國，從民國十二年錕以三千元一票的賄選「大會」之後，直到今天還依舊是只聞雷聲，不見雨。抗戰中，人們藉口「軍事第一」，把國民大會再三地擱擱起來。和平，要求政治民主化、要求召開真正代表民意的國大底呼聲，就和物價的增高一樣，愈來愈響徹了雲霄，響徹了全國。於是，政府決定在今年的五月五日召開國大了。後來，爲了對其他黨派讓步等緣故，牠臨時又被宣佈無期地展延了。雖然如此，在民主運動方興未艾的今天，趁國大還未召開的夜，我們來研究目前中國爲什麼和怎樣召開國大，絕不會是多餘的吧！

無可諱言的，從帝國主義的鴉片商品和大砲攻進閉關自守的中國以後，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已把中國逐漸爲半殖民地了。這些外來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頑強地阻礙着中國無上近代文明國家的道路。雖然在日帝潰敗之後，具有「大國民風度」的人，都狂呼中國已在「晝夜之間，由半殖民地的地位，一躍而爲世界上三五之一了」。但實際上，這只是一種自欺欺人的夢囈而已。因爲人們即使看見經濟、政治和軍事各方面的對外依賴性，至少也應該承認：香港、九龍澳門還沒有收回，旅順、大連及其他權益又被割去了。這就無可爭辯地證明中國還不是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的國家。相反的，由於直接壓迫者日帝之打倒，中國民族的信心也跟着增進了，對新的外來壓力也比前難於忍受，而更加希望掙脫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以獨立發展本國的生產力。因此，由的民族獨立任務不但沒有解決，而且快要用一種新的方式提出來了。另外，與民族任務同等重要的，是國內的民主問題，即農民的土地問題。因在落後的中國，尤其在長期戰爭破壞後的今天，所有的土地都差不多集中在少數的大地主手中；而佔壓倒多數的農民們，却愈來愈多地喪失了土地，全陷於赤貧之中了（據聯統統計目前中國有三千萬飢民，單是「兩湖熟天下足」的湖南，就有七百萬飢民）。假如不解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問題就無法提高廣大民衆的生產力和購買

價昂貴、過去日帝好的敲榨擄削、奸商的囤積居奇……一切的痛苦都落在工人身上，但他們生產過程中是佔着決定性的重慶地位，在反帝反封建軍閥的鬥爭中起過偉大的作用的，所以改善工人的生活，正如改善農民的生活一樣，對於產的發展上是急不容緩的。

這些民族民主問題，乃是落後中國所必須解決的歷史任務。但中國最近幾十年來的政治歷史告訴我們：一黨官僚專政的政府，絲毫不能解決這些關係到全民利益的史任務（我們在下面就要進一步用牠自己說的話來證明這一真理了）。要決牠，必須用人民自己選舉出來、真正代表民意的政權機關——國民大會當然，能够代表全民意志去執行的，並不是一般的議會制度，更不是那種而不決、決而不行、或包而不辦的包辦會議，尤其不是像以前袁世凱、曹錕那些強姦民意的「國民大會」。反之，牠必須是具有充分權力，能够解決一切重大問題，特別是上述幾個的國家最根本的問題，且由地推選代表以執行行政司法機構來執行。

像這種「全國國民大會」，在近代史上，可以找到不少的先例。最有名的是「六四〇」至「三三」年的英國「長期國會」，和「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國民會議。牠們一經成立便成了全國最高的政權機關。前者代表人民的要求，通過了所謂「大抗暴的法律」，組織軍隊戰勝國王，宣佈英國爲共和國。後者一面宣佈了「人權宣言」，認爲人權喪失乃社會貧困和政府腐敗的原因，因此在莊嚴的宣言保證一切天賦的，不能讓與他人的人權；另一方面，實行沒收教會財產，消封建特權，以及決定許多社會的經濟的立法，來對抗國王、僧侶和貴族。

除了國大的職以外，真正代表民意的國大，還必須同時具備另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真正用普通、平等、直接、不記名的投票方式，即由一定年齡以上的國民，不分性別、階級、等級、職業和黨派，都可以在各該選舉區內，用記名的投票方法，直接選舉出自己的真正代表。

且要全國國民能多清楚認識國大是真正代表民衆自己利益的，以便加

以慎重的選擇，那就必須讓參加競選的各黨、各團體和各個個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信仰完全自由，以發表各自的主張，互相展開熱烈的批評。沒有這一先決條件，「普選」只是騙人的。

對於國大這些基本的條件，在歐美各國民主政治中，原已成了早就實現過的「常識」了。但在真囂「還政於民」、「主權屬於全體國民」的中國，在國大還未召開的今天，且讓我們鼓起來，正視一下實際的政治狀況，並將它和上述的「常識」對比一下吧！

首先，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五日由國民政府公佈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劈頭第一條就遠離了一切民主國家的憲法精神，強行用某一政黨的主義，規定「中華民國為三民主義共和國」。依這一地來推論，那麼中華民國的法律就是以服從三民主義為準繩的法律，凡違背三民主義的人民自由或權利，都可依照第二章第二五條「保障國家安全、地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的法律來加以「限制」因而，第二章所裝着的「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或處罰」的身體自由，「依法律不得限制」的言論、出版，「秘密通訊」、「信仰宗教」（注：還只限於宗教的信仰！）等自由，都可以被解釋為「保障國家安全……必要」的法律來「限制」，這就毋怪乎除極少數已釋放外，全國的監獄和「中營」裏，還依舊充塞着「依法限制」其自由權利的政治犯。人民的「自由都「依法限制」了，還談什麼「普通、平等、直接、無記名的投票選舉」？還談什麼「主權屬於國民全體」？最近，在上海市參議員的選舉中，推出了許多黨派舞弊，保甲人員操縱選舉場，和「選舉人」被威脅服罪……諸如此類的悲喜劇；事後由於青年團第六、十一分團主任之登報聲明「政府發言人」之公開反駁，遂更加清楚地暴露了「普選」到底是什麼玩意兒，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的上海，尙且發生這類怪現象，其他落後地方「普選」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關於這次國大代表的產生問題，據本月三十日公佈的政協會決議說，國大代表總計為二千〇五十名，其中增派及社會賢達代表「七百名，由政協會「協議」分配之；除新加台浙等代表一百五十名外，餘一千二百名「合法產生」的代表仍照舊。這一千二百名代表，是這樣地「合法產生」於十年之前的：依選舉法規定，由地籍長、職業團體執行機關及軍隊推選出來的候選人，經國民政府圈定應代表之兩三倍，再把「載明國民政府所指定之候選人全體姓名之選舉票」送全體「選舉人就中圈定一人」

。十年前如此「保姆式」的「合法產生」的代表，難怪今天還是那樣地受人擁戴，那樣地受人尊重甘願了！

其次，據最近政協會修正，「國大為有形之組織」，牠的職權僅限於制定憲法，而行憲機關的大則定於憲法頒佈後六個月內，依法規定而召開。但無論如何，我們從這些代表之所由產生這一角度看來，就或多或少地可以想像到：以後國所通過甚至行使的憲法，將會給予廣大民衆一些什麼東西，將是否可能解上述的民族民主解放任務。

英國十七世紀中葉的期國會，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憲章運動，美國在獨立戰爭中產生的憲法，法國十八世紀末的國民會議，德國二十世紀初的章馬憲法，以及俄國立後的蘇維埃憲法……所有這些歷史經驗本身，證明牠們的真實的偉大成績都是民衆以血和肉的鬥爭換來的。反之，中歐在近數十年來的什麼清和法、臨時約法、天壇憲法、和臨時約法等，都因為牠們僅僅是幾個人物「自吹自擂的滑稽戲，既不能代表民衆的利益，也得不到民衆的幫助，結果，牠們都在廉價的大拍賣中自生自滅了。從這些中外歷史的經驗中，我們可以了解到：任何舊制度都絕不會自動退出政治舞台的，因為不會自動給予被統治者以自由權利。真正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絕不能在想奇蹟或哀求贈給中從天而降。牠只有用民衆自己的力量才能爭取得到。此，每一個不願永遠受人奴役和壓迫的人們，都應該起來爭取自己的利益發表自己的意見，並為這些意見和利益而鬥爭到底。這是一天賦的、不讓與他人的人權，同時，也就是或不承認的歷史職責啊！

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

（上接第五頁）如果不解「五卅」運動及二次革命失敗的原因，不去接受這個血的歷史教訓，去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我們從「五卅」運動的過程，以及二次革命的失敗，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教訓，就是在半殖民地中國民衆，尤其是工農大眾要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自由，首先必須完全脫離帝國主義的羈絆。要脫離這種羈絆，獲得自身的解放，必須完全依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決不能幻想什麼恩賜。國內的矛盾紛爭，決不能靠什麼和天使來斡旋，也不能靠軍事上的投機和政治的勾結來解決。因為這樣只會加重人民的痛苦，加深矛盾的嚴重性。中國的命運，將決定於人民大眾，去是工農大眾政治的覺醒和能否接受「五卅」運動和二次革命失敗的教訓。

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過程

碧 遙

一·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基本條件

日本婦女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東京女學校成立以後，開始得到了受教育的機會。明治九年土居光華發表了『近世女大學』，針對傳統的婦女經典『女大學』而作，鼓吹『日本婦女，應與男子同樣有人民權利』的平權思想。明治十八年，福澤諭吉著『婦人論』，次年又著『男女交際論』，鼓吹歐化，使日本婦女努力從舊禮教，舊習俗中解放。

中日，日俄兩戰役而後，勝利的日本抬頭了日本主義與個人主義兩種思潮。日本主義，促使日本婦女發生『國民』的自覺，欲打斷奴隸的鎖鍊；個人主義則更使日本婦女發生『人』的自覺，處處欲維護人格，人權。易卜生的『娜拉』、『海上夫人』；蘇台曼的『故鄉』；是當時婦女界最歡迎的讀物。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三)，日本婦女組織了『青踏社』，出版文藝性的『青踏』雜誌；婦女與男子競爭文學的領土，是相當大膽的嘗試。主要的女作家，有平塚明子，田村俊子，野上彌生子，與謝野晶子，長谷川時雨諸人。

但向社會各方面爭取解放的婦女運動，卻是開始於大正九年(一九二〇)的『新婦人協會』。該會活動的綱要，為：

- (一) 設大學程度的婦女講習會。
- (二) 設勞動婦女的夜校，發行勞動婦女的報紙。
- (三) 各地開講習會，演講婦女勞動問題，及一般社會問題，時事問題。
- (四) 設有關於婦女各種特殊問題的研究會，依會中的決議而起實際運動。
- (五) 聯絡各地婦女幹部，作全國性的實際運動。
- (六) 發行機關雜誌『女性同盟』。
- (七) 設婦女寄宿舍，附設婦女旅館。
- (八) 設婦女簡湯食堂，製菓所，運動所，圖書館。

由上流有閑婦女的文藝團體『青踏社』，轉而為一般婦女解放運動的『新婦人協會』，其間的進步，不可以道里計算。而促成這進步的因素，則為社會生活的根本變化。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資本主義急激發展。根據大正九年日本的第一回國勢調查；其時日本國內有自己收入的婦女，總數為九百九十五萬五千人，其中工廠女工為八百一十六萬人，(占其百分之八十二；鑛山，交通機關等處工作婦女一百七十萬人；知識分子的職業婦女十七萬人。小資產階級以下營着自食其力的婦女如此之多，她們內受家庭制度的壓迫，外受資本家的剝削，婦女解放運動，便有了發展的根據。

同時，蓬勃的資產階級，正醞釀着民主運動，欲肅清專制的政治勢力。政黨為拉攏民衆，提出各項政治解放的諾言；對於在政治上，社會上處於從屬地位的婦女，盡力鼓動她們的自覺。大正十一年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達於最高潮，『新婦人協會』受了他們的提攜，政治上得到了一點收穫，即治安警察法第五條第二項的修正案，在衆議院中由各大政黨提出通過；從此婦女有政治演說及集會集社之自由。

由這一勝利的鼓舞，婦女運動的團體，產生了許多，如『婦人聯盟』，『婦人參政同盟』，『女子學生聯盟』，『全國廢娼同盟』，『婦選獲得同盟』等等。然而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眼看在他們的潮流之中，來了巨大的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浪頭，便立刻向專制勢力送秋波。以前發出了的普遍的諾言，隨風吹散。各大政黨與專制勢力又復合流，日本便向帝國主義的反動政治邁進。

到了大正十三年，婦女團體次第凋零。這一方因為她們的領導者本身多屬於小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則因為支持她們的政黨勢力，已因產業界的觸礁而退後或調轉了方向。

但其時勞動運動方興未艾。大正十三年勞動總同盟分裂之後，十四，十五年無產階級的政黨中發生了激烈的鬥爭與分化，一部分活動，由勞動農民黨代為展開。勞動農民黨對於婦女解放工作，作成了三類綱要。第一類：

廢除女子在公法上的差別，『禁止女子人身買賣』，『撤廢關於女子教育與職業的一切限制』。第二類：『禁止婦女夜間勞動，坑內勞動，及危險作業』第三類：『撤廢日用品的消費稅及關稅』，『對於戰死或廢兵的家屬，由國家予以扶養』。

這時日本婦女因被禁止加入政黨，便成立『婦人同盟』，以工廠女工及職業婦女為主；解放工作，日更澈底。

二、日本政府及資本家的婦女政策

日本婦女的解放運動愈走愈激烈，放棄了民主運動，而漸趨沒落的日本資產階級，與專制的舊政制愈結愈緊。他們不但不像以前的支持婦女解放，反而要將被壓迫的婦女，封鎖於從屬的、奴隸的地位，以為反動政治的保障。所謂全面的產業合理化，便是對勞動婦女權取的強化。

同時政府更對婦女大眾施行催眠，提出婦女組織網的問題；具體的方法，一方組織全國女子青年團，一方組織愛國貯金會。女子青年團隸屬於內務省（內政部），由文部省（教育部）予以補助費，受體育與政治的訓練，其目的不問可知。愛國貯金由勤儉獎勵婦人團體執行，也是隸屬於內政部，由內政部委派名流夫人為執行委員。名義是因日本有十四億七千八百萬元的外債，由五千九百餘萬的日本國民，每日貯蓄一錢，自一九二六起以後之六年間，合得十四億七千五百萬元，便足以償還外債的全部。實則這筆負擔，大部是加於下層社會；而這筆貯金，又可以供給政府，用於反動方面。

此外尚有愛國婦人會，以全國名流夫人為中心，更網羅各地方長官夫人，目的在沖淡婦女的解放意識；所謂工作，不過是陣亡者的子弟的教育之類。另有篤志看護婦人會，努力於戰時看護的訓練。

資產階級的使徒，便以文字向婦女催眠。『婦女俱樂部』雜誌，儘量提倡忠君愛國，良妻賢母，孝女節婦等等的奴隸道德。『婦人之友』雜誌，蒙着基督教的謙讓的外衣，進行同一的目的。其他代表小資產階級思潮的『婦女界』雜誌；庸俗的家庭道德論的『主婦之友』雜誌；代表頹廢的思潮的『女性』，『婦人公論』雜誌都是同一鼻孔出氣。

三、日本婦女在戰爭期間所處境遇

日本統治者在準備侵略戰爭的前夜，便已對婦女有種種的設施。等到戰爭開幕，那種物品的統制；薪金的減少（薪水特別減低，且大半化為公債

）；工作的加重與時間的延長（以前鑛工，化學工人等不用女工，戰爭時期多由女工担任）等等，生活的壓迫與政治的壓迫，非常嚴酷。而更不合理的結婚一事。青春少女，用『報國』的美名，使之和出征軍人結婚；和殘廢軍人結婚；完全不管相識不相識，相愛不相愛。結婚之後，便得奉老撫幼。又有所謂『大陸新娘學校』，目的在製造一批侵略我東北的女先鋒隊，新娘的幸福與否，全不考慮。

戰時一切的婦女組織，都是在侵略的『國策』之下成立而。所謂『婦人報國會』，『女子挺身隊』等等，無非是榨取婦女的精力和生命，以供軍閥政府的孤注一擲。而那些婦女解放的戰士，不是遭了拘囚，便是被派赴危險地帶。

四、日本婦女戰後參政運動的成功

長期間在封建制度之下完成了的日本婦女的從屬地位，雖在明治維新，封建制度消滅之後，仍舊沒有何種的改變。反而因男子大眾的政治權利的獲得，在新日本帝國中，以政治的，法律的，使婦女的從屬地位制度化。

然而自從大正十年日本資產階級遭遇了經濟恐慌以後，資本家便一直是向勞工採取工銀減低，時間延長的攻勢，自然而形成男工日減，女工日增的狀態。加以八年征戰，壯丁全部送往海外，生產工作，大都操於婦女手中。以如此的客觀形勢，除卻法西斯蒂的恐怖政策以外，任何政府，都難使這些被壓迫的婦女，安然就範。而況反動的軍閥政府剛已坍台；噩夢方醒的日本民衆，都有民主政治的要求，日本婦女自不能不要求解放，要求參政。

戰後日本婦女的要求參政，既是必然的趨勢，即便沒有麥克唐納的特別恩賜，也將竭力以爭。一旦獲得了麥帥允許參加普選，便十分踴躍進行。開票結果，初次登場的婦選，竟得三十七席，佔國會席位的十二分之一。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中婦女議員的席數，除卻法國婦女此番選舉大獲勝利，達到總額的百分之十以外，其餘沒有一個國家及得上日本婦女的記錄。至若美國國會的議員，不過佔總額的百分之二。日本婦女二十餘年來所爭取的參政權，現在總算已經開始實現了。總算是一個初步的勝利。她們這一次的勝利，對於正作階下囚的日本軍閥，當是一種相當深刻的幽默；叫他們拉長苦臉，哭笑不得。

日本的政治舞台，已為被壓迫的婦女開放了。雖然這『開放』是在一種外力的『恩賜』下，但如果日本婦女以後能運用自己的力量起來不斷鬥爭，她們是有進於光明的可能的。站在婦女的立場，我們深深地為日本婦女的前途祝福。然而反觀我們的祖國，霖雨正在光臨，濃雲密霧，浙瀝不盡；不知何時始可見天日？勝利的虹彩驟即消逝，瞻望墨黑的天際，能不恐懼隨之？

世界大戰還會再來嗎？

劍 光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結束了，人民似乎是在咒詛戰爭。但歷史告訴我們，過去有許多剛從戰爭的疲乏中恢復了健康的國家，急不暇擇地就要找一個賭博的機會。若是不幸而戰敗了，人們就把責任往野心家頭上推。然而當一個國家快踏入戰爭的時候，她的人民可以說是興奮得像瘋狂一般。「這是煽動家搗的鬼！」不錯，煽動家野心家是罪魁禍首，但煽動家野心家是隨時隨地都在等候機會的，人民既吃了他的虧上了他的當，要不要再受他的煽動上他的當呢？要不要把我們的生命財產作為他賭博的籌碼呢？

或許有人說戰爭雖然破壞，但破壞是改進的初步，同時戰爭可以促進科學，同時戰爭淘汰了庸劣份子，同時……真的，不但有人這樣想，還有學者替他辯護呢？

依據蘇氏 (D. Sorokin 帝俄時社會學家) 的說法，就是現代的戰爭中，智力依然佔着優勢，因為假使所用的武器是相等的話，智力和聰明高人一等的士兵，戰勝敵人的機會，總是比較的多。這便是說，智力高的人所加於低的人的損害，必定要較對於所加於己方的為多。所以，在現代的戰爭當中，優秀者的生存機會，還是比較低能的方面多一些。就拿射擊講，凡是射擊技術精良的，必定能够多殺死幾個敵人，這便無異減低自己方面被殲滅的機會，而增加生存的機會。現代的武器還是和人的聰明智力有密切的關係。所以戰爭所淘汰的，依蘇氏說，不能說是人口中的優秀份子。

雖然，現代戰爭間接所殺死的人也是盈千累萬的，可是蘇氏以為這種戰爭的非常死亡率對於人類並不一定有惡劣的影響，因為凡是遭受了種種折磨而仍能不死的人，顯然是生活力最旺盛最適應於生存的份子。意大利社會學家傑尼 (C. Gini) 和薩伏南 (T. Savornan) 也以爲戰爭並不一定會消滅優秀的份子，因為在戰爭的過程中，男子雖然因為從軍的緣故，遭受極大的打擊，數目大見減少，可是女子的供應却跟着增加起來。結果，除了優秀的女子之外，便很少結婚的機會。因此庸常低能的女子就很少綿延種族的可能性。所以戰爭雖然淘汰了許多優秀的男子，但因為優秀女子延種族的可能性多於

平庸女子的緣故，人口中的優秀份子還是能够傳綿下去。

德國的斯坦恩格博士 (Dr. Steinmetz) 對於這個問題，尤其說得動人聽聞。他以為在近代戰爭當中，直接死於槍林彈雨之中的，事實上不過四分之一，但死於疾疫災荒的却佔到四分之三。這就證明戰爭所淘汰的祇是那些生活力本來不強的居多，至於生活力強勁的優秀份子，雖然遭盡了無限的折磨，還是能够免於一死的。反之，和平對於人類反有惡劣的影響。第一，和平足以促使人類的退化，因為唯有在和平的時候，一切的罪惡就增多，人類的活力便喪失，同時人類中庸碌無能的份子也就繁碩而蔓延起來。

斯氏又以為戰爭不僅是個人優秀的選擇者，同時更是團體或種族民族優秀的選擇者。他的意思以為：兩個團體或民族當中，何者為優秀何者為低劣，何者的聰明才智高，何者的聰明才智低，何者有較多的生存權利，何者沒有較多的生存權利，都決定於戰爭。因為在戰爭的過程中，需要競爭的不僅是交戰雙方的體力，還有雙方的智力，雙方的社會團結力，以至雙方的道德律，精神力，總之，是雙方的總力。所謂勝利，那便是一國所有力量總動員的結果。征服者就代表這許多多力量的優越。被征服者便表示這許多多力量的低落。沒有戰爭，那末這種團體種族民族之間的優劣便無從發現，因而天演的淘汰也就無法進行了。所以依照斯坦恩格的說法，戰爭是選擇優秀人種的天然法則，所不利的祇是低劣無能的人羣而已。(見中華月報六卷一期)

這一種可以說典型的納粹思想及帝國主義思想。我們早已知道民族間祇有文化程度的差別，無所謂種族優劣的。而各民族文化之發展也依客觀條件而定，根本與種族的優劣無關係。民族的優越感可以由各民間相互卑視的矛盾中自求其解答。漢族向來稱異族人為「蠻貊」，但後來也被稱為「南蠻子」並且被征服了。等到高鼻子藍眼睛的洋大人坐着砲艦擁進中國來的時候，更變為又可笑又可憐的「野蠻民族」了。希臘也向來稱外國人為「野蠻人」(Barbaros) 但現在他的一切唯野蠻人之馬首是瞻了。誰是世界上最低劣民族

呢？誰是民族中的庸劣份子呢？耕田，織布，做工的是庸劣份子麼？賭吉普卡，跳華爾滋，談羅曼史的是優秀份子麼？

凡是「老百姓」誰都想不出一個戰爭的好處來。但戰爭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更不是一個「英雄」所能創造的。英雄決不能以他的自由意志來創造歷史。「自由意志不是別的，祇是人認識事實以解決問題的能力」（恩格斯）戰爭實在是社會畸形發展的一種必然的結果。凡要了解國際戰爭的必先瞭解資本主義的本質。自從新航路新大陸發現，殖民地開拓，工業革命以後，整個世界由封建制度轉變為生產手段私有，並以交易為生產目的之資本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的自由經濟之下，生產是無政府狀態的不平衡的，所以帝國主義戰爭及經濟恐慌早已在這兒下了種子。先進國家的資本家一方面在本國榨取他的勞工，但為求得產銷的平衡及原料的來路，更以他榨取所得去榨取落後的國家。

「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大資本家的壟斷集團的統治。當一切原料資料都被一個集團支配着的時候，這種壟斷都是非常穩固的。上面已經看見，國際的資本家集團欲使對方沒有與之競爭底可能，怎樣狂熱地努力於購買一切鐵礦油田等等。所以，只有殖民領，可給壟斷對於競爭者的鬥爭危險——這種危險包含競爭，以法律手續建造國家壟斷底可能性——以完全成功之保證。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需要愈是急切，全世界上的競爭與掠奪也愈激烈，殖民地攫取的鬥爭也愈加兇猛。」（列寧：帝國主義論）

「為着世界市場的銷路而實行的國民的獨占之鬥爭，逼着資本家不能不締結國際的協定。世界市場的分割，必然是「依靠資本」，「依靠力量」而行的。但經濟的政治的領域中不平衡的發展，急速的變更獨占者之間的勢力關係。所以國際的獨占是沒有永久性的。因此，財閥政治，為着投出資本，取得原料，和輸出商品，就努力在地理的意義上去設定所謂「勢力範圍」。但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國際帝國主義者對於世界的分割與再分割，就由和平而轉到戰爭——帝國主義戰爭。布爾喬世界，事實上已為帝國主義者所分割。所以為世界的再分割而實行的戰爭，在帝國主義時代，是不能避免的。」（李達：社會學大綱）

明明這些戰爭是由資本主義促成的，但世界各國的人民看到資本家的表演、聽到資本家的謊話、受到資本主義法律的驅策，於是捫着槍向他素不相識的人衝去，人間有比這更淒慘的悲劇麼？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在國內被壓

榨得快要死滅的人竟又被趕到火線上去犧牲——不准後退，不准顧慮，要「勇敢」。他們的確是很勇敢的（？）他們以自己家破人亡的代價，為着資本家的利益，去換取「敵人」的家破人亡，而這些「敵人」與他們無怨無仇素不相識，實際上還與他們同是被壓迫的可憐蟲呢！

比較有良心的資本家（就是希望資本主義殺人的時候不要有血腥氣，更不要看到紅色恐怖的資本家）就紛紛討論如何可以消弭戰爭。「戰爭能不能消滅？」資本家及候補資本家覺得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於是做書呀，做文章呀，演講呀，座談會呀，辯論會呀……似乎資本家與資本家或資本家與勞工相調和便可以消弭戰爭了。於是他們得到許多結論——互相了解、互相讓步、經濟互助、文化溝通……

這些討論是多餘的，誰要戰爭誰自己上前線去就是了，誰要強迫大眾欺騙大眾去參加他們所不願意參加的國際戰爭，那大眾為什麼不可以起來打擊他呢？前面我們會引李達的話表示資本主義存在一天戰爭就有一天不能消滅，這是很對的，但是他接着又說：「他（蘇聯）也決定一國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性」（同書第六一頁）。事實告訴我們，蘇聯之存在非但不能消弭國際戰爭，非但打起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英雄主義的旗幟去參加了戰爭漩渦，並且還準備着下一次大戰。無產階級在「一致對外」的烟幕下失去了他們的意識。歷史又在兜圈子了！

不把提階級真理的人是永不能解決戰爭問題的。等着吧，在討論休戰與和平的「真正」戰犯們！人民在血的洗禮中獲得了更多的啓示，他們將從戰場上回來，各自到老家用清算他們的血債，那時候人類字典中沒有「戰爭」一詞了，國防計劃可以丟進字紙簍去，軍火商可以掃砲灰去，社會的寄生蟲可以絕跡了。朋友！你對戰爭覺得煩燥麼？但煩燥是沒有用的，趕快去理解罷！

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青年與婦女 第三號

▲每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人：青年與婦女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青年與婦女社
通訊處：雲南路二二六弄四號
經售處：五洲書報社

▲本刊已呈請登記中

本期實價法幣六百元▼

對症下藥消除內戰

青直

抗戰結束，接着應當建國了。可是，正因為那制死命的外敵——日本帝國主義——的投降，使得在抗戰期中就暗暗進行着的內戰，更以無與倫比的姿態顯現出來。其範圍之廣，動員士兵之多，以及對整個國民經濟破壞之深，實不亞於任何外來的侵略戰爭。復員停頓，交通中斷，通貨依然膨脹，物價問題仍然無法應付。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破壞之後，又來了內戰的破壞，方欲和平休息，喘一口氣的老百姓，又在戰神的羽翼之下戰慄了。難道我們就不能夠不應該過一些和平的快樂的日子嗎？

『我們需要和平！』

這是今日老百姓一致的呼聲。那麼，我們首先就要研究、明瞭為什麼在對日抗戰之後還要再打內戰呢？為什麼在受盡了敵人的長期的屠殺之後還要自己來扮演自相殘殺的悲劇呢？

我們需要和平！這是當然的。但是我們對和平還要抉擇。因為，假如我們任何形式的和平都能接受的話，那我們早應該擁護注精衛的『和平』政府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宰割，何必還要千辛萬苦的抗戰八年呢？

我們不僅要和平，而且還要過人的生活。我們是人，我們要求有人的權利，有和別人同樣多的權利。在現在的中國用一句話來說，就是需要民主，我們要過民主的和平生活！

我們需要『和平』和『民主』。我們並不僅僅要求朦朧的停戰。我們必須明瞭在怎樣的意義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永久的停戰，而不是使停戰作為一種欺騙性的暫時停戰，而過渡到一個更狂烈的戰爭中去。而且這種只能加深，絲毫不能解決問題的朦朧的停戰，是一種幻想，也是人所共知的。

現時內戰的雙方，表面看來似乎僅是國共兩黨武裝力量的鬥爭，其實並不如此簡單。它動員了數十萬的士兵，幾百萬的人民，這僅僅是國共兩黨的力量嗎？不是的，它正像其他的戰爭一樣，是有特定的歷史因素在裏面推動着。

它實在多少包含着——一種農民反抗特權者的戰爭的因素在裏面。

自從滿清帝制政權推翻以後，中國歷史上的民主革命完成了嗎？沒有，推翻了那封建專制政體，換了一個『中華民國』的稱號，還僅僅是完成了民主革命的軀殼，僅僅是一個開端，而骨子裏却依然如舊，却還待繼續完成。地主階級依然存在而且壯大，土地的迅速集中，大多數農民失去了土地而變成仰地主鼻息的佃農；而在城市裏，在新興的資產階級得了一切的控制之權後，便拋開了昨日的盟友，而爲了自身的利益，爲了不使飢餓的農民和勞動者獲得和自己相等的權利，便與民族民主革命的敵人——帝國主義和官僚地主資產階級緊密的結合起來，共同一致的對付階級敵人。而中國的民主民族革命就在叛賣與流血後輕易的流產了。這正是中國數十年來革命的實質。

帝國主義的侵略，財富和土地的集中，鄉村的破產，使得廣大的人民都瀕臨在死亡線上。專橫的統治，一切自由的被剝奪，將廣大的人民投入黑暗的深淵。特權者與被剝奪者間的一天天日益增長的對立，不就是數十年來國民生活的實質嗎？

終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到了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這種侵略要以軍事力量鯨吞全中國，是不但要把全中國的受苦的人民淪為奴隸，而且連地主老爺和特權者的利益也受到嚴重威脅的時候，於是，不管是特權者或地主資產階級，才在大多數羣衆的一致要求抗戰的壓力之下，發動了抗日的戰爭。

政府的無能，政治的腐敗，在抗戰中暴露無遺。抗戰成了拖戰。軍事上節節失利，政府西遷，廣大的土地淪入敵手。爲了保衛家鄉，保衛祖國，一部份農民羣衆轉入了抗戰的漩渦，參加了遊擊戰爭，並在敵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解放區』，多少獲得一點改良（如二五減租等），獲得一點自由。現在，抗戰勝利了，難道他們這些在敵後奮戰八年的戰士們，就情願放下武器，放棄自己已獲的權利，再回過頭去來安份守己的過那種半奴隸狀態的生活嗎？

不可能的！除非他們的領導者心甘情願背棄了他們，即令背棄了他們，他們也會單獨奮鬥的。

（下接第十六頁）

對於尊師運動的看法

衛星

幾天來，報紙上以最大最顯著的地位登載着『尊師第一』，街頭上貼滿了『尊師』的標語、圖畫，學生們三五成羣的向路人以求乞的方式在銷售尊師章，大人先生們也不斷地爲『尊師』在無線電播音機中呼籲，最近，還不惜賣一下大腿爲窮教師們舉行了一次足球賽。多麼光榮的教師啊！他們在不同的場所、不同的方式底下被『推尊』被『崇拜』了！

『尊師運動』的產生是由於三月二十二日市立中學教師的怠教。教師們在這通貨膨脹、物價飛騰、生活發生困難的環境下，卸下了以往『師道嚴嚴』的面具，不借步着一般工人、店員等勞苦大眾的後塵，作了這一次爲生活而掙扎的怠教。

教育局方面的經費若有餘裕的話，那麼只要劃出一部分來，這一問題便很容易解決的了。但是，在教育經費只佔市政府支出預算的百分之六的情形下，叫教育局怎樣來處理呢？縱使有了經費可能增加教師待遇，獲得解決的話，也將囿於『公教人員一律待遇』的法令而給牽制住了；因爲要是教員待遇一旦提高，全國的公務員勢必也要要求提高待遇；這樣牽一髮而動全身的事情，在整個國家的財政支出上，將要增加一個龐大的數字，而這個數字是否我們現在的政府能够負擔，却是一個問題。在這樣的困難情形下，我們聰明的市政當局，便想出了這一個『尊師運動』的妥善之計：一方面可以藉此籌劃一筆經費來補助教師們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可避免刺激其他公務員的要求增加待遇以致而影響

整個國家的財政支出。

所以尊師運動的本質完全是一種爲救濟教師生活而產生的慈善性的募捐運動。在這尊師運動產生的意義中，我們又可以看出兩個事實，就是：教育界的貧乏與整個社會經濟崩潰的危機。

戰爭剛結束的時候，大家嚷嚷着：『建國！建國！』在這建國的綱領中，又把教育推爲第一。教育部與各省、縣、市的教育廳、局，爲配合着這『教育第一』的建國綱領，便不斷地頒佈掃除文盲推行國民教育的計劃與規程等，並且雷厲風行的命各地、各機關舉辦國民教育班、民衆夜校等；工作是那麼的艱巨，責任是那麼的重大，範圍又是那麼的廣泛。但是，在二中全会根據行政院報告，全國教育經費僅佔全國支出總預算中的百分之四·七。這百分之四·七的教育經費，對整個中國的教育事業能發揮些什麼樣的功能？那真不啻在對這『教育第一』的建國綱領下一個強烈的諷刺！

在這種事實與計劃差得太遠的情形下，令我們的教育工作人員做些什麼呢？但是教育行政當局爲了顏面、爲了報銷，又不能不做。因此，便不惜削足就履來敷衍塞責——對教育上的一切設施，都只着眼於表面上、數字上的觀瞻。結果，學校設備的改良可不顧問，而學校數量的增加却急不容緩，學校教育的成績如何可不理會，却又孜孜於學校中的班級數與學生數的增添。

但是另一方面對於教師却又不同了。教師們的

資格、經歷、要很嚴密的審查，教師們教學的效率要慎重的考核，但是教師們的生活却又不顧。換句話說，他們要『馬兒好』，同時又要『馬兒不吃草』。而這倒翁的教師正是做了這教育界貧乏中的犧牲者。不信，請看：江蘇省許多的縣立學校教師，已有三個月沒有拿到薪給了！北平的教師爲了生活的逼迫，對當局提出了嚴重的抗議——以總辭職的行動來表示；而這裏中學教師怠教以後，市政當局還說這是『本市的恥辱』；大學教授罷教後，當局置之不問，現在又只好默默無聲的復課了。他們只會把『清高』，『學生學業爲重』等的大帽子不斷地給這些可憐的教師們戴上，壓得他們擡動不得；他們幾時曾經在爲教師們的生活謀一澈底解決的途徑？恐怕請求救濟總署配給一二袋麵粉，那已是最大的努力了！但是，這一二袋的麵粉教師們吃了就可過一輩子了嗎？

公立學校的教師如此，現在撇開了不談，再拿私校教師來論，也不是一樣嗎？所好者，無非是那些黑心的學店老板，他們藉着所有的桌、椅、黑板、房屋等的生財，拼命的做買賣——濫收學生、濫收學費，而對教師們却又盡其剝削榨壓的能事，以遂其求利的目的。

在這樣的情形下，試問有能力有去向的人，誰再願意來從事這一項『餓死有餘』的教育工作？誰再願意討戴這頂『清高』的『萬世師表』的大帽子？當局對於師範教育的推行固然是不遺餘力，但

是現在這許多師範生將來畢業後能否保定從事於教育的本位工作呢？一般入師範學校的人的本旨，恐怕都不在於這一個將來的問題，却是在於現實。師範學校在目前不論學費，雜費，甚至於膳宿等一切費用都是免收的；一般好學而清寒的學生在目前這種教育商業化，知識商品化的社會中，能够找到這樣的場所，一方面能得到求知（？）的機會，另一方面又可獲得生活的解決，怎不叫他們不趨之若鶩呢！但是若細細的調查一下，恐怕十之八九把師範學校看做了臨時的救濟所！

教育界的貧乏，影響了師資，影響了整個的教育事業。於是許多人起來大聲疾呼『救救中國的教育！』『提高教育經費至百分之三十！』

但是呼聲是呼聲，却挽救不了這已成的事實！我們現在退一步講。縱使教育經費提高了，那麼一切的問題是否也就跟着解決了呢？不要看別的，試看英美兩國。他們的財政當然比我們中國這窮措大富強得多，他們的教育經費也不容否認的比較地高，但是根據今年三月間申報所載：倫敦與加拿大的教師都會爲了待遇微薄而實行總辭職；美國的教員收入不够支出，也整天地在爲生活而憂慮。由此提示我們，教育經費的提高，解決不了教師的生活，解決不了整個中國的教育問題。

尊師運動所反映的另一個事實便是整個社會經濟崩潰的危機。

今天做教師的人，本身當然無容疑義的須受過相當的教育。小學教師至少也得中學畢業，中學教師大概都是大學，專科等學校畢業；換句話說，他們至少須受過中等教育，甚至於高等教育。但是不要忘記現代教育是商業化的，在這商業化的教育情

們本身都是什麼階級？縱使不都是資產階級，但至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但是這般本來是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教師，現在怎樣呢？從他們的怠教宣言中『床頭金盡，壯士束手』的話看來，要不是實際情形如此，他們何至於卸去以往『儼然道貌』的面具，來向各界呼援呢！事實也太悲痛了：高貴的大學教授逼得不能生活而去拉洋車；中小學教師在無可奈何中逼得去跑『單幫』；自己做了教師整天地嘶啞喉嚨在教別人的孩子，而自己的孩子却因付不出學費整天地就在家內嬉戲；孩子們病了，無錢請醫吃藥，只好眼巴巴的看着他死亡。這種悲痛矛盾的事實，都是筆者親身所聞所見，若要細列，那真是舉不勝舉了。

幾年來的戰爭，的確使這輩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教師們淪爲赤貧者了！這一個事實同時又說明了在整個的社會組織中，窮苦的大衆是在一天一天的增多，社會的經濟財富，只是集中在極少數的特殊的人的手中，就此整個事實而論，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局面？它總有一天要因此而崩潰、毀滅！

但是在這普遍貧乏的社會情形中，我們的教育當局却又在唱『掃除文盲，實施國民教育』的高調。試問這些文盲是誰？這些需要受國民教育的人是誰？有錢的人本身早受過相當的教育，他們的子弟不容你講早已送入了學校。所謂文盲，所謂需受國民教育的兒童，所指的無非是一般勞苦大衆，一般貧苦兒童。但是他們爲着生活，若能入校去讀書的話，早就去工作了，那裏有這種空閒時間來享受這份『恩賜』呢？

從這些事實看來，不禁使人疑問『怎樣造成這種狀態？』要答覆這個問題，就中國本身而論，固

與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阻礙了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但就整個世界而論，那就不得不說這是現實社會制度下的特定產物了。在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下，儘管你把『尊師運動』描摹得冠冕堂皇，一般人會對這一運動產生什麼樣的觀念？在這一運動中，除了教師們惹得極少數人的同情與惋惜以外，大部分的人還不是在對教師發生卑視與噴笑吧？

教師們！你們應當認清這一點。你們的生活，你們的地位，應該用你們自己的力量來爭取，來獲得解決；千萬不要存一絲一毫的幻想，希望別人來替你們解決！你們不看見事實嗎？怠教以後答應的十六萬元的緊急津貼，你們今天拿到了沒有？縱使拿到了，是否就可以解決了你們的生活問題？當局答應你們配給麵粉三個月，你們是否在三個月以後就都成了『餓』而不再要吃東西了呢？對於這許多問題，你們都應細細的考慮，細細的研究，然後再找出一個根本解決的途徑，作爲自己努力的目標。你們時常訓誡學生作事不要苟且，而你們自己對於這些問題更不能苟且；你們又時常勉勵學生要改革社會，而你們自己却更應該領導着改革社會；你們不應做一個徒尙空言的『代宣者』，你們應當自己發揮出力量。因爲只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制度下你們的問題才能得到合理的解決。

但是，這個任務是艱巨的，這項工作是偉大的，你們應當抱着虛懷的態度，繼續不斷的學習研究，爲着一個合理的社會而努力。要是你們老朽，沒有這勇氣，沒有這毅力，來爲解決自己的問題而奮鬥，那麼，請你們大家安心地作一輩子的牛馬，作一輩子的奴隸，飢了不要叫餓，冷了不要叫寒，任主子們心理上的喜、怒、哀、樂、來左右你們的命

結婚是出路還是墳墓

石 望

結婚，是人生必經的歷程。但走上這段歷程的女子，對牠的看法却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渴望牠是一條出路；有的又擔心牠是一座墳墓。輕率地踏上牠的，往往遺恨終身，沒機緣踏上牠的却孤獨一生。如此，毋怪乎有人要說，青年時代是人生中最浪費的時代，盤據在一般年青人心坎深處的，像磁石般吸住了她（或他）們底注意力的，往往不是學習問題，而是結婚問題。結婚，究竟是一條出路，還是一座墳墓呢？這是值得我們去正視，去研討的。

在現社會裏，外貌漂亮的少女們，都難免不抱着一種『拜金主義』。她們每天置身交際場中，受狂蜂浪蝶們的追逐。她們羨慕着公子們的位尊而多金，憧憬着少奶奶的舒適而高貴。在對方狂熱的追求和甘言的誘惑之下，她們結婚了。但這種金錢買來的『愛情』很快就貶值了，破滅了。因為那些男子們有的是金錢，在滿足了追求目的而玩膩以後，他們就把以前說過的廉價諾言，甚至『山盟海誓』，都拋到九霄雲外，而另尋『新歡』去了。我們相信在這個世界上，每天不知有多少的『拜金主義者』變成了朝秦暮楚的男子們底玩物和犧牲品哩！她們像榨乾了的檸檬般被遺棄之後，不是憤而自殺，便是飲恨終生。至於那些『愛情永固』的，最多也不過做一個男子的柔順的寄生蟲，不事生產，不問國事，就此無聲無臭地了却一生。她們在社會的進步中，盡了何等的作用，因而在人類的歷史中，又留了怎樣的一頁呢？

不錯，對於這些甘願作男子玩物和寄生蟲的女子們，到底得到了悲劇式（墳墓）還是喜劇式（『出路』）的結局，我們是不感興趣的，因為這與大眾的福利、社會的進步無關。反之，值得我們關心的，却是另一種女子，具有崇高志向和奮鬥勇氣的女子。

我們不能否認：在民主潮流洶湧到全世界每一角落，婦女們都漸漸起而要求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平等權利的今天，有很多婦女都已經覺悟到自身任務的重大，再也不能忍辱苟安，專謀一己的私利了。所以她們都在努力加強自己的認識，充實理論的修養，參加各種社會事業，以便進而從事婦女的解放運動。這種新的覺醒和志向，無疑是最崇高的，最值得我們欽敬的。

然而，我們曾不祇一次地看見過；很多具有這種崇高志向的女子，正在結婚的問題上，往往把她們的熱情和勇氣都斷送了。在她們和那些思想與己不同但家境豐裕的庸俗男子結婚之前，她們會抱着莫大的希望，希望婚後可以帶給她一種安定的美滿生活，使她得到充分時間去從事理論的修養，去參加社會的事業。她希望把自己心愛的丈夫影響過來，最少也使他不妨礙自己所要從事的事業。她深信這些是絕不會落空的。但事實上，結婚以後，這一切的希望都漸漸幻滅了。翁姑命令她謹守婦道，丈夫要求她孝順翁姑；她必須絕對聽從他們的訓誡，必須每天忙碌於育兒和廚房的繁瑣家務；她既不能安心研讀，也不能多到外面跑跑，不然，家人們就會疑心她有『外遇』了。此外，朋友們到她家裏來也要引起他們的不安，以為『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這些外來的誘惑，很快便會抓去她底『孝心』。這種和現實的家庭生活，與她底前進思想和希望是極端矛盾的，無法相容的。這時，如果不是逆着理智，讓殘酷的實生活把自己的壯志雄心，一年年的消磨到絲毫不留痕跡，那她便必須鼓起非凡的勇氣和決心，為脫離這種吃人的家庭束縛而鬥爭。此外，很難有任何中間的道路。

在這裏，可以順便舉出一段新鮮的插話做例子：筆者在半月前曾見到一位頭髮長短不齊的女朋友。她告訴我，過去，她曾抱着無限的希望而結婚，但三年來的歲月，却把她磨折得半死不活了。她決心脫離那種永遠忙不完的家庭瑣事，決心拋開她那個小孩子——愛的唯一結晶，而到社會上找職業做，謀取生活上和經濟上的自由獨立。可是，她的企圖不可免地受到了翁姑的強烈反對。就在她準備第二天去做事的當天晚上，趁她睡熟着的當兒，她的丈夫便狠心的把她底頭髮剪得七零八落，以便她不能再在外拋頭露面。她發覺後，傷心地提出抗議了，但結果又是給丈夫毒打了一頓。這一連串的侮辱和難堪，使她恍然醒悟過來，毅然以傷害罪向法院提出離婚，而且現在知道這一離婚已經成為事實了。與這件事同時，一封遠方的來信告訴我，同樣性質的離婚悲劇又在那兒的一個女朋友中發生了。聽說，那位悲劇的女主角由於愈來愈不能忍受舊家庭（由翁姑所代表）的殘酷束縛，乞助於她底丈夫，

但他寧願『全孝』而捨棄他倆婚前曾譽之為『世界無雙的偉大而神聖的愛』。這兩件事難道純粹是偶然的巧合嗎？不，牠們都只是新的思想與舊的傳統間不可調和的必然產物而已。這類悲劇的發生，本來並不怎樣新奇，也不是絕對無法避免，只因爲人們往往不肯虛心接受別人從痛苦中得來的教訓，不是親身打破自己的結婚幻想便不甘心，以致造成覆轍重蹈不窮的悲劇，如此而已。

由此，我們可以說：合理的結婚，必須以思想的——致爲前提（尤以經濟、社會和政治各方面處於不利條件中的女性爲然）。我們固然極端反對古舊的盲婚制度，但也同樣反對現代較先進的婦女那種買賣式的、純感情而非理智的所謂『自由結合』！

進一步，把我們的焦點移到另一種場合，上述的結婚前提，也是同樣必需的。

在目前這個滿目瘡痍的殘破社會裏，在戰爭破壞及隨牠俱來的失業和物價暴漲的打擊下，究有多少人被擠到飢餓線上，過着悲苦的日子呢？這種與飢餓相掙扎的家庭生活，對於一雙雙的窮苦夫妻，不僅是一種無比可怕的重担，而且成了無休止地相互爭吵、咒罵和仇視的泉源。要消除這種物質痛苦所引起的精神痛苦，首先，他們必須藉助於一種共同的思想，去認識這些痛苦都是來自不合理的社會，如果把牠澈底地合理地改造一番，那末，不但戰爭、失業和物價高漲等痛苦根本不會存在，而且由於托兒所、公共食堂等的設立，更可將婦女們從家庭（特別是廚房）中解放出來，得以專心參加社會的精神的事業……從這種一致的思想中，產生了深切的了解與同情，在互助互勵之下努力地照自己所信所覺的做去。如此，才能在艱苦的物质生活中，得到了精神上最高的滿足，夫妻間的愛，才能終始如一地存在，不致給窮困所吞沒。

同樣的，每一個鍾情的青年男子，每一個懷春的妙齡少女，經過共同的了解與同情，手攜手地朝着最高的目標努力前進——只有在這樣的過程中，一種互相敬慕的真摯的情愛才會油然而生，才會超然於買賣式的愛情之上，日益滋長起來，最後達到美滿的結婚之路。

總括一句話來說：建基於理智之上的結婚，乃是人生旅途中的一道里程碑，我們不把牠看作一條出路，自然也不會葬身在拜金主義者所制的結婚之墓去的。

（上接第十二頁）

那已經陳腐了的政治機構，如果不能來一個澈底的改革，而還想回到過去的反動統治的王座上，在這種狀態之下，戰爭能够避免嗎？

不可能的，因爲陷入奴隸狀態的人們實在是不能忍受了。

這是實在的客觀情形，這種客觀的趨勢，也絕不是僅靠某黨某派的力量所能阻止得了的。雖然在內戰中國共兩黨扮演着領導的角色，但其中之歷史因素與階級背景仍是隱約可見。

內戰的責任，絕不是何方先進兵，何方先發第一炮。這個戰爭乃是數十年乃至數百千年來的歷史演變所造成的。誰能阻止有組織有武器的解放了的奴隸羣爲爭取生存與解放而作的戰鬥呢？就是其領導者也无法阻止。

既然內戰的真實原因乃是如此，那麼讓我們想想看，怎樣才是澈底有效的而不是臨時的停戰呢？不用詭計，不用控訴那一方先調兵，先遣將，而要根據客觀的真實原因，尋求澈底的解決方策。

既然作戰的一方，多少是爲了爭取農民某些改良的利益（雖然很不澈底）而戰，那我們不能不說，那與之對立的、古老的、腐朽的、代表少數特權者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實在應該來一個從頭至尾的改革了，這澈底改革的辦法在目前是實行民主。讓人民自己主宰自己；地主交出土地，讓耕者有其田；以普選方式成立地方的和中央的政權；召開不是指定不是諮議性的，而是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來代替那舊有的過時的不民主的政權。將各種民主權利和基本自由交與全民。對國內各民族應給予民族自決權，讓各民族自己選擇自己的命運。對外須脫離帝國主義的政治的經濟的羈絆。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外爭獨立，內爭民主』，才能做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才能做到切實停戰，才能走上民主、自由、富強之路，否則都不過是幻想，都不過是痴人說夢罷了。

如果不認清我國內戰的真正本質，只求一時的表面解決；如果不針對客觀形勢對症下藥，只求臨時妥協；只靠外國的調停，那結果一定只能使黑暗延長，痛苦加深。況且我們還不應該忘記中國的內戰在目前還有別國的作用在裏面，誰都知道，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中國內戰還是美蘇關係的表現呢！

民主、自由、和平，可能平白的從天上落下來嗎？不可能的，這不是慈善事業，特權者是寧死都不肯放鬆絲毫特權和利益的，只有靠全民團結的力量，靠着全體受苦難的老百姓的力量，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中國經濟之路

竹雲龍

一 以農立國？

中國人說本國地大物博而以農立國，好像是一件很榮耀的事。考之實際，除了原始時代的農耕時期之外，沒有任何國家可能真正的以農立國。經濟生活的發展，是一種綜合性的愈趨健全進步的發展。世界經濟的潮流，已冲破各國的閉關自守之門，在原子能時代，再說以農立國，真有些荒唐且近乎滑稽，但是，那些擁護「以農立國論」的反動理論家，現在却搖身一變，主張「農業工業化」，高呼「以工業化的農業立國」。

現在，中國人民都對於所謂TVA制度抱有極大的謫念，且希望長江流域的YVA以及黃河流域的HVA能於數年中實現。主張以農立國的反動理論家，更以TVA制度為其理論的擋箭牌，證明中國可能以農立國，且只能以農立國。

中國以什麼工業資本使農業工業化？進而追問：中國以什麼條件使工業電氣化原子能化？這一個問題，主張以農立國的先生們當然不敢答覆，就是主張「以工立國」的朋友也不見得能流利應對。如果「以農立國」的意思與以前日本所主張的「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意思一樣，即是主張中國以落後的農業「立國」，實際上主張中國以農亡國！甘心處於供給原料銷納工業品的殖民地地位。如果主張「以工業化的農業立國」，則中國必需解決後列幾個問題：

(一) 必須有足供全國農村工業化的發電廠，機器廠，肥料廠，以及科學化的農業人才；如果這些東西都等待美國人或英國人，這不是叫中國做一個「工業化」的殖民地嗎？美其名曰工業化的農業，實際上是帝國主義工業化的殖民地農業。如果YVA或HVA都在外資外力主持之下經過二三十年完成了，中國的一切並未改變——輸出原料輸入成品，很明白的，沒有獨立的完善的工業，就不能奢談農業工業化。中國還沒有建立自己的重工業，更未會建立電氣工業的基礎。不能談農業工業化。

(二) 必須有大批公正幹練的管理員與辦事人才。在貪污份子盤據整個中國的今天，一千萬個好計劃，也變成一萬萬個壞的。組織問題與管理問題如果又因為「中國人總是弄不好」而讓外國人來，這是什麼呢？不是殖民地相嗎？貪污習慣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不過中國比外國來得更「完美」，從官方到商業機關方面的每一部門，無不以「外快」為一種主要收入；月入薪金十萬，公館中開支幾百千萬，非貪污即不足以養小老婆。其他更不必多說。在中國，一朝權在手，就有「路」。他個人有路，中國却因此弄得走頭無路。如果不肅清政，工，商，農，學，各方面的貪污習慣與貪污集團，則一切都是空話，然而，要消滅貪污，又談何容易！談何容易！請不要忘記：貪污已經成為習慣，且已經成為一個制度的標記了！

(三) 必須解決土地所有權問題。土地是全民族的土地，為了實現大農業計劃，必先實行國有土地政策，消滅土豪劣紳強佔土地分租佃農的落後生產關係，解放自耕農的小生產方法，消滅農村中殘酷的剝削者——高利貸者兼富農。如果在土地私有制上在貪污風氣的影響之下實行大農業計劃。結果，又將像以前的築公路一樣，弄得不像西四。因為在收買土地或圍湖土地的時，就發生貪污與賄賂，有了貪污與賄賂就一定把事情辦壞。中國土地私有制與大農業工業化不能並立一起，誰肯把良田美國無代價地給國家呢？以上三個基本問題如果得不到合理的解決，則中國不可能成為工業化的農業國，只能部份的在外資外力主持之下，成立一部份大農業，與多數小農業並存且對立着，完成殖民地農業的姿態。

二 以工立國？

說老實話，「以工立國」論並不比以農立國論高明，因為單獨地以工，也不能建立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工業與農業，並不是兩種互相衝突的生產部門，却是具有血統關係的姊妹業。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工農兩業却互相衝突，且農業發展日益落後，工業日益銳進，造成全世界工業之間的「剪刀

式」發展。這種不平衡發展，在資本主義各國不用說，就是在社會主義蘇聯，也沒有阻止「剪刀式」發展的徵兆，所有的五年計劃都着重於工業，尤其注目於重工業。

工農業相背而馳的這種病態發展，是近幾十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問題之一。全世界經過兩次大屠殺，工業生產已打開原子能之門，但全世界還在鬧糧食恐慌！產米國中印等國向美國要求大量「救濟」這一方面重重地打了以農立國論者一記耳光，一方面也警告以工立國論者：不要信口開河，工農兩業是不可分離的！沒有進步的農業基礎，即不能建立真正的工業，沒有完善的工業，即不能使農業進步至工業化。機械地在兩種歪曲論調之間喧嚷不清，是不正確的。

民國以來，以農立國以工立國這兩種論調不斷在爭論辯駁，真至今天，仍舊沒有具體結果，為什麼呢？因為這種爭論辯駁的方法本身就成問題，所以不會有完滿的結果。一個提出問題的正確方法，能解答問題的一半；如果提問題的方法根本錯誤了，還能有什麼好的配答呢？在那些虛張聲勢的爭論裏面，難免發現一點半點真理，但大部份都是空話。

主張以工立國，看起來似乎「前進」一些，其實不然，有人主張儘速以外資外力使中國大大地「工業化」，有人主張在中國發展中小工業，前一種主張叫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的投資市場與工業附庸（帝國主義永遠不會把別國的工業弄得比它本國的更好！）後一種主張叫中國停止經濟發展。

主張以中小工業立國者的妙論，有幾個理由：（一）可以消滅大資本操縱一切的壞現象。（二）中國很落後，一下子形成大工業很困難，還是由中小工業慢慢發展起來的好。（三）中小工業可以分散到各處，與落後農業配合起來，一同前進，可以同時「大」起來。這些先生們還以為今天是十七世紀，本國的中小工業，如何與外國大工業競爭？如何經得起傾銷的打擊？即使本國大資本不能操縱本國經濟，你也不能阻止外國大資本操縱世界經濟。中國「開關」了一百多年，再閉關也不可能。

自己沒有力量建立大工業，外資在本國建立的大工業只能反而壓死本國的大中小工業，且使中國工業殖民地化。自己有中小工業，可是，官僚資本勾結帝國主義，以壓倒一切的優勢橫霸中國經濟的每一部門，中小工業也沒有前途。

以農立國不是路子。

以工立國也不是路子。
到底怎麼樣才能立國呢？讓我們更深刻些從鐵的事實分析開始吧。

三 經濟現狀

說起經濟現狀，人人說糟，糟到如何程度呢？必須正視現實。先說後方「自由區」的工業：

抗戰以後，大後方建立了不少工廠，有的是由沿海內遷的，有的是新創的，但都帶有濃厚的投機性，與應急性，大部份規模很小。據卅三年的官方統計，歷年開廠數字如後：

廿五年前	三〇〇
廿六年	六〇〇
廿七年	二〇〇九
廿八年	四一九
廿九年	五七一
三十年	八六六
卅一年	一三三八
卅二年	一〇四九
卅三年	五四九
年份不明	一〇二
合計（工廠數）	五二六六

從這一系列簡單數字中，我們可以知道一個大概：後方工業本來很微弱，自廿七年起，有顯著的向上發展，以卅一年為向上發展的頂點，卅二年已經露出衰落危機，卅三年更明白，卅四年則家家發出倒閉聲。前列五二六六廠的業別如後：

業別	工廠數	工人數
冶鍊工業	一九八	四九一三六
機器工業	一〇一六	四五四二四
五金工業	一三七	一五五三三
電器工業	一二四	八五五〇
化學工業	一五二〇	八〇八六〇
紡織工業	一〇二六	一一三五五八

服飾品工業	一八二	一二九九九
飲食品工業	六〇一	一八九六七
印刷文具工業	一五四	九五五四
類項工業	一〇八	五〇八一
合計	五二六六	三五九六六三

至於資本額方面，卅三年的幣值資本額約為四八七、四八〇〇〇元，化學工業約佔百分之三十一強，紡織業佔百分之十六強，冶鍊業佔百分之十五強，機器業佔百分之十二強，餘者均不過佔百分之一至八。

前列工廠開設在重慶市區的一五一八月，在四川省別個縣市的八六四月，兩共佔廠數百分之四十五·二四，佔工人數十五萬五千六百廿五人，即百分之四十三·二七，更佔資本額百分之五十三·八六，因此我們可說，後方工業的一半在四川，而其重心則在重慶。佔廠數第二位的是湖南省，九三五月，五七五六三個工人。雲南貴川廣西甘肅陝西及其他各省又次之。

五千餘工廠之中，民營者四七六四月，國營的五〇二月，但民營廠的資本只佔全額百分之六十一強，國營工廠（廠數百分之九·五）却佔資本總額的百分之三十八·八！可是，國營工業雖佔優勢，也不能在極端惡劣的條件之下有什麼奇蹟似的发展，且最後也不得不十九停業，以待整頓。

後方工業一般的帶有幾個致命的弱點：（一）資本額不大。（二）工人技術水平紙下。（三）原料供給及成品市場，兩方面不能按工業發展的情形得到順利的解決。（四）交通十分困難。（五）生產成本太高。（六）浪費人力物力太多。（六）一切計劃都是臨時應急性的，投機性的，自覺毫無前途的。所以在卅三年時，這些弱點，都打擊後方工業，首先使可憐的重工業部門破產或縮小範圍，而政府方面的加強並擴大統制，又給輕工業以致命的打擊。但是，後方工業在向上發展的過程中，在溫和的通貨膨脹過程中，確實獲得驚人超額利潤；因為在通貨膨脹過程中，工資的增加總落在貨價之後。看看目前後方工業十分之九停業倒閉的慘景，再想想它們的黃金時代，難怪『對抗戰大有貢獻的』發國難財的資本家要嘆氣了，要大呼『救救後方工業』了。

後方資本家，有的早已把本錢全部『賺出』且得到相當的利潤，倒閉關廠對於他們的發展說來，是一個打擊，對於他們的財產說，情形並不可怕，因為他們早就把全部流動金搬到沿海一帶來活動了。只有少數資本家還株守

在後方，不到沿海一帶來『吸些新鮮空氣』。但沿海的情形，比後方好不了多少，這是使他們這批發國難財的『愛國者』真正不開心的原因。如果沿海一帶的工商業能在順利的情形之中發展，勝利財由官僚與這批『愛國者』共享，『美果一分而食之』，則我們可以相信：他們將對後方工業樂之如敝屣，對政府不但毫無怨言，且極盡歌功頌德之能事。

沿海一帶的工業，八九年來，經過不少次的摧殘。雖然，在上海的舊租界中有過短短的畸形繁榮，但所建立的工業。比各處所損失的工業，不論在數量與質量方面都相差很遠。

淪陷時期，敵人強佔了一部份工業，幾年來的經營，並沒有什麼大發展。但勝利却帶來了淪陷區工業的浩劫：真正的日本廠早前自動破壞得很多，日本投降後，先走漏了大部份能可隱藏的東西，以後經過數度接收和點交，又損失了無數可用的物資和玲巧的機件。此外，經過日本人強佔或改造的中國工業，現在都剩下一些死的軀殼，拍賣後復工的可能很少。比較最有生氣的，還是一批久受日方限制的本國民營工廠，但他們的數量與產量，在中國經濟方面不能有決定作用。至於中國人民熱望着收歸『自己』的東北大工業，已經不再存在了，所餘留的也不過是些過時的牛廢物。

最近收復區復工的廠數，約為淪陷時的十分之七，但罷工數尤其是耗電耗煤數字，華北僅十分之三，華中十分之五，其北尚全在停頓中。最近因為大量進口貨開始傾銷，工資也較前期普遍提高，各種生產費用比外貨貴，雖然有關稅，收復區工業仍然顯得不能維持的樣子，業已發出提高滙率提高關稅等等的呼聲。如此可憐的『民族工業』，也產生了一個危機。這危機的成因是外來的，但內在的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的專橫獨持，也附帶地加深了這一危機。至於國營工業或半官性的官僚工業，則因為『成本』還輕，表面上好像沒有什麼問題，實際上並沒有比民營工業好多少，或者更壞些。官員特多，中飽走私，管理不通，這些事實都是它們的致命傷，它們有最好的條件而把好事交給『批官份子』。官僚雖不是個個壞的，但官僚層形成一個制度就會把事情攪壞。『批官份子』的經濟情形說明了一切。東北的工業是蘇軍拆毀炸燬的，但台灣是由中國官僚以和平方式接收的，半年多以來，台灣的工業差不多全部停頓了，台幣大跌，通貨膨脹，物價上騰，貪污份子掀起房屋黑市頂費的惡浪，生產日低因而人民購買力日薄，各報所載的台灣通訊，

完全描畫出一幅圖畫：接收官僚猶如到了新的殖民地那樣，爲所欲爲，人民則懷着一股自由解放的熱望，却被反動的官僚制度與物價高漲沉重打了一下。腐化的官僚制度一接觸到豐富的台灣工農礦業各經濟部門，立刻發揮它特有的專橫貪污本能，弄得僅次於東北的台灣工農各業陷入死巷。

總之，目前中國工業有幾個特點：(一)國家資本與官僚資本壟斷一切重要生產部門，迫使「在野資本」無法投資而從事於投機活動。(二)一般的生產成本過高，不能抵抗外貨傾銷。(三)後方工業有根本崩潰的現象，而收復區工業也不斷遭受有形無形的破壞與打擊，露出新危機。(四)大資本趁機會併吞小資本，官僚資本借職權侵蝕並吞沒國家資本。(五)在外資的優勢壓迫之下，一切工業資本又染上很濃的買辦色彩，其領導者爲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六)在優勢的帝國主義勢力侵壓之下，一切工業露出不能起而競爭的徵兆，象徵中國工業根本危機的後果——殖民地化，買辦化。

另一方面，中國農業的情形，比工業情形更壞，更悲慘。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公報說，目前全國農村的災民約三千萬，其中估計東北僅一百萬人，四川甘肅雲南貴州寧夏西康西藏新疆陝西等省一個飢民也沒有！台灣也未列入。該公報估計湖南省災民五百萬，但在四月十日另一通訊中又有「七百萬將近餓死」的文句。該公報估計河南災民四百萬，但該省大部份在水災與兵禍之中，二千幾百萬人之中心恐怕有半數是災民，或者這「四百萬」是業已餓死的飢民。東北的災民總不至一百萬，四川等省份實際上也在強徵暴捐的災禍中，飢民也數以百萬計，但爲了掩蓋「自由區」的實情，爲了證明「義民」是幸福的，他們就要抹煞事實；對於災情嚴重的地區也加以輕估，如此也可以叫「人類」看看我們中國的大國民並不十分痛苦。

如果我們估計中國農民的十分之二在飢餓中，即七八千萬人在死亡線上掙扎，當然有關「國際概略」，但事實上恐怕還不至此數呢！例如該公報估計廣西災民僅一百萬，實際上，經過幾次大戰鬥以及澈底抽丁拉夫徵捐服役之後，廣西一千三百萬人之中，起碼有三分之一在飢餓之中，因爲廣西的保甲制辦得最「好」，所以農民也最苦。四川因爲是陪都所在省，在抗戰時期負擔最重，五千二百萬人之中，起碼有一千萬以上經常在飢餓中。勝利之神帶給中國農民一件禮物——大規模徵糧，弄得今春全國普遍鬧糧荒，到處發生吃人慘劇。所謂「救濟品」，一大部份當商品賣給奸商賺錢（當然也有官

僚的份），一小部份發到民間去的過程中，過「手」一多，東西也就少而又少了。但即使全部救濟品分發到農村去，也無濟於事。例如廣西一千三百萬人每人平均僅得救濟麵粉六兩，如果再給別人揩油去一些，還能救幾個人？救來救去，只救了一些吃救濟飯的人們。

與糧食恐慌同時並存的也就是普遍缺乏種籽，這將使明年的糧荒更嚴重！如果內戰始終打打講講，講講又打打，把農村當做雙方人力與食糧的無窮盡的倉庫，那末，農民的生活當然還要更痛苦萬倍。

中國農村破產問題，是一個很老的問題，自從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以後，一部份中國人習慣於一種錯誤的思想方法——把什麼壞事情的原因都歸罪於敵人，好像在九一八以前中國本是一個天堂。還有人發明一個宣傳抗日的結論：打倒日本就有飯吃。

事實教訓這些輕浮的不懂歷史的「思想家」，現在，日本打倒了，民衆的肚子倒反更餓了，農村的情形更糟了，爲什麼？因爲日本的侵略行動，把原有的中國農村問題弄得更緊張，所以，打倒日本以後也就不能解決農村問題，要解決農村破產問題，還得從農村本身入眼。

(一)幾千年來的官僚制度，與鄉村大地主大豪紳不可分離，戰前如此，戰時如此，戰後更如此。倚仗官僚的勢力，（實際上官僚不過是大豪紳的代理人——「公僕」）豪紳可以各種辦法兼併土地。舊式的地主不斷沒落，而新型的地主不斷起來取而代之，這種新型地主，實際上（在經濟學的觀點上）是中國官僚商人，賈辦，財閥，或工廠主的化身，他們大部份是「全能財主」——有商店，當舖，股票，美妾，田契，房屋等等中國式的資本家。他們都是所謂「不在地主」。四川一帶，不在地主佔的田約計百分之七十以上！例如巴縣的田，差不多都給一個官方不肯宣佈姓名的財主兼併了去。皖南南陵有四個大公堂，佔地六萬多畝，且大部份是良田。三區一帶的土地集中在宣紙商的手裏。涇縣的情形也差不多。湖南雲貴會國藩等的後裔，都擁田萬畝以上，且在上海有不少大工廠的股份，安徽會國藩的後代還保留幾十萬畝土地。戰時時期漲價最慢，且相對跌價了，豪發戶都紛紛搶買土地，一則保護財產，一則可由紳而官，由官而鉅富，在淪陷區與後方，這種現象都很普遍。戰時以各種勢力兼併土地的數量很可觀，一個小鄉長可以兼併五六百畝，縣長當然上千或上千萬，別人更不必說，這情形在淪陷區或後方都一

此外，日本人在中國也兼併了不少土地，尤其在東北華北，一併就是十萬畝。華北強佔土地所成的大農場面積總計約三千四百萬畝。東北當然超過此數。現在，這些土地有的早已劃為官僚的私人莊園，餘下的還由各種機關霸佔着，且不能從事生產也得霸佔着，好像這些土地本來不是老百姓的而是日本人從日本帶來的『敵產』。

『耕者』之中，目前大部份失去了『其田』中原八年戰爭、十四年東北殖民化，四五十年台灣殖民地化，使農民澈底地脫離了土地，變成赤貧的貧農或小佃農。土地都集中在各種形式的地主之手，他們——官僚，商人，財主，工廠主，買辦，土豪劣紳，漢奸，大流氓，是中國大部份可耕地的佔有者，他們死死地佔有這些土地，且結成一個官僚制度來保護他們的所有權。

(二) 一方面土地所有權非常集中；另一方面土地的耕種却極端分散，且有大塊大塊的土地荒蕪着，且這種荒蕪只有日益惡化的趨勢。江西廣西等省都產生三四百里絕無人烟的地帶。一方面證明農民不堪地主與官僚的壓榨，寧願逃荒(逃荒也要得到官僚的許可)！一方面證明戰爭時期，農村的負擔太重，人們都破產了，負債累累，幾代子孫也還不清，不逃荒就世世代代做別人的變相奴隸。

四川地主最高的苛租為九成，最低的為收穫額十分之六。五，一般的都繳租八成。有些田租表面租額很小，但名目繁多，正租附租押租追租預租——一收再收，結果有時超過十分之八的收穫。高額地租弄得農民破產，債進債堆。敢冒險的不是當土匪就逃荒，不敢的也不願多種土地，於是土地荒蕪的現象，跟着土地集中及農民赤貧的加深而擴大。一方面使農民日益貧困，一方面使農村生產量減縮，糧荒日益跟着嚴重，形成農村經濟總崩潰的趨勢。

(三) 八年戰爭，負擔十分之九全在農民，目前內戰或暫時武裝和平互相對峙，人力物力的負擔也大部份落在農民頭上，通貨膨脹的最大最後受害者是農民，各種直接間接稅的最後負擔者大半又是農民。目前收復區各地常常發生活埋鄉鎮長抗徵抗租的事情，土匪日多，換言之，脫離土地之後的農民，如果不能安居樂業，也沒有工業都市容納他們，他們就變成農村的消費者或破壞者。在中共統治的地區，因為有各種切實的改良政策如減租減息等等，所以有農民跟他們走。且農民還希望拿到中共的武裝以後去消滅向所痛恨的土豪劣紳，所以有很多富豪爭先逃難。收復區內先天道等教派不斷在農

村活動。台灣的農民也由對官僚憎恨而普遍埋怨。東北的中共軍裏面當然有一部分是自動參加的，其目的想取得農民所渴望的土地。

整個中國農村已到了總崩潰的門口，農民已普遍地不安起來。

最後略談財政問題：

最近人們非常熱烈地討論着外匯，物價，金價等問題，順便有時也談及國際貿易及國際收支逆差順差的問題，也有人談論如何穩定幣值的問題。這些先生們的論點，大多狹小而死板，有人以為只要法幣價值一穩定，一切經濟問題都可解決，有人以為借外債不利於中國的民族資本，有人主張穩定匯率然後一切可以恢復常態，說來說去，越說離中國真正的經濟問題的中心越遠。

財政資本雖然能支配一切經濟生活，且集中反映一切經濟生活的狀態，但財政問題。不是單獨的問題。中國財政問題之日益嚴重，有後列幾個原因：

(一) 百年來的國際貿易入超，即百年來的殖民地化經濟傾向，日益使中國變成一個有名的國際債務國。

(二) 外國資本的大量投資(包括貸款)，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日益取得重要的決定因素的權力與地位。

(三) 一九三五年中國加入英鎊集團實行虛銀本位(紙本位或外匯準備本位)以後，中國法幣的價值實際上只有市價而沒有法定價，市價完全依外國存款數，本國鈔票發行數及國際國內動態的各種變動而變動。因此就發生八九年來嘔吐不休的外匯問題。

(四) 中國在抗戰時期的收支相差太遠，國府以發行紙幣彌補赤字數額，造成通貨膨脹的問題，這面又引起一個物價問題。更因此而引起改革稅收制度等問題。

(五) 英國的世界霸權讓位於美國，中國也跟着無形之中走入美元的懷抱，且參加美國主持的國際貨幣基金及國際復興銀行，更準備參加將來美國換縱的國際貿易組織。表面上，如此可以取得美國的信心而獲得大量借款，好救救火急的財政危機；實際上，這是一條使本國財政問題完全由外國資本家操縱的死路。

(六) 法幣流通區膨脹的程度，已達到惡劣的地步，新台幣新東北的票的膨脹程度在飛速上升；同時，中共地區的通貨膨脹與金融紊亂的情形，比別處並不稍差。全中國的人民跌在通貨膨脹的大海裏，而金融紊亂與內戰的災害，更把大多數人民推在赤貧的極端。在另一方面，少數特權者却大發橫財大發勝利財接收財，手裏積聚大量資財。

(七) 國際國內局勢動亂異常，資金不能安於生產事業，於是又發生一個游資作祟投機操縱掀風作浪的問題。且所謂游資，包括的範圍極廣，即使是工業方面的資本，一旦變賣，也就可以化為游資。買賣股票是最好的例子。

(八) 官僚資本在游資羣之中，當然是最強的一個，在掠奪收復區經濟果實之中？它也是最強的一個；中紡建公司是個好例子。它一方面不費分文拿到日本人的大批工廠，一方面又從美國拿到大批「廉價」的棉花，面對着如此高價的中國市場，高興得發狂，難怪一個高級職員的薪水有百萬以上，且暗中還有別的。

(九) 目前大部份資金集中在進出口貿易方面，三十五年春季，上海的進口貨超出出口貨價值四倍，而大量傾銷的「救濟品」還不計在內。這說明法幣不能維持一定的法定匯率的理由，也說明今後中國財政問題的嚴重性，更與工業農業危機三方面互相影響，把中國推上經濟崩潰的大山邊上去。

(十) 日本投降後，大量收復行政費，軍事費，在統治權未穩固前，以發行鈔票解決，稅收大部份給地方機關或經手官僚拿去了，中央機關收不到稅，又只能以發行紙幣應付開支，內戰又支出大批費用，將來的整軍等等又得化費許多金錢。

總之，不論對內外，中國的財政問題簡直無法解決，向外借債無異請別人來管理本國財政，內債無人肯承購且沒有發鈔票那樣方便，而發鈔票不過是自掘墳墓的財政手段。國家窮了，十分之九以上的人民窮了，只有特權的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肥了。就在如此情形之下，却有許多見多識廣的學者，唱着一種美麗的高調：中國只有大貧小貧！

四 結 論

中國經濟問題決非頭痛醫頭的方法能解決好的，整個的中國經濟問題，必須以整個方案來解決。並且，經濟問題最後也脫離不了政治，因此又必須與中國的政治問題共同解決。

(一) 首要問題，貧農，小佃農，兵士，以及各種農村游離人口，他們必須獲得土地，然後才能生活，才能恢復正常的農業生產，恢復購買力，恢復食糧及工業原料的供給。如何使他們迅速獲得土地，是解決農村經濟危機的根本問題。土地問題越拖延，內戰的危機也越大，因為即使共黨完全放下武器，農民却不肯，他們拿了武器就想分土地的，廣西已經出了「人民革命軍」，這是一個新的農民大暴動的信號。如果土地問題拖延到暴動而不得解決，則全中國將陷人可怕的飢饉之中！別的更不堪想像了。今天，農民不希罕什麼「民主經濟」或「民主政治」，他們的問題很簡單：「那些以罪惡手腕從我們手裏奪去的土地，什麼日子還給我們？難道不暴動就真的不肯還嗎？」

(二) 土地問題之外，農民主要的受着各種強徵暴捐與高利貸的壓榨剝削，如果不消滅這些災禍的根源，農民即使分得土地又很快會失去。剷除鄉村的惡勢力，即打倒所謂「封建勢力」，同樣是急不容緩的事。

(三) 今後一切捐稅，應以財富比例為收稅標準，應該立刻停止目前這種不公平的稅收制度，尤其必需立即取消對農行之中的「攤派」。

(四) 在工業方面，立刻取消國營事業的一切特權，工業貸款應該普遍官僚資本所設立的工廠一律查封，大部份資產充公給國家。

(五) 由國家設立國際貿易機關，專理一切國際貿易，禁止任何外商或華商的私自進出口貿易，澈底剷除買辦階級的經濟基礎，阻斷外貨傾銷的門戶，反對門戶開放的侵略政策。國家獨佔國際貿易不但有前述好處，且可以阻止過份入超的國際收支逆差，挽救本國的財政危機。

(六) 儘可能提高關稅，或者禁止某種本國能製造的工業產品的進口。藉此保護本國的工業業，使她在本國市場有銷路，而不致受外貨傾銷競爭的打擊而倒閉而為外商或買辦資本所併吞；又可免去因本國工業倒閉而發生的經濟恐慌及失業浪潮的襲擊。

(七) 停止濫發鈔票，停止條件太苛的或附有不利中國各種秘密條件的對外借款。澈底裁撤大量軍費取消無能機關，停止國庫支付軍費及特務費，即速大量裁軍，緊縮一切軍政開支。徵收本國的財產稅，沒收逃往國外的資金（它們在抗戰前後擾亂國民經濟最兇）。不惜以一切手段維持法幣的價值，挽救本國的財政危機，樹立自主的財政政策。

(八) 除了沒收日本及漢奸的財產充公國富之外，（下接第二五頁）

續 哲 學 漫 談

陳 曦

(四) 物質與意識

上節中我們曾提到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唯物論與唯心論的對立。

可是我們還沒有更詳細些來討論到底所謂物質是什麼？以及哲學上的物質與自然科學上的物質有些什麼不同？不錯，在古代希臘的許多唯物論哲學家中有，有的把水，或把火，空氣，原子等東西認為宇宙的本源，認為是一切物質的根本元素。這種把物質的甲形態或乙形態絕對化起來的見解是錯誤的。因為水，火，空氣，原子這些東西，都不過是物質的一種特殊形態而已，它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物質。另一方面，則由於科學的不斷進步，發現了原子之後，又發現了電子是物質的最初或最後的本源，……這樣發現下去，是永無窮盡的。而我們當研究哲學上的物質時，所關心的決不是這些，即追求宇宙的最初或者最後的物質。我們所關心的乃是一個最一般的概念，因為哲學本來是研究宇宙間一切現象的最一般的規律的。因此我們不應將某一特殊部門（如自然科學上）的物質的概念，跟哲學上的物質的概念混同起來。

然而在哲學上所理解的物質的意義是什麼呢？普列哈諾夫與列寧有很正確的解釋：『哲學上的物質，是離開我們主觀意識而獨立存在的一切事物，可以用我們的感官來感覺的。』這個定義最為完整的，因為不論是物理學上的，化學上的，生物學上的，以至政治學上的，經濟學上的物質都包括在它的範圍之內了。這就是說，任何自然科學上的社會科學上的客觀實在，在哲學上都是物質的。這也就是說，不但水，火，空氣，地球，太陽，動物，植物……是物質，就是社會上的階級關係，國家，政權，戰爭，革命，物價……亦是物質。在自然科學中，它所研究的對象是有體質的物質，它只是把水，火，空氣，原子……這些東西當作物質而已。在哲學上，自然不否認它們是物質的，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停留在這裏，如古代希臘樸素的唯物論者一樣。我們再三說過，自然科學上的物質不過是哲學上的物質之一種形態而已，我們絕不應把二者混同起來。

混同了自然科學上的物質與哲學上的物質，將造成什麼錯誤呢？這是一個較為深刻而且嚴重的問題：要是在哲學上只承認自然現象中有體質的東西才是物質，那麼在社會現象中的一切客觀實在，如階級關係，國家，政權，戰爭，物價……等便將被驅入於精神的領域了。意思就是說，這些東西並非物質的，而是上帝或神的手裏玩的把戲。試想這將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

上節中我們在基本上已經明白，在正確的理解底下，所謂意識，就是客觀物質的產物，亦是客觀物質的反映。

首先，我們從第一點來討論，從較平方面來說，我們的意識是發生於腦神經的。腦神經便是所謂『思想的物質』，它是我們生理上的一部份，毫無疑義地，它是屬於物質的範疇。而意識就產生和依附於我們的腦袋的。意識一旦脫離了腦神經，便失却了存在的餘地。所謂『幽靈』『魔鬼』這些字眼，擺在童話或者神話中或者是允許的，而在學術的領域內是不容插足的。

假如我們再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考察，那麼，今天我們所享有的二十世紀的意識，並非憑空而來的，它是由幾千萬年以前的動物逐漸發展而來的。我們只要把猴子的意識與人類的思想一比較就很清楚了，二者的不同，就是人類的意識經過了長時期的勞動與磨練的結果，不斷地與自然界社會界鬥爭的結果。它非但依據着人類生理上的發展，而且依據着人類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所以，人類的意識，同時又是物質發展的最高產物，它是有機體世界的高等代表所獨占的。

其次，我們再從第二點來看，任何思想的發生，都有着它的客觀根據的。肚子餓了便想到吃，天氣冷了就想穿，受了打擊就感到痛苦，凡是人都如此的。最有意思的是，大多數神話中的人物，差不多都是按照人的地位，人的性格來創造的。『大不肖怎樣』『聰明』，但亦不能超過他所生活着的環境。任何人的思想都是受他們的環境所限制，所支配的，他們只能反映客觀的現實，所以有人把意識比喻為鏡子中的影子，或者照像，雖然犯了機械的錯誤，但假如單就反映這一點來說，人類的意識確是如此的。

在哲學上有所謂「主觀的能動性」，便是用以糾正上面這一錯誤的。我們固然承認意識是物質的產物，又是物質的反映。但是第一，並不能因此就說意識等於物質。有人認為意識是肉體的分沁物，把意識看做另一種特殊的物質，與一切物質來等量齊觀。第二，不能把意識看做一個被動的，呆滯的，毫無生氣的東西，把意識絕對地決定於物質，而忽視或不認其對於物質的反作用，即能動的作用，須知道，這種見解是完全機械的。意識與物質是有着根本上的差異的。同時它非但反映了物質，而且反過來，通過人類的活動（哲學上稱為「實踐」）改變了物質，因而也改變了意識自己……

意識並不是一種獨立的，跟物質發生外的關係，或跟物質平行而存在的第二本源；意識依靠着物質，它是物質底產物。

(五) 運動

作為現代哲學的二個基本特點，就是首先認為物質是宇宙的本源，其次又認為宇宙一切東西，包括物質的與精神的，都是在不斷的運動變化之中。

哲學上的運動與自然科學上的運動，其意義之不同，正如在哲學上所理解的物質與自然科學上所理解的物質之不同一樣。但這並不是說自然科學上的機械的運動，不能用辯證法來解釋的。相反，只有以辯證法的觀點來觀察那些機械的運動，才能獲得正確的結論。但是什麼是自然科學上所理解的運動呢？在物理學的力學中，以為物體從某一點到另一點的地位的變遷，便是運動，好像我們踢足球時，足球在球場上的地位的變化，那才稱運動，好像那些撲撲風塵，帶來關金法幣，帶回金條西裝的「重慶人」，「民族英雄」們，在重慶與上海之間飛來飛去才能稱之為運動。至於從普通炸彈到原子炸彈這一科學上的進展，或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的過程，人類從生長到死亡，……一些自然科學家就不懂得這亦是運動了。所以自然科學上的運動觀是非常狹窄的。固然，我們不否認位置的變遷是運動，但這不過是運動的形態或者運動的方式之一種，它是不能代替社會現象中的，思維現象中的一切運動的。在哲學的理解底下，運動是指一個過程，指一個發生發展變化的過程。無論在社會的領域，自然的領域，思維的領域，皆作如是觀。

同時，假如我們對於「位置的變遷」的理解，不是以辯證法的觀點來解

決，仍舊是要陷於機械的錯誤，甚至最後否認了運動。因為他們把運動單純地看成「物質在某一場所，轉瞬間又在另一場所。」至於這中間是怎聯系起來的？其運動的動力是什麼？他們就不能解釋了。忘記了誰發生這樣一個變想頭，說一把箭射出以後，它必須首先通過全路程的二分之一，之後又要通過其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所以，結果那把箭仍舊是不動的。然而事實呢，箭的確是運動的，而且最後達到它的終點。在這裏，我們就可看出自然科學上的那種機械論的運動觀點是如何破產的。這種想頭雖然優得可笑，可是對於機械論是富有諷刺意義的。因為他間接地告訴我們，以機械的觀點來觀察機械的運動，結果是不澈底的，寸步難移的。最後，他們必然要否認運動，把客觀上實際的運動，解釋為僅僅存在於人們的感覺中的一種概念而已。

辯證法對於這種機械的運動，其理解是如此的：物體同時在某處，同時又不在某處；物體一方面被限制在某一定的場所，另一方面它又不絕地在突破這一限制；沒有前者，運動（機械的運動）是不可想像的，沒有後者，運動（機械的運動）是不可能的。

運動是不是抽象的呢？不是的，各種各式的運動，都是不能離開物質的。運動是物質的屬性。運動是物質存在的形式。這些名言，都說明了物質與運動的關係之密切。恩格斯說：「沒有物質的運動，與沒有運動的物質是同樣不可思議的。」物質與運動的關係是內在的，有機的，統一的。所以當我們提及任何一個客觀存在（物質）時，同時它就包含着運動的意義在內了。所以我們必須同時把它作為一個過程來看。譬如說，我們一提及了資本主義社會，就應該從它的一聯串過程來看，從它初期的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以至最後的金融資本，財政資本。

至於思維與運動的關係又何獨不然。記得在學校裏念貨幣學時，一位教授把許多關於貨幣的理論介紹給我們，什麼金本主義派，名稱主義派的……最後他還說，這個亦對，那個亦有理由，假如你們要新創造一種學說亦無不可。這該是如何可笑的見解！我們不管他把任何學說介紹得如何完全，但是這種研究方法是非常膚淺的，因為他不能從動的觀點上來解決問題。他不去追求產生某一學說的歷史背景，以及彼學說與此學說的邏輯關係他只是從平面上靜態上來解釋問題。因此就難怪他不能深入到某一學說的內容去，就難怪他說的，這個亦對那個亦有理由，而隨便那一個人都得創造一種新的學說

(當然，我們並不反對創造新學說，但這是要有條件的)。一個大學教授，所能給與人們的，不過是更混亂更糊塗而已。

哲學上的運動，包括宇宙任何現象，所以運動非但是物質的根本規律，而且又是精神的根本規律，因為精神是物質的反映。運動的本身是個複雜的過程，各種特殊的具體的事物，就各有其特殊的運動方式。機械的運動，化學原素的運動，生物的運動，社會現象的運動……其性質都是不同的，這就由於這些事物之間有着質上的差異所致。哲學上所研究的運動，並不是各種特殊事物的特殊過程，而是包括自然界社會界以及精神領域的最共通，最根本的運動規律。所以它必然承認一切現象都有它發生，發展及滅亡的過程的。

然而滅亡是否絕對消滅呢？不！所謂滅亡，不過是由一種舊的質向一種新的質之推移而已。他們是永遠地，無終極地發展與變化下去的。物質運動的無限延續性，是辯證法中最重要的一點。

運動的動力是什麼呢？任何物質的內部，都是矛盾的，運動的過程即由於矛盾的鬥爭。所以矛盾就是運動的原動力。所以有人說辯證法就是關於矛盾的學說。然而具體的矛盾，須看具體事物的本質而定。各種特殊的物質，其所包含的矛盾亦是不同的。但是沒有矛盾的物質是沒有的。比如任何一種化學元素至少必有二種因素的矛盾，那就是陽核與電子的矛盾。生物的最基本的矛盾，是細胞的生長與死亡的矛盾。人體中太陽的吸力與行星的引力亦是矛盾，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亦是矛盾的，反映在階級中便是階級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存在，才成爲運動的發動機。所以黑格爾有句名言說：『矛盾推動前進』。

運動，它把各種現象都聯串起來了。把各種現象都糾結成一個統一體。但是這種關係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在這裏，可分爲二方面的解釋，一方面是從平面上去理解他們的關係，另一方面是從運動發展中去理解。某一現象與他種現象有着什麼的相互作用與影響，他周圍的時空間的條件如何，他與數種現象之間的關係之深淺與疏密如何等等；各個現象都是不同的，這必須依據具體的情況而定。譬如化學上某一元素的形成，必須有一定的溫度，而這一溫度又依據地球上的溫度，而地球上的溫度又與太陽的距離有一定聯系的，……這種關聯是無窮盡的，無始無終的。生物的發展又依據着生物的一定傳統，以及物質的給養等而發展的。天文學上太陽與地球的關係更爲明顯，

社會中生產力的發展是依賴着自然的條件，一定的人類知識水準，以及生產關係等。但是這種相互的關係，什麼是主要的，什麼是次要的，這又要具體的條件而定的。當我們觀察一切現象時，要先抓住主要的關係，然後再全面地注意其他次要的關係，方才不致陷於機械的錯誤。

運動與靜止的關係又如何呢？辯證法固然以運動作爲其基本的觀點，然而它並不因此而否認相對的靜止。人雖然一天天地在走近死亡，他體內的細胞雖然在不斷地新陳代謝，生與死在無休止地鬥爭，然而當他還能夠呼吸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叫他他是活人又是死人，否則，我們將永遠看不清任何現象，反因此而墮入五里雲霧中……

(上接第二二頁)

必須澈查經濟漢奸的財產並沒收之，這一筆數目如果認真查辦起來一定很可觀。

(九) 除了穩定幣值之外，必須嚴辦一切抬高物價或操縱投機的好商，使游資沒有作祟的可能。

(十) 目前，國家機關已經擁有遠超過民間工業許多的生產部門；且在今後的經濟生活中，國家機關更具有絕對的決定作用。但是，中國幾千年來的官僚制度，把什麼事情都弄壞了，一黨專制更把官僚制度的劣蹟提高到頂點。如果希望目前這個激進腐化的官僚制度實行中國的經濟改革，這是幻想。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與政治改革同時進行，不消滅官僚制度，代以真正由民衆自己選舉出來的民主制度，則一切經濟改革法令都是空話。一黨專政所製造出來的『民主政府』，不管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都不能解決問題，倒把問題弄得更複雜更嚴重，其最可怕之點，就是各自倚賴一個外國政府來進行內戰，而用自已製造的『民主政府』做幌子，把中國人民推到火海裏去，把中國經濟弄得徹底破產而不堪收拾。最後說來，中國經濟之路，也就是中國政治之路。

歡迎介紹

歡迎批評

由粉飾說起

寒樹

粉飾是一個極好的名詞，但它的實質却壞透了。房子破舊了，把它粉飾一下固變得煥然一新，但房子的破舊，依然是事實。再說，將腐蝕空的木頭在外表油漆一次，看起來真是一支大度的「棟樑」，然而它本身的腐蝕將斷，不能因為粉飾而倖免。所以粉飾是表面化的，暫時的，不能保持恆久。

一般人很喜歡粉飾。只要表面上好看，裏子就不去管它了。只要「紙老虎」不為人家拆穿，就什麼都行。儘管袋裏一個錢沒有，西裝不能不挺；儘管在學校裏鬼混，新的洋裝書不能不拿了一大堆；儘管一肚子的「男盜女娼」，表面上不能不裝得「仁義道德」，儘管……粉飾的功効畢竟是好的！

個人歡喜粉飾，團體也歡喜粉飾，社會又何曾不粉飾？大而至國家，又何獨不然？恐怕只有粉飾得多，而粉飾的技術也格外高明。

即以我國看，不就是一個粉飾的國家嗎？無論那一件事表面上真「光耀」，但仔細把這層美麗的「膜」揭去，就「不可說，不可說」了！

隨着時代的洪流，中國也大談民主，實行民主了，但實行的結果如何呢？有沒有真正「民主」？有沒有真正把一切特殊的政治組織取消，有沒有取消一黨專政？有沒有將政治犯全部釋放？有沒有……也許有的，也許有一部分；但却有一層粉飾的「膜」！

可以舉些例子：去年十二月一日的昆明學潮慘案，無辜的學生，正義的教師給慘殺，給「暴徒」在「草菅人命」下白犧牲，事後當局極力「徵究」（人民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發表了對此案「

歉疚」的話，就這樣輕描淡寫的把一場大的命案（其實在當局看來是小事）粉飾的乾乾淨淨，每一個想爭取「民主」的百姓肚子裏是雪亮的。這是民衆們第一次領會到民主的「恩典」！

較場口郭沫若等被毆，又將全部責任，推給「暴徒」，好像下文就不了了之，中國「暴徒」之多，簡直難以使人置信，這些「暴徒」還是「養家的」呢還是「野種」？為什麼他們的「暴」，只暴在正義的身上呢？

上海學生在追悼于再先生的游行中，沿途有軍警「保護」，這層保護的「膜」，就是真正的「民主」嗎？

「羊棗冤獄」，老百姓只曉得他是屈死的，有許多哀悼他，爲了他因爲「思想」問題而遭到非刑慘死，甚至連美國的新聞記者也憤慨的公開質問，但我們不看見大公報上登的很明白：「羊棗患病死的，當局非但沒有拷打他，並且優待他，生了病小心的爲他醫治，這樣的民主之下，羊棗不死在前，不死在後，死在「釋放政治犯」的時候，我們只好嘆他「福薄」了！

上海選舉參議員了，這再「民主」不過了，由老百姓自己選，揀地方上公正的，肯爲大家謀福利的選，還不好？但我們常常看見報上，也聽見說，百姓選舉時候有人「照」填寫某某人的，不用百姓認識或要曉得的某某人，反正填了就算，明天報上發表了「民意之下」的參議員，老百姓還有什麼話？

「民意之下」的參議員，老百姓還有什麼話？（人民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發表了對此案「

學校的教員被架走，學生被毆打，暴徒們在使出他們全身解數之後，還向學校當局說：「我們是共產黨」！——見大公報——無法無天之後，還敢來一個聲明，真是「好漢本色」！

多着呢！這些還只是犖犖大者。那些另另碎碎的事實太多，我們不要寫它吧！反正是「民主」，反正粉飾與妙無窮！

但我們上面已說過：粉飾畢竟不能遮盡天下人的耳目，做了婊子無論如何要「撇清」，要粉飾得像處子，總不會成功；反之，不做婊子的即使人家譁罵你，有一部分人相信，但日後自有人來證實！事實畢竟是事實！個人要不得粉飾，團體社會要不得粉飾，國家更要不得粉飾，我們希望個人摒棄粉飾，更希望我們的國家摒棄粉飾。老百姓對當局的測度，是以事實爲準繩的，假使表面裝了一層「膜」在實行民主，老百姓一定不會容忍的！

（上接二七頁）

所以真正的民主決不是欽賜的。只有羣衆一致自覺地把階級消滅後，慘無人道的戰爭才會停止。威爾遜說：「另一次大戰正在等待着，」在階級未消滅時，戰爭的危機正在各處蘊藏着，當然這不是威爾遜的原意，但這却是一個愛好民主的所應知道的。

假使站在威爾遜的環境來觀察，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高度的擴展時，他却能有愛好全世界人類和平的理想，這點可說是進步的。但在現在如果就此爲滿足，希望有一個人格偉大的政治家便能將一切問題都解決了，造成「革命必先革心」的理論，即

使他不是惡意，這意識也太幼稚了，這總是一種錯誤的思想，看「威爾遜總統傳」的朋友，當你的眼光從報上多利亞社會時，你感覺怎樣。

（人民沒有看到，也沒有聽到），發表了對此案「

『威爾遜總統傳』中看到的民主

稽山

民主只能在羣衆自覺的活動中才能領略到，決不是少數『偉大的人格』所能感化；民主是要羣衆用自己的力量經過鬥爭的過程才能獲得，決不是統治者皇恩浩蕩的欽賜。

受了無數友人的慫恿，說『威爾遜總統傳』是一張值得一看的片子，它全場充滿了民主的意識。因此，在民主聲喊得響徹雲霄的當兒，也就來湊一下熱鬧吧。那天，從百忙中抽空趕往，已是快將開映了，可是場中却稀朗朗地似乎賣座不到半數，（在另一家上演的『出水芙蓉』却早已掛客滿牌了，）也許『民主是否真理，尚待研究，』上海人對它並沒有多大興趣。

當然，在色情胡鬧諸片中，『威爾遜總統傳』是值得推荐的，但從民主來說，它却給我很大的失望——也許推荐给我的好心的朋友們的所謂民主和我以為的民主不同，也許我是壓根兒不懂民主這一回事。總之，全片太誇張了威爾遜的人格，充分表現着英雄主義，這應是民主的一個大障礙。

也許一般觀衆對於現實的『五子登科』太熟悉了，因此在銀幕上看到遠征軍出發時，總統親在抹桌這一個鏡頭，便不由自主地喝采起來，不過我們要注意這只是特權階級暫時不使用它們的特權，它們和被統治者間的關係並沒有改變，不是那個兵士知道總統在這裏便驚惶得把杯子也打翻了麼？這不是民主的一個小小諷刺麼？如果特權階級和羣衆暫時相混便可算是和諧，那麼我們上代人所愛說的『

青天大老爺』的私行察訪，便該說中國早就有民主了。如果羣衆的民主只是在特權階級不使用它們的特權時才有，羣衆便得仰候他主子們的喜怒，這樣的民主未免太可憐了！

本來在資本主義的王國內談民主是有限度的，代議制度使羣衆成了代表財政寡頭的政客們的尾巴。『威爾遜總統傳』中幾場競選的偉大場面，不知不覺地將盲從，欺騙，甚至某些無恥等等的舉動，也給暴露出來了。就算威爾遜是聖人罷，假使他不接受政客們的建議，他能做州長嗎？他能做總統嗎？廣泛的羣衆完全被遺忘了，他們被記起時只是他們被某少數人所利用作尾巴時，過此他們又被遺忘了。民主在可憐的盲目羣衆被利用時似電光的一閃出現，但轉瞬它又似電光般不留形迹地消滅了。

這點，即使在喊民主的威爾遜總統似乎也沒有意識到，他並沒有瞭解羣衆，他雖滿心想爲羣衆謀幸福，但他却完全脫離了真正的羣衆，他只是離開了現實，而從『偉大』的腦子中幻想着救全世界人民偉大的計劃。國際聯盟的本質怎樣，姑且不論，而威爾遜只是要實現他的信心，羣衆迫切的需求是否這樣，這不是他所注意的，因此他的建議在國內受到拒絕，它失敗的原因，威爾遜以及製片的好意宣傳者都沒法獲得解釋。這時他開始環遊全國作沈痛的演說：『你們是被欺騙了！』這些使許多軟心腸的都握一把眼淚，但他這樣只是在要求羣衆來支持他個人的主張是對的，羣衆並沒有意識到現在該是他

們自己來主宰自己命運的時候，他們似乎在欣賞不同演員表現不同的演技而已。『你們是被欺騙了！』不錯，在羣衆沒有抬起頭來自己主張的時候，他們總是被欺騙的。威爾遜，這個好心腸的總統，借用他妻子的話，『是一個孤獨的偉人。』

歷史只是羣衆不斷鬥爭的歷史，假使歷史可以創造的話，那麼只有藉着羣衆的力量。（這當然是指最進步的階級，一切妥協，動搖，腐化，落伍的階級遲早總要被歷史的車輪所拋棄的。）羣衆決不是不知不覺的『阿斗』，他們自身的痛苦困難，只有他們自己知道得最澈底，同時也只有他們自己才能解決。一個健全的政黨，只能在羣衆中起一些領導作用，絕對不是高踞羣衆之上，叫羣衆把他們當作天神上帝般崇拜着。威爾遜在返國後談到國際聯盟時說：『我已……反對派議員當即反唇相譏：『你嗎？威爾遜先生，你的政府便足以代表全人民的意志嗎？政府，幾許人藉這名義來壓抑羣衆合理的要求以實現他們本階級的私慾！』

因此，站在歷史發展的觀點，民主只有經過羣衆用自己力量的鬥爭才能得到，這不是『好人』的廉潔政治所造成，不是特權階級自動放棄一部分的特權，不是一個強有力政府的保證，更不是一般政客們專事上層拉攏所能辦的。羣衆的痛苦是自身所受到的，羣衆的幸福，也只有讓羣衆自己抬頭去爭取，這是他們應有的權利，（下接二六頁）

一個家庭的戲劇

沙 崙

赫爾岑著 巴金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發行

這一篇用血和淚鑄成的悲劇，是赫爾岑——作者自己生涯中刻滿了創痛的一段里程，也可說是他人生旅途上所經過的許多波濤中最巨大最致命的一個浪峯，它把一個完滿幸福的家庭衝得粉碎離散，遺留下的是永遠不能彌補的傷痕。

亞歷山大。赫爾岑，是出生在十九世紀中葉俄國的貴族家庭，但他爲了研究社會主義，反抗沙皇專制，而在監禁流亡中渡過了一生。在亡命國外的悠長歲月中，他並沒有放棄俄國解放運動的工作，不斷地從事文字上的鬥爭，抨擊沙皇專制政治，因此在此當時的俄國青年中起了極大的作用。——一個家庭的戲劇，是他用日記的筆法，加以動人的描述，記載他在歐洲亡命中一段家庭生活的歷史。現在我把內容概要地介紹一下：

正當歷史的風暴捲進了歐洲，意大利的覺醒和法蘭西的革命預言了一個新時代的到來，那時，赫爾岑懷着對革命的熱情和憧憬，同他的妻娜達麗領着幾個幼小的孩子，來到了革命火焰旺盛的法國。

一八四八年的六月裏，法蘭西被腥風血雨淹沒了，流血的慘劇在巴黎扮演着。結果資產階級的政府戰勝了，工人運動被壓制下去。新生的法蘭西又重新墮入茫茫的黑霧中，同時也將赫爾岑心中才被煽起的希望之火吹滅了。

流血的恐怖的黑夜是過去了，接着來的是心靈感到極端的倦怠、空虛和黯淡的黎明。反動者得到

了政權，高坐在共和國的王座上，從此勞動者又成了地獄裏的冤囚！

一種難忍的憂鬱壓倒了赫爾岑，再加他的小女兒又染上了嚴重的傷寒症，在死亡的邊緣上經過長期的掙扎，總算慢慢地活了過來，可是這却消耗了他和娜達麗的精力。

正在這憂患和緊張的時期，一個陌生人闖進了他們的圈子，並且在他的家庭裏翻進了狂瀾，這人就是黑爾威席。在和赫爾岑結識以前，他曾經一度被譽爲德國的天才詩人，因爲他曾做了兩首歌頌革命的短詩，因此而風靡了德國。但是，在一次德國的工人暴動中，他異常勇敢地做了，一個可恥的臨陣偷逃者，而喪失了他的信用和整個過去的榮譽。這個極端的利己主義者，爲了要享受奢侈豪華的生活，娶了一個他並不真心喜歡的德國銀行家的女兒愛瑪爲妻，那是一個淺薄粗俗的平凡女子，她死心塌地的崇拜着自己的丈夫，甘心一輩子做他的奴僕。

一見面，黑爾威席就對赫爾岑表示熱烈的對父兄般的敬愛，這使好心腸的赫爾岑不覺對他發生好感；同時，他又在娜達麗面前反覆地訴說他的痛苦，希望她給予溫暖的撫慰，這樣又很容易地贏得了軟弱慈善的娜達麗的憐愛。於是，不久以後他就自然而然成爲他們家庭中的密友了。

可是，一個人的利己心一旦達到極端強烈的地步時，就顧不到別人的利害了。黑爾威席就是到了如此的地步。他自從得到了他們的信任和同情以後

，便不顧一切地用他的狂熱的激情來誘惑娜達麗，使她脆弱的心靈墮入不能自拔的癡迷狀態中。赫爾岑早就敏銳地發覺了這一點，並且預感到這將是災難和不幸的徵兆。雖然他很愛娜達麗，這件事使他感到極大的痛苦，但是他理智的，他絕不願意娜達麗爲了他和家庭的牽制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所以他坦白地表示尊重她的自由，由她自己來衡量一切的價值，而決定取捨，並且他還進一步地提出分離的意見供她考慮。這一個冷靜的獻議警醒了娜達麗，使她爲自己的癡迷所引起的結果而惶惑和驚駭了，因爲她從未起過和她丈夫分離的意念，而且是始終如一地深愛着他。這時，她感到非坦白地向赫爾岑陳述她自己的心跡不可，於是便從楚利克趕往巴黎去和他重聚，這樣才算免去了一場可怕

的風暴。固然，他們的深摯的愛情使他們之間的暗雲消散，而又緊緊地繫在一起，但是傷口的創痕却久久不能復原。疑難的毒菌在噬着赫爾岑的心靈；娜達麗受了這次的風波後，心理上便呈現出衰弱的現象。而另一方面，黑爾威席的絕望也達到瘋狂的地步，他常常帶着維特的神氣，好像隨時都會用手槍來結果自己的生命或者葬身海洋。娜達麗當然不能無動於中，於是她在精神的痛苦和折磨下，更顯得衰弱和憔悴。

在表面上，他們的態度都還平靜，可是以前的裂痕又開始發展，最後終於爆發了。

娜達麗的軟弱使她仍保留着對黑爾威席的憐愛，當黑爾威席宣告說要離開他們，要在他們的眼中消滅時，她竟然悲痛地哭了。赫爾岑嫉憤的火從他心頭燃起了，殘酷的帶刺的話像毒火般從他口中噴出，使娜達麗痛苦得幾乎昏厥了過去。幸而，她那

種無限的苦楚和無言的悲痛的神情鎖定了他的衝動的激情，使他的良心受到譴責，終於在悔恨和悲傷交織的情緒中和娜達麗恢復了破裂的感情。

次日，愛瑪來找赫爾岑，告訴他她的丈夫要赫爾岑去親手殺掉他，因為他寧願死去，也不願和娜達麗分開，更不願和赫爾岑破裂，而赫爾岑的回答是：「……我討厭這種庸俗的傳奇劇裏的把戲！」最後，愚蠢而可憐的愛瑪，爲了要救下「一個偉大的詩人」，更爲她的丈夫懇求他讓娜達麗和她的丈夫一同走。赫爾岑叫她去徵求娜達麗的同意，當然她是失望了。於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黑爾威席一家便整裝出發了；臨走時他們還做了一件丟臉事，就是把一切的欠債都留給赫爾岑來償付，這是布爾喬亞式的最可鄙的出走！

如今，他們的家庭又重新得到了清靜，但是——一切都帶着風暴的痕跡，傷口的血仍在緩緩地流着。疑惑、疲勞和煩厭代替了信仰，激昂和憤怒。不眠的長夜，無底的苦痛使生命成了乾涸的枯泉。在這些閒惰的日子裏，黑爾威席仍舊不斷地寄信給赫爾岑和娜達麗，用自殺和可怖的犯罪行爲威脅他們，使他們的和平又被擾亂了。起初娜達麗還擔心他真會自殺，但是事實告訴她他是多麼地卑怯而又無聊！——有一次，娜達麗受了赫爾岑的慫恿，寫信給黑爾威席表示很贊成他去自殺，而回信却說他自殺的念頭已經消除了，因爲他的心情已改變，他要到埃及去——這使娜達麗對他完全失去了同情，而且把他當做一個無足輕重的懦夫。

不久，赫爾岑離家遠走，在途中友人告訴他說：黑爾威席會要求娜達麗跟他走，而得到了她的允許。這是黑爾威席的謊言，但赫爾岑竟信以爲真；殘餘的嫉火又燃起了。他馬上寫信給娜達麗，那是

一封充滿了憤恨，絕望和猜疑的信。娜達麗的回信是陰鬱的，她悲痛地說：「我寧願死去；你的信仰破碎了……」這些真誠的泣訴又使赫爾岑狂亂的心情安定了下去。

三年的隔離後，他們重逢了；這次的重逢消除了一切的疑難。他們經過了試驗，受到殘酷的打擊，「像一隻船經過了風暴和災難以後，回到牠自己的港口——雖然已經破碎，可是牠得救了。」他們又回到了正路上，年青時的幻想消滅了，他們是更了解彼此的優點和弱點，共同再担負起過去的苦痛的担子，開始人生旅途一段新的行程。

幸福的陽光又射進了他們的家庭。然而，好像命運已注定了他們的不幸似的——一個最無情的打擊落在他們頭上，而把一切都摧毀了。

一八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赫爾岑吩咐家人把屋子飾滿了鮮花，點綴着燦爛的燈籠，爲的是歡迎從巴黎來的他的母親，兒子柯利亞，和家庭教師。一切都已預備妥當，只是等待着他們的來臨。然而，冷酷的命運也已事先安排好了，等赫爾岑到海邊迎接時，只見海浪衝擊着沙灘，却再也沒有歸人的影子，他們已飄蕩在黑暗的海洋上，或者已經在海底長眠了！

一切都不留痕跡地去了，只有餐桌上的他母親座前的一杯酒，一束花，和柯利亞座前一堆新玩具還靜靜地躺在那裏。歡樂的聚宴成了葬禮的前奏，用來裝飾屋子的鮮花又將成爲花圈上的飾物！

經過許多的波折，已使娜達麗的神經和體質上受到極大的傷害，而這個打擊又是這樣猛烈，是脆弱的她所經不住的，恐怖與痛苦已滲透了她的血液。她病了，而且從此就再也不會復原。

在病床上的娜達麗是一天一天地接近了墓門，

而赫爾岑也漸漸地覺得她的生命是在不斷地流出去，像開放了的水閘。曾經有過短短的幾天，她的病勢有了一些好轉，但是，這正是「一曲就要絕響的樂調的最後的諧音」。

當娜達麗彌留的短短的時期裏，卑劣的黑爾威席又寫了一封無恥的挑戰書給赫爾岑，要和他決鬥，並且誣蔑他用造謠手段迷住了娜達麗，更用最刻毒的咀語說他的母親和兒子的被溺死是命運的報復。這使赫爾岑像受傷了的野獸般的狂跳起來，因爲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這樣的侮辱。但是爲了垂死的病人不再受到侵擾，他用沉默來回答了這個侮辱，把復仇的願望存在心底。在寄了這封信不久以後，黑爾威席寫信給他的妻子說：「我最盼望的是赫爾岑會接受這個不用證人的決鬥。我相信我們兩人一開口就會擁抱起來，把過去的事完全忘掉的。」啊！這就是他理想像的決鬥方法，還是德國傳奇劇裏的把戲！赫爾岑是更深一層地了解他了。

這時，娜達麗雖臥病床間，但從友人的傳聞中而約略知道一點，後來又要求赫爾岑給他看那封卑鄙的挑戰書，她對黑爾威席的輕視已變成了憎恨。爲了給赫爾岑洗雪恥辱，她還寫了一封信給黑爾威席，裏面不但表示她對赫爾岑忠實的愛，而且更充分地把他黑爾威席過去的無恥行爲（如恐嚇，要挾，欺騙）都一一舉發了出來。當這封信被原封退回來時，她把友人都召來，把她最後的願望託付給他們，即是把那封信在證人面前讀給黑爾威席聽，以爲她給他的懲罰。

娜達麗的病已到了最後的階段，這一支諧曲將成爲遺音了。悲痛和絕望縈繞於病床的周圍。最後的時刻終於來到，孩子們都召到了床前，在那裏領受着最後一次母親的愛撫。

一切都將告一段落。悲哀和慘痛也慢慢地沉靜下去。行過葬禮後，孩子們都被娜達麗的女友帶去撫養，於是家庭生活的最後的痕跡也消逝了。

現在，那一件纏繞了這麼久，剝削了娜達麗的幸福，使她到死都未曾得到解脫的事也需要一個結束：兩個赫爾岑的最親密的朋友負了死者的使命去找黑爾威席。這個胆怯的人一見到那兩位陌生客人的光臨就嚇得面無人色。他在這時無恥地否認了一切罪行，但是終還是不避兇一個小小的報復——一記耳光的侮辱。這對於他却是一個寬大的恩賜！

跋涉了這段艱苦的路程，赫爾岑的精力也已耗盡，他需要長期的休息來療養他的創傷。在法國，一切都帶着過去的暗影，他已不能再逗留下去了，於是他遷到了英國倫敦，結束了這段生涯中最痛苦的旅程。

在這凄婉動人的故事裏，我們能够很清楚地看着有二種典型人物：一種是熔合着偉大的人格和優良的本質的典型，它的代表就是赫爾岑；還有一種是集合了一切卑劣的本質充分地反映了社會黑暗面的小布爾喬亞典型，這種典型的具體表現就是黑爾威席。他們兩人在任何場合，任何事情上，總是成爲極端相反的對照。赫爾岑的寬大、容忍，遇到事變時的冷靜理智的態度，對於妻子的尊重和敬愛，以及對於問題的深刻分析和正確的處理……處處都表現他那完整偉大的人格，和一個大思想家的風度。同時，他的妻子娜達麗的本質也有許多和他相似的地方，所以他們的愛情才能達到那種深刻的程度，患難使他們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共同生活中所遭遇到的種種磨難和試驗，使他們了解彼此的弱點和優點，尤其是當娜達麗臨死的時候，他們的互相了解已達到了更深的程度，他們的情愛也進入更高

的境界。但是，娜達麗也正如其他女子一樣，難免要犯一般小布爾喬亞的毛病，便是對於戀愛存有一種幻想，對於她的伴侶需要表面上的更多的體貼和溫情，來灌溉她的心田。然而，這是在赫爾岑那裏不能充分領受到的，因爲赫爾岑是一個偉大的思想

春滿江南 藍天

春，綠滿江南，
朝陽染紅了屋宇，
月娘撫着河邊的垂楊，
東風吹皺了原野，
百花飄散濃烈的芬芳，
黃鸝幽幽低唱，
唱出失落了春天的人們
底哀怨！

春，綠滿江南，
被蹂躪的河山，
載上勝利的災殃；
菜黃的臉上，
壓死了歡笑；
陽光從不會
照進低矮的茅房。
春，綠滿江南，
可沒有綠在人心上！

分表現了出來：「……有一些時候，在我的心靈深處有什麼像一根細毛那樣的東西隱隱地搔着我的心靈，過後一切又是光明的了。」——這個沒有滿足的東西，這個未經使用而且被摒棄了的東西——追求着另外的同情，而且在黑爾威席的愛裏找到了牠。——這是赫爾岑的解釋，他是最能透澈地了解娜達麗的。

正因爲娜達麗有這個弱點，再加上她的優柔寡斷和不堅定的性格，才會受到黑爾威席的誘惑和欺騙，便陷於癡迷，終於招致了這樣一個悲劇。

再說到另一個典型人物——黑爾威席，他是一個定型的小布爾喬亞，具有着人格的雙重性，陰沉、優柔寡斷，心地不光明，所以從來不願坦白地吐露心懷，而是用一層虛假的激情遮蔽了卑怯、無恥、惡毒的內心；他的利己心是達到了坦然和冷酷的程度。爲了自身的享受和某一方面暫時的滿足，他不惜以任何最不人道的手段來侵害他人的幸福，剝奪他人的快樂，而且還硬將犧牲者推入用造謠、謊言造成的恥辱的陷阱裏。這些都是典型小布爾喬亞所具有的特點，而在黑爾威席身上活生生地表現出來。至於他對娜達麗的愛，和赫爾岑的愛情對照起來，是根本有着質的差別。赫爾岑的愛情是真實的、深刻的、崇高的，而他的所謂「愛情」却是虛偽的、淺薄、自私的，而且含有濃厚的毒素，這種毒素終於侵蝕到娜達麗的心靈，使幸福美滿的家庭破裂，演了一幕這樣的悲劇。

至於在技巧上，文字的幽美和深刻，好像美妙淒婉的音樂，感人至深，是當時名作家們如屠格涅夫，克魯泡特金所賞識和讚美的。而且譯筆的流利和生動，使讀者的情感完全溶化在裏面，使人親切地體會到書本中的情景。這種親切的感覺是在一般的書本中所不能體味到的。

可笑的日子

希 烈

看，

陽光給烏雲掩蓋了！

四、二八，

這可笑的日子

從『民主』的招牌後面，

鑽出來

一大批花臉，

看花了人們的眼睛！

帶來更多的跑龍套，

攪昏了人們的腦袋！

幕前是

『尊重民意』，

……一齣清唱！

幕後又是

收買，

強迫，

操縱，

包辦，

原來是

鬼魅現形，

串演丑腳戲！

× ×

看，

陽光給烏雲掩蓋了！

四、二八，

這可笑的日子

人們惶怍的睡眠，

給保甲人員吵醒了，

去，去，選舉去！

像羊羣，

驅到投票場去！

蒙在葫蘆裏，

擠在人羣裏，

依着，

像小孩子學樣，

塗上一個不認識的名字；

好了，

一齣滑稽的喜劇閉幕了！

× ×

看，

陽光給烏雲掩蓋了！

四、二八，

這可笑的日子，

曹錕舊戲在重演，

民意又來一次強姦，

呵！

假借吧，

利用吧……

然而人們的眼睛是雪亮的，

多少人的憤恨，

將匯成一條鐵的巨流，

男的，

女的，

老的，

少的，

一切人們結成的

爭取民主的巨流，

流呀！

從帕米爾高原，

從喜馬拉雅山……

流呀，流呀！

浩蕩的流呀，

流到黑龍江，

到黃河，

到長江，

到珠江……

急湍的洪流，

激起了澎湃的怒濤，

翻動了海底的沉沙，

推毀了枯朽的渣滓，

洗淨了腐敗的老家！

看呀！

這古老的大地，

熱血所栽植的

新綠的嫩芽，

在春風裏茁長，

在太陽裏開花！

……

……

沒有太陽的一隅 (溫州通訊)

李志遠

——一個師範學生的申訴——

我們的學校是一所省立的師範學校，在抗戰發生後的七年中我們都生活在暗無天日中；在神聖的教育機關中竟有特務組織存在着，我們同學只要說出一句不滿學校的話，或學校認為與正統思想違背的話，五分鐘後校長便曉得了。監視得非常嚴密，凡是被認為思想「不正確」的都被迫退學，最後造成清一色的思想。

抗戰終算成功了，政府也頒布了人民的一切自由和民主權利。學校換了一位新的校長，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新的希望。特務組織大概是沒有了，可是我們還繼續被人教訓着；只有正統的思想才是最正確的最神聖的，其他一切都是異端，是危險的。為了保證我們不受危險的思想侵襲起見，又苦心孤詣的暗中檢查我們和某些先生的信了。有一天校長和教務主任召集全校各級的隊長到校長室裏來，把各教師的名字一個個向他們提出，詢問其思想如何，有些人不懂學校用意何在，弄得莫明其妙不知到底該怎樣答覆才對呢？答出的只是很空洞的「很好」，「沒有什麼」或「好像有點激烈」如是而已。

我們的食米和菜費一向是政府供給的，但偏在最近米價狂漲的當兒，我們的膳食費改發三千代金，這與實際需要的數目相差太遠了。我們都正當發育成長的時期，小菜方面既談不到滋養，只有從飯方面來補充，這樣每人每月總得要四十五斤左右才够。照目前每千元六七斤計算，則米是米就要七千

只有三千元，這就是說，一個月裏有二十天我們不要吃飯。學校要我們回家帶來補足，否則作自動休學論，這種妙想天開的辦法對我們真是當頭一棒！我們師範生大多數是家境貧寒的，那裏有餘力交出這許多米來？我們不是只有走上失業之一途嗎？可是我們要讀書呀！爲何把窮人推之於校門之外？我們要開全體大會討論這個問題，學校派先生來監視，理由是「沒有先生出席的學生大會是不成立的」。校長說：「你們儘管開會討論，但最後決定權還在教務會議上」。教務主任也說：「你們代表大會的決議沒有用，在校務會議上是通不過的」。

當時我們開會的結果是決定不帶米，請學校替我們向教務廳請命。不幸學校當局絲毫不體卹我們的痛苦，果然在校務會議上不能通過，仍然維持原議。這樣激起了大家的憤怒，在絕望之餘，同學們晚上把報告撕下來了，更搗壞了一排教職員宿舍的琉璃窗。校長和心虛的教員都逃了。第二天便調了五六十個兵來。於是每一個平常是絕對服從的同學也反感起來。幸而有一位較明大義的先生立刻出來勸，不讓他們開進校門來。這些兵便轉而開到校長住的地方去了。當天晚上一個茅棚燃着了火，雖經我們全體同學合力撲滅，但終於燒光了，只是沒有蔓延到別的地方而已。校方肯定的說，這火是反對帶米最激烈的同學放的。放火的行動當然是不對的，這是盲動，這種行動足以危及學校的公理和師生的

生命的。我們死後有人負責也沒有入真的請法警那

樣愚蠢的勾當。學校當局說這次的火是反對帶來最激烈的同學放的，既然毫無證據，而在邏輯上也不是唯一可靠的說法。學校當局對付學生的手段既已超過了教育的範圍，又怎能保證他們不會爲了鎮壓和分解力量起見而設計加以罪名呢？這件事使我們想起了希特勒傑作之一：國會縱火案，不寒而慄。

第二天學校開始捕人了，教務主任帶着警察走到一個女同學的家裏，拉着這女同學說：「她是共產黨，你們把她捉去吧」，她便這樣被捉去，關在拘留所裏，一共關了七天才不明不白的放了。這是「合法」的嗎？我們想提起公訴，可是我們在懷疑：「法律是否會幫助被壓迫的人和弱者？」最後學校命令這同學和另外兩位女同學，五位男同學一同退學，什麼理由？放火嗎？毫無證據。現在學校當局也不敢提起了。唯一理由是說他們思想成問題，「有共產黨嫌疑」。但這又很難令人相信，過去七年嚴格的統治，什麼過激黨都清除掉了，那裏來的共產黨？據我們所知，這罪名最大的女同學幼稚得很，只是有些青年人所特有的正義感和激昂而不願做一個馴服的羔羊而已。其中有兩位大家都認爲是最無辜的：一位平時可以說是「安份守己」的，只爲了她與前一位女同學較接近些罷了；另一位男同學大家都曉得他沒有什麼所謂思想問題的，只是在這次大會中發言比別人多些，這才真叫做「莫須有」了！

就退一步說，算他們都是共產黨吧，但現在已是民主時代，政府已正式承認人民有思想的自由，並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這又怎成爲一個罪名？然而，不管怎樣沒有理由，而八位同學被命令退學却已成爲事實。他們爲了大眾的利益被犧牲了，但有誰替他們主持正義呢？同學們都感到學校加

下來的帽子太可怕了，除少數人外，都只好和

兩 度 學 徒

莫 琳

我第一次當學徒，是在一所營造廠裏。那時我不過十四歲。當我離開鄉土，和慈祥的家人告別時，那種依依不捨的情景，現在猶歷歷在目。母親緊緊地抱着我，眼睛充滿淚水，再三叮囑我好好地做人，使得將來有吐氣揚眉的一日。我向母親點點頭，說自己一定刻苦耐勞，叫她放心。直至船鈴響了，母親才不得不離開我。船慢慢地開動了，我看見妹妹站在母親旁邊向我揮動白手絹，母親則傷心地擦着眼淚，一直到看不見她們為止。回到船艙，我伏在哥哥的懷裏大哭了一場。從此我便離開了家鄉，離開了快活的學校生活，離開了慈祥的父母，來到上海，在一個陌生的地方，開始我的學徒生涯。

營造廠的工作是笨重的，勞苦的，一天到晚跟隨在老師傅後面，替他搬磚石和扛泥土，後來熟手了，還得担任石灰和做全盤建造的工作。我的老師傅只在旁指點指點吧了。我在家的時候，雖然遠不似有錢人家的孩子那樣嬌生慣養，但也從不會用肩膀挑過什麼笨重的東西。現在，我却得在炎炎的烈日下，赤着胸和足，掛着滿頭大汗，挑起重重的担子從這邊走向那邊。爲了「好好地做人」，我硬着頭皮忍耐下去，這樣的勞碌，好幾次我會死而復生！但老師傅還不時罵我，爲了小小的過失甚至要打我。我沒有話說，也沒有哭，我記起了母親的話，我只好忍耐着，痛楚地忍耐着。

營造廠裏生活是遊牧式的，食宿處隨着工作地點而轉動。就在新的牆角邊，用磚塊架成了爐子來燒飯煮茶。晚上，攤起蓆子，在塵埃中着地睡覺。

爬蟲與蟲子在身上沿行，但我不知道，一天的勞苦，躺下身來，便一覺睡到天亮。就是在冬天，打地窖捲過來的刺骨的寒風，却真真有點「吃不消」哩！這種非人的學徒生活，我過了兩年半，離滿師還祇有那短短的半年，但天不從人願，因戰爭爆發，營造廠解散了，我的老師傅也就失了業，我使失去依托，也無從找到那個師傅去補師。於是，回到哥哥住的狹小的三層樓裏，和幾個同居的工友，過着六角粉的生活。

我第二次當學徒是在一所五金店裏，那時我已十七歲了。人雖然生得高高的，但老闆祇肯收我做學生意，不讓我當店員。在這窮途末路之時，我哥哥唯有答應下來。從此我又改換了一個生活環境。初進去拜師那天，循例買了一雙大紅臘燭點起來，跪在紅毯子上，向老闆叩了三個響頭。彷彿我初入學時候，母親一大清早抱起我去拜「孔聖人」似的。在這裏工作，雖遠比營造廠輕便得多，但日子却較前難過，動慣了的我现在必須靜止下來，踏一步也得如履浮雲，幾乎要用脚尖來行走。老闆整天就在面前監督着。我的工作須小心而機警，客人來了，茶端奉上；吃飯時老闆先生們隨手盛飯，之後又得倒茶，提手巾。一清早起來，掃地，揩檯檯，起排門。打烊之後，還得檢拾貨物。直等於爲人役使的牛馬。一天到晚的工作，沒有忙完的時候。

每個月，我祇領到幾十塊的「月規錢」，僅够在馬路邊理髮和買肥皂之用。一年到頭，祇有年底才得到額外的「鞋襪錢」，能够買雙新鞋子過年。

自掃門前雪」。先生中本有些同情我們的，但都以爲學校既用這種手段對付學生，恐怕惹禍上身，也就沒有勇氣說話了。本地各報紙根本對這次事情都不登載，還望牠們來替我們爭公道嗎？聽說校長和教務主任會親身跑到報館裏去懇求，如無學校蓋印的任何有關本校的文章或消息，概不能登載。這一切的一切太令人氣憤和失望了。我們七八年來受盡多少災難，滿以爲抗戰的勝利會給我們帶來一點光明，誰曉得這一角落還是黑暗重重！

編者按：我們收到這篇文章之後，恰好於五月六日的新聞報上看到如下的一則新聞：

溫 師 一 度 發 生 風 潮

浙江省立溫州師範學校，於四月中旬發生軒然大波，啓因於學生無力補繳膳費，校方愛莫能助，以致學校絕糧，勢已斷炊，校方爲免使絃歌中輟，勸諭學生返家，攜米赴校，詎有王姓女學生等利用時機，鼓動風潮，竟將膳堂一座，縱火焚燬，辦公室校長室及教師寢室，全遭搗毀，損失慘重，校方乃暫行停課，將該女生扣押法辦，風潮至二十日始告平息，茲教育廳據該校電呈，業已復課。(五)

這顯然與上面這篇文章所導報的事件有關。但非常奇怪，文章敘述的經過與新聞報上的消息竟完全相反。根據常識判斷，我們很有理由相信這則新聞是學校當局發出來的官方消息。真理在那一方面，我們相信明眼的讀者自己會判斷無誤的。

日子像水流，一月月的，一年年的，我慈愛的母親死了，父親也去世了，我在五金店總算做滿了三年學生意，升爲小店員，但一切都沒有多大改變。同樣的工作，又幾乎是同樣的待遇。我當當想起母親的叮囑我立志爲人的話，在已往的日子，我就是好好地忍耐着，縱然被人譏笑或挨打挨罵，也得卑躬屈膝，忍氣吞聲。但到現在還不過是奴才一個！於是我明白了：這世界是不合理的，除非這不合理的社會制度改變了才能找到個人的出路。

我們的讀書研究會

澤清

編者按：這篇報告是本刊讀者澤清君親自送來的，他的學習精神很使我們欽佩，尤其是職業青年，更是難能可貴。從這篇報告中，看到他們求知慾的強烈和學習態度的認真，對於那些只知盲幹的實際主義者，不知將有什麼感想。

不知將有什麼感想。

現階段的青年，除了有資產的少爺們和小姐們，有資格進學校讀書，有權利享受高等的教育外，極多數的青年，祇受過初等或中等的教育，便因為經濟的限制，生活的逼迫，而不得不拋棄了學業，投身服務於社會。然而這個萬惡的社會，是最容易使一般意志薄弱的青年，墮落腐化的。但是另一方面，本質好的青年，他們有着遠大的理想，崇高的志願，對於社會現狀，則又深深地感到失望與不滿，同時，他們在為生活而鬥爭的過程中，為了澈底的瞭解現實，精細地分析社會現象，並且進一步適當地應付一切問題，以期達到解放自己，獲得合理的生活起見，他們知道首先非充實自己的學識不可。因此，強烈的求知慾，激動着這羣失學的青年，於是，就必然地產生了一種失學青年的自學問題。

當我們幾位知己的同事們，在業餘談論着這個問題的時候，彼此同樣都有一個感覺，就是大家都迫切地需要智識，需要學習，明白一個人自學的效力是相當有限的，進步的速率是很慢的，必須用集體的討論、研究，進步才是迅速的。所以有些同事提議組織一個『讀書研究會』，終於在熱烈的情緒之下籌備起來了。

由於大家非常的熱心，參加的同事很多，超過了我們的預計。同事杜君，答應把他的臥室，經常借給我們開會，這樣，會址的問題，也很順利的解決了！於是在『勝利』後的第五月四日（五四運動廿七週年紀念日），我們的『讀書研究會』宣告誕生了！同時，大家感覺到時代是在不斷地推進着，西方各國，已由機械進化到原子能的時代，反觀我們中國，自五四運動到現在，雖然相距了很長的廿七年，但是，今日的社會及政治，却仍舊是在反動的巨輪之下打滾，並沒有改革，沒有進步，反而顯得倒退，所以今

日的『五四』還失去它的歷史意義，正因為如此，我們更需要加強學習，準備去迎接比『五四』運動更高級的運動。更為了紀念『五四』運動，我們就決定把它改名為『五四讀書研究會』。

我們的讀書研究會，組織很簡單，設書報代辦部，圖書部二機構，進選負責者二人，幹事二人，經常的事務，全由他們辦理。會中的經費由大家量力繳納，經費是限定購買書報用的，我們當場決定開五種進步的期刊，三種報紙，並且決定把大家已有的書報都集中到杜君家裏，成立圖書部，以便大家輪流借閱。

讀的書本，由大家選擇合於時代，合於我們需要的。至於讀書的方法，是大家選擇了這本書以後，由各人預先自己去讀，在每次讀書研究會上，每個會員，都必須把關於書的內容，以及有什麼心得？有何批評？發表出來，輪流作報告，同時大家再按照大綱，共同研究、檢討、辯論，使得每個人都了解為止。最後由主席做結論，並且由記錄（為了平均訓練起見，主席和記錄，由每人輪流担任）摘錄下來，這樣才能對每一個問題，或某一本書的內容，能够深入核心，得到正確的了解、澈底的明瞭、清楚的觀念，並從集體的討論中鍛鍊自己的頭腦和口才。

我們開會的次數，規定每星期一次，每次的時間三小時，從下午六時半至九時半。開會的順序是讀書報告半小時，討論二小時，歌唱餘興半小時，如有會務討論，則可延長半小時。在計劃中，我們還預備每月舉行一次名人演講，一次同樂聯歡會，以後還要舉行生活檢討會。當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我們不知所措，因為我們都沒有經驗，但是我們不怕困難，我們相信只要不斷地努力下去，一定可以獲得最後效果的。

一個絲織工人的來信

編輯先生：

偶然在報攤上看見『青年與婦女』這本刊物，細細一看，覺得內容很不錯，雖然在我們工人看來，未免感覺高深一點，但也還能看得懂。同時又看見徵求生活報告的啓事，故冒昧地把我們絲織業工人的生活向大衆報告一下。

絲織業的工人，戰前待遇堪稱不錯。但自『八一三』滬戰爆發後，各廠紛紛停閉或裁員減薪，及至國軍西移，雖曾再度繁榮，但因在敵偽反動政策高壓之下，工人沒有團結，故待遇仍極微薄，甚至於一天工作十四五小時還不够維持個人生活。而資方呢？八年來假借敵偽勢力，剝削工人，投機囤積，發國難財者不知有多少。如某某廠，開辦時只有數台織綢機，但五六年後，已發達為一百餘台，而工人生活則一日不如一日。現在抗戰勝利，天日重光，工人生活，理應改善，但資方却藉口銷路不暢，成本太重，拒絕工友最低限度的合理要求，迫使工潮發生。以目前來說，要算我們絲織工人的待遇最低了。如十小時工作，每星期日休假，女工生產期內工資照給等勞工法規早已規定而其他各產業部門均早已實行的條件，我們還未爭取到。絲織工人為一專門技術工人，由藝徒而達到熟練須經過艱苦的學習過程，而計件工資制更是資本家剝削工人最巧妙的方法，五光十色的花式織品，對工人的體力尤其是目力損害甚大，所以每個織工到了四十多歲即不能繼續工作，而廠方是沒有養老金等規定的。工人工資，應以工人生活費高低而定，而不應以廠

方一時困難而定。若因廠方一時困難而減低工人工資，那麼，廠方賺錢時，紅利是否可平均分配？何況資方的業務秘密並沒有公開，一切帳目並沒有讓我們知道過，賺錢虧本誰知道呢？

這次工潮，自二月二十六日開始提出要求，直到現在已四十多天了。勞資雙方經數度談判，沒有結果。勞方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三月二十八日全體萬餘人齊集社會局請願調解，但資方拒不出席，在羣憤激下，社會局勞工處李處長電召資方同業公會負責人出席談判，經數小時磋商，議決九項決定，勞方認為十分滿意，即行散去。不料三十日接獲社會局決定書，內容已變更爲十三項，不用說，多餘幾項都是對工友們不利的。就是本來九項，內容亦已改變，工友們實無法接受，但從此却得到了一個嚴重的教訓，即一切只有依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對任何人都不能存有幻想，於是工友們被迫罷工了。堅持了十多天，當局却來了一個訓令，要我們先復工後仲裁，雖然工友們大都不願復工，但工會爲了要遵守法令，不使事情鬧僵，一定要工友們復工。但誰料反因此引起了更不幸的流血慘案，事情是這樣的：滬東楊樹浦海州路源通綢廠，在罷工期間由於工友們努力爭取，廠方不得不供給他們膳食，但十五日復工後，廠方立即宣佈停止供膳，工友們當然忍受不了這無理的對待。遂齊向廠方提出質問，言詞之間發生衝突，廠方即打電話到格爾路警局召來大批警士，捕去工友及代表八名。於是立即激動了全滬絲織工人的憤激，同赴警局要求保釋，並

發給... 局... 面鑒於羣... 激昂，工友們先行散去。這時... 來了... 指... 警局即捕被... 捕代表已犯法，須移解法院。工友們聽到了這個消息，情緒更趨激昂，發出了抗議的呼聲，並圍住資方的汽車，於是警局便使用暴力手段，一時自來水，刺刀，槍柄，皮鞭齊向工人羣衆攻擊，打得落花流水。而資方的汽車就這樣衝出重圍去了。結果工人受傷十餘名，一名重傷，更再捕去工友數名。翌日，全上海絲織工人，爲響應源通廠的不幸事件，再度罷工，並號召各產業部門的工友同情援助，我們不能否認到：目前爲止，全上海的工友尚未真正的團結起來，而工會更祇是要求我們工人服從工會，工會則服從社會局。那末社會局又服從誰的意志呢？半年來此起彼伏的工潮，都差不多給這種『服從』帶着走的。這樣，我們又將被帶到失敗，還是勝利之路去呢？我想，看看以前被帶走的人底結果，也許可以得到答覆吧！ 招弟 四月三十日

徵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園地公開，誠歡迎外
- 二、來稿一律用白話文。
- 三、來稿請用稿紙繕寫清楚，字數最好不要超過四千字。
- 四、來稿本刊有刪改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五、稿末請註明姓名及通訊處，并加蓋圖章。
- 六、來稿經刊出，當致薄酬，并贈送來稿除聲明并附郵外概不退還。
- 七、來稿請寄本社通訊處。
- 八、

新中華

第二卷 第四期

從孫科談話反映出來的危機

不久以前，曾經泛濫一時，普遍全國，從學生，工農，大學教授直到參政員們所一致叫喊出來的「反對內戰，要求和平」的呼聲，現在幾乎全消沈下去了！當權政黨固然早已聲明「戡平內亂」的決心；即在中共方面亦已完全拒絕和談，而以「一切為軍事」，「一切為勝利」來作中心口號了。由此充分證明：現時內戰的雙方，都已走向「唯武力解決」之一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以主張親蘇與和平見稱的現任國府副主席孫科先生，最近竟迭次向中外記者發表談話，一反其故態，公開抨擊蘇聯，主張對中共「打到底」，這不但又一次表現出政府當局準備「戡平內亂」的決心，而且從孫先生的談話中，更明顯地暴露了新的危機！

孫先生將國共內戰的責任完全放在蘇聯身上，說「蘇聯幫助中共水陸並進，到今天控制了百分之八十五的東北」……等等之後，他最後的結論便是：「第一我們要向蘇聯抗議，叫她履行條約的義務，……第二，我們要向美國呼籲，叫他在外交上表明態度，同時加強經濟援助中國」（中央社廿三日南京電）。在這一段話裏，很明顯地表現：他一方面抗議蘇聯在東北的違約行動力不從東北消滅，美蘇是會因此發動戰爭的。雖然他附帶聲明「我們並不希望由第三次大戰來解決東北問題嗎？」

目前的中國情勢，宛如一幅世界矛盾畫面的縮影，國共兩大政黨的衝突也正是反映了國際間兩大勢力（美蘇）間的矛盾，代表了這兩大勢力向中國擴張的企圖，使得衝突表現更尖銳和更白熱化罷了。固然，美帝國主義早已視中國為其附庸，企圖以此作為未來第三次大戰中進攻蘇聯的根據地。如果國共的內戰仍舊像現時這樣地繼續下去，便很可能成爲第三次大戰的導火線，並且也許就是未來大戰的主要戰場之一。凡是呼籲美國帝國主義來干涉中國內戰的人們，不但等於甘心以菲律賓自居，而且是自願將中國提供爲第三次大戰的首衝地，自願將中國放在原子彈的毀滅之中，這是一個何等可怖的傾向和危機！

至於蘇聯本是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正是人類最進步的象徵。可是因爲她的執政當局背棄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原則，單從軍略觀點着眼，希冀通過中共的軍事冒險，佔領東北，以此建立未來大戰中抵抗美帝進攻的戰略堡壘。這種政策，

從孫科談話反映出來的危機…… 韻 寬

評馬歇爾援歐經濟計劃…… 鏡 微

「民主」美國的新反勞工法…… 唯 康

巴勒斯坦問題及其前途…… 江 濤

從匈牙利政變看蘇聯對東歐政策…… 旭 東

生活指數解凍後的勞資糾紛…… 劉乃光

學生運動的總結與教訓…… 凌 明

華萊士與製造戰爭者…… 沈念譯

宇宙在翻騰（詩）…… 沙 崑

白雲山下日無光（廣州通訊）…… 樵 子

關於普選全權國民會議（信箱）…… 曼 青

但其主要的目的是在取得美國的援助，首先是希望由此獲得大量的物質上的援助，同時並希望她在外交上（以她的金元和原子彈爲後盾）來壓抑蘇聯。實際上，這種傾向，絕不是想要消除中國的內戰，只是希望將內戰引到美蘇間的正面衝突，引到第三次大戰而已。所以孫先生又說：「我們知道，第二次大戰是由東北起，因此如果東北的局面不能澄清，可能引起又一次的世界新衝突」。這即是說，如果中共的勢

不但不能拯救中國人民於苦難之中，反而是同樣將中國推向未來大戰的原子彈毀滅的陷阱，將使中國人民遭到更悲慘更殘酷的劫運。這種傾向也是異常可怕的。

所以中國的人民大眾，尤其是工農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民衆，必須立刻覺醒起來，認清當前的危機，堅決地反抗這兩種可怖的傾向，以自身團結的力量來阻遏這種正在醞釀和蔓延的危機，澈底解決本國的問題。如果中國的民衆需要外來援助的話，那決不是帝國主義惡意的支助，來興風作浪，而是和中國勞苦大眾同一命運的全世界被壓迫民衆的同情和援助的手。只有如此，中國才能免於再一次致命的浩劫；而且只有全世界被剝削與被壓迫者的共同奮鬥，才能打破帝國主義者的迷夢，從根摧毀那些腐朽的殘存的舊制度和威脅全人類生存的戰爭危機；也只有如此，才能根本挽救中國的危機，保衛蘇聯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安全，保證今後全人類的幸福！（韻覽）

評馬歇爾援歐經濟計劃

自美國務卿馬歇爾於本月六日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宣佈援助歐洲的經濟建設後，立刻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尤其是獲得了英法等國的熱烈擁護。但同時也引起了蘇聯方面的疑懼。

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得明顯地是跟蹤着莫斯科外長會議的破裂，杜魯曼援助希土的反共計劃及最近匈牙利的政變等而來的。這是美帝國主義包圍蘇聯，孤立它和削弱它，藉以準備最後進攻它的整個反蘇政策之一種邏輯的發展。

美國在實行軍事進攻蘇聯之前，必須把資本主義世界放在它的圍剿下且壓起來，尤其必須將未受

蘇聯控制的歐洲各國，放在它的絕對控制之下，築成『西歐堡壘』以對抗『東歐堡壘』。可是，歐洲各國，尤其是法、意、荷、比等國現正陷於極端嚴重的經濟恐慌和革命危機之中。因此，美國必得首先從經濟上來『援助歐洲』，緩和其經濟恐慌，藉以避免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機。並同時藉這經濟計劃以影響東歐各國，乃至影響蘇聯本身。這便是馬歇爾『援歐經濟計劃』中所包含的『精髓』！

正因為如此，所以蘇聯方面最初的直覺的反應便是：『馬歇爾援助歐洲建設，表面上似覺新奇，實際上僅為杜魯曼主義之延續而已。』『杜魯曼主義係藉金元之幫助，企圖向他國施行政治壓力，亦為干涉他國之計。』（見倫敦十六日廣播『真理報』論文大意）。可是，儘管蘇聯對馬氏計劃的反應是如此，西歐各國，尤其是英法却積極在準備接受這一計劃來緩和當前可怕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且不僅西歐各國統治者有如大旱望雲霓地迎接馬歇爾的計劃，就是蘇聯控制下的東歐各國也躍躍欲試地渴望從馬歇爾的計劃中分得一杯羹以解其當前經濟上的『倒懸』（這從波蘭及羅馬尼亞當局最近表示歡迎馬氏計劃，即已明白地暴露了這一點）。在這種情形下，克里姆宮主人便不得不從最初對馬氏計劃的抵制態度轉變而採取迎受態度了。他希圖藉此自動領導東歐各國從馬氏計劃中分沾利益，否則，即從內部破壞之。——這便是蘇聯當局表示『前拒後迎』的秘密！

但美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政策是異常之堅決而頑強的。因此，馬歇爾援歐經濟計劃一定在它原定的目標之下進行。蘇聯要想從馬氏計劃中獲得援助，只有向美國屈服。否則，蘇聯的企圖是一定要失望的。要真正阻止美帝國主義的反蘇計劃（經濟援助

計劃在內）實現，只有法意比等國的工人革命運動勝利。但這一革命運動的勝利，同時也就是致命地打擊克里姆宮的主人。（鏡微）

『民主』美國的新反勞工法

『民主』美國的參眾兩院，最近曾通過了塔虎脫——哈特萊的新勞工法案。這法案規定法院可下令制止大規模的罷工，不許公務員罷工、同情罷工及靜坐罷工，嚴格限制工會活動，並禁止同業工人與資方集體談判等。這正如美國各工會領袖所斥的，是一種『奴隸法案』；是『美國法西斯發展的真正第一步』。

杜魯門總統爲了害怕牠馬上掀起工人的反抗怒潮，同時也爲了明年的競選，曾試行把牠否決了；但參眾兩院又都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重新打消了他的『否決』。資產階級這種堅決和一致的行動，當然是不足爲奇的。美國資本主義正在走向一個不可逃避的新危機，國內的工商業蕭條將與全世界的經濟恐慌先後發生。這已經由美國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及政府官員，公認爲今後幾月間的事了。所謂民主與自由的發條，原是要靠豐裕的物質條件來潤澤的。既然經濟蕭條行將到來，這種改良自然愈來愈少可能了——因爲美國資產階級不得不把工人降級到奴隸地位來挽救自己。這就是美國的獨占大王們一步步剝奪掉工人最基本民主權利的理由。在這種客觀困難面前，一切資產階級代理人——不但杜魯門，而且，即便羅斯福總統尚在繼任，也還是無力挽回頹勢的。

但美國的工人階級不願做資本主義制度普遍衰敗下的代罪羔羊，不能接受資產階級轉嫁來的經濟蕭條惡果。他們不但是世界各國工人階級中最強大

的，(號稱五千萬以上!)而且也是最有組織的(現參加勞聯和工大的已有一千三百多萬人!)當他們對改良的希望已逐漸幻滅時，他們勢必利用這種強大而有組織的力量，起來為自身利益而鬥爭——不但從事經濟鬥爭，而且從事政治鬥爭。事實上，當新的反勞工法尚在研討期間，他們已預感到一個大的打擊必然到來，因而爆發了不少的反抗，如發動簽名運動，舉行幾次二十萬人的大會和遊行，以及不斷的罷工等。現在，這法案被確定地通過之翌日，廿餘萬的煤礦工人便首先起來罷工。礦工均謂罷工目的在反抗議會通過之新勞工法。(聯合社廿五日電)而職工會也聲言全國總罷工將要發生了!由此，我們可以說：反勞工法案的通過，不但清楚證明美國的民主改良的限度已縮小到什麼程度，今後美國的前途，正如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的一樣，只能在法西斯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擇取其一；而且，這法案將開啓了美國工人階級鬥爭的新的一頁，預示美國臨近的社會主義革命又前進了一步!

因此，美國的工人們必須將經濟的改善鬥爭與政治的解放鬥爭連繫起來，並創建一個真正革命的新工人黨，以便在他的領導下走向最後的勝利!(唯康)

巴勒斯坦問題及其前途

巴勒斯坦問題，所謂猶太人與阿拉伯人的問題，已成了一個愈來愈嚴重的問題。最近聯合國的安理會正在召集了一個特別會議，組織了什麼調查委員會，企圖來解決所謂猶阿問題。可是實際上，巴勒斯坦的問題，絕不是什麼簡單的猶阿問題，而主要是列強間的分贓及由此所引起的複雜衝突問題。而在列強中，在巴勒斯坦導演主要角色的，在現在是英美蘇。而尤其是英國的作用最大。英國一向視

巴勒斯坦為它的生命線之一，所以它在巴勒斯坦也像在印度一樣，不惜玩弄一切陰謀詭計。

在印度，英國玩弄着印回衝突，在巴勒斯坦，英國也製造了阿猶糾紛。最初，當阿拉伯民族解放運動抬頭時，英國便支持少數民族的猶太資產階級的耶山運動，要求在聖地重建他們的祖國，以此不斷激成了阿猶之間的衝突和流血。但是當猶太人勢力日漸膨脹，阿拉伯反英鬥爭日漸激化，埃及正醞釀一個獨立時，英國便企圖以相反的策略達到同一的目的，即藉口保護阿拉伯人鎮壓猶太恐怖行動而調集大隊於巴勒斯坦了。

這時候，另一帝國主義工具——阿拉伯地主資本家們便出而支持這同的帝國主義政策。這就是印度「分而治之」政策的翻版，衰老的大英帝國，爲了維持對殖民地的統治是不得不運用其陰謀詭計的。它只有利用殖民地中不同種族宗教的資產階級和地主，欺騙並領導其下層工農走上互相敵視和仇殺的道路，才能保證垂危的唐寧街對超額利潤源源的榨取。

中東的石油，向成爲帝國主義爭奪的焦點。二次大戰把英法獨占這一帶的局勢改變了。法國迅速的投降於納粹，使它在東中勢力瓦解，而衰老的大英帝國，爲了對抗德國而不得不在戰時讓美國在中東敷設油管，則在戰後爲了抵抗「共產主義」，更不得不在中東乃至希臘慷慨地向美國讓步，即「準備將地中海與中東方面軍事責任，移交美國。」(聯合社倫敦五月十九日電)昨天英國幫助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是爲了繼續對阿拉伯人的奴役；今天，杜魯門「好心」支持十萬人猶太移入巴勒斯坦，也不過爲了取得巴勒斯坦這一據點後，取代英國支配整個中東(包括埃及及伊朗)，進而包圍蘇聯，進攻蘇

聯。無論如何，猶太人只不過是阿拉伯羣衆與帝國主義之間的緩衝器，在列強間，猶太人是絕不被重視的。克林姆宮爲了防備美帝國主義「不願意」與公有財產制的蘇聯和平永存，便努力在國境外圍建造萬里長城或鐵幕。在聯合國大會上，它拉攏一些與國以爲阿拉伯國家的聲援。以圖阻礙美國勢力在中東的更可怕的擴張，但這些努力，將如過去伊朗、特港等問題一樣，終會是徒然的。

阿拉伯與猶太的工農大眾的利害是相同的，他們的敵人是英美等帝國主義以及出賣他們的阿猶資產階級。但可惜，巴勒斯坦的兩個共產黨，一個是百分之百的猶太人，另一個是百分之百的阿拉伯人，也在製造「民族的裂痕」。阿拉伯民族解放同盟也只允許阿拉伯人參加，彼此宣傳敵對的政策，好像法國共產黨與德國共產黨對立、南斯拉夫共產黨與意大利共產黨對立一樣。猶太共產黨在耶山運動的旗幟下遊行，高喊「自由移民」、「擴展殖民運動」。而阿拉伯共產黨則參加反動的封建地主與資本家政黨領導的「阿拉伯民族陣線」，高喊：「打倒耶山運動」。因此，客觀上，他們是在替阿猶資產階級與英美帝國主義服務了!

只有阿猶工農大眾聯合起來，推翻一切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阿拉伯工農共和國，才是真正的出路。自然，這工作必須在英美等帝國主義國內工人的配合與援助下才能成功。只有到那時，被解體中的資本主義所排擠的猶太人，也才能在全世界任何地區得到幸福的歸宿。(江濤)

青年與婦女 第二卷 第四期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人 青年與婦女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青年與婦女社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總經售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從匈牙利政變看蘇聯對東歐政策

旭東

匈牙利於本月初發生了一個政變：內閣總理奈琪被逐職，國會議長范爾加出走，共黨領袖丁尼斯（前陸軍總司令）任內閣總理，組織一新政府，並要求其他三閣員、三部長及首都布達佩斯市長辭職。於是，以前由所謂「小地主黨」（即以富農和中農為基礎而由智識份子領導的黨）佔優勢的匈牙利政府，便於轉瞬之間一變而成為共黨所控制的政府了。

這一政變的消息傳出之後，立刻在美英間引起了強烈的反響。首先是美國立即宣佈停付對匈貸款（一千五百萬美元），隨即與英國協同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指責蘇聯干涉匈國內政，要求徹查匈變真相。而蘇聯不但反駁抗議，以美英干涉匈國內政指責調查，並同時指使兩國狄托元帥發動巴爾幹聯盟運動及保國總理狄米特洛夫逮捕反對領袖柏特洛夫來與匈變相呼應。而美國務卿馬歇爾則跟著匈變之後，又宣佈了廣泛而龐大的「援歐經濟計劃」。這一連串的針鋒相對的事實，充分證明美蘇之間的衝突是愈來愈趨於表面化和尖銳化了！

據蘇聯方面宣稱：此次匈牙利政府的改組，係在排除陰謀破壞「民主聯合政府」的叛徒。但美國却從另一方面駁斥道：匈牙利的政變，乃是違反「雅爾達協定」，破壞了「民主政制」。從表面的宣傳看來，好像雙方都是為了維持或保護匈牙利的「民主政制」；但實際上，這不過是克里姆宮主人和柏街主人在匈牙利所設的一種短兵相接的衝突而已。因為所謂匈牙利政府或在該政府中佔優勢的奈琪及其黨羽，正是柏街的代理人。關於這一點，不但由奈琪離職後即飛往美國，要求援助，還組織流亡政府，可作充分證明；而且他還坦坦地告訴了我們：「全覺察之被逐，皆因企圖與美國樹立友好關係之故。」路透社華盛頓六月廿二日電：「在蘇聯直接控制下的匈牙利，奈琪及其黨羽居然企圖與美國樹立友好關係。」無怪乎克里姆宮主人忍無可忍，不得不起而除此「心腹之患」了！

但匈牙利不是自戰後即一向在蘇聯的直接控制下嗎？何以奈琪及其黨羽竟能在這種情形下担任政府首腦，並在其中取得優勢呢？換句話來說，何以遇事把持操縱，實行官僚獨裁的史大林及其在匈牙利的徒黨（共黨），竟對

奈琪表示那樣客氣，容許他掌握大權呢？更有進者，何以以前不打擊奈琪派，直待到此刻才來開刀呢？要解答這些問題，便必須首先將蘇聯戰後對於東歐的主要政策加以檢討。

戰後的東歐，由於「鐵幕」的掩蔽，一向被人視為神秘的所在。各國共產黨或「蘇聯之友」，則極力渲染東歐是當今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樂園；而各國帝國主義者或「反蘇專家」，則把那些地帶描繪成爲蘇軍和夫黨所任意蹂躪的「地獄」；但實際上，戰後的東歐，既非「樂園」，也並不是什麼特別的「地獄」；而只是在克里姆宮官直的一種「系統的政策」下所製造出來的頗爲奇特的場所罷了。

克里姆宮的獨裁者，對於戰後東歐所施行的整個政策，乃是由於他放棄了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根據他過去在第二次大戰中被納粹進軍的「經驗」，戰後蘇聯與美國所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對立，以及蘇聯本身在戰爭中所遭到的無比毀壞等條件下所定出來的。這政策的中心點是：企圖將東歐「四國」乃至德國的一部分，「綏靖國」或「安全區」，並在這裏建立「戰時聯盟」，以備掛號未來美帝國主義對蘇聯的新進攻；同時，並在這些國家內盡量攫取工業設備、原料、物資及賠款等，以彌補蘇聯的損失。以克里姆宮被毀壞的區域（如南俄等地）。

在這「政策的路線」下，當紅軍進佔東歐各國時，紅軍領袖及官僚們便幹出了如下的事情來：

一、劫取工業機器（原料及技術人員亦包括在內）遷往蘇聯。大家知道，蘇聯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北部，曾搬運工業設備佔當地所有者百分之七十。其實，這不過是將它在東歐所施行的掠奪政策運用到了東歐罷了。單以在德國蘇軍佔領區所搬出的工業設備說，其比例便差不多與我國東北同（即百分之七十）。它從芬蘭、匈牙利、保加利亞及東國蘇軍佔領區所搬去的工業設備，雖沒有詳細的報告，但其數量是很大的。在波蘭，捷克和南斯拉夫，據說算是搬運得最少，但也佔當地全部工業機器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至於原料與其他物資的劫掠，更是其餘事了。但由於此爲工業設備的劫取，不但

削弱了被佔領國無產階級的力量，而且直接地破壞了那些國家的工業及整個經濟體系。這對於當地的民衆自然會引起強烈的反感和憤恨的。

二、勒索賠款與強制徵發。蘇聯對於東歐各國所勒索的賠款，至今尚無詳細可靠的報告，但其數量是相當鉅大的。尤其是上百萬的紅軍屯駐在這些原來既甚貧困而又遭受慘酷戰禍的國家裏，對於食糧，衣物及其他軍用物資的徵發，實是一絕難勝任的負擔。正由於不可負擔的賠款和徵發，使得這些國家內戰後殘破不堪的經濟便愈益陷於艱困和混亂了：通貨不斷膨脹（如匈牙利式就是最明顯的例子），物價繼續高昂，以及食糧奇缺，致人民生活日益陷於絕望的深淵。

三、參加股份公司。這就是說，官僚們強將這些國家內的某些製造原料（如汽油及某種礦產等）的公司，改組成爲與蘇聯合辦的股份公司。其公式是蘇聯與該國資本家或政府機關各佔百分之五十。例如羅馬尼亞的蘇羅煤油聯合股份公司，就是顯例。甚至在商業方面，也有這種「合辦的股份公司」出現。例如在匈牙利，便有不少這類的蘇匈商業合股公司。無須說，這種「合股公司」，蘇聯並不拿出資本來，只是用「賠款」或賠款的名義掛上一筆帳而已。這無疑地也是一種變相的劫掠！

誠然，蘇聯在東歐各國也曾實行了一些改良主義的辦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改革和產業國有化。

土地改革：確使東歐各國缺乏土地的一部份農民獲得了土地，獲得了生活的資源。例如：波蘭：三十六萬貧農和中農即獲得了二百四十萬赫克托（Hectares）的土地；在捷克，十七萬五千家的貧農和中農，獲得了二百三十萬赫克托。此外，如德國東部，匈牙利，羅馬尼亞及南保等國的土地改革情形也大略相同。但這種土地改革，實際上是出農民自動執行了的，這就是說，當蘇軍進佔這些國家之初，農民們即自動起來趕走地主，奪取土地。紅軍當局及官僚們不過是批准農民們的自發舉動而已。而且，土地改革案雖批准了一部份農民新奪得的土地權，但就整個東歐國家的農民經濟情況說來，農民們所最迫切需要的是低利息的信用借貸及廉價的農具和肥料等。然而這正是蘇聯無法給予的。因此，東歐的土地改革還沒有使農民們脫離真正的痛苦。相反地，在紅軍的繼續徵發，通貨繼續膨脹及工業品日趨缺乏的情形下，一般農民大眾倒愈來愈感到痛苦了！

某些產業國有化，在東歐各國，一般說是頗爲普遍的。其中尤以蘇

軍佔領的德國部份、波蘭、捷克及南斯拉夫等，國有化進行得比較徹底；差不多有百分之七十至九十的重工業都國有化了。芬蘭、羅馬尼亞及保加利亞，國有化則限於德國人的產業（所謂「敵產」）。而奧匈則尚在開始進行中。但這種「國有化」，也像土地改革一樣，最初全是工人羣衆自動起來趕走資本家，尤其與納粹有關的資本家，自行沒收工廠，組織工廠委員會以領導繼續進行生產的。蘇軍當局對此，起初採取放任態度，隨後且進而干涉。他們爲了要與當地資本家建立聯合陣線或「祖國陣線」，甚至強迫工人羣衆將已經沒收的某些工廠交還原主。所謂「國有化」，也不過是事後加以分別批准罷了。而且「國有化」的真實內容，幾乎同工黨政府在英國所幹的勾當如出一轍。就是說，國有化的產業，不但用股票或公債等方式賠償原有產權人，而且經營和管理國有化產業的多半還是原來那些人物。因此，可以說，東歐各國的產業國有化，還是限於資本主義的國有化的圈子內，與社會主義的國有化風馬牛不相及。

在政治上，東歐各國都以「民主的聯合政府」相標榜。但實際上，這些「聯合政府」全是在蘇軍的刺刀控制之下抑制了自發的工農勢力，才得以成立的。克里姆宮主人，爲了遷就美國的民主，爲了要「符合雅爾達協定」，爲了與各該國廣大的農民羣衆及一部份資產階級，乃至與一部份地主妥協，便不得不容許共黨以外的其他政黨存在，不得不推行有限的選舉制度，不得不成立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但事實上，這種「聯合政府」一般總是受共黨的操縱的。這是共黨官僚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政客們的一種混合政府，真正工人和貧農的代表們在這政府內是很少有他們的位置的。因此，這種「聯合政府」，絕少代表工農羣衆的利益，而只是代表克里姆宮官僚與各該國小資產階級上層份子（共黨就是這種上層份子的代表團之一）的特殊利益而已。

以上所叙，不過是克里姆宮的政策在戰後東歐各國所造成的一般情形。如果要仔細分析起來，東歐各國間是有些差異的。但單就這些一般的情形看，東歐各國雖完全處在蘇軍的控制下，在各該國共黨的操縱下，仍然是充滿了矛盾和爆炸性。這次匈牙利的政變，僅僅是此種充滿矛盾和爆炸性之一種顯爲顯露的表露罷了。由於匈牙利的農民（主要是富農和中農）在經濟上佔有絕大優勢，同時對於克里姆宮的政策又特別懷抱不滿，於是奈琪所領導的「小地主黨」便得了他們的支持，而在上次的選舉中獲得了多數黨的地位，踏上了政府的首席。但奈琪派按照它的本性，對於蘇聯失望之餘，當然

只有求助於美國，事實上美國也確給了它相當的援助（如三千萬美元的貸款），——在這種情形下，克里姆宮早已是不能忍耐了。尤其在杜魯曼公然提出援助希土的「反共法案」之後，克里姆宮更感到了奈琪派在匈牙利所佔地位的危險，因而迫不及待地出之以政變的手段來打擊這一派了。但實際上，「奈琪派」在東歐所有的國家內都依舊是存在的，有其根深蒂固的社會基礎的（私有經濟制度的存在）。要根本掃除東歐各國的「奈琪派」，便只有在經濟上完全社會主義化，即無賠償地沒收一切工廠、礦山、森林和土地歸國有；在政治上，讓工人和貧農羣衆自由地團結起來，建立他們自己的工農政

權。然而這正是克里姆宮的獨裁者最所害怕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東歐各國的矛盾和爆炸性，仍然將繼續保存和發展下去。美蘇間在東歐各國的暗鬥及因此而引起的公開衝突，也將仍然繼續下去！如果世界其他國家不發生勝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來干涉，則東歐各國便將成爲美蘇戰爭的導火線之一。克里姆宮希圖在東歐及其他邊界國家（如伊朗及中國等）建立「緩衝國」，建立「戰略堡壘」來防禦原子彈的襲擊，不但徒勞，且將加速戰爭的到來。要防止第三次大戰的爆發，避免原子彈對蘇聯的襲擊，只有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六月廿六日

生活指數解凍後的勞資糾紛

劉乃光

四月底五月初的物價暴漲，迫使上海工人不顧政府禁止罷工的法令，堅決走上街頭，要求「解凍」生活指數。加上當時學生運動的勃起，使政府不得不表示了讓步：這種讓步是被迫的。政府爲了維持其統治地位，便不能完全考慮到個別中小資本家的利益了。解凍本身固然並不澈底，並不能滿足工人的要求，因爲工人要求的是無條件的解凍，而不是有條件的逐級打折扣辦法；而且公佈的指數根本就遠落在實際的物價後面，（五月份指數政府公佈的是二萬三千五百倍，而上海郵政局自編的却已超過四萬倍以上，便是顯例！）不過，即使如此，這次有條件的解凍仍不失爲一種讓步，是步步損害到資本家的利益。而與緊急法令絕對保護資本家利益，凍結工人工資和罷工權不同的。但這種讓步，假如在工業發達，經濟制度健全的時候，也許還可以緩和一下勞資間的利害衝突；而在今天經濟發生危機的基礎上，牛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被外貨所排擠，以對工人的讓步便很少可能了。更何況在內戰繼續擴大的位勢下，貨物不能暢銷，原料不能源源供應，而惡性通貨膨脹又使廠方預算不能平衡和穩定。因此，指數解凍後，每一個資本家都以「無力負擔高工資」爲口實，拒絕執行政府的規定。而在工人方面，名義上雖解凍了，實際工資却沒有怎樣提高，愈來愈給高物價壓得透不過氣來。可是，工人束緊褲帶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們不能使自己和家人餓着肚皮而光替資本家生產利潤，他們總要爲最低的生活要求而起來鬥爭。這樣一來，解凍不

但絲毫不能緩和勞資鬥爭，反而使之更加尖銳化了。既然解凍本身只是一種臨時應急的辦法，今天學生運動已在表面上暫時平服下去，統治者便認爲難關已過，而資本家也清楚覺得工人鬥爭已喪失了有利的時機，不能與淺薄的學生運動混雜起來，於是向工人反攻，企圖一步步搶回已失的成果了！這就是今天上海勞資糾紛重新爆發起來的主因。

首先掀起這次勞資糾紛的，乃是資方。他們拒絕照官方規定指數發工資！而在這次糾紛中，他們又表現得那麼果決、堅定而團結，竟連很多本來決定萬至已經照公佈指數發了工資的工廠，也馬上拾起「無力負擔」的盾牌來反攻了。他們由上海工業協會，召集各工業同業公會代表，聲言「工商界絕對是沒有再結精神，今後大家應決心團結一致，步伐整齊」。這種團結精神果然表現在市商會和工業協會聯合向當局提出的要求中。他們要求：一、工人月薪恢復二十五年的標準；二、按月發薪照上月份指數計算；三、反對解凍最高額三個月規定的規定；四、制止工人罷工等五項行動。這些要求雖然是非常無理的。第一、要求底薪恢復到二十五年的標準，起碼必須工人及一切消費者能自編真實的生活指數，或使物價能恢復到當時的標準才有可能。因爲現在的物價比之當時已經漲了四、五萬倍，而指數還只是二萬三千多倍。假如不是因物價與官方指數脫了節，使工人生活過不下去，則工人也不會與資方協議中得到調整底薪了。因此與其說應減低底薪，毋寧說應如何

地提高指數，那才合乎事實哩！第二，以上月指數發薪，無異把工資大減特減，例如五月份爲二萬三千多倍，四月份只一萬二千倍，那就等於減少了一半工資；今後內戰不停，物價漲風將愈來愈快而且厲害，吃虧的當然只是靠薪資過活的人了。第三、政府把解雇三個月最低額，改爲最高額，在物價無止境地暴漲和失業者充斥的今天，本來已是很不公平的了。工人拿了這一點子解雇金離了工廠，便差不多命定要長期推受失業的苦難，很少有復工的希望了，難道資方連三個月殘喘也不讓他留一留嗎？第四、要求制止罷工怠工，那不但是效法希特勒的行徑，剝奪工人最基本的自由權利，而且實際上也是不可能的，因爲資方自己『有錢能使鬼推磨』，工人就只有赤手空拳；如果硬要把別人的手足綁緊，強迫接受那種無法接受的要求，當然不容易辦到。

固然，資方這次之鄭重地提出解雇金問題，已經顯示出大規模解雇和工廠的步驟將要實行了。在經濟破產的狀態下，工人的鬥爭照理總要被工廠的暗影所威脅，因此使工人在失業威脅中多份處於不利的地位。但無論如何，這次的工人鬥爭並非在正常的不景氣中，而是在慢性的危機中迫於生活才發生的。工人們覺得，與其讓家人和自己貧窮而死，倒不如冒失業危險來一個掙扎。假如今天容忍資方將內戰所帶來的一切災難——經濟總崩潰，完全轉嫁在自己身上，則自己將首先做了舊制度祭壇上的犧牲品。這一罪責，工人不但不應該負擔，而且也不可能負擔，因爲即使他們完全不吃飯，不拿工資，整個經濟的崩潰還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工人們應該學習全體資本家那種決心團結一致，步伐整齊的精神，依照我們在本刊上期的『如何解除經濟危機的威脅』一文中所指出的方向去奮鬥。不要光是相信資方『生產不好』、『無力負擔』的鬼話！即使屬實也必須攤開他們的賬簿，讓工會聘請專家來查核，同時其生產必須由工人加以監督，以杜防他們的舞弊和管理失當。如果某些工廠無力繼續開辦下去，工人們也不要消極地只是爲三個月解雇而鬥爭，更應積極地全力要求把他們收歸國有，同時由工人自己組織工務委員會來監督和管理。這些對策絕不是紙上談兵，而是日本、意大利各國所早已屢次實行過的。

但從這次鬥爭的初步結果看來，資方雖然由於自身的階級團結和政府的援助，已將不澈底的解決也逐漸打了很多折扣了。很多工廠的工人已被迫接受社會局和勞資評斷會的『調解』，只得到六六折、七五折、按上月指數發

工資……這些不利條件。事實上，政府當局今天在口頭上尚彷彿在維護工人利益，但隨着資方的堅強和工人的無力，牠將逐漸承認資方的要求。假如不然的話，牠就應堅決執行自己所公佈的法令，最少也應容許工人用自己力量（如罷工怠工）來促牠付之實行。至於所謂『評斷會』也只是保持一種虛偽的中立的，比如牠通過了『工資評議辦法』十五條，却『嚴守秘密』，據說『秘不洩露的理由』，係防範各業資方乘隙取巧。『這理由』當然只能騙騙小孩子。因爲資方既然已參加過這會議，而本階級又『決心團結一致，步伐整齊』，則怎能保守秘密呢？折穿來說，這只是因爲十五條辦法對工人不利，恐怕公佈出來太刺激人心，引起工人的抗議，如此而已。因此，工人們應該從這裏得出一些寶貴的教訓，了解在學運威脅迫促政府向工人讓步時，不應存有幻想，以致人們利用這一點來分散隊伍，實行各個擊破。當時吳蘊初等赴南京請求工資解凍，現在事實證明這只是一種緩兵之計。等到學運平息，同一的吳蘊初們就對解凍加以最堅決的反對了。不幸當時以左派自居的報紙（如文匯報），不但沒有預先警惕工人不要受騙，反而將牠加以美化，看成勞資合作的範例，在字裏行間極盡捧場的能事。由此證明工人們必須呼喚一切階級合作的謊言，才能前進一步！既然工人鬥爭生自社會的慢性危機中，則無論怎樣不利也是要爆發的。不久將來，在新的政治危機之下，其他羣衆（如學生及農民等）運動勢必爆發出來。那時工人的運動與之相配合，獲得新勝利的機會就會更大。現在問題只是在於工人們在鬥爭中能否吸收教訓，自己組織起來，健全工會組織，擴大和鞏固運動的基礎。只有工人們覺醒過來，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過問政治，干涉政治，將自己的日常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連繫起來，把國家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問題加以全般的解決——，只有這樣，工人們，以至民衆們，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才能根本消除失業和物價高漲等痛苦！

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四日

本社優待長期訂戶啟事

本社爲優待本刊讀者起見，特訂定長期訂閱辦法如下：

- (一) 請先惠訂費法幣一萬元，開立訂戶。
- (二) 依定價八折優待，逐期扣除之，平寄郵費在內，航空或掛號另加。
- (三) 倘發行發生障礙時，餘款照數退回。
- (四) 欲補購已出各期者，請速通知，如無存底，恕不寄奉，補購者暫按八折優待。
- (五) 匯款函件請寄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本社。

學生運動的總結與教訓

凌訶明

毫無疑問的，這次普遍全國的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是中國近幾年來所罕見的。而此種運動之發生，又絕非偶然，只不過是當前極度緊張的中國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的必然產物。然而這些來得萬分急迫的危機，又深深植根於戰後中國在國際上的矛盾（美蘇之間）地位，以及國內的專橫，貪污和腐敗的官僚機構之中。尤其像現時如火如荼的國內戰，更加速地使這種危機一直走向懸崖絕壁；一句話，戰後各種社會條件已為中國開啓了一個長期革命震動的局面。學生運動只是整個『震動局面』的一部分而已。

此次學生運動，是緊緊地跟隨着黃金風潮，台灣事變，『五卅』上海工人遊行請願等等之後而來的。反過來說，這次學生運動的爆發，也將為往後更多和更大的事變作了預言，奏了序曲。正因為如此，這個運動一開始便連根地觸痛了那個腐朽入骨的舊政制，使得統治者立刻顯得張皇失措。也正因為如此，統治者便不顧一切地予這一運動以惡毒的污蔑和嚴重的打擊，迫使其不得不暫時屈服於他們的刺刀之前。但歷史的發展，自有其一定的規律；跟着一個更深刻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之不可避免的新的爆發，學生運動將會很快地恢復其活力，並可能與各種進步的羣衆運動，尤其與城市的工人運動配合起來，形成巨大無匹的狂潮，衝出一條光明出路來！

但這次的學生運動，在當前有利的客觀環境之下，同時又反映了廣大羣衆的要求，何以結果終於遭到挫折（雖然是暫時的），不能不在統治者的無情打擊與威脅之下停止下來呢？這是有其客觀和主觀的原因的。我們對此，不能不慎重地加以檢討，以便從中獲得寶貴的教訓，作為今後的借鏡。

首先，讓我們面對着事實，從客觀的原因方面加以分析吧。當五月開始，上海的工人走上街頭，以行動來要求生活指數解凍時，當權者迫不得已便趕速讓步，使工人暫時地安靜了下來。因此，當學生運動爆發時，工人運動既已因生活指數的解凍而平靜，所以學生運動便在這客觀的條件之下，陷於孤立的狀態了。正因此，當權者才敢這樣肆無忌憚地破壞自己剛纔頒佈的『憲法』和『再應許的』諾言，才敢給學生以最無情的壓迫：逮捕、綁

架、毆打、甚至槍殺，無所不用其極！

歷史曾不止一次地證明：學生運動如果不與工人運動取得聯繫和配合，是不能單獨發展，單獨解決問題的，結果往往歸於夭折。『五卅』因學生與工人攜手作戰，才能直接地導入了『九二五』——二十七年的大革命洪流。『九一八』以後的學生運動，因爲沒有工人運動的配合，每每都得不到預期的結果。因此，我們希望，覺悟前進的學生青年，應該特別重視這些歷史事實，從這些事實中，學習基本的經驗，獲得寶貴的教訓，并緊緊地把握住這些經驗和教訓，作為今後學生運動走上勝利的指標。

其次，這次學生運動之遭受挫折，除了上叙的客觀因素之外，還有主觀力量方面的原因，也是不可忽視的。關於主觀方面的一些弱點，首先便是缺乏一個正確的政治領導。在這次運動中，無可否認的，中共曾起了某種作用，可是它不但沒有運用正確的策略領導這一運動，使之與城市的各種民衆運動，尤其是工人運動聯繫起來，形成一股洪流；而且恰恰相反，它企圖將這一自發的運動與它自己的軍事投機聯繫在一起，以前者隸屬於後者。如決定全國總罷課的日子爲『六二二』（『六二二』原爲中共『反內戰』的紀念日）便是很明顯的例證。這個日子既被限制於其自派的狹隘範圍內，其結果不但不能號召廣大的羣衆，反而給統治者以便利的藉口，得以污蔑這次學運是出於中共的策動，而加以公然的鎮壓了（定『六二二』爲總罷課日，這可以說是個最愚蠢最笨拙的政策，而決定這一天子，自然又是『經過各校的同學民主討論的』）。假如當時將這次普遍全國的學運與『五卅』那個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民族民主的紀念日聯繫起來，決定這日爲總罷課，并以之與其他的城市羣衆的要求相配合，即令統治者要施行壓迫，但至少其情形，其結果都是多少不同的。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任何進步的運動，如果沒有正確的政治領導，是最容易被統治者打擊下去的。

復次，在這次學生運動發展的過程中，學生本身也表現了某些弱點。例如某些學校的領導分子，尤其是參加某黨派，或受其影響的分子，往往表現

宇宙在翻騰

沙 崙

你怎知道——
天永不變色，
地永不翻身，
滔滔的波濤，
捲不起海底的沉沙？
你怎知道——
荒蕪的叢林，
闢不出康莊的大道，
光明會永遠
停在黑暗的背後？

看哪！
天邊已露出一線光芒，
正在遠遠地，
遠遠地，
朝着烏雲衝撞。

看哪！
火山開始爆裂，
噴射出星星的火點，
這是幽靈的熾火，
抑是解放的信號？

看哪！
颶風張開巨翼，
撲向古老的山林，
將大樹連根拔起；
海浪開始澎湃，
掃蕩那岸邊的雜草污垢，
捲翻了幾世紀的沉沙，
聚攏了無數的伙伴！

那時——
烏雲早已潰散，
太陽的雄姿已可描摹；
展開在我們前面的，
是一條比銀河更晶亮的天道。

那時——
古老的叢林，
被壓進地壳，
地上不再有火焰迸發。

那時——
塵土上伸長了嫩芽，
原野點滿了春花；
大海沉靜如昔，
岸邊閃爍着金沙；
舊日的森林，
傳出了青春的呼喚；
不，
這已不是枯槁的樹林，
這是寬坦的大道；
年青的孩子們，
載歌且舞，
向着無窮的未來奔跑！

出把持操縱的現象：如上海學聯會代表的產生，便不是由於各校學生會的選舉，只是由少數人暗中指派；某些重要事件的決定，也往往不經過應有的討論過程；甚至像『六二』總罷課那樣重要的決定，也事先並不徵求各地重要大學的同意，只由北平幾個大學決定即發出通告；而在某些學校的集會上，當同學中發表與自治會負責人的意見不同的主張時，也往往遭到打擊，甚至加上不名譽的頭銜等等。這些現象，都是違反民主精神的。正由於這些違反民主精神的事實，致使大多數的學生羣衆不能完全自動的積極起來發揮其創意精神，在『民主集中制』的團結下發揮其偉大的集體力量。學生要爭取民主，要改革社會，首先就必須在自己的組織內實行民主，養成民主的習慣，才能堅固地團結其力量，才能發動每一個人成爲自動的堅強的戰士。

但這次學生運動，雖然因爲沒有工人運動及其他羣衆運動的配合，缺少正確的政治領導，並表現了某些弱點，而暫告結束了。可是我們却絕不能否認它在反抗當前的腐惡政治制度上所起的意義以及它在今後中國羣衆運動中所種下的影響，是異常之重大的。從這次運動中，不但表現學生們反映了人民大衆的要求，向當局勇敢地抗議，並在抗議中發揮了英勇奮鬥的精神，啓發了他們各方面的天才與能力，獲得了鬥爭的豐富經驗與教訓，提高了他們的政治覺悟，更進一步地認識了統治者的面目；而且還普遍地激起了全國民

衆對腐惡政治的憤懣，獲得了民衆的同情，并以此提高了人民政治的覺醒；——這一切都足以證明這次的學生運動決不是毫無痕跡地過去的。

現在學潮雖在高壓之下而平息了，但在不久將來，牠必然會隨着社會、政治、及經濟危機的加深而重新抬頭，與各種羣衆運動重新結合起來。爲了迎接這個明天，我們希望全國的青年學生們，尤其是積極參加過這次學運的同學們，絕不要因這次的挫折而消沈、頹喪，而要認真地來檢討這次學運，來進行自我批評，來從這次英勇的鬥爭過程中檢討其優點與弱點，獲得真實的教訓，這對於未來的運動是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

此外，而且也是異常重要的，我們的學生們必須理解：學生青年一代人的命運是與全國廣大的被剝削被壓迫民衆的命運緊相聯繫的；而中國廣大民衆的命運，又是與整個世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者的命運不可分割的。因此，我們的學生青年一代人，必須把眼光注射到全國和全世界的民衆方面去，必須從歷史發展的科學觀點來理解我國及全世界民衆在戰後所遭到的無比痛苦和威脅，必須替自己和全人類找出一條新的解放的道路來。記取過去鬥爭的教訓，進一步地研究前進的社會科學，以及一切鬥爭的基本理論與策略，把自己的頭腦加緊武裝起來，準備迎接行將到來的光榮而偉大的解放運動！

華萊士與製造戰爭者

威廉·F·華特
沈念譯

一個人的個性，雖沒有經過大的考驗，但往往在許多小的行為中會表現出來。同樣的，一個國家政策的真實性質，即在其含意沒有全部公開之前，也會在顯著的偶然事變中揭露了的。這次，由於華萊士斥責杜魯曼——馬歇爾對希士的提案，在資產階級報紙及華盛頓的垣街代表們之間掀起了狂熱的爭論。一大批對於前商務部長的謾罵與攻擊，其實，正好暴露了垣街政治家們的最壞的陰謀，即企圖以武力征服世界及驅使人類到最恐怖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去的不安的心理。

最初，政府企圖不理華萊士的批評，資產階級的報紙也不登他的演辭。但杜魯曼總統却採取調和的態度，向前副總統說，他決沒有意思排斥華萊士於民主黨之外，並且預告着，華萊士及其思想同志——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裴柏，必會支持一九四八年的民主黨競選。

但，自華萊士出國之後，這種靜默的溫和的態度便中斷了。不久之後，華府與垣街都一致起來對他大肆攻擊。眾院反美行動委員會的提議，依據一七九九年的洛根法，華萊士必須以「串通外國政府，陰謀擊敗本國政府」的罪案起訴。（這洛根法的制定，恰正是聯邦資產階級處在上一世紀的反動時期，想藉以把一切對於與法國進行有計劃戰爭的任何反抗呼聲，加以扼殺的。）另外，也有人主張，撤銷華萊士的出國護照，要求國會對他制裁。

兩黨參議員們輪流着責罵華萊士。共和黨參議員范登堡指他為「巡迴煽動家」並斥他對歐美人民的呼籲為「危言聳聽」。阿堪薩斯的民主黨參議員福爾勃雷特說：「他的演辭好像是克里如宮所寫好的」。華府人士在擁擠着脅迫杜魯曼去公開指譴華萊士。杜魯曼的最高檢察官克拉克，即刻在費城起來響應道：「凡告訴歐洲人民說美國是凶暴的帝國主義，要走向與蘇聯戰爭的人都是說謊的人。」當這反蘇十字軍的首叛者——邱吉爾利用機會稱華萊士為「潛在的共產黨」之友時，這好戰的合唱便完成了。

怎樣來說明這事實呢？即垣街主人為什麼那樣狂暴地以猛烈的歇斯底里行動來誣毀華萊士而不與之作理論上的爭辯呢？他們公然地捏造事實來誣陷

華萊士為外國的代言人，究有什麼意義呢？帝國主義發言人的這種復讎心理原來是植根於他們的害怕，即害怕華萊士的攻擊立刻會暴露了他們真正惡毒的政策。政府企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提出法案，當國內人民沒有完全了解這法案的內容之前，當反對派沒有形成之前，便催促國會通過了它。杜魯曼藉口英國有計劃的撤退將會在希臘造成危機，因而堅持國會務須在三月卅一日之前開始行動。整副的宣傳機關都動員起來製造這虛偽的恐慌氣氛。

羣衆在生長中的反抗

但是，愈當杜魯曼主義的惡毒意義與帝國主義世界性侵略行為變得更明顯的時候，廣大的反對派便開始抬頭了。羣衆，在杜魯曼政策上所感受的大不安，都在報紙及一切無線電廣播中流露了出來。這羣衆，絕不顧政府的宣傳是如何地深且廣，都在指明，只有經過聯合國機構所決定下來的行動，才是大多數人民所維護的。

只有羣衆的抗議，方延遲了並超越了杜魯曼所指定的通過議案的日期。像透頂的反動派——紐澤西州的共和黨參議員霍克斯，也向范登堡抗議道：「美國人民絕不願有時間來考慮這個問題。倘有任一參議員不相信我所說的話，讓他周遊全國一次，便會聽到我會聽到的話了。」

隨着反對華萊士的呼聲的提高，華府羣衆反政府的壓力，也便增強了。四月十四日紐約時報警告杜魯曼幸勿懲罰華萊士，因為這種強使華萊士緘默的主要後果，將會使許多最關懷的外國人感覺到，美國政府是有相當理由害怕華萊士的批評了。自然，華府是較少害怕國外的反抗，較多害怕國內的批評。牠，害怕着華萊士的警告，必然會激起了美國人民對軍國主義運動的反抗，並且會使華萊士自己變成了國內廣泛反戰情緒的轉捩點。

高據在支配地位的華府權貴們，是絕沒有讓步舉動的。他們決定掃除他們的帝國主義侵略道路上的任何障礙物。如果華萊士不採取與垣街協調的步伐，他們便毀謗這中肯的批評者為國家的叛徒；誰躊躇而不百分之百的同意他們的戰爭計劃，他們便詆之為「赤色」或「共產黨的工具」了。

其實，華萊士的一切質詢，只是最起碼的民主。這些，杜魯曼會據以控告蘇聯的獨裁主義。但杜魯曼式的民主，好像是專爲了輸出目的用的；在國內是不准有任何的殘留。華萊士及其同志們，現正首先嘗試到統治者甚至對他們的忠誠抗告也準備着的權威脅迫。

在走向戰爭的行程中，美國的財閥們正努力製造一種空氣，俾使資產階級統治者的官方政策支配一切，而所謂「危險」的思想得以排除。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幾年，在美帝國主義統治層內干涉主義者與孤立主義者之間，還可以發現熱烈的爭論。但今天，即使在杜魯曼與華萊士之間，對於應否利用「聯合國」作爲帝國主義政策的幌子等的策略上的分歧，也不能忍受了。政府的意見必須絕對統一一致，應像在希特勒、天皇與墨索里尼治下的一般。美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感覺到不能再在人民的眼中，允許那種「意義不同」的奢侈品之存在了。這點，正反映出垣街主人在專橫的軍事帝國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多麼遠了。

最壞的事是：箝制了華萊士的言論。這個人，我們十分清楚，一直到最近不久之前也還是政府內部重要的人物。「反華萊士」這件事，明顯地指出民主黨擺向最反動的營壘已到什麼程度。華萊士之被排斥於杜魯曼內閣之外，是在巴黎外長會議時他不滿國務卿貝爾納斯第一次表現的對蘇強硬政策。現時，僅在幾個月之後，跟着杜魯曼——馬歇爾主義的展開，他們之對付華萊士好像在美蘇戰爭已臨近爆發的時候。因而，他也變成了美國大企業家精神裁判下的犧牲品。他之遭受犧牲正好是流行於全國及勞工運動中的「反共」行動的尖銳表現了。這因共黨而展開的清除異己運動已經擴展到包括一切意見相左的人，而不管他如何聰明和忠誠於資產階級的基本利益。這種復仇性的對華萊士的排擠，說明了這個事實：美國統治階級已決意要祛除任何障礙征服世界計畫實行的人。他們折辱了華萊士，便是給一切其他反對派的一個警告，使他們在感受到垣街鞭子的刺痛前，立即屈服下來。

他們真正害怕什麼

帝國主義者假裝着，並不因爲華萊士在國外批評政府這件事而憤怒。邱吉爾，被英國工人剝奪了政治生命以後來到美國，他首先掀起了反蘇十字軍的旗幟。杜魯曼總統，一年前在密蘇里州的富爾敦城，以無言的默認來支持他，這些，當時在那兒被僱傭的報紙上是沒有任何喧鬧的。這純是他們所擁護的政策與他們所服務的利益的決定。一方面對邱吉爾的親善，他方

面對華萊士的仇恨的態度。邱吉爾——這位死硬派的帝國主義劊子手，正立在一「反共」的戰爭道路上。華萊士是應該被責罵與排斥的，因爲他胆敢詰問華府投向一個新的瘋狂的世界大屠殺。

華萊士究竟說了些什麼呢？會這般地激怒了獨佔集團與軍國主義者。其實，他一切的批評都是十分溫和的。

他說異着爲什麼這個會承認不能參與使西班牙從佛郎哥解放出來的同一政府，現在却那樣關懷地代希士的獨裁者而行動？他要問：假如杜魯曼的提案，真是爲了救助饑荒而不是武裝專制主義者，爲什麼一定要撤消「聯總」呢？他指出杜魯曼的帝國主義路線是如何地鼓勵了法西斯分子，如何地加強了國內的反動勢力。他呼籲，必須立刻停止這種捏造的恐慌空氣，在這種虛擬的空氣中，事實會被歪曲，時間會被否定，而歇斯底里的症狀却蔓延一時了。他指出，杜魯曼主義只能將這個世界割裂爲兩個敵對勢力的集團，只能將美蘇導向世界戰爭而已。

這幾點被指出的都是十分真實的事，因而在懼怕原子彈戰爭與不信任杜魯曼的提案動機的美國人民間，得到很大的反響。華萊士主張美國政府必須通過「聯合國」，而不應在它的機構之外，進行其目的。他的意見，在衆院裴柏、泰勒與勃拉特尼克共同決議案中，得到解釋。這個決議案拒絕對土貸款，並且轉發援希問題爲經由「聯合國」以建立兩億五千萬美元的善後救濟金。

諸如此類的行動，頗能得到全國人民的欣然贊同。因爲他們仍舊保有幻想，認爲「聯合國」機構確能保障和平，而不明白這個組織原來是與政府「自身並沒有不同的一種壓榨工具。華萊士與裴柏等願美國的外交政策，應通過「聯合國」而實現出來，並將它視作「強國結的保證。他們要求永恆地存續像戰時一樣的與克里姆林宮保持合作與妥協的戰線，避免對蘇直接衝突。他們認爲只有這樣，才能維護美國產業的真實利益。

但，他們的政策是過時了，它不再適合於美國統治階級的需要與嚮望。現時，德國與日本已經崩潰了，歐洲工人的革命威脅暫時得到緩和了，蘇聯處在防守的地位，垣街主人們正想利用機會將征服世界的計畫推向第二個階段。撫慰史大林的時期已讓位於加緊包圍並無情地進攻蘇聯的時期了。

垣街的新動向

今天，美國的產業大王，並不像德黑蘭時代一樣在關心如何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是怎樣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了。這話就等於說：它必須採取必

要前策略剝奪克里姆及其傀儡政權的各種影響，以達到破壞蘇聯國內的國有財產，貿易壟斷及計劃經濟的目標。

爲了這些目標，華盛頓必須與臣服那些，在史大林主義支配之下，或直接或在羣衆壓力之下解放出來的歐洲和亞洲資本主義國家。這就是戴高樂將軍及時配合着杜魯曼主義的宣佈作東山再起的唯一理由了。這也就足以說明華府支持佛朗哥，薩拉柴，裴隆以及助長士希獨裁政府與蔣政權的血腥統治之根本原由了。

美國政府決不願因有「聯合國」的妨阻而限制了它活動的自由。華府在它可能公佈的同時，還有着更廣大的軍事干涉計劃。包含在杜魯曼——馬歇爾主義的征服世界的程序已分條地分配在美國人民之間。

美帝國主義，現時爲了那個同一的原因，即必須放棄國內的偽自由主義，同時取消了它在世界政治中曾經採用過的和平主義的假面具。因被不可抗的世界統治的野心所驅使，華盛頓必須仗賴於反革命的力量，鎮壓所有的反對派，以殘暴的武力制阻一切。這就是參議員們要重覆羅曼、凱多的精神「摧毀共產主義」，也就是華萊士所以變成他們眼中之釘的重大理由了。

素以那被拋棄了的「新政民主黨」的顯要代表自居的華萊士，仍幻想着自己是進步派的先鋒隊。但從資產階級政策的製造者的觀點看來，他已無疑地變成了時代的落伍者。躑躅在歷史行程的後面。那些掌握了國家政權的無恥強盜們，已不再起用新規約時代的改良主義者及其夢想家。爲了完成其掠奪計劃，他們急需的是殘暴不仁的人與工具——那些懂得如何推進劫掠與征服海外的計劃的軍國主義者，以及那些在國內展開反民主與反勞工的運動的，大托拉斯的獨佔家。

但他的擁護者們抗議道，華萊士才是羅斯福衣鉢的真實繼承者；杜魯曼是一個大騙子，只不過在偶然事變中做成了總統，其實他已完全背棄了羅斯福的傳統了。這便是史大林主義者們最出色的理論，他們攀了華萊士的衣襟喊救命，而且吵鬧着要回到羅斯福時代的「強團結」的政策去。

然而無論如何，華萊士確能以羅斯福的一部份繼承者自居的。我們必須記住，羅斯福不僅能與莫斯科合作，而且在一九三九——四〇年蘇芬戰爭的時候，他也隨時準備好與蘇聯斷絕一切關係而支持芬蘭作戰。在上述的期間羅斯福之對付克里姆林宮，（像歷史所指明的）完全是符合於其外交政策的目的。在這意義上，當然今天不是華萊士而是杜魯曼在實踐着（才能接受了）羅斯福的傳統。

自由主義者，工會官僚與史大林主義者的全副智慧包括在決定那一種資產階級的代表，是他們及工人們所應跟隨的。就在這個問題上，他們現在開始分裂了。一部份在美國內外和受着民主黨影響而組織起來的民主運動者已經傾向於支持杜魯曼另一環環繞在美國進步公民會四周和爲史大林派所支持的份子，却把希望寄託在華萊士與裴柏的身上。

但不管他們間的不同，這兩個陣營的任何一方都贊同美國工人不應有其他的選擇，只應在這一羣或那一羣的資產階級政客之間選取他們的信任者。

危險的政治煽動家

現在讓我們來瞧吧，在反戰的鬥爭上，參議員裴柏有幾分可以值得信賴呢？他與杜魯曼的目的之間並沒有基本的不同，不同的只是他更願意通過「聯合國機構」來實踐那目的而已。他曾在一次自我辯護的演說中稱道：「沒有人在今天的境地會再比佛羅里達州來的參議員表示得更清楚了。在兩次公開演講中，他都提到，如果蘇聯採用武力實施侵略的時候，他必投票而且盡他的可能來反對蘇聯。」

但在人民的壓力與必須忠誠於財閥的兩大矛盾之間，裴柏開始動搖了。最初，他說明他願投票贊成杜魯曼的提案，之後他又投票反對了。華萊士曾經奉承他爲「第三黨」的自由領袖，但裴柏自己立刻拒絕了這個建議。他答道：「我決沒有意思脫離了民主黨，我們民主黨人，有時候可能彼此在某些枝節上有不同的看法，但我們絕不可離開自己的老家」。這樣看來，杜魯曼與裴柏之間的不同，同一家人的爭吵，是够容易和解的。

亨利·華萊士也許更堅決些吧？四月十八日在斯托羅姆招待記者的時候，他替自己描寫着「我不是共產黨員，不是社會主義者，我僅是一個美國資本家——像我在倫敦對國會中演說般的——我是一個進步的保守派，深信着只有對蘇聯解與取得和平才是絕頂重要的事。」

這必須還要指出：華萊士會虛誠地替美國大產業界服務很多年了。他當過農業部長，副總統及商務部長。他依舊是一個忠實的資本主義及軍事機構的支持者，與任何民主黨員沒有區別。但跟着時間的演變，寡頭財閥們已經在應付蘇聯問題上，與美帝國主義的重要領袖們發生衝突了。但這些衝突是策略上的與臨時的。當國際局勢變得更緊迫時，華萊士必然會轉到街戰爭削子手那邊去，與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過程中所表現的一樣。他的真實角色是危險的煽動家，他的主要目的是搖晃着，一條所謂「其他」的路線，在緩和與欺騙民衆，同時戰爭的程序却殘忍的進行着。

在反美帝國主義與反戰的鬥爭中，沒有一個資產階級的政客是可以信賴的。在危急之際，他們必不可避免地叛賣人民的利益，叛棄了反戰的力量，而轉到戰爭的陣營去的。裴柏的動搖已是說明這些：利用羣衆的忠實反戰情緒的危險的煽動家是不能有任何期望的。

反戰的鬥爭是不能與這種不可調和的鬥爭分離的，即掃除華府一切孕育戰爭與從戰爭裏漁利的帝國主義的勢力。像華萊士、裴柏這些絕對信賴資本主義及其代理人的人，只能將反戰的鬥爭引入死巷。只有那些，以革命的社會主義行動與大產業統治階級戰鬥到底的人，才能提供美國工人以反街戰計劃的領導。

廣州
通訊

白雲山下日無光

樵子

人們對於歷史事件，慣常都以為全是由少數野心家所製造出來的。這正如他們以為拿一把掃帚便可以阻擋海潮的前進，一樣愚蠢。今天呼嘯在亞細亞廣闊的原野上的風暴，人們便是用這種態度來解釋和處理的。

『五卅』事件，在中國近代底血腥的史冊中，無論如何已佔了極鮮明的地位。現在，讓我們們拿小說家的寫實主義，來描摹這一歷史事件吧！

血的五月剛開始，一連串的血浪便衝擊着每一個中國人的心房。電子迅捷地從以太飛過，憤怒之火也烘烘的燃燒在學生底心中。『五卅』，在羣山環抱的石牌，這個清靜美的所在，國立中山大學底學生召開了一個學生大會，爲了反對內戰，爲了支持南京、北平、上海等地的同學，決議由『五卅』起罷課三天，而且成立一個四十五人的工作委員會。大會中，一些同學起來發言，企圖阻止罷課，但他們剛開始說了兩三句，同學便報以『噓！狗！打狗！』的呼聲，他們祇有頹然坐下。

愕然相顧；突然，一個將有四十歲的『老同學』起來發言了：『不錯，我們要反對內戰！但我們應當知道，內戰不是單方面的，而是雙方面的……』

『噓！狗！』『學生證？』『趕他出去！』在這樣的呼聲下，這一個老而不倦的，沒有身籍的『老同學』，狼狽抱頭鼠竄了！

當罷課的消息由十餘個分別報道出來時，佔大多數的中立份子，心花怒放了他（她）們多不瞭解罷課的意義，而且覺得這是很輕微的事情。

一個絕好的假日哩！

工作委員會緊張地工作着。『五卅』，一個大會又召開了，決定明天舉行反內戰反飢餓示威大遊行。

早晨，天氣很暢爽，羣山是翠綠的；潤濕的南風剪動着樹木，濃厚的雲層在天上流動，陽光不規則地投射在地面上；白雲山靜，給一個白色的雲環套着了，僅僅露出了小小的頂端。這就是『五卅』的早晨，南國的夏日。

校車果然沒有了，這早在意料中。但工委會預先定好的十部車，總不見開進來。同學們步行出廣州雖然不成問題，但這麼多的宣傳品怎樣辦？於是，工學院的同學，馬上將車房那一部壞車修理好，裝載着宣傳品。但不久，那些車也到來了，據說在半路上給三某些人攔阻着，不准進來，故此延誤了時刻。集合到平山堂時，已將有十時了。

行列開始進行了，由一些魁壯的同學散兵式的推進，作爲行列的前導；巨大的布條橫額『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反內戰反飢餓示威大遊行』給南風吹得緊緊的；裝載着宣傳品的那一部『古稀年』汽車在四馬路不平的馬路上，英雄地前進着，呼呼地呼叫着；女同學在前，男同學在後，三人一列，有些手裏拿着旗幟，有些在散發傳單，他們高呼着口號：『反對內戰！』『反對征兵和納稅！』『多壯大的行列！』

『反對內戰！』『反對征兵和納稅！』『多壯大的行列！』這連個行列經過每一個路口時，都『古稀年』用高速度朝行列衝來，但同學們視若無睹，『古稀年』得在距離同學半尺的地方停止了。沿路，很多欲往

省運會的同學，在中大同學的號召下，都參加了行列。宣傳組的同學，沿路在牆上，在汽車上，書寫着標語，塗畫着漫畫；救護隊的同學，則密切地注視着每一個同學的面容。

行列由惠愛東路經漢民路轉入泰寧路、德路，再左轉靖海路，面向着維時珠江畔的永安堂大廈前進。但是，那裏早已有用餘個大漢拿着竹棍、鐵枝、刀、鐵鈎等在路旁徘徊着，當行列剛到來，他們便突然衝出，給同學們以迎頭痛擊。這突然的襲擊，使隊伍紛亂了，同學已給打傷了很多個，尤其是女同學，他們哀號着，慘叫着。在大隊的男同學趕上前來，赤手空拳，揮擊這些一類似苦力的大漢時，苦力退却了。於是行列再向前進，曾經戰鬥過的男同學，拿着竹棍、掃帚、條凳，作爲隊伍的護衛；當行列到達長堤時，無數架貨車追趕到來，無限數的苦力從車上跳下，對同學再施行襲擊。於是，苦力和學生的鬥戰，『五卅』事件便這樣發生了。

『古稀年』汽車早已給打得亂拆骨；女同學多避入了商店裏，歐打時，有人在放槍；一個穿黃軍服，腰際掛着手槍的人，兩手架在腰間，在馬路上梭巡，那裏打作一團，他從行近那裏，好似一個沒有了辦法的維持秩序者，又好似一個指揮者。

宣傳組的一個同學，眼裏看一個女同學給按在地上毆打，於是他拿着墨油罐，對準那些苦力揮去，而且和他們作着鬥，很多苦力成了裸體的菲沙苦力。但這一個人以後便失蹤了。有一個女同學，她本來已經進入了商店裏，但她看見一個男同學拿竹棍打得苦力也破裂了，這出白竹的錘擊來，她失聲地怒吼，『拿竹棍出來！』

她失聲地怒吼，『拿竹棍出來！』就這，她又失蹤了。平時她是一個流淚而勤學的學生，

就這，她又失蹤了。平時她是一個流淚而勤學的學生，

就這，她又失蹤了。平時她是一個流淚而勤學的學生，

但在這樣的一個鬥爭裏，她並表現出如何英勇呵！

毆打了將有一小時，商店的玻璃多給打碎了，學生受傷的有卅餘人，而十八個是重傷的，其中有很多個重傷的。同學們生擒了一個苦力加以審問，原來他們真的是一些起卸苦力，但他們並不是自動來毆打學生的，而是××處的陳××給他們每人五萬元，叫他們『打一打』的，死傷則由姓陳的負責。

毆打過後，同學們又整齊了隊伍，頑強地前進，但已少了一半同學，到六二三路的時候，便折回平山堂來開大會。會議剛結束，同學們報有大隊兵到來捕人，於是便宣佈疏散了。同學們在回校途中，高唱着歌曲，高呼着口號，祇要十餘個民衆企立道旁，同學們便走近他們，向他們宣傳，解釋反對內戰，反對徵兵和納稅的必要。這些同學的鬥爭意志是最堅強的，情緒是最高漲的。他們多是些苦學生，飽受了戰爭摧殘的青年，他們底心靈是異常純潔而清高，他們絕不是任何黨派的成員，他們祇知道自己是中國人，中國這一個殘破而紛亂的國家，需要他們出來干涉了！

在毆打當中，給政府捕去了五十多個同學，這是在前星期釋放的那個同學所說的，失蹤的直至現在還沒有詳細的統計。其他院校的同学，則更難計算。例如文化學院的十餘位女同學，在早晨往平山堂集合的路上，便給拉去了。

六月四日早晨四點鐘，石牌又給大隊的軍警包圍着了。他們到每一個宿舍，檢查每一個同學的學生證，按着名單加以逮捕。這次逮捕，多少人，到今天仍然不知道。當他們把法學院的一個姓梅的教授夫妻倆從屋上拉出來時，用繩把他夫妻倆全身緊綁着，其他教授知道了，帶着妻子兒女，哭喊着要把他倆釋放；同學們則更悲憤異常，他們把帶軍警去逮捕教授的那個同學，打得狠厲害。

事後，同學們又開了次大會，當主席報告兩個同學死亡時（後來才知道沒有死），全體同學都異常哀戚。在這樣沉悶氣氛的驅壓之下，工作委員會已變得軟弱無能和害怕了。不但不清楚現在應

當是退守還是進攻，而且完全慌亂了！雖然在這次大會中，有一個同學起來發言，認爲無論退守或進攻，都需要取得工人的援助，才有辦法。這一個提議，雖然一致認爲正確而通過了，但並沒有人去執行，領導的工作委員會，已放棄了切實責任。如果說這次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那麼他們領導的並不高明而且敷衍，正確的說是一種報銷主義。

同在這一天，目的早晨，南中國唯一較爲自由作風的日報『每日論壇報』，也給封閉了，並且逮捕了社運黨導，編輯彭芳草，和太公教的駐粵記者陳月等多人；同時，從卅一日起的大戒嚴，抽查戶口，更逮捕了不少人，恐怖空氣，瀰漫了全城。

爲了渡過六二二，全市中上學校於卅一日下午便宣佈放假，有些放假，星期，有些三天。但中山大學，則一直沒有上過課，五份四的同學已離開了學校，學校當局雖然準備於十六日考試，但學生和教授都預料難於舉行。

人們認爲這一事件是學生和『工人』的鬥戰，而且連連的還是『工人』方面。於是，工會的上層便喧嘩嚷嚷的，要求這又要那！正如廣東一句俗話『使用銅銀及大鑿』。學生方面則因爲在恐怖的毆打逮捕下，而且領導的又放棄了責任，這樣便徬徨無措。於是自行組織了兩方面的人物，組織了一個調解委員會，由張發奎在『信不信任我？』的口吻之下當了主席。當然，調解是很完滿的！

直到今天，中大同學收到了不少工人的慰問信，皮鞋匠、電氣工人等等，他們措意很簡潔，字跡歪斜，而且夾有五千元或一萬元，以此表示他們對於學生的同情和慰問。誰相信工人會打學生呢？從這些來信中便可以得到證明。

值得報導出來的另一件事，就是在這次事件中執行任務的軍警們，他們都是面有戚容（不是殺氣）的。他們接受學生送給他們的傳單，有些背轉身偷偷的看，有些則把它塞入袋中。

的東江馬鞍圍，在這次夏潦中給沖垮了。近十日來，天雨綿綿，白雲山下並沒有見過日光！

六月十二日寄自羊城

印度消息續聞

五月九日紐約訊——印度駐美大使暨聯合國代表阿薩夫·索利氏於今日接獲美國人士對全印工聯總會委員安東尼·比拉，及其他工人領袖在馬達拉斯被捕之強烈抗議書。

這一抗議書的簽字者爲：羅勃·彼茨堡導報編輯；菲力·拉甫，政黨評論報編輯；韋克特·麥克唐納，政治報主筆；法累爾·羅斯，戰鬥報編輯；工人行動報主編葛拉特；『第四國際』主編法蘭克；『新國際』主編夏克曼以及小說家摩斯·法拉爾等。他們抗議書的原文如下：

『署名者曾得到如下真相的報告：安東尼比拉，馬達拉斯工會主席，及全印工聯總會的委員，於四月十六日同西爾發，穆爾亞及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的其他黨員一起被捕和拘禁。這些人都是因爲領導和援助馬達拉斯的白金漢與加拿的克紡織廠一萬四千五百工人的罷工遭到了迫害。工會祇是要求工人最低的房租金，和生活補助津貼以抵禦高漲的物價，和其他一些必需的利益。』

這些最公平的要求却遭到了暴力和恐嚇，而安東尼比拉便是在公共安全法案（爲最近馬達拉斯議會通過，是衆所共知的抵制勞工的武器。）的名義下被捕了。

『爲了聲援他們領袖的被捕，在三月三十一日有十萬工人實行廿四小時的罷工以示抗議。在四月一日，當示威的婦女和兒童試想經過馬達拉斯總督府請願，要求釋放安東尼比拉時，他們又被海瓦斯斯攻擊，受到警察嚴厲棍棒和鞭打。同時，紡織廠罷工則仍舊繼續下去。』

『我們這裏的署名者，曾始終一貫地支持印度人民爲從帝國主義壓迫下爭得自由的鬥爭。我們也曾堅決地保護工人在任何國家爲改善待遇而進行組織和罷工的權利。我們相信：如果一國的工人組織的基本民主權利的自由應用被剝奪了，或者他們的領袖因爲他們的政治上信仰而被迫害了，這個國家便永遠不能得到自由。』

『因爲以上種種理由，我們要求立即釋放印度之被捕工會領袖和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第四國際）之黨員，並請先將這要求立刻轉達貴政府。』

更正 本刊上期紐約通訊『托洛斯基謀殺案真相大白』中，『社會黨領袖托馬斯』誤植爲『社會主義工黨領袖托馬斯』，特此更正。

信箱

關於普選全權國民會議的討論

編者先生：

我是一個北大學生，同時也是貴刊忠實的讀者。在北方，我感覺得整個雜誌界都是非常沉悶與淺薄。除了一些把『內亂』『統一』『共匪』等字眼一個個硬嵌入句子中去的文章以外；留下的便只有那些充滿着標榜華萊士的『超新政』，『政協路線』，『聯合政府』的囁語了。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開始苦悶，失望，一種潛伏着的命運觀不自覺地控制了我想。當一次次地想起中國目前所遭到的苦難與缺乏一條新生的坦途時，我回答自己說：『這是命運的悲劇』！但是這種病態繼續不久，一個出色的醫師在最短的時間內把我這個思想上的毒瘤割掉了。這醫師就是我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所發現的你們的『青年與婦女』。

從那時起，我就變成貴刊的長期讀者了。不管上海與北平是被擺佈得如何遙遠，思想上的契合却使我把心中的那隻手伸向你們。我敢說，在中國目前的思想界上，只有你們的理論是最深刻最正確的。如果中國思想界上尚有一盞明燈，那這明燈應該是屬於你們。你們不但指出了當前中國政治腐敗的根源及其出路，指出了戰後整個國際局勢的變結及其救治的方式，而且還指出華萊士的虛偽，聯合政府的幻想，國共和談失敗的根因，同時并大胆地說出克林姆宮官僚獨裁的罪惡政策，中共的軍事冒險與政治投機；這一切霹靂般的議論，不但驚倒了一切偽裝的人，同時也暴露了一個強盜馬克思主義的惡毒陰謀。可惜能夠接受你們的理論的人太少了，以致今日羣像依舊亂舞，反動勢力仍是那麼猖狂。不過，我雖然大體接受貴刊的思想，但也還有使我難於索解的地方。例如貴刊每當分析國內問題時（像如何停止內戰，解救經濟危機等等）最後總是提出一個口號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說只有它才能解決問題。這就有點難懂了！現在讓我將對這個口號的疑問提出幾點來：

一、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似乎是一個空洞的口號，因為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根本改變政制問題，在現政府統治下，要想召開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恐怕統治者絕難允許。即使它表面上允許了，但由於它有的是錢與勢，它可以操縱選舉，這樣一來，所謂普選也者，不過是名存而實亡罷了。既然『普選』已失去了普選的真諦，那麼，更何談『全權』？

二、召開這樣的國民會議既然困難重重，即使形式上召開了，又極易受統治階級操縱，那麼接着使我們懷疑的自然是召開後能否『解決一切問題了』。

三、一般羣衆（至少是我所接觸到的圈子內）現時都不能接受這個口號。他們要求的或是『聯合政府』，或是『社會主義的工農政府』，那麼我們爲什麼不在這二者之間去選擇呢？如果一味地捧住『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而不顧，究竟在這口號提出後有多少人能夠了解和接受呢？

四、據我想來，你們提出這口號或許是因爲要把握所謂『民主階段』。等到革命的主觀力量完全成熟後是要提出更明顯的口號來的，如俄國革命時的情形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但我却懷疑：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否可作爲我們的指針，還是問題。二月革命後的俄國，立憲會議（即國民會議）果然占了一個極重要的地位，并因此引致了羣衆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當羣衆掌握政權的時候，立憲會議被放進歷史博物院裏去了。既然俄國革命證明了立憲會議並沒有能解決問題，那末，我們是否可以把這點教訓去告訴中國羣衆，叫他們直接走向社會主義的制度呢？

以上是我積聚了一個長時間與經過多次思索而仍弄不清楚的問題，請你們絕不要誤會我是在有意爲難你們。我實在是本着認真和嚴肅的精神在追求真理，希望你們給我以滿意的答覆，藉以消除我的疑難。敬祝
操安！
讀者受青謹啓 六月十日

曼青先生：

讀了來函，對本誌的立場既備致贊許，并承告北方雜誌界的一些現象，我們很是興奮！你對於『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所提出的一些疑問，我們不但絕不誤會你『是有意爲難我們』，而且很感佩你這種『追求真理』的『認真和嚴肅的精神』；在我們方面，絕無任何成見，其唯一的目的『在追求真理』，希望以『真理』來澈底改造我們這個國家的無比混亂和腐敗制度，并進而改造整個世界，讓全人類走上光明幸福的道路。因此，我們對於真理是十分認真而嚴肅的，願意同任何追求它的人們不厭求詳地來討論的。而且我們堅決相信：『真理愈是討論，便愈見明顯。』反之，凡是拒絕別人提出疑問，害怕同別人討論的，一定是自己站在真理的反面，故往往流於專橫武斷。不錯，現時確有不少自稱前進的人物，甚至自稱革命的黨派（如克里姆宮所指揮的各國共黨），就十分害怕別人向他們提出疑問來質問他們。他們的教條是：『只許捧，不許問』。如果你敢於冒險向他們提出疑問，要求討論，他們不是擺出教訓的態度，說你是學院派或懷疑主義，就是學着反動統治者的態度，給你戴上一個什麼派或什麼匪的帽子，而我們是深惡痛恨這種中世紀的『宗教法庭』的作風的。這不過是就便表明我們對於『追求真理』所一貫採取的態度。現在讓我們來解答你所提出的一些疑問吧。

你說『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似乎是一個空洞的口號』。但事實上恰好相反，在現時大家要求民主，大喊民主口號的情形底下，只有這個口號才是最具體，最實際，最具有民主的內容的。因爲這口號內所標明的『普選』，就是指凡在十八或二十歲以上的中國人民，不分年齡，性別，均得以不記名投票選舉自己信任的代表到國民會議裏去，以表達他們的意向和要求；同時，所謂『全權』，就是指這樣地由人民普選出來的國民會議，必須具有全部權力討論和解決國家當前一切的重大問題，連澈底改組政府的問題在內。假如不談民主改革則已，如果要談民主改革，便必須有一個中心的能統攝一切的政治口號。而這樣的

總的政治口號，在現時便只能是一「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因爲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有可能將全國人民大眾的願望，意志和力量集合并集中起來，以最民主的方法解決國家當前亟待解決的民主任務（如對外完全獨立，土地歸農民，八小時工作制，國內弱小民族自決權等），以及國內戰和其他的重要（如經濟）問題等。因爲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如果一旦實現了，到那時人民大眾一定已經團結起來，成了國家的主人翁，這樣，軍事專政必趨瓦解，國共間的糾紛自會受到合理的裁判而獲得解決。到那時，你所謂「根本改變政制」的問題，也就可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加以澈底解決了，至少離澈底解決的路很近了。

至於你說，「在現政府統治下，要想召開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恐怕統治者絕難允許」。這是毫無問題的。不但這樣的國民會議絕難允許，就是現時某些黨派所主張的「政協路線」又何嘗得到「允許」呢！這裏的問題不是「統治者允許」與否的問題，而是人民大眾能否爲實現此種國民會議起而積極鬥爭的問題。如果民衆不積極起來鬥爭，任何統治者總是不會自動允許，自動進行真正的改革的。倘使民衆起來積極鬥爭了，統治者主觀上雖十分不願「允許」，但在羣衆力量的壓力之下，却不得不表示退讓，不得不允許召開較民主的國民會議，或進行某種民主的改革。假如民衆已積極起來鬥爭，統治者還要頑強抗拒，絕不讓步，到這時進一步以武力解決問題的方法，自會從民衆及代表民衆利益的政黨中提出來。也只有到這時候，民主議會的解決方式才能真正爲羣衆武力的解決所代替。但在達到這一步之前，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這一口號，總是一個號召人民大眾走向政治舞台，動員人民大眾參加政治鬥爭的主要的口號。這是有以往一切歷史可資憑證的。俄國便是最典型的例子。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七年，列寧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總是以「立憲會議」（即國民會議）作爲絕的或主要的政治口號去號召羣衆起來鬥爭。直到二月革命之後，即布爾塞維克已提出了「一切政權歸蘇維埃」作爲主要政治口號之後，立憲會議雖被降爲輔助的政治口號，但它在政治鼓動上仍然起了重大的作用。

不錯，你已提到：「俄國革命的教訓是否可以作爲我們的指針，還是疑問」。當然，我們絕不是拜物主義者，像現時一般所謂「蘇聯之友」或克里姆林宮所指揮的徒黨一樣，凡是蘇俄的東西都是絕對好的，尤其是史大林的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是天經地義。相反地，我們對於克里姆林宮官僚獨裁對內對外的全部荒謬政策，都是不斷地加以指責的。但關於列寧領導俄國工農走向十月勝利的根本路線，基本教訓，却應特別予以注意，從它們認真學習，以爲我們的借鏡或指針。而立憲會議在俄國一般民主解放運動，以及工農解放運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無疑地是值得我們借鏡，可以作爲我們的指針的。

至於「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能否解決問題」，如果從立憲的機械的觀點來看，是很難說定的。但如果從辯證的觀點來看，却難得出正確的答覆。這就是說，這樣的國民會議，如果「實現」了，它是有可能解決問題的。如果不能實現，當然談不到解決問題，但却不能因此便否認它對於解決問題之重大的助力。相反地，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只有從現時起，積極地，堅定地，勇敢地，把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提到人民大眾之前，以此去號召他們，鼓勵他們起來爲實現這一口號而鬥爭，讓他們在這一口號之下活動起來，團結起來參加政治生活，走上政治舞台，實行干涉政治。同時，并以這樣的會議去對抗統治者的軍事專政，暴露其一切虛偽的民主的「國民大會」（即所謂以「幾與勢」操縱選舉）所召開的「形式上允許」的國民會議。縱令這樣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不能召開，不能解決問題，但在這種運動之下，及由於這種運動的幫助，離開真正解決問題的時間也就逼近了，俄國由「二月」走近「十月」，就是最好的經驗。你說「俄國革命證明了立憲會議並沒有解決問題」，但你恰好忽視了正因爲有立憲會議的長期鼓動，並最後在羣衆面前證明俄國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客對此會議的召集表示故意怠工，才迫使羣衆走向武裝暴動奪取政權來解決問題的道路。因此，從客觀上講來，俄國的立憲會議口號雖然沒有直接解決問題，但它却大大地推進了加速了真正走向解決問題的道路，即間接地幫助解決了問題。只有這樣來了解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對於解決問題的作用，才是正確的。

的「聯合政府」，不但全是上層的拉攏，不能體現真正的民主，而且即令實現了，也絕對不能真正解決問題的。戰前法國和西班牙曾經一度實現過的「人民陣線政府」（即聯合政府）以及戰後在法意等國成立的「聯合政府」所表現之無能，就是鐵一般的教訓。至於「社會主義的工農政府」，假如「一般羣衆」都「要求」的話，那我們將首先舉起雙手贊成。但事實上，這一口號尚未被提出來，更不要求「一般羣衆」在要求的話了。無疑地這一口號將來是一定會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但這還是將來的事，它在現時至少只能有宣傳的意義。今天要想號召民衆起來參加政治鬥爭，來干涉政治，宣傳的口號是絕對不夠的，必須有一個目前的總的政治鼓動口號，這口號，除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外，實在再找不出任何別的適當的口號來。假如你能找得出更好更適當的口號的話，我們是願意接受的。但我們相信，你是找不出來的。

最後，我們希望你特別注意的是：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的提出，絕非根據我們主觀的願意與否，而是完全由於客觀的需要決定的，這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邏輯。在西方先進的國家中，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在一個多世紀以來便已成了一切民族民主改革運動的中心口號（如法國大革命中的國民大會，美國獨立運動中的大陸會議，迄至俄國立憲會議等）。在現今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落後國家，如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亞及中國等遲遲未決的民族民主的改革運動中，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也仍然是主要的政治鼓動口號。這口號與民族獨立，土地歸農民，八小時工作制等口號連貫起來，便構成爲「過渡綱領」。這綱領不但可以推進民族民主的改革運動向前邁進，而且可以成爲走向社會主義的絕對必須的橋樑。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僅僅是所有國民會議或立憲會議中最民主最急進和最具有革命內容的一個口號而已。

在中國，因爲缺乏民主的傳統，對於西方革命運動的經驗又頗隔膜，再加各種自稱民主的黨派又忙於上層勾結，害怕選民最民主的方法去號召民衆起來參加鬥爭，所以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至今尙被忽視，尙未爲民衆所瞭解。但我們十分相信：如果中國民族民主的運動再往前進展，這一口號一定會被民衆所接受并爲之起而積極鬥爭的。因爲這口號一定是一個政治口號，只要爲客觀的情勢所需要，它便遲早一定會獲得羣衆的擁護，形成推進改革運動的力量。因爲篇幅所限，我們的解答未免簡略。倘使你尙有疑問時，請往後提出來，我們將同你作進一步的討論。

編者 六月廿四日

印度正在從分治走向內戰

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實行分治後，印度的流血衝突是更加嚴重了！最近一月以來，我們每天可在報紙（尤其外國報紙）上看到成千成百的「難民」被屠殺的報導。而據路透社十日電：在旁遮普省暴動中，已有十五萬人被殺死了！直接促成這次大流血的，乃是分治後的大規模遷徙。

這次大遷徙，實在是最最不合理的。印回雙方預定對調的移民是四百萬名，但路透社廿三日電，則透露移民的數目要近二千萬，可見此次規模之大，在近代歷史上還沒

有見過。而在遷移過程中，往往一隊長達四十哩的幾十萬難民會被武裝的異族人所襲擊，有時甚至在整整三小時的屠殺中，只有匱於屍堆中的才倖免一死。但更重要的還不僅限於生命的威脅哩，因遷徙而受到的財產等物質的損失，更是難以估計！幾百萬的人民，一旦離開自己世代居住的地方，所有的房屋、器具及賴以爲生的職業，便都無法一起遷出，這種損失對他們更是普遍而嚴重。同時據美國記者新德里廿四日的通訊說，「爲人口十分之九所從事

的農業，已停頓一個多月，廣闊的耕地都已荒廢，農民不是被殺便須逃亡」。這幅悲慘的畫圖，充分映現出印回民衆所受的痛苦，已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了！

但這種痛苦並不是不能避免的。只由於英國的分治陰謀，和印度上層的懦弱無能，才造成今天這樣的後果。「分而治之」是英國一貫統治印度的政策；這次把印度分成兩個國家，兩種軍隊，就是這種政策進一步的具體化。英國提出這計劃，就是有意造成印度的分裂、動亂以至內戰，希望在印回兩敗俱傷之後重新穩定其統治。不幸尼赫魯，真納們竟接受了這個分治的陰謀，由實施分治而舉行空前的大遷徙，由大遷徙而引起極可怕的屠殺、損害和痛苦。這個責任，應該完全由英帝國主義及尼赫魯、真納們

之嚴重性，牠今天已經給印回的上層在英國的牽引下，帶向內戰的懸崖絕壁，個別的散漫的流血衝突，將變成爲公開的大規模的內戰了。這種內戰，在兩個國家與兩種軍隊的對立下，又幾乎是難以避免的。印回雙方的資產階級大地主們，只能把印回人民帶到這條內戰的死港去。惟有由印回及印度其他民族的下層羣衆，在共同的澈底的民主民族鬥爭目標下團結起來，才能避免一切的紛爭和內戰，獲得完全的解放！（唯康）

生活指數與最近工潮

最近物價又在突飛猛漲了！各種日用必需品先後漲了二成至一倍以上，這是事實，也是每一個靠薪資生活的消費者所痛切感覺到的。但官方公佈的生活指數，却只漲了一成！這一來，指數與實際物價更爲脫節，薪資生活者的褲帶更要束緊，因而使平靜許久的上海工潮，又開始動盪起來了。

在目前的工潮中，較嚴重的是法商電車、汽車及英商電車的罷工。據大公報的報導，罷工的原因全是經濟性的，例如法商電車工人向公司提出的七項要求是：一、普加福利金十五元，二、子弟學校裝置廁所，三、修改車務部服務章程，四、機務部每月加薪工資，五、調整職員等級，六、各人借支五十萬元分期發還，七、車務部復職復薪。這些要求，有的從勝利開始就提出來，到現在差不多二年，公司一直沒有答應，工人不滿意公司的態度，因而……罷工了。（九月二十八日大公報）至於英商電車罷工，也完全是爲了響應普加福利金十五元的要求而起的。據次日的同一報載，英電「車務部職工，因爲本月份發表的生活指數太少……追不上生活程度，況且別的洋商烟草公司等處，都有職工福利會來救濟」，電車工人却沒有，因此便和法商工人採取同一步驟。從這些報道可看出，這次罷工是迫於生活而不得不然的。

可是，政府當局在罷工發生後，却只把「共產黨」的帽子加在幾千的罷工工人頭上，要「予以制裁」和「嚴辦」！這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是危險的！難道「共產黨」真的如此雄厚的「實力」，否則，不是共黨也把人說成共黨，不是等於推人家走這條路嗎？要合理地解決工潮，應該先消滅那產生工潮的經濟原因，即遏止通貨膨脹和物價高漲。不然「制裁」和「嚴辦」是沒有用的。這次交通工人不願聽動員令，而且在電力工會被「制裁」而指令改組的翌日發生，便是最新鮮的例。（流光）

談禁舞與節約

自政府當局發出於六個月內禁絕舞業的命令以後，不但經營舞業的老闆，職員和舞女們曾數次舉行了「萬人集會」，強烈地反對這種斷絕他（她）們生路的禁令，就是社會各方面的人士，亦站在避免增加社會失業的觀點上，認爲禁舞並不是當前一個應有的措施。

禁舞，據說是爲着節約。因而節約的主旨據本月初廿六日所舉行的節約大會所宣傳的，乃在於希望市民盡量節約，以節省物力，加強「勤儉」的資源。但在民衆看來，節約不過是掩飾當前統治層生活的糜爛；而禁舞，亦如以前禁止黃包車一樣，更不過是替社會增加失業，迫使無出路的人們走上死亡之路而已。

舞業之所以如此發達，固然是由一班糜爛墮落者流追求享受所造成，但根本說來，這乃是整個社會制度不良的結果。如果每個人都有正當的事業和娛樂，每個舞女都有生活的技能和合理的職業，則像現時這種變相出賣肉體的舞業，自然不會存在。而那時跳舞便將成爲一種純藝術性的或交際場所必須的娛樂了。然而我們的當局，總是不從根本的問題上着想，而只注意這些枝節問題，其結果往往是弄巧反拙，徒然增加失業羣和娼妓的數目，更造成社會的混亂和不安！

至於談到節約，最好是從上層的達官貴人及那些腐化透頂的資產者先做起。而人民大眾則早已束緊褲帶，節無可節，約無可約了。叫人民盡量節約來加強「勤儉」的資源，那就等於叫人民餓着肚皮來加強自強！節約云乎哉！總之，無論禁舞和節約，都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都不能爲當權者打開一條較好的出路。（羣音）

新聲(原名青年與婦女) 第二卷第七期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人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陳景光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總經售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五日出版

事啓

本刊因內容水準逐漸提高，爲着「名字」與「內容」的適當配合起見，故自本期起改名爲「新聲」。又本期因改名關係，致延期數日，今後仍恢復每月一日出版，敬希讀者留意！

內戰進階的新階段

雲碧

自政府當局頒佈剿共總動員令以後，內戰的烽火便愈形熾烈起來，大有不知伊於胡底的趨勢！在政府當局，自然是動員全部軍力，決心圍剿，企圖完全毀滅共黨的武裝力量；而中共方面，亦出動所有的部隊，全力抵抗；這便形成了雙方戰爭最劇烈最殘酷的局面。

自四平街決戰及山東會戰之後，從軍事觀點來看，政府軍隊確又佔領了許多重要城鎮和交通點，給了共軍以重大的打擊，并逼使中共一部分軍隊（由劉伯誠所指揮者），從山東散佈至豫、鄂、皖各省邊境，採取了純粹的游擊戰術。這種從保衛或進以一地的陣地戰轉變為廣泛的純粹的游擊戰的形式，可以說是當前內戰中一個新的轉變。

但這種軍事方面新的轉變，決不出於偶然，而是有其客觀因素的。因為軍事力量也是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之反映。政府的軍事機構是建基於城市的基礎之上的，而現代的城市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堡壘。政府當局一方面把守着這些基本堡壘；同時經過海上和陸地的孔道與帝國主義者及鄉村地主的經濟連結一起，獲得它們物資上的援助與支持。所以政府的軍事戰略，必須維持重要的城鎮和交通點線。而維持這種點線的軍隊，必須是近代化的適宜於陣地戰的軍隊。這種軍隊的配備，最近因為得到美國的幫助，已達到它的某種高度了。正由於它有這些優越的條件，所以戰後二年以來，尤其是最近四平街和山東會戰之後，它在軍事上才獲得巨大的勝利，已從共軍手裏奪取了許多最重要的城鎮和交通點線。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它離開根本摧毀中共的武裝力量還遠得很，實在說，政府當局要想根本摧毀中共的武裝力量，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由於它在政治上的貪污腐化與無能，及以此造成的統治機器的變換，士兵的厭戰，特別由於戰爭不斷地破壞與消耗，使經濟危機日趨嚴重，人民的痛苦和反感日益加深，那些走頭無路的農民和對現狀不滿的城市青年，在絕望和憤懣之餘，往往跟着中共走。在這種客觀條件之下，共軍雖不斷地損失，但却也不斷地獲得補充；它雖不能固守城市，却可以散佈於較偏僻的鄉村，進行游擊戰，不斷地消耗國軍的財力和軍力，破壞其交通，損毀其工業原料，這種情形如果長此繼續下去，勢必釀成國家整個經濟的崩潰，人民大眾的騷亂而後已。

從共黨方面說，它的武裝力量，是一貫建立於農村經濟和農民的基礎之上的。而農民隊伍的最大優點在於利用散漫的農村地形進行游擊戰。這種戰術是農村經濟及農民本身散漫性之反映。但游擊戰在戰略上也只能成爲陣地戰的輔助功用，而沒有任何決定和主動的意義。因爲它是建立於落後的基

礎之上的。過去十年江西的農民暴動，便是城市征服鄉村最有教訓意義的例證。最近中共在軍事上無疑地遭受了重大的打擊，它在華北，尤其是山東，又重新失去了許多重要的城鎮和交通點，軍隊也大大地損傷了。它現時雖然還能盤據農村，乃至散佈於豫鄂皖地區，不斷地進行游擊戰來破壞國軍的交通線，威脅其城鎮，消耗其實力，但這絕不能解決橫在中共面前的嚴重問題。雖然它曾經在它的解放區對農民有相當的改良，分配土地給貧農，可以因此獲得農民尤其是貧農的擁護，但在目前這種游擊戰的情勢之下，絕無法長久固定。因而連這種改良也不可能保持。因爲它今天佔領這個地方，明天國軍又來了，使農民感到共軍並沒有給予他們什麼好處，相反的，這種更廣泛展開的內戰，只有替他們帶來擾亂和死亡，貧窮和痛苦。尤其當共軍在不斷地徵兵徵糧，在軍事上不斷地失敗中所招致的生命財產的死傷和損害，更使廣大的農民羣衆陷於異常痛苦的状态之中。由痛苦而反感，由反感而怨恨，最後勢必釀成各種各式的分化，走到不可收拾的局面。當然，我們並不是說，反映農民要求的這種軍事行動是宿命地沒有前途，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抵抗城市資產階級的武力的。而只是說，它一定要在一個前提之下，即，必須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必須與城市的各階層的進步力量配合起來，脫離現時這種孤立狀態，這種農民的武裝才能成爲一種真正的革命力量。尤其最重要的，它還必須有一個奮鬥的目標，就是說，必須有一個真能代表工農及一般被壓迫民衆利益，即將農民的利益與城市被壓迫民衆的利益連結起來的政綱。但中共恰好就沒有這樣的政綱。它有的只是空洞的「政協路線」和「聯合政府」的口號以及超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這些混亂人們頭腦的東西。當這些口號和主張被事實證明爲一種烏托邦的幻想時，於是便單靠軍事冒險來作孤注一擲了。但軍事是政治的延長，中共既沒有一個明確而澈底的政綱，所以它在軍事上不斷地招致失敗，而找不到任何的前途了。

從上面所敘國共各自所處的困境及其內部所醞釀着的危機看來，我們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和利益上認爲國共雙方的內戰，如果還是繼續下去，無論是那一方面都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只有把問題弄得更僵持，更惡化，更無出路而已。但從現時雙方的情勢看來，都不會自動放棄它們現時所進行的軍事行動的。因此，內戰只有繼續下去，中國的混亂和災禍只有繼續加深下去，其結果，無限的痛苦和災害，當然還是落在人民大眾的頭上。

爲了制止內戰的繼續，爲了挽救人民大眾愈來愈不可忍受的浩劫，人民大眾應立即挺身起來，要求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以解決當前的內戰及其他國家的重大問題，實在是時候了！

聯合國大會暴露出來的國際危機

旭東

美蘇對立的尖銳化與第三次大戰的威脅

曾經一度引起全世界極大注意并寄予莫大希望（實即幻想）的「聯合國大會」，現在又在紐約富勒與舉行了。這是舊金山大會後的第一次大會。會議的進行已經過了兩個星期。但在這兩星期來的會議上表現了一些什麼呢？首先是美國務卿馬歇爾代表美國演說，其次是蘇聯首席代表維辛斯基針對馬歇爾演說致答詞；跟着便是法國外長皮杜爾，英國國務大臣麥克尼爾，及各國代表們相繼發表演詞，但這些演詞差不多全是圍繞着馬歇爾的演說和維辛斯基的答詞而表示其所代表的各該國政府當局的意見的。因此，這次聯合國大會便完全成了美蘇兩強及其追隨者毫無掩飾地針鋒相對的角鬥場！現在讓我們摘錄一些主要代表或發言人的演說詞來對照一下吧。

馬歇爾的演說，正如合衆社（該社紐約十七日電）所描叙，「並不吞吐其辭。渠警告稱：世界已面臨危機，并促請大會代表注意世界各地人民皆深懼捲入新而更可怕之衝突。渠毫不遲疑，將世界一切混亂之責大部歸諸蘇聯。渠嚴辭指責蘇聯妨礙聯合國行動，因而不能阻止他國對希臘之仇視與侵略行動。馬歇爾並將朝鮮獨立延誤之一切過失加諸蘇聯，關於裁軍問題，馬歇爾更率直地宣稱：『美國堅決反對任何武備之裁減，此事須待德日和約簽定，安理會具有軍事力量，以及原子能獲得國際協議後始能實行』。因此，馬歇爾要求將希臘問題，朝鮮問題提交大會『公斷』，并主張限制『否決權』，建議在聯合國大會中設立『和平與安全常務委員會』等等。很明顯地，馬歇爾『將世界一切混亂之責大部歸諸蘇聯』，就是將美國正在加緊準備的反蘇第三次大戰，即所謂一個『新而更可怕之衝突』的全部責任，預先放在蘇聯身上。所謂將希臘問題和朝鮮問題提交大會『公斷』，便是叫大會通過美國的主張，解除希臘邊境的游擊隊，使朝鮮北部從蘇軍的統制下脫離出來，以此來鞏固美國在東西兩方面的戰略堡壘。『限制否決權』，則是限制或剝奪蘇聯在聯合國安理會或其他會議上的抵制行爲。而建立『和平與安全常務委員會』，不過是在安理事會之外設立一個包括全體聯合國會員國代表的機關，可藉多數或三分之二的名義壓制蘇聯，以便經常替美國服務而已。像馬歇爾這種『并不吞吐其辭』的『警告』和『建議』，當然不是蘇聯所能輕易屈服和接受的。於是維辛斯基代表蘇聯出而抵抗了。

維辛斯基一開始即譴責『美英企圖不顧聯合國機構，脫離該機構而執行其政治措施』，因而着重地指出『馬歇爾援歐計劃爲強迫歐洲國家依賴美國獨佔資本，并欲在歐洲結成敵對東歐及蘇聯之企圖，以爲美在歐洲經濟根據

地』。他認美國『對於希臘北鄰諸國之指責，乃毫無根據之談』。『美國在聯大中提出朝鮮問題，爲違背四強莫斯科協定』。『馬歇爾建議之設立五國和平與安全常務委員會一案，顯然違背憲章，蘇聯代表決反對之』，他強調『若干國家之報紙已在發動新戰爭的宣傳，尤其是美國——之報紙，正從事瘋狂的宣傳，使輿論贊成新戰爭的發生。戰爭投機份子，以捏造的蘇聯準備進攻美國之消息，刺激人民，以爲其本身備戰的藉口。蘇聯并未作攻擊任何國家的威脅，而若干國家尤其是美國，則已自戰爭的心理狀態進入採取軍略性切實措施之階段，包括建立新根據地，重編軍隊，擴大軍備生產，改進作戰武器等』。最後維辛斯基提出建議案，內稱：『聯合國機構嚴重譴責若干國家尤其是美國土耳其希臘等國反動分子發動之犯罪性的新戰爭宣傳……聯合國機構認爲需要促請各國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違者施以刑事處罰。聯合國機構重申有儘速施行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通過之裁軍決議，及同年一月廿四日廢止原子武器及其他集團破壞効力武器決議案之必要』（路透社富勒與十八日電）。維辛斯基的演說，除其犬儒主義的空想外，每一『指責』及『建議』，都是針對着馬歇爾的演說，是用不着再加解釋的了。現在我們且進而看看美蘇以外英法兩強的態度吧。

接着維辛斯基發表意見的是皮杜爾，他宣稱：『美蘇間之衝突與日俱增，已無協調之希望。自聯合國成立以來，法國即努力在美蘇之間調解，但此種努力徒勞無效。忠實言之，人們不知其如何協調。因此法國對於其目前之問題唯有採取公正立場』。但『皮氏隨即說明法國對於各項問題的立場，幾乎每一問題均與美國採取同一路線。關於否決權問題，法國將同意考慮所有修改或限制五強否決權之建議。關於巴爾幹問題（希臘問題），皮杜爾認爲聯合國應對此有所行動，提出解決之辦法，而不容駭推責任。關於馬歇爾援歐計劃，皮氏稱：『吾人選擇此一途徑，不容回頭矣』。皮氏對於維辛斯基所提聯合國應對美國之鼓吹戰爭宣傳有所行動一點，并未予以直接之評論』（紐約十二日廣播）皮杜爾率直承認美蘇危機的尖銳化，且確言無法協調之後，便以這樣對『每一問題均與美國採取同一路線』來表示法國的『公正』！

麥克尼爾，據紐約二十二日廣播，他『發表了一篇長六千六百字的演詞，聲明英國的基本政策。他猛烈抨擊蘇聯，同時更向莫斯科呼籲，請他們對於世界的各問題，放棄那種不屈不撓的態度。麥氏譏嘲維辛斯基說美國是『戰爭販子』，他說，維氏的指責簡直是喜劇。他更反駁維辛斯基指責馬歇爾

的經濟援歐計劃足以威脅到任何國家的主權，並且責備蘇聯妨礙了原子能的管制，和使用了二十二次的否決權，把安理會弄得不能行動。他『率直的警告』：『倘使蘇聯認為它的權力必須擴張到一切區域，倘使它想，它所叙述的任何國際局勢，必須被他人所接納，那麼這一種限制，將不僅毀滅了聯合國，就是不穩定的世界和平，也將傾圮和覆滅，叫我們大家都遭遇到維辛斯基君所促請我們注意的一切可厭惡的影響了』。最後麥氏鄭重地指出：『現時世界危急的局面，大體上都是由於蘇聯的不願意合作造成的』。總而言之，麥克尼爾是完全站在美國方面，最露骨地攻擊蘇聯，把現時造成世界危機的責任放在它頭上，最後威脅它，叫它放棄現有的立場向美國屈服，否則，反蘇戰爭就成爲不可避免的！這便是所謂『英國的基本政策』！！

賴依，聯合國秘書長，這個具有蝙蝠特性（當然是由於他所屬的挪威的地位所決定的），依靠聯合國的存在而獲得『地位』和『榮譽』的人物，這回也不得不破例『向美蘇兩國提出了嚴重警告，指出它們的外交戰倘使再繼續下去，聯合國就要被摧毀了！賴氏的演說，替聯大的紛紛陳詞，作了一個總結。他對兩強同樣的加以指責。兩強在大會的致詞中，曾經互相抨擊，充滿了什麼『戰爭販子』，『醞釀第三次大戰』，『扯謊』和『惡意的破壞聯合國』等等的字句。使賴氏最感困惑的是英國代表麥克尼爾譴責蘇聯的坦率演詞，其中最刺激的一段是：『英國感覺現時還想列強要能團結，就無異於昏聩的幻想，或是危險的欺騙』。賴氏向大國，特別是向兩強說：『沒有任何的機轉，更無論這脆弱的聯合國，可以在強權的全面鬥爭中存在。他更明白指陳，現在只有兩大強國能夠挽救聯合國。他向雙方呼籲，請求他們互相妥協，以防聯合國嬰兒的天折。賴氏原來并不擬發言，他這次發表演詞是鑒於聯合國已面臨到重大的危機，所以纔有這一個應急的措施』。（紐約二十三日廣播）賴依雖已深切感到聯合國的重大危機，但他却不了解這危機正是整個國際危機，特別是美蘇不可調和的矛盾尖銳化之一種反映。因此，他請求美蘇『互相妥協』，正等於請求不可調和的矛盾互相調和，那還不是『昏聩的幻想』或『危險的欺騙』嗎？！

至於其他各國的代表們，除了東歐在蘇聯控制下的幾個小國外，差不多全是站在美國方面附和馬歇爾對蘇聯的指責及其建議的。所以，『聯合國大會二十三日以絕大多數克服蘇聯之反對，通過美國提案，討論朝鮮問題，希臘問題，設置新安全委員會，及限制行使否決權。同時，大會不顧蘇聯代表維辛斯基之堅決反對，通過阿根廷提案，討論并建議修正對義和約。斯拉夫民族集團之六票，在各種問題中，始終居少數地位』（聯合國紐約廿三日電）由此已可充分證明：蘇聯在這次聯合國大會中，第一步便完全陷於孤立和失敗的地位了！此後會議情形的发展，雖不能完全預測，但多半將依照美國的提案的意旨去解決各種問題的。那時留給蘇聯的只有兩條路：退出聯合國，還是留在聯合國內向美國屈服？

美國的態度是非常清楚而堅定的。它在這次大會之前即已從各方面佈置就緒，如召集『泛美會議』以團結美洲各國，『鞏固後方』；提出『援歐經濟計劃』，拉攏西歐各國，『加強前線』。所以在這次聯大開幕之前夕，合衆社即已預告：『將於十六日……開幕之聯合國全體大會對世界和平將具有最大之重要性。非僅大會之議程上充滿爆炸藥般之問題，美國且已準備就緒，將與蘇聯攤牌。馬歇爾將親臨前敵，展開美國鷹與蘇聯熊之間的『冷戰戰爭』』（該社紐約十二日電）當維辛斯基發表反擊馬歇爾的演詞後，美衆議院外交委會主席依東更強調稱：『與蘇聯之攤牌爲不可避免之事』。他坦白告訴世人：『美國決不吝代價，維持現下在聯合國之地位，此地位將繼續爲吾人外交政策之基石』。（合衆社十九日電）以上這些事實，都表明美國公開承認利用聯合國爲其工具，并決心在這次大會上壓制蘇聯，即令蘇聯退出聯合國亦所不惜。因爲蘇聯一旦退出聯合國，美國便可以『有理由』公開譴責蘇聯破壞『國際和平機構』，公開號召聯合國其他會員國來進行反蘇戰爭了。

在美國這一『非常清楚而堅定的態度』之下，蘇聯的代表們在未來繼續的會議上雖然還會表演一些半抵抗的姿態，但結果多半是要向美國遷就的。但遷就并不能緩和和美蘇間的真正矛盾，只是將矛盾更加推往前發展而已。假如沒有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來干涉，美蘇間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將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毀滅人類的第三次大戰的前途！

當『聯合國』成立後，全世界的和平主義者，特別是克林姆宮及其追隨者們都吹噓這是『真正的國際和平機構』時，我們即肯定地宣稱：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只能是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之更壞的翻版，而且必然成爲美帝國主義手中御用的反蘇工具，——現在鐵一般的事實難道還不够證據嗎？！同時，當人們，特別是克林姆宮的徒黨，宣傳戰後『美蘇間的矛盾不是主要的矛盾』，否認第三次大戰的可能性，甚至認爲美蘇可以和平合作，共存共榮時，我們更不斷地指出：美蘇間的矛盾不但是戰後整個國際的主要矛盾，而且必然跟着時間進展日趨尖銳，向着第三次大戰的前途邁進，——經過兩年餘來的事實，特別是現時正在聯合國大會上所暴露出來的無可否認的事實，難道還不够明白嗎？！

任何機會主義的幻想，必然在歷史發展的事變下被粉碎，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預測才能經得起時間和事變的考驗。全世界的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應儘速在馬克思主義的指示下團結和行動起來，爭取社會主義的勝利；否則，依照白宮和克林姆宮的現行政策繼續糾纏下去，依照聯合國大會這種『外交戰』繼續醞釀下去，那毀滅人類的第三次大戰即將臨到你們的頭上來！

△歡迎訂閱▽

本刊對於長期訂閱，極表歡迎。如蒙訂閱，請郵匯法幣一萬五千至二萬元，開立訂戶，當即按期寄奉，依定價八折優待（平寄郵費在內，航空掛號另計）。

戰後世界矛盾與人類前途

紀芬

——評一羣「新民主主義」者的內部爭論

一 爭論的發生

幾個月以前，梁純夫先生在世界知識發表了『從莫斯科看美蘇矛盾』一文，指出在此次大戰結束後，美蘇矛盾已由次要而主要化，由相對而絕對化；同時，『社會主義一躍而為世界政治的主流了』！這幾句話實際上只是自下一般新聞記者的最普通的印象，但無意中却觸犯了莫斯科總路綫的禁忌。因為這路綫一貫都在追求『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共存共榮』的『理想』，竭力把社會主義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中脫離開來，最好是不要提起這個可怕的名詞，至少也不要把它和蘇聯連在一起，免得嚇跑『和平的朋友』。於是『新民主主義』代替了社會主義，以強調美英間的次要矛盾來抹掉美蘇間的主要矛盾，——據梁純夫先生說，這已經成爲『先入爲主』的流行見解了！但不幸他偶然在無意間說出『懷疑』和違反『傳統公式』的話，而『總路綫』或『傳統公式』從來就是不容懷疑的。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說的，他就被視爲『大逆不道』，被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而『討伐』起來了。喬木先生馬上寫了一篇萬字長的『論世界矛盾』，沈志遠先生也發表了一篇『現階段世界政治主流與主要矛盾』，齊聲『討伐』梁先生之『根本忽視了』新民主主義，把牠與社會主義及蘇聯等同起來，因而是『在散佈着助長美帝國主義陰謀的一些觀念。』在他們這篇篇文章中，總是盡力將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清楚分開，設法證明社會主義與蘇聯並無關係，美蘇之間即使存有矛盾，也不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間的矛盾，而且牠並不是主要的。爲了辯解這一點，他們又不得不把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矛盾，歪曲成美國與英、法等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將後者全都變成『超級帝國主義』的『假想殖民地』，而最後則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間的矛盾，歪曲成新民主主義與資

本主義間的矛盾，一句話，即把莫斯科的傳統公式完全搬出來，以此表明其爲正統的理論家。但這又引起林煥平先生的加入論戰，和梁先生的答覆。這樣，一方面是要死死奉行總路綫，另一方面則對牠起了某種懷疑，爭論就由此發生了。當然這只是『民主陣營』的內部討論，（應讀作『討伐』！）但從這當中，我們可以看出人們的理論思想已墮落到何等不可救藥的程度！現在，我們就要把牠加以暴露。

二 美蘇矛盾的主要化

美蘇矛盾在今天之成了主要化，完全是由於戰後客觀情勢深刻的變化造成的。戰後的資本主義舊制度，比諸戰前無疑是更加殘破不堪，更加缺少恢復的能力了。在舊制度營壘中能够互相對抗的國家，過去是以大英帝國爲代表的，今天已陷於沒落和瓦解狀態中，其他大半以上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那些老大的帝國主義，都遭受同樣不可避免的沒落，那更顯赫了；唯一能在大戰中拾頭的只有美國，她的生產力在此時增加了一倍以上，因而形成戰後美國獨霸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領導，同時也就是表現出美國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唯一心臟，因此資本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強梁帝國主義，與空前衰敗的舊資本主義世界便成了明顯的對照：一方面，舊制度大多數國家的生產力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美國則提高了一倍。從這中間生出的矛盾，主要表現

在世界生產力不能恢復，引起市場的日益狹窄化；同時美國則生產過剩，生產品不能在整個國際市場上銷售。這矛盾引起美國的極度恐怖與衝動，必須找尋新的出路，這唯一的辦法就是幫助舊世界的復興。美國戰後兩年以來的努力，都在朝這方向走，主要的表現就是大規模的貸款。但舊資本主義世界本身受大戰破壞得太厲害了，因此使得天文數字的貸款也成了滄海的一粟！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英國，她所借到的款項，簡直是資本主義近代史中空前龐大的，後來事實證明，這種幫助最多只盡一種暫時緩和危機的作用，不到一年便把三十七億美元迅速消耗殆盡；在歐洲大陸方面，情形只有更壞，法國今天已宣佈以前借來的美元都完全用光。在這種情形底下，美國的借款可說是幫助很少的。正因爲如此，證明美國現在正日益感到兩種威脅：第一、她面臨整個資本主義的毫無出路，破產；因爲市場的狹小而沒有挽救的希望，就要跟着引起美國的經濟恐慌，這恐慌現在已日益迫近美國資本主義的大門了。在這種經濟毫無辦法的威脅底下，唯一的出路自然而是盲目地向擴大市場方面走，而現在留下的唯一的市場，就只有佔地球六分之一土地的蘇聯。經濟愈無辦法，恐慌威脅愈大，則愈加要向蘇聯找求市場，這乃是一種必然的趨勢。第二、在黯淡的經濟背景後面襯托出來的，便是政治上的危機，即，革命的威脅。這威脅今天已存在於世界每一個角落，牠與蘇聯——社會主義的象徵——的存在是有密切連繫的。不管史太林如何向資本主義世界屈服讓步，但全世界的工農大眾，當他們走向社會主義鬥爭的道路時，終究要將美蘇間的衝突了解爲兩種不同制度的衝突，——一種是臨死而無能的舊資本主義制度，另一種是社會主義新制度（牠的代表就是蘇聯這個表現新社會誕生的據點和堡壘）。只有從上面的客觀分析中，我們才能了解何以美蘇間的矛盾，成了今天國際局勢中主要的最迫切的矛盾。而梁純夫先生之所以會說出這一點，當然完全是憑着新聞記者的印象主義，而並沒有什麼新奇的。這種美蘇衝突的尖銳性在任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新聞記者的報道中都可反映出來，沒有任何人敢加以否認。否認戰爭威脅存在，甚至在目前還公開表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能『互有合作』的，那只能在克林姆宮裏面找出來！（見今年五月十四日文匯報載『史太林和史達林的談話記錄』，本刊二卷三期對此曾有評論過）克林姆宮之否認戰爭威脅存在以及甚至於承認兩種制度能互有合作，這表明牠在歷史最大的轉捩點頭，仍然抱着過去一貫的懦弱、苟安及投降的心理！他們否認這種尖銳的

矛盾，就等於否認事實，而否認事實就完全是從上述的懦弱、苟安和投降的心理出發的。再由這種心理而生出極度的幻想，幻想美蘇衝突在最後一分鐘能够避免，能够延緩，且更不惜犧牲一切革命的利益來緩和這種不可緩和的矛盾。事實證明史大林過去在第二次大戰前夕已曾這樣幹過，起初加入帝國主義的『國聯』，提倡和平或民主陣線以對抗侵略或法西斯陣線，甚至將所有老布爾什維克及紅軍參謀部完全槍斃，結果却是走到了與希特勒妥協的道路——違反一切莫斯科審判案的謊言，真正在希特勒的不侵犯條約上簽字的只是史大林，但德蘇不侵犯條約並不能避免戰爭。今後史大林也只能把舊路重走一遍，而且用更壞的方式重走而已。沈，喬這些先生們對梁純夫先生說出一點起碼的印象和明白的事實也大肆『討伐』，那只是證明他們完全是克林姆宮在中國的最可憐的應聲蟲吧了！

三 英美矛盾的被誇大

跟着這種邏輯的發展，史大林一方面否認戰爭威脅及美蘇矛盾的主要性和迫切性，另一方面便生出一種利用英美矛盾的幻想。本來一個新生的工人國家，即在列寧時代也並不會拒絕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來爭取蘇聯的存在。但史大林並非用真正的布爾塞維克政策去利用矛盾；他的政策在第二次大戰以前已清楚暴露全是機會主義的了。在戰後，史大林的外交政策還想用同一的機會主義去利用資本主義各國的矛盾。但上面已經說過，只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尚在健康或帝國主義剛剛產生的階段，國際間才容許有幾個強國共存，和發生較為激烈的對抗。現在所有強國的資本主義都衰敗了，而唯一有能力和美國競爭的雖然似乎還有英國，但她實際上仍然是處於極度不相稱的地位的；至於全歐洲的國家則更成了美國的一羣孤兒。在這種情形下，即使資本主義國家間引起矛盾衝突，但目前絕不會尖銳到與美國發生戰爭的程度。甚至連普通的新聞記者也不會得出這個糊塗的結論哩！實際上，每一個在大戰中創傷慘重的國家，今天的希望都只是救

濟、安定、和平，以及應付國內戰爭(革命)的威脅，這威脅今天差不多正在使整個資本主義舊世界完全癱瘓，所以今天英法和美在關稅及通貨等問題上的衝突，絕不致引起嚴重而尖銳的後果，恰恰相反，一年來以英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雖然企圖向美國施行抵抗，但每次總被美國優越的經濟勢力所壓服。在這種情形底下，留給史大林在國際關係上玩弄外交陰謀的餘地可以說非常之少，而另一方面，留給蘇聯與全世界無產階級及殖民地人民利用時機推翻資本主義的可能却空前地大。但史大林根本就不企圖走後一條路，他所選擇的只是那條末路：利用帝國主義間的矛盾。他最初想經過法國共產黨的壓力去『中立化』法國以對抗美國，結果『最典範的』聯合政府把法共團員趕走而自行宣告破產，法國終於完全投到美帝懷抱中去了。現在又想利用英國，但其後果仍將只能如此，那是可以預言的。這種利用表現出最大的叛賣性，便是將英美矛盾加以誇大，在爭取與英聯盟反美的條件下，動員共產黨去出賣工人階級和殖民地民衆的利益。

今天沈喬二先生在文章中竭力誇大英美間的矛盾，其主要原因也就在這裏，他們的『論據』都是從克林姆宮抄襲過來的。而且更明顯的，美國今天正在全力支持國民黨政府，因而使人們更幻想去支持英國，以打擊美國及其手下。支持英國的辦法是叫中國共產黨向英國獻媚，具體的事實則最清楚地在香港表現出來。自從政協路線公開破產，中共被迫撤離國民黨統治地區之後，大批大批的『民主人士』或『左派』都把香港當作海外桃源，而避難到那裏去了。他們不但反對『收回港九』的口號，而且共產黨領導下的工團，甚至與英國的勞工司及秘密警察勾結起來，打擊和破壞罷工；這從最近十三科機器工人罷工中，工團所採取的『中立』態度便可清楚看出。這就是誇大和利用英美矛盾的邏輯結果！

四 整個世界往那裏走

我們在前面已指出戰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正陷於破爛狀態中，蘇聯的地位也瀕於險境，美國資本

主義在新的經濟復興與面前則遭到新的經濟危機威脅，而全世界的革命局勢又已非常普遍地在醞釀着。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應該由此得出結論：任何國家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出路。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則新的戰爭和法西斯主義必然要到來，這戰爭將直接打擊到蘇聯的頭上。可是，人們偏要企圖用『新民主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說東歐今天所實現的就是『新民主主義』。其實折穿西洋鏡來說，這完全是史大林遷就資本主義世界，以抑制東歐人民走向社會主義的一種反動步驟。他一方面要遷就資本主義世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略略遷就東歐的工農要求，因此牠是兩方面遷就的不澈底的後果或私生子。在英國，戰後工黨之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實際上同樣是利用羣衆對牠的信任來擡住他們對社會主義的要求；其餘在歐陸的法義等國，工農之大規模走向社會主義的政黨，(尤其是『共產黨』)他們的目的和要求都無非是爲了走向社會主義。但現在這些『新民主主義』的論戰家們却認爲，在法國，『法國共產黨是國內最強大的政黨，尚不能實現完全的新民主主義』，主要原因應歸於『客觀情勢』；其實這完全是主觀領導出賣的後果。所以今天橫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前途只有兩條：或者是走向社會主義，或者是走向新的戰爭(法西斯主義)，方向是異常清楚的。人們企圖憑空用一種烏托邦的『新民主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但對於所謂新民主主義的解釋，却連這幾位『新民主主義政論家』們也弄不清楚哩！梁先生認爲它乃是『社會主義的預備階段』；沈先生則認爲是『基本上尚處在資本主義範疇內』……的社會經濟制度或『具體的歷史階段』。喬木先生也很爲這制度『還決不是社會主義制度』，『它的綱領在基本上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範疇的』。其實不管人們如何解釋，新民主主義這公式却完全是反動的，牠所能起的作用，正如沈志遠先生所解釋的，即當民衆走向社會主義時把他們攔阻着，只限制在資本主義的範疇內，牠的唯一作用就在這裏。沈梁這次爭論的另一意義，就在於表明目前史大林的總路線底下，人們害怕社會主義而遷就資本

主義世界，究竟達到什麼程度，表明沈志遠這些先生們連梁先生『社會主義已一躍而為世界政治的主』的否認，實在太不可藥救了。由此證明這些先生們在將來的社會主義運動浪潮中，不但要起制動機的作用，而且還要起憲兵（鎮壓）的作用哩！

馬歇爾計劃與歐洲危機

潘衛真

大戰的無比消耗和破壞，使歐洲的經濟幾乎枯竭殆盡，戰後資本主義的歐洲，不僅談不上復興，連穩定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了。我們未曾看見，大陸上能有一個國家，在戰後兩年的今日，已經稍為恢復其深刻的創傷了的，相反地，經濟之停頓不前，正陷資產階級於無出路的困境，此種惡化的局勢，不斷地刺激着、推動着工人羣衆戰鬥力的復活，以行動來擺脫忍無可忍的可憐生活條件，更使資產階級走頭無路。從法蘭西、意大利、一直到希臘、荷蘭、比利時，都在革命危機震撼下，而且，那早已脫離資本主義剝削的蘇聯，仍然獨立地盤據着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看着對方臨頭的大難。資本主義霸主的美國，怎能無動於中？馬歇爾的援歐計劃，因此便應時而生。

美國援歐爲了什麼？

在目前世界的政治形勢中，牠的基本矛盾仍然是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矛盾。這一矛盾，並未因蘇聯的日益陷落而消失，也未因二次大戰而減輕，反而於德日瓦解之後，更呈明朗與尖銳，因爲（一）只要蘇聯國有財產制存在一日，就一日障礙了資本主義擴張市場的貪求；（二）在戰爭中，蘇聯被迫出兵佔據了鄰近國家，一方面更縮少了資本主義的市場，另一方面給這些國家的改革以若干推動，因而增加了對資本主義的威脅；（三）歐洲各國正大踏步走向十月之路，不管克里姆宮怎樣放棄了十月革命的傳統，但十月革命總還是一個榜樣，要割斷十月之路，必然要加緊打擊蘇聯。由此看來，我們不難明白：以美國爲首的資本主義，於戰後，何以更要竭力來對付蘇聯了。

爲了準備進攻蘇聯，美國必須組織西歐集團，把牠放在自己的指揮之下。要有效地達到這，美國便不能坐視歐洲的騷動，不能容忍蘇聯勢力的擴張，不能看着歐洲市場一蹶不振，總之，不能讓歐洲的危機發展到不可收拾。牠非穩定歐洲的局勢不可。而穩定歐局，就必須先從經濟上援歐，馬歇爾的援歐計劃，目的就想『緩和歐洲的經濟恐慌，藉以避免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機』，同時以『關稅同盟』在經濟上包圍蘇聯，以便最後在軍事上進攻蘇聯。

還有一點，也是促使美國急於要援助歐洲的。美國爲要增加其資本與商品的輸出，對於歐洲的穩定也同樣感到急切。牠需要對外剝奪更多的利潤以緩和國內的危機，如果歐局動盪不定，無疑給美國的輸出以莫大的影響。光只這一點也足以說明何以美國不能坐視歐洲面對着的經濟與政治危機了。

歐洲又在急劇變動中

歐洲的危機所表現出的無出路狀態從來未有像今日那樣明顯的，這已經不是一種行情性的危機，而是一種廣泛和深刻的社會結構性的危機了。戰後歐洲的生產已不及戰前二分之一，普遍的通貨膨脹反映羣衆生活水準之一落千丈，愈來愈陷於極度貧困中。資產階級爲了要彌補在戰爭中的深刻傷痕，沒有一個國家不向羣衆身上打算，而羣衆呢，當然也日益感到這種局勢之無可忍受，相繼左傾，因此階級矛盾也就日益尖銳起來。

一九四三年，歐洲的工人羣衆已經開始抬起頭來，往後便愈來愈活躍，一次再次的總罷工，表現出一種重新結集的力量與資產階級的抵制相抗衡，而且有壓倒之勢。我們不是已經看見，歐洲好些國家如法、意、比等的工人階級不是力圖解決其歷史的任務而採取了獨立的組織行動嗎？但這些革命的行動都給史太林黨及其他改良政黨阻止了，雖然未曾完全擊敗，却使工人羣衆沉默了一時，限於一些零碎的經濟鬥爭。然而，歐洲的革命浪潮正如拋物線之向上一樣，工人的潛在力量在某種刺激下，立刻又要發揮出來的。

最近法國，特別是義大利，又發生了大規模的罷工潮，據聯合社十六日的報導：『意大利罷工工人達二百萬名，均因物價高漲，要求加薪……』。這一次大罷工據合衆社報導則是『造成了意大利史上最險惡之勞工不安，達到推翻略斯貝里內閣之目的』。根據這些時斷時續的零星消息，我們雖未知其演變之詳情，但有一點是可以斷言的：意大利的工人，像歐陸各國的工人一樣，他們的鬥志仍然保存着，現在他們不僅不願再忍受生活的高壓，而且已提出了政權問題。他們時刻在準備着，一有機會又要向資產階級宣戰的。

至於法國，工人羣衆的鬥爭也不斷起伏着，戰爭帶來的飢饉把法國工人推送到歐洲工人鬥爭的最前面，『聯合政府』的建立一度阻止了工人的進攻，但工人並未因此而退却，仍然保持着強大的戰鬥潛力，這種潛力時刻足以威脅資產階級的存在，最近又常以罷工向現存政府表示他們之不可欺侮。法國和意大利，已成爲今日歐洲革命的焦點。

救急的時間表會快嗎？

美國已深深的感到歐洲的危機在急劇的變動，援歐已是刻不容緩，馬歇爾於九月十日已在國務院正式聲明：『在馬歇爾計劃生效之前，尚需要採取臨時援歐計劃，以應付當前不可容忍的飢寒威脅』。並要求議會採取行動，經濟事務副國務卿克萊頓亦會自歐洲急電華府，『要求召集特別議會，票決二十五萬萬元之急』。從美國這樣的着急與焦慮看來，亦可窺出歐洲危機嚴重的程度了。

歐洲的危急和美國的援救似乎在賽跑中，但救急遠落在危機之後是很顯然的。飢饉的洪水在歐洲之迅速蔓延，美國要着手搭圈籬來阻止如何來得及？雖然如此，美國仍想竭力挽此狂瀾。所以馬歇爾於九月十日召開特別議會，以通過『又』急電密蘇里號主力艦上之杜魯門，要求十一月召開特別議會，以通過對若干國家之緊急援助，其中尤注意法意二國。這是必然的，不救歐洲即等於不救自己。美國特別注意法意二國，只因爲該二國的形勢比之大陸其他國家更不利於資產階級的統治吧了。時勢的發展如果是更趨嚴重的話，美國的援歐也許還不及到十一月的特別議會時呢，那時，『如美認爲有利時，則對施用武力，亦並無遲疑』。

美國並非不知道，歐洲危機的原因及其可能發展，而且一定明白，這可能的發展對於世界的政治形勢有若何的影響。美國商務部長哈里曼於十五日已說出了這一點，他說：『吾人皆知共產主義的計劃爲於適當機會奪取政權。這一適當機會即爲混亂狀態，而飢饉爲造成混亂狀態的原因』。據說，馬歇爾及陸軍部亦已認定：『倘法意二國現政府垮台，將推翻地中海的均勢，推翻中歐的均勢，嚴重影響希臘的局面，使德境美軍受不友好國之包圍，使英國因此湧起左派的騷動』。(合衆社十五日電)美國不能容忍危機破壞歐洲的均勢，更不能容忍因危機而引起革命。

歐洲的危機愈深，階級關係便愈緊張，資產階級的統治便愈動搖，美國援歐之心也愈切，因此，美國加緊援歐是勢所必行的。

踢開阻礙前進的絆脚石

歐局的發展不成問題的將必推使工人走上決定性的新的鬥爭，而這一鬥爭之能否獲勝，則須看工人階級能否拋棄對史太林黨、社會黨等改良主義的幻想了。

工人羣衆於戰爭以後，傾向於改良主義的政黨是很自然的，從客觀的因素說，羣衆初期覺醒之不足誤認了這些老的工人大政黨的改良主義就是他們所要求的反資本主義的改革，因而羣衆相向往。從主觀的因素說，真正代表羣衆利益的革命黨尚未長成，羣衆得不到正確的領導，使史太林黨等改良主義更發揮了牠的欺騙性。因此，直到現在，歐洲工人羣衆的鬥爭，都在史太林黨等改良政黨控制之下，因爲這種控制，幾次三番的羣衆革命行動都給阻礙了，打斷了。事實表現得最清楚不過，在每個鬥爭之前，這些改良黨派不是羣衆的真正領導者，而是羣衆前進路上的絆脚石；不是幫助羣衆走上政權，而是限制羣衆於壓迫的機構之內，所謂聯合政府之類，就是這種反動政策的最出色的表演之一。

工人羣衆雖缺乏如資產階級的教養，可以受騙一時，但在不斷的實際鬥爭中，羣衆發現這些改良黨派之無望，由無望而不信任，由不信任而揚棄。我們可以斷言：上升中的歐洲羣衆鬥爭，不要獲勝則可，如要獲勝，必須首先把成爲他們絆脚石的改良黨派踢開而且必然一定要踢開的。

馬歇爾們救不了歐洲

史太林等改良主義的黨派，既不能引導歐洲工人階級向資產階級作戰，走上政權，這是不反證了馬歇爾計劃將能穩定歐洲資本主義政制，並使之繁榮呢？那大大不然。美國之緊急援歐，即使能把歐局緩和一時，但決不能解決歐洲的根本矛盾。原因很簡單：任何僅限於資本主義範圍內的辦法，要想拯救行將入木的歐洲現存政制都是徒勞的。很久以來歐洲的混亂，飢饉和不安，已經表明牠日暮途窮，不能再前進一步了。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把歐洲從水深火熱中搶救出來，但這正是美國所極端害怕的，也是史太林等改良黨派所極不願爲的。

唯有革命才能解放歐洲的生產力，使之前進與繁榮。但今天，馬歇爾正準備以其美元撲滅醞釀中的歐洲革命，史太林官僚們則以機會主義的辦法從事幫忙，二者之能否使歐洲得救已明如指掌。

如果拿民主黨參議員鮑特的話來說：『美元不能爲世界百病的萬靈藥』。已經病入膏肓的歐洲資本主義，即使一百九十三億美元是『百病的萬靈藥』，對此亦將束手無策，何況美國亦將要自身難保，牠連自己也將不能醫治。同樣，改良主義那張溫和的藥方，又怎能去醫治這種急症呢。美元和改良辦法將必然爲羣衆的浪潮所傾覆。

因此，我們可以肯定的說，能够挽救歐洲免於崩潰的，絕不是馬歇爾的援歐的計劃，也不是改良主義黨派的改良藥方，而是歐洲工人階級的自覺行動。歐洲的工人階級究竟在何時才能起來自覺地進行堅決的行動呢？那將由主觀和客觀的聯合來決定，但堅決的行動是不可避免的！九月廿二日

對日和約的問題，最近在美蘇之間已形成了尖銳的矛盾：一方面，美國

主張召集與遠東問題有關的十一國代表會議來立刻簽訂對日和約；另一方面，蘇聯則堅持由美蘇英中四強取得一致來解決這一問題。美國主張召集十一國代表會議解決對日和約的表面理由，是防備蘇聯在這一問題上使用『否決權』，使對日和約無限期地遷延下去；而蘇聯則害怕美國利用十一國代表會議的『多數』（三分之二）來壟斷日本。這顯然是世界範圍的美蘇矛盾在遠東的一種正面而尖銳的表現。但這一矛盾却深深地將中國政府當局也轉入其中！中國政府當局本來在許多國際問題上一向追隨美國的主張，這次在對日問題上，由於恐懼日本在美國縱容之下復興起來，却採取了保留『否決權』及附和蘇聯堅持『四強』共同一致來解決日本問題的態度了。

很明顯地，美國的用意是在依照它戰後一貫的計劃立刻簽訂對日和約，以便儘速安定日本的經濟和政治，扶助它成為相當有力而供其驅使的遠東利益的支柱者，反蘇的堡壘和急先鋒。無疑地，這是日本資產階級，被打敗的帝國主義者，所極願走的道路。因為它們深深覺到只有在美國的扶植下，在未來的反蘇戰爭中，才能找出『復興』的前途。兩年來麥克阿瑟將軍對日本的全部措施，以維護天皇的傳統地位，用民主的面幕掩飾日本資產階級帝國主義殘餘勢力的統治，用美元或其他物資穩定和恢復日本的經濟，最近且公然主張將日本的生產力恢復到一九三二——三四年的水準，即恢復到日帝最繁榮時代的水準；同時，日本資產階級對麥克阿瑟的措施不但唯命是聽，且為之歌功頌德；——這一切都充分證明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資產階級是各自有計劃地在準備着走上同一的前途——反蘇戰爭！

這種情形，凡稍有政治頭腦的人都看得清楚，蘇聯的當權者自然更深切地感到恐懼。於是克里姆宮的主人也就不得不堅持他在西方問題上所慣用的唯一法寶，——『否決權』來拖延對日和約的簽訂了。可是，蘇聯的『否決權』在西方既只能拖延問題的解決，引起糾紛的日趨嚴重，在遠東當然更不能有較多的成就。我們相信，美帝國主義既已在軍事上完全佔領了並控制了日本，不管蘇聯願否參加簽訂對日和約，美國的反蘇計劃是決不會因此而停止的。相反地，正因為蘇聯的拖延政策，美帝國主義更將加緊地進行它的反

對日和約應有的態度

江濤

蘇陰謀，迫切地準備反蘇戰爭。

如果從中國方面說來，為了害怕日本在美帝國主義的扶植之下『復興』起來重行侵略，因而簡單地附和蘇聯召集『四強』會議解決日本問題的主張，或簡單地堅持在對日和約上保留『否決權』，那是沒有什麼意義的。因為這至多只能拖延對日和約的簽訂，可決不能防止美國扶植日本成為反蘇戰爭的急先鋒。倘使反蘇戰爭一旦爆發，不但日本帝國主義者一定乘機拾起頭來，中國——尤其是東北和整個的華北首先將成為最殘酷的屠殺場！

要想真正防止日本成為反蘇戰爭的堡壘和急先鋒，要想真正防止日本帝國主義『復興』成為對中國的再度侵略者，唯一的可能只有讓日本的工農大眾自己獲得徹底的解放，走上政權，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假使日本工農大眾一旦建立自己的政權，不但美帝國主義絕對無法利用日本成為對蘇戰爭的急先鋒，並且美帝本身亦將受到致命的打擊。至於中國民族呢，那時不但絕不會感到日本侵略的威脅，而且定能從日本獲得真正的援助了！

但要日本工農大眾獲得真正的解放，首先必須讓日本從現時美國的軍事統治下解放出來，同它簽訂一個『不割地，不賠償』的真正的和平條約。因為只有如此，日本的工農大眾才有可能去肅清一切帝國主義的罪犯，去掃除天皇制度的遺毒，去沒收財閥的財產，澈底剷除帝國主義的根基，去建立真正和平的社會制度。

華爾街主人的對日政策，主觀上既是為了反蘇戰爭，而客觀上又必然會扶植日本帝國主義的重起，無疑地是絕頂反動的。克里姆宮主人對日政策，雖然主觀上是企圖阻止美帝壟斷日本作為反蘇急先鋒，但牠既已完全放棄了十月革命的傳統（如列寧對戰敗國不割地，不賠償的主張），放棄了贊助日本工農大眾的澈底解放，那在客觀上便只能加緊促進美國的反蘇戰爭，讓日本帝國主義者獲得重起的機會而已。因此可以說，克里姆宮的政策與華爾街的政策，在本質上是相反相成的。

為了中國民族真正解放的利益，為了蘇聯社會主義財產制的安全，為了全人類免於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國民族不但應該堅決反對華爾街對日政策的陰險企圖，而且必須揭破克里姆宮對日政策的反動實質。對日簽訂『不割地，不賠償，不駐軍』的和平條約，這是防止侵略，避免戰禍，創造遠東真正和平的基石，這是被壓迫的中國民族所應堅持的唯一正確的立場！

對日貿易的認識

竹雲龍

一、培養日帝政策之延長

七月廿四日，在美國操縱之下的「遠東委員會」

通過了關於日本臨時進出口政策之決議。且允許日帝使用其現在美軍管理中之金銀約值一億三千七百萬美元，以爲日本進出口貿易之循環基金。八月九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聯合公告，「爲加速日本經濟復興減少美國納稅人的負擔起見」，決於八月十五日起，開放日本「私人」之對外貿易。美國這種不顧一切反對的斷然行動，立刻引起中澳兩國的反感，尤其是中國的工商界，得知此項消息後，大起恐慌；而一般下層民衆，因爲曾經飽受日帝的迫害與剝削，時隔二年，創痛未滅，一旦聽得此項消息，對政府之一味聽命於美國，甚至不惜與敵國在未訂立和約前就開放「私」貿易，莫不反感。但今美國既已決定開放日本的國際貿易，加速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計劃，中國政府只好跟着美國走，不管經濟委員會小組的建議「保留」，不管立法委員的反對，不管工商界的反對，更管不了民衆的反感。

戰後，美國有計劃地在培養一個聽命於華盛頓的新日本帝國主義，一個對美國是殖民地而對別國則具有「輸出力」的國家，以便取得遠東的穩定，防止社會主義在這遠東唯一工業國中獲勝。最後，并藉以爲未來進以蘇聯的主要堡壘。日本資產階級戰後則非常聰明地特別向美國表示絕對的臣服，企圖在美蘇矛盾的緊張關係中迅速地強大起來會向美國不只一次地暗示應該武裝日本「防共」。

「昔日之敵，即今日之友。」帝國主義雖然有時要爲了利害關係大戰一番，但一旦勝負既判，美

國就急急乎去撐持那三個戰敗國（日德義），不惜供給大量救濟和借款，更拋棄了戰時曾經擬定的「澈底消滅軸心國生產力」的方針和計劃，轉而主張使三國迅速恢復生產力。爲什麼美國對同盟國受損害最深重的像蘇聯反而而不借一個美元，對敵國倒愛護得如此週到呢？理由很簡單：帝國主義在同一個行將崩潰的舊制度之上，不得不合力「防共」。

開放日本的國際貿易，是美國培養政策的新發展，中國政府之以「主動在我」作幌子的附和政策，實有其不得不附和的「外交」原因。

二、日帝的生產力與貿易計劃

日本是個輕工業國家，戰爭中她損失了八百萬紡錘，四百八十萬噸商船，現在只有五百萬紡錘（其現在工作的僅一百八十萬）和一百五十萬噸商船。但是她的發電廠大部份完整無損，鋼鐵工業尚存百分之七十，機械工業尚存百分之八十五，此數較「九一八」之前尚多五倍！她的造船廠全國還可以同時製造一七六艘輪船和二千隻汽艇。她沒遭受到德義兩國那樣的破壞，所以，戰後她還保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總生產力。

可是，日本是個缺乏煤、銅、礦砂、礬、鹽、和食糧的國家，沒有對外貿易，就不能使日本的產業活動。戰後日本工業的總生產量，據七月四日日本的白皮書記載：如以一九三五——三七的平均數爲一〇〇，則一九四六年九月爲三〇、四，十月爲廿九、四，十一月爲三八、八，十二月爲二七、七；一九四七年一月爲二五、四，三月爲三〇、八。生產量與現存生產力之相差如此巨大，根本原因，

就在原料和煤的不足。至於農業方面。一九三七年——三九年平均每年產米六千七百萬石，麥二千三百二十五萬石，但一九四六年產米僅六千一百萬石，麥一千一百五十八萬石。一九四六年農村耕牛共一百八十三萬頭，乳牛十六萬頭，馬一百〇七萬匹，豬九萬頭，家禽二千〇四十萬隻。較戰前耕牛減少百分之十五，乳牛減少百分之三十八，馬減少百分之三十，豬減少百分之九十一！家禽減少百分之六十二。每戶平均耕地面積，由戰前一步町減少至〇、八七步町。戰前日本人口半數從事工商業，半數從事農業，戰後工商業就業人數僅及戰前三分之一，農村尚維持戰前百分之八十的就業水準。

戰前，日本不但是遠東的輸出國，並且是全世界的輸出國。戰後，雖則她的工業受了損傷，還保持着對南洋各國及中國的優勢。一九四六年日本從美國輸入八十九萬包棉花，紡錘的工作數字即自一百五十萬枚增至二百八十萬枚。一九四七年初，日本的人造絲工業已恢復至一九三七年水準的百分之八三，本年上半年即輸出絲織品二百萬碼。一九四六年的日本對外貿易，完全由美軍總部統制，全年貿易百分比爲：美國輸入佔百分之九六，輸出爲百分之六九。對英國南洋及朝鮮中國均輸出棉製品。

關於對外貿易的計劃，日本政府已向美軍總部要求，以木船交換中國的食糖和布匹。另一方面日本已由蘇聯輸入焦煤一千四百噸，本年底前約共可輸入十萬噸，另外尚有蘇聯煤十一萬噸及木材二萬立方呎輸入，日本則輸出木船二九五艘。此外，蘇聯並希望獲得值五億日元的機器。又，日本計劃以紡織品及化學品與法國交換越南的原料，日本政府希望在以後一年中，取得六百十億日元之進口貨，較美國的擬定數多八十六億。

日本貿易局宣布：一九四七年上半年總輸出中，中國佔百分之十一，美國百分之十八，朝鮮百分之十六，英國百分之十，香港百分之七、八。輸物以瓷器為最多，佔百分之五十一，棉製品為百分之三十三，五金及機器共百分之二十一、九。進口以糧食為最多。一九四六年輸入食糧佔百分之七十。

就日本的對華貿易計劃看來，日帝預計對華出超五千一百六十萬美元。輸出人造絲，機械、陶瓷等，輸入煤、鹽、糖、大豆、獸毛、藥材等。

三 結 論

日貨之所以能向各地傾銷，因為日帝向來把勞動力價格壓得很低。如目前日本物價較戰前漲六七十倍，工資僅增三十六七倍，百分之六十六的工資必須消費於食物方面，可見工人生活的痛苦。以「飢餓的輸出」形容日本的對外貿易，一點也不過份。

美國主張限制日本的生產力在一九三〇——三四年的水準，換言之，限制日本的重工業，寬放日本的輕工業，如此美國可完全控制日本的生產。中國的工商界已有「表示」，要將日本的生產力限制至一九三〇年以前的水平，這希望當然不能達到，因為美國在有計劃地扶植日本作為遠東的第一號反蘇前鋒，當然不會過份壓低她的生產力。

現在，第一步勝利已讓日本帝國主義取得了，她已可越出物物交換的範圍，向各國（尤其是遠東）輸出輕工業製品，以便取得轉賬美匯而彌補其對美貿易的逆差。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美國的保護下，生產力將提高在一九三四年的水平，甚至還要高些！日本的生產力當然是中國工業的競爭者和打擊者，但是，如果以為停止任何中日經濟關係，就可以挽救中國的民族工業，那完全是欺人之談。即使中國禁止對日貿易，她最多也不過損失百分之十

五的貿易額，並未阻止日帝的發展，更不能防止與日帝的經濟發展俱來的侵略。何況政府越禁止對日貿易，走私也必越興旺，因為經濟關係百年來早已世界化，任何阻礙，決不能阻止經濟方面的貿易與投資等行爲，戰時敵對國家的經濟關係都經過各種孔道維持着，則停戰後更不可能以政治手段中斷任何國際間的經濟關係。再者，事實上威脅中國工業的不祇是日本，主要還是美國的生產力！如果對美國大開着門而對日本閉門就是「愛國」或「保護民族工業」，那只有小孩子才能相信了！因此，處身於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關係之中，生產落後的國家（如中國和蘇聯），其最好的對外貿易政策，並非對某等國的斷絕經濟關係，而是由國家實行有計劃的合理的對外貿易壟斷和控制。現時所施行的對外貿易控制，只能替小數官僚集團開關致富的機會，與我們所謂合理的對外貿易壟斷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事實上，反對開放對日貿易的呼聲，決不能阻止美國的斷然行爲，更不能說服唯利是圖的「正當商人」，「開放」已成事實，中國唯有應付「開放」，因為經濟關係是滲透一切的世界關係。因此，目前中國的對日貿易並非開放與否的問題，而是如何成立一個代表民衆利益的政府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經濟戰爭！逃避現實是幻想，虛無主義的空談也對事實毫無補助，只造成一種混亂的、人言言殊的、不知所云的局面，讓奸商和特權者在混亂中分肥。今日中國每一個大大小小的與社會有關的問題，都直接與一個徹底民主獨立的政府有密切關係，對日貿易問題也不能例外。只有一個對外完全獨立對內予絕大多數民衆以民主權利的政府，才能有獨立的保護本國生產力的貿易政策。

而限制日本生產力的「愛國」主張，其本質上更是不合理的反動主張。制止日帝的侵略，不能以為政治條約限制日本的生產力即可奏效，因為日本既有遠東最高度的生產機構，精良的技術人員和大批熟練工人，則壓制其生產力，無異於強制日本資本家以更殘酷的方式剝削工農，且因此而幫助日本資本階級製造反動的「愛國」情緒，使其於今後的侵略戰爭中增加許多力量。中國的狹隘愛國主義及其政策，結果適成爲日帝反動愛國主義的成因。要徹底防止日帝的再起和侵略，永遠解除中國的鄰邦的威脅，唯一的方法是：幫助日本的工農大眾奮起推翻現存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建立一個無剝削無壓迫無飢餓也必然是無侵略的國家。

侵略中國的基本原因，不是日本的高度生產力，而是日本的資本帝國主義制度！任何國家的對外貿易，是本國經濟生活的必然形態，不能任意中斷。明白了這二點真理，我們就有權利請求那些高聲吶喊「反對對日貿易」的「愛國」人士去研究一下：如何繁榮本國的與全球的經濟？在什麼條件之下？在何種制度之上？

真理雖然深奧而澀苦，但美麗動人的空話却是毫無用處的！

一九四七、九、十八。

向讀者呼籲

本刊自誕生以來，一年半當中都不斷在經濟困難裏掙扎。幸而由於一羣熱心文化的朋友底經濟援助，以及青年讀者底努力推銷，使我們得以勉強支持，按期出版。現在，更大的困難又臨到我們的面前了：印刷、紙張等費用愈來愈飛漲，但我們的售價又不欲按成本而提高，因爲這必然會增加許多經濟困難的讀者底負擔。在這種難題面前，如果得不到廣大青年朋友的援助，（從捐款到推銷）則我們無論如何努力，也是獨力難支的。因此，我們迫切地向愛護本刊的讀者朋友們呼籲，請把你們那雙富有熱力的手伸給我們，使這新起的聲音，不致寂靜下去！

蘇聯的婦女

克利夫著
曉瀾譯

人類進步的程度是由婦女的地位來測量的。當不平等盛行的時候，甚至生理上的不同也成爲壓迫和特權的根源。因此，如果我們考察蘇聯婦女自十月革命以來地位的變遷，便可明瞭在這一時期中整個政治機構的變遷。

一 十月革命給了婦女什麼？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和二十日，出現了列寧簽字的兩條法令：『關於解除婚約』和『關於公民結婚，子女與結婚登記』。這兩條法律剝除了男子在家庭中的統治特權，給予婦女以完全自由去選擇她的配偶，並且以自覺的權利去決定她的姓氏、定居地和公民資格。任何人都無權使另一人違反自己志願地爲婚姻所束縛，並且在需要時，任何人都可有離婚的自由。法令上又繼續解釋：俄國社會是貧窮的，沒有充分的各種兒童設備，因此有離異的情形時，父親必須負責給予贍養費。

在法律上登記和未登記的婚姻之間毫無任何分別，一個未登記的婚姻所生子女，與其他登記的婚姻的子女有着完全同等的權利。假如男子和其妻分離，所有的財產便由兩人平分。

既然生兒育女是與生活的狀況有着密切聯系，而社會沒有任何權利阻止生育孩子的婦女決定她是否應該有孩子，相反地却應幫助她得出一個解決辦法，因此，允許一切婦女在懷孕的最初三個月內可以墮胎。（在這一方面，國家盡力深入俄國最偏僻的角落，以完成這些決議的實施；因此滿裝控制生育的必需物的專車行遍了全國各地。）懷孕的婦女在生產前後各得到八個星期的休假，工資照付。

因爲當時俄國的窮困，這一切法令（其目的是給婦女以平等地位）不能完全實行。育嬰院是很稀少而又只有極少數的幼稚園，並且，最明顯地缺少的是公共廚房——牠們本可代替私人廚房以省去其勞役。史大林官僚專政漸漸地損毀了老布爾什維克在革命後，爲達到男女平等目的而公布的所有法令。

二 回復到資本主義家庭制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七日公布了一條法令，制定徵收離婚費：以前只收三個盧布的費用，而現在一對夫婦第一次離婚必須付五十盧布，第二次離婚則須付一百五十盧布，到第三次及以後者須付三百盧布。

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發布的一個命令如下：『將來的離婚請求者必須申述他們的理由，並須使法庭滿意，認爲這些理由是嚴重的，且有確實根據的。雙方必須親自到一個低等法院出庭，讓法庭聽到一切的見證，然後再來決定法庭或能作成雙方的妥協。如果確信妥協爲不可能，便將請求書交給一個較高的法院。證人們必須在兩個法院中出庭。』這同一法令將離婚費增加到二千盧布。這樣使離婚的負擔遠超越在一般工人的可能範圍外，很快便可使人明瞭，當他記起了工資的標準，那是包括了每人的薪給，從指導員的最高工資到不熟練工人的最低工資的平均數，在一九三七年是三千四百六十七盧布。（我們沒有一九四四年的數字）。對於俄國社會的上層份子，二千盧布不過是一個小數罷了！

七月八日的同一法令更廢止了不登記的婚姻，牠宣布說：只有登記的婚姻所生子女對他們的父親有合法的權利，並且只有合法結婚的人有領津貼，遺產和贍養費等的權利。

法庭不承認任何一個未正式結婚的婦女的要求，不爲一個新生的孩子從其父親得到贍養費或其他任何扶助而考察他的父系。孩子們都必須承用爲一家之首的父親的姓氏。『一家之首』這幾個字在一九三七年

國際 爪哇 抗議美國助荷的兩個文件

編者按：我們曾在上期刊載一篇抗議書，爲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詹姆士·加農致杜魯曼總統的，這電報對美國幫助荷蘭在印尼使用飛機大砲等軍用品一事，表示強硬抗議。現在，爲使讀者充分明瞭革命黨對殖民地戰爭態度起見，我們將國務院覆文及加農的駁覆聲明譯載於下：

美國務院對抗議的答覆

你們七月廿四日的抗議電報，我們業已收到。你們認爲這些物資，原是供給荷蘭政府來幫助戰爭進行的這種假定，倒是正確的。租借法案裏也確曾規定，每一政府，都保有權利來收回任何租借軍火，物資及戰爭工具。然而，這法案裏也同樣的包含有這樣的條例，即各國政府都明白表示，並不一定一般地實施這項權利。

美政府對於印尼問題的態度，過去是，現在也是，提供適當的幫助，務期印尼及荷政府，能在三月廿五日簽訂的林加牙協定之基礎上，解決了雙方的爭論點。美政府曾好幾次敦促雙方以友好妥協的精神來達成協議，並且在本年七月廿一日，有鑒於印荷雙方已破壞了一切自願協調的可能，我們曾公開地表示非常遺憾。

像你們所知道的，印荷問題，已由澳洲及印度政府提到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安理會曾向雙方呼籲，停止敵對行動，並以仲裁或和平的方法來解決紛爭。美政府曾盡其最大的努力與誠意來緩和雙方的分歧，這種努力一貫遵循美國既定的外交政策，即與安理會的行動一致，來達成和平，並在雙方自願協調的基礎上解決了問題。

加農駁覆亞摩爾的聲明

你八月六日的答覆，迫使我重複提出這個正當的請求。以國務院的名義，你已承認了以下基本事實：（一）

的戶口調查表還是沒有的。或許那便是爲什麼雅哥夫勒夫，一九三七年戶口調查部長，及他的助手被目爲托洛斯基主義者而開除去的理由！在一九三九年的戶口調查中，這個『錯誤』被改正了！這些年頭的俄國報紙都充滿關於馬克斯與恩格斯家庭生活的桃色故事；他們忘記了恩格斯的婚嫁是從未登記過的呀！

三 宣傳僧侶式的道德與禁止墮胎

在『給父母們的信』一書中，著名的冬烘先生AS馬加倫科在一九四〇年寫道：『……社會道德要求性生活須以結婚來約束，婚姻則是男女的公開結合以達快樂和生育兒女的目的。』

一九三五年七月廿七日的青年報紙『Komsomolskaya Pravda』寫道：『家庭以外的性生活』驅使我們走到卑鄙污穢和野蠻。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一報紙上，攻擊青年男女的亂婚，而以榮譽與尊敬來稱頌女孩的貞潔。全部的史派報紙都跟隨着這一路線。

墮胎之風俗於俄國可從莫斯科Statistical Review(一九二九年)的以下數字而得明瞭。莫斯科人口的每千人中，一九二五年有三十一·六出生，九·七墮胎；一九二六年，二九·七出生，十六·三墮胎；一九二七年，是二五·六與十九·二；一九二八年是二十二·七與二十七·九；一九二九年是二十一·七與三十五·二。這種墮胎的原因很明顯是經濟上的，並且只有兩種方法才能使他們的數目降低：(一)改善人民經濟狀況(二)用嚴厲的方法壓抑生活上最不可了的現象，史大林派官僚層選擇了後者。

一九三六年六月廿六日，宣佈墮胎爲犯法，上層社會的婦女，自然會有其逃避這法律的方法，身受其害的祇是工人的婦女。『Pravda』報紙，在說明這法律的理由時，是極盡其矯飾之能事的：『……一九二〇年的決定可以修改，因爲俄國已廢除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物質情況已經改善，工人政治文化水平亦有驚人進展』(一九三六年五月廿五日)假如生活真的變成如此美滿，還用得着這種禁令嗎？

四 特權與卑鄙是同時存在的

史太林派的國法，並不以此爲止；對於沒有結婚的人民和膝下猶虛的夫婦，却要科以罰金，相反的，子女成羣的夫婦可以得到賞金。詳情如下：第三個孩子每個賞金四百盧布；第四個孩子賞金一千三百盧布；每月津貼八十盧布；第五個孩子賞金一千七百盧布；津貼一百二十盧布；第六個孩子賞金二千盧布；津貼一百四十盧布；第七第八個孩子賞金二千五百盧布；津貼二百盧布；第九第十個孩子賞金三千五百盧布；津貼二百五十盧布；十個以上賞金五千盧布，津貼三百盧布。

廢除墮胎權利的代價是多麼可憐呢，引『Pravda』上的一小段話，已足夠顯示給我們看『慷慨』的限度了。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七日它這樣說：『少年管孩子們的費用，不許超過維持生活所必需的——二百五十至三百盧布一月。列寧領導布爾什維克的時候，規定孕婦在生產前後各有八星期的休假，工資照付，一九四四年七月八日的法令規定產前產後有五星期，產後六星期，而且祇有在同一地方工作了六年才能工資照付，如工作了三年至六年的，八折；二年至三年的六折；一年以下則爲五折。』

從全國健康人民委員會的訓令裏，可以清楚地顯示出史派官僚對工人婦女是所落到怎樣高貴的程度，它禁止醫生診斷婦女的月潮來時，核准假期(一九四〇年的Obzor Sotralavov Strakhovaniya)同樣的高者在史派貴族婦女烏給，L'nestia，要求傭僕不許離開監守的信上表現出來。

娼妓是任何社會的罪惡淵藪。這並不是偶然的，在一九三七年戶口調查書中，包含了傭僕，流氓，娼妓這幾項職業，但數字沒有公佈出來，而一九三九年戶口調查書中並沒有這幾項，這一事實本身已足夠說明那是怎樣的一回事了。由莫洛托夫夫人領銜的上層社會婦女，却是香亦托拉斯的主要傭客，她們要是懷孕的話，當然無須工資照付的休假，幾千盧布的離婚費，在他們不過是滄海之一粟，而且她們自有其蒙蔽法令的方法，總之，祇有工人，特別是女工，才蒙受這苛刻法令之害吧了。

荷軍確已使用租借項下的軍火，裝備以反對印尼人民。(二)這些軍備原是供給荷政府的，但在嚴格的規定下，禁止它用以違反大西洋憲章。(三)租借法案中確有如此規定，即有權利要求收回任何租借物資。

這些意見，你不能認爲祇是我們這方面的假定或臆測，相反地，他們純從你們官方的文告與國務院明文公佈的政策中，做出的結論。

你八月六日的答復，只能說明，杜魯曼總統與國務院已完全拒絕了引用『收回租借』的條規。

你們的拒絕是依據於這種見解的：即租借法上另有一條，說明美國已保證並不『一般地』實施這權利，於是這條規便宣告無效了。

我不能接受你這種論據。因爲這裏所涉及的，並不是什麼『一般化』的問題，而是十分特殊的，侵犯租借法案與違反大西洋憲章的問題。

假使在這樣嚴重的問題上，即明目張膽地侵犯那些爲尋求無恐懼自由、獨立自主、免於殖民地主義及專制統治而鬥爭的印尼人民的權利這個問題上，不能援用『收回租借品條例』，則當在什麼時候才加以援用呢？

當然，國務院並不是不知道，對它不利的輿論正漸次在生長中，它們視大西洋憲章及其時常宣佈的崇高目的爲另一團紙片，並不比戰時其他許多外交上的文件，含有更重要的意義。國務院，如在印尼問題上，仍不能遵守其隆重諾言，則更確定了這些輿論的真實性了。你說，國務院並沒有袖手旁觀，而是積極地干涉印度尼西亞的局勢。但是這種干涉，顯然純屬片面的——他的援助，並不給予被迫作戰的印尼人民，而是給予企圖以刺刀重建殖民地統治的荷蘭。

不久之前，世界銀行貸款荷政府一億九千五百萬美元。這樣的行動，如沒有取得國務院的同意與默契，是決難實踐的。印尼人民非常確當地，把這種貸款看做無異於加贈奴役者的魔手。我知道，國務院並不準備再貸款印尼共和國了。但我要問：爲什麼不呢？

在維護這些獨裁政權國家，像希土等國的獨立名義之下，總統與國務院都毫不躊躇地請求國會貸款億萬元。現在，有什麼理由，拒絕貸款給這正在爲自己的獨立而奮鬥的印尼共和國呢？

這個明顯的對比，更增加勞工階級對政府外交政策的不信任。

只要國務院的行動繼續違反其公開的諾言，則必遭受美國人民及全世界輿論的斥責。

信箱

蘇聯到底有沒有民主

編者先生：我首先應向你作一點自我介紹，讓你能瞭解我。我自高中畢業後，因為家境突然衰落，（那是由於戰爭所致）就失學了！那還是在敵偽統治時代。正因為敵偽統治的殘酷，同時我又失學，弄得走頭無路。於是經過一個同學的介紹，我便踏進了解放區——蘇北的某縣城。我在那裏住了將有一年，和平便到了，於是我又獲得了機會重新回到了上海。

我在「解放區」所親身經歷的生活，所目見耳聽的事實，說來太長，俟有機會再說。但有一個問題却使我感到困惑，甚至痛苦，無由解答，那就是：「革命黨內部的民主問題」。因為我一方面常常從共產黨人的文字和演說中，看到和聽到要求實現「民主政治」；甚至在「解放區」已經實現了「真正的民主政治」；但在另一方面，「解放區」所表現的事實都是異常不民主的。例如：我有一個親近的朋友，他同我一樣，雖然還未正式加入共產黨，但却熱烈贊成共產黨，並自願到「解放區」來吃苦奮鬥。可是有一次他在一個集會上提出了幾個關於政治的問題：如「打敗日帝後是否可能成立聯合政府？」（因為那時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已在「解放區」散發了！）戰後，歐洲是否有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共產黨在淪陷區是否準備奪取政權？！當問到還未曾說完時，主持會議的主席（當地共產黨的領袖）却憤怒起來對我的朋友說：你怎麼提出這樣的大問題！你應當知道：建立聯合政府是我們最高會議所決定，而且為毛主席所詳細而正確地解釋了的。你怎麼還敢於懷疑呢！我問你：你究竟代表一種什麼傾向在這裏說話？！你甚至於還要問什麼戰後歐洲有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你應當知道：我們這裏是切切實實地作抗戰工作，不許人家到這裏來散佈懷疑主義或任意搗亂的。經過這一番訓斥後，全場空氣緊張，令人恐懼，而且第二天，我的朋友就被調到一個什麼地方去了！後來據說：他的生命已成了問題。但這並非單個的故事故事，在「解放區」像這類的例子是頗為普遍的。因此，我對於共產黨所說的「民主」懷抱異常的反感。我在「解放區」將近一年的時間是在沉默和恐怖中渡過的。

但我應當聲明：我對於社會主義是十分相信的，我直覺地認為在我們這個充滿了腐爛和災禍的社會裏，除了社會主義外再不能存救藥了。我尤其相信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成就。可是最近偶然從朋友處看到了貴誌第二卷的幾期，見其中不少地方批評到蘇聯，又令我發生困惑。我深感到對於蘇聯的情形知道得很少，更感到不深刻，但我準備進一步研究，并極願請教先生。現在我這裏提出一個問題，蘇聯共產黨是否同中國共產黨一樣，也是那樣沒有民主的？列寧主張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樣的解釋？其實現在蘇聯的情形又如何？我認爲這問題非常重要，想先生不致吝於指教吧！敬頌

李覺民謹啓九月十一日

覺民先生：讀過來信後，我們對於你所敘述的關於前蘇北「解放區」的不民主的「故事」，感到很大的興趣。尤其是你不因為對中共的不滿而放棄你的根本信念，更表敬佩！你說，你願意同我們研究蘇聯的情形，我們自然是願盡其所能來同你討論的。因為蘇聯問題不僅僅是蘇聯本身的問題，而是與現今整個國際局勢及其前途有鉅大影響，乃至有決定關係的問題。同時，正如紀德所說：「關於蘇聯的實話，往往被人帶着恨說出來，而謊言則被人帶着愛說出來」，以致人們對於蘇聯的真相很難於獲得正確的瞭解。但也正因此，凡是真正關心於今後蘇聯和全人類命運的人們，更必須認真地來研究蘇聯，以便正確地理解它。你這次提出：「蘇聯共產黨是否同中共一樣，也是那樣沒有民主的？」列寧主張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樣的解釋，其實現在蘇聯的情形又如何？」這幾個問題，可以說已經接觸到理解蘇聯問題的鎖鑰了！因此，我們更樂於和你討論。

首先，讓我們從列寧所主張的「民主集中制」談起吧。其實，「民主集中制」並不始於列寧，馬克思遠在列寧之前就已經提出來了，而列寧不過是繼承馬克思的傳統思想，并特別加以闡發和運用，以此在俄國建立了布爾塞維克黨第一次達到偉大的成功而已。依馬克思和列寧的意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裏，由於生產的集中化和階級矛盾的尖銳化，一個被剝削和被壓迫的階級要想獲得徹底的解放，必須有一個具有創意外和紀律的革命黨。但要發揮創意外精神，便又必須黨內有充分的民主，即一切黨員毫無例外地都有發表自己的意見，以及互相討論和互相批評的完全自由。可是黨員們發表意見的行動，以及互相間的討論和批評，其目的只是為了革命的行動；但要行動，又必須有嚴格的紀律，必須有集中的領導，務使一切黨員的行動統一起來，向同一目標前進，以便獲得勝利。因此，當討論重要的政策或問題時，每一黨員都有權自由發表自己的意見和批評他人的意見，但當政策或問題一經黨大會多數通過之後，在實踐上任何黨員都應遵守共同行動的紀律，則令不同意，亦應以少數服從多數。但另一方面，如果「少數」認爲「多數」通過的政策仍然是錯誤時，「少數」雖在行動上得服從「多數」的紀律，在思想上却還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要求繼續討論，以便爭取「多數」；改變黨的政策。一個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假如沒有「民主」，便絕不能發揮黨員羣衆的創意外精神，勢必流於官僚主義的統治。反之，如果沒有「集中」，便絕不能有步驟一致的革命行動；其結果將形成渙散而無力的無政府狀態。「民主」和「集中」，其本身則是辯證的統一，這對於革命政黨的內部結構說，是絕對必須的原則，沒有此種原則，革命政黨的組織是絕對無法存在的。自然，革命政黨還有一個政治上的前提，那就是革命的理論和政策，沒有此種理論和政策，革命政黨的組織便根本談不上。但革命的理論和政策，必須有「民主集中制」的政黨才能付諸實

行，而且也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黨內，革命的理論和政策才能繼續獲得發展的機會。

至於上面所述的『民主集中制』，其實現在蘇聯又如何的問題，那我們得把蘇聯歷史的演變分成兩個主要的階段來解答。我們可以說，在列寧領導的時代，『民主集中制』，無論在共產黨內，蘇維埃內，及職工會內，都是充分地靈活地『實現』過了。但到了史大林掌權的時候，『民主集中制』中的『民主』便日漸縮小，以至於完全被消滅，於是無論在共產黨，蘇維埃和職工會內，都轉變成爲『官僚集中制』，最後則形成了史大林個人的拿破侖主義的獨裁。因此，在現時的蘇聯境內，任何『民主』的影子都是尋不到的，有的只是純粹『格柏烏』的或『特務隊』的橫暴無比的統治。

爲了證明上面的判斷，爲了證明『列寧領導』和『史大林獨裁』兩個時代的完全相反，我們又得略徵引一些無可辯駁的事例來作見證。

例如：當布列斯特和約簽訂之前，布爾塞維克黨內曾掀起了最激烈的爭論：一方面，列寧堅持接受德國的條件，立刻簽訂和約；另一方面，布哈林和拉狄克等（所謂左派共產主義者）堅決表示反對，公開駁斥列寧的主張乃是背叛了俄國無產階級的利益，他們甚至以分裂黨來相威脅。但列寧對付那些『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只是從理論和事實上批駁他們，并以此說服黨員羣衆，爭取羣衆的擁護。僅由於列寧之無比的說服能力，最後終於獲得了羣衆的信任，黨內絕大多數接受了他的主張，以此合理地解決了問題。往後的『新經濟政策』問題也差不多是如此。在列寧開始提出這一問題時，黨內大多數人都表示反對或懷疑的。爭論的進行有如狂風暴雨。但列寧總是耐心地駁斥了他的反對派，并由此說服了黨員羣衆，因而他的主張最後獲得了黨大會的通過。『布列斯特和約』和『新經濟政策』不過是兩個著名的例子。其實，在列寧領導的時代，凡是關於黨內重大的政治問題和組織問題，都是經過黨員羣衆，從上至下和從下至上熱烈地毫無避忌地爭論過和互相批評過的。正因此，列寧所領導

的布爾塞維克黨是最富於創意精神，因而黨的政策也是最少錯誤的。不僅共產黨內部是如此，就是各級蘇維埃、職工會，乃至合作社內，無不充滿了民主的活潑的創意的精神。而且凡是黨，蘇維埃和職工會的領袖們，一般都是經過羣衆由民主方式選舉出來的。羣衆不但有權選擇領袖，而且可以批評領袖，攻擊領袖，乃至撤換領袖。在列寧領導的時代，任何領袖，連列寧在內，都沒有什麼特權，他們只能靠理論的修養，主張的正確及工作的努力來取得黨員和工人羣衆的信任，以此建立他們的『權威』，獲得他們的『地位』，別的法是沒有的。也是絕不容許的。最後，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凡是爭論問題時反對和攻擊列寧的人，絕不會因此受到懲罰的。相反地，只要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紀律，工作和地位都是照舊的，除非黨員羣衆表示不信任，那是另一問題。例如：在布列斯特和約和新經濟政策決定後，那些猛烈反對列寧的人，如布哈林、拉狄克等，都是照舊擔任他們的職位。至於因爭論或反對列寧的主張而遭受列寧的懲罰，在那時代連作夢也想不到哩！

可是，自列寧抱病後，尤其是自列寧逝世後，蘇聯的情形就一天一天地改變了。首先是史大林在黨內組織小組織，有計劃地排斥異己，特別是排斥托洛茨基。從那時起，凡是批評史大林的主張的人們都要遭到打擊。例如：當托洛茨基要求黨內的民主以反對史大林的官僚集中，提出『計劃經濟』以對抗史大林向富農讓步的政策時，不但托洛茨基遭到了打擊，被解除了紅軍總司令的職位，而且凡是贊成托洛茨基主張的黨員們都受到了各種各樣的壓迫。當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等在一九二六——二七年反對史大林對英國大罷工和中國革命的機會主義政策時，史大林根本就禁止將他們的主張在蘇聯黨和各國共產黨內進行討論，以此完全消滅了黨內的民主。而且不久就開除了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及加米也夫等老布爾塞維克的黨籍，將

他們送到充軍地，隨後，又將托洛茨基趕出了蘇聯領土。布哈林、李柯夫和托姆斯基等，也僅因爲和史大林個人的意見相衝突，遭到了季洛維也夫等同樣的懲罰。最後，到一九三六至三七年，季洛維也夫，加米也夫，布哈林，李柯夫，斯米爾洛夫，莫拉洛夫……幾十個著名的布爾塞維克領袖，十月革命的元勳，列寧的助手與合作者，都以『莫須有』的罪名，希特勒或日本間諜，給槍決了！至於其他因反對史大林的意思而開除出黨，監禁，充軍，槍斃或暗殺的人，數以百萬計。從此，無論共產黨，蘇維埃，職工會，合作社，集體農場內，都只能有『官僚的集中』，最後則『集中』於史大林一人身上；蘇聯內的一切都決定於史大林，史大林的言語成了『聖旨』，史大林的行動成了『準繩』，於是史大林便成了『上帝』，成了『太陽』。底下便是所謂白俄羅斯二百萬勞動者簽字歌頌史大林的詩篇：

「吾主聖明，吾主是天才中之天才！」

工人的太陽，農民的太陽，全世界的太陽！

江河的強力，勞動的光榮和驕傲！

在列寧時代，任何黨員都可以懷疑列寧的主張，批評他，攻擊他，甚至說他違背馬克思主義，背叛無產階級的利益，但沒有一個人，因此受到任何懲戒。到了史大林時代，凡是反對他的意見，敢於批評和攻擊他的人，不是遭槍斃，也得坐牢充軍。『吾主聖明，吾主天才中之天才！工人的太陽，……！全世界的太陽！……！』這一『天王聖明，臣罪當誅』的頌辭，僅僅是史大林獨裁下的蘇聯之一種無誤的反映而已。

由前面的敘述及引語中，你不但看到史大林統治的蘇聯沒有任何民主，而且你還可以由此理解：中共黨內及其所統治的『解放區』之沒有民主，正是從史大林衣鉢相承下來的。 編者九月二十日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六五號

每冊實售法幣三千元

新聲

三十週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羣音

俄國的「十月革命」，已整整地進到三十週年了！這革命第一次推動無產階級走上政權，並將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轉變為社會主義公有財產制，因而第一次給人類歷史開闢了一個新紀元，替人類前途創造了一個光明的典範。

列寧說：「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序幕」。這就說：它絕不只在俄國推翻沙皇和資本主義，建立蘇維埃工農政府，走上社會主義的體制為滿足，而且必須把這個革命推廣到各國去，直至社會主義在這個星球上獲得最後勝利為止。十月革命後成立第三國際，正是為了擔負這個使命的。實際上，列寧和托洛茨基領導的第三國際，確曾在理論和策略上建立了一個正確的路線，在組織上奠定了一個有力的基礎，且在最初的幾年中成了世界革命行動的眞正領導。如果按照這個方向繼續發展下去，它的勝利是毫無疑義的。

然而異常之不幸，自從那位偉大的導師列寧逝世後，史大林所代表的官僚主義即在蘇聯和第三國際整個體系中攫取了無上的領導地位，背棄了十月革命的傳統，創立了「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因而對內剝奪了無產階級的民主，排除和鎗殺了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對外則與各式資產階級集團乃至帝國主義者謀取妥協，希特勒握手簽訂「德蘇協定」了！最後，當希特勒撕毀「德蘇協定」而向蘇聯進攻時，史大林又卑躬屈膝地倒在「民主」帝國主義的英美方面來，並以解散第三國際為取得羅斯福信任的代價。這樣，以致在第二次大戰中及戰後，各國共產黨完全與社會民主黨骯髒一氣，癱瘓了各國反戰的革命運動。所有這些，都是史大林背叛十月革命傳統和列寧遺教之鐵一般的事實！正因為這一連串的反叛，便造成了戰後蘇聯遭受美帝以第三次大戰威脅的嚴重危機。這一危機，如果不能獲得全世界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的救援，則這個由「十月」所創造出來的人類歷史最光輝的產品——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將大有可能在原子彈的威力下遭到毀滅的命運。

但要挽救這一危機，只有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者團結在繼承「十月」傳統的第四國際旗幟下行動起來，把這業已腐爛透頂的資本主義送進墳墓，建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才有可能。但要走向這一前途，首先必須從史大林的官

364
11/1日

三十週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羣音
評法國市政選舉	鏡微
從杜魯門廣播看援歐計劃	唯康
第三次大戰與中國的前途	譚寬
蒲立特「訪華觀感」讀後	江濤
論九國共黨情報局的設立	劉乃光
老問題的新發展	竹雲龍
評「反蘇大陰謀」	旭東
中國社會究竟是何種性質（信箱）	吳世明

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確……吳世明

在二次大戰前，史大林曾企圖與英、美、法「民主」帝國主義建立「民主陣線」來反對「法西斯陣線」，阻止戰爭；但當戰爭真正爆發的前夕，他又與法西斯巨魔

僚機會主義的路線下解放出來，恢復馬克斯主義的傳統！這樣，我們紀念十月革命才有真實的意義。

評法國市政選舉

十月十九日法蘭西舉行了全國市政選舉，據巴黎二十日廣播：「法內政部二十日上午宣佈，選票計有四百萬張以上，戴高樂之法國人民聯盟獲其中百分之四一·五，共產黨得百分之二九·七，社會黨得百分之二〇·六，人民共和黨因戴高樂之興起，僅得百分之八·二」。由此已可清楚地看出：代表資產階級法西斯傾向的戴高樂派，在去夏的國會選舉中幾等於不存在的，在這次市政選舉中竟突然躍到了第一位；代表同一資產階級的民主傾向的人民共和黨，則從去夏選舉的第一位跌至第四位；這充分表明：法國資產階級是迅速地在拋棄「民主」而轉向法西斯主義專政的方向去了！

又據合衆社巴黎二十七日電：在一萬四千個人口不滿九千人的小市鎮二十六日第二次選舉中，「檢票結果，社會黨在議員及市鎮長之選舉中，均能居領袖地位。議席三萬七千六百四十六席中，社會黨得七、一六四席，戴高樂之同盟得三、二一四席，共產黨得二、二八〇席，皮杜爾之人民共和黨得一、四六一席，其他席數分散或左或右之聯合組織中。」這裏表明：社會黨雖是居於第一位，但戴高樂派亦已一躍而進於第二位了！而且據路透社巴黎二十七日電：「戴高樂派與社會黨已有默契存在，由社會黨在若干區域內支持戴高樂派，而由後者在若干區域內支持社會黨人任市長」。由此又可以

看出：社會黨之所以能在小市鎮選舉中獲得首位，不僅是由於它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傾向使然，而且還是由於與戴高樂派「默契」，雙方互相勾結的結果。總而言之，在法國這次的市政選舉中，代表法西斯革命傾向的戴高樂派已昂起頭來，並取得一個優越的「合法」地位了！

但另一方面，正當法國進行市政選舉之前，「巴黎公共汽車及地下火車工人之罷工已進入第六日」(路透社巴黎十八日電)。而在選舉中「代表全國一百八十萬公務人員之法國公務委員會，亦提出重

編等級之要求，並揚言於拒絕其要求時即行怠工」(路透社巴黎廿一日電)。現在「鐵路郵政又有罷工威脅」(聯合社巴黎廿七日電)。這又證明：法國的工人階級及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已在物價日益高漲和生活日趨困苦之下，只得經常以罷工來爭取他們的生存權了。如果用罷工的方法不能解決他們日益陷於窮困的生活問題，且事實上也將無法解決這一問題，這個廣大的下層羣衆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決生死的革命鬥爭的。但現時阻礙這一鬥爭的，便是法國共產黨。這個黨雖一方反對戴高樂派，但同時又頑強地留戀於法國的現存制度，有系統地抑制工人羣衆走向革命奪取政權的道路，始終企圖用「聯合政府」來挽救當前的危機，所以結果只是幫助了戴高樂的發展。

現在戴高樂在這次市鎮選舉中第一步取得勝利之後，便已趾高氣揚地要求「儘早解散國民會議」(路透社廿七日電)，希圖用「合法手段」來奪取政權了！但戴高樂之路上政權，便等於希特勒一九三三年在德國取得政權一樣，所帶來的不但是法蘭西的法西斯化的悲劇重演，而且將是反蘇第三次大戰的正式宣告。因此我們可以說，法蘭西的局勢已走近最危險的邊緣了！要挽救這一最可怕的危機，只有法國工人階級迅速從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改良主義的朦朧下解脫出來，進行生死的鬥爭，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鏡微)

從杜魯門廣播看援歐計劃

白宮最高級的政界及外交人員會議後不久，杜魯門總統即於本月廿四日宣佈：特別議會在十一月十七日召開。這樣，馬歇爾的緊急援歐計劃，便向實施之途跨進一大步了！

提前七星期召開議會的「迫切」理由，正如杜魯門在廣播中指出的，在於「目前需要太為迫切」——國外正臨危急階段，歐洲飢寒之災患，使今冬成爲歷史上決定性之時期。……吾人務必援助若干國家渡過此一迫切危機。最迫切之危機在法國及義大利」。因此，他籲請「立即行動」，首先指撥十一億元，以六億四千二百萬元資助法義，最後則

撥款二百億元，以實行整個馬歇爾計劃。

戰後歐洲經濟的畫圖，實在太黯淡了。歐洲各國已給第二次大戰破壞得一蹶不振，她們在來年的入超總額將達二十億美元，糧食的不敷在六十億元以上，煤的缺乏則近六千萬噸。這種貧乏已造成普遍的危機，尤以法義爲最。法義兩國最近政潮的湧湧，便是這種危機的反映和結果。而隨即到來的冬天，又勢必使飢餓更加嚴重到頂點，如果不及時加以援救，則「革命」的怪物便要出現，今後的歷史便被「決定」，或最少也被蘇聯的勢力「決定」了！(特別在歐洲九國共黨報刊出後，這可能更大。)華爾街主人對於這些是異常警覺的，所以赴歐觀察的軍備小組會主席蕭特報告說，「共產主義已在全世界引起不安」，「必需立即援助」了。

對於這個緊急援助計劃，共和黨在特別議會中「將採取合作而非伊事加蓋橡皮戳之態度」，這點已經由參加白宮會議的衆院共和黨領袖哈萊克說明過。這是以杜魯門保證不恢復物價管制爲條件的。因此，共和黨如採取積極合作態度，乃是杜魯門保護他們實際利益的結果。但國內物價現已如此「繼續驚人上漲」，杜魯門們又早在呼籲全國人民「束緊褲帶」，以節糧援歐；而在廣播之翌日，白宮又召集百多種工業的勞資領袖，商談這計劃「與勞工間的關係」，其目的更顯然是要工人們「束緊褲帶」，增加生產。由此看來，所謂節糧援歐，只是犧牲大多數民衆利益，來挽救資本主義舊世界的危機而已。但這種危機的深度是無底止的，任何計劃都只顯露其捉襟見肘的窘狀，而不能起根本救濟的作用；正如一個病人膏肓的人，不能才速用強心針來延長殘喘一樣，其病身終是徒然的。(唯風)

新聲(原名青年與婦女) 第二卷第八期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人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人 陳景光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第三次大戰與中國的前途

韻 覽

當殘酷無比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火燄熄滅之後，所謂民主陣線剛剛擊敗了德、意、日的軸心國的翌日，民主聯合國的內部矛盾和衝突，尤其是美蘇的矛盾和衝突，便明顯地暴露了出來，這會表現於戰後一切國際的事變和會議中。尤其自杜魯曼的援助希土反共法案及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公佈之後，美蘇的矛盾，更形尖銳化和白熱化起來；因而最近又有對抗此種計劃的所謂九國共黨情報局的出現。由此，在整個星球上的每個角落，都充溢着美蘇矛盾的氣氛，因而，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可怕的名詞，又更加強烈地活現於全世界每一個關心時事人們的腦海中，不管人們主觀上願意與否，大家都不知不覺地在估計着和就心着第三次大戰到底會不會爆發。我們這個曾經飽受長期戰爭痛苦，而且現時還在感受戰爭痛苦的中國民衆，對於這個關係整個國家前途的問題，也自然會注意起來。因而，『第三次大戰到底會不會爆發』的問題，便自然成爲各報章雜誌的重要題材和人們街頭巷尾談論的中心題目了。

三次大戰到底會不會爆發？

要判斷這個問題，決不能憑着人們主觀上的願意與否，而必須科學地客觀地從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結構、矛盾和變化的過程精細研究和分析，才能斷定在何種情形之下，會爆發戰爭；在何種條件之下，可能避免，甚至根本消滅戰爭。像賓符先生在『創世』第二期所著『第三次大戰會爆發嗎？』一文的論斷，不但異常之唯心而毫無科學根據；而且前後自相矛盾，其『結論』模稜兩可。例如，他劈頭就說：『現在雖是原子時代，但戰爭最主要的因素還是人力。如果人人不要打，或沒有打的心思，戰爭怎麼打得起來？即使打起來了也無法打下去。所以單就全世界人民普遍厭戰的情緒，這一點看來，我胆敢貿然先下結論：『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會爆發的』。這是何等唯心而缺乏社會科學常識的論斷！單就全世界人民普遍厭戰的情緒來貿然下結論，『說『第三次大戰是不會爆發』，這未免太荒唐了！難道第一次大戰與第二次大戰是全世界人民普遍喜愛戰爭才爆發的嗎？在二次大戰的前夕，參戰的雙方，大都不願意冒險發動，即希特勒瘋狂地發動戰爭，也並不是他特別好戰，而是一種制度在驅使着他。就是史大林雖然異常害怕戰爭，並會瘋狂地宣傳

『民主陣線』，爲此動員了全世界的黨徒，企圖以此來阻止『法西斯的侵略戰爭』。然而二次大戰終於爆發了出來。甚至在戰爭發動的前夕，史大林又轉而與希特勒簽訂『德蘇協定』，希望他不要進攻蘇聯，但結果還是無法避免。這難道不是血淋淋的教訓嗎？

原來第二次世界大戰亦如第一次大戰一樣，是兩派帝國主義強盜間的重新分割市場的爭奪戰，並不是什麼民主陣線與侵略陣線的戰爭。雖然蘇聯和中國也轉入這一戰爭的漩渦，其中含有社會主義反抗資本主義，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意義；但整個的第二次大戰，並不能因此而改變其帝國主義搶劫的性質。二次大戰的爆發，既然起因於帝國主義間的利益衝突，那麼它們之發動戰爭或參加戰爭，便不是某些人主觀上願意或者特別好戰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制度的矛盾在盲目地支配他們、驅使他們走向戰爭的道路。他們之走向戰爭，亦如被壓迫階級之走向革命一樣，都同樣是因爲這個舊的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和平地生存下去或不能加以改良；不過兩者所走的路向不同吧！前者是走向毀滅人類的殘酷大戰，而後者則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真正和諧平等的社會。既然過去的兩次大戰的爆發是一種制度的問題，那麼我們要判斷第三次大戰會不會爆發，便決不能像賓符先生那樣主觀而『貿然地先下結論』說它一定不會爆發；但亦不能像賓符先生那樣主觀而『貿然地會到來；而是要看這個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否被根本摧毀以爲斷。如果這個制度存在一天，戰爭的可能性便一天存在，而其爆發也決不可免。因爲這個制度已經腐朽不堪，充滿着矛盾與無出路；在這次可怕的二次大戰停止之日，即公然作第三次大戰的準備，這就足夠證明這個腐朽的舊制度已陷於無可救藥的境地了。尤其在現時美蘇的矛盾日益尖銳，法西斯的毒菌日漸生長的情勢下，如果沒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來干涉，不管人們願意不願意，一個更兇猛更可怕地毀滅人類的三次大戰便不可避免地要到來。

戰爭的主要營壘

前面我們對於三次大戰作了一個客觀的估計，現在我們便要進一步來研究戰爭主要的營壘這一問題了。戰後的世界，呈現於我們眼前的是美蘇之愈

來愈尖銳的矛盾和對立。從過去的一切國際會議直到最近聯合國大會，無論在那一問題上，都充分表現美蘇對立的姿態。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請參看本刊二卷七期『聯合國大會暴露出來的危機』），只要人們敢於面對事實，是不能加以無視和否認的。然而賓符先生在這問題上也異常之主觀而且自相矛盾的說：『在聯合國大會上，展開着聯合國生死存亡的鬥爭，這場鬥爭表現於蘇聯與美國短兵相接的論戰……』但他接着又說：『美國也許恨蘇聯妨礙她的擴展，但兩國之間並沒有直接現利益的衝突。』這簡直是自欺欺人的胡說！假若沒有現利益的衝突，為什麼在聯合國會議上又『表現蘇聯與美國短兵相接的論戰』呢？在這一問題上，李鐵民先生與賓符先生有同樣的觀點：他在『展望』一卷一期『美蘇關係剖視』一文裏說：『美蘇兩國政府的關係，雖然呈現緊張的狀態，現在尚無鬆弛的象微，但是就破壞和平或軍事衝突的意味來說，我們還看不出關於這方面有任何可怕的地方』。接着又說：『美蘇的基本矛盾，潛在性多於現實性，基本性多於迫切性，並非當前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關於這一問題，本刊二卷七期『戰後世界矛盾與人類前途』一文，說得異常詳細而透澈，我在這裏不必重複。不過有一點要特別指出的，便是這地位先生在表面上都不能完全否認美蘇矛盾的存在，因為這是事實；但在骨子裏却又因為同樣害怕懼美國金元勢力和原子彈威脅的神經衰弱症，所以都強調沒有現實利益的衝突，當然他們邏輯的結論是：『美蘇不會進行武裝的戰爭了』。其實，這完全是一種懦弱和苟安心理的表現，這種一相情願的變態心理的歪曲論據，不但是徒勞的，而且是最危險的煙幕，使人們在這種阿Q式的煙幕之下，模糊了階級的意識，放棄了鬥爭的目標，其結果只有助長戰爭的爆發。等到戰爭真正爆發時，一定張惶失措，束手無策，讓帝國主義者任意擺佈的。

事實上，戰後的美國，藉着她的金元和原子彈的威力，顯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了，她的生產力較戰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對於世界市場的追求也就愈益迫切，除了已經控制或正準備控制的市場之外，對於佔地球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蘇聯，自然不能忘懷。爲了擴展她的勢力範圍，爲了穩定資本主義制度，她必須聯絡和幫助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來對付蘇聯。從杜魯曼的援助希土反共法案到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便是以金元的力量控制歐洲各國，築成她的歐洲反蘇堡壘，以威脅東歐，包圍蘇聯；自然，經濟援歐計劃同時也是希圖緩和因經濟危機而日益迫近的革命危機。這就是美帝國主義者的如意算盤。雖然九國共黨情報局的產生，是針對馬歇爾援歐經濟計劃的一個對抗的表示，但在這一對抗中又充分暴露小資產階級在大資產階級面前之胆怯遷就的傾向。例如史大林對此舉向英美鄭重聲明：『共黨情報局非共產國際的復活，』（實際上共產國際早已死亡了），他並表明願與英美改善邦交，且又一次地強調兩種制度合作的可能（見大公報載合衆社二十三日電）。但不管史大林如何放棄世界革命；如何強調兩種不同的制度合作的

可能（這問題在青年與婦女二卷三期已駁斥過）；如何卑屈地硬要與資本主義共存共榮；不管他僕從們如何附和，如何強調『英美的矛盾』，如何強調『美國的孤立』（李鐵民先生說：『縱觀今天的世界美國的地位是十足孤立的。』），但美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一不同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她正在積極準備第三次大戰來毀滅它。這種趨勢，如果沒有世界革命來挽救，將會隨着時間的進展而逐漸發展下去，一直走到爆發點的時候。

怎樣才能阻止戰爭？

由於克林姆官一種機會主義的謬誤政策，在二次大戰中沒有按照列寧的路線變帝國主義戰爭爲革命戰爭，反而以和平陣綫與侵略陣綫，人民陣綫與法西斯陣綫的烟幕，將帝國主義大戰的實質，在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者面前掩蔽起來，以此模糊了他們的階級意識，在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和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泥沼中兜圈子，因而束縛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活動，造成了戰後如此混亂、矛盾和三次大戰威脅的局面。如果還是讓舊制度繼續存在下去，讓克林姆官及其僕從們所宣傳的『新民主主義』的烟幕繼續籠罩下去，則一個更慘酷的浩劫——三次大戰便要臨到人們的頭上了！但要阻止這一可怕的大戰，決不是靠賓符及李鐵民先生們所幻想的那些民主人士所能辦到的。他們現時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於改良主義者華萊士身上，以爲華氏所領導的民主勢力，便可以阻止戰爭。賓符先生說：『……國內反對戰爭的民主勢力的發展（在美國爲華萊士所領導的），也足以阻遏戰爭的「爆發」。這種幻想是異常之危險的，正如二次大戰前幻想民主陣綫來抵抗法西斯陣綫一樣，是一種最可怕的烟幕。其實華萊士仍舊是一個資本主義忠實的支持者，現在雖然呼籲和平，反對戰爭，但這不過是一個緩和與欺騙民衆的幌子，當一旦戰爭真正爆發，華萊士必然倒到華爾街「戰爭販子」那邊去，會給這些幻想家失望的。人們企圖在「戰爭」與「革命」兩條清楚的路綫之間，找出一條改良主義與和平主義的道路，不但是不可能，而且在客觀上只有助長戰爭的爆發。第二次大戰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此，我們更加有權利堅決地斷言：要阻止三次大戰的爆發，唯一有效的辦法，便是從根摧毀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要做到這一步，除了全世界的被剝削和被壓迫民衆一致起來進行世界革命，以社會主義來代替它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但要完成這一艱巨的歷史任務，首先必須從克林姆官的機會主義的領導之下解放出來，才不致重蹈覆轍，才能避免再走一次錯誤悲慘的道路。然而始終堅持進行世界革命，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的，只有繼承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第四國際。惟有它才能擔負這一偉大的歷史使命。人類只有建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才能根本消滅戰爭，才能走上真正和平和幸福的樂園。

中國的前途

中國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份，同時也是它的最弱的一環，因而

它的命運與整個資本主義的存在與否有着不可分離的聯繫。戰後的中國，真是滿目瘡痍，民不聊生。經過八年抗戰的煎熬，經過二次大戰的浩劫，但接着『勝利』而來的，又是慘酷的戰爭。現在內部的矛盾和對立，宛如一幅世界畫圖的縮影；美帝國主義者的對待中國，無論是馬歇爾和魏德邁，雖然所採取的方式不同，但同樣都是執行帝國主義的政策，企圖控制整個的中國，而在中國的黨政當局方面，也只會有一切聽命於華爾街，唯它的馬首是瞻。尤其從最近蔣立特所發表的『訪華觀感』的論文中，更露骨地反映出美國的對華政策，同杜魯曼的援助希土法案和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一樣，其目標都是準備對付蘇聯的。正因為戰後美帝國企圖支配整個的中國，也就更引起了蘇聯官僚階層的恐懼和不安，促使它在華作爭取勢力範圍的劇烈鬥爭。蘇聯於戰

蔣立特『訪華觀感』讀後

江 濤

美前駐蘇大使蔣立特 (William Bullitt) 在美國生活雜誌上把他『給美國人民的一個報告』，即所謂『訪華觀感』一文發表，便立刻引起了我國官方人士的狂熱歡迎。但另一些人們却以出奇的冷淡對待它。自然，歡迎與冷淡都各有其原因。至於我們呢，既不苟同於把這『觀感』當作救命符，但也不能無視於美蘇矛盾在遠東空前尖銳局勢下蔣立特發表觀感之現實意義。面對着苦的現實，我們倒認為從反蘇急先鋒蔣立特的文章裏看到了美帝對華的真面目。若以此來作為中國人民大眾的一個警惕，倒不是沒有意義的。

『訪華觀感』開門見山地指出：『防止任一國家統治中國而動員其四億五千萬人民來對抗我們，這是最美國切身利益的事實』，這可說一語道破了美財政資本的『對華觀感』！該文接着說：『那繼承着帝俄帝國主義的蘇維埃帝國主義者，利用中共為蘇聯的附庸，不僅中國的領土主權甚至它的獨立也在危殆之中。』蔣立特是『蘇聯通』，理應不會不知道史太林所執行的『擴張政策』，僅僅是蘇聯官僚階層的自保外交的無可奈何的一個手段，與真正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很少共同之點。史太林之支持中共，事實上也不過是把它當作一個外交工具，藉以抵抗美帝對蘇聯的包圍與進攻而已。但蔣立特伊稱之為『帝國主義』，並要求美國大張討伐之師！他公開宣稱：『我們必須採取行動以防止蘇俄統治中國而動員其人力來對抗我們』。他甚至稱這和『行動』為『自衛』！實也說得坦白，難道美國不是為着它在華的巨大利益而戰鬥嗎？

『局勢既如此緊迫』，如何使『美國政府能火速進行行動』來援助中國呢？蔣立特提出的辦法是非常具體的。對於占有中國全部工業百分之七十的東北，是決不可失的。因此派兵東北這一問題『應在對華作有效的一般性援助之前，先求解決』。『杜魯門必須像羅斯福在鄧克爾撤退後，英法嚴重缺乏槍砲彈藥時所做的一樣，採取迅速的行動』。蔣立特意思是說，立刻把留在

後在東北的駐軍遲遲不撤，割據旅順，共管大連，分佔中東及南滿鐵路以及搬走工廠機器等這一連串違反社會主義原則之不名譽的舉動，以及指使中共進行政治的投機和軍事的冒險，都是明顯的表現。美蘇在華這種鬥爭的情勢，如果中國的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不及時起來用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它，也許中國，特別是東北將首先成為第三次大戰的爆發點，成為美蘇衝突的犧牲品。

因此，凡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不願做非律濱第二，不願做蘇聯官僚層工具的人們，起來，團結起來，同全世界被剝削被壓迫的民衆聯繫起來，用革命的行動，去阻止毀滅人類的第三次大戰。只有如此，中國才能得救，才有光明的前途！

菲列賓，沖繩島，阿留申，日本等地彈藥宣布廢棄，售予中國，並且趕速運輸。『如果他（指杜魯門）不採取（這樣的）行動』，蔣立特便以華爾街代言人的資格提出威嚇：『國會復會後的首要步驟之一，就應該調查我們對華政策。對於我國政府那些不克維護美國人民（實際是華爾街大王們）重大利益的人士，要確定其責任』，『宣布其姓名』即予以應得之罪！

蔣立特依據美國軍事專家意見，認為結束戰爭亦即肅清中共，需時三年。因此，他就擬訂了一個『三年援華計劃』：在東北，除了『重新裝備已將美國武器用舊的若干師軍隊』外，還需要訓練並裝備十師美化的新部隊；在華北需要輕裝閃電式部隊二十師，予以適當的訓練供應與指揮，這樣，『一定能澄清整個華北局勢的』。另外有自美國空軍觀點看來已屬廢物的數千架飛機，應即『發給中國』。所以『整個三年計劃所需費用也不過超出六億美元』。

進一步，蔣立特認為『不但要維護中國成爲一個自由的國家，而且務必使它成爲一個健全而強大的國家』——在適當時機能夠在遠東方面作為對抗蘇維埃帝國主義的真正力量。中國若要強盛，必須先求內部的安定；要求內部的安定，必須首先獲得財政上的穩定。『但事實上』中國已落入惡性循環的漩渦中，『發給紙幣，物價跟着上漲，所有固定收入的中產階級已經破產了』。於是軍隊『吃空額』，在一九三七年以前是世界上最要算數一數二的『能幹』『廉潔』的游擊人員，現在『也流行着貪污』，各色各類的稅務，征收員類多貪污，甚而至於『法官』『也有貪污的』。舉出了這許多例，蔣立特把咱們中國目下成爲一大流行的公開秘密歸作出結論：『沒有一項微小的事情，不受貪污的侵染的』。這裏，我們注意這位先生把位居要職的官僚資本家的貪污舞弊輕輕地放過了。但據我們所知，他們實已侵佔了一切的國家財富。蔣立特自然更不會承認，中國六大家族就是美國金融寡頭在支撐着的。

爲了安定內部肅清貪污，爲了結束戰爭，在三年之內必須給中國政府信用貸款六億美元以輸入大量美棉、烟草、小麥、石油、汽油以及機車鐵軌卡車零件等，以及安定通貨的幣制基金一億五千萬美元。加以軍事援助的六億美元，即此後三年中，每年費用爲四億五千萬美元，三年共爲十三億五千萬美元。這筆費用，在華爾街代表人蒲立特看來，『用作防止史太林霸占中國並利用中國人力資源以反對我們的代價』，是『所費並不太高』的。

然則，這個三年援華計劃又如何執行呢？他說：『中國從事內部改革而無美國援助，或者美國雖援助而中國並不從事內部改革，都不能解決維護美國重要權益的問題』。（在蒲立特看來，只有『維護』了『美國重要權益』才能『解決』『中國的生存』！）因此『美國政府和中國政府必須同時來共同着手解決這一問題』。阻止史太林霸占中國既是中美二國政府的共同任務，那末，任何信用貸款『不應由中美二國政府共同管理是毫無理由的』。如何管理呢？蒲立特說：『中國方面簽字聲請，而由美國政府的一個代表加以副署方能取用』。這還不等於說，一切由美國來決定嗎？

既然中國政府執行內部改革，要聘請許多外國（美國）專家指導賦稅制度的改革，賦稅的征收，財政政策的修正以及工業的建設諸問題，自然非請美國人不可！既然要訓練裝備中國軍隊，又不得不勞美國軍國主義英雄們遠涉重洋而來了。而且，既然美國軍人『應該管理中國東北的給養事宜』，以及其他美國運輸人員訓練與作戰顧問諸方面，需要美國動員衆多的人士來華，一個總的指揮，是省不了的。『倘使杜魯門能派麥克阿瑟將軍於現任職務及權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總統私人代表的稱號，飛往中國』，那末，整個遠東就因爲這位『權威的將軍』的蒞臨，『將充滿希望而顯得一片光明了』！無疑地，麥克阿瑟過去既然在日本做起了太上皇，今天飛來中國，決不會表現得差些的，至少他可以就近『指揮』『監督』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呀！

口口聲聲以中國『獨立』『自由』爲辯詞的蒲立特，到了這緊要關頭，也就不得不暴露出帝國主義者進一步直接統治中國的真面目了。華爾街是決不以現下在華的『重要權益』爲滿足，他們要經由麥克阿瑟來直接統治中國以動員其人力物力來最後進攻蘇聯的。美國參謀部的日常談論裏，中國早就被稱爲美國在遠東的『前進基地』了呢！

蒲立特先生的簿記學不能不算精明，籌劃也不能不算週到，甚至連禮貌也顧慮到了：『這個三年計劃』是『不致於被認爲毫無禮貌的』，蒲立特如是云：『對呀！中國的統治層，是『決不致於認爲毫無禮貌的』，他們相反的

，且已動員其所有的報紙來公開頌揚讚美了。其中某些人士，且早就希望讓美國直接來『攪』哩！可是『疲憊厭倦與盼望和平的』，『遭到了戰爭繁重賦稅和不斷上漲的生活費用與死亡』的中國工農大衆又將如何呢？多智善辯的蒲立特，在他一帆風順的論據裏，一接觸到中國工農問題就不免木訥不能則聲了。在他認爲『會獲得全中國人民的擁護』的中國愛國人士希望實行的十項改革事項中，沒有一處會提及關係全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農民生死存亡所繫的土地改革與工人八小時工作制這些基本的民主問題。而其實，農民之所以走向叛亂，不斷補充了中共的軍事力量也者，就因爲他們對於土地的歷史性飢渴呀。蒲立特是不願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而祇會拿達姆彈來解決農民的肉體的。因此，我們行見蒲立特的敵對力量永無消滅之日。就是蒲氏自己也承認：『穿上國民黨破軍服的農民』也常常聽到他們家屬日夕窮困的消息，而嚴重影響他們的士氣了。『但要怎樣才能根本解除農民的窮困，提高那些『穿破軍服』的人們的『士氣』，那就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了。但這對於華爾街的主人不但不感興趣，而且認爲是麻煩的問題，所以蒲立特諱而不言。至於蒲氏偶然涉及中國勞動羣衆的生活狀況時，他却肯定地說出：

『上海工人的生活水準却較戰前提高三分之一。』這話不知從何說起！原來統計學在蒲立特手裏，竟是這麼一個隨意製造的工具呵！

總之，從蒲立特的『觀感』裏，我們看出：美國帝國主義在遠東正企圖配合着『援歐計劃』，爲了更有効地策劃一個反蘇十字軍，便不得不來一個『援華計劃』，以麥克阿瑟將軍出馬來『建議』『應讀作指揮監督』中國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了。但像美帝這種完全自私的援華計劃，即令付諸實施，也是不能解決中國問題的，它至多只能把『戰勝的中國』推到戰敗國的地位像日本一樣地加以管制，統治，最後變成反蘇戰爭的一個基地而已。所以中國面臨着的不僅是十足殖民地化的道路，而且將是首先要變成反蘇原子彈大規模的試驗場！本誌歷來就大聲疾呼地指出：『美蘇矛盾不但是戰後整個國際的主要矛盾，而且必然跟着時間進展日趨尖銳，向着第三次大戰的前途邁進。』（見本誌一卷七期『聯合大會暴露出來的國際危機』一文）今天在蒲立特所代表的美帝的戰鼓喧嘩聲中，我們的這個估計被證實得多麼快呀！史太林派的估計，他們否認第三次大戰的威脅性及美蘇矛盾的主要性和尖銳性，認爲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能互相合作，共存共榮，又被駁倒得多麼快呀！

不願做美帝殖民地奴隸，不願做反蘇戰爭砲灰的中國人民，應儘速地團結起來，在一個正確的指標下爲自己的解放和前途努力奮鬥！

論九國共黨情報局的設立

劉乃光

正當美蘇關係日趨緊張的今天，莫斯科即突然宣布：歐洲九國共產黨（蘇聯、法、義、捷、波、羅、保、南、匈）會於九月底在波蘭舉行會議，發表時局宣言，並決定組織「情報局」，出版機關報，以南斯拉夫京城貝爾格萊德為總部。很顯然的，一九四三年被解散了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現在又被部份地恢復起來，以「對抗美帝國主義」了！

據「真理報」發表的會議決議說，這次組織「情報局」，是因為「會議注意到參加本會的各國共產黨之間缺乏聯繫，在目前環境中，乃是一個嚴重的缺點，經驗已經表明：是錯誤的而且有害的。各國的黨之間交換經驗，並且自動調整活動的需要，目前尤其迫切」。在這個決議裏，人們已經正式而公開地，承認其過去錯誤政策所招來的後果了。事實上今天在各國共產黨之間，不僅僅缺乏聯繫，而且由於各自擁護本國資產階級利益的結果，相互間已處於尖銳對立的地位。例如：法共不願蘇聯政府的聲明，竟全力支持法帝國主義對魯爾、薩爾、萊茵等地的要求，因而引起德國共產黨的攻擊；意大利共產黨則爲了特里雅斯特港問題，反對南斯拉夫和法國兩國共產黨；而朝鮮南部共產黨也反對蘇聯主張的朝鮮託管五年計劃……諸如此類的對立，已把各國共產黨之爲克林姆宮外交工具的作用，發生障礙了。過去的經驗彷彿已使人們明白：這種「缺乏聯繫」（對立）是有用的，因此今天才「迫切需要」『調整』各國共產黨的『活動』，企圖使牠們重新有效地替克林姆宮利益服務。

但「經驗已經表明」的「錯誤」，到底是怎樣造成，由誰造成的呢？假使第三國際的解散，造成了這種「缺乏聯繫」的「錯誤」，則當時何以要解散牠呢？必須先弄清楚這些問題，「經驗」對於人們才是有用的。但要弄清楚這些問題，我們便必須把過去第三國際的歷史回顧一下了。

第三國際成立於一九一九年，是用以代替當時在政治上破了產的第二國際的，因為後者屬下各國黨擁護帝國主義戰爭，擁護各自的資產階級政府，因而背叛了革命的國際主義，被列寧宣佈了牠的死亡，必須成立第三國際來領導革命。所以他在「四月提綱」中主張改變黨的名稱爲名符其實的「共產黨」，以表示和這個放棄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完全不同。而在一九二

〇年第二次大會通過的第三國際章程第一條中更宣稱：「工人國際聯合會新組織底成立，是爲了組織各國無產階級底聯合行動，趨向於單一的共同的目的，即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蘇維埃共和國」。這完全是繼承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傳統的。（這「宣言」認爲「工人無祖國」，高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第三國際前四次大會（一九一九至二二年）的一切文件，都充滿了這種傳統的精神。

可是，一九二二年起，列寧病重了；而由於蘇聯經濟上的落後貧困，以及世界革命退潮之使蘇聯陷於孤立，於是史太林所代表的官僚層逐漸抬頭，在一九二四年秋天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保守理論，來對抗列寧時代的革命國際主義，牠的外交政策便從世界革命變爲維持現狀，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命令中共與資產階級「合作」，禁止牠在革命高潮中組織蘇維埃去奪取政權，以致革命失敗了；同時在英國又與黃色工會領袖們相勾結，成立「英俄委員會」，使之順利地出賣了大罷工。跟着從極右轉到極左，發明「第三時期」與「社會法西斯」的胡說，在希特勒上台前夜，拒絕與社會民主黨建立任何反法西斯的聯合陣綫；而在希特勒奪取政權時，却命令德國共產黨不戰而退，最有希望的德國一九三三年革命，便因此被克林姆宮斷送了。中國和德國的革命失敗，在蘇聯東西兩面站起了日本和希特勒，戰爭的威脅已臨到人類頭上，於是使克林姆宮又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向英法美等帝國主義要求建立「和平陣綫」和「人民陣綫」，並加入帝國主義強盜分贓機關的國際聯盟，但這一切都只能替帝國主義粉飾其民主欺騙，掩蓋其戰爭準備，同時助長了法西斯的愛國宣傳，和麻痺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因此，「人民陣綫」斷送了一九三六年的法國靜坐罷工和西班牙革命以後，史太林發現希特勒已經羽毛豐滿，要發動戰爭了，於是立即向這個「魔鬼」投降，和他訂立德蘇協定，以此瓜分了波蘭，發動了第二次大戰，但結果仍避免不了德國向蘇聯的進攻。這個向希特勒投降的德蘇協定一經破產後，史太林只有重新投回「民主」帝國主義的懷抱，號召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無條件地擁護戰爭」，「保衛祖國」，甚至要求殖民地人民亦不得進行任何民族民主的解

放鬥爭。最後史太林爲了討好民主帝國主義，表示他完全放棄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便在一九四三年五月間，把第三國際正式解散了！

克林姆宮主人的外交政策，就如此從一個破產走到另一個破產，因而一步步把蘇聯帶到墮落的深淵中，同時把共產國際也從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司令部，變成史太林外交政策的柔順工具，簡單地供他作每次轉變之用；克林姆宮外交政策一經轉變，各國共產黨的宣傳和鼓動論調便立即跟着改變，恰像影之隨形一樣。在史太林的支配下，第三國際的歷史，便成了一部不斷貽害世界工人階級的災禍史。從那時起，牠對於世界工人階級革命，再不能起任何幫助的作用，反而只能起一種制動機作用了！

但雖然如此，布爾塞維克主義仍然是有牠的保衛者的。正如第二國際破產必須成立第三國際一樣，第三國際的破產也必須成立第四國際，以完成第三國際最初的章程第一條上所定下的任務。這個新國際在一九三八年正式成立，牠的創導人就是列寧的合作者，十月革命兩大領袖之一的托洛斯基。他堅持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傳統，事先指出蘇聯官僚階層的對內對外政策及其錯誤性，而提出他自己底正確意見。早在左派反對派時代，他已預先警告：蘇聯官僚層要把第三國際從世界革命的組織，轉變爲官僚層外交政策底工具。而在一九三八年寫的「一個新鮮的教訓」一文中，他便已很有預見地分析過第三國際的性質與前途：

有名無實的共產國際，牠的社會根基確切的說有兩種性質：牠一方面靠克林姆宮的津貼爲生；另一方面靠社會民主黨的同一來源，即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來養。近年來共產黨的增長，牠們之滲入小資產階級隊伍中，牠們之受職於國家機關、工會、議會、市政府等，已極端增強了牠們對本國帝國主義的依賴性，而犧牲了牠們對克林姆宮的傳統的依賴性。

十年前，我們預言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一定不可避免要招致共產國際各支部的民族主義傾向的增長。這個預言已成了一件明顯的事實。……今天，我們可以有把握的預言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在共產國際內部，離心的民族主義傾向一定不可避免要加強。牠的每一個支部都將要獨自產生一種愛國主義的政策。……爲了不致妨害牠自身和牠底帝國主義盟友的關係，莫斯科……恐怕有可能設法把牠（共產國際）完全解散。……當權的莫斯科私黨，將收穫共產國際十五年來寶貴的果實。

托洛斯基這幾行字，不但預言了五年後史太林之正式解散共產國際，而且預言了共產國際解散後各國共產黨的互相對立和衝突。解散和對立都出自

同一的根因，即各國共產黨內部民族主義傾向的加強，而這傾向又是史太林放棄革命的國際主義，採取「一國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的後果！

當然，第三國際的解散，只不過把一個發臭了的死屍，加以埋葬而已。牠最初成立時的共產主義、國際主義精神和思想，已從史太林把牠變成外交工具時起喪失淨盡了。從那時起，牠只是妨害而非幫助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工具，完全符合於克林姆宮的自保目的。而羅斯福當時之主張解散牠，也是因爲討厭這工具之替克林姆宮服務。今天史太林之成立九國共黨情報局，也不過在美國的加緊包圍壓迫下，想把這個破碎的工具重新聯結起來，抵抗美國，威嚇美國；假如美國對克林姆宮壓迫得更厲害，那牠就把這工具擺向「左」面，盡一種「壓力」的作用。但無論如何，決不是爲了把共產國際最初的國際主義革命精神重新恢復，幫助各國社會主義革命。這一點，在九國共黨會議的公報裏已經得到證明。牠所發表的時局宣言，只規定各參加國家共產黨的任務，是「保衛它們各個國家的民族獨立與主權完整」，只是「領導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計劃的抵抗」。第三國際章程第一條中所揭示的字句，不但在這裏，而且在任何場合，都不再被提起了。

但即使是形式上的部份的恢復，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者都羣起攻擊牠，甚至表示驚惶；這就迫得史太林連忙起來加以否認了。史太林於十月十四日向英工黨「叛徒」議員們說：「共產黨情報局之設立，決非共產國際之復活，亦決不致變更蘇聯願與英美改善關係之願望。」彷彿爲了使人更信服他的保證似的，他特別舉出理由說：共產國際建立的任務「在爲各國工人間建立聯繫，協助工人之能領導。然今日之局面已不同，許多國家中之共黨已成爲大部份民衆之強有力的代表，彼等在本國內均有根深蒂固之遠大責任，且多有剛毅幹練之人士爲領導。目前如仍企圖由一公共中心領導此等政黨，實爲外行與莫須有者。故決無理由以設立一新共產國際。」（合衆社十月廿三日電）這些話顯然包含了最無恥的曲解與最可笑的矛盾和撒謊。因爲：第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八四八年便主張工人有國際組織的必要，因爲資本主義經濟已把整個世界結成一個單位，各國無產階級便天然需要國際的連結來推翻牠，拿社會主義社會來代替牠，因而宣佈「工人無祖國」，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這種聯合的組織便是第一國際。這個國際失敗後，很快又建立起第二國際。第二國際後來由於放棄國際主義，採取狹隘的社會愛國主義而破了產，因此列寧才主張建立第三國際，更加具體明確地

把這個新組織的目的，寫在第三國際的章程第一條上面。而在十月革命後公布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人民之權利宣言』中，也明白昭示新政府以『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促成全世界社會主義的勝利等等為目的』。(見中文本莫斯科譯『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三六二頁)史太林把共產國際的目的『簡單化』，顯然是一種有意的曲解，爲了辯護他的背叛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傳統。第二、即使照他的話單是爲了『建立聯繫』，也不是『決無理由以設立的』，因爲最近才公布的九國共黨會議決議，已公開承認『各國共產黨之間缺乏聯繫』了。何等明顯可笑的矛盾！第三、九國共黨會議決議：『情報局應負起『必要時根據互相的協議而調整各國共黨的活動的任務』，這表明各國共黨因民族主義傾向的增強而形成的互相對立和衝突，『迫切需要』加以『調整』，此次成立『情報局』就是『企圖由一公共中心領導』來『調整』牠們的表現；而在『時局宣言』中竭力攻擊帝國主義，號召各國共黨起來『擬訂大家同意的行動綱領，擬訂對於反對帝國主義勢力……的策略』，也是希圖形成這樣的一種『中心領導』，來對抗美國所領導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蘇聯的包圍圈。史太林一貫都把第三國際換縱在自己的掌握中，一貫都命令各國共黨盲目服從他的總路線，變成他的柔順工具，絕不讓牠們有絲毫的自由和獨立性，這一個『公共中心領導』的由來已久，他今天口頭上雖然說沒有這種企圖，實際上仍是由他獨自操縱的。(從情報局總部設在克林姆官所支配下的南斯拉夫，以及由蘇聯共黨兩首要人物，即被視爲最可能繼承史太林的日丹諾夫及馬林柯夫領導召開會議，便可證明這種操縱。)假如因各國共黨離心傾向太大，不能『領導』，那便證明史太林成立這個『中心領導』的『迫切需要』，而絕沒有證明他根本放棄這一『企圖』。第四、假如真的如史太林所誇口的，『許多國家之共黨』已如此『強有力』和獨立領導，那就應該更有理由、更有力量去提出『奪取政權，成立無產階級專政，來推翻資本主義』，一如過去第三國際成立綱領所號召的那樣了。但事實却又不然，克林姆官今天在所有國家都只把共產黨的活動，限制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牠們最高的目的只是成立聯合政府，他們不敢觸動私有財產制度，不敢提出階級鬥爭，一句話，即把改良幻想的新民主主義來代替社會主義。克林姆官這種背叛革命的政策，把戰後興起的革命浪潮一一斷送，把各種有利的局勢一一放過之後，法西斯勢力已到處重新抬頭，而蘇聯自身則處在美國原子彈戰爭的威脅前面；——就在這種危險局勢中，牠不但不呼籲全世界工人階級的團結和覺醒，反而誇口『許多國家共黨』的『強有力』，不需要『領導』。這是何等愚蠢無知和諷刺呢？何況，這所謂『許多國家』到底指那幾國，而其中他沒有這樣『強有力』的國家的共產黨，又是否仍需要成立『國際』的領導呢？如果不需要，則當初第三國際也不需要成立了。

從史太林的言行中，還可以找出無數這樣的矛盾，提出無數的問題來的。他本人當然不以這些矛盾爲恥；反之，却陷在矛盾的圈子中，毫無出路哩！因爲他昨天爲了向羅斯福讓步而解散第三國際，今天爲了對抗杜魯門又把牠部份恢復，(但又偷偷摸摸地不敢承認這事實！)明天，爲了另一筆政治交易，他也可能把牠重新解散的。這還不够證明第三國際純粹是他作政治投機用的籌碼嗎？因此，他今天不但完全與過去的傳統決裂，而且也絕對喪失瞭解過去教訓的能力了。廿多年來無數的清算肅軍、開倒車和腐化，已把蘇聯帶到了可怕的墜落深淵中，史太林的錯誤政策，從一個破產走到另一個破產，終於招致了德國的進攻；僅僅由於蘇聯工農爲保衛國有財產制而進行英勇抵抗，才把蘇聯救了出來。可是，一轉眼間，同一雙官僚全能主義的壞手，又把牠帶到美國的原子彈戰爭面前了。只有世界各國社會主義勝利才能阻止這個毀滅的前途，今天歐洲以至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衆，都在摸索這條社會主義的道路；但另一方面，在美國支持下各國資產階級，也正在選取最有力的統治形式——法西斯專政。不幸克林姆官恰恰要在這兩條道路中間，採取一種烏有的『新民主主義』路線，以此阻止各國工農大眾走上社會主義之路。他們今天企圖重新運用那個發臭的舊工具——部份恢復共產國際，所盡的正是這種背叛作用。這就又一次證明：要領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以便有效地保衛蘇聯、消滅戰爭等災難，那只有團結在堅持列寧底國際主義傳統精神的新國際第四國際旗幟下，才有可能了！

無產階級的政黨……愈應該極其明瞭、正確、固定地，用實際的國際主義，去反對口頭上的國際主義……

實際的國際主義，祇有一種：即奮往直前的工作，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並且以宣傳、同情、或物質條件等等，去幫助全世界(不僅一國)上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

大戰發生以後二年多，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運動，在各國形成三種派別……

一、社會狹隘愛國派，口頭上稱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乃狹隘愛國主義者，這些人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應『保護祖國』……
 二、第二派人，即所謂『中庸派』，搖擺於狹隘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庸派』頌揚和誇張自己，說他們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國際主義者……
 問題的焦點，即在『中庸派』不相信必須革命，以反對本國政府，不提倡革命，不進行堅決的革命鬥爭，而應造最卑鄙的(並且特別響亮地空談馬克思主義)避免革命的遁辭……

三、第三派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主要的特點，是在他們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及中庸派完全破裂。和他們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和本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鬥爭。他們的原則：『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

——列寧著『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見其師古譯中文本『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第七八至八三頁

「緊急措施」公佈後八個月，「改革方案」公佈後僅兩個月，中國的經濟危機，又以更可怕的姿態向前發展了，其主要的特徵就是物價飛漲。時隔八月，物價上漲六倍至八倍不等。後面是幾種商品相隔八個月的比較數字：

名稱	二月十五日市價	十月十三日市價
白 粳	十二萬元	八十萬元
本廠油	二十四萬元	一百八十萬元
二十支雙馬紗	四百四十萬元	二千六百萬元
龍頭細布	十六萬元	一百萬元
白報紙	十萬元	八十五萬元
岡本肥皂	二十一萬元	九十三萬元

在這二百四十天中，人們渴望了將近一年的美國大借款仍無着落。外國的「私人存款」之「動用」令雖公布已久，但尚在「擬訂辦法」。「財產稅」與「財產登記」更不知何年何月能弄得好。官僚制度行動之遲緩，與物價之飛漲兩相對照，不但人民全體對政府失望反感，就是執政者也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忙着以種種新法新方案新辦法去應付同一個經濟危機之相異階段的種種問題。在平常時期，八個月本來不算長，但就戰後中國如此緊急的形勢而言，不能不算是個相當長的時期了，政府在這八個月之中，玩了許多套魔術，開了不少張藥方，但經濟危機却更加嚴重起來！每月幾萬億元的軍事支出，隨戰線的擴展及物價之上漲而增加，但貧苦不堪的人民，再也不能負擔千稅萬捐以及濫發通貨的無形搜刮了！政府之無能解決經濟危機，有其內在的基本原因，戰後二年來已為事實所證明，但近數月來因國際國內局勢的緊張，現政府之基本政策與經濟危機的關係，更昭然於世，人們已用怨言來代替希望了。

老問題的新發展

竹雲龍

日見橫行，失業將日益增加，工潮將此起彼伏地在各部門發生；禁令愈多，黑市愈瘋狂，貪污的機會越多，人民的負擔因而更沉重。如此，這個業已非常痛苦且黑暗的社會，必然弄得更混亂更可怕更黑暗！經濟危機必然引出社會危機。

禁令在漲風之前失效已不止一次，政府十年來「努力抑平物價」，暗中又在濫發通貨，漲一萬抑下一千，如是一漲一抑，物價愈抑愈高，現在許多物價都比偽幣價格高得多了，這現象十分可怕，「薪水階級」都在恐懼着未來更難熬的日子，從前還有一線希望，現在都只有絕望和怨恨了！到處談論着物價飛漲，生活指數不合理，工資跟不上物價還要折扣，配給品有名無實等各種問題，社會的不安現象，隨着生活艱苦的情形更普遍了。

政府對公用事業的貼補政策，本來的用意是在維持法幣的虛偽價值，最近顯然有逐步放棄貼補總任公用事業漲價的趨勢，與其濫發紙幣的行為配合在一起觀察，我們很可以相信政府為事實所逼，已走上「高物價政策」後期的迅速發展的階段，這是政府於經濟危機的最後階段中不能控制經濟發展的情況，是總崩潰的信號。因為漲風一陣緊跟着一陣，週期越短，倍數越加越高，通貨膨脹的速度越來越快，惡性通膨既已打開總崩潰之門，總崩潰便只有依照其自身的邏輯待時而發了！

要阻止經濟總崩潰的爆發，首先必須立刻停止戰爭，進一步從根本上改革幣制。然而這又必須有一個全般的澈底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因此，要想挽救當前經濟危機，必須從政治的改革着手。此外一切臨時應急的經濟緊急措施或救急方案都是無效的。因此我們希望人民大眾挺身起來謀取政治的改革吧！

八個月來物價上漲百分之六百，但工資僅增加百分之二百左右，公教人員的薪金增加更少，數千萬倚賴固定收入的「薪水階級」，八個月來實際上失去了收入的一半以上，而近日來的瘋狂漲風，將有吞食其已經維持清苦生活的收入額之四分之三的可能了！這是一個極大的生活方面的威脅，如果往復的基本情勢不能改變，則人民的生活資料必將日益受「漲風」的掠奪，多數人民將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絕境，貪污之風勢將更加發展，盜賊搶劫將

鳴謝啟事

我們為了經費支絀，曾於上期向讀者發出呼籲，請求在物質及推銷上加以援助。很快便先後收到下列諸先生的捐款和同情信，我們特此道致最深的謝意！

- | | | | |
|-------|------|-------|-----|
| 王 先生 | 廿五萬元 | 趙 旺先生 | 五萬元 |
| 杜 先生 | 五十萬元 | 董 真先生 | 卅萬元 |
| 施 蠶先生 | 十萬元 | 劍 朋先生 | 十萬元 |

評「反蘇大陰謀」——一部說謊的「奇書」

旭東

——薩伊爾斯、卡恩合著，梁純夫等譯，新知出版社出版——

當這部「反蘇大陰謀」的最初兩章譯載於「評論報」時，紀芬先生在本誌（前名青年與婦女）上即已根據文件和史實盡情揭露了它的無比偽造和希有說謊（請參考本誌第一卷第十期及十一、十二兩期合刊）。正因為這一「揭露」，「評論報」中止了登載。但經過半年之後，這部無比偽造和希有說謊的「奇書」又以單行本出現了。因此我們也就不不得不破費一點時間來繼續對它揭露一番。

「這本書所包括的全部內容」，已如紀芬先生所指出：「無非是把克里姆宮的歷史偽造，它一手排演的中世紀式審判案，它對於政敵的暗殺和中傷……，這一切「舊文件」、「舊供詞」、「舊陰謀」和一些間諜案子混淆在一起而已」。其主要目的是企圖替克里姆宮的獨裁者史大林二十餘年來在蘇聯所進行的篡奪、陰謀、迫害、屠殺及一切罪行作辯護。爲了這一極端卑鄙的「目的」，「反蘇大陰謀」便有系統地將一切與史大林政見不同的，被他所迫害或暗殺的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十月革命的元勳，內戰的英雄們通通放進希特勒和日帝的「間諜網」裏去，并把這個間諜網與以前英美德法等帝國主義在十月革命以來對蘇維埃政府所進行的一切陰謀破壞和暗殺等事件連繫起來，而托洛茨基則被位置在這一陰謀事件和間諜網的中心地位，——這樣一來，托洛茨基便成了「反蘇大陰謀」的「一貫的指導者」了！

這一空前的無與倫比的大規模的有系統的偽造，雖然是由薩伊爾斯和卡恩出名，但實際上却是史大林指導下的整個格柏烏的集體產品，而薩卡兩人不過是執行格柏烏的命令，把它稍微編製一下譯成英文在美國發表而已。這從中譯本「後記」鄭重介紹薩、卡兩氏爲「美國出色的內幕記者」，就已於無意中暴露了他們本身是屬於格柏烏的活動人物。

至於我現在繼續來批評這部說謊的「奇書」，同紀芬先生以前所預告的一樣，仍然「只能作一種摘要式的批評」。而且我的批評還是接着紀芬先生的批評繼續下去的，因此希望讀者們也接着紀芬先生的文章繼續下去，以便對「奇書」的說謊獲得個一貫的概念。

列寧與托洛茨基

「奇書」爲了把托洛茨基安置在「反蘇大陰謀」的始終一貫的指導者的地位，它便必須將托洛茨基與列寧對立起來，並捏造前者「始終一貫」地反對後者。底下便是第二章的原文：

反對列寧的運動是由野心家外交人民委員長托洛茨基領導的。他認爲自己是列寧的必然繼承人。十四年來，托洛茨基曾激烈地反對布爾塞維克，只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八月，布爾塞維克革命前幾個月，他才加入列寧的黨而隨着它獲得權位。在布爾塞維克內部，托洛茨基組織了一個反對列寧的左派。（一八頁）

據列寧說，托洛茨基已爲德國人所利用，實際上幫助了德「帝國主義者」（一九頁）洛克哈特傾向於相信在俄國的利益要求幫助托洛茨基反對列寧。托洛茨基和他的信徒們現在正以這種和平政策「出賣革命」爲理由來攻擊列寧。托洛茨基計劃在布爾塞維克內成立一個所謂「聖戰」集團，以圖獲得協約國的支持而迫使列寧退位。（二十頁）

我們將前面這些冗長而荒謬的偽造抄下來，爲的好讓讀者們來對照十月革命後列托兩人間的真正關係。

不錯，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和托洛茨基間確曾有過長期的意見分歧和對立。那主要是由於：在政治上，自一九〇五年起列寧主張「工農民主專政」，而托洛茨基則認爲列寧這一公式是錯誤的，階段論的，所以他從不斷革命論的觀點上提出「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專政」來對抗列寧。在組織上，列寧主張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極力排斥孟塞維克的自由主義的觀點，而托洛茨基則調和於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因此遭到了列寧的不斷指責。但列寧與托洛茨基間這種分歧，到了二月革命後便完全消解了；因爲前者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而採取了「無產階級專政」，而後者亦拋開了他的調和主義的組織觀點而加入了布爾塞維克黨。正因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得以及異常密切地攜手合作而領導了十月革命的勝利，並於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的聯合進攻中保全了蘇維埃政權。也正因此，列寧和托洛茨基兩大領

袖的名字便成了俄國革命的象徵，在任何場合都被人們不可分離地并列地提舉了出來。這已成了絕對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雖然史大林費盡氣力企圖將托洛茨基的名字從十月革命的歷史中排除掉，但總是徒然的。

至於十月革命後列寧與托洛茨基的真正關係究竟如何，那我們可以完全引證列寧自己關於托洛茨基的評語及對他所表示的幾個極重要事實來說明。

正當十月勝利之後，某些「老布爾塞維克」右派（即反對十月暴動的人們）曾在暗地裏散佈托洛茨基以前不是布爾塞維克的鬼話，但列寧在一次黨會議上即起而公開宣稱：自托洛茨基懂得同孟塞維克不可能聯合之後，……

「從那時以後，便再沒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爾塞維克了」。這就是說，自從托洛茨基放棄了他以前企圖與孟塞維克調和的組織觀點之後，便再沒有人比得上他是一個更好的布爾塞維克了。這是列寧同托洛茨基攜手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後，前者對於後者是否真正布爾塞維克的第一次評價。這足以擊破一切關於托洛茨基不是真正布爾塞維克的謊言。

當聯共黨第十次大會後的第一次執行委員會上，莫洛托夫對托洛茨基說了一些中傷的話（當然是故意於史大林的），列寧便起來責斥莫洛托夫，其中有這樣的一句話：「托洛茨基同志在黨內關係上的光明磊落是絕對無可非議的」。一種「絕對無可非議的」「光明磊落」的態度，當然是與「陰謀詭計」「不可調和的。這就足夠證明『在布爾塞維克黨內，托洛茨基組織了一個反對列寧的左派』，是一種最惡毒的扯謊！」

而且列寧對於托洛茨基的「再沒有更好的布爾塞維克」的評價及「絕對」相信他的「光明磊落」，絕不限於言語，而且有無數的事實為憑。其中最特殊的是：托洛茨基在斯維亞斯斯克戰役中（這是挽救蘇維埃政府最初一次決定性的戰役），曾處決了兩個叛逃的軍官，并由黨中央委員會認為絕對正確的。但史大林一批人還是在幕後散佈某種不利於托洛茨基的流言，迫得托氏在一次政治委員會上說出了這樣的話：「當初在斯維亞斯斯克若不採取那些嚴密無情的手段，我們今天就不能在這裏開會了！」「絕對正確」！列寧喊起來，他并立即用紅墨水在一張上角印有人民委員會的公文紙上寫出如下的附告：

同志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發的命令之後，我如此確信，絕對地確信，托洛茨基同志的命令是正確的，合乎事業目的的，而且是事業成功所必需的，所以我毫無保留地贊助這個命令。

佛·烏梁諾夫——列寧

列寧將這張紙頭遞交托洛茨基，并告訴他：「這樣的空白文書，你要多少我

可以給你多少」。在當時國內戰爭的異常艱險而複雜的情況下，列寧居然肯預先簽字在托洛茨基後來認為必需頒佈的任何命令之中，如不是「確信」托洛茨基絕對不會做出任何不光明行動或濫用職權，他肯這樣異乎尋常地「預先簽字」麼？！

當一九二三年初，史大林為了在喬治亞造成他的勢力，他假借中央委員會的權威，瞞着列寧和中央委員會在喬治亞實行了一個有組織的陰謀政變，壓迫那裏黨內最好的份子，鄂維尼啓子和傑爾順斯基幫助他。那時臥在病榻上的列寧對此非常憤怒，但又無法親自起來干涉，因而要求托洛茨基担負這一任務。下面便是列寧為此寫給托洛茨基的信：

親愛的托洛茨基同志：我懇切地請求你，在中央委員會替喬治亞事件負責做辯護。這事件現時正在史大林和傑爾順斯基的「檢查」之下。我不能信任他們的公正。恰恰相反！你如果同意替這事件担任辯護，那我就可以放心了。……致最好的同志的敬禮！

列寧 一九二三年三月五日

這封信不但完全表示列寧信任托洛茨基的「光明磊落」，要求他負責替喬治亞事件辯護，而且也同時表示了對於史大林的絕不信任哩。

列寧在他患病當中，如他的「遺囑」及某些舉動所表現的，是如何地厭惡史大林，要求黨取消史大林的職位，把希望寄托於托洛茨基身上，即認定他為「繼承人」，我們往下即將說到。總之，列寧對於托洛茨基，自十月革命一直到他去世，都是保持着一種異常親密的合作和特殊信任的態度。無須說，托洛茨基之對待列寧更是如此。列寧逝世後不多幾天，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加雅寫給托洛茨基的一封信，足以為此兩位巨人間的相互關係的最後印證：

親愛的列夫·大衛多維奇：我寫信給你，為了告訴你一件事情，即是：約在去世前一個月，佛拉第米爾·伊里奇聽我唸你的書時，唸到你批評馬克思和列寧那一段便停下來，請我把那幾行字重唸一遍給他聽，他很注意聽着，然後要自己親眼看一遍。

我還告訴你：你當初從西伯利亞到倫敦我們家裏時候，佛拉第米爾·伊里奇對於你的感情一直保持，到他死都沒有改變的。我敬祝你·列夫·大衛多維奇有力而健康，我熱烈地抱吻你。

娜·克魯普斯加雅

這封信告訴我們：托洛茨基對於列寧的正確評價，曾得到了列寧在臨死前的特別注意；同時，列寧對於托洛茨基的「感情」，從最初見面直「到他的死都沒有改變」。單只這一點就可以反證我們在前面所摘引「反蘇大陰謀」中的幾段偽造以及其他千百種的偽造是怎樣的荒謬和可恥了！

列寧與史大林

『反蘇大陰謀』雖一開始就將托洛茨基和列寧對立起來，并把前者描繪成爲『反對列寧的運動』的『領導者』。但對於史大林和列寧的關係，却沒有一句話提到，雖然它的全部精神在暗示史大林是列寧的『必然繼承人』，並將凡是反對史大林意見的人們都稱之爲反列寧主義，反蘇聯的叛徒。於是列寧生時和史大林的關係，在『反蘇大陰謀』中便成了一個秘密！因此，爲了讓人們進一步懂得這部『奇書』中所隱而未宣的『秘密』及其用意，我們不得不就此把它掘發一下。

列寧和史大林的直接關係，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可說絕無僅有。自二月革命列寧回國後，史大林才有可能與列寧接近。但由於史大林和加米也夫等在二月革命後短期內所表現的可恥的機會主義，會遭到列寧的嚴厲抨擊。因而此後列寧之對於史大林，除了承認他在組織技術上有某些能力外，在政治上不但無視他，而且是隨時打擊他的。例如：當爭論布列斯特和約問題時，史大林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廿四日的黨中央委員會上發表必需簽訂和約的理由說：『西方沒有革命運動，連事實也沒有，有的只是可能性；而我們不能拿可能性來考慮』。列寧聽到這幾句話，雖然表面上史大林是擁護他的立即簽訂和約的主張的，但列寧還是毫不躊躇地起來反對史大林，質問他：『不能拿來考慮嗎？』西歐革命尚未開始，『但如果我們因爲這樣來改變我們的策略，我們對國際社會主義就是叛徒。』這裏證明列寧在那時史大林短短的幾句話中，便已預先覺察出他後來放棄世界革命的『二國社會主義』背叛思想了。

史大林之得以篡奪蘇維埃政權，實行其背叛思想，乃是發軔於一九二〇年聯共第十次大會上被推選爲黨的總書記。這是由季洛維也夫違反列寧的意志而引薦的。雖然那時的總書記，在列寧主持的政治局領導下只能有一種技術的性質，但列寧對史大林擔任這個職位還是很不放心的。所以他當時帶着憂慮和諷刺的口吻論這個被推舉的總書記說：『這個廚子只會撒胡椒的。』自從那時起，列寧總是用偵察的懷疑眼光來注視史大林的一切舉動的。也正因此，史大林常常對列寧懷着怨恨和嫉視，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等待着機會自圖發展和進行報復。恰好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末病倒了，於是史大林便乘機在暗地裏大肆活動，有系統地佈置起他私人的勢力來了。

起初，史大林以反對托洛茨基，謀阻他繼承列寧的地位打動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後兩人一向是害怕和嫉視托洛茨基的），拉攏他們成立『三頭』

小組，并經過這『三頭』小組操縱中央委員會，最後由史大林一手支配的『組織局』在黨和政府各級機關內位置私人。於是黨和政府機關便有系統地迅速地被官僚化了。所以當列寧於一九二二年十月病癒銷假而重新回到他的工作地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員會議時，他甚感驚異。他深深覺得在他害病時期中，人們已經在暗地佈置了一個官僚主義的陰謀網，網的總線在『總書記』手中。於是列寧也就積極開始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除了在言論上不時攻擊政府機關的官僚主義的危險外，并會與托洛茨基商討阻止官僚主義化的具體問題。底下是列寧和托洛茨基關於這問題的一次最重要的談話：

列：我們裏面的官僚主義是很嚇人的。我重來辦公時候，曾被它嚇住的。

托：不僅是國家的官僚主義，而且是黨的官僚主義，困難都起源於這二個機關的配合，以及團結在黨各級書記周圍的有勢力派別間的相互庇護。

列：那麼你提議進行鬥爭，不僅反對國家官僚主義而且反對中央委員會組織麼？托：就是這樣吧。

列：好的，我同你聯盟：一般地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地反對組織局。托：那是很榮耀的，能夠同一個正直的人結合一個正直的聯盟。

在這次談話時，列寧并計劃在中央委員會底下設立一個特別委員會作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列托二人都要加入這個委員會裏面，其主要的目標在『搗毀官僚主義脊椎骨的史大林私派』。但可惜，當列寧這一計劃剛定出之後，列寧又病倒了。因此史大林更加肆無忌憚地加強和發展他的官僚機關，準備最後來反抗列寧，排除托洛茨基。列寧臥在病榻上對這種危險情形的發展日感焦慮，同時又唯恐不能病癒來親謀挽救，因而於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五日寫下了他的著名的『遺囑』。

列寧在『遺囑』中解說共產黨『立足在二個階級（即工農）之上』，可能引起分裂之後，隨即指出怎樣穩定中央委員會，以防止分裂的具體辦法說：『我所說的穩定，乃是防止最近將來的分裂之一種保證。這裏，我審查一些純粹個人性質的問題。我認爲在穩定問題上，從這個觀點看來，根本的因素乃是中央委員會那些委員，如史大林和托洛茨基。這二人之間的關係，我認爲，構成了分裂危險之一大半；這分裂是可以避免的，我又認爲增加中央委員會人數到五十至一百可以幫助避免這分裂。』

史大林同志作了總書記之後，集中了龐大的權力於他手裏；他是否時時曉得以充分的謹慎使用這個權力，我可沒有把握。他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如他爲人民外交委員會問題向中央委員會作鬥爭時所證明的，不僅表現他有異常的能力，——就個人說，他自然是現在中央委員會中最有能力的人，——而且表現他有廣

大的自信，和太被事情之純粹的行政方面所吸引。（底下亦全是批評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及布哈林和畢達可夫四個中央委員的缺點。）

列寧在這裏說黨的『分裂危險』的原因，雖然表面上歸納於史大林和托洛茨基『二人之間的關係』，但實際上指的却是史大林，因為他『集中了龐大的權力於他手裏』，而不『曉得以充分的謹慎使用這個權力』，換句話說，就是他濫用權力。至於托洛茨基則『是現在中央委員會中最有能力的人』，他的唯一缺點僅僅是『廣大的自信』和太注意於『純粹的行政方面』而已。因此，列寧還希望增加中央委員的人數來加強其本身，來監視史大林的濫用權力。但過了十日之後，列寧覺得增加中央委員會的人數是不能穩定中央委員會，防止黨的分裂了的。所以他於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又給上面的『遺囑』作了一個補充說：

再者：史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共產黨人中間相互的關係是完全可以忍受的，在總書記職務上就變成不能忍受的。所以，我向同志們提議，想個辦法免除史大林這個職務，而任命另一個人去担負這個職務，這另一個人各方面與史大林不同的僅僅在於較高一等，即是更有耐心的，更忠實的，更有禮貌的，更對同志客氣的，更少任性的等等……

列寧在這個補充的『遺囑』上面，露骨地指斥了史大林的令人『不能忍受』的『粗暴』之後，已經明白而堅決地主張撤換史大林的總書記職位了。至於『另一個人』列寧雖沒有明白指出是誰，但從『各方面與史大林不同的僅僅在於較高一等，……』的條件看來，那無疑是屬意於『在黨內關係上的光明磊落是絕對無可非議的』和『現在中央委員會中最有能力的人』，——托洛茨基了。由此充分證明：後來一切對史大林是列寧『必然的或合法的繼承人』的宣傳，不僅是神話，而且是直接違反列寧的意志和主張的。關於這一點，就是史大林也不敢加以否認。雖然他盡力禁止『遺囑』公開發表於黨員羣衆面前，但他後來亦終於被迫承認了『遺囑』的真實性。底下便是史大林寫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國際通訊』上的一個聲明：

『列寧在遺囑』中提議撤換史大林而以另一位同志代替他的黨的總書記地位。這是完全真實的。

列寧寫在『遺囑』中撤換史大林總書記職位的提議雖然還沒有公開出來，但不久之後，即到一九二三年二、三月間，列寧和史大林的衝突已經十分尖銳化和表面化了。這衝突的直接原因，是由我們前面所提出過的喬治亞問

題所引起。列寧一方面請求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員會上替喬治亞事件辯護（見前面列寧為此事寫給托氏的信），同時又寫了幾篇攻擊史大林的文章。此外并寫信給老革命家姆狄維亞尼及其他反對史大林對喬治亞政策的人們說：

我全神注意着你們的事件。我氣憤於鄂終尼啓子的殘暴以及史大林和傑爾順斯基的同謀。我爲你們準備幾篇文章和演說。

這裏所謂『演說』，是指列寧準備在十二次黨大會上宣佈的。列寧的秘書福梯耶娃稱這演說是『佛拉狄米爾·伊里奇爲大會準備一顆真正的炸彈，打擊史大林』（福梯耶娃并向托洛茨基聲明，『炸彈』這個字是列寧說的，不是她想出來的）。列寧的『演說』（打擊史大林的『炸彈』）雖因病劇沒有能在十二次黨大會上出現，但列寧已於此時向史大林宣佈『斷絕一切私人同志的關係』了。這一『絕交信』，不但由列寧夫人克魯布斯加雅當天向托洛茨基和加米也夫這樣說過：『佛拉第米爾·伊里奇剛纔口授一封信給史大林，信內宣布與史大林斷絕一切關係』。就是當時史大林的小組織『三頭』之一的季洛維也夫，後來在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也說出了如下的證詞：

『一九二三年初，佛拉第米爾·伊里奇在給史大林同志的一封信中，曾表示和他斷絕一切同志的關係。』（中央

委員會訓錄第四號第二頁。）

這正如克魯布斯加雅向托洛茨基所解釋：『你認識伊里奇的，他若不認爲必須在政治上毀滅史大林，他絕不會走到斷絕個人關係的地步』。列寧在臨死以前，『認爲必須在政治上毀滅史大林』，不僅向黨提議撤換史大林的總書記職務，而且還以『和史大林斷絕一切私人關係』來作決絕的表示，這便是列寧對於史大林的最後的真實態度！

人們如果將克魯布斯加雅在列寧死後寫給托洛茨基信中轉告列寧死前對於托洛茨基所保持的始終不變的『感情』，來同列寧寫給史大林的『絕交信』對比一下，則誰是列寧的朋友，誰是他的敵人，誰是列寧遺教的繼承者，誰是牠的叛徒，那便瞭如指掌了！

『反蘇大陰謀』既一方面完全偽造了托洛茨基『領導』『反對列寧的運動』；但同時對於真正領導反對列寧運動、迫得列寧死前與之絕交的史大林，却諛莫如深；光只這一點也就足夠證明該書用意之無與倫比的陰險、卑鄙和荒謬了！（未完）

信箱

中國社會究竟是何種性質

——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是否正確？

編者先生：約半年前我偶然在報攤上看到了貴誌二卷一期，隨便買了回家，讀完後，深深覺得貴誌獨具眼光，持論公允，與時下一般雜誌大異其趣。從此我便成爲愛好貴誌的讀者了。我尤其愛好的是貴誌的「信箱」。因爲在信箱中所討論的問題，差不多都是我所最感興趣而要求瞭解的。

現在我亦有一個問題特向先生提出，那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這個問題，我在十年前就聽到了一位教歷史的老師曾經給我們講過，但我那時還在高中一年級，對於社會科學毫無修養，同時對於中國社會經濟政治情形又屬茫然，只是模糊地記得老師說過如下的一些話：「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複雜，不容易論定，有些人說中國的社會是資本主義性的，別一些人則說是半封建性的，還有的說是次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等等。」我當時對這些說法雖有點莫明其妙，但亦獲得了頗爲深刻的印象，並且從此凡是看到書籍和論文中涉及到這一問題時，都特別注意。就我所看過的書籍和論文中說到這一問題的論調看來，差不多都是主張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一些新歷史家如胡伯贊、華岡、平心等都是如此）。因此我懷疑以前我的歷史老師的話有些誇大。但不久以前偶然從朋友處看到神州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合訂本，其中有幾期差不多全是爭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從那些爭論看來，不但「非常複雜」，而且也確是「不容易論定」。因此，我又覺得我以前的老師所說的話是對的。不過，中國社會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我還是不明瞭。就我的直覺說，似乎「半封建和半殖民地」是對的。但另一方面我又感到「讀書雜誌」中爭論這問題的那些作者們的許多不同見解也似乎各有理由。因此特希望先生抽暇予以解答，我相信要求明瞭這一問題的人一定不少，想您一定高

興指教吧！敬候撰祺！

讀者吳世明上

世明先生：你這次提出的問題，正如你以前歷史的老師所說，確是「非常重要」和「非常複雜」的。這問題之所以「非常重要」，因爲中國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及其前途，都與此問題有直接的緊密聯繫。如果對於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沒有明確的認識，那對於中國的社會結構、階級關係及其前途都無法獲得正確的理解，因而也就談不到對解決中國問題能有正確的方案。所以凡是認真想替中國人民大眾服務、合理解決中國問題的人，都必須首先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加以科學的探討，求得明確的認識，以便獲得改革的正確指標，向勝利之途奮鬥。總言之，認識中國社會性質是謀取解決中國問題的出發點，出發點是否正確，往後的成敗將繫乎此，這正是所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

至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之所以「非常複雜」，那是由於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某些特點及其與國際關係之特殊糾結使然。假如像歐洲中世紀的英、法、德、意等國家，它們的社會性質是單純的，封建性的；又假如像現代的英、法、德、意，則它們的社會性質也是單純的，即資本主義性的。可是我們中國，古典的（春秋戰國的），即歐洲中世紀式的封建制度，早在二千餘年前已被秦始皇的君主專制所摧毀了。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却沒有能在那被摧毀的封建廢墟上建立起來。秦以後二千餘年，中國社會經濟在本質上很少改變，差不多是處在一個停滯的狀態或一進一退的循環圈裏。直至雅利安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強迫侵入，中國的社會經濟才開始走上了劇烈的全新的變化。這就是說，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在外來資本主義傾銷商品和搜求原料的侵襲之下逐步地解體了，手工業的生產方式逐步地沒落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逐步地移植進來

了。但另一方面，不但舊時的封建式的剝削方法還殘存着，並已與資本主義的剝削方法糾纏在一起，而且特別重要的，中國已迅速地變成了國際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以致舊的經濟基礎雖日趨崩潰，但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却無由順利發展，因而中國社會便形成了一種頗爲畸形的，癱瘓的，或者是所謂「非常複雜」的狀態。然而這種「非常複雜」的狀態，却並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不過不像歐洲中世紀的以及現代的英、法、德、意那樣單純而容易認識罷了。自然要詳盡而準確地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必須詳細地檢討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百年來歷史的發展，分析自西方資本主義侵入後中國國內社會經濟的演化及其與國外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關係之變遷。但要辦到這點，絕非本信箱的簡短篇幅所能容許。因此我們這裏只能予以極簡略的解答。

首先，要判定中國的社會性質，根據現代社會科學，必須觀察中國現時究以何種經濟佔支配地位。如果是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佔優勢，那可以說中國的社會還是封建性的或前資本主義的；如果是城市的現代工商業經濟佔支配地位，那便成爲資本主義性的了。就實際情形來說，中國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早已給外來的資本主義所破壞了。我們的農村生產方法固然還是落後的手工業式的，但大部份農民的生產品却并非只是爲了「自給自足」，而早已成了「商品」。例如米、麥，特別是絲、茶、棉花、桐油和煙葉等等，其中有些不僅爲了國內市場，而且還爲了國際市場。總一句話說，中國的農村經濟絕大部份已經商業化了，已經非依賴現代的市場不可了。另一方面，中國現代式的工商業，比起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固然還很落後，但人們絕不能否認，我們確已有了相當數量的工廠，交通，和銀行等現代產業。這些產業比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固然顯得落後，但它們在中國的國民經濟生活上却無疑地佔據了支配的地位。因此我們可以斷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的。不用說，中國的資本主義是落後的，但絕不能以它的落後來否認中國社會之資本主義的性質。

人們往往以中國的經濟和先進國英美法德的經濟相對

比而指出其落後幼稚之後，便得結論說，中國社會的性質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或半封建的。其實，十八世紀的英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美法德，比起現時同一英美法德來也是「落後或幼稚」的。但「資本論」的作者却仍然稱十八世紀末的英國和十九世紀中葉的美法德為資本主義國家。中國現時的資本主義雖然落後或幼稚，但比之那些時候的英美法德等國，却不見得落後或幼稚多少，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如生產的規模和技術的高度，現時的中國比之那些時候的英美法德還要進步呢！把中國現時的經濟與同時的四方先進國家即發展到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經濟對來比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那顯然出於玄學的，機械的，即違反歷史發展的觀點，因而其結論便成爲荒謬的了。

你說：「就我所看過的書籍和論文中說到這一問題的論調看來，差不多都是主張『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你并指出『一些新歷史家如翦伯贊，華崗，平心等都是如此主張』。不錯，近年來，一班所謂『新歷史家』或『進步人士』一談到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時，都搬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這一個時髦的公式出來。但這僅僅是一個時髦公式罷了，它的本身全是虛偽的，乃至荒謬的。這公式的前半節，所謂『半封建』（姑且不論這種『一半』的說法之機械）是形式主義的，與中國社會的實質相違背的。因爲封建的實質即它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但如我們前面所指出的，中國自從外來資本主義侵入之後，不但城市經濟已完全商品化，就是鄉村經濟也已絕大部份爲商業關係所支配了。因此所謂『半封建』與中國『社會的實質』，即經濟基礎，是完全不相符合的。至於以所謂『半殖民地』來形容或規定中國的社會性質，那更是荒謬絕倫。因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這一類術語的涵義，僅僅是指某一國家或民族對另一國家或民族的隸屬或依賴關係而言，與該隸屬或依賴於他國的國家或民族的社會性質很少決定作用。例如現時的加拿大，印度和安南都叫做『殖民地』，但這三個國家的社會性質却有很大的差異：加拿大是純粹的并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

會；印度也是資本主義性的，但比之前者要落後得多；而安南的資本主義發展却有阻礙。而且同一殖民地，例如印度，在十九世紀前半期，可以說它的社會性全是封建的；但到了第一次大戰後，特別是第二次大戰後，它的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了。關於『半殖民地』的情形也同樣有這種空間和時間上的鉅大差異。例如中國，伊期和沙地阿拉伯都謂之『半殖民地』。但這三個國家的社會經濟却相差得很遠。在中國已經有了相當數量的大規模的現代工商業，伊期便比較落後些，而沙地阿拉伯則大部份還停滯在游牧經濟狀態裏。如果從時間上說，中國自鴉片戰爭後即已淪爲半殖民地，但這一百年來中國的社會經濟基礎却起了絕大的變化。如果以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爲標界，我們可以說，這時以前的中國社會是前資本主義性的；從那時到第一次大戰這一時期內，是從前資本主義走向資本主義的過渡時代；但自第一次大戰後，由於工商業的蓬勃發展，中國社會便已踏進資本主義的階段了。由此可以瞭解，『半殖民地』的名稱如果從空間和時間上抽出來，不但絕難看出半殖民地國家的社會性質，即連該半殖民地國家的本身也是抽象的。因此，用『半殖民地』來規定中國社會的性質，不但毫無用處，且是極端荒謬的。

也許你看到這裏一定發生疑問：一個極端荒謬的公式，而且是對於中國社會性質如此重要問題上所加的公式，何以竟被許多有名的新歷史家所接受或主張呢？我們這兒只能作個最簡單的答覆：中國有一個政治集團，它是唯蘇聯克里姆宮主人的命令是聽的，而克里姆宮主人爲了在中國進行一種機會主義的政治路線（即階級合作的路線），便命令一些『紅色教授』給中國社會的性質製造出一些『公式』來，以便給他的『政治路線』以『理論的基礎』。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公式不過是許多公式中之一而已。而他的中國黨徒們接到了這個『公式』便如獲至寶，所謂『新歷史家們』或『新社會科學家們』當然是奉旨宣傳。至於這個『公式』是否合於中國社會的實質，那他們是不管的，只要作到不違背上峯的命令就行了。其實不

僅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是如此，還有其他許多重要問題，只要克里姆宮一提出，它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應聲蟲們便會附和起來。例如當克里姆宮提出什麼『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時，人們就到處宣傳『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當它拋棄『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而另提出『民主陣線和人民陣線』時，人們也就跟着拋棄前者而宣傳後者，并要求與『社會法西斯』結成『陣線』哩！總而言之，凡是克里姆宮提出一種『主張』或『路線』，不管那主張和路線如何荒謬，都必得製造一套『理論』或『公式』來與之相配合，有時甚至不惜大規模地偽造蘇聯及各國的歷史。固然，有許多人，特別是青年人，在主觀上并不是有意附和克里姆宮的『理論』或『公式』的，但他們往往缺乏獨立的認真的思考，所以就隨聲附和去了！這雖是一些題外的話，但我們的意思是希望你及一般讀者們不要輕信所謂多數人的『主張』，即令是出之於『新歷史家』或『新社會科學家』所公認的『理論』或『公式』，也得加以獨立的認真的思考，尤其要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和客觀的歷史事實去分析和判斷。思想上的盲從只能引你走上行動的死巷！

現在讓我們再回到本題上來作個結論吧。一般說，中國的社會是資本主義性的。但我們的資本主義是落後的。它的落後的根源是：一方面，國內陳舊的土地關係尙遠未改革，以致封建的殘餘勢力及其剝削方法尙保留下來；同時，國際帝國主義自從將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之後，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極力加以壓抑；因此，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便無由獲得應有的發展而永久掙扎於落後狀態中了！由此我們便得出一個基本的政治結論：中國要想脫離它現存的落後的痛苦狀態，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和排除任何帝國主義的束縛以達到真正民族獨立，這便是我們國家遲延未決的歷史的民主任務。在資本主義佔優勢的社會關係下，城市決定一切，也就是城市的主要階級決定一切。而城市的主要階級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我們的資產階級，因爲它與外來帝國主義和國內土地佔有者有不可分離的聯繫，它沒有可能完成我們的民主任務，因而這一任務便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無產階級完成這一民主任務之後，那時中國將不是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要跟着直接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途了。

以上的解答自然過於簡單，如你或其他讀者們還有不同意見或須要更詳細解釋，那儘可提出來。爲了真理，我們總是樂於同你及任何讀者們來作進一步的討論的。編者

內政部登記證警滬字第二二一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五號

原名：青年與婦女

新聲

第三卷 第一期

靜觀「國大」行憲

「舊行憲法」後的第一屆「國民大會」，已決定在三月二十九日揭幕。牠的主要議程是「選舉」總統副總統，並「產生新政府」。因此，為數不多的人們都相信：「我們的國家將從封建的專制典型轉變為近代的民主典型，五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民主憲政政府即可建立，中國人民從此便將由他們自己來治理自己了」。這就是說，這次「國民大會」定將結束以前一黨專政的「訓政時期」，真正「還政於民」了！倘若事實的確是這樣，那倒是一番新的現象！但人們願意相信奇蹟，自不妨作如是想；反之，如果根據過去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則凡是稍具政治頭腦的人都不能不認為：這種「新現象」，無非是過去的舊現象之粉飾吧了！一切的政府機構和「國策」，都將「一仍舊貫」，那是可斷言的。

實際上，中國近四十年來的歷史，已經表演過不少的「民主憲政」滑稽劇了。人民不但睜着眼睛聽由擺佈，且還要承受這些表演所帶來的後果——更大的災難和痛苦！他們即使由於健忘，記不起很久以前的故事，但至少，上次「國大」的事實和結果，用不着重提也會映現在眼前的。至於這次「國大代表」的產生，則更創了許多的先例。比如代表退讓問題，便是聞所未聞的。因為

看，歐美各民主國家實行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罷工及人身等基本自由權利，在中國反而盡付缺如，這又成了週知的事實，任何漂亮外衣都掩不了人民這種民主權利之被剝奪。而且最重要的，極大多數人民都輾轉在絕難忍受的痛苦災難中，這更是「行憲國大」揭幕前夕最普遍而又最嚴重的「舊現象」！

當今天「國大」正在召開的時候，如果政府真有決心「結束一黨專政，還政於民」，那就應該首先用事實來表明，用行動來保障實施上述的基本民主權利，這樣才能獲得人民的信任。不然，那只是再多一次證明：民主憲政決不是由上面所恩賜得到，而是靠人民自己用力量去爭取的。但人民要發揮自己的力量，首先便須覺醒和團結，然後能從日常的起碼的奮鬥開始，逐漸努力爭取一個由普選產生代表而且具有全部權力解決國是的國民會議之實現。只當這樣的國民會議爭得實現之日，才是解決一切國家大事、消除人民痛苦之時！（流光）

37年 4月1日

論	靜觀「國大」行憲	流光
壇	評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的土地方案	旭東
	首都教授發表時局主張的意義	鏡微
	「美援」與中國經濟的動向	竹雲龍
	美蘇「冷戰」走向白熱化	劉乃光
	捷克政變及其所引起的後果	韻覓
	意大利會走上捷克之路嗎？	江濤
	知識份子的幻滅與新時代的展望	紀芬
	倫里昂·托洛斯基	曉星輝
國際	巴黎勞工反對工會分裂	沈念輝
	英國經濟的新危機	
	伊拉克人民的騷動	
	印度羣衆的一個大集會	
爪	關於中共土地改革的討論（信箱）	張務善

「美援」與中國經濟的動向

竹雲龍

貝祖貽去美月餘，穩定中國經濟的金融性借款，由商談而終於全無着落。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却答應給中國五億七千萬美元的「援助」，其中有六千萬指定為「建設華南」的經費，大部份則為軍需物資。中國政府雖失望於「美貸」，却獲得五億餘「美援」物資及機器；穩定經濟局面雖不可能，軍事局勢却獲「益」匪淺。

美國單予「援助」而不給貸款，那是美國的國際政策，並無矛盾之點。在美國統治者的眼中，中國是「無能而貪污」的同盟者，一切調查與報告都說明中國既無力償還大量外債，也無法穩定通貨或平衡收支，但是，美國在遠東除了一手扶植的日本之外，「反共」的同盟者還只有中國，因而美國雖拒絕六億美元的借款要求，却慷慨送給中國五億七千萬美元的「援助」。這一美國對外政策，起因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極度不穩且腐朽，同時也受美國自身生產力與輸出力的限制。美國一方面以軍需品幫助一切反共政府，遏止各國共軍的發展；另一方面，則以金錢與物資穩定尚未發生內戰的國家之經濟情況，支持各國資產階級政黨去打擊共產黨或其他革命政黨。這一政策是二次大戰的延續，三次大戰的「布局」。宋子文之主專與美國之向專投資，冷靜加以分析，好像兩國政府之間不無「默契」存在，這一「默契」就是：在三次大戰的準備時期，華南將成為未來的「後方」，建設與練兵並進，就成為「營務之急」了。

世界局勢非常明確地暴露資本主義舊制度之腐朽不可挽救，一切「復興」計劃，不是幻想就是未來戰爭的準備行爲，美國戰後兩年來的對外「援助」與「救濟」，一方面爲造成虛偽的國際貿易購買力以暫緩其本身的經濟大恐慌，另一方面則着眼於阻止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企圖最後以三次大戰來解決「共產主義問題」。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說：美國早已失去了穩定任何資本主義國家（連其本國在內）的信心，它的對外援助救濟或貸款，是資本主義的最後掙扎，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行爲。所以，美國的對華「援助」一貫帶着明顯的戰略性質，其對於華南地區的特別「注意」，無疑是爲了未來戰爭的交通、電力、軍火廠等等的原故。我們如果再注意美國堅決佔領琉球島及同台灣投資這兩件事，與其對華「援助」一同考察，更證明美國將「國防線」擴展至太平洋彼岸的企圖與決心。在私有制度中，一切國與國之間的「友誼」行爲，都建基於利害關係之上。美國如此慷慨地對待全世界資本主義各國，與其對待蘇聯的手段對照起來一看，就不難知道其中的奧妙了。

半年來國內軍事形勢的新發展（東北危急與華北吃緊），迫使資金紛紛向南逃避，一部份流入台灣，一部份逃往香港，另一部份則避難外國去了。不但東北華北的資金南逃，華中的資金也開始南逃了。此外，尤其值得注意的事是：工業南移的傾向，逐漸明顯了。上海已有十餘萬紗錠陸續向南裝運，少數不日即可開工，又有幾家機器廠及鐵工廠已搬到香港或台灣去開工了；大部份戰時向歐美定購的

評中國土地改革協會的「土地改革方案」

中國土地問題的日趨嚴重，不但引起了在野各派的關注并各自提出其解決方案，就是官方和半官方也被迫着不得不對這一問題加以某種救急的應付了。最近「中國土地改革協會」所宣佈的「土地改革方案」，可說是代表半官方對土地問題的態度及其解決法之一種頗爲有系統的表现。

該「方案」的「序言」說：「中國土地改革協會自鑒於我國土地問題之嚴重，已成爲一切禍亂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而政府現行有關土地的政策與法令，并不足以根本解決這一問題。如果不急求徹底而普遍的改革，實有非常可怕的後果。」在這一談話中，除了對政府現行有關土地的政策和法令「批評得不够外，我們認爲大體是正確的。但該「方案」提出關於「以期迅速而普遍的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標」的具體辦法時，却未免太不「迅速」，太不「普遍」，尤其是太不「徹底」了！

例如該方案第二章說：「終止佃農制度，化佃農爲自耕農。現在佃耕他人土地之農民，分年償清地價，取得土地所有權，化佃農爲自耕農。上項地價爲現租額之七倍，分十四年交納，但租額超過正產物百分之三十七五者，應仍以百分之三十七五計算之」。這算是「土地改革方案」中對於改革土地之最根本和最具體的辦法。但這辦法內却明顯地包含着三個主要矛盾：（一）雖然允許佃農「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必須在「十四年」之後，這無乃太不「迅速」；（二）而且佃農取得土地所有權，又必須每年交納將近合原有地租十分之二的地價（即百分之三十七五的正產額的一半），未免太不徹底；（三）只注意佃農，而對於廣大無土地及土地不足的貧農，沒有提出任何救濟的辦法，未免太不「普遍」。而且該「方案」第四章（三）條內又規定「取得土地之新自耕農，負交納地稅（每年土地生產額十分之一）之義務」。這項地稅與每年應繳地價合起來，便已佔到全生產額十分之三了。如果再加上

機器，以及最近的進口原料，都集中香港，其中少數已在香港裝配開工了。中美合資的工廠（包括紡織、燒碱、電力等）已在廣州香港及台灣等地積極籌備。政府所屬的資源委員會，則積極在湖南江西等省籌劃增加煤鐵礦產量。以上這許多事實，雖不足以否定上海仍為全國工業的中心，但已證實中國的資金及工業一部份確實已向南方移動，因為港台兩地通貨穩定，南方原料進口便利，電力及燃料價廉而易購，勞力較上海低廉，尤其離北方的軍事威脅較遠。台幣之日益拾價，一九四七年香港匯豐銀行之空前盈利與信用膨脹，以及兩地工業水準的逐步上升，是資金與工業南移的必然後果。

戰後中國經濟的新發展，只能以歷史不平衡發展或綜合發展規律去解釋。這一發展傾向，一方面是北方激烈戰事所促成的，一方面也是美國資本投向南華南並「建議」中國政府開發華南所促成的。可是，這一新發展，與東北工業的徹底破敗相比，與華北工業的停滯蕭條相比，與上海區工業的漸露疲態相比，就顯得出中國經濟的真實狀況了。華南的發展十倍也抵不上東北與華北的破敗或衰落。除了香港和台灣之外，全國正面臨各種嚴重的經濟難題，其主要病徵就是物價瘋狂飛騰與生產日益減縮。全國各地的經濟總崩潰現象，與港台兩地的新發展相互對照，可知南方的假繁榮，起因於北方的恐慌和動亂，它非但不能為中國經濟打開一條出路，客觀上却幫助美國在南方的野心，迫使中國又滾入戰時經濟的泥沼，且日益受美國資本的支配。建基於全國災禍之上的南方短暫的穩定與假繁榮，不但不能「建國」，適足以為準備三次大戰作急先鋒而召來浩劫。

三月餘以來，由於軍事局勢的影響，由於法幣流通地域的縮小，由於政府的收支額日益背道而馳，由於進口物資的缺乏，由於前線需用的日益浩大，由於交通工具之不勝重負，由於廣大農村的破產，由於紙幣之濫發，十分之九以上的中國版圖，已浸入經濟總崩潰的險浪中了。物價每月上漲一倍或一倍以上，若再發展下去，一九四八年的物價將較去年上漲幾百倍！人民將無法生活，工廠商店也將無法營業，一個大的災難將不可避免地襲擊中國的窮苦民衆，直至他們自動奮起解除這一災難為止。

自從公佈「經濟戡亂法案」以來，為時不過三月餘，米價上漲四倍多，油類及紗布的漲風則尤其驚人。政府初則寄厚望於美貸，希望以「改革幣制」的魔術來取得暫時穩定。失望後則又高呼「軍事援華」，這是自身無法解決難題而希望三次大戰快些爆發的統治層意識。歷史上從來沒有「便宜貨」，中國以往依附英美希望日本倒台後「坐享其成」，結果，雖將抗戰拖至二次大戰同時結束，空得一個「勝利國」頭銜，却未代中國打開一條生路。因為中國並未勝利，勝利者僅是劃分勢力範圍簽訂秘密條約的英美蘇法而已。如果今天還不懂得八年抗戰的血的教訓，一味幻想三次大戰來解決問題，那真正是愚不可及了！

無論如何，經濟崩潰事實上已經開始了，且發展了一個多月，如果事前明知它要發生而無法阻止，事後更是毫無辦法的了。一切虛張聲勢和空言允諾，早已在事實面前暴露出可笑而無能。

華南經濟方面的新發展，不能阻止北方的總崩潰，而事實上前者恰好是後者所造成的。兩種矛盾的經濟現象，同時發生在一個國家，但中國經濟的今後動向，仍舊沿着舊的軌道向新的災難發展着。

其他的苛捐雜稅，則「取得土地所有權」的「自耕農」，其貧困與痛苦與以前的情況仍然沒有什麼區別。因此，我們有權利說，中國土地改革協會這次所宣佈的「土地改革方案」，與以前立法院所公佈的土地改革法案一樣，僅僅是一個畫餅而已。

假如人們真正認識「我國土地問題之嚴重，已經成爲一切禍亂的根源和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如果不急求徹底而普遍的改革，實有非常可怕的後果」，則底下的幾種辦法是絕對需要而且必須立刻實行的：（一）無賠償地沒收一切地主的土地爲國有；（二）將所沒收的土地按照農村人口重新平均分配於一切農民；（三）廢除一切苛捐雜稅，重新規定不得超過土地生產額十分之一的單一地稅；（四）廢除一切高利貸，由國家銀行貸予農民以百分之三以下的利息的貸款。我們認爲只有這幾種緊急辦法立刻付諸實施後，才能解消「一切禍亂的根源」，才能挽救民族於死亡。否則，「非常可怕的後果」是無法避免的！（旭東）

首都大學教授對時局發表主張的意義

南京最近自倪青原等四十七教授聯名發表「爲當前時局告國人書」後（見大公報廿五日所載），跟着勾作謙等一百教授復聯名發表「對時局宣言」（全報廿七日），差不多同時，羅夢冊等十一教授又在政治大學座談會上各自發表「對於時局的認識和主張」（全報廿八日），——這一現象，不能不說是中國當前局勢已陷入異常嚴重危機和急需加以改革之一種反映！現在讓我們將教授們對於局勢嚴重性的認識及其改革要求摘出幾個要點來看吧：

關於局勢的嚴重性，倪青原等告國人書中說：「當前國家已面臨極嚴重之危機。全國人民正遭遇最陰沉之恐怖，吾人精神上所感苦悶之深刻，及生活上所受壓迫之沉重，實已遠超抗日時期任何階段。際此舉國惶惑，民不聊生之時，吾人已忍無可忍，不能再事緘默」。勾作謙等的「宣言」則稱：

美蘇「冷戰」走向白熱化

劉乃光

最近，美蘇間的「冷戰」是愈來愈熾烈了！由於捷克共產黨的奪取政權、以及史大林壓迫芬蘭簽訂軍事同盟等的直接刺激，西歐五國（英、法、荷、比、盧）的軍事聯盟公約便以空前迅速的步驟簽訂了；跟着，西歐十六國的經濟會議也已在巴黎召開，且准許西德參加；而西德則自外長會議破裂後，美英法三佔領區政府今天已團結一致，成立了統一的新政府。另一方面，在美國國內，馬歇爾的五十億元援歐法案，已經參院表決通過；杜魯門則向議會提議恢復徵兵制，迅速完成援歐方案的立法手續，並立即制定普通軍訓法；馬歇爾也表示「局勢極為嚴重」，因而敦促議會採取決定行動；此外，軍事領袖也在召開秘密會議，以統一陸海空三軍；而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則更是危言聳聽，說「世界危機或許在今後四五個星期內爆發。」……這一連串事實，便使戰爭的空氣籠罩了華府，並進而傳染到全世界！人們的神經緊張到萬分，彷彿第三次大戰就要一觸即發了！

從上面這許多事實可以證明，目前形勢的特點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今天已不得不把走向戰爭看作唯一的出路。牠們今天的一切努力，都為的是企圖盡量鞏固其經濟地位和軍事據點。即使馬歇爾的援歐計劃，也並非要恢復歐洲戰前的生產（他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主要是準備新戰爭的。當然，牠們在主觀上也許並不願意再來一次戰爭，但資本主義本身的經濟危機却迫使牠們非走這條路不可，恰如一個人在臨死時不得不掙扎一樣。這在表面上似乎是要對付蘇聯的統治者，而實際上則是要對付共產主義。（不幸的是牠們誤把史大林主義也籠統地包括在共產主義的範疇內，把史大林當作共產主義的化身來反對而已。）因為今天對資本主義世界威脅最大的是國際的無產階級，他們都在戰後經濟普遍衰敗的無出路中，極力渴求走向真正的共產主義道路。這個威脅最清楚的表現是在法意。美國不惜以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去支持各國的獨裁政府，其目的就是要對付革命。更恰切點說，華爾街在反史大林「極權主義」的旗幟之下，正動員世界資產階級的輿論來反對世界革命。

關於這一點，華盛頓的三月十八日廣播也已隱約地指出：馬歇爾們「現在很顧慮到共黨向西歐推進的運動，就連史大林本人也沒法加以制止。」馬歇爾們「相信蘇聯並不要戰爭」，但「現在所怕的就是蘇聯的衛星國家或是過激的政治組織不顧莫斯科避戰的意願，而採取足以引起戰爭的行動」。在這段話裏，美帝國主義的發言人是明白地將史大林和「過激的政治組織」及其運動截然分開的。但我們應該補充說明：所謂「共黨向西歐推進的運動」，其實就是指西歐工人的社會主義運動，共產黨只不過把這些運動的領導權奪在自己手中，使之適合於牠自己的利益而已。只有歐洲工人這種社會主義運動，才是「史大林本人也沒法加以制止」，因而使馬歇爾「很顧慮」和懼怕的。不然，假如這只是各國共產黨的改良主義運動，那牠們就應該完全受命於莫斯科的「總路線」，斷不會違反後者的意願，不會「連史大林本人也沒法加以制止」了。

我國局勢自勝利以還，轉益惡劣。魚爛土崩，形勢日危。加之國際風雲變幻莫測。凡我同胞，莫不痛心疾首，引為至憂。至於造成此種嚴重局勢的根因，教授們除指責中共稱兵作亂及種種暴行之外，就是歸結於政府當局希有的腐敗無能。例如倪青原等所抨擊的「政府負責人昧於國際潮流，背乎歷史傾向，只知鋪張民主之形式，不識厲行法治之精神，政令出之以「手諭」，公事取決於「請示」，官署等於虛設，官員類似傳達。全國政事為極少數不學無術之徒所操縱，而讒佞奸詐之流更從而上下其手，極盡蒙蔽推諉之能事。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濫用權威，公行賄賂，以致行政效率，極度低落。便共黨得乘機以「新民主」為號召，橫施極權制度之狠毒——」勾作謙等關於這方面的補充是：「實由於主持政務者，上則玩弄權術，中則把持操縱，下則阿諛逢迎，紀綱蕩然，是非混淆，上無可揆之道，下無法紀之守，既未能實行節制資本，抑且放縱私人游資，聽其無限制之泛濫，形成壟斷資本，投機、囤積、浪費、荒淫之現象。亦未實行——耕者有其田，於是縱容地主階級，以維持最惡劣之佃租制度，且將各級地方政權與民意機關，乃至社會經濟力量，落諸地主階級及其代表人——官僚集團——之手」。因此，教授們要求「在政治上採用輸血治療，立刻開放政權，擴大政府基礎——」。在經濟上，從速履行「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強制徵收官僚富戶之財產——！以及嚴懲貪污等。羅夢冊教授並且聲明：「我們現在希望一種新的力量產生，這種力量可以壓迫當局改革現狀，假定他不改，則取而代之——」。劉不同教授更表現得激烈些，例如他說：「我們的政府，墮落腐敗，為政者只能代表他本人的利益，其他一切非其所能，歷史上曾有過這樣庸俗無能的醫生。現在要我們自己來開方子，我沒有第二個主張，唯一的辦法就是請他們這班人走！」（羅劉的話均見政治大學座談）大家知道，南京的大學教授，一向為政府當局所審慎選派和直接監視，素以「穩健」著稱，而於「國大開幕」和「總統選舉」之前夕，竟對政府當

美國在反史大林「極權主義」旗幟之下，動員輿論來反對社會主義革命，這恰恰是反映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本身的異常尖銳的矛盾，牠的懼怕和「顧慮」並不是一種杞憂。只有從牠們害怕革命這一角度去觀察，我們才能更明確地瞭解，美國何以對四月十八日的意大利普選那麼懼怕，要以停止美援來威脅牠，又要以歸還特港來拉攏牠。美國所「怕」的主要是意大利工農羣衆再來一次比去年十一月更「過激」的運動，而不是「怕」意大利共產黨會有勇氣和決心奪取政權。因爲正如塔特貝爾納斯時所說的：「蘇聯只不過在雅爾達協定所確認的蘇聯勢力圈內鞏固其地位罷了」，共產黨最近雖敢在捷克採取這一步，但却不敢在協定所確認的勢力圈外（即意大利）依樣地做，不然，牠在去年十一月的總罷工鬥爭中早就應該做過，因爲那時奪取政權的條件本已非常成熟了！

可是，杜魯門們就這樣故意地有計劃地利用戰爭的恐懼心理，製造出戰爭的空氣，動員世界的輿論，以之威脅莫斯科，並把戰爭的責任轉嫁給後者來負。史大林在這種戰爭氣氛中，於是被迫得改變過去兩年來在聯合國各種會議中討價還價及「裁軍」等政策，而走上冒險的道路，逐漸把東歐的許多國家完全控制起來，以鞏固自己的衛星地帶；另一方面則在法意等國家發動遊擊式的罷工，利用革命來威脅美國，恰如美國之利用戰爭來威脅他本人一樣。但這一來，却只有更加推使牠一直走到戰爭的深淵去。他這種自保的經驗主義政策，唯一的結果只能在國際上給予美國輿論的藉口，造成不利於蘇聯的地位和空氣；另一方面，他的零星的罷工政策，也只能不斷浪費了各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客觀上幫助了法西斯主義和美國，不自覺地在推動戰爭走向爆發。

在這種情形底下，假如目前的一切條件不變，則戰爭就似乎不可避免，目前美蘇雙方的「冷戰」就要達到白熱化的沸騰點了。但我們認爲：在歐洲無產階級革命力量未被徹底擊潰之前，第三次大戰是不會立即爆發的，美國沒有除去這一革命威脅，是不敢冒險發動戰爭的。因此，目前整個國際局勢正陷於無出路狀態中，無論杜魯門和馬歇爾，也無論史大林及其各國徒黨們，都不能替人類打開一條出路——除了以爲戰爭就是出路之外。唯一的前途決定在國際無產階級及被壓迫民衆和資本主義所作的決鬥，即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之上（這一決鬥的中心現時無疑是在法國）。假如不幸革命失敗，則新的戰爭勢難避免，人類前途也就不堪設想了。但根據一切現存的事實，我們堅決相信：革命的力量將及時團結起來，形成一個新的領導，滿足各國工農的要求，把社會主義革命帶到勝利之路，以此阻止第三次大戰！

捷克政變及其所引起的後果

韻寬

自捷克政變發生後，不但在它國內政治上起了極大的變化，即在全世界的輿論和國際關係上，亦掀起了巨大的震動。尤其是美國，當捷克政變發生後，華爾街的代表們，從杜魯門，馬歇爾到貝爾納斯，都歇斯底里地利用這一政變的事實，來加緊作反蘇的宣傳，而且特別加緊作反蘇戰爭——三次大戰——的軍事準備，使整個的美國儼然陷於劍拔弩張的戰爭狀態之中！以致引起美蘇矛盾之更加尖銳化，刺激着整個人類對於三次大戰的恐懼與驚慌！

這次捷克的政變，實際上本是由於克羅姆宮對美國謀取妥協失望後的一種表現，尤其是杜魯門的反共政策和馬歇爾的援歐計劃以及建立西歐軍事同盟一連串的反蘇事實所刺激起來的。原來克羅姆宮戰後對東歐衛星國的一貫政策，是壓制工農的革命運動，與資產階級謀取妥協，建立「聯合政府」的。

局發表如此激烈的抨擊，提出頗爲急進的要求，這就足夠暴露我國當前局勢之陷於何等嚴重的危機，及如何急需加以徹底的改革了！因此我們可以說，南京大學教授們這次對時局聯名發表主張，要求民主改革的運動，實含有頗爲重大的政治意義。但這運動能否擴展到全國，形成一種新的民主改革浪潮，獲得進步的成果，那就要看全國民衆能否及時起而以自己的力量影響這一運動，推進這一運動，乃至改變這一運動的走向來決定。但有一點是可以預斷的：南京大學教授們的這一運動是不會停止的。它將在國共兩黨之世抄尋一個出口，形成「第三種力量」，甚至形成「第三黨」，在華盛頓的影響之下，進行民主改良的鬥爭。這一鬥爭自不能挽救中國當前的嚴重危局，但它有可能引起另一個更進步的鬥爭的爆發。我們期待着由此引出一個更進步的鬥爭之到來！（鏡微）

意大利會走上捷克之路嗎

緊隨着捷克政變之後，意大利四月十八日的普選就成了全球矚目的焦點了。

捷克共和國的「慘變」，已使整個「文明」（即資產階級）世界「大爲震驚」。因此，他們不僅要向莫斯科提出新的警告：「一旦意共在普選中獲勝，意國將得不到美金的援助了」（杜魯門語），並且，在這些警告後面，「還應該用實力來支持」。於是杜魯門急急地向兩院宣稱要：「恢復徵兵制，制定普通軍訓法，加速通過援歐法」，西歐五國聯盟公約加速簽訂了，而十六國經濟會議也正在召開。但這些支持，對於那被戰爭與工農的鬥爭弄得衰頹不堪的意國資產階級是顯得緩不濟急的。喀斯貝里眼見意共之加緊活動與工農日增的聲威，不得不向其保護者求救。果不負所望，美英法亦慷慨地宣告將特里雅斯特自由區和北非殖民地歸還意國了。當然，誰也不會以爲這些殖民地的歸還是爲了復活莫沙里尼殉葬的帝國經濟的繁榮。但這一紙支票，却確可將成爲喀斯貝里在競選中的主要政治資本，他藉此不但在迷惑的愛國主義的小資產階級面前誇

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害怕這些國家的工農走向奪取政權，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威脅其官僚的統治；但另一方面，也是在美國原子彈的威脅下，害怕三次大戰，企圖以此種政策，贏得美國的諒解而與之妥協，藉以避免反蘇的戰爭。但這一企圖，被一連串的事實證明美國是在各方面從事反蘇戰爭的準備時，克羅姆官便被逼起而抵抗，因而在匈牙利，羅馬尼亞等國以官僚手法製造了一批政變，排除了一部分傾向美國的資產階級份子，以鞏固其在東歐的控制權。這次捷克的政變，不過是繼續匈、羅等國的政變之一種表現而已。

捷克在東歐原是一個工業最發達而具有歐洲資產階級民主傳統的國家。當納粹崩潰之後，在東歐引起革命運動的國家中，它也是最激烈的一個。當紅軍進入捷克時，革命的潮湧已經達到了高度，工人自動成立了工場委員會來管理工廠，甚至佔領工廠。同時創造了類似蘇維埃的委員會，將一切的地方政治權利和一切武裝都集中於工人手中，形成了兩重政權的局勢。這就足夠證明捷克無產階級力量的強大和覺悟程度了。當時只是沒有完全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那是由於缺乏一個真正無產階級革命黨領導的原故。另一方面，捷克資產階級在東歐也是最強有力的，因而也就特別強烈地傾向西方，尤其傾向美國。美國亦特別注意和重視它，甚至公然稱捷克為西歐親視東歐的「小窗」。正因此，克羅姆官對捷克的態度也就特別顧忌。這從最初迅速地命令紅軍退出捷克，成立比較接近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聯合政府」明顯地表現了出來。克羅姆官企圖以這樣的「民主政府」作為與西方資本主義，尤其與美國接近的橋樑。但當它從一連串的事實中，看到美國毫無妥協的意向時，尤其看到捷克的民主資產階級對它的危險時，它便以政變的方式，來排除傾向英美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完全轉變捷克為克羅姆官官僚的御用工具了。但實際上，這種工具，不但不能抵抗西方的資本主義，而且也不能解除捷克內部反蘇的矛盾。因為克羅姆官對捷克的政策，亦如對東歐其他國家一樣，是不澈底的。它一方面雖排斥和打擊了傾向美國的某些資產階級分子，但同時却仍舊保持私有制度。那些在私有制度下的資產階級，現時在克羅姆官的刺刀之下，雖然暫時表示容忍和屈服，但一有機會一定會拾起頭來傾向美國，而作反蘇的急先鋒的。同時，在對工農一方面，因為沒有沒收資本家的財產為公有，沒有澈底解決土地問題，勢必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同時，克羅姆官官僚獨裁的作風，絕對沒有民主，在這種情形之下，工農羣衆是不能長久忍受的。因此，捷克的社會矛盾在一個新的基礎之上將會生長起來。建立在這矛盾基礎之上的克羅姆官式的統治，必然是很脆弱而不穩定的。捷克的局勢，乃至整個東歐的局勢，只是一種過渡的階段，最後還是要看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來決定。如果法意的無產階級走上社會主義的勝利，東歐這個矛盾的火山，將首先爆炸，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而克羅姆官的官僚統治，也將在那裏首先分解。如果世界其他國家沒有勝利的革命來干涉，而法西斯的巨魔又在西歐走上了政權，則以美國為領導反蘇的三次大戰就會立即爆發。那時東歐的局勢也將迅速的轉變，不但傾向英美的資產階級將瘋狂進行反蘇的鬥爭，即小資產階級分子，甚至現時站在共黨內的一部分官僚，也可能掉過頭來站在法西斯方面。而廣大的革命工農羣衆，在法西斯的鐵蹄踐踏之下，勢必不能動彈，則東歐各國，捷克當然也在內，勢將成爲美蘇戰爭的犧牲品！

這次捷克的政變，在捷克國內既沒有真正鞏固克羅姆官的地位，但在國際上却特別加強了反蘇的宣傳和軍事的準備。我們現在從捷克政變後在美國表現的輿論和行動來看吧！

從這次事變後，反映得最爲強烈的，第一個要算貝爾納斯了。據紐約十三日廣播貝爾納斯的演辭說：『我們現在應該向莫斯科提出新警告，反對蘇方採用高壓手段，從事擴張，並且在這種警告的後面，應該用實力來支持。』所以最後他提出的重要步驟是：（一）把現時五十五萬的陸軍人數增加到

摩，以圖取其選票，而且可以帶便暴露意共之純爲莫斯科的外交工具，因爲莫斯科會可恥地向意國要求賠款并支持南斯拉夫割去它的特港呀！此外，法意三個協定的簽訂，『已使意國戰後第一次恢復它在國際的地位』。凡此等等，其用意都是爲擁護喀斯貝里能在普選中重新獲得勝利。今天，那不勒斯及羅馬等地競選遊行中之衝突，只不過是美蘇矛盾深化下意國階級鬥爭的催場鼓而已。

捷克政變，一方面加劇了美帝煽動戰火的歇斯里的亞病，以此來恐嚇克羅姆官；同時，在反對方面却使全球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在舊的幻想上派生了新的幻想：匈捷政變之成功，不已證明了東歐新民主主義政制，可以經過和平的政變一步步地推行於世界嗎？如此想着，這些人便自作聰明地替史太林安排計議，而且閉起眼睛坐聽意共政變的捷音了。作如是觀的人誠然不在少數，只是無乃太天真了！

誰也不能否認，自從大戰結束迄今，意國一直處在直接革命的局勢裏。被這垂死的資本制度所驅逼，工農羣衆已在兩次革命浪潮裏英勇地獻身，他們罷工，武裝自己，成立工人政權意味的內部委員會，工兵代表會，國民解放委員會，占領工廠城鎮田地。意國統治階級從自由資產階級的波諾米，巴達格里奧，喀斯貝里到薩伏伊皇室及羅馬教皇，都已衰弱到沒有垣街的輸血就不能活命的程度。而剛從地下鑽出來的意共却很快地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人，擁有二百二十萬的黨員和二十五萬到四十萬的武裝力量。因此，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意共決心走上社會主義，一個奪取政權的號召，從總罷工開始，就可立刻制資產階級於死命了。然而，陶格利亞却不得不惟克羅姆官官僚主義的指揮棒是從。但克羅姆官主人的特種利益，十分懼怕帝國主義的反蘇戰爭，但同時懼怕社會主義的革命。因此，它以許多線索牽動各國的共黨，如何去把革命的羣衆從革命的路上引離，帶到資產階級的廟堂上。以此換取『聯合政府』中的部長大臣的位置，而讓羣衆的手足被網索起來。所以在意國兩次革命的浪潮中，意共都盡力之所能地起了制動機的作用。意共

曾經核准的六十六萬九千名的員額。(二)把擴充空軍和原子彈的程序列入最優先的等級，並增加空軍的經費。(三)設計一個長期的普通軍訓計畫。杜魯門在議會中的演辭更是明白而具體。他說：「捷克共和國淪亡，使整個文明世界受到震驚。現在正以壓力加諸芬蘭，使整個斯干的那維亞半島岌岌不安。所以我們必須另外採取各種措施，以補充聯合國的工作，並支持它的目標。在世界歷史中，有時候行動遠較猶豫為聰明。行動固然包含若干冒險性，但不行動的冒險性更大……」

「所以我認為我的責任，應向議會提出建議，第一，我建議請議會迅速完成對於歐洲復興計劃的行動。這計劃是我們援歐政策的基礎。第二，我建議迅速制定普通軍訓的立法。我們在緊急時期動員大量受有訓練者的能力，可以防止未來的衝突。第三，我建議暫時再制定徵兵的立法案，使我們的武裝部隊維持適當的實力。」

在繼杜魯門向議會建議制定普通軍訓法和徵兵立法以後，馬歇爾十七日在參院海陸空軍事委員會會議席上，立刻予以響應。他說：「若無兵力，則在目前世界大局中的外交行動只有趨於遷就。委員會應討論普通軍訓法及臨時徵兵法，美國空軍的擴充亦有考慮必要。」

我們從貝爾納斯，尤其是從杜魯門和馬歇爾所發表的這些演辭和建議中，明白地看出他們利用這一政變的事實為藉口，不但加緊經濟援歐，而且公然藉此進行軍事的準備，來推動反蘇的戰爭了！因此，整個的美國，又被推進到一個戰時的狀態之中。這便充分地證明美蘇之間的衝突，因捷克的政變，是愈來愈尖銳和白熱化了；三次大戰的氣氛也愈來愈籠罩於整個的星球之上了！

從前這一切總括起來，便可充分地證明，克羅姆宮的主人，為了害怕戰爭而建立東歐的「堡壘」，却反而因此加速了戰爭的步驟。它在戰後對東歐所施行的整個政策，乃是由於它根據過去在第二次大戰中納粹進攻的經驗，以及戰後它與美國所領導的資本主義集團的尖銳對立所決定的。這政策的中心意義，便是企圖將東歐的一切小國，乃至德國的一部分，成為它的「衛星」，建立「戰略堡壘」，以抵禦美帝國主義向它的進攻；同時，它企圖利用西歐共黨所控制下的無產階級力量替克羅姆宮的外交政策服務，利用無產階級的壓力來壓迫美國對它妥協和讓步；然而，這一政策在客觀上却只是使美蘇的矛盾愈趨尖銳，愈益加強三次大戰之到來！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捷克乃至東歐各國的社會矛盾，仍然照舊繼續保存和發展下去，美蘇在東歐的暗鬥和公開的衝突，也將日益發展下去，甚至最後走到爆發點。要根本掃除東歐的矛盾，使它們能真正抵抗美國的進攻，只有工農羣衆自己起來奪取政權，澈底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才有可能。然而，這正是克羅姆宮主人所最害怕的。

人類又已面臨毀滅性的戰爭危機！要避免這一危機之爆發，不但要從根摧毀製造戰爭的資本主義；而且還要無情的摧毀克羅姆宮的官僚獨裁。世界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只有重新集衆在一個新的革命國際（第四國際）的領導之下，堅苦鬥爭，澈底完成世界革命的任務，才能避免毀滅的厄運！

過去既已欺騙了羣衆，今後也不會表現得代表羣衆的利益。其不能不做的，更不用說在社會主義革命了。因為東歐式的「新民主主義」政制，只能在資本主義發展落後而小資產階級佔優勢的國家，而且還值當紅軍的刺刀能控制着區域裏，才不致不安定地存在於可能。其存在之所以仍不安定，是因為美蘇矛盾之愈加尖銳，這些地方所將反映的美蘇矛盾也愈激烈。即被壓迫的階級將日漸加強與帝國主義血絲紐帶的聯繫，而史大林將被迫不得不對之加重壓力；同時工農羣衆對於史大林官僚主義的政制將愈來愈不可忍受，在後一種情形下，更何況軍略地位之重要已使美國不能不千方百計去控制它。意共要舉行政變，即無異向美帝挑戰，最忙美帝軍事進攻的史大林，又怎敢如此呢！

但意共決不會中止其為莫斯科外交工具的鬥爭的。倘若意國工農對資產階級的壓迫又一次地把力量代價去向資產階級換取在「聯合政府」中的席位。這聯合政府也或許可以暫時地使它在美蘇矛盾中「中立」，但不可免地要遭受天折的。因為「改良主義」的麵包屑，決不飽社會主義飢渴的革命羣衆。他們將勇敢地，在革命政黨的紅旗下開展其鬥爭，而這樣的政黨，在意大利是會長起來的。另一方面，反共解放軍，法西斯意大利社會運動團、法西斯革命行動隊等，不下六十個地方的軍事組織，已集匯為法西斯反革命中心，將起而以武力反對革命。這樣，在革命與法西斯兩大主流衝擊之下，任何形式的「聯合政府」，或民主政府，都不會長期存在的。所以意國的民衆仍只能在兩個前途中抉擇：由法西斯到新戰爭的文明火葬，或是由意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到歐洲社會主義聯邦？（江濤）

新聲月刊(原名青年與婦女)第三卷第一期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陳景先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四月一日出版

知識份子的幻滅與新時代的展望

紀芬

(一) 運動的初期

自從科學的社會主義誕生，結束了過去底浪漫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思潮之後，直到今天已差不多一個世紀了。在這將近一個世紀的期間，科學社會主義所經歷的發展過程也就夠複雜、曲折、慘酷和壯烈了。大體上我們可以把它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包括從第一國際產生至巴黎公社失敗的幾年，這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別名——產生和確立基礎的草創階段，在這個階段內，新運動的思想至少在最先進的知識份子和工人中已喚起一種新的希望——對人類遠景的比較切實和樂觀的希望，這一點反映在運動初期領導人物所懷抱的強烈革命信念中。但巴黎公社的失敗却帶來一個深刻的反動局面，這一新生、幼弱的希望便遭逢打擊，直接造成第一國際的瓦解。這是科學社會主義所遭逢的第一次厄運。

(二) 第二個時期

但一八七一年後的反動局面却造成資本主義繁榮的基礎。一般的說來，自此以後，歐洲資本主義便急趨向登峯造極的發展；殖民地的市場大大擴展了，歐洲的工業飛速的繁盛起來了，產業工人的數量也空前增加了。歐洲無產階級便逐漸從反動的黑暗中抬起頭來，自信力和戰鬥性也逐漸加強，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在較廣泛、較堅實的基礎之上，重新復興，產生了第二國際。第二國際的最大功績是在黨、工會、和議會鬥爭的基礎上，教育和團結了歐洲各國的無產階級力量。但第二國際之保證工人生活的逐漸改善與民主主義的權利，却分明是以資本主義的空前擴張為前提條件的，正因為如此，在這個時代內，一般小資產階級，包括工人階級內的貴族份子，便生出了一種無窮的、盲目的樂觀主義，以為資本主義的『無限制』的發展可以保證工人地位的『無限制』的逐步的改良，工人階級的數量、牠在議會選舉中的選票和席數的『無限制』的增加，緩進地、和平地代替了資產階級的統治，於是第一國際時代的『強烈的革命信念』為一種庸俗的改良主義與議會主義所代替。這是對於科學社會主義第一次加以全般修正的企圖。當第一次大戰宣告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告終，戰爭與革命的時代到來的時候，受了改良主義完全腐蝕的第二國際便傾覆了。這是科學社會主義所遭逢的第二次打擊。

(三) 第三次復興與第三次厄運

考茨基雖然以反修正主義始，以投降機會主義終，但當他清醒的時候，曾預告歐洲革命的烽火將從西方移到東方。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應驗了這一預言。十月革命使國際無產階級得到第一次表演奪取政權的機會，因此，第一國際時代的革命熱望便得到實現，不是在西方(像馬克思所預言的)，而

是在東方。西歐無產階級開始以驚訝和羨慕的神氣監視莫斯科的發展，當他們毫無躊躇地成千成萬團集於新生的第三國際週圍之時，科學的社會主義便從改良主義的泥沼中得救了，一個新的復興運動從東歐擴展到西方，又從歐洲擴展至全世界，特別是東方的殖民地世界，這一片地球上最落後的處女地也第一次以最熱烈的態度接受科學社會主義的種子了。於是這一運動正式跨入了第三個時期，一種新的樂觀和熱望支離了全世界。這種樂觀是建築在資本主義開始崩潰所引起的革命信念上的，與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改良主義的樂觀完全相反。

但不幸剛替人類展開一個新遠景、新希望的十月革命，却生長於一個落後環境中；西歐無產階級之不能及時奪取政權又使這一革命陷入孤立。在這兩個致命的條件之下，十月革命所造成的蘇維埃制度便趨向官僚主義的墮落和腐化。在分配過程中產生的跋扈的特爾米多官僚層於一九二三年抬頭，一九二八年取得決定勝利之後，科學社會主義的復興運動——布爾什維克主義便為『一國社會主義』的史大林主義所代替，第三國際從世界革命的工具轉變為克林姆官官僚的外交工具，格別烏的暗殺與中世紀式的審判代替了革命的教育和說服。史大林主義的勝利便翻譯成世界革命運動的一連串的失敗，這種失敗反過來又加深了蘇維埃國家的墮落過程。因此一個嶄新的反動時代便從一九二八年開始一直造成了法西斯主義的勝利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只是這個反動時代的一對孿生子。

(四) 新修正主義

這一長期和富於災劫的反動時代，在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內造成一個最深刻的危機。一般往日依附這一運動的知識份子和老一輩知識份子化的工人革命家，受了差不多二十年的長期失敗所磨折，發生一種可怕的頹喪、懷疑和幻滅。他們竟把一部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解釋成爲一部失敗的歷史，十月革命，在他們看來只是一種浪漫的作品，因而是活該受歷史的殘酷懲罰的。十月革命的思想泉源——布爾什維克主義，在他們看來，也只是史大林主義的培養基，後者甚至還被視作前者的有機產物。於是各種各式的新修正主義學說如雨後春筍的產生出來，成了科學社會主義復興的嚴重障礙。所有這些修正主義學說總是圍繞着『俄國問題』的軸心旋轉，這也並不奇怪，因為這個空前的反動時代本來就是蘇維埃國家墮落的直接後果。而這個新生的制度却在人類歷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牠是人類智慧的產物，牠的發展也只能靠人類的智慧才能解釋。從『俄國問題』發展出來的最普遍的修正主義思想，便是認爲科學社會主義不一定是『科學』的，人類歷史的發展也許、恐怕

多份要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分析，下一階段將不是社會主義，而是一種新的剝削制度代替資本主義。這個新制度被標上許多象徵式的名稱：官僚的集體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人們替這個新制度所指出的共通特點是：奴隸勞動、國有化、官僚的集中主義或全能政制、個性活動與自由之橫被剝奪等。公認的新統治階級是行政的官僚。這些特點，離開了財產關係與國家性質，成爲一種抽象和謬誤的理論基礎，認爲法西斯主義、新規約、與史大林主義的政制同屬於這個新剝削制度的類型。

第二次大戰使那些幻滅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把法西斯主義加以合理化的企圖，遭逢破產。歷史證明：法西斯主義與羅斯福的新規約只是資本主義對付社會危機與準備戰爭的應急工具，牠們並不是一個代替資本主義的新制度，恰恰相反，牠們與舊財產制度是不可分離的。但雖然如此，戰後世界革命發展速率的過於延緩與史大林主義的突然興盛，却使這些幻滅的知識份子更陷於無望的混亂和迷惑。『假如法西斯主義不是新制度的表徵，那末，史大林主義政制的擴張（特別是東歐式的擴張）却無論如何預示一種新的剝削制度將代替資本主義』，他們這樣雄辯地指出。有些人則更拿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的趨勢（特別是英國工黨政策），來證明這種『新制度』或『新革命』的不可避免性。

但問題的本身却在這裏：假如這一新制度（不管牠是否賦有什麼剝削的性質）真的成爲資本主義（連同社會主義）的不可避免的代表物，牠當然在歷史上找到一種合理的辯護，我們將對牠採取什麼態度呢？無產階級又將如何應付這一『迷霧』呢？在這個問題上，幻滅的理論家們所產生的怪異的理論分析，簡直有如七色虹彩。大致上歸根結蒂，他們不能超出這兩種傾向：或者直接、間接的擁護『民主』帝國主義的反蘇戰爭政策，企圖挽回這一可怕的全能主義的潮流，或者對史大林主義的『新民主主義』發生宿命主義的幻想，認定整個世界不可免要經過這一段痛苦的歷程，走向社會主義。從這裏，僅僅從這裏我們才尋出這種修正主義的真正根源：悲觀主義。人們再也不信任無產階級能擔當社會改革的重任，自然也就不信任社會主義革命的『必然性』。於是一切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都成了懷疑的對象：布爾什維克主義麼？牠雖然造成十月革命，但也造成史大林主義，這就足以證明馬克思主義缺乏和諧和實現了，云云。實踐的背叛與理論的背叛是同時進行、交互影響的，因爲在過份緊張和激盪的舊世界中，小資產階級的幻滅家是無法從容找到喘息的機會的。在戰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中，從最右傾的投降派一直到那些口頭上尙承認革命的教派主義者，都或多或少的從馬克思主義的政綱懷疑開始，這不是一種價值驚奇的現象。這種現象之反映資本主義崩解時代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悲觀情緒，正如過去第二國際時代同一現象之反映資本主義黃金時代一般小資產階級的樂觀主義。兩個時代的修正主義反映兩個時代的同一小資產階級的不同情緒：一種是幻想，另一種則是幻滅，從此到彼。

(五) 世界革命的速率何以遲緩？

在方法論上，一般的說來，這些知識份子幻滅家總是不能脫離庸俗的經驗主義與唯理主義的範圍。他們只能承認一個又一個的既成事實而把牠們加以理論化，缺乏任何分析和預斷的能力，因爲他們根本就懷疑人類具有這種能力。他們的慎重的口頭禪就是『時代不同了』，彷彿地球繞太陽運行一週便可以改變人類社會的規律似的！他們就以此爲藉口否認一切原則、一切理論、一切科學的分析和結論，而可恥地屈服於現實之前。事實上『時代的不同』並沒有改變支配舊社會的規律以及企圖利用這些規律來改造社會的原則和方法，牠只是改變了小資產階級的地位和情緒吧了。

世界革命不能如預期的發生於第二次大戰當中，這一事實又被許多理論家拿來證明馬克思主義預斷之不準確。事實上誰也沒有把一種社會學的診斷當做十足靈驗的預言來看待，人類對於自然界的物理學和化學的現象可以經過實驗室的種種精確的實驗，得出較準確的結論和推斷，但社會現象却複雜和微妙得多，而最大的缺點就是不能在實驗室中加以分解或化合，得出十分準確的論斷。我們直到今天爲止，只能明瞭現社會的法則，並根據牠們來分析、預斷社會之一般的发展趨勢，我們還不能達到準確地推斷某一事實發展速率和發生的日期。因爲有許多足以影響某一事實發展底過程的複雜因素，恐怕不是現代人類的智慧所能一一發掘到的，只有事實本身才能證明出來。馬克思主義之預測第二次大戰足以造成世界革命的後果，在方法論上是無疵的，因爲戰爭是資本主義的最大恐慌，假如一個普通的經濟或社會恐慌都足以造成革命的局勢，我們能懷疑世界戰爭倒能平安過去嗎？但事實證明：這次預言了的世界革命並沒有採取第一次大戰時代的速率發展出來。這不是方法上的錯誤，而是對於速率估算上的錯誤。而這一錯誤則歸咎於兩個未知的因素：第一，戰前十餘年來史大林的反動對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施行精神上與肉體上摧殘的深度與廣度；第二，德國工業與無產階級在戰爭中所受的毀滅性的摧殘。所有這些因素只有在戰爭的過程中才充分證明和暴露出來，第一個因素反映在新革命領導者過份延緩，第二個因素反映在德國革命——歐洲無產階級革命的骨幹之意外的沈寂。缺乏成熟的革命領導與德國革命之缺如，使世界革命發展的速率不能如預期的迅速，使戰後歐洲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失去重心，成了散漫的、個別的、步驟不一致的發展。無產階級的組織力與政治覺醒也較之戰前落後了。這所有的後果反過來就造成了史大林主義的勢力擴張，以及一般小資產階級對這種擴張的離奇的解釋和幻想。

(六) 戰後史大林主義擴張的原因

戰後史大林主義的擴張構成幻滅的理論家們對馬克思主義懷疑的第二個口實。馬克思主義者一貫把史大林主義政制看成爲過渡時代的矛盾的產物。蘇維埃官僚階級的特點是一方面依靠於國有財產，另一方面又依靠於國內與國際各個階級力量的平衡之上。因此牠害怕任何現狀的變革：戰爭與革命都足

以成爲牠的致命風暴。根據這一分析，我們當然有充分理由預斷：史大林主義政制將在第二次大戰中完結。但資本主義之過份虛弱與世界革命的過份延緩却意外地延長了蘇維埃官僚的壽命，而這種因素都只有在戰爭的過程中才準確地證明出來。人們不企圖了解這一點，却冒失地對一種意外的現象投降了。但我們剛才已指出過，既然人們無法了解這一現象，結果仍然只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才能得到滿意解釋。史大林主義的擴張只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底過渡期間過份延長——世界革命延期爆發的後果，這種現象並不足以證明史大林主義政制是一種歷史新時代的有機產物，牠只證明蘇維埃制度仍處於兩個歷史時代的交叉點上，全部矛盾和問題還要延到臨近的世界革命或第三次大戰來解決——解決的日期延緩了，問題只是如此簡單。那末，史大林主義的擴張與杜魯門主義的擴張一樣，只是一種臨死政制的掙扎與迴光返照，另一方面又是新社會誕生的陣痛。

(七) 新時代與新的復興運動

現在差不多三年來的事實已充分證明：科學社會主義還保有全部樂觀主義的權利。世界革命雖沒有及時終結第二次大戰和舊制度，但牠却已經存在

國際 鱗爪

巴黎勞工反對工會分裂與官僚主義

二月一日，巴黎的革命工會領袖們，包括巴黎圖書業工會，全國教師聯合會，建築業工會，五金工會，以及總工會的少數會員，聯合起來發表一個宣言，號召全國所有工會即刻召集一個工會統一大會。他們一方面斥責改良主義者與史大林主義者的叛賣政策，另一方面堅決爲工會的統一而鬥爭。他們指出，工會的分裂只能削弱工人階級的力量，並因而引起工會內部的小派別鬥爭來代替了工人對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宣言中又說：史大林派的官僚政策已替分裂工人力量者的利益服務，他們屬下的五十多個官僚，並沒有得到工人下層的同意，投票贊成總工會的分裂，這種官僚主義的傾向，正是背叛了革命政策的必然後果。宣言結論說：「史大林派的工會領袖佛蘭雄與社會黨的石屋，當法共與資產階級政府合作時，主張階級調和，現在資產階級政府不要他們了，他們便要分裂，這樣的合作與分裂，與工人階級的利益絲毫不相干的。然而，這是十分清楚的，我們必須盡力之所能，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工會，這工會的基本任務須奠基於階級鬥爭上。」

英國經濟的新危機

著名的英國工人報紙「社會主義呼聲」會以「一九四八年的生產」爲題，指出英國經濟的新危機。該報寫道：「過去兩年中，資產階級政府會以全力從事於生產的增加，藉以消除國內的經濟危機。雖然，總生產額已提高至戰前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但工人的生活始終未加改善。現在爲了防止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以及加強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勢力，文德禮政府已宣佈凍結工資的政策，擬將其正在生長的經濟危機的重載，由犧牲工人的利益來負擔。這政策的實施，因引起愈內工潮，已迫使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平衡預算。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政府不得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平衡預算。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下，政府不得不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以平衡預算。」

伊拉克人民的騷動

伊拉克人民，已經在酣睡了數千年之後，覺醒過來了。他們在巴格達及其他大城市中，以示威遊行，迫使他們的議會廢除在英蘇斯簽訂的，使伊國有化，並建立民主的工農政府來控制生產。」

印度羣衆的大集會

印度馬都拉(Madras)市有一大規模的羣衆集會，第四萬五千人參加。該集會是由托派領袖(托派)所召集的，而該派領袖是會布布列斯(Butterfield)所召集的。同武力的去破壞這集會，雖然結果集會的工人們也證明是完完全全失敗了。另外召集一個會議來對抗

而且在發展了。在歐洲，革命的中心已移往法國，圍繞在這個中心週圍，便是其他歐洲的國家，尤其是意大利的革命局勢；東歐的奇特的向「左」盤旋；在美洲，工人階級的驚人潛力已成爲國際無產階級的一種雄厚的後備軍，把整個美洲迅速歐洲化。一般的講來，比之第一次大戰之後，歐洲無產階級的政治覺醒是落後了，組織力量是減弱了，但資本主義的統治力却衰敗得更厲害，直到今天爲止，牠還不能不依賴於工人政黨的支持。這就足以形成一個新的因素，即革命危機的慢性發展，使新領導的形成得到無比的便利。革命勢力的潛滋暗長與新領導的逐漸成熟和抬頭必然招致歐洲史大林主義影響的衰落，這一點在法國已略見端倪。總而言之，科學社會主義所遭遇的新厄運分明已臨近尾聲，牠的新的復興運動(第四國際運動)已在世界各地展開其樂觀的遠景，當牠在一個更無比闊大的歷史基礎上取得新的勝利之時，一切反動時代的陰霾；從史大林主義到一切幻滅小資產階級的修正主義產物將消失得無影無踪，一個新的時代將替人類打開一個無窮樂觀的遠景。那末，幻滅的最好讓牠幻滅吧，我們的希望還在前面。 一九四八年三月廿三日

論里昂托洛斯基

E. G. Gaiman 著
曉星 譯

(編者按：這篇論文是曉星先生新近自巴黎譯寄來的，對於此一代巨人的了解頗有價值。)

「列寧是（俄國）工人階級的反映、形象，這不單是就其無產階級的現在，而且還是就其還要較近的無產階級過去來說的。……他從民族的環境（Milieu）中，吸收一切他所需要的東西，以完成全部歷史中最偉大的革命行動——」托洛斯基如是刻畫這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創始者，而列寧今天所顯示的也就如此。列寧與布爾什維克主義之能夠誕生，無非是當作俄國全部舊時代的產物而已。一個帝國主義把牠自己的特出缺點與專制政治的缺點連結起來，牠的發展僅止於不致培養和平主義進化的幻想，這種幻想支配了西方各國的工人貴族。在列寧身上，沒有半點宿命主義底消極性的痕跡，而事實上也只能是如此；這位俄國革命的領袖從其青年時代便傾向於行動。事實上，列寧的生涯就是一個最生動的榜樣，表明一個人物集中全力於本階級底歷史目的的实现。西方工人階級運動的領袖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只能把列寧認爲一個莫名其妙的製造是非者；一九一四年之後，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又把他認爲一個難於和解的仇敵。

托洛斯基則不同。雖然童年時代消磨於一個農莊中，他之受其本國人民底農民力量的影響，並不較多於他從帝國主義世界幾個偉大都會底活生力量方面所受的影響，這幾個大都會是他頭兩次逃亡時到過的：倫敦、柏林、維也納、巴黎、馬德里、紐約。在所有偉大的俄國革命家中，他無疑是最「歐化」的了，他吸收西方文明最徹底，他把俄國工人階級現有的革命的機動性注入其中；因而得以令牠在本世紀達到最高的表現。

在列寧方面，行動是他這個人的自然表現，又從具體出發，把行動自身列入思想的整體中，牠與思想總是不可分離的。在托洛斯基方面，行動是思維的自然完成，而思維則捕捉着具體的翼，永不讓牠走開。這裏有的只是差別的暗影，但正是這種毫厘之差才於一九一七年始，使他們的合作得到最後的成熟。

這兩個巨人並沒有過着傳奇英雄的簡單生活。「只有那些不可藥救的侏父才把列寧想像成功一個永遠不犯錯誤的聖人，」托洛斯基在這個問題上，這樣說。他們的大小錯誤與他們的深刻本質是密切相連的。在列寧方面，在

他的一九〇五年的著作中，在一九一七年以前他關於俄國革命性質的思想中，一句話也沒有提到離開眼前的境界，把無產階級之爲革命動力的概念推演到底。不預先排斥無產階級黨與一個萬一產生的依賴於農民的政黨之間一種革命聯盟的可能性，在列寧看來，也就等於不預先毀棄達到推翻專制政體的最切近、直接、和最少危險的道路。但這種錯誤無論何時總是不超出他底革命氣質的範圍之外。他不能夠和孟什維克主義有任何共通之點，孟什維克主義也把俄國革命描寫爲最初局限於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之內的，但却把歷史進程的領導權拱讓於「自由」資產階級（不存在的，托洛斯基說，而事變也證明他是對的！）他那種嚴厲地要把每一「理論」問題加以解決的意志，還過於偏執，無法想像到由無產階級立即奪取政權。十二年之後，當托洛斯基的理論，多謝列寧的領導，已得到實現的時候，他（列寧）一分鐘也不猶豫，在思想上與在行動上一樣，作必需的轉變，但是他不是在決定關頭說過：「此事令他暈眩」麼？

托洛斯基，在他那一方面，在政治上站在與孟什維克主義的對極，但有一個長時期却因爲過份的相信憑藉純知識的說服來統一分歧的政治流派的可行性，而誤入歧途。不錯，當他還十分年青的時候，靠天才的靈機一動，他形成他的不斷革命的思想，這一思想成爲瞭解二十世紀大多數革命的鎖匙，因此，使他不僅在俄國革命者中，而且在所有歐洲的革命家中，也出人頭地。雖然如此，他却依然過於依戀西方社會民主主義底「傳統的」、不夠的組織形式，所以無法了解分裂的必要，這種分裂在歐洲工人運動的領袖們眼中，顯得這樣殘暴。布爾什維克組織方法之運用，就整個歐洲而言，都是需要的；這一點，甚至連列寧也還沒有領悟到。托洛斯基終生害怕宿命主義，而且也不能滿意於德國領袖們的空洞的希望，即、認爲「進化」的過程將「自動」消滅列寧的「暴行」；但雖然如此，托洛斯基却在實踐上爲組織的調和而鬥爭。這就是他容許自己去發起有名的「八月聯盟」的原因，這個「聯盟」是完全仇視他的政治見解的。這一點也說明這樁奇怪的事情：列寧受着他那種求達目的的兇悍意志所指導，却有一個長時期成爲讚美考茨基的人；雖然

在他自己的黨裏，他是第一個激烈地與中派主義的組織觀念決裂的。而托洛斯基呢，他對於歐洲工人階級運動的比較深刻的認識却令他能够在列寧老遠之前，就了解考茨基思想的破產，但是，他在俄國多年來却一貫成爲中派主義組織原則的辯護者。

但真正偉大人物的特色還是這種品質，即、容許他們於決定關頭超出於他們自身的特別界限，把自己抬高到歷史以緊迫的方式向他們的階級提出的諸任務之高度。一九一七年，在列寧和托洛斯基兩方面，這一轉變都是『自然而然』完成的，沒有衝突或內在的摩擦。同一列寧，他終其生以超人的固執堅守着一度採納的原則立場，但從俄國革命的第一天起，便放棄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這一公式，照他說，『被事變繞過』了）而且變成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最兇悍的黨人。托洛斯基，這個『調和派』，在同一時刻，以同樣的敏捷，理解了布爾什維克派與孟什維克派之間的『統一』已『不復可能』（歷史的諷刺，迫得他要得出這個結論的却正是史大林），於是，照列寧自己的話說來，變成『最好的布爾什維克』了。只有革命才能够以最少的困難完成這雙重的轉變，因爲他們兩個人（他們都是真正的革命家）都察覺而且瞭解：爲了替他們本階級的勝利開闢道路，革命是必需的。

托洛斯基曾往往受人指責，稱他在對黨的態度上，曾過於野心，過於『個人』，在他對同志的態度上則過於驕傲。這一類的指責是荒謬的。列寧具有一種罕有的心理洞察力，當他揭露托洛斯基方面的弱點爲『過份吸引於事情的行政方面』時，他看得清楚得多。但是甚至連年老的查格利加·巴拉巴諾夫，雖然他太慣於簡單地採集走廊私語的精華並把牠們改寫爲歷史的動力，但也說過這樣深刻的話：在革命當中，就在羣衆把他抬到他們肩上一那一時刻，托洛斯基却較之已往更能够忘却他的性格底顯著的『個人的』特點。當所有發縱革命的秘索集合在他的手中之時，『領袖』的尊大再沒有比這個時候更見外於他了。『憑他的天生的機敏』，查格利加說，他懂得了最必要的時候，怎樣施行最嚴峻的自我批評，但這個時候，在多數凡人却是最困難的時候，在這裏我們看出性格的真正力量，牠是每一偉大行動的根基。

在托洛斯基身上，絕沒有半點那種庸俗的『馬克思主義』，以爲牠可以憑統計學來明瞭歷史的進程，正猶如觀掌色者憑手的紋路察知未來一樣。他遠遠越出『經濟學』或『社會學』之類的『門別類』的學問，設法從各方面了解人類的真實。這就是他之所以毫無問題成爲歷史上最偉大的歷史家之一

在『過去底完整的復活』（指歷史——譯者）這方面，比任何人都來得成功之一個，而這件事工作自米細勒（米氏是法國十九世紀的歷史家——譯者）時代以來，才僅僅被人夢想過。憑他的銳敏的眼光，在一時刻，他包羅了偉大的羣衆運動與政治領袖的人格，麵包的價格與學術雜誌的論調，股票交易的運動，與沙龍中洩露出來的辛辣私語。他的強有力的頭腦宛似一個巨大的熔爐，將歷史的一切構成要素重新鑄於其中。他的著作所論及的題目從哲學起、經過政治經濟學、應用經濟學、社會學、政治辯論術、歷史、傳記、軍事技術一直至新聞記者式的散文和藝術批評。怎樣總合這樣龐大的一種工作呢？他簡單是政治的新聞學嗎？抑或牠是『應用的馬克思主義』？是的，但除此之外，牠還包含更多的東西。牠是一種驚人的、不斷的努力，企圖照其整體來明瞭和解釋人類，爲的是能够操縱他的轉變。牠是一種不斷的努力，企圖把人類活動的一切方面加以自覺的批評，這樣，牠們就可以在人類底批評的自覺心的指導之下，加以轉變。

普遍的興趣

雖然他有普遍的興趣，托洛斯基却處於玩票主義與折衷主義的對極。這種興趣的普遍性，爲了是真實和有效的，需要牠們底根本的統一，牠們之合成爲一個世界的概念；這個世界是永遠不停止『變化』，而牠之爲一個統一體仍不稍減，而且牠同時還具有明確的輪廓。托洛斯基較之任何其他同時代的思想家都來得專心注意於人類實體的多面性。托洛斯基對於文書與事實的運用精確和小到拘迂之點，同時，他的遠景却是闊大的，能够從眼前離開，爲的是把握事變的基本方向。從直接觀察到的人類活動的一千另一面出發，他憑一雙魔術彫刻匠的手，探索一幅壯麗的全景，在這幅全景之中，精要的輪廓以完整的明確性顯現出來。

連結他全部作品的『主想 (Leitmotif)』是歷史的唯物觀念。這一『主想』，他以一種無匹的熟練運用着；有時候從『根本的實際』（這就是階級鬥爭）走到知識生活的最『遠距離』的現象，有時候，憑一種自信的科學，發掘地面，爲的是探尋政治與意識形態底現象的深刻的階級根源。對這些任務之每一椿，他都發生很大的熱情，絕不容忍對於馬克思主義學說採取一種蔑視的、膚淺的、或厭倦的態度。在他看來，牠是瞭解歷史的不可或缺的鎖匙。多謝這把鎖匙，他常常在他的著作中，替我們把歷史寫成活的。他在

同一時候，又是牠底嚴酷的批評者和牠底最雄辯的前驅。但他之能够充當這兩種人，僅僅因為他把歷史了解得這樣好。

在托洛斯基身上，有一種理論與實踐、思想與行動的完滿的統一。列寧把無產階級對一個叛賣其利益及其解放鬥爭底叛賣者的憤恨，向叛徒考茨基發洩。托洛斯基則用輕蔑和辛辣的諷刺來叱責考茨基的思想，這種思想之趨於沒落，因為牠脫離行動，而行為之真正腐敗則因為脫離原則。他本人的思想與行動間的這種統一性最清楚的表露於革命的戰略中，而在勝利的無產階級底軍事戰略中則達到牠的最高形式。當革命的領袖發現自己站在羣衆的前頭之時，他負上一個重大的責任；軍事首領也有同樣的責任，還要加上替那整千整萬在他底下作戰底士兵生命負的附加責任。拋開那些犬儒主義者、精神錯亂或心智混亂的人不說，一般人碰到這種責任，大都是聽命於他們的懷疑、他們的信仰、他們的意志、他們下決定的能力的。托洛斯基，這位傑出的軍事領袖，具有托洛斯基，這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附加的儲才。正猶如他懂得怎樣去按歷史的脈搏，他憑銳敏的一瞥，也能够拿起一份軍事地圖，斷定應該集中全力以付的決定地點。他底行動的果決、力量、鋼鐵般的銳敏，是由於他對無產階級運動底正義的明確了解與不可搖撼的信念而來的。對紅軍士兵演說，在他看來，與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彼得格勒的 *Cirque Moderne* 中演說一樣。指導東南前線軍部的工作，只是他對革命軍事委員會指導的邏輯的繼續；而這，反過來又邏輯地導源於他在黨底中央委員會的工作。人們企圖從他對軍隊的講辭或者從他在前線的態度中，找出半點軍官底傲慢或窮兇極惡底「軍事精神」的痕跡，也是枉然的；這種「軍事精神」表現一種荒謬的紀律、一種枯燥無味的陳規、以及一種官僚的詈罵，所有這些結合成一種「戰略」，這種「戰略」之視人爲兒戲，宛如牠之視最廉價的材料爲兒戲一樣。所有普通的將軍們——史大林現在的元帥們也包括在內——爲了保持他們底軍隊的統一，除了訴諸他們的最下流的本能與皮鞭的威嚇之外，便找不出別的方法；托洛斯基則與他們相反，從未停止訴諸被壓迫者的革命的自覺。對於假裝革命的浪漫主義，連同牠在作戰中之反對集中的合作——這只是資產階級紀律的抵銷——托洛斯基拿無產階級底自覺和自願遵守的紀律來對抗。關於這個問題，他於二十年之後宣稱：「甚至在內戰當中，我也設法在軍隊內部——甚至在戰役中——給予共產黨員充分的機會來討論一切軍事的決定。我曾甚至和士兵，而且，我在我的自傳中已說明過，甚至

和臨陣逃脫者一起來討論這些決定。』既然在一個充滿敵人的世界中（甚至他不得不利用的敵人也如是多），凡事都要當機立斷，誰又能怪他往往無法充分實現這一點呢？最重要的考慮還是這一點：思想與行動的統一不免要對於手段與目的底辯證的互相作用，有透澈的理解，而這種作用是在行動中指導着每一個真正革命家的，因為他最大的願望是達到其本階級底自覺的提高。

革命的軍人

這位革命的軍人的真面目，不僅與他的敵人，甚至與他的不少讚美者從他那裏所得的印象，也不同得多啦。匈牙利白衛軍在一幅有名的諷刺畫裏，會把他畫成一頭赤色獅子，坐在一座骷髏的巨大金字塔上。另一方面，卡爾·麥耶告訴我們說，骨子裏他自身有某種溫雅，這種溫雅的來源無疑是一種智慧，而這種智慧則似乎是能够瞭解一切事物的。這種溫雅在他的最後遺言中重新發見，在這裏，他表示他對我們運動底勝利的信心之後，便補充說，他曾畢生爲一個解除一切暴力的社會而奮鬥。

又怎能不是如此呢？藏在每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的心坎中的，就是對於人類的信心，沒有這一信心，則一切革命的活動都是全無意義的了。通過他一生的最後二十年，亦即作退兵之戰、反對污蔑、中傷、人類底愈來愈墮落的幾年，他保持這一不動搖的信仰，不爲幻想所欺，並把他的宏大的透切眼光保持到底。他總喜歡反覆說這句話，人類從半猿人的階段往上爬會很長久，也很辛苦，但仍然得到不少的進步。而且他又怎樣懂得去輕視那些職業的悲觀主義者呵，這些傢伙往往設法爲他們自己的幻想而向人類報復。所有生命到頭都是死，他說，但統計學仍不斷證明：人類並不因爲這個理由便停止出生於這個世界……

在所有人類活動的基礎中，實際上藏着一種顛撲不破的樂觀主義，而這種樂觀主義只是保護本能的又一表現而已。馬克思最愛好的諺語是一句拉丁話：「*Nil humani a me alienum puto*」（人類不能有見異於我者）。托洛斯基懂得一個革命領袖必須是人上人，而且貫通他的最後秀的成就，就有一根這種樂觀主義的線，這只是對於生的執着，而這對於一切健康的人又往往構成一種補充的吸引力：「用張開的眼睛、用一種永不退讓的批判精神來愛生命、沒有幻想、永遠不粉飾牠，只是經常如實地接受牠，不管牠不得不貢獻給我們的是什麼，抑尤有甚者，不管牠有時候變成什麼——這就是最高

信箱

關於中共土地政策的討論

編者先生：

我差不多是貴刊的長期讀者，對於貴刊的獨特且新鮮的言論，有贊成的，有反對的，亦有不能理解的。像對最近一期上的「評中共對土地政策的轉變」一文，就發生不少的疑問，現在試把它提出來，希望先生或該文作者鏡微先生予以詳盡的答覆，最好能在信箱中發表，因為我相信與我有同樣疑問的人一定不少，這樣不就是等於答覆了不少的人嗎？其次像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很希望在貴刊中能夠不厭求煩的討論它。不曉得先生的意見如何？

現在把我的疑問提在下面：

(一) 該文中說：「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開宣佈放棄土地革命而採取『二五減租』的妥協政策之後，經過了整整的十年，現在又似乎轉變到『江西時代』的老路線上去了。……」這雖然是事實，但是這正為了客觀的需要，即是說：為了集中全國的力量去對日抗爭，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讓步。而今天的情勢已大大地改變了，這一政策的轉變也許是適合時宜的。但是鏡微先生雖然贊成土地改革，然而却不贊成這種轉變，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幻想」而已，不知是何根據？

(二) 即使退一步說：中共過去的土地政策是妥協的，不正確的，那麼，至少今天的改變就是對的了，為什麼仍說它是「幻想」的與「投機」的呢？如果說是因為與民族資產階級合作，那麼也是應該的，因為土地改革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的，資產階級也贊成土地改革（即使如美帝的代表馬歇爾）。照鏡微先生的意見似乎是中國非走俄國的道路不可，又不知是何根據？

(三) 該文中稱中共已「……將自己（不僅在政綱上，且在構成份子上）完全墮落成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如果依照鏡微先生的話，即是說：中共已變成一個農民黨，那麼，又爲什麼「……它的土地政綱并不在於徹底解放農民，而只是藉以作爲與大資產階級謀取『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呢？一個農民黨，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不能徹底解決農民的問題，這是怎麼解釋的？

(四) 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鏡微先生沒有說得很清楚，他的意思好像是今天中國的土地改革，唯有無產階級才能勝任，這一點，希望能多加發揮。

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尚未覺悟與行動起來之前，農民單獨的鬥爭是不是有前途的？而且事實上農民的痛苦太深了，他們是急不及待無產階級起來的。所以如果反對農民自己解決土地問題，豈不是有取消主義的嫌疑嗎？

(五) 鏡微先生說中共是「克里姆宮」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爲了同樣的目的，這未免令人不信，不知鏡微先生有何事實或文件的根據？

以上一些問題也許提得很幼稚，因爲我對這問題很缺乏研究，希望 先生不要見怪！此請

讀者張務善拜上
三月廿日

你對於本刊上期「評中共土地政策的轉變」一文所提出的幾個疑問，雖然其中有些問題在該文中已有簡略的說明，但正如你所說，土地問題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所以我們還是很願意來同你討論。現在就來信所提疑問逐一答覆如下：

(1) 「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開宣佈放棄土地革命而採取『二五減租』的妥協政策」，你認爲「這正是爲了客觀的需要，即是說，爲了集中全國力量去對日抗爭，就不能不在某些地方讓步」。你這種解釋，正是中共曾經用以粉飾自己的機會主義政策而不斷地向人們宣傳的。但不幸，這種解釋是完全虛偽的！因爲從原則上說來，土地改革既是「一個有關於中國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是一個改革中國社會的基本綱領問題，或用你的話來說，是「這樣一個嚴重的問題」，那就無論在任何時候及任何情形之下，都絕不應「公開宣佈放棄」。假如土地改革在客觀條件限制下不能立刻實行（能否立刻實行，那是力量的問題），那至少也不應放棄宣傳的工作。而且事實上，當時中共所控制的區域內是已經實行土地改革的，這就等於把已經分配給農民的土地又重新交給地主，這對於中共本身是失信，對於

農民羣衆是愚弄！一個對自己失信和對羣衆愚弄的政黨，還配得上改造中國社會嗎？至於「爲了集中全國力量去對日抗爭」，那更不能成爲「放棄土地改革」的理由。因爲要「集中全國的力量」，首先便必須集中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羣衆的力量。但要集中農民的力量，却又必須將農民從極端殘酷的剝削和悲慘的奴役地位裏解放出來，因而徹底改革土地，正是解放農民，使之有可能集中其力量來抵抗日帝侵略，并獲得真正勝利的主要資源。假如在抗戰期中解決了土地問題，把幾萬萬農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我們相信中國抗戰的局勢及其結果是完全不同的。法國大革命時代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後，農民羣衆對內外敵人之無比勇敢和拼死的抵抗和打擊，主要就是由於土地改革的推動。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共在抗戰期間爲了與少數地主資產階級謀取妥協而放棄土地改革，犧牲農民大眾的基本利益，不但不會「集中全國的力量去對日抗爭」，反而是大大地分散了和癱瘓了抗日的力量，以致抗日得到現在的後果！然而這正是中共機會主義的罪惡政策所造成的！！

(2) 中共以前放棄土地改革政策既是錯誤的，罪惡的；它今天重新宣佈「土地法大綱」，實行土地改革，——這種「轉變」，鏡微先生不但沒有表示「不贊成」，相反地，他還承認它「多少代表了農民羣衆的要求，具有相當進步意義」。至於鏡微先生所謂「幻想」，既不是指現時中共土地政策的「轉變」，更不是指它不應該「轉變」，而只是指它「藉以達到實行此種大綱（即土地法大綱）的總路線，即希圖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線，却完全與十月革命的歷史教訓背道而馳，這在本質上仍然是俄國社會革命黨式的，即烏托邦式的」，（見本刊上期第六頁）也就是「幻想」的。至於你問「何所根據」？那我們可以答覆：根據即在於歐洲及中國過去的歷史經驗。甚至遠在資本主義初期的法蘭西大革命中，實行解決土地問題的，也不是一般的「民族資產階級」，而是代表當時下層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黨。俄國

的土地改革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黨所完成的，鏡微先生已經指出過了。而中國第二次革命中土地問題之不曾獲得解決，乃是由於當時的中共不顧一切與資產階級謀取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如「武漢政府」），這是人所共知的。難道這些歷史經驗和教訓還不夠雄辯嗎？如果你不否認這些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那麼，你所謂「……與資產階級合作……也是應該的，因為土地改革是屬於資本主義範疇，資產階級也贊成土地改革」，這種形式邏輯也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我們希望你特別留意：歷史是循着自己的辯證邏輯發展的，因而「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民族民主任務（土地改革即落後國家主要的民主任務），資產階級往往無法解決，因而落在無產階級肩上。此外，還得請你注意：資產階級口頭上贊成土地改革和實際上能否執行土地改革，是絕對不可以混同的。歷史經驗證明，口頭上贊成，為的以便於實際上否定。而鏡微先生之認定「中國非走俄國十月的道路不可」，其根據也就非常明確而充分了。

(3) 「一個農民黨，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不能徹底解決農民的問題。」這是不難解釋。寧可說，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從理論上說，農民是一個過渡的階層，一般在經濟上是分散的，孤立的；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是落後的；又由於它的不斷分化（向富農、貧農及農業勞動者的分化）及各層份間的矛盾，其內部是缺乏團結性的；因此農民本身絕難表現一致的利益，絕難提出正確的綱領，因而絕難在革命過程中起獨立的作用。所以，農民必須從城市階級去找到領導，才能解決本身的土地問題。從事實上，如我們前面所說，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的，在法蘭西大革命中是城市的小資產階級；在俄國十月革命中是城市的無產階級。凡是自稱代表農民的政黨，在歷史上從未見過能解決農民問題的。俄國的社會革命黨，算是所有號稱農民黨中之最典型的，但也不會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只是」將土地問題「作為與大資產階級謀取「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而已。假如你不否認中共已「完全墮落成

為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則「它的土地政綱并不在於澈底解放農民，而只是藉以作為與大資產階級謀取「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也就昭然若揭了。何況歷史事實已兩度（一九二七及一九二七年）證明它這種「討價還價」的勾當呢！（請參考上期第五頁）

(4) 「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關係，鏡微先生沒有說得很清楚」，那是因為篇幅所限，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即正如你所推測：「今天中國的土地改革，唯有無產階級才能勝任」。至於你要求我們對此「多加發揮」，但因為本「信箱」的篇幅有限，我們此刻仍然無法滿足你這一要求。不過有幾個要點可以在這兒指出：（一）農民由於其生來的缺點（見前面所敘），根本無法解決自身的土地問題，所以必須從城市的階級尋找領導和幫助。（二）城市階級中最有社會經濟基礎和力量的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但前者由於它自身與土地剝削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絕對不願也不能解決土地問題。因而解決這一問題的任務須天然落在後者的肩上了。（三）無產階級之願意而且能够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不但因為它與土地剝削絕無關係，解決土地問題對它毫無妨害，而且對它自身的解放還有絕頂重要的幫助，這就是說，它在幫助農民解決土地問題過程中，一定能和農民結成鞏固的同盟，以此幫助它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踏上政權，走向社會主義。這已是由俄國的歷史事實所證明了的。

至於「在無產階級尚未覺悟與行動起來之前，農民單獨的鬥爭是不是有前途的。」對於這一問題的答覆，在我們是否定的。因為所有落後國家的歷史經驗都證明：農民雖然經過了許多次的「單獨鬥爭」，但由於「無產階級尚未覺悟與行動起來」，所以從未得到真正解放的結果。而落後的俄國農民之得到解放，又正是「無產階級已經覺悟和行動起來」所獲致的。你說「事實上農民的痛苦太深了，他們是急不及待無產階級起來的」。假如這是事實，又假如農民因痛苦太深而不等待無產階級起來即進

行「單獨鬥爭」，那就難免要遭到失敗的後果。但這一判斷絕對不是「反對農民自己解決土地問題」，只是指出農民鬥爭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與合作，是不會有真正勝利的「前途」而已。但也正因為如此，一個革命的政黨必須將農民的鬥爭與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有系統地有計劃地配合起來，並將前者放在後者的領導之下，以期達到最後的勝利。這乃是唯一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結論。

(5) 你說：「鏡微先生說中共是克里姆宮的外交工具，甚至其土地改革也為了同一的目的，這未免令人不信！」信與不信，雖然是人們的自由，但「事實或文件」却是多得很。現在讓我們隨便舉出幾件人所共知的「事實」來看吧。當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時，克里姆宮主人即一反其以前「第三時期」的外交政策，卑躬屈節地拉攏英美法的民主國家及各式民主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建立「民主陣線」及「人民陣線」以反對「法西斯陣線」，反對製造戰爭的希特勒惡魔，於是各國共產黨和中共立刻響應，大肆宣傳其陣線論的主張。但當一九三九年同一克里姆宮主人史大林與希特勒訂立「德蘇協定」時，各國共產黨和中共不但忽然終止了民主陣線反法西斯陣線、反希特勒的宣傳，而且立刻反過來攻擊英美法為帝國主義，並為希特勒進攻蘇聯的生存和納粹主義辯護了。可是，當希特勒進攻蘇聯，迫得史大林轉而求助於帝國主義的英美時，各國共產黨和中共又轉過來宣傳英美對希特勒的戰爭是進步的，甚至革命的。迄至戰後，史大林看到美國有準備第三次大戰來進攻蘇聯的企圖時，史大林才又發見了美國是帝國主義的、反動的，因而各國共產黨和中共也又大唱其反美的論調！而中共一九三七年之放棄土地革命政策以及這次又重新提出「土地法大綱」，正是完全隨着上敘克里姆宮主人史大林的外交政策轉變之下而轉變的。這些「事實」，難道還不夠作鏡微先生論斷「中共是克里姆宮的外交工具」的「根據」麼？假如人們敢於面對真實，我們相信鏡微先生的論斷是絕對不可動搖的。

編者 三月二十三日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二一七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證第一類新聞紙類

每冊實售法幣一萬五千元

原名：青年與婦女

新聲

第三卷

第二期

今年的五月

當大地滿蓋着新嫩的綠蔭，原野點滿了鮮花的季節，這個令人嚮往和沉醉的時光，以鬥爭、生命、熱血鑄成的鮮紅的五月，又一年一度地臨到我們的眼前了！

在這陰霾四佈，反動低氣壓籠罩着整個星球的今日，我們來追思和紀念這個充滿朝氣、鬥爭和富有歷史意義的五月，更感到憤懣和沉痛，更感到落在我們肩上的歷史負擔之沉重了！

『五月』留給我們的教訓實在太豐富了，它從最初的第一天起，直到最末的一天，都是以英勇鬥爭的姿態出現於歷史舞台的，它曾經掀起了人類解放運動的巨潮，尤其在我國歷史上，它是永遠不能磨滅的一個『紀念月』。

『五一』勞動節，是資本主義正在欣欣向榮的牧歌時代，年青的美國無產階級，首先為八小時工作制鬥爭而獲得勝利的日子。可是，今年，經過了二次大戰殘酷的浩劫之後的第四年，全世界的勞動者，不但依舊受着貧窮、飢餓的痛苦，失業的恐慌，而且一個更可怕的新戰爭又一步一步地在威脅着，都達到離奇古怪的程度，但這一切的災難最後還都是加在勞動者身上，陷他們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中國的工人，不但談不到八小時工作制，即連最低限度維持生命的要求，也要遭受最嚴重的打擊與迫害了。如不久以前法商水電罷工與申新九廠事件，便是明顯的例證。這一方面固然充分表露統治階層的野蠻與橫暴；但同時，史大林的盲動主義的領導，也是招致悲慘後果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國的無產階級，要想走向解放的道路，不但首先要團結起來與統治階層進行頑強的鬥爭，而且還必須堅決地脫離史大林黨機會主義與盲動主義的領導，在一個真正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新的領導——第四國際——之下，向前邁進。這是每個前進的無產者在今年的五一節應該特別認清的。

『五四』，在中國是一個劃時代的啓蒙運動。它曾摧毀了封建的傳統，帶來了一般的民主與自由的浪花。但今天，展開在我們面前的，不是民主與自由，却是一連串的噩夢。遠的即便不說，最近北平師院事件，川大事件，以

論壇

今年的五月……

『國大』揭幕以後……

逮捕·毆打與人權……

戰後中國工人運動的分析……

史大林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的墮落……

義大利人民的抉擇……

義大利的危機和前途(羅馬航訊)……

論里昂·托洛斯基……

法國醞釀着新的社會危機(國際鱗爪)……

關於中共能否取得政權的討論(信箱)……

顧 實

流 光

衛 真

金 戈

紀 芬

劉乃光

蕭 瀾

曉星譯

沈念輝

周永新

難於忍受！

中國經過八年抗戰的浩劫之後，跟着而來的又是國共的戰爭，以致生產的衰敗，通貨的膨脹，物價的奇昂

10 260

37年 5月1日

及上海許多大學所發生的種種怪劇、毆打、逮捕、開除、搗毀之連續發生，暴行與血案之層出不窮，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中國民主運動雖在五四時代就已展開，但現在却愈來愈被壓縮了。不但享受不到一般的民主與自由，即連起碼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保障，也被剝奪去了！中國的青年學生，要想獲得一般的民主與自由，要想同其他的勞苦大眾一起獲得真正的解放，必須以繼承「五四」的傳統精神，來紀念今年的「五四」。

五月最後的一天——「五卅」，它不但是中國民族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第一次以直接的行動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紀念日，而且還是開關一個新的偉大革命——第二次革命——的揭幕日。但由於一個可恥的機會主義——史大林主義——的領導，使這個偉大的革命遭到悲慘的失敗，因而招來了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今天美帝國主義的獨霸。今天的中國，無論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都唯美帝國的馬首是瞻。如果中國的民衆，不堅決的從美帝的羈絆下脫離出來，不從史大林黨機會主義束縛之下解放出來，而在一個正確的馬克斯主義黨的領導之下，走向徹底革命的道路，那就將不可避免地要成爲美國反蘇戰爭的角逐場所——三次大戰的犧牲品！

我們今天來紀念「五月」，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都有特殊重大的意義。中國的無產階級，學生青年以及一切被剝削和被壓迫的民衆，不但要澈底了解「五月」所包含的這幾個偉大紀念日的內容和其歷史意義，吸取它的寶貴教訓，而且更重要的還應該繼承它的傳統和英勇鬥爭的精神，踏着它的血跡去衝破陰雲的重圍，替未來的前途打開一條光明的出路！（韻寬）

「國大」揭幕以後

「國大」於三月廿九日揭幕，原定牠只是選舉總統副總統的，事情本很簡單易辦，不消多少功夫；但至今廿多天還沒有閉幕，而演出的却一幕比一幕驚人。每個人對牠的觀感，除了嘆爲「空前絕後」外，恐怕再也找不到別的形容字眼了！

所謂「空前絕後」，不但表現在會場內的噓聲喝打、一團亂糟，會場外的代表「抬棺」，懸樑絕食；而且更在於選舉的整個過程中。總統無人競選（有人認爲「陪選」應作別論）是此次選舉的最大特色，本來早成定論。但被選人突然表示不願出任總統，却使代表們要從「行憲」變成「修憲」，結果通過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予總統以非常大權，不受憲法所規定的限制，如此總統才不致難產。但這來，中國憲政史上，又多添「因人立法」一頁了！

不過，副總統的競選，是最後一幕，也是最精彩的。得票最多的李宗仁、孫科和程潛，在舉行第三次投票之前，都先後宣告放棄競選了。從他們的聲明中，不難看出「民主」的真相。因爲李宗仁的理由是：「邇來忽發現有人以黨之名義壓迫統制，使各代表無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權」；程潛則說「是『受命放棄』的；孫科更自稱要『聽候國民黨的決定』。既然這三位競選人都是國民黨員，自己同志的政策主張本無什麼不同，毋需如此大宴代表，利用報章互相攻擊，（爲此又演出代表打毀救國日報的全武行，）甚至在競選白熱化時候公然翻臉，企圖以退爲進。但這在名義上還是『國民大會』而非黨員大會上表演出來，却未免太令人啼笑皆非了！

無論如何，我們可以說：不管鹿死誰手，這仍只是「國民大會決定」的事，或者，即使漂亮點說，也只是國大代表的事，但決不是人民自己的事。個人名義上的變換，對於中國人民的影響還是一樣的。人民自己的事，必須人民自己的力量來爭取，來解決，——中國人民應該從這次空前絕後的表演中，更清楚地確認這「點真理」，首先把烏煙瘴氣的假面具揭破，爲的好走上真正的民主道路。（流光）

逮捕·毆打與人權

逮捕，毆打，搗毀等事件，最近又在北平各院校和重慶等地演出了，這是緊接着上海各工廠大事搜捕之後而來的，其時也正是「國民大會」開會準備「還政於民」的時候。

關於這類事情發生在此時此地，似乎很少人會感到驚訝，我們所注意的，倒不是這些一連串慘案的原因，而是牠所引起的後果，以及如何方可終止這些痛心事件的重演，真正獲得人權的保障。

有人常常把所有的工潮，學潮都歸咎於共黨「陰謀份子」煽動的結果，果真如此，人類的歷史應該是一部「陰謀」史了。但在歷史上我們未曾見過一種人工的方法可以造出一個廣泛的羣衆運動的。學潮的彼此起伏，只是表示學生們對現局的不滿，難忍和反抗，所謂「少數陰謀份子煽動」的說法，不過是以此爲藉口便於對學生們合理要求的鎮壓罷了。

至於史太林共產黨，我們自然也看得很清楚，牠最近確是在不顧一切地盲目的，爲的是追隨莫斯科的外交政策，響應前方軍事的需要。因此在工廠和學校中，企圖利用任何一個羣衆鬥爭作孤注一擲。這樣一來，更加深當局的恐懼心理，使更有藉口來「先發制人」——「事先逮捕和毆打，把羣衆所有的合理要求都說成爲「陰謀」指使而加以高壓。

學生們起來爭取生存的權利自有其邏輯的根源與發展路程，不是人工所能製造出來，也不是某黨利用所能收效，更不是逮捕和毆打所能壓制。即使時給控制或壓制下去了，但絕不會從此沉默，一種新的刺激將必引起一種新的更大的鬥爭的爆發。當局不敢認真去看學潮之所由來，反而橫加逮捕，又怎能解決問題呢？又怎能不使問題更趨嚴重呢？

本月九日和十日，北平師範學院和北大所先後發生的慘無人道的打人和捕人，不過是過去一連串逮捕和毆打的繼續，這次事件所引起的學潮，在高壓和孤立的狀態下，似乎一時不致於擴大開去，但在另一方面却不僅更充分的表露當局的蔑視人權，而且給正在開會的「國大」以一種極具深刻的諷刺。說明了：什麼「行憲」、什麼「還政於民」只是一個騙局而已。

保障人身自由是民主國家起碼的基本權利之一，這一起碼權利都失了保障，一切民主都是空話。政府當局如果眞的能够「還政於民」，就必須立即停止其逮捕，毆打等行爲，給人權以確實的保障。但我們根據過去和目前的事實看來，要能實現迫切的民主要求，獲得起碼的人權保障，絕不是靠恩賜而祇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和行動來爭取的。（衛真）

戰後中國工人運動的分析

金 戈

中國工人，以近代無產階級的力量出現在中國歷史的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工人階級已經第一次顯示了自己的力量，此後經過香港海員罷工，京漢路的「二七」慘案，運動的血壓，直向上升，納入「五卅」的巨流，爆發成「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僅僅因為這次革命被一個最壞的機會主義路線領導着，以致完全失敗下來。工人運動的命運，本身就是中國革命的命運，跟着革命的失敗，運動也就陷入長期沉寂的狀態。

今天，在另一個新的大戰之後，中國工人運動，重又復興起來，可是這次復興起來的運動，其基礎和上次再也不是相同的了。第一次大戰之後的工人運動，是產生在中國資本主義勃發期，而這次戰後的運動，却產生在這個制度垂危的掙扎上。就革命的客觀條件而言，牠非僅比以前更為成熟，而且爛熟得幾乎蒂落，很能夠允許工人階級獲得更大的勝利。祇是可惜，工人階級仍舊被昨天那個錯誤路線重覆的領導着，以致運動發展，經過許多不必要的曲折歷程。正是這個歷程，翻譯成今日運動的危機。些落後的人們，往往因此發生宿命的悲觀，以為運動已經「稍縱即逝」了，其實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我們根據戰後三年來的運動歷史，加以客觀的分析，所得出的結論並不是「悲觀」，而是「危機」，指出這個危機，乃是克服危機的唯一道路。現在讓我拿戰後工人運動的發展，加以簡略的分析吧！

從半真空的缺口中迸發出來

戰後工人運動的復興，是產生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條件之中：

日本帝國主義的八年統治，依照牠的目的，只能給中國工人羣衆帶來更大的禍害和破產，使他們從白粳的生活降低到僅能拿苞米糊來苟全性命。生活的逼迫，曾經引起他們零星的反抗，但是工人運動的發展，往往不是以生活貧困的深度來決定，而是決定於階級力量的對比。那時，他們還在強大的日帝法西斯式的刺刀統治之下，夢想順利地昂起頭來，是比較困難些的。

只當一九四五年九月「同盟國」戰勝日帝的時候，這個刺刀統治才突然崩塌下來，接替牠的新統治，還留在後方。固然這兩個新舊統治者根據他們相同的階級立場，由前者委託後者代行維持秩序，換句話說，抑壓羣衆力量的掀起，但是無用，這一措施畢竟不能避免日帝佔領區裏，於新舊交替的短時間內，形成政治半真空的狀態。工人階級積壓已久的鬥爭情緒，於是便

從這個缺口迸發出來，好像一陣山洪，泛濫在幾個大城市，尤其是上海。我們可以相信，如果東北的工業基礎，不是被蘇聯史大林官僚劫掠而去，使東北工人階級的力量解體，那末戰後工人運動的復興必定還要驚人 and 可觀哩！

三大勝利果實

工人運動的初期鬥爭，以要求遣散費開始。當時所有敵偽工廠，因戰敗而停工，使工人們立刻失去工作，所以他們提出了這個要求。很快的，這個要求便擴張到中國資本家的工廠裏，改作勝利獎金的名稱出現。圍繞着這二個主要要求，工人階級便自動的團結起來，產生嶄新的工會組織，工會的領導層，都是經過羣衆民主選舉出來的，因此他們最能代表羣衆意志，而勇敢的站在羣衆前鋒，進行不屈的鬥爭，這些鬥爭的結果大多得到勝利。階級鬥爭的邏輯，與戰爭相彷彿，勝利的軍隊，即使日進一里，也能給士兵帶來很大的鼓勵，這些零星鬥爭的勝利，同樣的也給工人階級以極大的興奮，彼此跟踵而起，形成了巨大的罷工浪潮。

中國統治階級當牠重返統治之初，擺在牠面前的就是這個自然形成的火一般的局面。牠的統治力量在工人階級龐大力量對比之下，無疑的居於劣勢地位，何況牠們的經濟基礎，比日帝更為脆弱，接收的工業不能馬上全部恢復，通貨膨脹，繼承了偽鈔的速度扶搖直上，一切經濟危機的破綻，在「勝利」的基礎上更暴露得透澈，美帝國主義的幫助，在中國「國民經濟」的比重的上，果然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但是很快的被國共所發動的戰爭引起的更深經濟危機所抵消。於是從戰後半真空的政治局面中爆發出來的工人運動，生長在這種危機的泥土上，鬥爭的箭頭非常合於邏輯的一致指着生活費用和物價脫節的問題，逼得統治階級窮於應付，不得不宣布依照生活指數計算工資的制度。

工人運動在這初期，獲得了三大勝利的果實：罷工權，組織工會權，和生活指數。

當運動還處在經濟鬥爭的階段，工人階級單憑自己自發的團結力量，是可以取得勝利的，不過經濟鬥爭所得的勝利，如果不能與政治鬥爭相連接，跨上更高階段，那麼勝利的果實絕對無法長久保持，所以運動發展到了這種程度，更迫切的需要一個正確領導。

自從「他們」來了之後

不幸得很，那些自命領導工人階級的黨派，如朱學範，民主同盟和史太林派之流，這時合唱着勞資合作的牧歌，進入工人隊伍，把工人階級的四肢用改良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繯繩束縛起來。我們可以說，在他們還沒有插入領導的時候，工人階級自發鬥爭所走的道路，大體上還較正確些，不過幼稚罷了。自從他們來了之後，使工人階級重覆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歷史，很快的給運動帶來失敗的禍根。一九四六年送馬敘倫等到南京請願的「六二三」遊行，就是這種禍根的植土典禮。這次遊行，凡參加過行列的工人都還記得，行列果然是興奮的，但是除了精神的興奮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工人階級的物質利益。原來他們不過把工人階級當作阿斗看待，抬出來壯壯聲勢而已。這種遊行，對於他們的請願幫助得很少，可是給工人階級的傷害，却就够大了。因為他們的失敗，代統治階級開闢一條「攻勢」的道路，工人階級隨着請願的失敗，同時遭受「攻勢」的襲擊；前進的工人份子被逮捕了，自動組織的工會被改組了，罷工的行為被宣布為非法了，好多已得的勝利果實，被部份的收回去了。這是戰得工人運動第一次步上曲折的道路。

自從經過這次挫折，那些「左傾」的工運專家便像澆着冷水，馬上將背脊朝着中國工人運動的歷史，完全抹煞工人階級過去的光榮功績和偉大的力量，埋怨中國工人人數太少，文化水準太低，不能在革命中起領導的作用，甚至拿公教人員的生活來與工人比較，責難工人生活過於優渥。他們全不懂得工人階級人數果然比農民少，但是在經濟的領域裏，依舊是決定的力量。他們全不懂得，工人階級的生活之所以要比公教人員優渥，那正是工人階級初期鬥爭的戰利品呢！

正當他們在自己給運動造成的挫折上如此這般悲觀的時候，新的工人鬥爭又在更深刻的經濟危機中醞釀。統治階級當時爲了挽救他們的危機，曾經宣布經濟緊急措施方案，把危機的重負往工人階級身上推，凍結了生活指數，可是這種措施，僅僅只能有三個月的命運，新的生活費用與物價的瘋狂脫節，重又把工人運動喚召回來，屢成戰後最大規模的一次鬥爭，逼得統治階級慌忙將生活指數部份解凍。這次鬥爭是工人階級自然成熟的鬥爭，史太林派只是起着推波助瀾的作用，那時他們的政策，正介於左右擺搖之間。一方面還唱着勞資合作的論調，另一方面，因爲內戰進行得相當火熾，已經把他們聯合政府的迷夢打得粉碎，所以他們盡量利用運動的力量，作爲進攻當權集團的工具。他們當時的宣傳是這樣的：「凍結生活指數是政府幹出來的，資本家也不同意」，因此他們居然向資本家討好，自動聲明在指數解凍之後，不拿罷工期的工資。好像指數解凍之後資方無須拿出更多工資似的，好像當權者是超階級的集團似的。在這種左右搖擺的政策之下，以致運動缺乏一個正確的領導，不能順利地再行向上發展。

「奇蹟」代替了埋怨

去年九月間，蘇聯在歐洲成立了九國情報局，日丹諾夫正面發表與美國對抗的宣言。由此，就充分的表示了史太林的政策已經決定的，從機會主義向左搖擺，在全世界採取自動主義的路線，來一個「新的第三時期」。中國史太林派的政策是跟着史太林的總軸心旋轉的，因此也同樣的從極右的一端跳到極左的一端，以爲昨天還值得埋怨的工人運動，可以在地球上繞太陽一轉的時間內馬上會出現奇蹟似的，不顧工人鬥爭的情緒，和準備條件的成熟與否，盲目的憑着主觀的要求，硬生生的把牠拉出鬥爭舞台，企圖把工人運動變成幫助農民戰爭的輔助工具。結果給工人階級招來不斷的打擊，和無謂的犧牲。

時間的相同，在這裏絕對不是「偶合」。與九國情報局成立的同一個月，上海法商電車的工潮被早熟的摘下來了。這還只是自動政策的開始，法電的工潮就成爲這種自動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第二個犧牲品，乃是「申九慘案」。

我並不抹殺，法電與申九工潮中所提的要求，的確是工人羣衆的要求，不過工人的要求之爆發爲鬥爭，必定要經過自覺的成熟階段，只有如此，鬥爭才能成爲全體工人的願望，才能有更充分的準備，也只有如此，運動的爆發，才能操更多的勝券。史太林派完全不懂得這點，他們所懂得的，乃是上級機關的命令，不是羣衆的情緒和準備，只是自己私黨的要求，不是工人羣衆的利益。於是稍一苗長的工人情緒，就被手淫般的浪費掉了。最後招致了工會的「整理」，前進份子的大量逮捕，成爲今天元氣斬傷的局面。

脫離罪惡的黑手

我們沒有理由可以這樣論斷：這個挫折就是反動時期的開始，不是的，這個挫折完全是錯誤領導的結果，牠只能是暫時性的。因爲就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看來，牠與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同樣的不能有一個相當的重新穩定的時期，所以工人運動的潛力，當然還是存在着。下面的事實便足以證明這點：罷工雖然被再三禁止了，但是怠工、餓工、懶工、勤工等等仍舊被默許。最近兩路局的罷工，更帶諷刺地撕破罷工的禁令，生活指數雖然部份凍結，但到底還不敢立即根本取消這個制度。最近他們企圖藉擴大配給品的名義，變相降低生活指數，一經研究之後，馬上自承不能擴大實行，宣布作罷；「整理」之後的工會，雖然完全在當權者的控制之下，但也不能不設法偽裝民主，拉攏羣衆。因此我們可以確信，祇要危機存在一天，祇要工人階級還未遭到致命的打擊，那麼，運動的到來，只是時間問題，牠可能新的各種因素湊合之下，重新爆發。

現在最迫切的問題，不是在猜測運動究竟會不會到來，問題乃在迅速脫離史太林派這錯誤領導的罪惡黑手，找尋一個正確的領導。

史大林主義與蘇維埃制度的墮落

紀芬

(近數十年來，史大林主義成了國際政治的嚴重現象，並成爲工人階級及殖民地革命運動的嚴重疫病，這已是無可爭辯的公認事實，戰後三年來史大林主義之突然繁盛又必然令無數先進羣衆迷惑不清，甚至發生幻想，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鑒於此，紀芬先生特別寫了幾篇文章，揭露這種現象的內幕，把讀者引向一個正確的結論，這篇文章就是其中之一，其他數篇當按期陸續發表。——編者)

一 馬克思主義的背叛

史大林主義的理論家們久已替史大林主義安置好一個虛假的歷史地位，稱牠是馬克思、恩格思和列寧底教義的繼續和擴大。假如這種定執含有半點真實的意義，則史大林主義就似乎應該成爲我們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了。不幸得很，列寧早已替我們揭露一切騙子的欺詐和蒙騙，他說，馬克思由於其本身的無可否認的偉大，雖然在生前遭受一切迫害，死後他的名字却不可免要爲一切反動傾向和勢力所利用。所以我們並不重視任何政治傾向之利用已故的偉大革命家的名字，或冒充他們的繼承者；我們所重視的不是商標，而是在商標掩飾之下的貨色。

在馬克思主義的幾個最重要的構成要素中，我們總不會忘記：「所有人類類的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的唯物史觀；國家機關所隱藏（或暴露）的階級獨裁性質，以及從此引伸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必需性；資本主義之趨向獨占與造成世界性的分工，以及從此產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性與不斷性，……所有這些最基本、最重要的觀念，在全部列寧的著作中，得到更深刻和廣泛的發展。他的帝國主義論、他對於我們這個時代底性質的判斷、他的建立無產階級黨的原則和方法、他的殖民地政策以及所有實際的革命戰略和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失敗主義政策與聯合戰線）——所有這些都無非在擴充和增強上述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要素。

史大林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呢？牠所包含的到底是那些要素呢？牠所包含的、恰好是與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正相反的要素：民族的社會主義（「一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世界可以經過妥協或利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壓力」而達到共存共榮的觀念、階級合作（「聯合政府」）、資本主義可以經過某種改良的手段（如「新民主主義」）而和平過渡到

社會主義的學說、一種永遠搖擺於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之間的策略、以及拜詹庭式的官僚主義禁制。因此，史大林主義並不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的一種最惡毒的修正和背叛。

不過凡是一種思想的產生，終歸有其一定的時代背景和階級根源，史大林主義也不能例外，關於這，我們將加以詳盡的分析。

二 史大林主義產生的背景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這一歷史事實：史大林主義乃是俄國蘇維埃制度墮落的產物。列寧與托洛斯基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最大貢獻之一，便是認識了這一新鮮的歷史規律：像俄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過遲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只有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才能完成，但一旦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俄國革命便不得不成爲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起點了。這種古典的布爾什維克觀念，支配了十月革命初期的一切布爾什維克黨的政策，甚至成爲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一切文件的中心思想。而另一個不可分離的觀念：「落後國的無產階級取得農民的幫助，可以首先奪取政權，但如果得不到先進國無產階級勝利的援救，牠將永遠談不到完成社會主義。」也差不多是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黨公認的真理。但最大的不幸便是歐洲第一道革命浪潮（一九一八——一九二〇）的連續失敗，使得俄國無產階級政權陷於完全孤立無援的狀態，連年的慘酷內戰又加倍浪費了沙俄的一份可憐和落後的遺產，於是以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爲首的革命高潮，逐漸爲失望、消沉、保守的退潮時代所代替。革命熱情的逐漸冷卻，使俄國無產階級轉而注意於保持既得的勝利品，這種防禦性的保守主義，尤其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即缺乏優越的物質條件與文化的國家中，必然助長一種特權官僚的產生，因爲在退守時代，每一階級以及無產階級內部的每一層次，必然極力趨向於鞏固自己的利益，而統治階級中的當權

一層(官僚層)，因為握有全部國家行政權力，也就得到更大的便利，犧牲別人以鞏固自己的地位；國家愈落後，官僚層愈容易『濫用權力』，而且也愈顯得貪婪和無情。這就是俄國蘇維埃制度墮落的深刻原因。官僚主義就是退潮時代保守主義的結晶體，為一種自保的本能所驅使，牠必須自覺地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革命機動性加以窒息，代之以無生氣的『維持現狀』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就是一九二四年史大林在『列寧主義之基礎』這部書中第一次完成的『一國可以完成社會主義』的學說。

三 史大林主義的中心觀念與思想方法

所謂『俄國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完成社會主義』的理論，無非是蘇維埃官僚為了保持、鞏固和擴大其特權利益的一種狹隘的世界觀而已。他們一度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機關，担負了分配的行政責任，便希望終身保持其特殊的地位，因為他們可以在普遍貧窮之中，利用這一特殊的地位，得到一般下層農工所分享不到的享受。在這種狹隘的寄生性的利益基礎之上，便產生了一種狹隘的意識形態——把世界革命貶降為『保衛蘇維埃社會主義建設』的陪襯物。而蘇維埃官僚『一國完成社會主義』的一切步驟，便成為他們蠶食國有財產收入的手段。這一理論所造成的後果在最近三十年蘇維埃內部的墮落與世界革命的失敗和延緩兩方面，達到最慘酷的表现。了解這一點也就是了解我們這個行將告終的反動時代的鎖匙。

蘇維埃官僚雖然為其自身造成一種理論的系統，但這並不因此證明他們具有什麼理論的能力，他們的最大限度的成就只在於替其現有的地位造成一種適當的辯護，因此指導他們底思維的方法不是唯物辯證法，而是一種最平庸的經驗主義與主觀獨斷的觀念論。這一點不僅反映在其理論體系底核心——『一國社會主義』的學說中，而且還有如一根赤線一樣貫串於他們的一切政策中。他們的能力只限於承認既成事實，把牠加以合法化，因而倉卒創造一種『新』的解釋來附加在自己的理論體系之中。這就是全部史大林主義的特點——牠一步一步的把最近三十年歷史中背叛墮落和反動的下落歷程加以唯理主義的紀錄。史大林主義的一切內在的矛盾、跳躍、反覆無常的搖擺，通通可以從這一點得到明確的解釋。

四 史大林主義在蘇聯

這一致命的理論體系在蘇維埃國家內部所造成的第一個果實就是：把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主義原理加以修改，使之貶降到『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官僚主義水準。這一修正反映蘇維埃制度的兩個基本的現實：(一)工業化之不足與勞動生產力的低下；(二)由上一條件必然產生的工資不平等與階級分化的劇烈性。這兩個互相連繫、互相作用的現實迫使蘇維埃官僚只好屈服，產生一種適應現狀的計件工資制——『史達哈諾夫運動』，企圖利用廉價的大量的勞動力的犧牲，來彌補資本底技術裝備不足所造成的巨大裂隙，而這種野蠻的工作制度的美化了(或理論化了)的別名就是史大林憲法的指導原理：『各盡所能，各取所值』。在這一原理的鞭策之下，蘇維埃官僚雖然在戰前三個五年計劃中，利用蘇維埃國有財產的便利，造成不可否認的工業化成果，但同時却在分配方面產生驚人的不平等，而這不平等現象所達到的程度，可以從這一連帶產生的現象中測知：勞動力墮落為強迫、集中、或『奴隸』地位的部份已逐年累增，成為自由勞動的嚴重的不可忍受的對照和威脅。這一墮落趨勢之不可克制，使蘇維埃官僚在這次戰爭中，甚至不敢夢想恢復『軍事共產主義』時代的生產和分配的優點，他們只好閉着眼睛把這一墮落過程加以空前的推進。在這種醜惡的強迫勞動的糞堆之上，只能培養一種加倍醜惡的意識形態之花，於是從『一國社會主義』經過『蘇維埃愛國主義』一直下降到沙俄時代狹隘的民族主義——『泛斯拉夫主義』之復活，野蠻的軍事紀律成為同等野蠻的勞動紀律的可恥的反映，希臘正教的福音交織着對彼得大帝與蘇伏勞夫的讚美歌，最後就是殘暴的政治迫害和民族壓迫與過去的『莫斯科審判案』合成了一部特爾米多反動之交響曲，而所有這些醜惡現象的綜合產品就是波拿帕特的軍事官僚專政與格別烏的殘暴機構。假如減去了國有化財產——十月革命的殘存的遺產，史大林的政制就是世界上最兇殘的法西斯統治！這就是史大林主義在蘇維埃國家所造成的後果，所謂『一國社會主義』無非是把蘇維埃政制的孤立和落後的條件加以理論化的企圖吧了。

五 牠的外交哲學

這一學說替蘇維埃官僚推出了一種邏輯的外交哲學：經過妥協或『革命壓力』的曲折政策可以達到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共存共榮的長期階段，而在這一階段內則蘇維埃國家就有充分的機會『完成社會主義』。為了實

義大利人民的抉擇

劉乃光

義大利總選已於四月十八日舉行了，這是『全世界等待着』的最緊張的一天！因為在美蘇『冷戰』逐漸走向熱戰的今天，此次總選將決定這隻『地中海長靴』目前的動向；究竟傾向東方還是西方？全國大小三百五十六個政黨，都熱烈地參加競選；其中最大的兩個集團：基督教民主黨與政府集團，和共產黨、社會黨左派（南尼）等的人民陣線集團，更是針鋒相對，各拼全力來爭取選民；而左右派間的流血衝突，也在各地不斷發生。就在這樣營壘分明的熱狂中，全國二千九百多萬選民，十分之九都參加了這一次抉擇！

投票的結果：（一）基督教民主黨得到了『空前的』勝利，獲一〇、七四〇、一三一一票（佔百分之四七·九），可望取得參院一六至一一八席，衆院三〇三至三〇七席，（合起來佔百分之五三·四八的多數）；（二）人民陣線得六、九五五、二二九票（佔百分之三一·一），可望取得參院七五至七七席，衆院一七八至一八二席（合佔百分之三一·七）；（三）社會統一黨得一、五八〇、七二二票（佔百分之七·七），可望取得參院十二至十四席，衆院三十三席（佔百分之五·七四）。從這次總選的前三名看來，共產黨無疑已遭逢了失敗，而基督教民主黨則在新議會中佔了絕對的多數，直接吸收了社會統一黨的大量選民，使牠的選票一落千丈，慘跌到第三位去。這當然難怪喀斯貝里誇稱：『我做夢也想不到我們竟會得到這樣的絕對多數』；而且要使美英法全感滿意，認為這是『冷戰』中對蘇聯的最嚴重打擊；甚至連邱吉爾也『歡喜』起來，認為『歷史上的大事』了！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之一，正如一般人指出的，是由於美國的『壓力』。她一方面用『救濟物質』和貸款等實質援助來誘惑，另一方面以『共黨勝利便取消美援』來威嚇；一方面以歸還特港和非洲的殖民地、允許義大利加入聯合國等來拉攏，另一方面又在總選前夕派軍艦到地中海『演習』，超級空中堡壘赴義大利天空飛行。但這種『壓力』即使能够起着很大的作用，却不是最主要的，具有決定性的。因為蘇聯也該當是同樣能够施行這種『壓力』的。事實上在總選之前十六日，蘇聯政府也曾『宣布業已準備開始和義大利從事關於貿易、航運與賠償的談判』。（合衆社莫斯科三日電）不久『報載蘇聯或將放棄要求義大利對蘇的賠償一億美元』。（路透社羅馬十日電）而在競選方面，據美國所得報告，『義共黨會得到蘇聯及其衛星國的相當數量的幫助，以供競選之用』。即捷共機關報十四日也承認，『捷克左派報紙將以白報紙六車趕運往義大利，贈與義國左派』。但所有這些都似乎無法抵補克林姆官對戰敗國人民的橫暴態度：如拒絕歸還特港，反對義大利加入聯合國

，以及實行向義大利索取巨量賠償等，這種政策顯然是加強了義大利一般中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傾向，因而幫助了美國的勝利。現在史太林官僚不但接受自己這種政策所招來的失敗教訓，反而將失敗歸咎於選舉的『不自由』，彷彿牠所統治下的國度就有絲毫『自由』的選舉似的！這當然是一種愚蠢的詭辯和惡毒的諷刺。

其實，美國的『壓力』和蘇聯的態度，都不是決定此次選舉中共產黨失敗的最重要因素。唯一決定的因素是在於義大利共產黨本身的政策，這種政策因為追隨蘇維埃官僚的外交，不斷地在事實證明中遭到了破產，引起了不滿和失望，因而日漸喪失牠的擁護者。義大利共產黨所實行的是一種改良主義的政策，一貫地追求階級合作的『聯合政府』，所以牠雖然自稱擁有二百廿萬黨員，操縱着全國總工會，直接影響着全國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同時支配着二十五萬到四十萬的遊擊隊員；但由牠沒有決心奪取政權、成立工農政府、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因此在去年十一月底的總罷工中，當羣衆已起來要結束這個資本主義舊制度、走向社會主義的時候，牠便懦怯地向資產階級屈服，只實行了一天便宣布停止總罷工了。光是這件事已充分暴露了義共黨政策的破產，引起普遍的疑惑、不滿和失望了。在此次總選前夕，義共黨仍然用這一破產了的、與資產階級合作的聯合政府路線來進行競選，仍然不斷宣布：『不論普選結果如何，共產黨決尊重法律與政府合作』，即在獲得多數勝利後，仍『願與基督教民主黨組織聯合政府』。（路透社米蘭十五日電）共產黨第二領袖『隆戈』說：『倘使共黨在此次選舉中獲勝，我們無疑將延攬基督教民主黨入閣。』（合衆社羅馬廿一日電）但在資產階級政黨方面，不管隆戈如何『要求新政府包括共黨在內，說不應該將共黨置之不顧』，（同上電）喀斯貝里依然明白表示『決不考慮延攬共產黨入閣。』這在一般中小資產階級看來，喀斯貝里至少還有點『骨氣』，共黨則是軟弱無力的。他們了解共黨過去的聯合政府絲毫無力解決義大利當前的嚴重問題，當然不會相信牠今後能造出什麼奇蹟。而在下層的工農大眾看來，共黨始終願和資產階級政黨合作『論政』，這證明兩者之間無大分別；他們當然也明白這樣的聯合政府決不是他們所希望的工農政府，同時決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的徹底改革。至於共黨領袖陶里亞蒂在競選演說中發表的共黨計劃：（一）防止反動勢力的再起及法西斯主義的復活，（二）驅逐另一戰爭的威脅，（三）尊重新憲法，使成工人利益的保障。』（路透社那不勒斯十五日電）也沒有超過喀斯貝里的競選政綱，更沒有比較切實有用些。反之，喀斯貝里除了宣布『執行農田改革

及救濟失業等兩大目標」，(路透社羅馬廿一日電)他還依附着一個強有力的靠山，獲得大量的物質援助，且可望收回特港及非洲殖民地，加入聯合國以恢復國際地位……這些號召無疑比共黨的更少虛幻性，因而獲得更多的擁護，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擁護。只有從這兩大黨施政綱領的比較中，我們才能找出此次兩黨勝敗的最主要原因。

在共黨失敗揭曉之前，四月八日的倫敦廣播便已指出一些值得注意的事實，說左派中已有大批脫黨者加入基督教民主黨。而在揭曉之翌日(廿一日)倫敦廣播又指出人民陣線已在開始瓦解，其中的社會黨左派領袖六人，已要求該派領袖南尼退出人民陣線。尤其是共黨領導下的遊擊隊，由於共黨領袖之反覆聲明「無意憑藉武力」，因此也開始解散了。這種解體現象原是不可避免的，共產黨的改良主義政策不斷遭逢破產後，威望日益減低，地位日益削弱，外部的壓力日益加強，內部的不滿和失望也日益普遍，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因此，在此次總選失敗之後，我們可以預言：義大利共產黨發展的黃金時代已成過去，從此將向斜坡滑下了！義大利社會黨在近年來的迅速衰落，便是這一類改良主義政黨的「前車之鑑」。共產黨也將或遲或速地步社會黨的後塵的！

但這並不是說，工人階級中的改良政黨底衰落，將替資產階級中的改良政黨開啓一個繁榮發展的新時代。毋寧說，後者比前者將更難長久立足哩！今天的喀斯貝里內閣，正如法國的許曼內閣一樣，只是一種過渡的中間性的政制。牠今天所依靠的美援，只具有臨時救急性質，過去數年來各國依靠美援的例子都已證明：美援並不是萬應藥方，可以醫治這個百孔千瘡的殘敗經

意大利的危機與前途

(羅馬航訊)

嘯瀾

自去年十一月起，意大利便經歷着一個非常的時期。整個的國家好像被一種熱病所纏繞，充滿着動盪、騷擾和不安。

地中海風吹過處，已不再是南方絢麗的歌樂之鄉，畫般詩意的拿坡里已消損了舊日的容顏。浪漫的想像在這殘酷的現實面前破碎了，幻滅了。除了那些吸吮着美國接濟的特殊階級(內閣官員們與新暴發戶)的住宅區外，遍處是污穢和雜亂；飢餓與貧窮在這裏更表現得透骨可怕。在羅馬古城裏，可看到一羣羣閒蕩着的無業流民徘徊在十字路口；巍立而斑蝕的大廈石階上，衣衫襤褸的婦人在餓着飢餓的嬰兒。貧窮已深入到社會的心臟，深入到整個沒落的資本主義制度的骨髓。

記得在哀那地 Signore Einaudi 爲了阻止通貨膨脹，壓制物價騰漲而頒佈限制工業貸款法令，同時更大量輸入美國食品後，雖曾一度使某些物品

濟制度；而重新奪得特港和非洲的殖民地，也不能突然使這個貧瘠落後的國家富裕起來。這些都不能解決義大利當前的土地、失業和購買力降低等難題，不能避免新戰爭和法西斯專政的威脅。相反的，牠愈是依靠美國，加入西歐集團，(而這又是此次總選後的必然結果，是喀斯貝里勝利之翌日宣佈的希望!)則更加促進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更加接近戰爭的邊緣了。另一方面具有法西斯傾向的右翼黨派，在此次總選中也漸漸抬起頭來，牠們在目前已有六十個地下的軍事組織，而在競選前到處活躍，打擊左派，且在選舉揭曉之後，連倫敦廿日廣播也不得不指出：「社會運動黨所獲的票數，顯示舊日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有再起的徵象。」如此看來，喀斯貝里勢將成爲法西斯主義和新戰爭的清道夫，是很顯然的。

不過，這只是兩種勢力消長過程中黯淡的一面。我們還有充滿樂觀的另一方面。在當權政黨無能解決土地、失業、購買力低落等嚴重問題，反而帶向法西斯和新戰爭的時候，廣大的工人和貧農們，勢必要找尋一條新的出路，同時在舊的改良政黨破產沒落了以後，又勢必要找尋一個新的領導。這個新領導的核心，今天雖還不很強大，但無疑已存在着。而今天社會黨內部的分化(請參考本期羅馬航訊)，雖然還未採取明確的革命政綱，但這種中派傾向仍是進步的，有助於新的革命領導之成長和強大的。當然，這分化也定將不斷在共產黨內部爆發出來，客觀情勢的需要遲早總會使這個新的領導成長起來，把義大利帶出法西斯主義、戰爭和貧困的死港，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條路，本是義大利的工農大眾，在第二次大戰後誤認共產黨和社會黨能領導他們走上，因而投牠們的票的！

(如燈油，通心麵)的黑市批發價格突然降低，但是不到二個月，這個政策的不幸後果便發生了。工人所受到的高物價威脅還遠未消滅，而工業却已遭到了窒息的厄運。資本家不願意受到這樣的損失，於是工廠相繼倒閉。大的托拉斯也馬上不能支付工資。意大利正面臨着一個嚴重的經濟危機，同時通貨膨脹的危機更加增加了巨額的失業工人。(據最近工會的負責人估計，意大利的失業工人有二百萬。)

可是，工人階級不願再做沒落的資本主義的替罪羔羊。米蘭的冶金工廠，在去年十一月裏與要開廠的廠主經過三天無效的談判後便開始佔領工廠。正當工會領袖們討論着廠主之要求取消限制開除工人問題的幾星期中，其他城市也相繼跟隨着米蘭工人的先例，自發地佔領工廠。佔領工廠的工人不但禁止廠主及經理進入工廠，甚且自動地恢復生產。在那些工廠被佔領的城市

裏，「由工人自己管理廠中工人之雇用開除及生產」的口號，已成為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在布里斯亞城市裏，他們走得更遠了。當被解雇的工人舉行一個龐大的示威遊行時，警察想用催淚彈來驅散遊行隊伍，但立刻被工人羣衆趕走。當號笛響聲升起時，整個的城市便完全癱瘓在總罷工的狀態中。人們以傾覆的卡車爲障礙物，在「煽動委員會」的指揮下佔領了整個城市的中心區。這次的罷工不久便由史大林黨與資方代表的協議而告終了，被出賣了。上層的領袖們被這事件的宏大規模嚇住了，可是工人階級本身倒是真正預備爲奪取政權而鬥爭下去的。

在這裏，我們更可看到兵士與農民運動之逐漸勃發，以及在婦女、青年中不安情緒的醞釀。這明顯地指出：革命的血液已滲透到在傳統上最麻痺無知覺的脈管中去了。米蘭的兵士們爲了反抗延長兵役的時期，差不多整個的守衛部隊突然離開兵營，包圍市政機關，要求立刻予以退伍。至於農民運動，在去年九月間農業工人總罷工勝利之後，便集中在威尼斯，阿普利亞和美利亞三個區域內。農業工人委員會已在數處建立起來。馬得那省的委員會已佔據重要地區的土地，當地的農民且自動驅逐了地主們，集體地管理這些沒收的土地。

以上這些活生生的鬥爭正在意大利的每個角落裏燃燒起來。這些運動已把意大利所有的下層分子吸引進來，隨着這一股漩流急轉。沒有再比這樣的事實更能象徵一個爛熟的革命局勢了。這一連串的運動正是一個新的革命爆發的先聲。

意大利的現勢已臨到一個大革命的邊緣，但是誰來領導這樣一個革命呢？哪一個階級將在這革命中佔主動地位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意大利兩個號稱革命的羣衆的黨吧！

意大利的共產黨是一個擁有大量黨員的政黨，它控制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人，二十五萬至四十萬的遊擊隊伍。但這一點尚不能測驗意共的真實力量。它因爲經過二十多年的地下生活，沒有受過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沉重牽累。當法西斯突然垮台下來後，工農羣衆之大量擁入意共，純然是懷着強烈的革命希望，正因此，意共領袖杜格利蒂（克林姆宮的忠實奴僕）三年來所走的妥協和叛賣路線才在隊伍中不斷遭到反對傾向的打擊。如在拿坡里之「左派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在羅馬之「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米蘭之「國際共產黨」。這樣的運動此伏彼起，常擁有數千份子，並在事變中起了領導的作用（尤其是「意大利共產主義運動」）這便是羣衆給予它的壓力，這種壓力自一九四五年更逐漸地在生長。目前意共正想學它在法國的姊妹黨那樣，從極右政策一百八十度地轉向左方，以再恢復對羣衆的直接控制。但是羣衆早已經歷了三年的發展和成長，他們的自覺已超過意共的頭了。

意大利社會黨，也曾與法國社會黨處於同樣地位，在莫索里尼的淫威之

下，淪爲一個地下的組織。但現在在歐洲各國社會黨中，牠算是最有工人羣衆基礎的了，因爲剛從法西斯獨裁的魔掌下掙脫出來的意大利工人階級，急切地摸索着一條革命的道路。而這種客觀的趨勢再配合了社會黨從法西斯鬥爭中遺留下來的某些聲望，促使社會黨很快地在羣衆中找得了一個地位，並且由於無產階級成分之佔大多數，因此成爲一個最能敏感地反映工人情緒的政黨。但是它的領袖層在實質上是因襲第二國際機會主義的傳統，不能保持一個獨立的立場，因此在意大利兩大勢力——資產階級政府與意共——的影響之下，分裂成兩個集團；南尼所領導的集團深爲意共所感染，因此他們的政路路線也往往是隨着意共的政策而擺動的。南尼大膽地聲言：他是一個「工人階級的煽動家」，因爲他覺察到羣衆的壓力和革命的情緒，可是在骨子裏他仍是一個機會主義者，到了實際的行動上，他仍舊採用階級合作的政策，作爲進入資產階級政府的橋樑。（他之對史大林黨的機遇主義政策——人民陣線、聯合政府等——亦步亦趨，並非偶然的。）

另一方面，與這個集團對立的便是沙拉加所領導的集團。然而，這個從社會黨分裂出來，另行組織的意大利工人社會黨，是由站在革命立場反對史大林黨的極左派及站在改良主義立場反對意共的極右派聯合起來的。這一個矛盾的結合，在革命份子看來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今天，沙拉加投降蓋斯具里內閣，成爲資產階級政府中之一員，也正是意料中的必然結果。其中一些老的中派主義者可憐地屈服於沙拉加的領導之下，可是它的革命的左翼便展開了英勇的內部鬥爭。它出版了一張報紙：「工人的反攻」。它以一個堅定的立場反對一切與資產階級的合作行動，並願無條件地支持一切工人的鬥爭。它聲稱：「只有在階級鬥爭中，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才能達到成熟。工人階級必須了解，它的目標並不是資產階級政府中少數幾個官僚的職位，而是政權的奪取」。這一個新的傾向在陰霾四佈的意大利啓示了一個較爲光明的遠景。可是新的革命力量還在開始發動的時期。它需要一個正確的領導，而它的前途將以工人階級覺悟的速度來決定。

意大利的工人階級，自一九四三年脫離法西斯的羈絆後，便表現出熱烈的鬥爭情緒。他們之傾向意共，正是由於他們革命情緒的高漲，急迫地需要一條新的出路，來解除這一切由戰爭帶來的災害，不幸，貧窮，飢餓。可是意共的官僚機關之不斷搖擺於左右路線的兩端，卑順地從屬於克林姆宮的外交政策，它與資產階級的妥協，合作，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扼殺了罷工與革命的成長，以及自動解散數十萬遊擊隊伍……正在一步步地暴露它的真面目，使它逐漸失去了工人階級的信賴，同時也失去了它在工人羣衆中的控制力量。意大利工人階級從三年來豐富的鬥爭經驗中更健壯地站立了起來。現在他們更有充分的機會回復到過去的革命傳統，更有可能發展他們的主動力與批評的精神。他們的一切優點都表現在歷次的行動裏，尤其表現在佔領工廠與街頭的英勇鬥爭中。今日的意大利工人階級，正在歐洲工人階級的前鋒

隊中戰鬥着。

雖然客觀局勢，從社會的混亂與赤貧化，階級鬥爭的愈趨尖銳，到無產階級的成熟與覺悟，鬥爭經驗的豐富化和力量的增強……都明白地表示出意大利已進入一個社會制度的蛻變時期。可是從主觀上來看，意大利的兩個最大的羣衆黨——可以把握意大利命運的兩個巨人——却已墮落在機會主義與改良主義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在這個革命的前夜，意大利所遭逢到的是個嚴重的革命領導的危機，即、真正的革命先鋒隊還未迅速地建立起來，完成領導工人羣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奪取政權的任務。

但是，這一個危機並不是致命的。意大利在戰後便開始有第四國際的支部存在，雖然它的力量還很單薄，還未深入到廣大的羣衆中去，可是在工人階級的不斷鬥爭過程中，它也將隨着無產階級的覺悟與提高而成正比例地生長起來。同時，從最近一件新鮮的事件中，我們更可看到一個羣衆的革命政黨的雛形。

二月二十八日由沙拉加領導的意大利工人社會黨在羅馬舉行大會，在右中，左三派意見分歧的爭論中，社會黨青年團總書記梅頓起立激烈攻擊領導層之背叛工人階級的政策，同時其他的左翼代表們也發表一聯合動議，表示對領導層的不信任，指責其與資產階級政府的勾結行爲。在大會結束後，整個青年團與圍繞着羅馬的「工人」報與米蘭的「社會主義統一」報的左派集團，便立刻同時脫離沙拉加的社會黨，成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政黨，名爲「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統一運動」，出版之機關報，名爲「社會主義統一」報。這一新運動的名稱與它的報紙正表現一種恢復舊的革命傳統的願望（即恢復在法西斯統治下的青年革命馬克斯主義者的秘密組織——「無產階級統一運動」）

當這個新集團中的份子表現出最完善的革命意向時，他們的行動中却仍夾雜着一種混亂的中派主義傾向。正由於這種傾向，使他們經過在工人社會黨內堅苦的歷史大陣鬥爭之後，又因打擊小資產階級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傾向而與意共中的份子採取聯合行動，直到今天仍與意共及南尼的社會黨共同建立的「人民陣線」相接近。雖然這新黨的黨員公開表示不贊同「人民陣線」的新改良主義政綱，且聲明他們之參加「人民陣線」意在於從它的基層發動一個真正的鬥爭，而這個鬥爭不是圍繞着投票箱的，而是展開在工廠及街道上的，但是，在進步的工人看來，這一種聯合行動將新運動與「人民陣線」的政策相混淆的危險性在內。而「人民陣線」的政策在今日是必然要破產的。因此這個年青的新黨有必要在政治上與「人民陣線」隔離。它必須進行一個有力的堅韌的戰鬥，將所有單個的資產階級份子從「人民陣線」中驅逐出去，卸却這個替代史大林領導層限制羣衆戰鬥精神的障礙物。它必須站在反對「人民陣線」改良主義的立場上，發表一個過渡時期的真正革命政綱，以推動意大利工人階級走向無產階級革命的道路。參加過所有的運動與鬥

爭之後，這個新的革命組織將運用其特殊的經驗越過不澈底的中派主義傾向，集合到第四國際的綱領與組織的旗幟之下。

附：這是沙拉加黨革命左派在分裂前所發表的政綱，發表在他們的報紙

- 一、「工人的反攻」上。現將其中一部分譯錄於下，以資參考：
 一、黨必須回復到它的固有領域——階級鬥爭，並且應使工人相信，意大利工人社會黨並非鞏固資本主義制度的工具，而是工人階級保衛其階級利益的工具。
- 二、黨應供獻一個明確的政策給無產階級，以爲它的革命社會主義的主動力，來對抗史大林黨的政策。因爲這個黨已成了蘇聯官僚層的軍事外交工具，絕對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利益。
- 三、真正的社會主義黨的基本任務在於領導無產階級不畏縮地抵抗資產階級與它的代理人（尤其是基督教民主黨）之進攻，同時反抗史大林黨的機會主義。
- 四、在基督教民主黨政府內爲本黨黨員的官吏必須離開這個政府。
- 五、「社會主義統一」所提供於選舉中的代表名單，表明其不可能代表獨立的意大利工人社會主義黨。
- 六、引導到世界無產階級團結的活動是一個社會主義機構不可缺的先決條件；我們反對將無產階級的政策附於蘇聯利益的史大林黨立場，同時也反對公開地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與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結在一起的工黨立場。
- 七、將從很久的苦難與累增的資本主義壓迫下勃發的無產階級、農民、以及各種勞苦大衆的運動統一起來。黨必須在工人鬥爭中取得領導地位，阻止他們受史大林黨策略的利用，而將他們引回到階級鬥爭的場合中。
- 八、爲管理會議之取得合法地位而鬥爭，並指責出一切分裂工會團結的企圖，指責假改良主義者與史大林黨之欲將工會繫屬於政府之企圖。

三月廿日寄自羅馬

鳴謝

我們這大願請愛護「新聲」的讀者朋友們，爲她的兩週年紀念發

- 金先生 白報紙五令
- 馮道生先生 五十萬元
- 李生來先生 三十萬元
- 麥渭文先生 五十萬元
- 斯頌禹先生 五十萬元
- 甯志威先生 一百二十萬元
- 李禮德先生 一百二十萬元
- 朱秋芷先生 五十萬元
- 劉建成先生 五十萬元
- 雷振強先生 五十萬元
- 無名先生 五十萬元
- 無名先生 五十萬元
- 方庭名先生 五十萬元
- 朱珍先生 五十萬元

論里昂托洛斯基 (續完)

E. Germain 著
曉星 譯

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否認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列寧則譏笑「列寧主義者」這個字眼。他只認定他自己是一個「始終如一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輪到托洛斯基呢，他在他的著作中，會小心地把「托洛斯基主義」這一名詞放進括弧中，而且多年來就把這一名詞標明為史太林主義官僚們方面稱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名稱。正如人們不能懷疑列寧主義底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性質，經過一番客觀的考究之後，人們也絕少能懷疑托洛斯基主義底真正的列寧主義的性質。而且，正好似列寧主義之保有其並不遜的獨自面目以及構成馬克思主義發展與豐富的明確階段，托洛斯基主義在今天，以其自身的特質看起來，也是馬克思、恩格斯與列寧底教義的一種擴大。托洛斯基主義就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這還是照這個名詞的最深刻的意義而言的。

從思想的觀點看來，托洛斯基的最大功績在於此：他曾確實在工人運動的普遍退潮以及那些傳統政黨和思想的全般墮落當中，保持了馬克思主義。他一分也不退讓，在理論，同時也在策略方面保持了列寧主義的遺產，抵禦列寧底不肯門徒與史太林底文士們的包圍運動。他以同樣的頑強，保衛了這一遺產，抵禦改良主義與中派主義底微弱而不斷的正面攻擊。

那些大的傳統運動之思想的衰落較之牠的組織解體，迅速和深刻得多。在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方面，牠於一九一四年在實踐中，與階級政治之真正決裂却發生在牠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全般破裂之前。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僅僅在一九二一年才採用一個正式是「改良主義」的政綱（哥列茨綱領），又僅僅等到一九二五年才確切不移地採用這種政綱（海德爾堡綱領）。但人們可以毫不誇大的說，一九一四年始，社會民主黨已不再注重理論。這個日期之後出現的寥寥無幾的「理論」著作，全是把黨底「策略」的幾個連續階段，加以經驗的合理化的。墮落的社會民主黨底「思想上的努力」無非是一種偶然的企圖，想在理論上「辯護」他們那些面臨資本主義沒落底領袖們的罪惡的消極態度，他們之犬儒主義地拒絕一切革命活動、他們之公然的販依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度」、他們在資產階級進攻面前的懦弱、以及他們對於其自己隊伍內部反叛者的黑心，結果就是機林的宿命主義與漸進的癡呆病之混合。希爾費丁在一九二九年恐慌爆發之前幾個月，「預見」高漲的資本主義繁榮的一個「長時期」！——這讓讀者們只好在厭倦與可憐之間去選擇。史太林派官僚的思想沒落以更優越的速度發生。「理論」變成了投合官僚

們口底「策略」的賤僕，這恰猶如中世紀時代，哲學之成為神學的婢僕，成為教會底俗世權力的一種必需的掩飾一樣。牠從沒有墮落得這樣低，從列寧的天才之高度下降到「偉大領袖」（指史太林——譯者）底職業辯護者們的沈重的脚。史太林派「理論家們」的唯一作用在於拿一些古典的「摘引文句來裝飾幾盤辣菜，而這幾盤辣菜則是那位著名的廚子供應俄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但他們的奴隸根性却使他們失却尊榮，甚至連他們的主人也失却尊榮。但這種完全的思想上的無能却為歷史前所未聞的最強大的物質機關武裝着，而那大堆愚妄和說謊的書籍綿延不絕的製造，還配合着格別烏的及時襲擊，却是一個社會的現實，這一現實已證明有摧毀一切的力量。當理論把握了羣衆之時，牠就成爲一種力量，馬克思說。只要羣衆一天沒有擁回政治決鬥場上，說謊已證明在一個放肆的機關的手中，是一種可怖並不稍減的力量。

人們一想到如果托洛斯基死於一九二三年，會發生什麼事情，不寒而慄。當然，馬克思主義——亦即是現代社會現實及其內在動力的表現——會由別人保持的。五大洲的幾十個，往後幾百和幾千個年青的理論家和策略家經過共同的努力，一定會對於實際的事變，達到馬克思主義的觀念的。但這種努力與獲到的積極結果的對比，最後結算起來一定會證明浪費的力量與損失的時間達到令人刺目的數額的。托洛斯基，盡其一己之所能，填滿了工人階級運動史中因爲一整代的喪失而造成的空隙，這整整一代爲史太林主義所腐化，並在肉體上受摧毀，爲悲慘的連續失敗而失魂落魄，並爲反動與法西斯主義的大浪所毀滅。凡是真正「戰勝」過托洛斯基主義者，他們的爭論作品已湮沒無聞。這不是因爲那些作者本身也泰半被當作「托洛斯基主義者」而處決了嗎？但托洛斯基從這個時期起的著作却繼續爲全世界整千整萬的青年工人和知識份子研宄着。因爲只有這些著作才在人類歷史這個黑暗時代，代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新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幹部的教育之可能，只有多謝托洛斯基的著作。他在退却和反動的這些年當中保持了馬克思主義，因此，他已替上升的時代建築了一道跳板，這個上升的時代正在開始。面臨着史太林主義的勝利，托洛斯基往往依賴於歷史的裁判。他死後已經七年，這一裁判在思想的領域中是已經分明了——正如托洛斯基從未懷疑牠會是的！

與任何關於經驗底事實之考究和系統化的方法無異，馬克思主義之能否維持，只有視牠是否繼續豐富起來而定。任何防禦地退守「傳統」的企圖，這裏作者是在運用列寧批評史太林的話，稱他是一個喜歡加辣味的廚子——譯者

又不作任何努力去包含新的發展（這種新的發展是經過唯物辯證法的篩子不斷發生的），都一定足以造成理論的一種致命的硬化，結局還造成牠確定的死亡。托洛斯基的工作代表一種唯一認真的努力，在馬克思主義的光照中來解釋最近三十年那些令人困惑的現象：法西斯主義的發展、官僚在蘇聯的權力篡奪、蘇維埃經濟的曲折演進、資本主義世界底出奇地加速的崩潰、以及無產階級革命領導一般的危機。列寧憑他對帝國主義、世界戰爭與第一道革命浪潮的研究，曾推進而且豐富了馬克思的遺產。他的成就就是帝國主義生長與十月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在托洛斯基身上却會加上一個沉重的任務：在反動和秦凱的反革命時代，豐富馬克思和列寧的遺產。因此他會以他底前驅者所具有的同樣難於和解的明確性、同樣闊大的眼界、同樣尖銳的分析，使這一傳統永替不衰。

除開那些自覺地與保持特權的本能決裂的個別份子之外，凡是保持特權的本能總是使思想受著一種狹隘和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受了這一界限所限制，任何『客觀的』社會研究的努力卒告失敗。革命底無產階級思想的機動性恰好就在於牠從每一種社會特權中『解放』出來；從社會的觀點看來，牠的『物質利益』與一種『無私心』配合一致。但工人的官僚們（改良派與史太林派兩者）却在現社會中成了享有特權的、保守的社會力量。正好似他們會一般的把思想貶降到服從他們底物質貪慾的水平，他們同時使他們自己的思想變成貧竭和無能，不足以担当歷史正不斷要求的新探討。在西班牙內戰當中，那些傳統領導的叛賣（這種叛賣就是他們自己的物質利益違反世界無產階級利益的歷史的表現）所採取的方式就是完全無能去瞭解法西斯主義的意義、資本主義的沒落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略，這種戰略是能够戰勝這些附加的障礙物的。那末，二十年來，沒有本（馬克思主義）著作由一個史太林主義或改良主義的『理論家』寫出來（即使有也只能當做孤立或次要的現象），就並非偶然。在歷史、社會學、藝術、文學或心理學的研究諸方面，所有馬克思主義的增益都全在打洛斯基的信徒或曾受其薰陶者的著作中。當然，反動時代（這個時代才剛剛告終）是不利於馬克思主義者一大代人的繁盛的。這一代才剛剛開始來扣門哩。但雖則如此，在第四國際同情者或黨員的隊伍中所發現的對於理論的興趣、他們對於最迫切的思想問題的努力研究——尚未弄清楚的歷史底重要現象的唯物論觀念、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學的關係；歷史中主觀因子之研討；唯物論辯證法之研究；對於藝術和文學批評想造成一種唯物論觀念的企圖——所有這些努力正在法國和中國、印度和美國、阿根廷和巴勒斯坦，由一些青年的理論家啓其端，他們都是在里昂、托洛斯基底著作的啓示之下完成的。在這些著作本身之中，就可以找出豐富的思想與研究底新方法綱要的無窮寶藏。光是把散佈於其著作中的提示加以研究，就需要一整代人的努力。這一代人將來工作和成功全靠他努力建立的學校。但馬克思主義之保持以及牠之通過現代新現象底研究的豐富化——光是

這尚不足以把托洛斯基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底發展中所佔的位置劃分清楚。馬克思主義中還有一個重大的部分是在他的時代以前無法加以系統化的。馬克思的工作照其整個說來，只是對於世界以及隨着這個世界的轉變而來的諸種趨勢的一種科學的解釋。至於這種轉變的自覺的實現，以及真實的無產階級革命，關於此，他所能遺留給我們的只是一般的見解和許多孤單的提示，而沒有有系統的研究。恰恰相反，他却以一種固執的態度反對任何『預定計劃』的制定，任何『總規』的訂立，而這種固執之產生正是由於他清楚瞭解：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戰略和策略之具體研究必須以廣大的革命經驗為基礎。他終其生只見到巴黎公社照着這種思想的要略所作的初步努力。這就是他之所以不得不把（按照這種意義）完成馬克思主義的任務遺留給他的繼承者的原故。

列寧，在他這方面，却作了一種極大的努力，精確地說明和劃清主觀因子的作用：黨的重要性、先鋒隊的形成、牠與本階級的關係。這些努力（與一種明確的、有系統的鬥爭策略相配合）是有原則的、實際主義的、革命的，我們今天認為，也該當認為是有一種普遍的應用性的；但列寧，至少直到一九一四年尚把他的眼界限於俄國社會民主黨。不過第二國際一場台，他的行動領域便開始迅速擴大。他成了整個世界無產階級的教育者。他關於革命底失敗主義戰略、關於革命黨底建立、關於聯合戰線戰略、關於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的著作，以及他在俄國革命當中和以後的全部實際活動，構成一種最寶貴的教義，無產階級保有這種教義就可以製成一種革命的政策。但列寧的經驗却限於俄國革命與德國革命之第一階段。往後的經驗已指出：主觀因子，革命黨底作用和政策的『一般的研究』——這構成列寧對於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貢獻——不得不由一種特殊的研究來完成，這種特殊的研究就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展的內在規律、關於革命的機械作用、以及懷着奪取政權底目的的革命黨的策略。這種對於馬克思主義的不可或缺的補足、這種『革命的科學』（照足這個字眼的雙重意義）之能够有系統的造成，只有根據於較一九一七年更廣泛的革命經驗。托洛斯基在『十月教訓』及『列寧死後之共產國際』兩本書中作了一種輝煌的發報工作。在他的『不斷革命論』，他的『俄國革命史』以及他在一九三〇年與一九三八年間論及德、法、西班牙問題的著作中，他已更明確的把這一工作實現到這一點：牠現在以精確的綱要形式存在着。這種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成就，牠的內容可以在第四國際的綱領式著作中找到。因此，這些成就不僅代表馬克思和列寧的遺產（『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以後怎麼辦？』、『帝國主義論』、以及『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的教義），而且還在全世界不斷搖擺於革命與反革命時代中，代表無產階級勝利與失敗的三十年。

列寧拿建立革命黨的藝術以及其政治策略底原則的發展，教育了俄國工人戰士的三個整代。但僅僅在一九一七年他對於無產階級專政，才達到清楚

的瞭解。布爾什維克黨的大多數領袖都無法溶化一九一七年十月的教訓。那些一九一九年加入共產國際的革命戰士，在其自己個人發展的基礎之上，對這些教訓的瞭解也不較多；因為戰前幾年的『和平的』發展、他們在戰爭中之孤立、與戰後革命浪潮之過於迅速和驚心動魄的展開，使他們受了沉重的阻礙。這個先鋒隊的往後的發展，因為一九二三年開始的第三國際的墮落而完全被打斷了，而這種墮落就是史太林主義反對世界無產階級的最惡毒的罪惡。一個革命領導，本來應該按照其政治的成熟性來加以選擇的，現在却代之以一種相反的選擇，完全以對於克林姆宮的奴服和盲從為基礎。當托洛斯基派被排出共產國際之時，凡事都不得不從頭幹起。一枝新的革命先鋒隊的建立開始進行了，這枝新的先鋒隊是能夠遵照十月勝利及往後的失敗的教訓而行動的。托洛斯基的大半時間就是貢獻在這任務之上。而對於歷史未來的行程將發生最大影響的，也正是這任務之完成。

一枝新的革命先鋒隊的建設工作是在最困難的條件之下着手的，也就是在世界工人階級運動陷入長期失敗的時候着手的。因此，這一工作不可免是一種『抗逆流』的運動。圍繞在托洛斯基所體現的活的馬克思主義的週圍，特別聚集了所有那些未曾被失敗挫折了勇氣的份子。這些份子往往是最無畏的，但也未必全是最好的。凡是因為與無產階級保有較密切的連繫，而反映了本階級的幻想和悲觀的人，沒有加入我們的隊伍。凡是從來沒有達到置身於羣衆運動而成為其一部分的人，總是較少猶豫，加入狹小的流浪羣中去。這一個先鋒隊的教育太過於慣常採用一種文學和學院式訓練的方式了，因為革命戰略的唯一真正的學校是積極參加羣衆的革命運動。這枝先鋒隊由於孤立，竟發展了一批缺點，這也就是整個退潮時期的特徵：過火的小組織主義、教派主義、知識份子的妄自尊大連同其不可避免的標新立異、職業的無產階級主義。工作中於內部而政治討論本來是任何健全的組織所不可或缺的，却帶上太抽象的性質了，罕有在牠們具體運用於工人鬥爭的光照之下，而把策略的概念加以批判的檢討的。加之，在歐洲與在蘇聯和遠東一樣，法西斯主義、史太林主義與帝國主義的恐怖無情地把我們的最勇敢、最有能力的幹部刈除，因此到處把這枝新先鋒隊底教育和經驗的永續性破壞掉了。所有這些因素（在不同的國家採取不同的表現）可以這樣總括起來：既然一個真正的革命先鋒隊只有與本階級的活動保有密切的接觸才能建立起來，又既然一種真正的革命政策只有與羣衆的批判眼光接觸並在牠監視之下才能訂立，我們在這個退潮時期告終的時候，在大多數國家中所保有的就只是幹部的小團體，只是骨幹的組織了。但頭一次的試驗（戰爭的試驗）已證明這種必需的準備工作收到何等效果了。若干人也許已臨陣逃脫；人的材料也許在這裏和那裏都已證明牠本身是太脆弱了；在不少的國家中，新的革命者團體已不得不起而接替開路的火把，但多謝托洛斯基在戰前那些年已創造好的政綱、傳統和幹部，到處基本的政策都訂定了、一個共同的路線製成了、相同的組織方法應

用起來了。凡是願望建立真正革命黨的人都結集在托洛斯基所制定的政綱基礎之上。而他在工人階級運動史中第一次創立的傳統就是一個真正世界領導的傳統，這個世界領導並不單純是諸民族領導的總和，或單純是領導着所其他組織於其後的、一個組織的權威。憑着這一點，早期共產國際薄弱的重大原因之一也許可以避免，而我們的運動底和諧的發展也得到補充的保證。

第四國際成立之時，托洛斯基預言不出十年，黨員將以數百萬計。諷刺的批評家們滿懷惡意地樂於援引這一診斷，並質問這幾百萬黨員在那裏。但歷史的預言並不能像股票一樣在一個確定的日期兌現的。歷史進程的發展會較之托洛斯基所預斷的慢了，但牠已經循着這同一路線發展了。在像法國、印度、美國、波利維亞這些國家中，同情我們底思想的工人和貧農是以幾萬計的，在世界的決鬥場上，毫無疑問，已經有幾十萬。與完成我們底事業所必需的力量相比，他們還十分少；但與一九二八年我們的微薄力量相比，即在現在，牠也是令人感奮的軍隊。法國工人鬥爭的頭一道重要的浪潮已足夠令各種分歧的、但同等仇視我們底運動的機關報（如史太林黨的『人進報』與亨利·里斯的『時報』雜誌）發現『托洛斯基的影子』投射於事變之中。光是這一點已足夠令我們充滿自信了。我們十分強烈的懷疑在下階段中，我們將再次碰到我們的批評家！

較慢的速率

我們在（估計）我們的迫近的遠景時，我們大家都會犯了錯誤，我們過於機械的運用一九一八年的類比了。我們並沒有充分的領袖打洛斯基這一根本的觀念：我們必須準備長年的（如果不是幾十年的話）戰爭、纏起、短促的和平插曲、新的戰爭與新的暴動。但現在是清楚了：我們正在經歷的，不是類似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的、一個短暫的時期，在這個短暫的時期內，由於極端的兇暴與決鬥的迅速接踵而來，無產階級的革命能力很快便耗竭了。像這樣的時期在歐洲再也無法重演，因為資產階級更無比的脆弱，而牠的經濟也再無比的動搖；至於在無產階級方面，決定性的決定也已是不可能了；因為牠從較之九一八年更得多的自覺力與組織的水準出發；牠過去沒有三十年來的進展，令牠對自己的力量發生自信；反之，牠過去却有二十年的連續的失敗；這些失敗已留下懷疑主義與精神頹唐的一種危險的遺產。我們必須瞭解這一奇異的現象：（革命發展）的節奏，在原子彈階段較之最初的轟炸機階段較慢些。但正是這種發展的較慢的節奏，將提供年輕的革命黨以訓練自己、積聚經驗和成熟起來的機會。我們再也沒有打洛斯基的活生生的頭腦，他以前那種思想的無可比擬的明確性，去發現更有力的激盪；這工作：在外表上似乎不大激動底大海的平面之下，去發現更有力的激盪。這些激盪已宣告下一次風暴的來臨。但我們有他的方法做指導，而且還有他關於我們這個時代底性質問題的遺教，而我們有他的方法做指導，而且還有滿信心的背誦他自已過去所說過的話：

『歷史是替我們底思想服役的；一架強有力的機器。他帶着無情的審慎和冷酷來幹工作，但牠畢竟在工作的時候，我們信任牠。只有等到牠底無聲的機件作用時，我們才心曠神怡地滾熱熱血之時，我們才有迫切之心，叫出來：『這件事幹得正如，幹得更快一點！』』

信箱

關於中共能否取得政權的討論

編輯諸先生：

貴刊「信箱」上所解答的問題，常為當前最重要意義的問題。而貴刊解釋問題的態度，又是具有嚴格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所以每當貴刊到手的時候，我總愛首先閱讀「信箱」中的文字。而且，就我所接近的一些朋友中，差不多都有同樣的嗜好，由此足見「信箱」的吸引力之大了！

最近，由於國內局勢的一些變化（經濟及財政危機的加劇，統治層的過分腐化，美援的遲遲到來，共軍佔領區的擴大……）於是就引起了一般對於中國統治權問題的談論，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一部份的無產階級，他們各自彼此談論着，或是抱着擔憂的心情，或是懷着美麗的夢想，總之，好像政權問題已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有不少的人們，都以為不久會有一個新政黨來代替舊的統治，這個黨，自然不是今天參加「國大」的民、青兩黨，而是擁有廣大的軍隊的共產黨，尤其是他們最近在軍事上的一些勝利，更促成牠得到政權，所以鹿死誰手，好像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敏感的資本家，雖然沒有惶惶終日，可是他們都準備南遷了。至於另一部份抱着極大樂觀的民主名流、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則肯定在一年以內能成立新政權。像這種看法，不知先生有何批評？

關於政權的性質，資產階級對此似乎沒有什麼具體的概念。談論得最熱鬧的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即是東歐式的聯合政府的政權，其他的就聽不到了。貴刊雖然曾表示這種政權是沒有前途的，但是還需要經過歷史的證驗；至少，這種政權在東南歐的好些國家中已經實現了，未知先生可有什麼理由來解釋它在中國不可能實現？

很多人都是這麼說的：中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農民的數量佔絕大多數，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在今天，甚至看不出來，那麼，這種過渡性的政權，一定能夠獲得大

多數人的擁護的，它的政綱亦是適合中國的國情的。這種理由好像很充分的，未知先生又以爲如何？

有人又以爲過去中共的確放棄了奪取政權的機會，可是不會了，客觀的形勢迫得他非奪取政權不可了，即是說，現統治者太腐化，最後一定要引起自動的崩潰，那時，沒有誰能去繼承這個政權的，除了中共。（自然，他們還要容納一些開明的份子。）

根據毛澤東所寫的「論聯合政府」，他們是要和平地由聯合政府走到社會主義，我以為這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爲相互對立的階級仍然存在，即是說矛盾仍然存在，那麼改良主義是不符合客觀現實的。所以我想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以後，仍舊免不了鬥爭，這種鬥爭也許比現在還要劇烈，不知道對不對？

盼覆，并致 敬禮！

讀者 周永新啓

永新先生：

來信所提出的一些問題，的確是現在一般人所最關心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太過廣泛，恐怕不是我們這個小小的「信箱」所能充分解答的。但現在問題既已提了出來，就讓我們簡略地來答覆一下罷。

人們根據「經濟及財政危機的加劇，統治層的過分腐化，美援的遲遲到來，共軍佔領區的擴大……」便判定中共「得到政權……好像已經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甚至連時間也都算好，即「肯定在一年內能成立新政權」。但在我們看來，這種判斷未免過於天真，過於膚淺和片面了。因爲人們所看到的只是統治層所遭遇的危機與腐敗一方面，却不會注意到中共本身也包含有同樣致命的弱點。首先，

要取得政權，必須有一個真能代表工農及一般被壓迫民衆利益的政綱。但中共恰好沒有這樣的政綱。它有的只是「政協路線」，「聯合政府」以及「新民主主義」等。所有這些，不僅在理論上完全是機會主義的幻想（這是稍有馬克思主義的常識都能判斷的），而且在事實上也已爲無數的歷史經驗所排斥過了。例如以「聯合政府」來說，不久以前在法意就遭到了可恥的失敗。至於「聯合政府」及「政協路線」之在中國，其虛幻性，過去一年餘來的經驗更是暴露無餘。也許人們要說，中共雖沒有正確的政綱，雖然在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的，但它已是一個具有武裝勢力的黨，而且其武裝又是很龐大的，更有進者，它現時已佔據有廣大的農村，「尤其是他們最近在軍事上的一些勝利」，在現時統治層如此腐敗無能及遭逢如此困難的特殊情勢之下，中共可以取而代之。但我們却要請人們特別注意：「軍事只是政治的延續」。中共既在政治上犯了機會主義的死症，它在軍事上的冒險，也就不過是這種「死症」之「延續」表現而已。中共現時具有龐大的武裝勢力，並已佔據了廣大的農村，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它的真正弱點也正在這裏。因爲它所佔據的僅是「廣大的農村」，它的武裝勢力也只不过是依據在落後的農村經濟基礎之上。但在現代社會經濟的條件下，農村是依附於城市的，無論在經濟、政治、交通及軍事上，城市都是中心，都是以左右農村。所以誰佔有重要的城市，誰就是全國的主人。中共的基本政治路線，既已脫離城市無產階級而專在農村作軍事冒險，作游擊戰，希圖根據農村來奪取城市，那就必定它不能有任何真正的前途了。中共在江西時代的慘敗，便是一個最好的教訓。

才對，中共現時同江西時代有所不同，就是說現時已與蘇聯在地理上聯接起來，可以直接從蘇聯獲得某種物質上乃至軍事技術上的援助。但也正因為如此，美帝國主義爲了對抗蘇聯，爲了準備未來的反蘇戰爭，也就愈加要以全力支持中國的統治層，愈加要從經濟和軍事上支持它來打擊中共，藉以間接打擊蘇聯。在美國這種有力的支持之下，在中共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與軍事上的冒險主義這些致命的弱點之下，統治層雖然是腐敗無能，雖然不斷在種種危險的打擊下，但還是會拖下去的。就是說，統治層固然無法消滅中共的勢力，但中共要想奪取政權，統治中國，也絕對沒有可能。假如在國際上沒有一個勝利的革命來干涉美蘇的衝突，假如中國的人民大眾沒有形成一種有力的革命勢力來干涉國共的矛盾，那末中國便只能被拖到第三次大戰的深淵裏去。

你說，『關於政權的性質，……談論得最熱烈的，還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權，即是東歐式的聯合政權的政權』，其實，你所謂『熱烈』，也只限於中共及其外圍份子，而且他們所談及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的性質又是多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換句話說，是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完全違反馬克思主義的政權或國家學說的。至於你問『這種政權在東歐的好些國家中已經實現了，未知先生又有什麼理由來解釋它在中國不可能實現？』要解釋『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爲什麼在中國不能實現，首先便要明白它在東歐『實現』的主要原因。東歐自從希特勒的統治瓦解後，工農羣衆已經自動武裝起來，建立了自己的政權，企圖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但當時史大林爲要與當地的資產階級，尤其要與美英帝國主義謀取妥協，便極力壓抑革命的工農羣衆，強迫他們與資產階級『合作』，建立『聯合政府』，因而成了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換句話說，這種政權是在蘇聯紅軍壓抑工農革命要求之下成立起來，而又是在紅軍的刺刀保護之下存在和向『左』移動着的。從本質上說，這種政權是過渡性的，因而是最不穩定的。它們的最後的命運，不是由西歐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就是由美蘇的第三次大戰來決定。中國戰後的情形與戰後的東歐大不相同，主要就是沒有蘇聯紅軍的直接控制（雖然蘇聯紅軍在東北控制了一個時期，但它並沒有在那裏成立東歐式的『聯合政府』），因而也就沒有成立『東歐式的新民主主義政權』的可能了。

『農民的數量佔絕大多數』，這確是事實，正因此，農民是中國革命運動中一個巨大的力量，不可不決定的力量。因爲農民在經濟上是孤立的，分散的，在文化上是落後的，而它的各層份間的利益又是不一致的，因而它在政治上決不能起任何獨立的作用。它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能真正獲得解放。所謂『無產階級的力量太薄弱』，那一定是指它的數量而言，但在質量上，即在國家經濟和政治的比重上，那它是遠遠超過農民的，具有決定作用的。這一點，凡是稍具現代政治經濟知識的都能理解。至於『在今天』——甚至看不出『無產階級的力量來，那是因爲它還沒有行動起來。但假如你將『五卅運動』，『省港罷工』，『上海暴動』——那些故事回憶一下，你就絕不會輕視無產階級力量的太薄弱了。中共致命弱點的根源，正在它背離了無產階級而依靠在農民身上，成了一個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因而它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權』，雖在東歐，在蘇聯紅軍直接控制之下，可成爲『過渡性的政權』，在中國却沒有它的地位。中共的『政

綱』，是農民性的政綱，與俄國社會革命黨的政綱相類似，是最不『適合中國的國情的』，因此我們可預言：中共未來的命運，同俄國社會革命黨的命運一樣，將被放進同一歷史的檔案中。

至於說『……現統治者太腐化，最後一定引起自動的崩潰，那時，沒有誰能去繼承這個政權，除了中共』。這種觀點，不但太機械，而且是過於宿命論的。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下，任何一個『統治者』無論如何『腐化』，也是不會『自動崩潰』的，除非從資本主義懷裏生長出來的無產階級已經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去推翻它，把它送進墳墓。因此，『繼承』資產階級『政權』的天然是無產階級，而中共恰好是叛離了這個階級的，所以它幻想代表各階級的『聯合政府』的實現，但僅僅是幻想罷了。最後，你對於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的批評，我們大體是同意的。

編者 四月二十四日

更正

本刊上期因排印匆促，略有誤植處，今更正如下：

頁數	行數	誤	正
四(下)	十七	下無法紀之守	下無可法之守
(同上)	廿二	歷史上曾有過	歷史上未曾有過
九(上)	廿二	理論分析	理論分歧
十四(上)	廿一	他們保守主義	他們的保守主義
(同上)	廿三	他就和他折夥	他就和他拆夥

新聲月刊(原名青年與婦女)第三卷第二期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陳景先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理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一日出版

內政部登記證警電字第二二一七號

新聲



1937年7月1日 開封失陷所暴露的危機

本報筆時，傳聞開封已由失而復得了。但，這次軍事慘敗所引起的恐慌遠甚於洛陽失守之時，其中自有深刻的原因在。自共軍入豫以來，以隴海路為中心的中原戰場便永無寧日，他們的戰略目的，截至今日為止已可以判明：東向威脅東南，南下侵擾武漢都是附帶的作用，主要還是截斷東南與西北的聯繫，然後配合山西、陝北的戰爭，與新疆的自治勢力及北塔山的內蒙壓力遙相呼應，陷西安於孤立的袋形陣地中，準備於將來必要時作進取的企圖。當我們回憶美國駐華的將軍們（如魏德邁、陳納德之流）不斷指出西安為未來美國轟炸蘇聯之最切近的基地之一時，我們更不難瞭解共軍戰略的苦心孤詣。這一點也可以解釋何以開封失陷之翌日，西安突然召開緊急軍事會議，着重西北軍事形勢的討論。

但除了這種軍事上的嚴重趨勢之外，最值得我們注意的還是這一問題：廿四日何應欽在立法院檢討戰局時，已公開承認：「共軍勢力已高速膨脹」，其中原因何在？何以在短短的期間之內，中原戰局便突改舊觀？何氏並未解答。但在新聞記者洩露的「五六十」個立法委員面，最重要的還是暴露：政府軍方面雖然操縱着城市經濟的高度機械配備；（一）保守的惰性与遲鈍；（二）但整個軍事機構却反映了整個腐朽的官僚政制底一切缺點；（三）賞罰不平；（四）互相推諉，以及因循玩忽；（五）「軍風紀的敗壞」；（六）「士不用命」。參閱六月廿五日申報南京電）有些立法委員還「指責空軍忽視軍民的生命，轟炸混亂中之開封城垣。」這就是說，在一種腐敗的軍事機構中，有利的條件也產生不利的後果出來。

政府軍方面的危機還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主要的還是這種軍事危機與經濟和政治的危機過於密切連繫在一起了。這可以從物價底無管束的高漲與立法院所反映的痲痺性的衝動看出來。今後戰局愈趨殘酷和激烈，中國人民所遭受的通貨膨脹的榨取與政治的迫害則將與日俱增，在這種所謂「民族」工商界也以拒納「財產稅」的方式對現局提出抗議了，受犧牲最大的工農大眾也有理由立即團結起來，爭取起碼的生存權和民主權利，才能免於長期的災劫。（星）

論開封失陷所暴露的危機.....星

「行憲」與「開封」的危機.....芬

通貨膨脹威脅着人民的生存權了.....竹雲龍

美國扶日與中國人民應取的態度.....譚寬

最近學潮的現象與檢討.....曉淵

怎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劉乃光

現代的「疫病」在埃及.....康譯

史大林主義與世界革命運動之失敗.....紀芬

新的國際領導帶來新的希望（巴黎通訊）阿堵

中國民族資本有前途嗎？（信箱）.....余學勤

的質詢中，我們却大抵可以於政府官吏的焦急和悲憤之餘搜集一些現成的材料，加以科學的整理和歸納。這天戰事一方面暴露出軍底農民戰爭的機動性已發揮到最高點，這是其優點；但牠迅速退出已佔據的大城市，又證明牠仍不適宜於持久的陣地戰，這是其弱點；另一方面是重武器及海空軍的缺乏；（一）保守的惰性与遲鈍；（二）賞罰不平；（三）互相推諉，以及因循玩忽；（四）「軍風紀的敗壞」；（五）「士不用命」。參閱六月廿五日申報南京電）有些立法委員還「指責空軍忽視軍民的生命，轟炸混亂中之開封城垣。」這就是說，在一種腐敗的軍事機構中，有利的條件也產生不利的後果出來。

政府軍方面的危機還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主要的還是這種軍事危機與經濟和政治的危機過於密切連繫在一起了。這可以從物價底無管束的高漲與立法院所反映的痲痺性的衝動看出來。今後戰局愈趨殘酷和激烈，中國人民所遭受的通貨膨脹的榨取與政治的迫害則將與日俱增，在這種所謂「民族」工商界也以拒納「財產稅」的方式對現局提出抗議了，受犧牲最大的工農大眾也有理由立即團結起來，爭取起碼的生存權和民主權利，才能免於長期的災劫。（星）

「行憲」內閣的危機

陳 曦

難產

「難產」已成了「行憲」政府的特點，前些時候，爲了競選副總統，程孫李會有一個長時期的逐鹿，甚至有棄選的精彩演出。雖然大多數人民報以冷淡，但是其中似乎奧妙無窮，投機文人於是爭相寫其競選內幕，以迎合小市民「看熱鬧」的心理。

接着就是立法院長的提名，與民青立委名額的談判，每日都佔據了報紙的主要標題。但是人們比較感興趣的恐怕要算是行政院的人選了，因爲這是「行憲」後的第一任內閣。

「政協」談判前後離國的何將軍，也於此時回國來了，這並不是時間的巧合，據說是新的行政院長正「屬意」於他，一般的反應也似乎是不成問題的問題了。但是事實却出於常人意料之外。據大公報所記載：「在張羣，何應欽堅辭之下，當局費煞思量，至廿三日夜才決定提名翁文灝。被提名的翁氏，到廿四日晨方纔知道，立委中絕大多數人也是廿四日上午才曉得出了「冷門！」這樣，經過了三天困難的過程，新閣總算是姍姍來遲了。

「科學家」的翁內閣

這個半路裏殺出來的程咬金，究竟有什麼地方能够勝任「行憲」內閣呢？據官方的意見是「(一)清廉(二)學者(三)無系派(四)有國際聲望。」自然，值得我們玩味的還是第四點，所謂有國際聲望也者，不如說是美國官方對他的印象不錯。讓我們聽聽廿四日(五月)合衆社華盛頓的電訊吧：「此間官方及外交界，對蔣總統提名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長一事，反應極爲良好，外交界認爲翁氏具有工程與經濟的學識，日後與美方官員共同處理美國援華計劃必能勝任。」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清者」，而是軍人，如果不善於與美國接洽「援華」事宜，如果不是「清廉」的，如果不能較「有效」地運用美國物資，那麼，這個新內閣一定得不到山姆叔叔的支持，這也就是「當局費煞思量」的「秘密」所在。正因爲如此，也就更反映了中國的執政當局，其「改良」的道路，是如何狹窄了。

舊瓶裝舊酒

看看新閣的全部名單，對於那些職業的幻想家，不能不說是使他們太失望與悲哀。原來差不多所有的部會長官都是「熟面孔」；而這些熟面孔「行政」有年，留給他們的印象自然是太深刻了。此番「行憲」伊始，本該容納更多的「新進的與有野的」人材，然而照六月二日大公報的社評所說：「共廿五位長官，生面孔沒有幾張，而內政，外交，教育，司法，農林，工商，交通，社會，水利，衛生十部，概由舊任部長蟬聯。一般人所期待的『變』與『新』，或許沒有得到滿足吧。其他，這是以想像得到的。一個局面到了一種定型，一個性格到了一種程度，縱使要變，也變不了許多，滿心想新也新不了多少。尤其一個人，由成功到保守，就會厭倦開創，懶於革新。」

像大公報這種圓滑的說法，其目的雖在叫人勿存過高希望，而應以些微的「變」爲滿足；然而他也不能不說出一點真話來。一個政權建築在脆弱的物質基礎之上，一點點的改革，即刻就要傷害極貴極大的利益，就要引起統治層巨大的反應。這就是「行憲」內閣生面孔不多的根本原因。連一隻破舊的瓶子都捨不得丟掉，那麼，要把瓶子裏的酒換一換，自然更是夢想了。

多瑙河會議之意義

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二十一日電稱：關於多瑙河自由航行問題的十國會議，已規定於下月三十日在南斯拉夫首都貝爾格萊德開幕。這同一電報還透露關於召開這個會議的幕後消息：關於會址問題，蘇聯最初是反對以貝爾格萊德爲會址的，但旋即同意，並經由南斯拉夫政府正式聲明確定上述的會址。這種瑣屑之爭彷彿無關大局，但電訊中着重指出，也就含有暗示蘇聯方面一種和緩的表示。

這個消息夾在二十三日的國際新聞中，大都不甚爲人所重視，但假如我們回憶五月末蘇聯突然片面公佈美蘇秘密和平談判的掀然大波，我們就知道這個小消息含有多大的政治意義。許多淺薄的新聞記者雖然把莫斯科的片面行動解釋成爲單純爭取輿論的詭計，但克林姆宮除了這一「宣傳作用」之外，還有更深刻的苦衷，那就是他十分明瞭蘇聯底質的經濟基礎再也不能忍受美帝國主義底緊張的包圍和戰爭的威脅了，他比任何國家的統治者都需要和平的喘息機會。美國非常瞭解對方這一弱點，正因爲如此，馬歇爾在廿八日發表的演說中，曾十分樂觀的確信：「在依據美國標準以穩定世界局勢的方面，已有優越的進步。」這也就表示他相信「在對蘇聯的一冷戰」中，美國業已獲得勝利。」馬歇爾對克林姆宮嚴厲的表示，他不願意再和莫洛托夫在會中空中叫一場，他要求蘇聯至少要在一些實際問題上確實作一種讓步的表示，否則什麼和平的談判都不能喚起美國的興趣。跟着馬歇爾便提議首先討論久已擱置的多瑙河自由通航問題。路透社廿九日的電訊還指出，多瑙河會議之後，「必將繼之以解決美蘇間租借債務的『真正努力』」，此外還有「選擇特種自由區總督談判的恢復以及柏林盟管會之恢復活動等，預料在會後數月內美國必將逐一提出。」這同一電報還帶威脅的口吻的預測：「如果莫洛托夫對此等問題仍復置之不理」，「美國即當公佈美蘇外交的全部內幕情形，以昭示世人；蘇聯完全缺乏改進美蘇關係及世界大局的誠意。」(見五月三十一日大公報)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我們才應十分注意下月召集的多瑙河會議。他將成爲美蘇和平外交的初步測驗。根據最近克林姆宮對「和平」的焦急心情看來，大體上，他將在這一個問題上對白宮至少表示一種初步的讓步姿勢的。但白宮所滿足的不是表面的、次要的讓步，而是得寸進尺的進攻，這正是戰後所有「和平談判」之終於成爲喜劇收場的原因。(芬)

「行憲」內閣的難題

在經濟上民怨沸騰，軍事上半生不死的僵局底下，新閣所遭逢的難題，真是多如牛毛，難怪新閣首次出席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以後，即遭到一百餘立委的責難：

「現在東北朝不保夕，華北岌岌可危，長江流域至今未見有何建設，而全體民氣消沉，士無鬥志，請問新政府對此討論過沒有？對於軍事情勢有無新的方策或部署？政府將如何收復東北，保全華北？翁院長應有具體說明。現在老百姓生活困苦，活不下去，請問政府有什麼辦法使這些在飢餓死亡線上的老百姓不致挺而走險？經濟一天天走向崩潰之途，新政府成立後未見任何措施，我們反只看到物價的瘋狂上漲，這對新政府不但是諷刺，同時也是抗戰，政府對此是否已絲毫沒有辦法？」

「政府對於人民的人身保障，將以什麼辦法來達成？對於混亂與人民生計，有沒有辦法可以使其健全？今天的局面已經是總崩潰前夕的景象，請問這個戰事是否還可以拖到兩年？」（註：翁閣報告中有云「能在兩年以內結束軍事已是很好的了」）

今日「行憲」政府主要的危機還是在於財政收支的極度不平衡上。根據新任財政部長王雲五的報告，支出較收入的差額，竟達收入的五六倍之多。尤其是此後工業源源南遷，則稅源更形枯竭的情況下，巧婦不能炊無米，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繼續發行通貨。至於改革幣制，不管方案擬得如何美妙，在目前的風雨飄搖的局面之下，根本就是一句空話。於是問題又不能不着眼於「美援」上面了，悲哀是的四億六千萬，只聞樓梯響，不見美人來，實在令人等得心焦！而且聽說又有折扣的可能。

漲風迎內閣

新閣上任前後，公用事業首先領導漲價，繼起的米價，則如入無人之境，從六百餘萬，直衝破千萬大關，金鈔黑市差不多於數日間高昇一倍。本來，在物資缺乏，工業停頓與南遷，交通的破壞，通貨惡性膨脹的條件下，物

通貨膨脹威脅着人民的生存權了！

竹雲龍

在往年，五月六月是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的「淡月」，人們僅僅關注着七月漲風及一月漲風。可是，一九四八年的情形不同了，每月有一次或二次人漲風，五個多月以來，物價已上漲十倍多！批發物價指數已超出戰前一百多萬倍！從各種情況看來，中國的經濟總崩潰已發展至中期階段了。今後，通貨崩潰的末期現象——每天漲價數倍的混亂局勢，差不多是無可避免的必然後果了，成疑問的僅是「時間」而已。

價上漲已是一種必然的規律。但是在相對的條件下，新閣假如真是表示一種「新希望」，甫告登台，對於市場人心，應該有一番良好的反應，至少物價應該暫時穩定一個時期的。可是事實却正相反，物價是採取直線形上昇，而上漲的週期也越來越短了。這無異表現人民對所謂「行憲」內閣的一種無聲的不信任和抗議。

民主在那裏

在「混亂」的大原則底下，抽丁徵糧將繼續下去，通貨膨脹將繼續下去，物價狂漲將繼續下去，我們實在不相信，這就是大多數人民的要求。正因此，飢餓的民衆必然從無聲抗議走向有形的反抗，這一點，「行憲」內閣不但不願意了解人民不安的原因，恰恰相反，我們所看到的，只是「行憲」政府在登台之翌日，隨便加以叛亂的罪名而肆無忌憚地捕人和特種法庭的設立。這與民主相距何止千萬里！「神聖」的憲法，在「神聖」的名義底下被捧出來了，可是真正的民意却被无情的踐踏。我們不禁要喊出：「民主在那裏？」

往何處去

假如華爾街的代言人蒲立特對於當權政府的描寫，依舊適合於今日「行憲」政府的話，那麼在現成的條件之下，新的內閣也決不會有任何奇蹟出現。相反，「民主」的調子已經唱完，就只有更清楚地說明當局已走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對於「行憲」內閣，大多數人原就不會寄與過份的希望。只是他的無能却超過了一般人的思想之外。我們估計，今後不是一個物價的漲風把他送下台，便是為軍事的需要而更換一個新的內閣。但是以往的教訓對於我們是太鮮明了，越調就越糟，無休止的調換將帶來無休止的災難。除了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除了產生一個能够真正代表中國大多數工農利益的政府來代替牠之外，我們找不到更好的辦法來阻止一個大災難的到來！六月廿二

從六月一日上海等大都市實行「支票當日不抵用」以後，五千元關金就在街上「滿天飛」，「幾種版式的」大票，成捆成包的在搬運在收付，商人的支票不能當現鈔，於是法幣的需要突然增大。政府原意「限制游資的流通」的法令，反足以增高通貨膨脹的強度。當局趁支票不能當日抵用的關頭大發鈔票，滿以為不會引起什麼反響，結果適得其反，由此可見，現政府對於其無法解決的通貨膨脹問題，是如何地以拙笨的手法在敷衍。

至於報紙上所說的「抽緊銀根」，那更是欺人之談，是通貨膨脹時期的「神話」。自五月份以來，財政部公然發行月息二角四分左右的「短期庫券」，藉以避免游資泛濫，企圖抽緊銀根，結果，銀根非但不緊，反而加強人民輕視法幣的心理。

「拋售物資」嗎？大量黃金既已拋完，台灣的糖也得拿上漲的物資去換，中紡公司的紗布同樣是微小的籌碼，不足以收回大量紙幣。

「善用美援」嗎？那些「援助」都是叫中國民眾繼續流血的物資和美元。既不能復興中國的經濟，又不能阻止惡性通貨膨脹的趨勢。

「徵收財產稅」嗎？喧嚷了多年，非但不能實行，且連自由認繳的「特捐」，也被迫以「攤派」方式解決，待人們繳上「一億」「五億」「十億」的支票時，恐怕只能買幾担米了！那些代表有產者的立法委員，決難通過剝奪「神聖的」私有財產的法律，最大限度也只能通過「類似的」法律，其後果，總是「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並且，實際上，徵收財產稅也救不了目前中國的經濟死症，因為許多流動資金早就逃到外國和香港去了。

改革幣制「嗎？那總是通貨膨脹國家天天流傳着的美麗的預言。而且實行起來，又總是另一個通脹局面的開始，中國如果在今日的客觀情勢中實行「改制」，僅能縮小舊紙幣的票面額，決不能縮小中央銀行的發行額！

以一切局部的治標的甚或虛偽的手段，政府僅能盡一種打嗎啡針的作用，但火難絕難消滅。紙幣的發行數字，超出百萬億元以後，政府又將於最近提出幾百萬億元的驚人預算了，而下半年的實際支出，恐還在一千萬億以上呢！紙幣泛濫的時代，資產階級雖然也受到損失，但最後的最深刻的受難者，還是農民，工人，公務員，以及一切倚賴固定收入維持生活的下層民眾。有產者可以將通貨膨脹的損害轉嫁於工農身上，而出賣勞力及智力的人們，就只得有限的收入，去對付永無休止的漲風！千百萬人已餓死了，自殺了，還有千百萬人在挨餓，在準備自殺！紙幣的洶浪，已吞沒了許多民眾的生命，且還繼續在淹沒許多人的頭顱。無數小的悲劇，在跟着國內戰爭的大悲劇發生，且越來越令人心寒，令人憤慨！

難道這悲慘的場面永遠不能終止了嗎？當然不會的。可是，至少，現政府無法終止這場悲劇。「戡亂」既無「法定」年限，而農民羣早已在十年的戰爭中破了產，既沒有對城市工業的購買力，又沒有資金投入土地增加農產品，美國「救濟米」之進口，正是中國農業宣告死刑的記號。以有限的鎊砲，配合自農村抽去的壯丁，現政府想平定一切大「亂」，但事實所給的回答，並非政府所企求的。

中國目前的農業既已大部份破產，工業也因為國內市場的縮小及外匯統制等關係，陷入半停頓及部份倒閉狀況中。南遷工業本來企圖覓取南洋市場，但日本貨及英美貨的傾銷和競爭，遠非落後的中國工業所能對付的，香港日貨向粵漢路走私，業已開始，這說明了南遷工業的並無光明的前途。在如

此窮困混亂的經濟基礎上，寄生着一個龐大的官僚制度，它已將全國的經濟權操縱在手，與農民作廣大的戰爭。日復一日，以致經濟危機日益嚴重，目前已呈不可收拾的情況了。農民的「作亂」起源於經濟危機，如今政府不解決土地問題以及其他最主要的經濟問題，反而以武力求「平安」，只是緣木求魚而已！

在鄉村方面，紙幣早已失去了貨幣的流通機能，農民六七年來習慣以「米」為價格尺度，紙幣在農村既不能大量流通，因而，紙幣濺發後最先受影響的是城市。

物價指數漲至八十萬倍的時候，政府編出的「生活指數」只有三十多萬倍，這正是一個無比殘酷的對照。如此低下的「生活指數」，與如此高昂的物價，兩相比較，正說明都市中工人，公務員，教員，職員等人的生活水準已低降到什麼程度了！

官編的「生活指數」是不合理的，非科學的，有意歪曲事實的！「薪水階級」早就不斷提出抗議和不信任的表示，但資本家仍舊按照那不正確的數字付給工資，甚至有更狠心的老闆還要打折扣。物價水準與「生活指數」每月按幾何級數脫節，已使「薪水階級」奄奄一息了！這是一個直接威脅民眾生活的嚴重問題。

坐汽車住洋房天天宴會的先生們，無論如何比不上「薪水階級」自己更明白自己的「生活指數」，生活指數應該由工人，職員，教員，公務員們自己成立物價委員會來編製。那些冒牌「專家」和故意不知民情的官員們，他們是爲了節省有錢人的利潤而編製工人職員「生活指數」的。事實早已證明官編指數的不合理不真實，可是這個不合理的「指數」繼續逐月把平民的收支巧妙減少一部份，工人職員已普遍地比戰前貧困了。生活指數與物價指數相差一倍以上，這是太欺人的「科學」算法。如果「薪水階級」再不設法自編指數，就要活不下去了！

工資必須按物價的上升倍數增加。不能讓虛偽的「生活指數」來掠奪「薪水階級」的極菲薄的收入！

同時，目前物價一個星期變個樣子，事實上以每日的物價平均數作爲某一個月的指數，根本是荒謬的編法，難道工人於七月份拿到六月份工資之後，於七月一日能購買六月一日的廉價米嗎？因此，在通貨瘋狂膨脹中，「薪水階級」必須至少每星期支付工資，否則吃虧太大。而今後生活指數編製的期限，則應按照物價上漲的節奏而縮短。

一九四八年，紙幣泛濫的洶浪一次又一次地打擊民眾，民眾則不斷地掙扎，反抗。有組織的工人和職員以集體的行動表示他們的要求，無組織的小市民就到處發生擾亂和騷動。各地的搶米風潮已經開始了，緊跟着，又將是怠工罷工等抗議性的「糾紛」，這起碼證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的危機的主要特徵：脫韁野馬般的通貨膨脹已接近一九二三年前夜的德國狀況了，中國當局已完全對這一災難束手無策，宛如一個人乘着電梯閉着眼睛一直往下降一樣。歷史上久已證明：一種政治制度連人民的生存權都無法保障，牠無異自行宣告牠已失去存在的價值了。

美國扶植日本與中國人民應取的态度

韻 寬

自美陸軍部長特萊勃調查團所撰扶植日本的計劃宣佈之後，頓時喚起了中國一般人民的注意，在某些人的心理上，甚至引起了恐懼和不安。圍繞於這一問題的輿論，抗議的聲音，已經自各方面尖銳地叫喊出來；從一般的報章雜誌的論文，座談會上的言詞，立法院會議席上的提議，大學教授的呼籲，乃至學生發出的標語口號，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這一問題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對這一含有現實意義的問題，來作一客觀的分析和估計，不用說，是非常必要的了。

(一) 美國對日政策之轉變

美國扶植日本，不管人們如何的曲解或辯護，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這從特萊勃調查的報告明白地表露了出來。在經濟方面，如減少賠償數字，提高工業水準，恢復中日貿易；尤其保留鋼鐵年產量，紡錠數額，商船噸數，化學原料年產量及水電等數字之鉅，更是明顯的例證。在軍事方面，海陸空各方面，都在積極地擴充和準備。關於海軍方面，日本大軍港橫須賀，佐世保與吳港，不但至今並未拆除，且將加以擴充，麥克阿瑟並曾將指定賠償盟國的驅逐潛水等艦二十八艘交給日警。嗣又允許日本成立海上保安廳，暫撥監察艦三十八艘，以後再擴充至一二五艘，武裝警察八千名，隨即擴充至一萬名。關於陸軍方面，如允許從前日本軍事幹部以警察名義繼續保留。警察人數先擴大爲十二萬五千人，繼又增爲三十萬人。關於空軍方面，除將原有飛機廠、防空設備與地下工廠多予保留外，並在青森建築九千五百呎長跑道的飛機場，又將大批日本神風隊飛行員送往美國訓練。這些鐵證，都足以表明美國扶植日本已成爲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但我們必須追究，美國爲什麼要扶日？要正確地解答這一問題，首先必須了解美國戰後對整個世界政策之轉變過程。對日政策乃是整個政策之一環，因此這一政策也是隨着整個世界政策之轉變而轉變的。美國戰後對世界的政策，不斷地在轉變過程中。在戰後初期，它於領導二次大戰摧毀了軸心國之後，便企圖控制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壓制蘇聯。它最初是以和平的政策，如在波茨坦宣言，雅爾達協定中，對蘇聯採取和平的方式，企圖使其屈服；而克羅姆爾方面，最初的態度，也是希冀在和平的氣氛底下，發展和擴充其勢力範圍。但由於蘇聯勢力之不斷擴張，使稱霸資本主義世界的王國不能忍受，它以爲蘇維埃國家的存在與發展，對於資本主義的統治，將是一個巨大

的障礙。因此，它本能地而且必然地認爲：蘇維埃國家的摧毀，一方面可以消除社會主義革命的威脅，而另一方面，可以擴大資本主義的市場，使其毫無障礙地統治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命脈。華爾街全部的外交和國內政策，都是有計劃地圍繞着這個目標而進行的。這從兩年餘來的一切外交會議中明顯地表達出來。而在蘇聯方面，雖然它背叛了十月革命的傳統，放棄了世界革命，但由於它的特權官僚階級基礎，還是建立於社會主義體制之上，這個官僚階級爲了自保的本能所驅使，亦不輕易屈服於美帝的狡猾政策之下。因此，華爾街的政策，便急劇地轉變，從和平的外交政策，轉變爲強硬的姿態了。於是一切政策的決定，便完全不經過外交會議而獨斷獨行，最後則企圖準備以三次大戰來毀滅它。

華爾街的統治者，在這一確定的目標之下，除了在本國積極施行徵兵制，制定普遍軍訓法外，必須以美元和物資來挽救整個瀕於飢餓狀態的舊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以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爲中心，建立西德工業勢力圈，更進一步建立歐洲的軍事同盟；在南美，則加緊鞏固泛美集團；在遠東，戰後初期的政策，本擬以中國爲中心的，但由於中國的統治機構之過分腐化與無能，於是轉變方向，便以日本爲中心，企圖建立遠東反蘇的基地。因爲日本的工業基礎較中國進步，恢復起來自然比較容易，華爾街的統治者便想利用這一基礎來發展日本的工業，恢復日本的經濟基礎，以便進一步發展軍事工業以擴充軍備，作爲三次大戰反蘇的據點。因此，它對日本的資產階級，不能不相當的讓步。而日本的資產階級，亦想利用美國的幫助，以便恢復它的經濟基礎，重新拾起頭來，成爲遠東強大的帝國。二者都是從同一帝國主義的立場出發，雖然其地位不同，但其目標則是一致的。

(二) 扶日在中國所引起的反響及其後果

當美國扶植日本的事實暴露出來以後，中國朝野各黨派及一般的民衆，都以其各自利益的不同，而發生各種不同論調和心理狀態。在當權政黨方面，因其自身利益和與美國的血緣關係，對此自然發生一種矛盾的心理，一方面出於忌妒，埋怨美國大量的援助日本，而不慷慨的援助中國；可是同時，又因爲扶日的目的是防共反蘇，站在自身階級利益的立場上，又不得不爲扶日的事實作種種曲解和辯護；而另一方面，圍繞於中共思想圈和政策之下的人們，也正因爲扶日是防共反蘇，則極力利用中國民衆對於過去日本帝國主

義的仇恨和畏懼心理，把中國民衆引導到狹隘的愛國主義道路上去，企圖藉此激成一種反美運動，極力避免，甚至故意抹殺其中所包含的反蘇的因素。前者自然沒有批駁的價值，凡是稍有常識的人，都可以明白那是統治階層利益的偏見；後者也是從主觀出發，有其自身的弱點的。因爲克林姆宮一方面主觀上害怕三次世界大戰，尤其害怕美國助長日本的復興，另一方面却又不敢在中國民衆面前把美國扶日所包含的這一主步因素（反蘇）明白的指出來，這種掩飾飾的態度是毫無用處的，不但不能避免危險，而且只有把危險的因素更加蔓延和發展而已。

至於一般的中國民衆，過去的痛苦經驗尙十分鮮明，對扶日所發生的後果，自然都感到不寒而慄。他們對於日本與遠東其他國家貿易的恢復，也懷着巨大的恐懼心理。合衆社的記者專爲此遍訪南京各階層居民，綜合了如下幾點：（一）大部分商人都害怕日本在經濟上的侵略性競爭，認爲中國倘使再受日本廉價冒充西洋貨的競爭威脅，必然將受害不淺。（二）一般反共的中國人以爲一個強大而反共的日本，在戰略上對美國將有很大的好處。（三）一般人深信，日本一心一意要報復，必將重新企圖稱霸太平洋。（合衆社南京廿日電）。這幾點意見，也足以代表一部分中國人的反響。尤其是敏感的（對這一切身問題特有的敏感）工商業者及中小資產階級，他們因其切身的利害關係，對扶日自然發生強烈的反感和恐懼。這從上面所引合衆社記者的訪問及同日報載香港工商團體所組織之反對扶日復興大會的宣言中，都充分地反映出來。

當然，我們絕對不能否認或輕視，以日本現有的工業基礎，在美國強有力的扶助之下，它的工業一定會很迅速地生長起來，則它的價廉物美的商品，勢必像潮水一般地流到中國來。這對於中國的民族工業，將是一個致命的打擊，是無容置疑的。因此，他們之反對扶日，是有其客觀的原因和具有某種進步意義的。但如果僅僅只限於此，是不够徹底的。因爲美貨在中國的傾銷，已經充塞了全國大都市，甚至農村，中國的民族工業，要想獲得喘息和發展的機會，首先必須從現時半殖民地狀態中掙脫出來，脫離一切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帝國主義的羈絆。廢除一切舊的乃至任何新的不平等條約，不但香港，九龍和澳門必須收回，即美帝國主義者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及其軍事顧問，亦必須撤退。關稅絕對自主，撤退掌握海關的「客卿」。變相不平等的「中美商約」及其他與美國簽訂的一切秘密條約必須廢除。但同時，根據雅爾達秘密協定的「中蘇條約」，也必須予以廢除，因爲「中蘇協定」，不但違背了十月革命的傳統，而且在客觀上正好有利於帝國主義繼續侵略中國，給予它一個最有力的藉口。因此，我們必須把反扶日運動與民族解放的鬥爭緊密地聯繫起來，爭取民族的獨立與自由，讓人民來主宰自己的命運。只有如此，中國才能阻止帝國主義商品的侵入，才能踏上真正復興的大道。此外，還有一種人（前面所引之第三點），他們深信日本在美國的扶植

之下，必將迅速地生長起來，稱霸太平洋重新侵略中國，這差不多成爲最普遍的恐懼心理。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忍受了八年日帝踐踏和蹂躪的中國民衆，對於日本勢力的再起，自然感到巨大的恐怖與威脅。因爲美國所扶植的乃是日本的反動勢力，這種反動勢力的增長，不但威脅中國的民衆，同時也威脅到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因爲這種反動勢力的抬頭，勢必壓制日本的革命運動。如果日本的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不能及時起來，掀起一個狂風暴雨的革命高潮，走向社會主義的革命，則反動的帝國主義勢力一定抬起頭來，推動三次大戰迅速爆發，成爲遠東反蘇戰爭的主要堡壘，那首當其衝的犧牲者自然是中國。不但東北華北成爲美蘇角逐的戰場，即整個的中國也勢必牽入戰爭的漩渦，這對於中國的威脅，實在太可怕了！而且這種可能性，比人們所懼怕的日本復興後侵略中國的可怕還要厲害。因爲日本現時的復興，還是在美帝控制之下，在三次大戰尙未爆發之前，它還不可能談到掙斷美國的束縛，重新向中國進攻。除非經過一次戰爭之後，或在戰爭期間美國無法控制它的時候，才有這種可能。然而這種可能還是較遠的事，最可怕的還是三次大戰的威脅！

（三）我們反對扶日的基本態度

扶日既然是戰後華爾街整個帝國主義政策之一環；那麼，我們必須把反扶日運動擴大爲反帝國主義，反對第三次大戰的運動，與整個摧毀資本主義制度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聯繫起來。只有如此，才能根本防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再起，才能免於三次大戰的浩劫。

總之，扶日政策對世界以及中國所發生的影響既然如此巨大，我們無論站在保障世界和平及民族解放的立場上，都應堅決地反對。我們之反對「扶日」，只是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的反動勢力和壓制日本的革命運動，我們決不能站在狹義的民族主義的觀點上來排斥整個日本民族。狹義的民族主義，不但不能避免災禍之到來，而且還助長民族間的仇恨，一方面易爲日本反動勢力利用來培養自國的極端愛國主義潮流；另一方面也容易爲中國朝野的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黨派所利用，作爲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之工具。我們絕不能以勝利國地位自居，而要站在與日本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同樣命運的立場上，不但消極的反對賠償，還應積極地主張美軍退出日本的國土，讓日本的民衆，抬起頭來，興起一個革命的狂潮，澈底掃除天皇制度。只有讓日本的工農及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民衆，主宰自己的命運，才能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復興，中國才無後顧之憂。

最近學潮的回顧與檢討

曉 瀾

上海的反扶日運動是自五月初，尤其是在各校紀念「五四」的時候，才由醞釀的階段走向表面化。在交大舉行的營火會之夜才有人發起「反美扶日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的組織。但是這初升的熱浪又逐漸迴旋而下，直到六月初，由於各大學學生發起民族展覽會，張貼反美扶日的諷刺漫畫，而發生了許多糾紛，如撕毀漫畫，校方的干與，甚至引起吳市長的注視，將中法的漫畫陳列市政府，並質詢漫畫之由來，儼然欲以侮辱國家元首的罪名加以懲處，際此情形，事態更趨嚴重，在約大竟形成校方與學生會對立的情勢，終至在六月五日突然爆發為罷課遊行的姿態，但這次遊行不幸由於當局的高度壓力而未能奏功。例如在交大，警察、憲兵、機關部隊的重重圍困，使校內同學無法衝破銅鐵織成的密網，與聚集在外灘的其他各校隊伍會合，同時在外灘會集的四千餘學生也在憲警監視下陸續解散隊伍。在這當兒，更有數十位在遊行隊伍中較活躍的學生遭到無理逮捕，甚至有一個被捕中學生跳江自殺的慘劇發生。在遊行消息洩漏之後，特務打手便開始在數校內行使他們的職務，企圖以恐怖手段來威嚇準備參加遊行的學生。終於以武裝包圍，暴力脅迫，以及逮捕綁架的強硬手段，才勉強地將這並不很大規模，而且是局部性的學生「愛國」運動抑制了下去。

正當上海反扶日運動走向具體化的時候，北平各大學學生也早已有所表示，如在「五卅」紀念日，北大舉行「反對美國扶植日本，紀念五卅大會」上便宣佈成立「華北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搶救民族危機聯合會」（見大公報五月卅一日消息），但當時的學生還僅限於消極地以發表宣言抗議美國對日政策而已，並未有欲以其體行動表示的意向，因此「反扶日運動」在當初也未曾獲得社會上、「尤其是」下層羣衆的普遍響應與支持，及至司徒雷登以大使之身分發表聲明，站在帝國主義當事人的立場，為美帝之扶日政策強加辯護，因此煽起了北平各大學學生的憤激，而決議以罷課遊行的愛國舉動來對抗。這次的遊行，因為是突擊式的，當局不能預先準備大規模地加以武裝包圍及封鎖，在倉皇間，便以警察來彈壓，一方面開槍射擊，同時由特務份子躲在後面，以石塊木棍投擲遊行隊伍，受傷的學生也頗有其數。但在慷慨高歌的情緒激流中，遊行隊伍終於未受到巨大損傷，完整地突擊重圍，集聚到北大民主廣場上舉行大會。

這一次上海、北平及其他各地的學潮中又一次地暴露了當局對於學生的敵視和憎恨態度，在反方面更證明它對於學生力量的畏懼，竟不惜動員機關部隊、憲警、特務，如臨大敵地施行逮捕、槍擊、綁架等殘忍手段，並對在

獄的學生加以無理的酷刑。這種措置，尤其是施之於「還政於民」的新政府成立的翌日，「行憲」之初始，真不啻為一幅最刻毒的諷刺畫。「行憲」後的中華國民連人身自由都毫無保障，又何談「民主」與「人權」！何況這次的反扶日運動也並未超越狹義的愛國主義的範疇，而且也僅局限於學生知識份子的極小圈子，沒有廣泛地深入社會的基層。執政當局連這起碼的甚且薄弱的可憐的愛國運動都不能容忍，却進而加以無情的摧殘，這不但在「行憲」的假面具上塗上了一筆可恥的墨灰，也同時在一般人民的心裏投下一層更厚重的暗影，使他們不禁為這個「行憲」政府治下的來日擔憂和寒慄。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得回顧一下這次反扶日運動在學運過程中的意義與教訓。正像執政當局在這次事變中變本加厲地暴露其殘酷野蠻，學生在這次學潮中也比往昔任何一次運動中所顯示的弱點來得更多。這就是導致這次學潮失敗的基因，也將是未來學生運動開展的障礙和危機。為了學生運動的前途，使它能夠成為全國人民大眾底民主運動的酵母，澈底完成民主任務，走向真正解放，我們不得不反省，不得不正視事實，指出這次運動本身所包藏的弱點，領受犧牲所換得的教訓。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學潮的產生是有其客觀的必然性的。在政治局面愈走向惡化，社會更趨動盪，經濟之總崩潰也愈無法避免。在多方面的刺激下，敏感的學生羣往往成為反映社會不安的鏡子。因此，在客觀現狀的驅迫下，再配合主觀上學生力量的成熟與膨脹，而必致於成為洶湧的澎湃的巨浪。這樣產生的學潮，由於其邏輯上發展的必然性，往往是富有進步意義，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也因其有堅強的羣衆基礎，而不易為強力所征服，甚至至是粉碎不了的。例如在戰爭剛結束後由昆明開始的數次學運，都是在民主浪花蓬勃向上的時期，因此不但未曾受到深重打擊，而且對於中國的民主運動也頗盡了推進的作用。

可是在目前，由於國內戰爭的日趨險惡，統治層為了在它的領域內鞏固其殘破的基礎，便不擇任何手段以壓制羣衆運動，在必要時甚至也顧不到民主假面具了。在這樣的局面下，往日學運的蓬勃氣象已消沉萎縮在逐日的退潮裏。客觀情勢固然使在短期內大規模學潮之產生成為不可能，同時學生羣本身，經過歷次劇烈打擊後，也需要一個理智清洗、養精蓄銳的時期，以彌補前時的創傷，因此他們的心理上也未自覺地感到迫切行動的絕對必要。由於客觀與主觀條件的不成熟，再加以這次反扶日運動過程中，在某些學校內組織與發動學潮的學生會或其他負責機構，由於其產生之未曾經

過真正民主普選的手續，因此在運動初起時便與羣衆脫節，走上我行我素的道路，僅依照某種政治路線而行動，結果只有少數學生參加運動，而多數羣衆則站在圈外冷眼旁觀。這也是這次反扶日運動之不能推廣與深入的基本原因之一。

其次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次學生的反扶日運動的另一大弱點，即是由於學生內部的缺乏民主，使運動的領導落入少數份子的把持操縱。這些份子爲了要配合農民武裝鬥爭，便全不顧慮到客觀條件之成熟與否，也不估計到真實的羣衆基礎如何，勉強地將學運轉屬於農村鬥爭，其後果便是給予統治階層以良好的時機，加以狠命摧毀，使從多次打擊下餘存的一點力量，再一次遭受大大的破壞。這次的學潮本身雖是進步的，但在某些上層領導方面，却多少反映了史大林黨在中國盲動作風，是爲了適合其策略上的要求，一貫地將城市運動附屬於農村暴動的又一明證。它忽視了城市運動與農村鬥爭發展的不平衡性，終於一次再次地將方在萌芽時期的學生運動以及工人運動（如上次法商電車工潮等）決不顧惜地加以冒險主義的葬送，造成毫無收穫的慘重犧牲。既然統治階層對於這種脆弱的羣衆運動之肆意壓迫是必然的，則這種錯誤的盲動路線在客觀上反而給予當局以藉口，加強其恐怖統治，延長其垂死的壽命。在另一方面，由於在學潮初起時所浮升的一批投機份子，很快地在反動壓力下頹廢下去，便同樣地鏗了一聲青年學生知識份子戰鬥的銳氣，加深了卜層羣衆，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失望與消沉。這樣在倉促間製造成的，不成熟的學生運動或工人運動，無形中便爲病入膏肓的統治階層打了一劑強心針。

怎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

劉乃光

(一) 複雜錯綜的因素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勒斯坦的阿猶紛爭問題即日趨複雜和尖銳化；這種紛爭在英軍剛開始撤出巴勒斯坦的今天，甚至已演成了公開流血的大戰！直接造成這種紛爭和血戰的，乃是猶太人之移入巴勒斯坦，要在這塊聖地上面建立一個新的猶太國家——以色列國。因爲他們兩千年前被逐出耶路撒冷之後，便到處流浪，到處遭到排擠、迫害甚至屠殺；今天在美國內的復國主義者底強有力支持之下，他們就挾着自己的武裝力量——哈格那軍、伊爾根和史德恩軍，向巴勒斯坦尋求復國美夢的實現了。

但猶太人的美夢天然是要遭遇當地及周圍的阿拉伯民族底反對的。因爲中東和近東的阿拉伯各國，多年來（尤其是在這次大戰當中）已逐漸發展了自已的工業，從而形成了一種不可侮的力量，民族獨立運動正在日益昂揚，迫

這次的反扶日運動，若站在民族解放立場上，是具有相當進步意義的，但是不幸這運動祇是限於學生知識份子的狹小圈子，未能得到城市下層羣衆的有力支援，而陷於孤立狀態，更由於一種錯誤的領導，他們未曾估計到客觀形勢是處於一個反動的退潮，更不以民主的方式來集合學生羣衆，使他們自動地參加運動，更因爲他們機械地服從一個不正確的政策，結果非但不能掀起一個泛濫的巨潮，却在狼狽的情形下潰散了。

由於對這次學潮的反省和回顧，我們再一次獲得一個嚴重的教訓，即是：學生運動必須是出自一般學生羣衆自發性的要求，然後根據客觀形勢成熟的程度與經過充分的準備而行動，同時這個學生運動的領導必須是在學運的過程中，經由普遍的贊同和選舉而產生的，尤其是一個較大規模的領導機構，如像學聯的組織，決不應是暗中指定或派遺的空頭機關，在幕後把持操縱，而必須是通過主要大中學校內部的民主普選再經推舉而產生的合法代表的全權機構。因此，站在前進學生的崗位上，在可能範圍內，我們不但應參與有意義的學生運動，並且應在運動過程中，積極地監督學生組織及領導機構的內部民主，儘量提供具體意見，反對和揭露操縱把持以及其他陰謀扼殺言論的手段，使學生運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因此，今後的學生運動，如果要想獲得預期的效果，必須脫離現時這種欺騙性的改良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領導，並且更進一步，在政治上必須在一個真正代表工農及一切被壓迫被剝削民衆利益的新政黨的正確領導下，配合城市無產階級運動的動力，才能成爲真正解放人羣鬥爭的主流。

使帝國主義的軍隊不得不撤退，（如法軍之撤出敘利亞、黎巴嫩，英軍之撤出埃及等。）他們既然要解除一切外來的舊束縛，自然更不能容忍猶太族的插足進來。所以後者強行移入並建立以色列國，必然招致阿拉伯民族底堅強反抗，這是很顯然的。

何況這還不只是阿猶兩族的問題哩，牠同時也是英美蘇三強爭奪這塊戰略性的重要原料地問題。因爲巴勒斯坦位於地中海之東、蘇彝士運河之北，不但是軍事上的戰略要地，而且由於牠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油源之一，更加成了列強間角逐的焦點。

一方面，大英帝國在戰後雖然是大大削弱了，但正因她的軍隊已被迫撤出埃及，她就更加需要抓緊巴勒斯坦這條生命線，以便保衛她在地中海和蘇彝士運河的權益、保衛她通向印度河的要道。爲了保持這一中東權益，她過去曾經支持猶太復國運動去反對阿拉伯民族。但當阿拉伯的民族運動怒潮

已無法壓抑時，她便轉而對其上層領袖妥協，把他們對自己的積憤引向猶太人，利用他們來打擊猶太人，以便獲得他們的好感，確保自己在中東的地位。為此目的，她不惜武裝及訓練外約但軍隊，並每年資助二百萬英鎊給他們。今天她雖然在外表上把軍隊撤出，以免被自己玩弄成的火災灼燒雙手；但實際上，她仍然派有軍官在阿軍中指揮作戰。她在中東的權益仍然毫未放棄，反之，據今年五月『聯合國世界』發表的法拉戈氏的文章所暴露，英國却曾經與阿聯簽訂密約，允許阿聯瓜分巴勒斯坦，英國則在海岸獲得基地，以保護英國在中東的利益。這雖是未證實的傳說，但却不是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美國代替英國而變成猶太人的保姆，極力支持後者的復國運動，其目的無非是為了插足於中東，奪取英國的地位，造成她自己的『石油帝國』。她最初贊成分治，後來提議託管，現在則急不及待地承認以色列國，更給予一億美元的貸款，甚至『擬供給所需之戰具』，同時又以削減援英貸款來壓迫英國改變助阿態度，——這一切的策略行動都是為了同一的目的：代替英國以獨占中東的油田。

至於蘇聯則着宣布承認以色列國，這顯然也和美國具有同樣的動機；所不同的，她的承認完全不附何種外交的或其他的條件，比美國所承認的範圍更廣，這只是證明她之企圖插足中東更為急燥吧了。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英美蘇之企圖獨霸中東權益，不惜各自支持某一方來反對另一方，極盡挑撥的能事，這乃是阿猶衝突日趨複雜和尖銳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蘇聯致以色列國的覆文『聲明蘇聯政府希望猶太人民獨立國的設立，有裨於巴勒斯坦與近東的和平及安全』，這不但完全是一句謊言，而且她的承認在客觀上就是直接助長猶太人的幻想，擴大阿猶雙方的屠殺的。

(二) 猶太復國主義的剖析

我們指出美蘇所助長了的猶太人幻想，就是牠的耶山主義（復國主義）。這種主義之充滿幻想性，在於：

第一、牠的最高目標是希望在巴勒斯坦『閉關自守』的經濟內，可以『和諧地』發展其生產力。這其實是完全無法實現的，因為今天全世界的經濟早已緊緊聯結成一個單位，而這一經濟又早已普遍地衰敗不堪，這一經濟的巨大震動又正在日益加劇，任何國家的經濟都將受到影響，都不能獨立地發展其生產力了。猶太人這種空想，無非要叫逝去的昨天回來吧了。

第二、牠認為猶太國家可以在五千萬阿拉伯人的公開敵對中建立起來。這就無異要在飛砂烈日的大沙漠中開掘一井，使之長期供商隊解渴而不乾涸，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事實已在證明：英軍剛開始撤出巴勒斯坦，以色列國即倉猝宣布成立；但與阿拉伯聯軍一交鋒，便屢居下風，不數日便三面受敵，形勢危殆；而且自己內部的哈格那軍和伊爾根黨也發生衝突和分裂。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這個新國家不致馬上夭折，但牠終究處於優勢的阿拉伯民族底威脅襲擊下，過着風雨飄搖的苦日子，到頭來仍多份要覆滅，這是不

難預言的。

第三、牠希望利用列強間的矛盾，依賴某一強國來達到上面的目的。但在弱肉強食的今天，只有強者才能利用弱者，而羔羊則是無法利用老虎的。一切強國都無例外地只把猶太人的復國運動單純當做一注籌碼，利用牠來統治阿拉伯世界。過去英國雖曾發表過貝爾福宣言，宣稱要幫助猶太人重建新國；但很快就轉而與阿聯上層領袖勾結，把猶太人淪為孤苦無告的流浪兒了。這充分證明帝國主義是最不可靠的，反覆無常的，一貫以犧牲弱國來保護其自身利益的。信賴牠便等於與虎謀皮，結果反而落入陷阱。今天美蘇之擺出『友好』姿態，也只是一種插話性的外交策略，充其量也只能支持以色列國以使之變成自己的外交工具，變成有名義無實權的傀儡國家。因此，不管那一個可能實現：是在阿拉伯民族打擊下中途夭折，抑或變成『國的傀儡而名存實亡，但都不是獨立國家的前途，歷史老太婆將再度證明猶太人信賴帝國主義的結果是最可悲的。

第四、牠以為單獨讓猶太人建立一個國家，便可以消解全世界的反猶主義。然而這種反猶主義是有牠深厚的社會、歷史和思想的根源的。當資本主義延長其臨死掙扎的時候，這種根源將更難於斬除。反之，經濟局面愈是殘敗，羣衆對現實生活愈是不滿和痛恨，則反動的統治階級愈需要把罪責轉嫁給猶太人，讓民衆的憤怒發洩在猶太人身上，因為他們在各國的僑民，常常是小高利貸者和小商人，較容易被當地的中小資產階級誤認作經濟上的競爭者或剝削者。當種族的敵視和迫害已成了沒落資本主義世界重要病徵之一的时候，猶太的復國主義者却相信用一種不費吹灰之力便可把它消除掉，這不像是像要伸手移動月亮一樣愚蠢可笑嗎？

猶太復國主義不但充滿上述的幻想，而且還具有如下的反動性質：

『第一、牠給予帝國主義以阿猶間『仲裁人』的行動口實，牠要求英國繼續統治聖地，讓牠發展一個『閉關自守』的小規模的猶太經濟，在此經濟領域內勞動的羣衆，具有比阿拉伯的勞動羣衆更無限高的生活標準和不同的現實利益；——牠以這一切來支持帝國主義的統治。』

『第二、牠在阿拉伯羣衆方面產生一種民族主義的反響，引起工人運動的種族分化，加強阿猶雙方各自的『神聖同盟』，因而使帝國主義可能繼續在巴勒斯坦保持其軍隊，延長這種衝突。』

『第三、牠購買阿拉伯大地主的土地，並藉外國的資助，在阿族的巴勒斯坦農業內部，當作一種『閉關自守』的猶太農業來耕種這些土地。在這一計劃中，大地主的地位是恢復了，土地從阿拉伯農民手中拿走了，同時最重要的，巴勒斯坦的猶太羣衆在阿拉伯羣衆分配王公土地的鬥爭中是沒有利益的，因為這樣就表示他們不再能購買土地了。』

『第四、在其他國家猶太勞動羣衆參加階級鬥爭方面，牠起了制動機的作用，把他們從世界無產階級當中分裂開來，給予他們以獨特的目標，去爭

史大林主義與世界革命運動之失敗

紀芬

(這是紀芬先生論史大林主義的第二篇文章——編者)

十九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是資本主義由盛極而衰的時期，亦即是以獨占資本為基礎的帝國主義抬頭的時期，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是：經濟的週期的危機已失去了正常的調節作用，由合乎常規的節奏（大抵十年一次）變為充滿混亂的現象。假如過去在資本主義健康時代，每一度短暫的經濟恐慌總是促成一次較持久的、較大規模的繁榮，現在在資本主義沒落的時代則完全相反，繁榮的機會愈來愈少，而每一次恐慌則來得愈加持久和規模闊大。這種含有死亡意味的「轉變」，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代底政治結構（民主主義）愈趨不穩定和崩解，而法西斯主義的暴亂、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便交織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十月革命的成功，正是這個新時代的偉大序曲。在這個時代，馬克思主義得到了最平衡和豐富的發展，牠的現實的戰略和策略那部分得到了最深刻、最有系統的完成。這一點不能不歸功於列寧與托洛斯基底天才的貢獻與十月革命的偉大教育意義。

特別是十月革命的教訓，牠不僅是瞭解布爾什維克主義（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斯主義）的鑰匙，而且還是教育新一代革命家的寶貴泉源。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後的主要歷史任務就是：在一連串新事變的光照之下，解釋和保衛了十月革命的每一教訓，把牠當作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在規律而加以理論化。他這一工作的艱巨和偉大可以從這一事實測知：他之從事這一工作不僅要抵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及改良主義者的歪曲，而且最重要的還要頑強地抵抗蘇維埃官僚階級的理論上與實際上的反動，後者對馬克思主義的打擊是無比可怕的，因為牠篡奪和濫用了十月革命的權威和蘇維埃國家的物質權力。

史大林官僚階級的理論的墮落和背叛，以及第三國際之輕易轉變為牠的工具，證明十月革命教訓並沒有在大多數老一代的布爾什維克戰士中得到深刻的瞭解和溶化。布爾什維克主義本身只是階級鬥爭底辯證法的反映，牠因此也有其幼稚生長和成熟的幾個連續的階段，假如我們不從中尋出一種貫串一致的革命力學法則，我們就只能見到牠不可免要消滅為無數矛盾的觀察、估計、和行動規則。比方，當我們要瞭解列寧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四月底「農民專政公式」與「四月大綱」底無產階級專政之間的顯著的矛盾時，我們必須首先把列寧與孟什維克主義的全部鬥爭加以辯證的了解，我們才能夠說明這一矛盾只是帝國階級鬥爭過程底活生生的矛盾的反映。但一個自覺革命家的最大任務不僅在於說明一種理論底矛盾的社會根源，而最重要的，還是去揚棄這一理論體系的一切不成熟的假設、猜測、和估計，在最後的分析

中，在全部經驗的基礎之上，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得到最精煉的豐富化。但蘇維埃的官僚們却完全相反，他們竟為了自身底狹隘的私利所限制，竭力把布爾什維克主義在階級鬥爭不成熟階段中反映出來的一切幼稚和過時的公式加以孟什維克化，而捨棄了牠在全部十月革命過程中得來的精華，這就是十月革命以後整個世界革命運動遭逢連續慘敗的真正根源！

一、史大林主義對東方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的災害

十月革命的最偉大的教訓就是指出：在二十世紀的落後國家中，由於資產階級的軟弱、無能，過遲的民主革命只有經由年青的無產階級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走上政權，才能得到澈底的完成；但無產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之後，牠便不能停留在資產階級民主任務的界限之內，必然被迫而立即實施全面的社會主義改革，與世界革命合流。這就是不斷革命論的精髓。所謂不斷革命論只是落後國革命的一種內在規律，而這一個規律與支配落後國經濟的另一規律——綜合發展律，是不可分離的，前者只是後者的集中反映。落後國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最先進、最近代、最集中的資本與最落後的、最分散的農業經濟及手工業生產密切地連結在一起，而這種綜合構成的經濟結構又與最先進的帝國主義壟斷資本發生隸屬關係，構成爲整個資本主義經濟之一環，最薄弱之一環。不特得落後國經濟底綜合發展的規律就無法懂得落後國革命底不斷發展的規律。

事實上不斷革命論的基本觀念遠在一個世紀之前已由天才的年青馬克思闡明過，一九〇五年以後，這一久已被遺忘的觀念才又爲另一天才的年青馬克思主義者，托洛斯基加以復活和發揮，十月革命的勝利使這一理論得到最輝煌的證驗。假如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提出的「四月大綱」就是他在活的經驗之中毅然放棄了他的「工農民主專政」公式，接受了馬克思的不斷革命論；那末，他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提出的「殖民地提綱」也就是最初企圖把十月革命底「不斷性」的經驗活用於東方落後國的革命運動。托洛斯基對於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全部文獻則更有系統、更明確的把不斷革命論應用到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中。一九二八年，經過了中國革命失敗的慘酷教訓之後，托洛斯基便更透切、更成熟地寫成了他的不朽名著：「不斷革命論」，證明這一革命的理論不僅已活用於俄國，而且已成了二十世紀一切落後國革命的指導原理。

史大林對世界革命的背叛就是直接從背叛十月革命這一偉大教訓開始的

。十月革命對於他宛如發生在另一個星球裏的事變，一切已發生過的事情，他都彷彿茫無所知的！一九二五年，當他第一次出來指導另一個落後國家——中國——的革命時，他却出乎意外地拋棄了十月革命的經驗和教訓，而主張在像中國這種落後國家中，由於帝國主義的過分壓迫，各個階級是可以建立長期的聯盟，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階段的，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幫助資產階級把這個階段實現之後，才能談到社會主義革命。其實這就是孟什維克的有名的階段論。這種階段論是以對中國經濟的機械的分析為前提的，他認為中國經濟是一種封建勢力佔優勢的「半封建制度」，這就是說，以中國經濟中之最落後的生產關係來抹殺最近代、最集中底資本主義經濟的指導或支配意義，並順便掩蓋了這兩種經濟關係底有機的、綜合的結合，以及這種經濟結合所構成的特殊經濟機構與帝國主義的有機的關連。一句話，史大林主義直頭否認了中國經濟是世界資本主義之一，因此自然重複了所有孟什維克的錯誤，把二十世紀的落後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從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中孤立開來，回頭又把她的革命過程機械地劃分兩個不可逾越的階段：資產階級領導其他階級完成的民主革命階段以及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前者事實上就是落後國革命的現成的紋索，後者則只是一種遙遠、不可捉摸的樂音。

爲了完成「民主的階段」，史大林主義創造了許多離奇古怪的反動公式，而中國則簡直是這一連串公式的最模範的試驗場。在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中，史大林認爲「國民革命」應該而且能夠由「四個階級聯盟」的「國民政府」來完成，一九二七年的慘劇證明這個「四個階級」的「聯合政府」原來只是中國資產階級「完成」反革命的「政府」之後，史大林便從布爾什維克的故紙堆中拾起「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來，認爲中國革命既已證明「資產階級永遠轉入反動陣營」，「民主階段」就應該由工人聯合農民的「專政」來完成了。彷彿中國數十百萬工農犧牲了頭顱就爲的是重新證明一個久已殘破的孟什維克公式之毫無中用的！但事情的荒誕還不止於此，史大林並沒有因爲中國工農的血肉橫飛而改變了他的致命的階段論，他只是簡單地把完成這一階段的希望從資產階級移到農民身上吧了，因爲從一九二七至三七年，整整十年的新試驗，史大林主義的「工農民主專政」只是翻譯成一批散漫的農民「蘇維埃」政權，而中國的共產黨則爲了領導這些「政權」償付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從一個幼稚的無產階級黨澈底墮落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的農民黨。等到農民的土地暴動遭逢資產階級的優勢壓力、而趨於失敗之時，史大林則又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藉口之下，重新把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孟什維克舊公式搬出來：與資產階級、地主聯合共同爲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而奮鬥。這一幻想旋即在戰爭結束之日破滅，於是「反動」的「大官僚資產階級」又被排斥，新的「四個階級聯盟」又改變而爲「自由資產階級，開明地主士紳、工、農、知識份子」的「聯合政府」——這就是所謂「新民

主義革命」的「新」公式。但史大林主義的公式無論如何變化無窮，牠們總是圍繞着這一指導的中心觀念：在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只能與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農民結成長期的政治聯盟，因此，在政治上無產階級永遠失去獨立的活動機會，而只能成爲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左派反對派。根據同一觀念，俄國的孟什維克在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中把蘇維埃的權力交回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也由於同一觀念，一九一七年四月間，以季諾維也夫、加民諾夫、史大林爲首的老布爾什維克固執地以「必須通過工農民主專政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一死的公式來抵制列寧的「四月提綱」；十月革命之後，這一觀念竟成了史大林主義指導落後國革命的中心戰略路線，從中國革命一直到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兩次西班牙革命，都是這一路線的模範的犧牲品。

一、史大林主義對反法西斯和反戰鬥爭的叛賣

史大林主義之在落後國革命中採取上述那個典型的孟什維克公式，完全是因爲保守的蘇維埃官僚對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力量缺乏信心的緣故。但不幸他們之輕視無產階級的力量，不僅限於那些無產階級數量較少的落後國家，甚至還包括那些無產階級佔絕對優勢的先進國家，唯有在這些國家中，蘇維埃官僚所特有的惰性、遲鈍、和機會主義的特質才表現得最徹底。遠在一九二三年，史大林已對德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能力表示不信任，因此，錯過了革命的寶貴時機。一九二九至三三年，正當德國無產階級在希特勒的威脅之下，本能地趨向聯合行動之時，蘇維埃官僚却創造了一個「社會法西斯」的公式，使共產黨所代表的少數先進工人對社會民主黨內的幾十萬工人採取一種輕蔑的排斥態度，事實上，哀的美頓主義或冒險主義就是對於無產階級大多數落後羣衆之機會主義的不信任。

但問題還不僅在於這種罪惡的不信任態度，主要還在於此：蘇維埃官僚從這種不信任出發，竟在先進國家中也把社會主義革命的遠景推到遼遠的將來。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基本認識和結論中看出來。我們剛才已指出過，法西斯主義與戰爭，正如綿延不斷的革命騷動一樣，是資本主義臨死掙扎的重要病徵。由於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走向獨占，使廣大的工人羣衆恒久的失業，又使廣大的中小資產階級趨於沒落和赤貧，這種失業和赤貧化反過來又加深了資本主義市場的危機和經濟的崩潰性，因此使週期的恐慌變成慢性病。在這種社會崩解的嚴重打擊之下，大資產階級對於麵包屑也愈加慳吝，於是建築在這種麵包屑施捨的基礎之上的民主主義制度便不能支持，廣大沒落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便陷於恒久的憤怒、煩燥、神經質和對於現狀的強烈不滿。或者是無產階級勇敢的奪取政權，把這個垂死的舊制度加以澈底的顛覆，因而替這些失望的、無告的小人物打開一條到社會主義改造去的康莊大道，否則他們將勢必受財政資本家支持的煽惑家所騙，把憤怒傾向工人方面，走向希特勒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陷阱中——這就是法西斯

主義的社會根源。假如法西斯主義是臨死的資本主義舊制度企圖穩定其國內市場的絕望手段，那末，戰爭便是這同一舊制度進一步奪取國外市場的邏輯後果。法西斯主義只是最不滿而又最不穩定底帝國主義走向戰爭的跳板。瞭解這一真理，我們就不難跟着瞭解：不推翻整個資本主義舊制度，一切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戰的鬥爭都是無效的。

但恰好在這個地方，史大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發生猛烈的分歧。正如史大林主義在落後國中把一切落後的（或封建的）要素孤立的來看，拒絕承認這些要素與民族資本或國外帝國主義勢力之有機的連繫，同樣，他在先進國中，也把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當作孤立的現象來處理，拒絕承認反法西斯或反戰鬥爭與推翻整個資本主義之不可分離。正當廣大的工人和小資產階級羣衆已普遍的認識這一真理：在危機四伏的社會中，只有勇敢的打破現狀才能保障生存權和民主權利——正當這個時候，史大林主義却『勇敢地』去支持資本主義舊制度底殘破的現狀——『保護民主制度』！牠與第二國際的改良主義一樣認定：工人是在資本主義的舊基礎之上來『澈底消滅』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的威脅的。這無異認定：在一個臨死的病者身上可以『澈底消滅』一切病象一樣愚蠢！在醫界，即使一個最蹩腳的庸醫也不致如此立論的，但不幸像史大林主義者這一類社會庸醫却能够『把荒謬說成真理』，這證明在一個勝利的革命權威底擁護與一個國家機關底物質力量的支持之下，許多可怕的罪惡都可以做出來！

在這一絕頂荒謬的前提之下，史大林主義便替西方先進國的工人階級創造了一連串的反法西斯主義與反戰的公式出來：遠在一九一九——二三年，德國共產黨在克林姆宮的指導之下，已開始把狹隘民族主義底反凡爾賽和約的『人民革命』來和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凡爾賽和約『革命』相對賽，結果把希特勒捧上了台。一九三三年之後，蘇維埃官僚便定出一個新的公式——『人民陣綫』來補充牠的『和平陣綫』外交，所謂『人民陣綫』就是無產階級政黨與自由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政黨共同擬訂一個『保護民主』的政綱，領導那廣大不滿現狀的工農羣衆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羣衆去維持那不可能維持的現狀，企圖藉此阻遏法西斯主義和戰爭底威脅的發生。結果在『人民陣綫』實驗得最模範的兩個國家——法國和西班牙中分別促成了達拉第軍事獨裁與法朗哥軍事法西斯專政的勝利，在這種勝利之翌日，接踵而來的便是希特勒底大膽的戰爭信號。不管史大林主義理論家們的喧嘩聲，歷史老太婆却冷酷地證明了『人民陣綫』並沒有遏止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威脅，只是惡意地拖延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期限。

在終於無法『遏止』的第二次大戰中，史大林主義仍然繼續把戰爭視爲孤立的現象。最初因爲史大林與希特勒訂立了一個不侵犯條約，便把希特勒的戰爭描寫爲『反凡爾賽和約』的正義戰爭，後來爲時不久，當希特勒擊敗法國、屠刀指向蘇聯、迫使史大林趕速與『民主』帝國主義訂立戰爭同盟之

時，史大林主義便又把『民主』帝國主義的戰爭美化爲『民主反法西斯的進步戰爭』。這種純然靠外交關係來任意決定戰爭性質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戰爭論完全相反。馬克思主義一貫就認爲戰爭性質是取決於進行戰爭底國家和社會性質的，因此，自始就認定『民主』帝國主義的戰爭與『法西斯』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性質上完全一致，牠們都是爲了爭奪殖民地和瓜分世界市場。一個工人國家，雖然在戰爭中與帝國主義之一方建立了軍事同盟，這一同盟絕沒有改變、更不應掩飾帝國主義『同盟者』底戰爭的反動性質，她尤其不應爲了一時的『同盟』關係而束縛了或犧牲了帝國主義『同盟者』國內的無產階級利益，迫使牠們爲本國資產階級的掠奪目的服務。正因爲在第二次大戰中與第一次大戰一樣，不管帝國主義的外交關係如何變幻，其戰爭性質仍然是與其自身的金融資本的擴張政策一致的——正因爲如此，列寧從第一次大戰的帝國主義性質中引伸出來的革命的失敗主義政策，仍然保有全部效力。所謂革命的失敗主義並不是爲了促成本國資產階級政府的失敗而便利於希特勒的勝利，而是在反動戰爭中，無產階級仍然勇敢地在前方和後方進行推翻本國帝國主義的統治，實行社會主義革命，即使爲此而招致軍事上的暫時失敗總比之維持虛偽的『國內統一』而犧牲革命，較勝一籌。最後的分析起來，蘇聯之真正可靠的同盟者不是帝國主義，而是推翻帝國主義統治者的無產階級，所以在蘇聯底帝國主義『同盟國』國內採取革命的政策與蘇聯工農的利益是一致的。但蘇維埃官僚所關切的只是保持眼前的官僚特權，他們之被迫而起來保衛蘇聯也只是從這個觀點出發，他們對革命的害怕並不下於他們對於戰爭的恐懼心。這種反動的物質利益和心理，與他們的帝國主義『同盟者』的反動心理是取得一致的，正因爲如此，蘇維埃官僚與帝國主義『同盟者』結成的不僅僅是軍事同盟，而且最主要的還是一種反動的政治同盟，爲了取得帝國主義的援助，史大林竟答應在戰爭中束縛了蘇聯和全世界工農的手足，替舊秩序充當憲兵。

假如戰前的『人民陣綫』是蘇維埃官僚底『和平陣綫』外交的補充，那末，戰爭中，盛行於『民主』帝國主義國內的『愛國陣綫』就天然地是史大林底『戰爭同盟』的補充物。這個『愛國陣綫』（神聖的國內統一）的最大作用就是：小心地把工農的反國內外法西斯主義的武裝鬥爭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遠景隔絕，並把前者納入『民族』資產階級設定的河床之上。結果，在戰爭結束之翌日，這個公式又輝煌地幫助『民主』帝國主義和那些淪陷國的資產階級流亡政府迅速地解除工農抵抗軍的武裝，取消一切戰爭期間的革命成果（包括一種萌芽的工農權力機關）。在法國、在意大利、在希臘，在其他差不多所有歐洲國家中，這個公式都盡了無可比擬的反動作用。當這個公式已失去時效之後，於是『新民主主義』或新『人民陣綫』的公式又起而代之，爲的是在戰後，與各國資產階級建立復興資本主義經濟的新神聖同盟！但這個公式的最實際的意義還是：在戰後資本主義更殘破的基礎之上，在法西

斯主義與第三次大戰的新威脅之下，史大林主義企圖又向歐洲和亞洲那些加倍饑餓、因而加倍不滿現狀的工農大眾證明：他們仍可以而且應該在維持那絕對無法維持、無法改善底資本主義現狀的前提下，改善自己的生活！這就應了西方的一句古語：『歷史所教訓者僅在於此：歷史所教訓者為無物。』

不過『新民主主義』雖然較之戰前的『人民陣線』公式在不同的背景之中，顯得加倍罪惡和荒謬，蘇維埃官僚却有系統地利用東歐底奇特的實驗來證明『荒謬可以變成真理』，這就需要我們作一番更詳盡的分析和暴露，但爲了保持思想上和行文上的和諧，我們這一工作將在另一篇文章中完成。

三、史大林的『策略』：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搖擺

根據上面的全部分析，我們大致上可以明白：史大林主義『指導』（讀作：背叛）世界革命的基本原理，無論在西方先進國或東方落後國中都是一樣的：經過與國際帝國主義及各國資產階級的合作、妥協，在維持資本主義現狀不變的基礎之上，無產階級是可以繼續獲得生活改善的希望，而且還可以逐漸過渡到社會主義中去。這是在資本主義舊制度全般崩潰的背景中的最無望的改良主義公式。這一公式是蘇維埃官僚對現狀變革害怕到死的心理結晶，因爲我們剛才已指出過：無論法西斯主義與戰爭的危機增大，抑或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都足以立即摧毀蘇維埃官僚所賴以生存的特權。這同一心理的物質根源也可以解釋圍繞着這一公式左右盤旋的『策略』路線。

史大林主義底『策略』的曲折盤旋，無論牠向機會主義或冒險主義的傾擺達到如何遠的距離，牠總是不脫離上述這一反動公式的吸力的，這宛如供求律的劇烈波動總是圍繞價值法則周圍一樣。這種現象最模範的表現在史大林主義對『聯合戰綫』底策略的運用中。

『聯合戰綫』本來就是列寧底天才的策略之一，同時也是十月革命底重大的政治遺產，牠的主要觀念就是：『共同攻打、分別進兵』。無產階級先鋒隊爲了一個具體的行動目的（例如，在中國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侵略）和『魔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派）也可以建立臨時的鬥爭協定，但這一協定只限於共同執行一定的具體任務，並不包含有任何政綱上的讓步（如無產階級放棄自己的政綱去擁護資產階級的政綱等）或互相批評的限制（如在抗日期間，不准批評資產階級政府的政策，不准宣傳社會主義等）。這一策略的最模範的成功例子便是一九一七年九月間布爾什維克派與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共同抵抗哥尼洛夫將軍的軍事陰謀。布爾什維克派在『聯合戰綫』過程中，對克倫斯基的資產階級政府保有全部批評的自由，正因爲這樣，牠才能順利地在鬥爭中揭破臨時政府及小資產階級妥協派的動搖、妥協、和無能，於擊敗共同敵人之翌日，跟着推翻了克倫斯基。這一策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大會中加以正式規定，活用於全世界。

但史大林主義却把這一策略加以最惡毒的歪曲，牠最初運用於中國，把

牠變成爲放棄獨立政綱和批評權利的長期政治同盟，背着羣衆與資產階級結成上層的『聯合』，結果造成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悲劇。一九二五年的英俄委員會，也是這同一機會主義歪曲的產物，結果也造成英國大罷工的慘敗。爲所有這些悲慘的浩劫所驚嚇之後，一九二八年，史大林主義便突然擺向極左，把『聯合戰綫』加以冒險主義的歪曲，竟把社會民主黨和其他一切民主主義黨派通通歸入『社會法西斯』的範疇，因而主張不要上層，只要『下層的聯合戰綫』。既然廣大下層的工人羣衆之所以留在社會民主黨內正因爲他們對上層領袖尚存有幻想，那末企圖簡單用一道哀的美頓書式的『公開信』或『宣言』號召他們加入共產黨，不但收效絕微，而且還給了改良派領袖一個口實：證明共產黨的『聯合戰綫』只是一種分裂工人隊伍的陰謀。這種奇特的『下層聯合戰綫』在德國表演得最精彩，結果不是『聯合』而是加深了共產黨工人與社會民主黨工人之間的裂痕，納粹黨就是乘着這條裂隙而取得勝利的。一九三三年之後，史大林主義的『聯合戰綫』因爲受了希特勒的慘酷的打擊，便匆匆又從『下層』轉回到更可恥的『上層』勾結，在法國，在西班牙與自由資產階級及改良派結成『人民陣線』式的長期政治同盟，在中國則恢復了『國共合作』，這個『策略』，自此以後便重新墮入機會主義的泥沼，愈陷愈深，愈弄愈離，完全失去了布爾什維克底真正聯合戰綫的本來面目。這樣看來，史大林主義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所有重要策略的歪曲已達到了原則背叛的最高峯。我們在這裏只提到『聯合戰綫』，並不是有意忽略其他方面，僅僅是因爲牠代表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策略的最重要一面吧了。

從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三三年，德國發生了兩次革命的形勢；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國也發生了一次驚心動魄的革命、一次農民暴動、一次長期的反帝戰爭；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西班牙發生過兩次革命運動；此外，一九一九年的英國罷工，一九三六年的法國大罷工，這一連串的革命震動構成了戰前推翻舊財產制度的最優越的條件，但所有這些機會都通通被史大林主義領導葬送了。克林姆官及其奴僕企圖把這一罪惡推諉給改良派，但他們的全部政治却成了他們底無可推諉的罪狀，尤其難於辯解的，在戰爭中，史大林主義差不多操縱了所有歐洲淪陷國的抵抗運動，在中國也操縱了一半抗日鬥爭；在戰後的今天，史大林主義還操縱了法、意的工人運動，操縱了中國的農民鬥爭——儘管如此，牠却仍然把世界無產階級引向一個失敗又一個失敗，這就最雄辯的證明：史大林主義所賴以支持的重點：蘇維埃特權官僚階級的物質基礎與全世界工農的利益陷於不可和解的衝突，不是前者犧牲後者，就是後者犧牲前者而求生存或解放！

新的國際領導帶來

新的希望 (巴黎通訊)

在美蘇之間的冷戰越打越火熱，人類二十萬萬人口中絕大多數的被壓迫和被剝削人民的革命運動正在徘徊，而越來越迫切的找尋一個新的領導的當兒，第四國際第二次國際大會於四月間在這裏召開了。

第四國際，在我國的人民聽來還不是個很熟悉的名字，牠是一向被史大林派譏為世界上任何最反動力量間諜的『托洛斯基主義』國際組織。如果一個人能夠用冷靜的頭腦去讀一讀托洛斯基的著作，便可以明瞭，這位被史大林視作『王』的托洛斯基，其實却是列寧的最密切的同伴，並且正因為他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傳統，才被史大林驅逐出去。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即自一九二四年起至一九三三年止，他還是以反對派自居，進行黨內鬥爭，直至一九三三年德國革命，因史太林的『社會法西斯』胡說，幫助希特勒走上了政權，以致革命完全失敗，於是托洛斯基始宣佈史太林操縱的第三國際死亡，必須建立第四國際。第四國際成立大會，亦即第一次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九月召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不久的一九四〇年五月，曾經召開過一次緊急會議。一九四六年四月，大戰結

束之後牠也曾召集一次國際的臨時會議，最近這次舉行的會議，是正式的第二次國際大會。

參加這次大會的約有五十餘位代表，他們從十九個不同的國度裏來，代表着二十二個第四國際的各國組織。多數是從歐洲來的，包括美蘇占領下的國家。也有從北美，拉丁美洲，非洲以及中東遠東等處來的。很多國家的代表則因經濟等實際困難而不能出席。大會的代表，都是一批第四國際在世界各國運動中的領袖，如英國革命共產黨的總書記海斯頓，錫蘭議會托派黨領袖塞爾凡，荷蘭革命共產黨總書記山丁，法國國際共產黨政治局的辟萊，佛蘭克，白里特魯，以及巴里凡斯等。

會議自四月初開始，全經過三個月，始行結束。在這三個月期間的艱苦工作中，大會通過了許多重要的政治決議案。主要的有：世界政治局勢與第四國際的任務；關於蘇聯問題與史太林主義的提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工作報告；殖民地國家的局勢與第四國際任務的決議；還有各種章程和德國及意大利的政治決議。關於第四國際內部，對好些國際支部和其他組織要求國際予以承認的，都曾加以極其精細的研究，並分別作成決議案。

此外，大會通過一個綱領式的告全世界被剝削人民的宣言，總結了大會的整個政治意見。宣言中慶祝科學社會主義一百週年紀念，並確認一百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作對資本主義機體的分析，即在今日，還是瞭如指掌。根據

他們這個分析研究資本主義，使我們了解，不管資本主義國家形式的如何逐漸獨裁化，以及牠們經濟獨占化，牠終不能克服由牠自己制度中產生出來的混亂和危機的。宣言又對清蘇聯國家的性質，以及牠在沒落的資本主義中之作用。並特別強調美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發展。對歐洲的殖民地，拉丁美洲的，和美國的共產主義革命，都曾加以檢討。其中特別向全世界工人羣衆警告，現在正在準備的新的世界大戰，將會給人類帶來無比殘酷的後果；牠清晰的指出工人階級解放的共產主義綱領，只有工人階級自己才能給牠實現，史太林派對於工人運動，只是把牠控制在手裏當作工具而已。最後，宣言訂出一個過渡要求的綱領，喚起工人階級，爲了打擊世界資本家對工人階級壓迫生活水準和剝奪自由的攻勢，必須起來作實現能給人類以真正高度生活水準的社會主義而鬥爭。一個新的國際執行委員會，已經在大會中選出，計有十九人。當大會閉幕之後，新的國際執行委員會，立刻舉行首次會議，推選國際新的總書記。

大會除了向托夫人娜塔利亞深致關懷的敬意之外，復對希臘、中國、越南、印度、巴維利亞，和其他國家被監禁的托派戰士，以及在蘇聯、捷克、保加利亞、德國、奧國境內艱苦作戰的戰士，並全世界正在爲社會及民族解放的工人羣衆和殖民地人民致其崇高的敬意。

阿塔奇自五月十日。

信箱

關於中國民族資本有否前途問題的討論

編者先生：現在有一個問題要請教，就是『中國的民族資本』這個問題。我之所以要問這個問題，起因是這樣的：我那務於本市某小工廠，不久以前，我們的經理先生接到一件印刷品，是中共方面寄來的，因爲我和經理有一點親戚關係，所以他給我看。裏面說的，是介紹他們對於民族工商業的政策，於是才使我聯想到在書本什誌上常常看到的『民族資本』這個名詞。記得有很多人說，民主同盟的份子，是代表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利益的，而中共在這裏又說願意保護中國的民族工商業，毛澤東也會說過，他們非但不反對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歡迎

中國的資本主義。照這樣說來，好像中國的民族資本將來會有一個繁榮的時期似的。

但是我却不敢相信，因爲在目前這種強弱兼併的世界裏，我國處處被外人所牽制，要想擺脫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國的科學與技術又處處落後，農民太窮，怎麼可能呢？況且，儘管中共口頭說要保護民族工商業，可是資本家們總是不信任他們，對他們並沒有好感。像我們那位經理他就說過，假如是上海危急了，他就要搬到華南或香港去的。這豈不是更加不可能麼？

所以，我想提出幾個問題來，請先生解答：

1. 『民族資本』的意義怎樣？
 2. 中國有沒有『民族資產階級』？
 3. 別的國家或者歷史上有沒有過這樣的階段？
 4. 如果有，那麼它是怎樣繁榮起來的？
 5. 我國的『民族資本』有沒有前途？
 6. 中共或民盟能不能保護它的發展？
 7. 中共的『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與他的工農政策會不會矛盾？
 8. 我們應該怎麼辦？
- 上面幾個問題雖然很幼稚，但是我想您是不會見笑我的。希望能夠詳細替我解答，那是不勝感激的。此請

讀者余學勤啓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一二二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第一二五八五號

學勤先生：你所提出關於「中國的民族資本」的問題，實際上，就是關於中國的民族資本有沒有前途的問題，換句話說，也就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有沒有可能走上西方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問題。如果這個問題獲得解答了，那你所提出的其他問題，即令不加解釋，也就自然會明白的。

事實上，在你提出問題的時候，你自己已將問題否定了，就是說，你自己已不相信「中國的民族資本將來會有一個繁榮的時期了」。不過因爲你根據的理由尚嫌充分，或者是你尚不能合理解釋，所以你自己還有所懷疑。既然如此，就讓我們來幫着加一番解釋吧。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資本主義（即民族資本）之能够在西歐先進國家（如英、法、美等）獲得自由的發展，是有它們客觀的先決條件的，那就是：及時地掃除了封建勢力，解決了農民的土地問題，並完成了民族國家的獨立與統一。因爲只有在這些基本條件下，所謂民族資本才不至遭「阻礙」，才能獲得保障而自由活動和自由發展起來。資本主義之在美國獲得特別充分的發展，更是由於美國根本沒有封建勢力，而且早在資本主義開始時期就完成了民族獨立與統一。反之，凡是一個未曾解決土地問題和完成民族獨立與統一的國家或民族，其民族資本是絕不能獲得自由發展的，因而其經濟必然是落後的。這可以說是一種絕對不可否認的歷史規律。

我們中國既遠未解決土地問題，又沒有完成民族獨立，所以民族資本便處處受到阻礙，這所以說，由於土地問題未曾獲得解決，農民陷於異常的貧困，國內市場便異常狹小；由於民族未曾獲得獨立，國家的經濟命脈一直操在帝國主義手裏，對外貿易便無法獲得自由；——在這種情形下，民族資本還有什麼活動和發展的餘地呢？中國社會經濟之所以陷於長期的停滯與癱瘓的狀態，其根源即在於此。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在土地問題未曾解決和民族未曾獨立之前，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是談不到的，換句話說，如果不徹底改變現時半殖民地地位，從根摧毀封建的殘餘勢力，中國的民族資本是沒

有任何前途的。

但現在的問題在這裏：誰來擔當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呢？在十九世紀以前的歐洲，土地問題與民族獨立兩大任務大抵都是由新生的「民族」資產階級得到農民的幫助而完成的，但二十世紀的中國却正處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已趨沒落的時代，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出生過遲了，當歷史迫他去完成自己的任務之時，他後面已有一個強壯的無產階級，這個階級曾在一九二五——二七年表現過驚人的作用，牠一旦站起來必然立即可以取得廣大農民的擁護，而且最令「民族」資本家心驚胆戰的，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運動一開始就對國際的社會主義革命潮流。牠固然對帝國主義的壓迫與外國資本的侵略很不舒服，有時迫得反抗一下，但牠對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威脅感到更大的恐怖，所以在嚴重關頭牠寧可與帝國主義妥協，甚至聯合起來鎮壓本國的工人，這就命定中國的「民族」資本家永遠不能擔當自己的歷史任務。

「民族」資本家這種軟弱和反動的態度當然是有其物質根源的。中國的「民族」資本主要是從買辦官僚資本孕育出來的，牠近至一九一四——一七年第一次大戰期間才第一次得到發展的機會，所以牠的基礎非常脆弱，譬如在上海，所有中國的「民族」工業直至今天還不得不依賴於一間外國的電力公司來發動馬達，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象徵，表明中國的「民族」資本在金融和重工業方面都要屈服於帝國主義的支配，而且不得不依賴於牠。在這種卑屈的狀態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當然更談不到解決農村的土地問題，亦即解決「民族」資本的市場問題。恰恰相反，他還不得不依賴於對農村底殘酷的封建式的剝削來積累他的資本，農村的高利貸、地主、富農、商人往往是四位一體的，他們替城市資本家擔當了農村的放債者、商品推銷人，和原料購買者。另一方面，爲抵抗外國底商品的競爭，「民族」資本因爲無力購置新式機器，便只好儘情向勞動力方面榨取，以半飢餓的工資購買十小時以上的勞力。所以「民族」資本家總是具有雙重的性

格，總是帶着買辦性質的。在中國現在並沒有「純淨」的買辦階級，也沒有「純淨」的「民族」資本家，因爲當「民族」資本家被迫而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壓迫時，他就戴上「民族」的頭銜；當他受了農民的威脅，本能地與帝國主義勾結時，他就是「買辦」的。要這這一階級來徹底反對帝國主義和完成中國的土改革命，當然是欺人的幻想。中國「民族」生產力的徹底解放只有待中國的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去完成，這就是說，中國的「民族」解放問題與土地問題已不能在沒落的資本主義基礎之上來解決了，這些過渡的歷史任務的完成只有與目下迫近的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有機地連結起來才可思議。

中共（連同其附庸「民主同盟」）的最大錯誤就是把中國問題孤立的來看，他們始終否認中國經濟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之一環，而把前者底落後的「民族」性或特殊性加以誇大，認爲牠是與資本主義世界處於機械地對立的「半封建制度」。從這一錯誤前提出發，他們便進一步創造「民族」資本與「買辦」（「官僚」）資本及「封建殘餘」關係底機械的對立，亦即把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雙重性格加以機械的劃分，創造一個純淨的美化了的「民族」資本家來完成「國民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三民主義共和國」（一九二七——四六），或今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照毛澤東的離奇看法，在世界資本主義普遍沒落、國際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爛熟的背景中，中國仍然有「民族」資本發展的燦爛前途，「民族」資本家仍然能够擔當建設這一片烏托邦式資本主義「綠洲」的任務，這不是唐吉訶德式的幻夢是什麼？關於這一點的更詳盡的批評，請你最好去參閱本刊二卷十一期紀芬先生的「新的幻想與新的災難」以及二卷十二期鮑徵先生對中共土地法大綱的批評。你所問的最後幾個問題，這兩位先生都已解答得很完滿了，所以我不打算重複，請你原諒。

編輯者

敬請批評，歡迎介紹！

每冊實售法幣六萬元

新聲

從濟南失守看政局的前途

繼續了將近三年的國共間的殘酷戰爭，現在却愈來愈緊張，愈來愈趨於慘烈了！中共最近以全力發動「人海戰術」的總攻勢，猛力奪取了濟南之後，現正以全力進攻錦州，企圖更進一步的奪取瀋陽和長春，完成其佔領整個東北的計劃。

中共的政策，自從它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放棄了階級立場，執行機會主義路線以來，在政治上即失去其獨自的立場，而成為克里姆宮的外交工具，招致了一連串悲慘的失敗。這的且不說，即以二次大戰後最近三年的過程來看，它於大戰停止之翌日，即幻想與當權黨進行妥協，高唱階級合作，強調政治協商會議，企圖以此與當權黨實現政協路線的「聯合政府」來分享政權。

但當這種機會主義的企圖不斷地遭到打擊而不能獲得當權黨的允諾時，它便以自動的軍事冒險來孤注一擲，企圖以軍事的勝利來謀取妥協的途徑。例如今年的所謂「五月宣言」，它一方面部分的取消了去年的「土地法大綱」，修改了土地法而發動的軍事冒險的具體表現。但這一軍事冒險政策，却又遭逢了悲慘的失敗，不但開封不久三

隨即得而復失，而且豫東戰爭中接着損失十萬人以上，這便是機會主義與自動主義合作的必然邏輯的後果。這次濟南的奪取與對錦州的猛烈進攻，是開封政策的重演，同樣企圖以軍事的勝利來作為與當權黨謀取妥協的資本，以達其「新政協路線」的目的。

這次濟南的奪取與錦州的猛烈進攻，無可否認的更加深了統治階層的內部矛盾（這已表現於立法會議對軍事的質詢中）與自信心之喪失，引起軍心的渙散，人心的不安，尤其最重要的，便是加深經濟的危機，使原來基礎不穩的幣制改革，更蒙受嚴重的影響，這從濟南失守後滬地一般商店將貨物隱藏起來的消極抵制政策以及一般消費者的「搶購潮」便可充分地看得出來。但所有這些客觀不利於統治當局的因素，在目前尚不能迫使其自動向中共謀取妥協的途徑。因為它在沒有達到完全陷於絕境時，是不願與中共進行妥協的。如果中共奪取了錦州，進而取得了瀋陽

從濟南失守看政局前途..... 韻 寬

聯合國大會與柏林問題..... 羣 音

印度與海德拉巴的戰爭..... 長 戈

評當局逮捕學生..... 陳 曦

幣制改革能創造奇蹟嗎？..... 紀 芬

最近法國閩潮暴露出來的政治危機..... 旭 東

日本工人鬥爭的動態..... 金 戈

透過遠東烽火看東南亞..... 劉乃光

中共新政協與土地改革..... 王景波

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數..... 雲 龍

史大林主義的黨制..... 紀 芬

克林姆宮與各國共產黨的關連..... 李伯南

革命黨怎樣能形成一個羣衆力量(信箱)..... 李伯南

長春時，也許有妥協的可能，不過這還要看美蘇在國際上的關係來決定。假如美蘇的關係仍舊如現時之緊張狀態僵持下去，不但妥協沒有可能，而且勢必迫使美國更加緊的援助中國，使戰爭更大規模的繼續下去；假如美蘇的關係一時好轉，國共的妥協談判或者可能重開。但即令妥協，也只能是暫時的，只不過是利用時間準備進行新的戰爭之一種緩衝作用而已。因此，我們可以堅決的說：國共的戰爭，決不是用政治的妥協或軍事的冒險所能解決的。如果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不挺身起來用革命的手段來干涉，則我們有權利可以斷言：戰爭仍舊無了無休地拖下去，拖到毀滅的三次大戰，還是拖向革命的前途，那只有看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戰爭與革命競賽的速度，以及本國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衆覺醒的程度來決定。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邏輯的結論：國共的戰爭決不是國共兩黨本身所能解決的。首先，我們從國民黨方面說，雖然它在軍事上有着比中共優越的地理和物質的條件——城市的基礎與美國的資援。但由於它所代表的階級的反動性及其本身的腐化與無能，更由於戰爭所引起的經濟的嚴重危機，工商業的停滯，農村的摧毀，通貨的不穩定，以及由此造成統治機構的癱瘓，士兵的厭戰，人民的反感與怨恨等——在這樣客觀的條件之下，不但企圖消滅中共的武裝力量決無可能，即自身亦呈現搖搖欲墜的姿態。華爾街的援助，亦不過使這種陷人民於痛苦深淵的戰爭不死不活地拖下去而已。其結果，中共勢必利用其游擊戰術，長期消耗其財力和軍力，搶奪和毀壞其物資及工業原料，破壞其交通。這種情形如果繼續下去，其後果是不難推斷的。

其次，我們再從中共方面說，雖然它現時擁有龐大的農民武裝，雖然它的武裝力量的形成，多少反映了農民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要求，雖然在軍事和地域上獲得了某些進展，但由於它有着致命的弱點，使它絕無可能推翻國民黨的統治取而代之。它最致命的弱點，便是因為它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單純代表克里姆林宮官僚的外交利益，因而就沒有一個首尾一貫的真正代表中國工農及一般被壓迫民衆的政綱，尤其因為沒有將城市無產階級的運動與農民的解放鬥爭有機地聯繫起來，以城市無產階級為領導而配合農村的鬥爭，使後者成為革命的輔助力量。但正因為中共沒有這樣的政綱，沒有正確的政治路線來號召工農及一切被壓迫民衆起來為自身的利益而鬥爭，於是只有在克里姆林宮官僚的指使之下，從機會主義的路線中尋找與統治階級謀取妥協的機會，或以軍事的冒險來達到其妥協的目的。因此，我們有理由堅決的說，中共無論在軍事上如何勝利，不要說現時奪取了濟南，即進一步地取得了錦州、瀋陽和長春，也絕對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把問題弄得嚴重更無出路而已。因為軍事是政治的延長，中共在政治上既沒有任何的前途，單憑軍事的冒險，是決不會創造出什麼奇蹟來的。

總之，我們從濟南的失守與目前整個政治局勢看來，從國共兩黨的關係看來，如果全國的民衆不積極起來干涉，戰爭仍舊是拖延下去，把大多數的人民拖向痛苦、死亡，把整個的民族拖到水深火熱的深淵！從開封之失而復得，從濟南的失守與錦州的猛烈會戰，雙方死傷的人數，即據官方不完全的零星報導，已足夠令人寒心了！至於戰區的人民因戰爭而蒙受的死亡、凍餓、恐怖與逃亡的痛苦，更是無法形容！像這種慘絕人寰創歷史空前紀錄的戰爭，人民是有權利起而干涉的。全國的工農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現在是再也不能坐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戰爭無了無休的延長，則一切極度悲慘的痛苦和犧牲，勢將落在全體人民大眾的身上。因此，全國人民大眾，無論為着解除自身的痛苦，為着整個民族的生存，都必須積極挺身起來干涉目前這種慘酷的戰爭，首先要求國共雙方立即無條件停戰，召集一個真正代表全體人民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共戰爭以及當前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進而走向徹底解放的大道！（韻寬）

聯合國大會與柏林問題

在面臨東西集團對柏林問題的緊張氛圍中，舉世矚目的聯合國大會，已於九月廿一日在富麗堂皇的巴黎夏樂宮開幕了。其主要的議事日程雖然包括目前世界若干重要問題，如巴爾幹問題，原子能問題，義大利殖民地問題，裁減軍備及聯合國警衛軍問題等，但其最中心最重要的還是僵持已久的柏林問題。當西方三強外長於大會開幕時，決定正式將柏林問題列入聯大或安理會時，則其他的一些問題，便迅速退居於不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見，柏林問題，已成為目前國際紛爭中最最重要的問題，尤其是美蘇在歐洲衝突的中心問題。

去年所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不但沒有解決任何問題，不但美蘇的矛盾與三次大戰的威脅沒有因此而稍減，而且矛盾却愈來愈尖銳，戰爭的危機愈來愈趨於緊迫了。這次的聯合國大會，已經進行了整整兩個星期，但在此兩星期的過程中，差不多都是圍繞着柏林問題在糾纏不清。據美、英、法三強所公佈的莫斯科談判經過，史大林曾一度允諾解除柏林的封鎖，其交換條件是美、英、法取消西德的紙幣在柏林發行，使蘇聯控制的東德紙幣統一起來。當這一條件得到美、英、法的同意之後，史大林便

下令其駐柏林的司令長官與美、英、法三國的長官商談技術問題，以期實現這一協定。但在討論的過程中，蘇聯的長官不但不解除水路的封鎖，而且還要求加強空運的限制，並鼓勵西方三強佔領區的共黨進行擾亂。於是引起美、英、法利用蘇聯的反覆無常，向安理會提出控訴，企圖以國際的輿論來壓制蘇聯，喚起各國對蘇的反感與仇視，為反蘇戰爭準備聯合戰線的基礎。同時顯然地美、英、法方面在玩弄外交的手腕，企圖利用聯合國大會的輿論壓力，迫使蘇聯屈服；另一方面，則以軍事的準備來恫嚇蘇聯，以達其外交的目的。如最近西歐五國軍事聯盟之更加積極和具體化（見合衆社巴黎九月廿八日電），推選聯軍總司令，以及英國開始招募志願兵與各地停拆防空壕及水池，且進而考慮各地設防空壕的計劃等，便是顯明的例證（見法國新聞社倫敦四日電）。

而在蘇聯方面，它既然早已放棄唯一能挽救其危機的世界革命，則除了犬儒主義的外交政策以外，自然沒有別的出路。它的犬儒主義的外交政策在這次柏林問題談判中的具體表現是：當看到談判將要決裂，壓力嚴重時，它便採取機會主義的妥協政策來緩和一下；但當它看到目前美、英、法尚不致即時發動反蘇戰爭時，它便表演其「強硬」姿勢，以圖在妥協的談判中多爭得一點利益。這便是史大林之所以敢於出爾反爾的根因。但我們可以預言：在英、美、法的壓力，尤其是軍事的準備足以威脅它時，它仍舊只有妥協之一途。

據本月五日巴黎廣播，安理會已於四日投票決定柏林問題列入議程，以九對二通過五日討論柏林問題的決議。蘇聯與烏克蘭亦投反對票，並宣佈他們將不參加柏林問題的討論，而堅決主張該問題應

由四強外長會議討論。在我們看來，不管在安理會或外長會議討論與否，都同樣不能打開僵局解決問題。因為柏林問題，乃德國問題之中心，而西德政府又勢必為美、英、法所成立，在此情形下，如果蘇聯解除柏林封鎖，德國便於無形中由四強共管而完全落在美國的控制之下，這對於蘇聯乃至東歐，將是一個最大的威脅，蘇聯是絕難忍受的。反之，三強退出柏林，完全由蘇聯佔領，則美國又不能忍受。在這種利害衝突的僵持局面之下，安理會或未來的外長會議，不但不能解除這種矛盾，而且只有使國際局勢更加嚴重，美蘇的關係勢必更趨惡化而已。雖然尚不致因此而即時爆發戰爭，但勢將推動戰爭的距離更加迫近，是可以預言的。

總之，從這次聯合國大會對柏林問題談判的破裂和僵持的形勢看來，在美、英、法三強方面，勢將加強其團結，利用外交的壓力和軍事的威脅，來包圍和恫嚇蘇聯，迫使其屈服。蘇聯在企圖從機會主義的妥協路線中取得一點利益而遭受打擊時，便只有以盲目的冒險政策來補助了。如最近史大林黨在緬甸，馬來亞和印尼的暴動，就是顯例。然而這一冒險政策的結果，一方面只有更加速推動以美國所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準備反蘇的戰爭，最後弄假成真地促使戰爭的爆發；另一方面，只有把尚未成熟的革命力量無代價地浪費，摧毀革命的潛力，延緩革命的到來，這在客觀上就等於幫助資本主義延長其殘存的壽命。但這兩種危機，只有第四國際的革命勢力在全世界迅速地生長起來，領導世界的革命勝利才能挽救。（羣音）

印度斯坦與海德拉巴的戰爭

經過一度表面沉寂的印局，最近又為海德拉巴

戰事掀起了騰騰的殺氣。祇由於真納之死對巴基斯坦造成不可避免的影響，和「大不列顛」目前處境之困難，使他一時無能干涉，加以海德拉巴在地理環境上的孤立與其內部矛盾的深刻，才使這極度緊張的局面在海邦藩王奧斯曼的迅速屈降下得到較快的結束，逃過了這場慘烈的血鬥。現在戰事雖已告一段落，但光從這次衝突本身的事實和其直接牽動的社會背景中，使已充分的暴露出「獨立」了的印度，其內部是蘊藏着如何深刻的矛盾及其危機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了！

海德拉巴祇是佔印度全境半部的幾百個封建王公中的一個。這些封建王公之所以直到現在還保持着這樣廣闊的領域和勢力，自然完全是由於英帝國主義處心積慮所扶植起來的；正因此，它們也就天然的成爲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忠實代理人。所以對內之肅清這種封建的桎梏，和對外之擺脫大英帝國的束縛，乃是印度解放運動中同一不可分離的任務。但由於印度資產階級的過分荏弱和卑怯，他害怕羣衆興起甚於封建地主和帝國主義，因而處處與之妥協，勾結以撻伐和阻止印度的革命，以致更助長了這些反動王公的氣焰，同時加深了內部的衝突。

就從這次對海邦的戰事來說，尼赫魯——這位印度資產階級的代表，甘地主義的承繼者，這次雖然又不惜揭去其「非暴力」的偽裝，居然以數萬雄師向海邦展開了全面的攻勢，而且在如意的條件下（只有經過一些輕微的抵抗）很快便征服了這個已經拖長了兩個世紀的王朝。但試問他今後是否也能够得到同樣如意的條件去征服俾路支，刺其普他拿和打平巴基斯坦呢？一個勝利的軍事政策必須附以一個革命的政綱，拿破崙當時之能够披靡全歐，就因爲他多少採用革命的政策解放了歐陸的農民。可是

今天，在一個半世紀後的印聯的領導，也祇能和其他東方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一樣，僅能導演出反動和可恥的悲劇。即這回他除採用了純軍事投機的政略以外，我們不會看見他敢拿出任何比較進步的口號，如沒收土地歸農民，剷除封建剝削等去爭取海邦的人民。然而放棄了土地革命，不立即給全印民衆以澈底的民主權利，使不能根本消滅印度這幾個封建的土邦，也無法打破巴基斯坦的分裂，更談不上最後完成印度的獨立解放。

我們早已說過：分治將必給印度帶來內戰。隨着哈什米爾未了的火併，海德拉巴戰事只不過是接連而來的第二幕罷了。這次表面上印聯雖已順利的得勝了，但爲此已使印巴間的關係越趨決裂，把原已緊張的局勢更爲加劇（見合衆社十三日電）隨後將愈演愈烈，至發展到什麼程度，現在誰還不能夠估計。

當尼赫魯在慶祝印度「獨立節」向全世界提供其阻止人類自殺危機方案的時候，印度人民——就在這僅僅的一週年中，爲了這虛幻的獨立已在不斷的自相殘殺，支付了過分悲慘的代價了！現在海邦戰事雖然解決了，但尼赫魯的政策，勢將陷印度於更大的混亂和軟弱無力，使英帝國主義得以保持它在印度的基本權益。全部事實既已證實資產階級無法解決印度當前迫切的任務，這任務使天然的落在印度無產階級的肩上——這個階級，在第二次大戰後已大大的增加了它的數目和社會的重要性，並已在不斷的鬥爭中建立起其正確的領導——印度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祇有它，才能够成爲印度革命的動力，澈底的解決民主與民族的諸任務，並把這個革命引到建立印度社會主義聯邦的道路。（長戈）

評當局逮捕學生

政府全面逮捕學生，延擱了一個多月，至今猶在進行，各大專及中學校，雖然早已開課，可是人心惶惶，以後將延擱到幾時，至今仍未可知。當局此次全面逮捕學生的理由是共黨「職業學生」製造學潮，破壞社會秩序，并有中央社列舉種種報告，作爲逮捕學生的根據。

就一般的民主權利而言，人民若非現行犯，單是嫌疑犯的身份，政府是不能任意加以逮捕拷問與監禁的，此次政府捕人的黑名單，大部出自官方學生的報告（見劉不同致翁函）完全依據於不可靠的片面報告，即任意逮捕學生，這是侵犯了人身的自由，侵犯了基本的民主權利之一。

被逮捕的學生中，有很多是成績優秀的份子，他們并不一定屬於那一政黨集團，只是因爲他們曾經參加過一次「反美扶日」的遊行，或是曾經担任過某一學會的幹事，或是（更荒唐的）與某一「特種人物」有私隙……於是他就這樣被捕而下獄了！像這樣不分皂白的捕人，實在是對「行憲政府」的一個刻毒的諷刺。

另一方面，所謂共黨「職業學生」製造學潮，更是違背事實的藉口。固然我們不能保證每一次學生運動中，沒有共黨份子的參加或領導。但即令如此，也是屬於思想和政治的問題，決不是用逮捕和監禁所能解決的。何況學潮發生乃是由於客觀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根據社會學上的常識，凡是能够促成一個羣衆運動的一定不可能由於少數人的操縱，而是由於羣衆的普遍要求所刺激。（至於領導者把羣衆引向那一條路，正確或否，那是另一個問題）譬如前年官方所發動的反蘇聯駐軍東北與搬

走東北機器的運動，獲得了相當學生羣衆的支持，便是一例。其次，去年九龍事件，學生的抗議示威，雖然遭到共黨的消極不支持，但終於形成了一個相當廣大的學生運動，又是一例。這便足以證明，大多數學生是沒有成見的，學生運動的本身是不可由少數人來煽動操縱的。即使羣衆被利用一時，但是當他們發現與自身利益相違背時，陰謀家仍舊是要失敗的。然而如果沒有學生運動的客觀原因。即使你有天大的本領，也不能把很多的人都喚到街頭來的。所以，學生的過問政治，正好反映政治的過分腐敗，引起學生深刻的痛苦與不滿，因而他們才以行動來表示罷了。而政府當局非但不反躬自省，反而任意逮捕學生，這是不惜與人民爲敵。

正像經濟危機不能由行政手段來解決一樣，學生運動也不是任何行政手段所能解決的。相反的，學生運動往往是社會運動的氣象表，高壓的行政手段只有促成暴風雨的早降。想以剝奪學生的民主權利來消弭學生運動，等於火上澆油！只有給與學生以充分的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使他們「安心讀書」，然而這正是執政者所顧忌的。所以我們堅決主張必須由民衆普選出來的政府，讓它來解決我們國家的根本問題，（包括思想問題在內）從而消弭當前的政治危機，只有到這時候，學生運動才會隨之而成爲歷史上的名詞。（陳曦）

新聲月刊（原名青年與婦女）第三卷第六期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總經理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十日出版

幣制改革能創造奇蹟嗎？

紀芬

八月十九日政府正式頒佈所謂「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這項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實行「貨幣改革」。事實上，這一種「緊急」措施，不僅久已不出人民所料，而且也已司空見慣，習以為常了。遠在抗戰時期，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會在中國的淪陷區中發行儲備票，以二對一的比率，把中國舊法幣收兌了去。抗戰結束之後，中國政府則又以二對一的比率用舊法幣來兌回儲備券。這一次政府用新的通貨單位——金圓券，以一對三百萬的比率來收兌舊法幣，只不過規模更大，比率更創空前前的紀錄吧了。

也許政府的代理人將向我們指出：這次的新通貨是有充分的準備金的。這種說法事實上是空的，因為任何「通貨」總有牠的虛擬的準備金，而政府也不難開列清單，向人民證明牠的「準備金」十分充足，橫豎這種準備金是不能兌現的。比如這一次金圓券的準備金，據政府開列的清單看來，國營事業的股票（即有價證券）竟佔百分之六十，而中央銀行的賬面資產，所謂「外匯資產」則占百分之四十。這種準備金的虛擬性質是不言而喻的。無論國營事業（其實僅是一部分）的股票或中央銀行的外匯都是無法兌現的「不動」產。

(一) 通貨危機是一種歷史性的

其實，當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的放棄金本位，又當如像美國這樣金銀準備金充沛的資本主義王國，也發生通貨危機的時候，一個落後國家希望靠「充足」的「準備金」來維持牠的通貨，不僅是幻想，而且還是妄想。在這裏，迫使我們要涉到經濟學的常識問題。本來通貨只是一種交換價值的符號，牠的穩定是以生產和交換的和諧和正常的發展為前提的，生產和交換愈擴大，通貨流通的速度和幅度同比例的增大，則牠的「價值」愈趨穩定，其機能也愈趨正常，反之，市場愈趨狹小，交換愈趨呆滯，則通貨逐漸失去平衡，發生膨脹現象。在資本主義正常發展的階段，雖然在經濟繁榮與恐慌之間，通貨發生了週期的搖擺，但一般的說來，牠還是健全的，這一點在英國的金本位制中表現得最清楚。隨着資本主義的崩潰，金本位制——這一有力的通貨制度的樞杵也折斷了。世界市場的恒久狹隘化與劇烈的競爭造成資本主義世界一種崩潰性的通貨危機，膨脹的速度以幾何級數增加起來。這一點最清晰的反映在像中國這樣落後而又脆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

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和世界恐慌的打擊，中國在工業和農業兩方面，早就陷於萎縮的狀態，這反過來就造成中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愈來愈驚人的出超，結果，在國際貿易的總結算中，中國政府把全部白銀都犧牲掉了，這就是一九三五年「白銀國有」政策的歷史意義。

八年的抗戰和隨之而來的三年內戰已把中國的生產力加以毀滅性的破壞，國內市場已殘破不堪。在國際貿易結算中，中國對外底天文數字的巨額欠債只有靠種種方式來彌補：一種是飲鳩止渴式的向美借款；另一種是殺雞取蛋式的經過國家壟斷等方法去搜括外匯。但現在兩者都證明已告失敗了。第一種方式已遭逢了美帝國主義世界政策的障礙：一方面，美國現在只能用全力埋首於援助歐洲；另一方面因此美國在遠東方面僅能注意力集中於日本，她對中國統治者的腐敗和無能已告失望，雖然她不能不繼續支持他們的軍事行動，延長他們的牛存；但除非中國資產階級能完全服服貼貼地屈服於美國的絕對指揮之下，除非中國完全賣給美國，她是不願意拿大量金錢來填補那永無效果的內戰的。最後一種方式也已到了山窮水盡；所謂「國營事業」的壟斷，固然已順利地排擠了許多中小的工商業者，替政府爭得一點盈餘，但其中大部分利益却落入幾個「官僚資本」的大「豪門」中，造成資產階級內部的嚴重的離心傾向。政府喧嚷已久的徵用國外存款、徵收富人財產稅或特捐，都只是徒然在資產階級內部引起一種互相推諉，互相暴露的喜劇吧了。

(二) 新幣能造成奇蹟嗎？

所謂「金圓券」政策就是在這個四面碰壁的危急關頭中拿出來的應急辦法，牠的歷史背景是黯淡的，牠的直接動機是創造奇蹟，連官家報紙，大公報也迫得稱之為「最後一張王牌」。但儘管如此，政府却有系統地企圖在人民的腦海中造成一個印象：以為這次幣制改革是可以使人民恢復到戰前的穩定生活的。這種荒誕的宣傳，其主要目的顯然是利用人民對於戰前生活的強烈憧憬。但只須一個很短的期間，人民便立即明白，維持戰前那種相對穩定底通貨的物質基礎——國家生產力已永遠崩潰了。

政府假定用來穩定金圓券的三種方法就是「黃金國有」、「凍結工資」和「禁止漲價」。不幸這三種辦法純粹是一種消極的行政手段，而國內外許多例子都證明靠行政手段來干涉商品市場，特別是一個殘破不堪的市場，只能產生更惡劣的後果。這些絕望的行政者忘記了一件小事：商品市場有其自身的法則，除非把舊社會加以全般的改造，否則支配這個社會的法則是無法改變的，無論當局的「震怒」也好，警察的恐怖手段也好，都不足以變更市場法則的影響。

我們剛才已經說過：貨幣只是交換價值的符號，那末，假如我們離開交換和生產的兩個行程來談穩定幣值，顯然是自欺欺人。稍為具有經濟常識的人都會明白：戰爭是破壞生產力的最有力的工具，牠流乾了農村壯丁的血

牠蹂躪了農村的生產，破壞和縮小了國內的市場，牠致命地打擊了民族工業，牠無底地消耗了國民財富（包括外匯），牠全般地擾亂了社會的平衡。這就是今天中國的狀況。在生產和交換兩個行程被嚴重地阻礙和日趨狹小的條件之下，原有流通於市場的貨幣也增加空前的變化的流通速度，不斷被大量排斥於流通過程之外，變成一種威脅性的游資，而政府爲了彌補戰爭所造成的巨大赤字空洞，又迫得捲入惡性的週期通貨濫發中而不能自拔，這就使近來通貨膨脹空前惡化的客觀根源。那末，假如一切條件不變，政府用一種虛擬的新貨幣單位來收兌原有的舊幣，也只能說是在一個新的基礎上走上一條足以造成更大災難的道路，數字的魔術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彷彿爲了預防這一點，政府下令「禁止漲價」，規定一切物價不能超過「八·一九」的限度，其實這也只是「凍結」幣值的同義語的反覆吧了。

（三）凍結物價的前提——「凍結工資」

假如物價或者物價的符號——幣值能靠一紙法令可以凍結，過去統治力更強的日帝就應該更有理由奏凱了，而統治力更無比強梁的華爾街主人也就不必爲美國的物價高漲而焦急了。顯然的，即使頒布這項命令的政府也十分明白這點淺顯的真理，但牠仍然去追求那個虛無漂渺的奇蹟，其中自有一種無可掩飾的動機存在。

從政府法令本身所舉的手段看來，牠強制凍結物價，特別是凍結上海物價的主要動機，便是企圖在短期內用一定量的虛擬幣值儘量搜括市場上殘存的黃金、白銀、和外幣，藉以解救政府的軍事預算的燃眉之急。這個物價或幣值的「穩定」期間愈長久，則政府對這種「外匯泉源」的搜括也愈充分，這是一種最後的「殺雞取蛋」的手段。但怎樣去延長這個「穩定」的期間呢？唯一的辦法仍然不出這一社會學的常識：「凍結工資」，取消「按照物價增加工資的制度」，即，最後還是犧牲工人階級及一般貧苦小市民的利益來挽救一個腐朽入骨的政制。

（四）新的危機在發展中

現在距離新法令的頒布已有一個多月，我們已有更充足的材料來判斷這一法令的價值了。政府之用全力控制上海市場，主要的原因就在上海是一個「外匯的貯水池」，此外，政府還有一個幻想，以爲控制上海市場則足以間接控制全國市場。但一個多月的過程證明：政府除了在上海搜括了一億餘美元（包括黃金）之外，牠的政策已遭逢一種非常險惡的危機的威脅，這種威脅是從兩方面來的：第一，政府爲了防止物資和資金的逃避，已迫得於法令頒布之日禁止上海物資的轉運出口，這一着把上海與全國各地的經濟紐帶完全割斷了，結果一方面準備了上海糧食和原料恐慌的基礎，另一方面則鼓勵了各地工業品價格的自動上漲。第二，正因爲政府致全力於上海市場，結果

各地物價的上漲並沒有受到嚴重的障礙，凡是政府統治力最弱的地方，物價的上漲更採取肆無忌憚的挑釁形式。在這種幾乎不可遏止的趨勢壓迫之下，上海市場也開始動搖了，這種動搖的象徵最初也出現在政府控制最弱也最不注意的邊緣上：日用品尤其是食用品、裝飾品、房地產、股票黑市等。食用品（蔬菜類）的零售價格上漲反農村的抵抗，其他如房地產之類的漲價則反對變相的資金逃避。此外還有一更帶威脅性的危機在擴大着：上海及附近一般民營工廠（如紗廠、布廠、綢廠等）甚至一部分商店都在原料（或來貨）缺乏與不敷成本的藉口之下，實行減工或全部停工，這是資本家實行消極抵抗的辦法。

這許多因素綜合起來，證明上海的資產階級已迅速加強他們對於「新貨幣政策」的不信任，他們已用各種方式來保護自己的財產，抵禦一種變相的掠劫，而在這許多方式之中，最殘酷的便是把損失儘量轉嫁在工人階級身上，所謂停工或減工也就是使工人階級在「工資凍結」之外再蒙受失業或半失業的打擊。

（五）「金圓券」所隱藏的社會意義及其前途

我們如果把「新貨幣政策」實施一個多月來的成績加以總結，可以得出一個無可否認的結論：這個政策的首要犧牲者是工人階級，其次是一般小市民（包括公教人員）；他們不但被剝奪了吃飯的權利，甚至還被剝奪了爲吃飯而鬥爭的權利（罷工權）；在資產階級內部，則這個政策只是加劇了中小資產階級的破產和沒落過程，使他們不僅失去了市場，而且還喪失了保護資產的手段。唯一獲得利益的是直接控制政府的官僚大資產階級，他們除了爲政府搜括一筆經費之外，還利用特殊的地位幹一般人民所不能幹的事情：如預先拋售股票、用低價大量收買港幣等。

從這個社會學的結論出發，我們對政府底新政策的前途，也大致可以相當準確的預測出來：牠不是在解決或緩和社會的矛盾，而是在把牠們積累和擴大到一個毀滅性的爆發點上，不久的將來，一旦漲價的浪潮淹沒了上海的時候，則活的商品——勞動力底活的代表——工人階級將最後而又最不可抗拒地起來抗爭，圍繞這一鬥爭週圍，一般貧苦的小市民也勢必拾起頭來爭取起碼的生存權利，而在這一火熱的空氣中，資產階級的信心將更形喪失，內部的傾軋將愈加激烈——在行將沉沒的大船中每一個人爲了挽救自己而存心把別人推到海中去，雖然這也並不證明他眞的能平安得救。這就是「新幣政策」的社會意義——企圖用一張新紙幣來彌縫社會的崩解，無異企圖用一把掃帚來阻擋大海的狂潮，兩者同樣是屬於人類幻想中的神話。十月一日（後記）這篇文章完稿到現在不到幾天，想不到我們預言的危機竟在上海市場以如此迅速的速率顯露出來：從上海市場一直蔓延到京滬、滬杭一帶的搶購貨物風潮，宛如排山倒海的趨勢爆發着。另一方面，彷彿爲了火上加油，行政院却連續決

定增加貨物稅和停止公用事業貼補的辦法來彌補赤字公債，結果首先引起煙草業的加價，把「八、一九」限價的土堤掘開了一個缺口。這些事實證明消費者，甚至連資產階級自己對新幣從就沒有多大信任，正因為如此，企圖靠這種虛懸的紙幣來搜購黃金及外幣才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政府爲了彌補收支的不平衡便只好急忙尋求上述的兩項解救辦法，這一來，把「幣制改革」完全變成一場短促的幻夢，物價的威脅又如巨靈一樣威脅着一般消費者，引起他們「重貨不重幣」的自保本能。現在據說，在新的威脅之下，當局已下令暫停上述兩項辦法的實施，但政府的收支如何平衡呢？只有一個老辦法：增發紙幣，實際上政府從未企圖終止過這個辦法的實行。據最初的預算至九月底政府發出金圓券是五億，但實際上已超過九億，亦即在短短的期間內，市場上突然增加九億大票；因爲牠不是用來收兌舊幣，而是用來購買黃金，外幣及彌補赤字的。總而言之，我們仍然認爲人們無法造成奇蹟。

十月七日

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數

雲龍

食物類 (價格單位金圓一元)			實支總價
品名	數量	價格	
白米	全月八斗	每斗二·三〇	一八·四〇
肉	每日半斤	每斤〇·七〇	一〇·五〇
蛋	每日六只	每只〇·〇七	一二·六〇
菜	每日二斤	每斤〇·一〇	六·〇〇
豆腐	每日二塊	每塊〇·一七	一〇·二〇
煤球	全月三担	每担三·三三	九·九九
合計			六七·六九

最近法國閣潮暴露出來的政治危機

旭東

法國自八月廿八日馬里辭職發生閣潮後，中間經過賴馬迪和許曼連續三次組閣的失敗，法國政局一時曾陷入極嚴重的狀態（即美聯社亦稱：「法內閣的難產已成爲法國戰後最嚴重的政治問題」）。迄至九月十二日居伊才勉強將內閣組成。——這一閣潮，現在表面上雖然已成過去，但由此次閣潮暴露出來的法國政治危機，却十分值得注意。我們爲了解法國當前政局危機的深度及其前途，覺得即在事後也還有加以簡略的檢討之必要。

法國這次閣潮的發生，所謂內閣的難產，表面上雖然是由於各中間黨派（社會黨，人民共和黨及急進社會黨等）對於獲得「合作」，但實際上乃是法國戰後整個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之一種最尖銳的反映。

法蘭西帝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由於法國資產階級的絕頂腐敗無能，不但它本國全被淪陷，遭逢了希特勒的鐵蹄蹂躪，它的生產力和財富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和損耗，就是它的殖民地也陷於分崩離析的狀態中。因此，戰後

衣着類			實支總價
品名	數量	價格	
白布	三尺	〇〇九	二〇
色布	三尺	〇〇九	二〇
絲織品	三尺	〇〇九	二〇
縐紗	三尺	〇〇九	二〇
鞋	一雙	一〇八	一〇
襪	十二雙	〇〇六	一〇
鈕等	戰前	〇〇〇	〇
合計			二〇

雜用類			實支總價
品名	數量	價格	
肥皂	六塊	〇〇二	一
生油	六斤	〇〇三	一
糖	二斤	〇〇四	一
醬油	二斤	〇〇三	一
池水	六斤	〇〇二	一
交際費	戰前	〇〇〇	〇
娛樂費	戰前	〇〇〇	〇
酒茶藥等	戰前	〇〇〇	〇
合計			三

根據多方調查，目前工人區最普遍的房租標準，每間每月食米二斗至四斗不等，現暫按二斗計算。九月份房租支出爲四·六〇元。

以上各項支出，合計一〇八元一角。求取九月底工人生活指數的簡單方法如下：
 $108.10 \div 35.00 = 3.0885$ 即百分之三百〇八倍強（基本計算原則請參閱本刊三卷五期）

的法國便陷進了一個極度的不穩定的局面。當大戰將近結束時，法國的工人階級和貧苦農民原已自行組織和武裝起來，一方驅逐納粹勢力，一方創建自己的權力，企圖以革命手段重新改造法國。但當時佔領導地位的社會黨，尤其是史大林黨，却盡量壓抑工農，解散他們的武裝力量，取消他們自建的權力機關，爲的是與資產階級謀取「合作」，建立「聯合政府」，恢復資本主義的「秩序」！因此，戰後初期法國極有希望的革命局勢就這樣地被抑制下來了！可是，史大林黨和社會黨雖然一時幫助資產階級抑制了革命局勢的發展，恢復了資本主義的「秩序」，却遠沒有能替法國解決由戰爭醞釀下來的任何一個嚴重問題。相反地，在戰後通貨日趨膨脹，物價日益高昂，食物與燃料日感缺乏的情形下，工人階級的生活日益陷於不可忍受，小資產階級日益走上破產，階級矛盾日趨尖銳化，因而整個法國局勢也就日益走近危機爆發的邊緣。在這種情形底下，法國資產階級獲得了美帝的有力支援後（這時

正當美蘇關係日趨決裂，便決心開始向「左」邊進攻，首先就是把史大林黨踢出「聯合政府」，建立所謂中間派的「聯合政府」，企圖以此渡過難關，再乘機打毀工人的勢力，踏上法西斯專政的道路。從去年夏天以來，法國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的圖謀便全是向這方面邁進的。馬歇爾的「援歐計劃」，主要希圖穩定法國的社會經濟，并藉此鞏固法國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去抵抗蘇聯。而戴高樂之組織「人民團結」運動，不用說更是得到了法國資產階級及美帝的暗助，準備於危機迫近時建立巴拿帕特乃至法西斯的獨裁。但另一方面，戰後興起的法國工人階級，雖在史大林黨和社會黨的機會主義欺騙與叛賣之下，遭受了許多次的打擊，但他們的力量不僅一直被保留下來，而且在向深的方面發展。所以一遇到物價高漲不能忍受時，他們總是勇敢地昂起頭來要求增加工資，進行鬥爭的。去年冬天的總罷工運動便是一個顯著的表現。這次馬里內閣之倒台，以及賴馬迪和許曼等內閣之再三流產，其主要原因更是由於工人階級在物價高漲下堅決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三所激起的。由此也就充分證明：這次法國閣潮所反映的階級矛盾和政治危機是如何的深刻了！

這種深刻的階級矛盾和政治危機，在閣潮僵持的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一些重要事實，更給了我們一幅明顯的畫圖：一方面，從史大林黨把持的總工會，石屋領導的非共黨的「勞工力量」到基督教勞工聯盟，在工人階級的情緒激昂堅強壓力之下都一致被迫要求增加工資百分之三十三，并不斷罷工相威脅；另一方面，戴高樂派到處煽動，咄咄逼人，要求解散國民會議舉行普選，終止聯合政府，建立戴高樂的單一政權；同時，所謂中間派的社會黨，人民共和黨及急進社會黨等，在工人羣衆與戴高樂派的威脅之下，致使相互間的意見陷於紛歧，而向左右分化：社會黨的左派則因感受工人羣衆的壓力而主張滿足工人的要求，它的右派與人民共和黨，尤其是急進社會黨的右派，則遷就戴高樂派的壓力，主張壓抑工人；而史大林黨仍舊本其一貫的機會主義政策，可憐而復可恥地要求參加「聯合政府」（并名之爲「新民主政權」）；——居伊內閣，便是在此種階級矛盾和政治危機的緊張下，勉強湊合起來的產物。敏感的合衆社記者稱居伊內閣爲「居中偏右的聯合政府」（該社巴黎九月十日電），可算是一針見血的看法，這就是說，居伊的「聯合政府」是遷就戴高樂的壓力，而偏向於反對工人階級的。在法國的政局繼續和加緊向兩極分化的情況下，像居伊這類的「聯合政府」是命定地極度不穩定的。

現在讓我們來略微檢討一下居伊政府成立以後的實際情況吧。據法國新聞社的觀察，居伊政府的基本「政策是盡力拉攏右派以打擊左翼，企圖避免以前中間政府左右夾攻的處境」。（見該社巴黎九月十五日電）對於引起閣潮的工資問題，它允許增加百分之十五。但在宣佈增加稅收以穩定法郎膨脹的財政政策中，却反而增加了工人的負擔（百分之二十的所得稅），所以他允許增加的工資又在所得稅中被扣去一部份了。同時在它的裁員政策中，更增大了失業的人數（業已解職的公務人員已有十三萬五千人）。因此，就愈加引起了工人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不滿。最近二十天來法國各地不斷的罷工示威，例如：九月十四日巴黎五金工人一萬五千人發動罷工，法國東部四萬五金工人宣佈無定期罷工，廿四日全國五百萬工人兩小時的「警告」罷工及十月四日開始的法國北部三十五萬的礦工罷工等。就是最明顯的表示。但另一方面，戴高樂也還不以居伊政府的「拉攏右派打擊左翼」的政策爲滿足。他不僅依舊趾高氣揚地要求重掌政權，而且還大規模地組織了他私人的武裝隊伍（合衆社巴黎九月廿二日電：法國內長莫許廿一日在國民會議中指斥戴高樂私人擁有警衛武力一萬五千人），這還不是顯然地在準備武裝暴動，企圖奪取政權嗎？至於那些參加居伊「聯合政府」的「中間派」，更是走向兩極分化：急進社會黨的右翼，即吉亞柯柯比領導下的一派早已表示傾向於戴高樂，與他採取同一陣線（巴黎九月九日廣播）；社會黨的「左翼」更公然分裂出來，組織了「社會統一黨」（法新社巴黎九月廿六日電）。這些情形，不僅暴露了居伊政府的極度不穩，而且是象徵着法國的向兩極分化是在加速地進行。

我們早在一年半前便已經指出過：「向兩極的運動便逐漸地在法國開展起來了」，「這種向兩極的運動，今後將跟着時間進展而愈演愈烈」。（請參考本誌第二卷第二期「國際局勢之論在法國」一文）一年半來事變的發展已完全證實了我們的預斷。因此我們更有權利宣稱：不僅居伊的「聯合政府」是極度不穩定的，短命的，就是整個法國的政治局勢也是極度不穩定的，將日益走近危機爆發的邊緣。法國今後將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還是陷進法西斯的獨裁？——這問題便愈益迫切地提到了法國民衆的面前！如果法國陷進戴高樂的法西斯獨裁，那就等於美帝進攻蘇聯的第三次大戰的直接信號！法國工人階級及一切被壓迫的民衆，要想避免法西斯與第三次大戰的浩劫，只有迅速地從史大林黨和社會黨的機會主義政策束縛下解脫出來，站在法國國際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的領導下，實行準備奪取政權，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才可思議。我們相信：法國工人階級及一切革命份子，在法西斯與第三次大戰的日益明顯的嚴重威脅之下，是會選擇這一前途，并爲實現這一前途而堅決奮鬥的！

日本工人鬥爭的動態

戈金

擁有六百萬人口的日本工人階級，在遠東無疑地是一枝龐大的革命力量。過去，在戰爭中，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以及遠東其他殖民地奴役戰爭的勝利，於帝國主義本國的工人運動興起，只是一種阻礙。同時，日本軍國主義之統治，更給工人運動興起，以另一重壓力。祇與日本帝國主義在戰爭中失敗之後，日本工人階級才得到一個抬頭的機會，企圖重新集合自己的力量，準備擺脫八年侵略戰爭所加予他們的痛苦。但是，以「民主」為標榜的麥克阿瑟統治，並不比舊日赤裸裸的軍國主義能給工人階級以稍多的自由。阻遏一九四五年日本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鬥爭企圖，不是別人，正是這個新的日本天皇的命令。

戰後，日本工業的生產，確已獲得相當的復興，於是另一方面是日資產階級在美國扶日之下，加速着資本的累積，促使階級分化的銳尖化，他方面也顯示工人階級力量的更加增長和增強。這便給日本工人階級的鬥爭，提供一個與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的經濟基礎。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鬥爭和殖民地運動，是在不可忍受的經濟危機中爆發出來，而日本工人運動，却產生在經濟暫時復興的基礎之上。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平衡性，在不同的基礎上，給工人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謀得綜合的發展。

日本工業的復興，並不就等於工人階級生活的改善，恰恰相反，牠正是從盡情地剝削了工人階級生活水準中復興起來的。今日，日本工人的實際工資，一般說來，比戰時反而降低百分之二十六。同時，這個狹小的島嶼，地理的條件，決定牠的農業生產，無法滿足九千萬人的需要。自從這島嶼突然喪失了牠的毗鄰殖民地那天起，牠便喪失了足夠的農產而來源。糧食問題和工資問題，同時成了工人階級的嚴重威脅。也正是這種威脅，提高了工人階級的鬥爭意志。他們第二次鬥

透過遠東烽火看東南亞

劉乃光

第二次帝國主義大戰給宗主國造成了無數的困難，嚴重地削弱了牠們的統治基礎，並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面前，清楚暴露了牠們的弱點以及無能；而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多年來却又多少已經發展了自己的民族工業，跟着又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覺悟力。當他們的羽毛已逐漸豐滿起來，而奴隸主則表現着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自然要利用這個翻身的好機會，起來掙脫奴隸的枷鎖。因此，殖民地半殖民地對帝國主義的離心力空前地加強了，民族解放的戰爭像怒潮般澎湃起來了。這就是戰後遠東陷於一片紛亂和戰爭的客觀原因。

我們翻開地圖看看，今天的整個東方，可說沒有一塊國土是寧靜無事的。越南和印尼，從一九四五年夏天先後成立了獨立共和國之後，就一直進行頑強的戰爭，分別抵抗着法荷帝國主義。此外，像緬甸、馬來亞、印度、以至近東的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國家的反英運動，在戰後也洶湧起來。帝國主義面臨如此普遍嚴重的局面，除了在某地加以武裝的鎮壓之外，便只有改變方式：或者轉移被統治者的反帝鬥爭目標，使之自相殘殺；（如印度、巴勒斯坦、菲律賓、中國，以及在某種程度上說，未來朝鮮等的內戰。）或者改變為間接的統治，向某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時加上地主）作有限度的讓步，利用他們成立一個新政府；（如對印度的尼赫魯和真納，越南的阮文春和保大，印尼的沙赫爾等。）或者，像法國和荷蘭，當牠們一時無力作戰的時候，便利用越南和印尼政府的妥協本性，和牠們簽訂一些協定，到準備停妥時再把牠撕毀，重新進攻。而不幸的，由於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資產階級之卑怯無能，再加上小資產階級改良派（如領導越南和印尼鬥爭的共產黨）之動搖妥協，以致不斷接受了帝國主義的表面讓步，簽訂各種協定，坐失了最好的時機，始終不能把帝國主義趕出國境去。因此，就形成了戰後迄今的長期動亂和內戰的拉鋸局面。

但泛濫在整個遠東的民族解放怒潮，正如西歐各國工人鬥爭一樣，今天都正在被史太林黨利用着，消耗着。因為像越南和印尼等地的共產黨，都先後插足到這些反帝鬥爭中，操縱了牠們；從當地解放運動興起之日起，到九國共產情報局成立而改變政策時止，在這個階段內，各國的共產黨都緊隨在莫斯科總路綫後，到處對施一種階級合作的「聯合政府」政策，在最有利的革命局勢中，不斷地帶着羣衆去遷就資產階級的利益，以便與資產階級合作，由此而葬送了最有利的局勢，癱瘓了羣衆的鬥志，讓資產階級的政權穩定下來，讓牠有可能隨時叛賣羣衆，與帝國主義妥協。同時，當羣衆運動非常高漲，而帝國主義則陷於無力狀態，需要作緩兵之計時，共產黨却連同其他政黨一起，與之簽訂了協定，以此鞏固了帝國主義的地位，讓牠得到喘息機會去準備新的進攻。等到這種動搖妥協政策葬送了最有利的局勢，反帝鬥爭不斷受到挫折，帝國主義的包圍圈愈縮愈緊之時，共產黨在國際上的政策轉變了，從極右的機會主義階級合作政策，開始向極左的盲動主義轉變了。這一轉變的指標，就是去年九月歐洲九國共產情報局的建立。轉變的原因，主要是由於史太林黨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失敗；牠兩年多來不但不能從外交上得到美帝的讓步，反而日益受到美帝壓力和進攻；牠的各國黨徒們不但沒有從「聯合政府」中得到任何好處，反而被這些政府中的「同僚」趕了出來；牠號召工人階級去和資產階級合作，結果反而犧牲了工人的利益，招致工人階級對這種政策之不滿；——就在這方面衝擊下，牠的政策「左轉了」，牠企圖以這種偽裝的革命姿態去緩和工人的不滿，以便更緊密地操縱牠們，

爭的企圖，爆發於一九四六年二月。僅僅因為他們的領導者在社會黨左派和史太林派共產黨之手，而當時社會黨左派還跟牠的右派在一起，史太林無則遵循機會主義的階級。結果在麥克阿瑟的又一紙禁令之下，卑躬的屈膝了。

然而工人階級雖未成功地爆發一次大規模的運動，實際上，這就是他們力量潛存的原因。這種潛在力量，時刻威脅着麥克阿瑟的統治，和歷屆內閣的壽命。和世界其他國家的統治階級一樣，日本統治階級，在這種威脅之下，是不會允許自己讓出更多的民主的，牠必有拼命縮短民主的尺度，圖謀以議會的『民主』形式，通過像美國塔虎特——哈特萊的反勞工法案。可是工人階級的鬥爭情緒，已經走在他們這個步驟之前，逼得麥克阿瑟不及待法案提出議會，必須有一個臨時的緊急措施，所以他致函藤田，於七月三十一日由藤田內閣正式頒佈『波茨坦政令』，禁止罷工。竟覆這個禁令的，首先就是福岡九州大學的教職員罷教。繼之，日本產業別會議，全國工會聯合會，以及在日本具有最大力量的全國信遞工會，鐵路工會，交通工會，都一致用行動表示了抗議。

禁止罷工令，不足以壓抑日本工人階級的鬥爭，反給這個鬥爭一個統一的目標，一切為改善生活而醞釀的鬥爭，使圍繞這個中心集中起來。原來的經濟，很快就找到了政治內容。

從中國報紙上所得到的消息，已經是：北海道的鐵路工人，五金工人和礦工，以及四國的海岸，在運動的起始，是最洶湧的二個浪頭，使這二地的交通完全陷於癱瘓。北海道的鐵路工人，甚至用鮮血在罷工中犧牲的領導者墓前簽名，組織鐵血團，對抗警察的襲擊。這種日本民族特異的英雄主義，將對我們預示未來日本工人階級鬥爭之無匹的英勇精神。在大阪，東京，栃木，宮城，長野各處，罷工運動正在蔓延，全國交通工人組合，全遞工會，電力站工人組合，都先後宣佈罷工，全國電氣產業勞動組合，更於七月十日宣佈『黑暗罷工』。總之，整個日本三島，已經投入工人階級戰後最大規

模用來和資產階級討價還價，使牠自己能够重新參加『聯合政府』；另一方面則用這筆資本去和美英等帝國主義討價還價，以壓迫後者向克林姆宮讓步和妥協。

因此，爲了配合克林姆宮這一轉製，遠東各國共產黨都『左傾』了；其中最明顯的是在中國、緬甸、馬來亞及印尼。中國共產黨很快從政治協定轉向激劇的武裝鬥爭，並在農村中實行了土地改革政策；馬來亞和緬甸的共黨，則於今年六月間，起事，馬來亞共黨的暴動日趨嚴重，在不斷暗殺和大批捕殺之後，政府終於出動了飛機火箭去大舉剿共；緬甸也在差不多同時展開了內戰，共產黨開始破壞交通，向首都進襲，於是上下緬烽火連天！而最近據報載，共軍竟打到仰光附近了。至於印尼方面，正當緬甸馬來亞共黨起事後不久（八月間），居留蘇聯廿三年的印尼共黨領袖麥索回到爪哇來了。他『一露臉就充任印尼共黨主席，在三個星期中把印尼的社會黨和工黨及收了過來，擴充勢力』。（倫敦九月廿六日廣播）再過十八天，九月十八日，印尼共黨就發動了政變，佔領了爪哇的工業區末里粉，成立了新的政權，由麥索出任總統。於是爪哇便引起了三角戰——印荷、印共、荷共間的戰爭。從上面一連串的事實可以看出，東南亞的烽火，直接是由當地共黨燃起的，而他們之能够這樣，當然又是利用遠東民族解放的反帝怒潮，以及羣衆對現狀的不滿情緒所造成。只有盲目無知或有意欺騙的人，才會否認這些事實中間的緊密連繫，否認牠們都是共黨所發動，而只認爲這些都是時局上的偶合。

東南亞共黨的暴動，顯然是一種冒險的極左盲動，而不是一種從下至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不是真正像資產階級報紙所說的『紅色政權』或『蘇維埃共和國』，因爲我們看不見印尼共黨拿出社會主義的革命政綱來，本動搖私有財產制度，反之，牠主要的只是要求外交上的親蘇吧了；而且這種轉變又是突然而來，毫無政治上的準備的，大多數羣衆都只能感到驚奇和失措，因爲印尼共黨昨天還在實行機會主義政策，與資產階級合作甚至與帝國主義妥協，以此幫助後者把動搖的統治穩定下來，把潰散的力量恢復起來；另一方面則把羣衆的力量大大消耗掉。等到這種政策已經招來如此不利的後果之後，他們今天又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從事冒險的盲動，如此讓資產階級和各個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共同以壓倒優勢的武力去平服暴動，結果勢將把羣衆的力量完全消耗精光。所以最後說來，這兩種政策都盡了同樣的作用；在客觀上幫助了帝國主義穩定其統治。事實已證明各個帝國主義正聯合當地資產階級進行壓平暴動的工作；在馬來亞暴動爆發後不久，美國即公開宣佈已批准了軍火運往馬來，以協助英國作戰；以後又經過聯合國印尼斡旋委員會的美代表聲明：『由美方援助共和國對共黨作戰。』荷蘭方面也由外長邀請印尼政府『重新談判』荷印共同聯合鎮壓共黨等問題。另一方面，半月來印尼的戰事也證明共黨已在不斷潰敗中，起事的工業重鎮末里粉已被政府軍攻下，牠那『東方狄托』的領袖也已被俘。即從這一反方面也清楚證實：印尼共黨的暴動是盲目的冒險，是在力量對比不利的不成熟條件中，只爲響應莫斯科的『向左轉』而舉行的。即使這些暴動藉着羣衆的支持，沒有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立即壓平下去，而很可能退守山地上，進行長期的游擊式拉鋸戰；但牠最後仍將受莫斯科對美國的關係來決定。假如以後美蘇的妥協實現了，莫斯科的總路線又改變了，那時，東南亞的共黨，也和其他國家共產黨一樣，勢將放棄極左的盲動主義。無論從那一點看，這些暴動都是無出路的。但我們由此又可多得到一次的證明：印尼共黨（和其他國家共黨一樣）只是莫斯科的應聲蟲，羣衆運動只是他們的工具（或政治資本），用來和資產階級帝國主義做買賣的。遠東的殖民地解放運動及歐洲的工人鬥爭操縱在他們手裏，就只能造成一種大災難，造成人類歷史當前的最大的危機！惟有脫離這個錯誤的領導，在一個真正代表殖民地人民利益的新的革命政黨領導之下，才能順利地完成反帝的任務，澈底走上解放的道路！

模的鬥爭之火中了。

日本警察總部是忙於撲滅這個火焰，開始對工人階級戰鬥，並慌張地要求機動性的配備。北海道的札幌城國家鐵路局，在九月三日一天之內，便解雇了三百九十九人，逮捕了六百六十人。民主黨，協同黨，進步黨，以及社會黨的右派，正在用各種方法破壞罷工，麥克阿瑟在考慮一個更嚴重的步驟。究竟這個罷工浪潮能夠維持多久？或者會不會再進一步的擴大？這主要看日本工人階級的領導力量。在這次鬥爭的過程中，工會的領導層，已經顯示出分裂的徵兆。如全遞工會，以土橋爲首的左派，已經在全遞中爭得多數，像這種分裂，還只是社會黨左右兩派黨內分裂之在工會領導層下的表現而已。這些所謂左派人物，他們領導工人鬥爭，與工人階級鬥爭的原本的利益，沒有絲毫共同之點。他們的目的，乃是藉助工人階級的力量，討取資產階級的青睞。史大林黨在戰後日本工人階級中，其力量無疑是增大的，但是他們過去都在機會主義的路綫上向麥克阿瑟低頭，今天爲了增加莫斯科的外交力量，正帶着盲動主義的精神接近工人，將會和社會黨左派一起，分工合作，把工人運動引導到錯誤的道路。日本工人階級的真正勝利，還需要建立一個正確的革命領導。

歡迎長期訂閱

郵匯(或郵票)金圓券一元開立訂戶，照每期售價八折優待(平寄郵費在內航掛寄費另加)款盡再行通知。

中共的新政協與土地改革

王景波

我們早就指明過，中國共產黨所執行的政策，與史大林主義一般地在世界各國所施行的一樣，簡直是無原則的：時而階級鬥爭又時而階級合作；時而軍事冒險又時而政治投機，時而爲友又時而爲敵；頂民族愛國主義的面貌而秉承克里姆林宮的意旨——翻過來覆過去，無非以克里姆林宮官僚利益爲依歸，而每一轉變的步驟恰與當時當地的羣衆運動相違背，即當進攻時它用上層的政治投機在羣衆中散布妥協的幻想；當退守時，它用軍事投機以發洩羣衆的憤氣，——這樣的一進一退，一來一往，便毀壞了羣衆運動普遍的發展，加深消沉的程度。

如果要說史大林黨有政治路線的話，自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它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就是依據一定地區的鄉村以軍事游擊作政治妥協的要挾。這種割據式的鄉村游擊戰的生存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政治的黑暗與農村的破產。因爲政治黑暗，城市一般小資產者（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對現狀不滿而又無法抵抗，便跑到鄉村依附游擊戰去；有了農村的經濟破產，史大林黨便可依據失業的貧苦的農民作巡迴無已的游擊戰。農民本是無政治遠見的，中共的附和，便把割據一定地區當作小天地而鼓舞歡呼的作『英勇而偉大的』鬥爭。

這種鄉村割據政策，這種軍事投機的游擊戰，沒有勝利的前途，我們也早就指明過。因爲這種游擊戰放棄了城市的領導，放棄了全國範圍的政治運動，放棄了城市與鄉村羣衆日常生活的鬥爭，即初步組織羣衆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鄉村的割據或巡迴的游擊戰不能激發城市的革命，只能引起城市工人的等待與消沉及小資產階級羣衆之投機的幻想。即專從農民鬥爭方面來說，農民的英勇戰鬥及堅強抵抗，僅足以證明中國革命在鄉村保有龐大的潛勢力。但史大林黨自一九二七年失敗後在鄉村所發動的游擊戰爭只不過巡迴的部份的發洩並消耗這些潛勢力，却不能以此爲主力推動中國革命走上勝利的道路，這已由二十年來付了很重的代價得來的經驗證明了。

一九二七至一九三四年，以江西爲中心的蘇維埃運動，曾經是轟轟烈烈，煊赫一時，並在瑞金建立了『中央蘇維埃政府』，但鄉村造反，城市仍可屹然不動，終於抵抗不住從城市來的經濟封鎖和軍事圍攻而實行『長征』，逃往西北，接着挑起『西安事變』，恢復『國共合作』，以『抗日救國的聯合戰線』來接續它政治的絕路，掩飾它的失敗與投降。抗戰期間，延安的聲名也曾洋溢乎中國，結果只落得抗戰停止後一次大的政治投機（重慶的政治協商會議，南京的和談）。抗戰『勝利』後，史大林黨的軍事勢力確是大大增長了，佔領區的面積也比江西時代擴大了，甚至『人民解放軍』也能攻打

城市了，但迄至現在——濟南攻下後，政治上依然無出路。中共的「五一號召」——召集「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就是表明軍事割據和游擊戰爭沒有政治出路，不得不重申它的階級合作的政策而向「工商界各人士」求援。

中共的「五一號召」開明義使說：「在造謠公司中央社的騙人政策下，白區的人民對於解放區很模糊，對於新民主主義感到有點困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表現得更顯明」這裏表明兩點：一點是中共自供在足以影響全國的各大城市（即它所謂白區）中的人民還在「中央社的騙人政策下」，受不到它的政治影響；另一點是要請「工商界各人士」不要「困惑」，新民主主義裏沒有階級鬥爭，主張「勞資兼利」。「五一號召」通篇沒有對「白區」的工人號召什麼，只是對「白區人民」，尤其是工商界各人士「解除「困惑」，盡量表白「解放區」的工人如何具有犧牲精神，努力增加生產，這也是很可重視的一點。

「五一號召」第四條說：「全國勞動人民團結起來，聯合全國知識分子自由資產階級各民主黨派，社會賢達，及其他愛國分子，鞏固與擴大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這種「統一戰線」可以說無所不包，剩下可反對的也就太少了！可是在現局勢下，即在沒有廣大羣衆政治鬥爭的情形下，這種號召可以說一點力量也沒有，只落得流亡香港的政客們一聲喝采而已。

但是，爲着進行這種妥協政策，便必須放棄鄉村的土地鬥爭，這是必然的邏輯的結果。因爲鄉村的土地鬥爭不僅是與「階級合作」，「勞資兼利」的原則不相容的，而且會引起「工商界各人士」的「困惑」。所以中共自「五一號召」的前後就藉口「準備工作不備」，在中原區停止土地改革的實施，一時在鄉村傳遍了妥協的空氣，許多原來因「鬥爭」「清算」「爬牆」而避居在城鎮的豪紳地主，都被邀請還鄉，以維「人望」。

我們記得去年雙十節中共曾經很莊重地頒佈它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並且三令五申雷厲風行，用意是在爭取農民羣衆以擴充它的游擊戰的基礎。這舉動，當時頗能引起人們的注視，甚至有人代爲宣揚說：「這一土地改革，其力量將勝過百萬雄師，將有可能使中共在內戰中處於不敗的地位，甚至還有可能在積極短期內使中國的內戰形式發生根本的變化，因而使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施復亮）但我們當時却指明：「根據江西時代的歷史經驗，中共的土地改革既已當爲換取統治階級的合作而成了「零找」

，則它這次的「土地法大綱」也就很有可能變成未來謀取合作的犧牲」。本刊二卷十二期：鏡微）如今果不出我們所料！農民是爲土地而起來鬥爭的，爲着謀取與「工商界各人士」的妥協而停止土地改革的實施，恢復豪紳地主的「資產」，就必然失却被壓迫農民的擁護。

中共既避開了城市的工人運動，又失了全國政治運動的領導，又放棄了農民鬥爭的基礎，今後就只剩下「人民解放軍」了，也就是說，就只剩下更單純的軍事投機了。史大林黨一定很自信：「人民解放軍」已經很強大，足夠作政治投機的資本，不妨暫時停止土地鬥爭以謀取與地主資產階級做政治的妥協。但是如果站在單純的軍事力量的對比上軍事技術就佔很重要的地位。在這一點上，我恐怕「人民解放軍」還抵不過有強大後援的「中央軍」。況且無論什麼軍事力量最後還是取決於它所依附的社會基礎之決定的政策哩。

過去開封一度被攻破，及最近濟南被攻下，證明史大林黨已從統治階級政治腐敗和鄉村不安中創造了很大的軍事勢力，它這兩次的軍事勝利都是很大的誘惑作用。但根本問題還是在政治的出路。沒有依據一定社會階級的獨立政策，及依此政策所團聚的廣大羣衆的覺醒與團結，即便攻下南京也還是混亂而不能造成革命勝利的。

我們知道，史大林黨是要以軍事的拼命換取政治的投機，即使它的軍事的聲勢號召「新政協」，以尋找它的政治出路，殊不知那種上層勾結的垃圾箱的新政協除公開表示它對革命的背叛外，沒有任何前途。

五一號召第五條說：「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行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試問現在有什麼真正的民主黨派和人民團體？所謂「社會賢達」，不過是官僚政客的代名詞。這種「新政治協商會議」即使召集起來，也只是分贖會議，如上次在重慶所召開的一樣，專門討論地盤與權位問題罷了。

由人民代表大會來解決國是，我們是贊成的，但我們反對雙方無出路的戰爭，同時也反對史大林黨無出路的軍事拼命，反對它撇開工農羣衆而進行上層投機的「政協路線」，反對分贖的「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要一個建立在於以城市爲領導的羣衆鬥爭的基礎上的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由此大會成立一個排除一切反動勢力的工農政權！（一九四八年十月初）

史大林主義的黨制

克林姆官與各國共產黨的關連

紀芬

(編者按：這可以說是紀芬先生論史大林主義的第四篇文章，第三篇即本刊上期登載之「南斯拉夫敲響了新民主主義的喪鐘」，因收入「南斯拉夫特輯」中，故未註明，希讀者注意。)

史大林主義的橫暴的官僚主義與制，在近二十年來的國際無產階級運動中，久已成爲一種最惡毒的疫病。牠所憑藉的主要手段便是賄賂、格·別·烏·(秘密警察)的威脅，與公然的說謊和偽造歷史。這種專橫的制度與第二國際改良派組織的弛鬆的民主主義俱樂部式黨制形成一個明顯的諷刺的對照。當然，我們並不是說，第二國際沒有官僚主義之存在，恰恰相反，上層機關之趨向官僚主義化與整個組織之過分弛鬆是同時發展的，特別是在第一次大戰之後，在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日趨崩解，改良主義與民主主義之花也日趨枯萎的時候，西歐各國的社會民主黨上層的機會主義領導，也日趨於官僚主義的硬化，黨內一切革命的呼聲都遭受排斥和窒息。但西歐社會民主黨墮落的重大物質來源却是帝國主義的剝削利潤，因此這種利潤因資本主義社會的崩解而突然減少，雖然一方面促使工人貴族用官僚主義的方法來保障自己的一份利益，以抵制大多數失去改良生活希望的工人羣衆底革命的不滿，但另一方面，正因爲失去了緩和羣衆不滿的改良主義槓桿，社會民主黨的上層領導才始終無法阻止內部黨員羣衆的左傾和民主主義的要求。這就是說，牠本身物質基礎的削弱已剝奪牠走向極端官僚主義的支柱。

史大林主義的黨制却在完全不同的社會基礎之上，牠的主要階級根源是蘇維埃的新興工人貴族，這個貴族層的主要物質基礎是以蘇維埃國有財產管理人的資格，竊取國民收入的一個重大部分，爲了確保這種剝奪的利益，牠使首先要保持牠的永久的官僚特權地位，結成一個頑固的官僚集團來抵制一切現狀的變革與革命的批評。因此，牠與社會民主黨官僚主義不同，假如後者寄生在舊資本主義制度的崩解上，前者則寄生在新生社會主義經濟的過於幼弱和緩慢生長的條件之上，而這個條件因爲受了孤立和落後環境的限制，更顯得嚴重：一般文化水準之低落與常備軍之保持竟成了官僚主義的最有力的槓桿。蘇維埃官僚所不斷賴以平衡其不穩定基礎的手段便是利用恒久的帝國主義包圍的威脅與蘇維埃下層人民的「孤陋寡聞」來進行恐嚇、說謊、欺騙、並剝奪他們的基本民主權利。

因此，社會民主黨及改良派工會的官僚主義，隨着資本帝國主義的崩解而崩解，史大林主義的官僚主義基礎則隨着蘇維埃生產力的發展，一般物質

和文化水準的提高而日趨動搖、削弱和不穩定。在這一意義上，社會民主黨的官僚與蘇維埃官僚的基礎是同樣不穩定和脆弱的，所以牠們對於下層工人的革命批評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都同樣害怕到死。但史大林主義官僚却較之社會民主黨的官僚保有更強有力的武器來保護自己，那就是——蘇維埃的國家機關。牠憑藉一個勝利的無產階級政權，較之社會民主黨單純憑藉工會及資本主義的殘破機構，當然對革命能發生更大的抵抗力。

這一點非常深刻的反映在墮落了的第三國際與第二國際對其各國支部的關係上。第二國際從頭到尾僅是一個報道和通訊的秘書處，牠的最大的領導黨——德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國際會議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作用與其說是物質上的，還不如說是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影響。這種極端鬆弛和缺乏集中的國際組織當然一方面可以滿足各國支部的「獨立創意」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大大助長了民族的保守主義傾向，而這一傾向與貴族工人的物質基礎是不可分離的，牠產生了第二國際底「民主主義」黨制的對立物——「民族」領導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從各國社會民主黨中產生出來使最後使第二國際的全部組織永遠陷於瓦解。

第三國際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是在組織上矯正了第二國際的極端民主主義傾向，確立了民主集中的黨制。但不幸這個黨制與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原則一樣，隨着十月革命的被販賣而被賣了。這就是說，任何正確的原則或優良的制度都不是生長在真空裏的，牠們都要受一定的物質環境限制的，十月革命的貧弱和孤立的環境保持而且再生產了一切官僚主義墮落與黑暗條件，這一墮落傾向最初侵入蘇維埃機關，自一九二三年之後，便迅速腐蝕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生機。既然第三國際的產生是以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爲基礎，俄國布爾什維克黨使天然成了牠的領導黨，而這個黨向官僚主義的墮落也就是第三國際墮落的先聲。

蘇維埃官僚層爲了確保牠的特權地位，牠首先就要在蘇維埃和黨內儘量扼殺任何民主的批評。牠爲了完成這一反動工作竟利用了布爾什維克民主集中制中「集中領導」的偉大機能，這在歷史上形成一個不可忍受的諷刺！現在許多受了史大林官僚主義損害的人，忘記官僚主義本身的物質基礎

企圖從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中，找尋史大林派黨制產生的根源，而且最壞的便是因此發生了對於社會民主黨歌頌時代的強烈憤懣。事實上企圖拿第二國際在資本主義和平發展時代的和平的、民主的組織方式來對抗史大林主義的官僚集中，不備顯得無力，而且顯得陳腐不堪，如果拿來解釋民主集中制的「弊端」則更是荒唐。至少，在資本主義沒落時代，在戰爭和革命的時代，布爾什維克是認真表演過一次奪取政權的，民主集中制之富於彈性，在十月革命中嚴重顯現中表現得最精彩。四月提綱的爭論，雖然列寧差不多以一個人來對抗中央委員會的全體，但畢竟充分的黨內民主却給了他一個勝利的機會，十月暴動之前夜，往後，在布列斯托和約的劇烈爭論中，列寧都以同樣的手段獲得正確的集中意見的機會。全部十月革命史向我們證明，沒有充分的黨內民主便不能有正確的意見集中，沒有集中的領導便不可能有一致的行動，在十月暴動之前夜，當季諾維也夫，加民諾夫企圖破壞黨底一致行動的紀律時，列寧才嚴厲地主張開除他們出黨。這就是列寧黨的民主集中制！

哥降斯特叛變之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通過一項決議：因鑒於蘇維埃政權的危急，暫時停止黨內一切小組組織的活動。蹩腳的歷史家，如蘇瓦林之流便拿這一點來證明：這是民主集中制自動地生長為官僚主義的制約指標。多麼淺薄！他了解，不是民主集中制本身，而是蘇維埃的貧弱和殘破的物質基礎一時限制了「民主」的廣度，我們並不否認，史大林的「特爾米多官僚主義」基礎就是由這些蘇維埃政權的弱點，一點一滴鋪砌成功的，但官僚集中之代替了民主集中畢竟不是「有機的」從此到彼的生長，而是一種強暴的篡奪——一種「級鬥爭」！這種鬥爭在一九二三年正式翻譯成爲「黨內左派反對派對三頭機關的鬥爭」，第三國際的最初派別分化圍繞在黨制問題週圍，這一點就是對「有機生長」論客的一個致命的駁斥。

在內戰期間，蘇維埃政權的基礎被削弱到無可忍受的程度。爲了應急，迫得痛苦地一步一步縮小了蘇維埃內，後來甚至縮小了黨內的民主，保持了常備軍，成立了嚴密秘密警察制度，……這些極宜的政策再加上文化水準過分低落的致命條件，便是史大林官僚主義在革命退潮時，取得全面勝利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史大林首先征服了俄國黨，往後則征服了第三國際的其他支部。蘇維埃官僚因爲握有全部國家機關，牠當然可以順利地把黨轉變爲殘酷的生存競爭的場所；凡是服從克林姆官上層官僚的命令的便可以得到一張黨員證，而一張黨員證在蘇聯就表示職業和生命的安全證；凡是對官方政策表示任何懷疑的，便立即有被開除、追捕、拷問、監禁、和充軍的危險。兩種手段：失業和格，別成爲蘇聯共產黨每一黨員頭上高懸摩克利茲之劍。但假如在聯共黨內，蘇維埃官僚可以直接運用國家機關的強大壓力來望死布爾什維克黨，牠對付蘇聯以外的第三國際支部，便遭逢較複雜的條件。各資本主義國內的共產黨上層份子，大都是憑藉蘇維埃的國家權威和克林姆

官的物質援助來取得和保持自己的地位的，在這一點上，他們當然與克林姆官保持一種密切的、甚至有機的連繫，而克林姆官也就利用這一點來屈服和購買那些廉價的靈魂；但另一方面，當作整個來看，那些支部却是生長於資本主義國家複雜環境中，因此除了受克林姆官的支配之外，還不可免要受本國的資本主義環境影響，換言之，牠是不可置身於本國的「級鬥爭」之外的。

當克林姆官爲了自保而毅然砍斷了自己與布爾什維克的革命傳統之後，牠便不斷使自己的意識與世界資產階級的意識相離和相解，這就使各國共產黨造成了永遠屈於資產階級政治影響的「前提」。因此，我們就並不希奇，在戰前的「人民陣線」時代中，在戰爭的「愛國陣線」中，在戰後的一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各國的史大林黨竟成了社會民主黨的嚴重爭者，或多或少地代替了後者，成爲各國資產階級的奴僕。假如各國社會民主黨的墮落是現在牠們之互相敵視中，那末，受同一「民族主義」支配的共產黨，也不可免要互相發生齟齬，這種齟齬是資本主義民族利益衝突的深刻反映。這種衝突，我們早已在德、法共產黨間發現。現在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在西歐各國）在反美的口號之下，以無比的熱誠在傳佈「保護祖國」的呼聲，這就是牠們完全投降了資產階級「祖國」的表現，第三國際之在戰爭中，亦即在國家主義投降的環境中，被解散並不是偶然的。

但是，有人也許反駁，「無論各國共產黨如何高唱『保護祖國』，至少牠們之始終接受克林姆官的指揮，却是一致」。爲這種「一致」所迷惑，有些人甚至走得過遠，竟認爲各國史大林黨與克林姆官是不可分離的，牠們將在克林姆官的指揮之下，經過許多左右搖擺的曲折過程，一直走到史大林主義之完全征服全世界。這是印象主義者因爲不能了解現象而對現象屈服的可悲實例！這些人根本不懂得，各國共產黨之墮落爲民族主義不僅反在在各國共產黨間的「民族衝突」中，而且還不可免造成了各國共產黨對克林姆官領導的民族主義的離心傾向。當牠們還需要克林姆官的「權威」和物質的支援時，牠們樂於接受牠的指導和格，別，烏的監督，即使這種監督不很適意；但假如牠們已經過克林姆官的聲援，一躍而成了民族的領導者，或已取得某種社會基礎之後，牠們便不能無條件忍受克林姆官的過份干涉，牠們便開始爭取獨立地位，牠們便自由調節牠們國內的社會壓力。一句話，克林姆官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不能一相情願地把共產黨永遠屈服於其外交軸心之內的，各國共產黨愈順利地取得本國的民族主義聲望，便愈難容忍克林姆官底偽善的「國際主義」降線。南斯拉夫的例子便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明證，而我們把南斯拉夫共產黨的「反勢視」史大林的例子便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明證。現在他們應該清楚的懂得：南共的民族主義的離心傾向已證明「共產國際的復活」報局」的成立只是「共產國際」的「殞屍復活」吧了！

自由主義的組織形式全部分析中，只能得出這個結論：假如第二國際通過極端的腐蝕，通過極端的官僚主義集中中的組織，促成了各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墮落傾向，最後的分析起來，這種墮落傾向在理論上以「一個社會主義」爲出發點而以「民族主義」的分崩離析而告終。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八日

信箱

一個力量薄弱的革命黨要怎樣才能形成一個羣衆力量

讀者先生：

上期貴刊討論的關於史大林黨之所以能獲得羣衆擁護的問題，就其客觀的根源，加以詳細的分析，並從歷史上以至自然科學的領域中來敘述一個真理的命運，指出真理在開始時往往是孤立的，沒有力量的，遭受壓迫的。所以一個勇於追求真理的人，必須摒棄一切勢利的觀念，不懼怕任何的壓迫，這些都不成問題。只是有一點，就是關於真理之如何方能獲得羣衆的擁護，形成物質的力量這一點，先生沒有詳盡地提到。正如你們所說的，今天史大林黨所領導的政策是機會主義的，而你們所贊成的第四國際的主張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但是後者無論在中國在國際上的力量還是很薄弱的，那麼它們要怎樣才能形成一個羣衆的力量呢？你們只是簡單地指出，歷史上『只當革命不斷向前發展，一直進到高潮的時候，代表真理的黨派，才能獲得廣大羣衆的擁護，而達到勝利』。像這樣解答問題，我以為還是過於簡單而嫌抽象。這也許是因爲篇幅的限制。但是我却很希望貴刊能在這個問題上多化費一些篇幅！因爲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思索了好久而得不到結論。

我會這麼想的：今天的中共，既然擁有如此廣大的羣衆基礎，只因爲它的上層領導政策的錯誤，而斷送了中國的社會改革。假如能夠把它的上層改良一下，即是說，調換一批領袖來實行革命的政策，那麼豈不是把現成的革命力量保全了下來。因爲這樣與羣衆的惰性以及傳統心理（尤其是農民）是相適合的。如果你要他們從一個舊的領導下面走向一個新的領導，一定要化費了很大的氣力。（我以為這也是新的領導在中國遲遲未形成力量的原因之一）但是我不知道在歷史上有沒有先例？另一條路便是由舊的集團內部自行分化，下級幹部和羣衆圍繞到新的領導下來。但是這需要在那種條件底下才有可能？是不是要等到『革命的高潮』？到那時，他們爲什麼會拋棄錯誤的領導的？這個現實的政治問題，希望先生能詳盡地答覆！此致
人類解放敬禮！
讀者李伯南敬啟九月一日

伯南先生：來信所提出的一些問題，正如信尾所說，是『現實的政治問題』因此，我們很願意就本信箱所容許的篇幅內盡量加以解答。

第一，你既承認『今天史大林黨所領導的政策

是機會主義的，……第四國際的主張是正統的馬克

思主義』。問題僅在於『後者無論在中國在國際上的力量還是很薄弱的，那麼它們要怎樣才能形成一個羣衆力量呢？』爲了正確地解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從歷史上舉幾個例子來看看。遠一點的例子是法蘭西大革命中的雅各賓黨。這個黨在大革命前是不存在的，僅僅在革命爆發後才發生并發展起來。但它不儘很快地『形成爲一個羣衆的力量』，且成了大革命的樞杆，澈底完成了當時歷史條件所能允許的革命任務。其主要原因是由於這個黨堅持革命的立場，能代表當時巴黎下層羣衆及全國農民的利益，因而逐漸地，也可以說是很快地獲得了他們的擁護，『形成了一個羣衆的力量』，解決了革命的歷史任務。倘若你要詳細地或具體地瞭解各黨在革命過程中是怎樣形成一個羣衆力量的，那就只有詳細地去研讀法國大革命的具體經過了。最近的而且也是最典型的例子是俄國的布爾塞維克黨。這個黨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前雖已具有頗長的歷史，但直到二月革命後它本身還是一個小黨，如果依照你的話來說，它當時『在俄國的力量還是很薄弱的』（更不用說它在國際上的力量了）。可是從二月革命爆發起，尤其是從列寧回到俄國提出著名的『四月提綱』起，這個黨便一步一步地并很迅速地獲得羣衆的擁護而『形成爲一個羣衆的力量』了。如果你要詳細地或具體地瞭解布爾塞維克在當時是『怎樣形成一個羣衆的力量』的話，那也只有詳細地去研讀俄國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所經歷的具體情形（這情形詳載於托洛茨基著的『俄國革命

史』中）。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兩個要點：（一）列寧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無論在理論和政策上都是代表正統的馬克思主義，堅持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從一九〇三年起即頑強地進行了反社會革命黨，尤其是反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鬥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更站在國際主義的觀點上，無情地反對第二國際的及其他小資產階級的各種各式的狹隘愛國主義及和平主義；到二月革命後，列寧更根據他一貫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堅決主張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此來完成遲延的民主任務，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二）正由於列寧有此種一貫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適應革命時機的正確主張，所以布爾塞維克黨便能在革命局勢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地獲得工農羣衆的擁護，因而『形成了一個羣衆的力量』，得以領導革命走上勝利。例如自布爾塞維克的『四月臨時大會』決定無產階級準備奪取政權，隨即要求『一切政權歸蘇維埃』，打倒十個資本家的總長，立即召集立憲會議，解決土地問題，停止戰爭（所謂『民主，麵包與和平』）等的口號後，布爾塞維克黨在工農羣衆中的影響便有如狂風暴雨般地蓬勃起來。因此，不到二個月，即到六月，布爾塞維克黨便已經由一個小黨而變成爲擁有廣大羣衆的大黨了。正因此也就引起了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異常仇視和壓迫，造成了『七月事變』乃至哥洛尼諾夫的暴動。但在『七月事變』和『哥洛尼諾夫的暴動』中，由於布爾塞維克黨的政策之正確，反而在羣衆面前盡量暴露了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之極端卑鄙的反動與無能，因而更進一步證實了布爾塞維克的革命主張之完全正確，結果，在壓毀哥洛尼諾夫暴動後的彼得堡蘇維埃選舉時，布爾塞維克竟獲得了絕大的多數，托洛茨基被

選爲蘇維埃主席，——布爾塞維克黨就這樣在絕大多數的工農兵羣衆擁戴之下踏上了政權。即以列寧和托洛茨基所創立、領導的第三國際來說，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過程中從第二國際分裂出來，經過好幾年它在各國的擁護者簡直少得可憐。但自俄國革命勝利後，尤其是自大戰結束歐洲各國進入革命的局勢後，德、日、匈及法國等的共產黨，便很迅速地生長起來，形成了一個羣衆的力量。這裏又一次證明：當革命局勢到來時，即令是一個小小的或力量很薄弱的「革命組織」，也會在很短暫的期間「形成一個革命力量」的。

以上所舉，限於西方的情形。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類似的例子。如孫中山先生最初所創立的同盟會（這在當時是一個革命的組織，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只能得到極少數的人贊成，比起當時康梁所領導的改良派來，在政治舞台上簡直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團體。但到了日俄戰爭引起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後，由同盟會而改組的同盟會，使很快即獲得了知識青年和某些羣衆（如華僑及國內青紅幫和新一軍等）的擁護，「形成一個羣衆的力量」，最後推倒了滿清政府。後來的中國共產黨，從一九二〇年成立起直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卅」前夕，它的力量還是很薄弱的。但當「五卅」事變（即第一次革命）爆發後，這個「力量很薄弱」的「革命同盟會」和第二次革命中的共產黨之「革命同盟會」的力量，我們這裏無法詳敘，請你從中國過去的歷史過程中去尋求它們的具體情形吧。

假如能正確地具體地理解上面所舉出的一些史例，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也就等於具體地解答了。現在讓我們總結起來說一遍吧：凡是堅持革命主張而代表羣衆要求的黨，在我們這時代，即凡是能堅持革命思想的「力量是很薄弱的」，但當一旦革命局勢到來時，它便很有可能獲得羣衆的擁護而「形成爲一個革命力量」的。因爲在革命潮流的進展過程中，凡是羣衆注目的黨派都不可免地要在羣衆面前耳

益暴露它們的背叛與無能，而被羣衆所拋棄（實即最壞對那些黨派的改良幻想）；而真正革命的黨則由於它的主張正確，經過事實的考驗，必然會日益獲得羣衆的認識與擁護，領導革命向前邁進的。假如你已確信「第四國際的主張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那就不管它在今天在中國在國際上的力量是如何薄弱，但當新的革命局勢到來時，它是會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布爾塞維克黨一樣，迅速成爲羣衆的力量。反之，不管現時史大林黨在中國及國際上具有如何強大的力量，一到革命潮流中就不可避免地要被羣衆拋棄，遭到俄國社會黨和布爾塞維克的同樣命運的。假使你認爲這個答覆「還是過於簡單而抽象」，那就只有請你去詳細地去研究我們前面所舉的一些史例了。但我們相信，你越是研究事實，將越是發見我們的解答是正確的。

第二，你說：「今天的中共既然擁有如此廣大的羣衆基礎，只因爲它的上層領導政策的錯誤，而斷送了中國的社會改革。假如能把它上層改良一下，即是說調換一批領袖來實行革命的政策，那麼豈不是把現成的革命力量保留了下來。因爲這樣與羣衆的惰性以及傳統心理（尤其是農民）是適合的……。」調換一批領袖來實行革命的政策，在一個真正民主集中制的革命黨內，不但是絕對應該的，而且是十分可能的。但現時史大林所控制的各國「共產黨」（中共在內），早已殺死了任何的黨內民主，而墮落成爲純粹的官僚集中制的集團，久已沒有任何「改良」的可能，即絕對沒有「調換一批領袖來實行革命的政策」的可能了。因爲要「調換一批領袖」，首先就要排除史大林本人及其在中國的代理人毛澤東周恩來等。試問：這樣的「調換」在聯共及中共內有絲毫的可能嗎？實際上不但絕沒有可能，即是有人敢於在聯共及中共內提出這樣的問題，他立刻將遭到身體的毀滅！過去無產階級黨內部的無數次的「清算」，整代老布爾塞維克的被槍殺，以及中共黨內的不斷「肅清」，便是史大林所控制的共產黨之絕對無法「改良」的鐵證！不但史大林的官僚集中制的黨內絕對無法「改良」，就是

只有「民主」而無「集中」的第二國際的諸黨，也沒有任何「改良」的可能了。因爲一個根深蒂固的或「病入膏肓」的機會主義而同時又缺乏「民主集中制」（這也是機會主義得以行走無深的根源之一）的黨，除了對革命發生破壞作用外，是命定地要與一切反動腐化的事物一同滅亡的。在這一點上，史大林所控制的各國「共產黨」，與第二國際的諸黨是完全相同的。爲要「保全」現成的革命力量，也只有更堅決地反對史大林黨的「機會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政策，並儘可能地建立新的革命領導來代替它，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羣衆的惰性及傳統心理」，是必須加以打破的。但要打破它們，也只有首先打破那個專門依賴「惰性及傳統心理」的史大林黨。至於「從一個舊的領導下面走向一個新的領導，一定要化費了很大的氣力」，那是歷史的悲劇，或者可以稱之爲歷史的浪費吧，但這是無法避免的。總之，你想以「改良」的方式來改造中共的領導，不但在歷史上沒有先例，而且今後也是一種純粹的幻想。

第三，你最後說：「另一條路是由舊的集團內部自行分化，下級幹部和羣衆團結到新的領導下來。」——這不但是唯一可通的，而且是不可免的道路。至於你問「這需要在何種條件下才有可能？」對此我們可以簡單地答覆：在一個新的革命領導已經在事實上存在，同時又有了相當的革命局勢（如俄國二月革命後的情形），那時傳統的舊黨（共黨及社會黨）的內部，就要「自行分化」，「下級幹部和羣衆」就要「團結到新的領導下來」的。現時法國的局勢已開始接近這種前途，法國社會黨內部的自行分化，其下級幹部和羣衆之傾向國際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就是一個象徵。在下一歷史階段，即法國走上真正的革命局勢時，法共內部也必然要發生分化，其下級幹部及其所影響下的羣衆，也必然傾向國際共產黨，至團結到它的領導下來的。至於「下級幹部和羣衆」爲什麼要拋棄錯誤的領導的？「你這問題的本身即包含了答覆，因爲他們在實際的鬥爭過程中發見了他們「領導」的「錯誤」，所以才自覺地「要拋棄」它哩！

一九二九年五月

中國往那裏走

旭東

中國的局勢，在美蘇矛盾日趨尖銳的影響、與國共戰爭愈益激化的衝激下，經過戰後三年來錯綜複雜的發展，現在又臨到最嚴重的危急關頭了！在這個危急關頭面前，絕大多數的人民都顯出極度的驚慌、恐懼、焦急，某些人們甚至感到『末日快臨』的絕望；而另一部份人則表現興高采烈，以為一個『新的時代』已降臨到他們的頭上，正在忙着準備去享受『勝利』的果實。但我們却仍然本着斯諾諾薩『不要哭，不要笑，但要理解』的箴言，願將當前局勢的癥結加以科學的探討，替已經受盡痛苦、磨折與犧牲而又感到徬徨的人民大眾指出一條可靠的出路來，以為他們努力奮鬥的標的。只有人民大眾『理解』了他們的地位和出路，並決心用自己的力量去打開這一條出路，中國才能從現時的死港中解救出來，走上一個真正的新時代。

國民黨統治所遭遇的危機及其掙扎之道

自最近國民黨政府的幣制改革迅速遭逢慘敗，同時連續喪失濟南、錦州、長春、瀋陽，『自動』放棄鄭州、開封，再加上共軍圍攻徐州、蚌埠等等，——這一連串的重大事變所造成的新社會經濟和政治危機，簡直有如火山立將爆發，全國突然陷入前所未有的緊張、惶恐和錯亂中；物價空前暴漲，食糧異常缺乏，搶米風潮遍及全國；由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處撤退的人羣宛如潮湧，彷彿十年前日帝進攻時的『逃難』情形；而留在這些城市的人們亦惶惶不可終日；幾乎全體的工人階級及公教人員都無法生存，而以怠工、罷工和『請假』等手要要求立即改善待遇；成千成萬的難民從北方『陷落區域』蜂湧到南方各城市來，日夜在飢寒交迫中掙扎；美國倉促地撤退在華的僑民；政府當局更表現張惶失措，暗地裏討論『遷都』問題；——這一切都充分暴露國民黨的統治已面臨到一個極度嚴重的危局了！這樣的危局，只有俄國二月革命前夕的情形差堪比擬，這是中外歷史上所極不常見的。

但國民黨的統治之所以陷入這樣的險境，難道果如一般人所說，單純是由於共黨的軍事進攻嗎？固然，共黨的攻擊給了國民黨政府以直接的威脅，但其最根本的原因還不在此，而是由於它所代表的社會階級基礎及其一貫的反動政策所積累起來的。這個黨自一九二七年壓平革命建立其軍事專政後，便只是代表極少數的上層資產階級地主和官僚們的利益，而以全體民衆，尤其是工農羣衆的利益爲其犧牲，因而自身日益陷於孤立、腐敗與無能，并由此招致了日甚強盜的兇猛進攻，整個民族幾淪於奴隸的慘境！自美帝以原子彈屈服日帝後，國民黨政府戴着『勝利』的旗幟回到『收復區』來，當時久受敵僞蹂躪的一般民衆，確曾一度對它表示歡迎，把政治經濟的民主改革希望

寄托在它身上。但國民黨政府當局對於民衆希望的答覆，除了發表幾篇空洞的民主改革或『還政於民』的宣言和演辭之外，却是變本加厲地剝削和壓迫人民。例如它一方面宣佈減租減稅，但同時却加緊徵糧徵食；一方面承認人民的民主自由，同時又指使特務任意逮捕人民；一方面以『四強之一』自居，同時又對美帝卑躬屈節，縱容美貨傾銷、美軍橫行；尤其對於從敵僞接收下來的財產，官僚和軍閥們所表現的貪婪、腐敗與無能，更是驚人，以致人民在八年流血抗戰中所獲得的唯一成果，其中大半不是被敗壞，就是變成他們盡情揮霍的私人物了；特別是所謂『五大家族』，因肆無忌憚地收奪敵僞財富而突然膨脹起來，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資本集團，壟斷了國家一切重要工業、金融、交通乃至國內外的主要貿易，窒息了全部的國民經濟；——在這一情形底下，不備一般民衆對之發生了強烈的反感，就是一般資產階級份子乃至當權黨內部，也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利害衝突，產生了一種新的劇烈的離心傾向，而國民黨政府也就從此愈來愈陷於孤立和險境了。今天國民黨統治所遭遇到空前危機，僅僅是它過去的全部政策及一切措施邏輯地發展起來的後果。

但在這種危機底下，國民黨政府是怎樣謀渡過它的難關，挽救它當前的危局呢？它的全部希望還是攔在美國的援助之上。但美國的援助全是站在它的帝國主義利益之上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爲了統治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尤其爲了對抗蘇聯，爲了準備一個新的大戰來摧毀後者，它是不惜代價扶植任何的反動統治以抵抗蘇聯及其外交工具——共黨的勢力在各國發展的。正因爲如此，美帝在過去幾年來，確曾以龐大的物資和軍火援助了中國的國民黨政府，幫助它渡過了不少的難關。可是雖然有美國如此龐大的援助，國民黨政府仍然是愈來愈陷於險境中。這就迫使美國的一部份統治者們也深深感到中國現政府之過於腐敗與無能了。所以最近華盛頓對於國民黨政府最高當局之緊急求援呼籲，除了宣佈『美國援華政策不變』外，也帶着冷淡而教訓的態度宣稱：『……中國的主要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在這些問題未解決前，美國即使全面援華，亦無多大用處』。（華盛頓廿二日廣播）這意思就是說，美國是準備繼續援華的，但國民黨政府自身的過份腐敗與無能必須加以若干改善，否則雖有更大的美援亦無效果。但中國現政府改變其腐敗與無能，其困難無異於要求實現奇蹟。在這種僵局下，其最可能的結果將是：美國答允更多的『援助』，但同時派遣大量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顧問到中國來，在『監督有效實施美援』的名義之下直接控制中國一切經濟、政治和軍事的活動，使中國日本化。而其最後目的是：儘可能將國共兩黨的戰局一直拖到第三次大戰的爆發，變中國爲未來美帝進攻蘇聯的遠東方面

的主要戰場。無須說，這是國民黨政府所最希望的。因為這個政府在共黨日益嚴重的威脅下，自身又絕對無法改善，使只能選擇這一最危險的前途了。

中共現時在軍事上的勝利及其在政治上的危機

中共最近奪取了濟南，尤其是奪取了錦州、長春和瀋陽，佔領了整個東北地區，無疑地，這是它在軍事上的一個絕大的勝利。但這個勝利的主要原因，却是由於它的對方的過份腐敗無能，與蘇聯強有力的軍事援助所獲得的。例如濟南吳化文和長春瀋陽絕大部份將領的不戰而降，以及蘇聯大量武器的接濟和軍事技術人員的資助等，都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但從政治上說來，中共却是大大地倒退而陷進一個最危險的泥潭中了！這個危險的具體表現，便是它今年五月所發表的公開宣佈放棄土地改革，強調階級合作，保障工商業財產，主張召集「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宣言。這是中共政策的又一次的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在宣佈放棄土地改革下，共黨不但強迫農民將已分得的土地退還地主，且公開表示歡迎一切流亡地主和紳士還鄉，企圖與前者重新合作來反對現政府當局。這不僅是對農民羣衆之直接的背叛，而且是將農村原有的階級矛盾又全部收羅於它自身的體系之中。中共之所以能夠不斷進行軍事冒險，主要原是由於它用土地改革作號召獲得了農民羣衆的拚死支持。它去年十月所公佈的『土地法大綱』，不管如何不徹底，但確曾給了貧苦農民羣衆以極大的鼓勵，因而增厚了它的軍事進攻力量，它最近在軍事上的大勝，一部份原因亦存於此。可是現在它公然放棄土地改革，這在農民心理上必然引起強烈的反感，這種反感繼續和積累下去，再加上地主豪紳的有力作用，勢必使中共控制下的農村矛盾日益尖銳化，使中共在農村的基礎發生根本的動搖。中共宣佈『保障工商業的財產』，這是它討好城市資產階級，希圖與後者『竭誠合作』的一種表示，這是它在鄉村放棄土地改革，表示與地主豪紳合作政策之擴大。這種『合作』政策，在它最近奪取濟南、長春、瀋陽等大城市後，更加被強調起來。但這一政策所包含的危險，較之它在農村的政策更要嚴重得多。因為不但大城市的資產階級比之鄉村地主更為有力，而且工人階級比之農民更具有高度的文化水準和階級覺悟性。中共『保障工商業財產』的政策在城內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將遭到不可救藥的破壞，其後果不俾定必引起工人階級的反抗，而且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產的衰退，造成不可克服的經濟恐慌。

至於中共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僅僅是舊政協路線之一種翻版。即令它能够召集一個『新政治協商會議』，包括各階層各黨派的『聯合政府』，但這也不過是把中國社會中原有的各階級各黨派不可調解的矛盾和衝突放進這個『聯合政府』中加以表演而已。像這樣的『聯合政府』，不但絕不能解決中國當前的任何重大問題，而且命定地要引起新的分化、新的分裂和新的戰爭

的。要想認真而澈底地解決中國的問題，只有成立工農政府才有可能。

我們根據前面極簡略的分析，使已有充分的理由斷言：中共在政治上不但沒有任何勝利的前途，而且還包含了許多致命的危險。「戰爭是政治的延長」，任何戰爭的命運，其最後總是由政治決定的。因此我們又可以說，無論中共今天在軍事上獲得如何的勝利，以及它在將來或會取得更大的勝利，但由於它在政治上腐朽透骨的機會主義，是沒有任何前途的，它在軍事上的一切勝利，都不過是它的全部悲劇中一些插曲而已。

中共之所以陷於這種腐朽透骨的機會主義的深淵，除了它所代表的中國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外，主要是由於它自覺地毫無條件地接受了史大林的領導，變成了史里姆官僚獨裁的簡單的外交工具。史里姆官僚層自放棄世界革命後，其目的的外交政策，便是指使各國共黨時而用政治投機，時而用軍事冒險，希圖以此與帝國主義達到妥協，以保持他們在蘇聯的特權，以苟延他們的殘喘。在第二次大戰後，蘇聯在帝國主義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重重包圍和積極準備反蘇戰爭的形勢之下，史里姆官僚層除了以各種各式的會議和談話『冷戰』等方式與美國直接進行謀取妥協外，便是指使各國共黨用政治投機或軍事冒險為籌碼來促成這一妥協的企圖。但帝國主義者自有它的最頑強的階級意識，勢非達到以新的原子彈戰爭來毀滅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不止。因此，史里姆官僚所有的和談與『冷戰』，都不過是促進和加速美帝的反蘇戰爭的準備而已。因而中共現時在軍事上的勝利，其最大的作用也只能是促進和加速美帝反蘇戰爭的爆發。所以不管史里姆官僚及各國共黨（中共在內）主觀上如何害怕第三次大戰，但他們的全部政策和行動在客觀上却正是推動這一戰爭之加速到來。假如國民政府是客觀上自覺地將中國的內戰拖到第三次大戰的漩渦中去尋求出路，則中共便如盲目地將中國推上這同一的漩渦。國民政府的腐敗無能會幫助了中共勢力的發展和軍事上的勝利，中共的惡性機會主義政策又轉過來延長了前者的統治壽命，但這兩者的『互助』除了替中國民眾造成無比的痛苦、災難和犧牲外，還正在分工合作地加緊將中國推進第三次大戰的深淵，——這便是中國已面臨到一個最嚴重危機的癥結之所在！

中國往那裏走？

依照現時國共兩黨各自依靠的國際後台（華爾街與克里姆林宮）及雙方所進行的全部政策和內戰的趨勢，如果人民大眾不及時團結起來用革命的手段加以強有力的干涉，中國不可避免要被拖到第三次大戰的漩渦中去！為了讓民眾有所警惕，這裏必須將第三次大戰對於中國可能的禍害加以極簡括的指明。第三次大戰果真爆發，固然其主要的火戰場是在西方的歐洲大陸，其遭禍最慘與犧牲最烈的是歐洲大陸的人民，尤其是蘇聯的工人，——那時美帝的原子彈可能將蘇聯的上百個工業城市變成灰燼，在美蘇雙方的陸空軍的拚

死作戰底下，全歐洲將變成爲慘絕人寰的屠宰場。但在東方，中國大陸不可避免地要成爲美蘇大戰的主要戰場：美帝所指揮的日本、澳洲、菲律賓及東方其他國家的軍隊將從沿海蜂湧到中國來，與蘇聯所指揮的軍隊在中國大陸上進行死活的鬥爭，其結果雖不能確測，但中國大部份的工業將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壞，中國人民將有幾千萬被犧牲，是極可能的。誠然，中國及整個世界絕不會因第三次大戰而遭到毀滅，相反地，首先被毀滅的將是克里姆宮最橫暴的官僚獨裁，跟着而來的是各資本主義國家最反動的統治層（美國的統治層在內），人類將從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覺醒過來，走向真正解放的社會主義的大道的。但我們所付的代價却未免過於沉重，太過於慘烈了！

爲要避免人類付出這個最沉重最慘烈的代價，只有各國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壓迫民衆立刻覺悟起來，團結起來，堅決地準備以世界革命來阻止第三次大戰，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才有可能。直到今天爲止，這個可能性還是依舊存在着的。因爲第二次大戰後所醞釀下來的革命勢力（如在法、意

最近國際局勢之展望

紀芬

戰後迄今不到四年，我們在這個資本主義舊世界中，所能看到的，仍只是一幅愈來愈黯淡的背景。一般的說來，國際性的大規模戰爭是已經終結了，但戰爭仍然存在，牠只不過轉化爲許多國家的內戰吧了。我們展開地圖一看，從東歐的希臘，越過中東的巴勒斯坦，再循印度、東南亞各國，轉到中國和朝鮮，差不多全是降落的砲火聲。錯覺的人，或者耽於幻想的人也許以爲這只是第二次大戰的餘波吧了，不久將爲和平所代替。這真是天真的、時代錯誤的想法！

一、美國在準備戰爭

大戰結束之後，資本主義能否爭取一個較長久的『和平時期』，又所謂『和平』到底達到什麼程度，這些都不是主觀的願望所能左右的，完全取決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第一次大戰，大家公認爲資本主義臨死掙扎的初度表現，但從第一次大戰告終（一九一八年）至第二次大戰爆發，中間還隔着兩個年代的『和平時期』，至少從一九二四至二八年，整整四年，歐洲得到那個年富力強的阿美利加資本王國的救助，還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機會。一九二九年那個歷史性的經濟大危機才正式開始把資本主義各國推入兇猛的戰爭競賽場中，但在歐洲，起決定作用的軍事強國（德國）的備戰，認真的着手還是在希特勒登台之後，美國之轉入戰爭狀態則更遲，是由一九三三年羅斯福的新政緩慢地過渡進去的。

最近這一次大戰剛告結束時，在國際上確乎會引起一度預測性的爭論，即資本主義能否循着過去的軌道，重新獲得一個『相對穩定』的機會，歐洲

、越南、荷印及印度等）雖然遭受了史大林式的背叛政策的摧殘，但大部份還是被保留了下來。如果這個革命勢力一旦在新的革命領導（第四國際黨）下發動起來，就大有可能走上勝利來阻止戰爭的。

中國的工人階級及一切被壓迫民衆，尤其是一切革命份子，爲了解脫當前國內戰的極度犧牲和痛苦，尤其爲了避免中國落入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更須要立刻覺悟過來，團結起來，首先要求國共立刻停止戰爭，立刻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實現真正的和平，來解決當前國家一切迫切的重大問題（如土地問題，對外的民族獨立問題及食糧問題等）。爲實現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而鬥爭，不僅是現時中國人民大衆解除內戰災禍及避免陷入第三次大戰浩劫的最可能的道路，而且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道過渡橋梁。

中國是任聽國共內戰繼續拖延到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去，還是同着世界的革命勢力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這是擺在中國一切民衆，一切革命份子面前所應急予選擇的生死問題！

第一道革命浪潮的被放棄，更增強一部分人的『和平』信念。在這裏證明歷史的形式類比與理論的惰性，對於事物真相的研究，發生多麼有害的障礙。戰後一個極短促的期間便使我們明白：資本主義已差不多完全喪失了牠的復興能力了，牠的危機已變成慢性。在沒落時期，支配資本主義經濟機構的特殊規律便是：經濟復興的期間一次比一次縮短，而恐慌的期間則反而一次比一次延長。這次戰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可以說更帶惡性的表現這一規律的作用：歐洲的復興直到今天還遠談不到恢復戰前的水準，美國的『和平復員』所造成的『繁榮』則爲時不到兩年便呈現各種不景氣的徵兆（如對外貿易下跌百分之二十以上，國外投資從八十億減至四十億，呆滯貨物打破五千萬元的紀錄等）。我們只須指出這一切有意義的事實便够了：過去一整年，不僅馬克思主義者，甚至連最保守的華爾街經濟學者和統計學家都爭先恐後的警告不景氣的來臨。資本主義的戰後復興在那樣短促的期間內便又爲另一可怕的不景氣的陰影所籠罩，實在是近代史上所罕見的。但可驚的事情還在這裏：爲了這一不景氣的迫近前途所威脅，資本主義各國來不及復興便又急忙回復到戰時的生產了。這種轉變，不消說，仍然以美國爲樞紐。現在美國的經濟又彷彿廓清了不景氣的陰霾，『戰爭繁榮』又緊接着『和平繁榮』而來，政府又成爲國內生產的最大主顧，失業的威脅又代之以人工短缺，大量存貨又瞬息告罄，總之，美國又要逐漸恢復她的國際兵工廠的地位。美國軍事機構與國內普遍軍訓的擴張，馬歇爾重整歐洲軍備的計劃，都大大促進美國生產轉向瘋狂的備戰化。這種新的發展不僅徹底打破一切和平主義的幻想，而且迫

使我們要把上一次戰爭與第三次大戰爭距離的估算大大的縮短。從這裏自然而然的令我們指出這一現象來補充上述的規律：在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和平的插曲』愈來愈縮短，而戰爭的現象則愈來愈頻繁而且變成慢性。這次戰後蔓延各國的內戰不僅是上一次大戰的餘波，而且還是下一次大戰的序曲，這一頗有意義的現象，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啓示，便我們更確切的測驗舊制度腐朽的深度和廣度。

政治只是經濟的集中。現在在國際政治上，美國無疑處於操縱的地位，她爲了自身的危機所推便，迫得要在國內和國際舞台上，儘可能替自己的戰爭計劃肅清障礙。在國內，戰爭工業的繁榮一時緩和了失業及生活不安的壓力，使戰後風起雲湧的工人鬥爭趨趨沉寂，工人階級的政治覺醒過程自然也就受了阻礙，在這次美國大選中，美國工人階級之仍然繼續從民主黨與共和黨中選擇自己的候選人，這就證明牠在政治上仍然是落後的、易欺的。杜魯門的政治攻勢恰好就建築在美國工人階級這一弱點之上，他巧妙的以空口允諾來鞏固工會官僚的地位。後者則極力充當白宮反蘇反共的招兵軍曹，並積極打擊工會中的左派來酬答主人。塔夫脫的反勞工法案，反黑人法案，『不穩份子』的肅清令……這一連串的反動措施，與這次大選中所暴露的限制小黨競選，都在證明美國政府正存在有系統的摧毀國內的反戰勢力。另一方面，與這種政治攻勢同時并行的發展的便是美國迅速走向普魯士式的軍國主義化以及軍人閥的形成。在美國歷史上，軍人之形成爲一個特權層還是在這次大戰當中開始的，麥克阿塞在日本已成爲羅馬帝國式的總督，逐漸成爲一種專橫和獨斷的軍閥系統，馬歇爾則直接操縱了美國內政和外交的重要權柄，他可以阻止總統的任何違反軍事利益的『和平』企圖。這兩個象微的例子足指出：華爾街的財閥集團有計劃地培養牠的更適切的工具，逐漸用軍事獨裁來代替美國傳統的民主政治。

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馬歇爾的軍事計劃已補足了他的『歐洲互助法案』，西歐五國的軍事同盟已代替了邱吉爾式的『歐洲聯邦』，現在又擴張爲北大西洋的七國同盟，甚至還醞釀着把牠發展至包括全世界資本主義國家了，這種同盟愈擴大，美國的戰爭機噐愈發，侵入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今後每一條戰線，每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命運都要取決於白宮的參謀部。在這種戰爭同盟的旁面，所謂『聯合國會議』顯然已失去任何『和平的』美麗面目了，假如牠還蓋什麼『和平』作用的話，牠只是本帝國主義外交家們拉攏與國的『和平交易所』，除此以外，牠使單純轉變爲美國製造戰爭輿論、孤立蘇聯的借戰機噐了。羅斯福關於『世界一家』的甜蜜宣傳久已成爲一種遙遠過去了的樂音，往來响起一般人的幻想家的痛苦的回憶吧了。

一、蘇聯在戰爭威脅下

未來的大戰與上兩次大戰的最大不同點便是：由於許多老大帝國之被擊潰或空前削弱，由於她們內部當前所遭遇的絕大危機，她們已一步一步的在

經濟、政治甚至戰略上也屈服於華爾街，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在國際政治上遂一時降到次等的地位。當然，她們之樂於響應華爾街反蘇反共的十字軍號召，最後分析起來，也就是她們已清楚的意識到：只有把賭注押在這一方面才能挽回整個資本主義的末運。美國之被迫而走向戰爭的冒險，也正是想征服這個佔地球六分之一以上的國土，令衰老的舊制度有返老還童的機會。

在日益加甚的戰爭壓力之下，儘管史大林尚愚蠢地否認戰爭危機的存在，但蘇維埃經濟已首受影響。戰後開始『和平復員』性質的第四個五年計劃，顯然已迅速爲戰爭生產所擴充。這種過於急促的轉變當然對於蘇維埃經濟的打擊是無可忍受的。我們不要忘記牠剛剛才受了長期戰爭的摧殘，工業城市所遭遇的破壞不是短期能够恢復，第四個五年計劃的起草人對歐俄部分的復興工作還不敢寄予很大的期望哩！本來戰前三個五年計劃還沒有解決俄國人民的消費要求，實質上，這三個五年計劃的特點還是以不斷犧牲消費品工業（輕工業）來得到成功的。戰爭期間，當然更談不到滿足這種要求，戰爭之後，蘇維埃的危機是希望以幾種手段來緩和的：（一）新的五年計劃；（二）領土擴張及掠奪；（三）向戰敗國索取巨額的實物賠償。但不幸蘇維埃官僚還來不及完成這一計劃，甚至還來不及消化那些既得的成果便立即遭逢新的戰爭威脅，這就迫使他們急忙把備戰重新排上議事日程，和平的、消費的生產本已占『計劃經濟』中之不重部分，現在又重受犧牲，在『緩衝國』中，蘇維埃官僚剛剛從單純的掠奪轉向『同化』的經濟建設，現在又爲戰爭的機噐所吞噬。這種轉變首先使蘇維埃國內的社會矛盾重新緊張起來，官僚們一方面需要空前的增強勞動強度，另一方面却又必須應付那些不願永遠過着半飢餓生活的勞動人民的不滿。爲了壓制這一基本的矛盾，使只好把那些不滿的『自由』勞動者，一天一天的貶降到『奴隸』勞動的地位，用軍事化的集中營來處置這些廉價的人的材料。在『緩衝國』中，蘇維埃官僚的干涉政策將愈益把這些國家的物質利益變成蘇維埃戰爭的資源，使這些國家的人民忍受雙重的負擔和掠奪：一方面是國外的，另一方面是國內的。這些都是蘇維埃官僚替自己準備好的火藥庫。她們在國內不斷舉行的肅清和文武官員的更迭，在『緩衝國』中加緊進行撤換那些自動生長的共產黨領袖代之以克林姆宮的親信——這些都是以表示他們的恐懼之感，同時也表現他們的統治基礎過分的虛弱，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抵抗更清晰的暴露史大林主義本身所隱藏着的危機。蘇維埃人民的恒久的不滿與『緩衝國』中的民族主義野心傾向將永遠困擾克林姆宮，使牠對戰爭與革命的任何震動都害怕到死。現在在全世界統治者中真正存着強烈和平主義幻想的，恐怕還是莫斯科。

二、史大林的『和平』

爲了爭取一個新的『和平的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史大林在戰後第一個時期確乎是希望白宮忠實地履行雅爾達秘密協定及波茨坦協定，甚至給蘇維埃以巨額借款（六十億美元——史大林要求）。而他則以資本主義的忠實憲

兵的資格，幫助牠恢復舊秩序甚至幫助牠增加生產。從這裏就產生了史大林堅決支持聯合國的大儒主義外交，流行一時的「聯合內閣」，以及各國共產黨督促工人「東緊褲帶、努力生產、反對罷工」的可恥政策。但不幸美國參謀部所走的道路却是一條典型的希特勒式道路：牠昨天在戰爭中答應交給史大林保管的贓品（東歐和滿洲），今天在戰後却毫不客氣要求交還給牠。這種帝國主義的背信政策恰好是以史大林背着工農與帝國主義秘密分贓的背信政策為基礎的。這種外交的失敗再加上國內矛盾的壓力，迫使史大林向左跳躍，企圖藉一種急就章的冒險主義行動向美國施行壓力，迫成一個新的「和平」。於是產生歐洲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隨之而來的便是法意及西歐其他國家的總罷工，希臘內戰的擴大，各國共產黨響應莫洛托夫及著名檢察官維辛斯基對戰爭販子的譴罵、以及和平與「新軍」的歇斯得里要求，時至今日，這種「行動」已蔓延到東南亞各國，中國的內戰也愈加激化，甚至還發生了朝鮮南部的叛亂——這些都無非為着一個目的：克林姆宮企圖騎在世界工農的背上與美國講價還價，這些工農的血肉、他們的改革要求、社會主義革命的利益都不在牠心目中，牠只是簡單地拿他們做一種外交零找吧了，這種外交當然起維護蘇維埃官僚的私利的。

但階級鬥爭自有牠一定的軌道，假如各國工農的鬥爭不被正確地引導到推翻資本主義統治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去，這些鬥爭力量就必然被犧牲、被浪費在局部的鬥爭中，替帝國主義的戰車鋪平了道路，這個時候，蘇聯無異盡撤一切可靠藩籬，束手忍受敵人的進攻。最近維辛斯基在聯合國會議中大聲呼冤，稱蘇聯的一切政策所求的只是和平，而不是「世界革命」，他還引證史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對一位美國記者坦白表示的一番又愚蠢、又卑屈的話來證明「世界革命」只是「神話」。這位滿手染着老布爾什維克鮮血的檢察官，只不過重新暴露他的孟什維克的癡說靈魂吧了。你們請想像一下吧：當世界工農正在生死鬥爭之際，十月革命政權的一位外交官居然在帝國主義創子手的面前羞羞地否認「世界革命」，生怕這幾個字玷污他的大禮服。這種否認最明顯的證明史大林派官僚利用世界工農的目的所在：不是為了「世界革命」，只是為了迫使美國和牠談判和平。既然資本主義存在一天和平便無法保證；既然美國為自身矛盾所推使，已重新領導各資本主義國走向戰爭，那末，即使史大林和白宮獲得一種「妥協」，這也只能是美帝國主義備戰總計劃中的一首極短促的和平插曲，而史大林浪費了全世界工農鬥爭的偉大潛力獲得的這種無價值的「休戰」，客觀上也只是替美國掃清進攻蘇聯的障礙而已，這與過去他在「德蘇協定」中對希特勒所盡的作用是一模一樣的。

四·鐘點還沒有過去

現在來推斷戰爭爆發的日期，當然還嫌過早一點。戰爭發動者的最大便利便是握有選擇時機的優越條件。但任何富於機動性的行為都還要受一定的條件限制的，首先美國現在即使在純軍事的意義上，她還只在準備戰爭的第

一階段，不僅在亞洲，甚至在歐洲她還沒有完成她的軍事基地的建設。在迫近蘇聯的據點上還有許多不穩定的因素在妨礙她的努力。歐洲大陸將來無疑成為美國戰略的重心，但在這個古老大陸的國家中，有多少軍隊是嚴格具有作戰能力的，還十分可疑，法國和荷蘭陸軍在殖民地作戰中已充分暴露牠們的脆弱。五國同盟和大西洋同盟的主要任務當然是立即開始重整歐洲的軍備，但數十萬精兵的訓練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亞洲，除了日本直接在美軍控制之下，獲得某種軍事建設的成效之外，中國大陸及與之毗連的東南亞已成了美國戰略的「阿基爾之腳跟」。

但軍事還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重要的障礙還是世界革命的潛力直到今天尚未耗竭，牠的主力——法國革命的形勢還繼續保存，這一火熱的大氣將永遠成為瓦解任何戰爭機構的可怕動力。所以，美國的軍事建設計劃必須與反對革命的陰謀同時進行。戴高樂和他的意大利同僚無疑將在歐洲大陸替美國盡一種最反動的血腥作用。本來在這次戰後，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陷於那樣衰弱和崩解的地步，革命的勝利是不應有任何困難的，但不幸由於歷史條件的一種特殊的結合，史大林主義在戰後却反而空前的膨脹起來，代替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隊伍中，充作資產階級舊秩序的保鏢，往後則從左方浪費工人階級的力量，替資產階級的法西斯反動勢力，清除道路。戴高樂的「人民團結運動」正從法共的幾次無效果的罷工中儘量收穫果實。社會黨的式微，人民共和黨之類的中間黨派的衰落，共產黨選票的喪失，以及最近戴高樂在參議院選舉中的抬頭，都在說明法共的無出路政策，逐漸把小資產階級及一部分落後工人的選票驅到「人民團結運動」及右派中去。當然戴高樂距離他的勝利還有一段幾乎難於逾越的道路；直到今天為止，法國工人階級還保持牠的團結力和戰鬥心，雖然在史大林主義領導之下。但困難並不等於不可能，假如下一階段，法國工人階級繼續受史大林主義的支配，牠的鬥爭繼續被限制在經濟鬥爭的領域中，假如牠不立即走上政權，替破產的小人物打開一條正當的出路，則戴高樂的勝利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只不過重走一遍莫索里尼和希特勒的舊路。

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及全世界其他第四國際的主要任務就是在這危急的歷史時機中，竭盡一切力量來挽救人類於新的浩劫中。牠們已把反對第三次大戰列在議事日程的第一項。但牠們深切的了解這一點：反對戰爭與推翻資本主義舊統治的任務是不可分離的。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完成這一任務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實際鬥爭中，教育法國工人階級，使牠毅然脫離史大林主義及一切改良主義的影響，走到真正社會主義革命道路上去。因此唯一能代表法國工人階級與戴高樂資產階級的反動勢力競賽的只有法國的第四國際，誰先抵達終點，這個問題不能由任何宿命主義的觀點來判斷，只有鬥爭才能決定。但這一點却是事先可以斷言的：法國國際主義共產黨已有足夠的勇氣去爭奪人類命運的支配權！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從幣制改革到「補充」「修正」

劉乃光

幾個月以前，當法幣日益變成德國馬克的時候，一般幻想奇蹟的人，都日益把希望寄託在「幣制改革」上面。可是，幣制雖終於改革了，但在短短的七十天內，却完全宣告了失敗！這種失敗，早在改革之前，凡是稍有經濟常識的人都已預見到，而我們更曾在本刊中詳細地指出過。事實上，當戰火日益蔓延而熾烈，政府軍費日益浩繁，財政赤字日益鉅大，而市場與生產則日益萎縮；——在這種情形之下，將法幣改為金圓券，那只能是名詞上的變更，票面上幾何級數式的增大，即是說，只是加倍繼續昨天的惡性通貨膨脹吧了！所以在「改幣」之後兩個月內，政府就已經急不及待地放出了十六億金圓券，這個數字超過了過去十一年所發行之法幣總額的八倍，因而使市場上憑空增加了八倍的大鈔；但通貨雖然如此膨脹，政府却同時用行政手段，把工資和物價強迫凍結在「八·一九」的水準上。這樣一來，就造成了黑市與限價間的驚人距離，而搶購貨物的風潮使以空前未有的規模，迅速地席捲了全國。物資都多方設法逃遁了，商店於是十有九空，甚至索性關起門來，使人們有錢也難買到任何東西；工廠則在原料缺乏的藉口下，大都停工減產，以抵制其製成品之被無限價廉售；而最蒙受痛苦的，則是工人階級及一切靠薪金生活的人，他們的實際工資，都被銳減到完全無法維持生活的地步，甚至拿了這可憐的工資，也買不到任何日用必需品，尤其是食糧，更現出前所未有的恐慌。整個社會生活，就這樣地被「改革」推到死滅的邊緣了！

在這樣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政府再也不能不宣告政策失敗而讓步了！於是「改善經營補充辦法」被頒佈了出來。這辦法的主要內容是放棄限價政策，恢復糧食的自由買賣，以緩和城市糧食的恐慌；其他重要物品則採取「核定定價」（議價）的原則，以補救工業生產和市場的萎縮；對於工人及公務人員的待遇，則答允「酌予調整」，以緩和他們的不滿。這是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但沒有劃出一點新花樣，而只是在一個更加殘破的基礎上，重新走着「八·一九」以前的舊路，所不同的，僅僅是政府今後在通貨膨脹和物價暴漲面前，更加無力控制，更加放任牠們狂跳，一直跳到死巷而已。

因此，限價政策取消了以後，配合着二十億金圓券全部的出籠，更加上前線空前的失利，物價便像一根久被強力壓縮後的彈簧一樣，以一種驚人的爆炸力伸展開來，昨天的黑市價格合法化了，跟着就一日數跳，一跳數倍，直到漲上十倍、廿倍、卅倍以上。而其中最嚇人的便是米的漲勢，牠從最初每石廿餘元的限價，一直衝出了千元大關，戶口米延期無着，米店裏粒米不

存，食物店十九歇業，搶風到處蔓延，幾乎家家戶戶都受到了「絕糧」的威脅。在米荒達到危機點時候，政府才狼狽地要同香港借米，從江西空運，而且迫使附近產米地放鬆禁運令，最後，也是最要緊的，是中央銀行暫時停止簽發金圓券，縮緊了銀根，這樣才使米荒緩和下來，一般物價也暫時回跌了些，但無論如何，人民對於金圓券的信心，從此已一落千丈了！

在人民對金圓券普遍不信任（尤其是像農村之盛行以金銀或日用品交換米糧）的情勢下，政府對於金圓券的發行，以及人民所有金銀外幣的處理，於是又來了一個「修正辦法」，其主要的修正點是：第一，由政府鑄造金圓，交中央銀行發行，每一金圓的法定含量為純金四·四四三四公毫，比原定的〇·二二二一七公分，減少至五分之一；第二，把原定的金圓券發行最高額取消，此後改以命令規定；第三，金銀外幣准許人民持有，并得將金圓券按照規定手續兌換成金圓、黃金或銀幣，兌換率也加以提高；（此外如以金圓券存入指定銀行，得換成金圓或黃金，一年後可加息付還。）第四，金圓券得照規定辦法購買外匯，進出口貿易則暫行連鎖制，使出口所得的外匯完全用之於進口。

這一修正辦法的目的當然很明顯：第一是企圖用「發行金圓」在人民中造成一個美麗的希冀，以此穩定一下金圓券的信用；第二是對那些仍然持有金銀外幣的人加以讓步，希圖再用提高兌換率等，把未兌換的金銀外幣吸收過來，此外又替外匯打一條出路。但這些目的之無法達到，也是同樣明顯的。首先，每個人都會問：政府究竟準備發行多少硬幣，才夠流通於市場，才夠支付牠那龐大的戰費而不靠發行紙幣？而且，這許多硬幣原料，又從那裏得來呢？在我們看來，政府今天為了暫時挽救一下金圓券的頹勢，阻遏一下物價的狂漲，可能懷人民之慨地，把近月來收兌得的一億餘美元的黃金外幣，撥一部份來鑄造金圓，然後以五倍於兌入時的高價兌出，（而據規定，兌現時須以同額的定期存款，存於指定的銀行，這實際上就是十倍的高價，即，人民昨天遵令以十兩黃金回政府換得了二十元金圓券的，今天則以其中一千元只換回一兩的金圓，另外一千元又必須存入指定銀行，一年內不能動用，而一年後取出時，則已所值無幾了！）政府如用這種出爾反爾的背信方法，多少巧取了人民（尤其是中小資產階級）手中的金鈔，但由巧取得到的數目到底非常有限，（因為人民不會永遠忠誠的），決不能彌補目前戰爭的消耗。不消多少功夫，這個意外的來源就會很快地宣告乾涸，而他方面又沒有「原料供應」，於是沿海一變般的金圓，便必然被高速度的通貨膨脹深拋在後

面，只成了可憐的點綴品，而且馬上成爲『黃牛黨』搶購的最好對象。這已經不是揣測之詞了。不久以前鑄成的一分銀幣，就會被人們搶購精光，當作爛銅廢鐵賣出，賺得了幾倍的利錢；而現在，五分銀幣也逐漸絕跡，被人們收藏起來了。（據說很多人的收藏是爲了準備下一次再改革幣制時拿出來用哩！）將來金圓券隨着通貨膨脹而日益貶值，而金圓的法定含金量又高於牠和黃金的兌換率，（即一市兩黃金可換到相當於一·四二市兩黃金的金圓，）這又怎能不引起排山倒海般的搶購潮，最後則完全被排出流通過程，即被收藏起來呢？

而退一萬步來說，即使這件無法相信的奇蹟終於實現，政府終於得到很多原料，使金圓普遍流通於市場上，但只要戰爭繼續延長，生產繼續衰落，市場繼續殘破，那末，金圓本身仍然是要貶值的。（即像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收藏着全世界絕大部份的黃金，也不能避免貶值的趨勢！）今天整個東北都完全易手了，華北也處於最嚴重的狀態中，全國出產麥、豆、高粱、棉花、煤鐵以及烟草原料等最富裕的地方，都全部落在中共手裏，這對於政府治下的市場與生產，更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今後如果戰爭一口不停止，則生產無法增加，交通無法恢復，市場無法擴大，捐稅也無法增收，（否則只能加速物價上漲！）另一方面美國的援助最多也只限於一部份軍火及其他軍需品，而一般民生日用品則無法滿足中國民衆的需要；——在這種加倍殘破的經濟基礎上，政府今後爲了支持這副龐大的戰爭機構，爲了彌補那筆天文數字的財政赤字，唯一的辦法仍只是濫發鈔票，『發行硬幣』不過是一個烟幕或幌子，藉以掩護牠底無限制的通貨膨脹而已。所以在這次公佈的『修正辦法』上，取消了金圓券發行的最高額，使是一個無誤的信號，顯示今後的金圓券將無限制地發行，牠的貶值速度，將超過法幣而很快走上馬克的末路！這次『修正辦法』之值得注意的，也就是在這裏！

根據過去的教訓，在幣值跌物價高當中，最受損失的乃是工人階級及一般的薪資生活者。他們爲要抗拒有產階級完全轉嫁痛苦於自己身上，爲要使自己免於飢餓與死亡，就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覺醒和團結，起來爭取『按照物價增加工資』的完全實現，反對與物價脫節的虛偽『指數』（如官方在過去，尤其是這次公佈的十一月份上半月指數），生活指數應該由工人組織自己編製；而且，爲了補救今後高速度的物價暴漲所招致的損失，他們更應該提出『工資預付』的要求，因爲在物價一日千里的情勢下，下月初才拿到的工資，無論如何也買不到上月份的物品。另一方面，爲了壓阻物價肆無忌憚的狂漲，爲了對抗官方限價政策之虛偽與無效，工人、店員、管家婦及一切消費者應該聯合起來，共同組織一個『物價評議委員會』，以全體民衆的眼睛，去監視奸商們的囤積和操縱，只有讓民衆組織起來，才能發揮出偉大的力量，真正有效地壓抑物價的狂漲。這些就是貧苦的勞動者們對付幣值跌和物價高的主要救急辦法。但最後說來，要根本平衡財政的收支，

消滅通貨的膨脹，抑止物價的暴漲，并進而恢復交通、增加生產和擴大市場，則唯一的辦法只有立即停止戰爭，否則，政府一切朝夕改的『改革』、『補充』、『修正』等辦法，都只是一場短促的騙局，而主要受犧牲和損害的，依然只是一般勞苦的工人階級及人民大眾！ 一九四八·十一·二十

美國工人政黨的競選總統運動

康君譯

十月廿七日，美國社會主義工黨（第四國際美國支部）曾在紐約召開一個熱烈的大會，結束了競選美國總統的工作。在這以前幾天，該黨的總統候選人F·多波士舉行了一個公開的辯論會，提出他本黨的革命政綱，去對抗社會黨候選人N·湯瑪斯所提出的改良綱領。最後，社會主義工黨成功地在全國百分之四十以上的人口，在競選過程中，多波士及副總統候選人G·卡爾遜（女）曾到各地作競選旅行，向各城市及工廠的千百萬工人公開演說和廣播。此外，該黨又散發了數百萬份印刷品，包括競選演詞及黨綱等。牠的中央機關報『戰士報』，也在這時增加了三千五百個新訂戶。至於他們這次能夠得到多少選票，現在還不知道，因爲所謂『民主的』美國選舉機構，實即只是替他們自己的資產階級候選人服務的。但不管怎樣，那些資產階級御用的電訊報紙等，對於這方面的報導，當然更少了。列於總統競選名單上，第一次以全部托洛斯基主義的選票，向全國的工人階級廣播演說，牠的政治影響無疑已普遍增加了！

在選舉結果首次揭曉之後，『戰士報』當即發表分析杜魯門的勝利，是由於網的杜威，是較工人階級底支持，因爲工人階級認爲杜魯門比之非個的勝利，是要保衛他們的生活水準，要蘇聯工人階級的好，以及要避免再行一次世界大戰的危險。目的。牠預言民主工人階級將無不滿足，應該有一個有組織的行動，去達到他們所要求的步驟，更明白地向左轉，產生他們的獨立政治組織。

印度市政選舉中的左派

印度第三個最大地方單位的威德拉斯，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一日曾舉行市政選舉。安東尼比拉在當地第三十二區的全體選票（七千票）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票。另外，有六位麻德拉斯的候選人所分得。安氏所得票數之多，開創了麻德拉斯市政選史的紀錄。第四國際印度支部的同情者，而安氏也是被選了。他們都是布爾塞維克列寧黨（第四國際）的主席，同時，兼全印工會聯盟理事會理事，因此，他們七位將在市議會中通力合作；而麻德拉斯工會這次勝利的重要性的，必須着重地加以指出。七個工會會員組成的市議會中，雖然麻德拉斯工會是受這個黨完全支配着，而選民們對於這點也絕不感到意外。麻德拉斯工會是受這個黨完全支配着，而選民們對於這點也絕不感到意外。甚至更弱些。幾乎所有工人階級都投這七位候選人的票，這是很值得注意的。

戰雲瀰漫中法國所昭示的動向

王景波

「只有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才可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這一個號召自第四國際一九四六年四月會議提出以後，日益顯示其實際的意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世界處處暴露其沒落期垂死的掙扎。即它的救護主——美帝國主義也大有左支右絀，扶起東來西又倒之勢。上一次戰爭尚未結束，馬上即要急忙準備下一次戰爭——戰爭成爲殘存的資本主義爲消除其經濟的和社會的危機之唯一的生活法。美帝國主義企圖利用戰爭的軍事準備來消弭其本國行將到來的經濟危機，西歐英法等帝國主義則希望借戰爭的聯盟繼續取得美援，以維持其搖搖欲墜的統治。

另一方面，每一國度裏所發生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的問題都牽動到國際大局。每一國度裏的羣衆鬥爭，即成爲部份的、經濟的、最低限度生存的鬥爭，都立即變成政治的鬥爭，以至於提出政權問題。各產業的總罷工及同情的聯合的總罷工以至全國的總罷工，三年來都在資本主義國中數見不鮮。這都表明資本主義世界極度的不安，沒有和平發展的時期，沒有改良羣衆生活的可能，而羣衆鬥爭的政治化及這鬥爭之國際的一致性，構成現時代的特徵。

「國際關係上的兩極化」——一方面是蘇聯及其衛星國的陣營，另一方面是以美帝國主義爲領導的資本主義國家的陣營——與許多資本主義國的內部階級對抗的尖銳化及增漲的兩極化，並行發展——（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總的政治決議」）。這一個指示對着眼前事實是非常活躍的。

動搖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可被推翻；推翻它的力量是存在的。第三次大戰的威脅是咄咄逼人的，但革命努力也在滋生蔓長。問題就在於革命的領導。現在世界各國資產階級（包括中國在內）都在努力爭取戰爭的前途，而世界無產階級則在爭取革命的勝利。人類的災難與幸福就繫於這二者間的抉擇。

史太林主義者對着當前戰爭的威脅，把希望寄托在那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實際上幫助大資產階級做戰爭準備的和平運動上。他們已背棄馬克思主義，不從資本制度本身矛盾上觀察戰爭的必然性，及解決戰爭之可能的條件，而把戰爭當作少數「戰爭販子」之所爲。這樣，他們使用反「戰爭販子」的和平運動以維護資本制度。甚至於他們自欺欺人說第三次大戰不過是「戰爭販子」的叫聲，實際上還渺茫得很！他們已背棄階級的立場，不在「階級對抗的尖銳化及增漲的兩極化」中去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此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消滅資本制度及其戰爭，而利用羣衆鬥爭的激進化，東戳西搗地同資產階級做參加政府的要挾。這是當前革命運動之一大障礙。

我們認爲「現在只有戰爭的生產才可以爲已經窒息的資本創造新的市場。戰爭不是利的，只是沒落的資產階級企圖用以跳過它本身矛盾的一種特有

的機關」（第四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宣言）。自所謂「柏林危機」爆發以後，戰爭的準備已做了很大的進步，但隨着戰爭陣營的兩極化，各資本主義國中「階級對抗的尖銳化及增漲的兩極化」也同時發展着。目前法國的局勢在這一點上表現最爲明顯。

在上一戰事停止後第一個革命浪潮中第一個表現有希望的是在法國。當時的法國一方面資產階級的統治完全是潰散的，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及廣大的不滿的羣衆紛紛起鬥爭，只因當時史太林主義者站在克里姆林宮官僚外交的立場上，要拉攏法國資產階級以抵制美帝國主義，使以聯合政府的方式救護了法國資產階級的統治。結果法國革命沒有成功，而史太林派的共產黨亦終於被踢出資產階級的政權以外。法國資產階級得史太林派這一救護以後便一直倒在美帝國主義懷抱中，由漸漸擺脫蘇聯而走到與蘇聯完全對立。今日它唯一的出路就是依靠美援，追隨美帝國主義所計劃的戰爭的道路。

但從此法資產階級統治並未穩固，而工人革命鬥爭，也還繼續發展着。繼共產黨的聯合政府垮台之後，來救護法資產階級統治的是馬歇爾計劃。但馬歇爾計劃並未能解決法國的經濟危機及彌補財政的漏洞。根據萊諾在議會上的報告，「從現在到一九四九年末，即使沒有工資的增加和物價的增，物價的增加倍於工資的增。物價的繼續上漲使工資問題提出議事日程。爲着適應美國的計劃，爲着保障國內秩序及維持對殖民地的尊嚴，它還必須維持八十萬人的龐大軍隊，軍費佔國家總預算的二分之一。在所謂西方聯盟預定擁有一百五十萬人的軍隊中，法國就應出七十五萬七千人的臨時一類數。這項軍費吞沒三百一十億法郎，差不多相當於一九四八年國民經濟的總虧欠，超過這一半美援的總數。」

因此馬歇爾計劃並未能穩固資產階級的統治。經濟狀況的加速惡化，表現在通貨膨脹，糧食缺乏及相因而至的物價的漲與工資不能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仍然是造成不滿的基礎。政治的危機和社會的危機不斷的並行着。而工潮的層出不窮，抵消了美援，更加深其經濟危機。

「解放」後爲時不過三十餘月，內閣的更迭竟有十一次之多，法國固向來是個多閣潮的國家，但從未有像這次戰後內閣的更迭之迅速並且一次更甚一次的帶嚴重性，現在的居伊內閣經過兩星期之久才勉強組成，其內還經過許曼的兩度組閣未遂。但是現在面臨着煤礦工潮及裁兵變派在參議院中的得勢，居伊內閣又發生動搖了。

這種閣潮的波動，稍有眼光的人也可以看出這個國土處在一個嚴重危機

的狀況中，並且是一個制度的危機。政權問題強有力地提出來了，因為統治階級在每次鬧潮中，特別在上一個鬧潮中，都表示它的無力，並對勞動運動的威脅而變換起來。很明顯的，法國無可挽回的走向一個更高的危機——內戰的危機。一個國家不能無指揮而生存。待解決的問題就是：誰指揮這個國家，並且是爲了誰的利益。人們已可看得出來，一切無產階級的革命潛能都是完整的。大資產階級雖有在去冬大罷工中的勝利及此後對工人生活狀況之熱烈進攻，但仍不敢對着奮鬥的工人階級直接走上一個新的進攻。小資產階級也完全不是決定的轉向右翼。縱使有史太林派的羈絆，工人階級將必然要捲入鬥爭，不是爲若干布施，不是爲若干資產階級「所可接受的要求，乃是爲宣告資產階級的總破產，爲建立它自己的工農政府，並以此方式展開歐洲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的道路。」

這是第四國際機關報爲法國上次鬧潮所指示的。自十月工潮暴發後證實了這個指示。這次工潮更帶嚴重的內戰的形勢，遷延許久，階級勢力的關係正在醞釀着重新組合。加上戴高樂派的抬頭，社會的矛盾更趨於兩極化。法國資產階級在連續的經濟的及社會的危機中當然要建一個「強力」的國家，「戴高樂就是代表這種要求。但它對着工人階級鬥爭的威脅，又不敢輕舉妄動，故一向只敢組織一個中間偏右的內閣。但這種內閣絕對不穩，勢必要轉向戴高樂的政權。但在現在的形勢下，要建一個法西斯的極權政制，勢必要經過一個流血的大決鬥。」

現在法國的問題，不僅關係歐洲大局，且關係全人類的生死關頭，也就是世界大戰與世界革命的分路口。問題就關係階級勢力的對比及無產階級的革命的領導——奪取政權的革命的政綱與革命的策略。

資本主義世界的救護主——美帝國主義，也早就有見於此。它的「西方積極東方拖延」的態度，與其說它着眼於蘇聯的軍事觀點，毋寧說是社會觀點。馬歇爾計劃注意法國的輕武器，就是着重在安定法國「秩序」。近日報章傳聞美國命令將德境美軍政府的所有軍械及軍火移交戴高樂應用。這是可信的。但法國的工人階級也不是孤立的。西德的工人也已起來了。意大利工人在不久以前還表演其偉大的戰鬥力，即在美國，東海岸的罷工公然宣佈不裝運馬歇爾計劃的物資。問題仍關係於革命的領導。

過去屢次真正救護資產階級的都是史太林派的領袖。他們不依據一個奪取政權的、以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的革命政綱，並用革命的策略去統一無產階級，團聚被壓迫的大衆去奪取政權。他們只想臨時利用羣衆的鬥爭向資產階級做要挾，或站在克里姆宮方面向美帝國主義做示威。直到現在他們還只是一個目標：建立號稱「民主聯合」的政府，即是允許他們與資本家關係並坐的政府。這個政府在法國是他們在戰後已經實驗遭到可恥失敗過的。所以要使法國有革命的勝利，必須革命的領導（第四國際黨的領導）依據革命的政綱與策略從激劇化的階級鬥爭中掃除史太林派在工人階級隊伍中的絆馬索。

法國罷工中的法共

曉星譯

法國的罷工現在剛好完成他們的六個星期的罷工，據政府供給的消息，雖然罷工遭遇的困難日增，尚有百分之五十在繼續罷工中。法國史大林黨領導的總工會已發出一個財政的呼籲，總工會的總書記佛拉松寫道：「我們每個星期必須有一億法郎。」事實上這個數目就是過去六個星期所收到的總額，工人們工資低微，生活程度又高，要他們作更大的財政上犧牲，顯然是辦不到的。有許多工人，甚至有許多共產黨的戰鬥工人都覺得在目前光是靠經濟上團結，還是不夠的，罷工罷工必須衝破目前的孤立地位，因此，總同盟罷工的念頭在工人中迅速發展起來。

史大林黨的領導機關並不願意任何人提出總罷工的口號出來，因爲工人的罷工運動一旦強大起來，就有立即擺脫史大林黨的控制之虞，因此，他正在自己黨內拚命進行一個反對總罷工的運動。在賽因區的五金工會的機關報《Le Metalier》上，巴黎區五金業的某些工廠中竟有人說總罷工是「唯一可能鬥爭的條件，另外還有人說：總罷工的條件是具備的，而且他無論如何是我們尚待完成的唯一手段。」他接着拿關於總罷工的種種困難的顧慮來答覆這種意見，他還說總罷工與階級鬥爭的不平衡發展是相衝突的，而且與史大林黨想經過部分的改良手段來取得生活改善的政策也不相符。在巴黎區的工會幹部會議上，巴黎區工會的總書記，漢納夫嚴辭攻擊關於總罷工的提議。

但這種反對總罷工運動的最重要文件還是佛拉松自己起草的一封信「給西納爾及華爾卡工廠五金工人的公開信」，該信已印了幾萬份散發。這封信顯然是針對這兩個工廠的工人而發的，因爲這兩間工廠的工人當選政府的第一次屠殺時，曾派代表向總工會要求發動總罷工。但另一方面該信却特別針對共產黨的戰士而發，因爲他們竟然和西納爾及華爾卡的代表們抱同一見解。佛拉松大罵總罷工的思想是從階級敵人那裏來的，他還說：「我們十分驚訝的注意到：有些戰士們，沒有頭腦到這個地步，竟受了敵人間諜宣傳的影響。但是人們假如榮耀地被同志們選舉到領導機關中去，他就不會這樣沒有頭腦的。」

但不幸這種「沒有頭腦」的人却愈來愈多。於是搜索這種人也愈加起勁。他們不投降就加以摧毀，史大林黨的領導甚至爲了牠的利益不惜破壞若干工會的組織的，牠根本不願意眼見工會的戰士脫離牠的領導。對史大林黨的政策採取反抗態度的，在巴黎的五金業工人中可以看到，史大林派遲疑不敢強迫實行局部的罷工。這種反抗運動將來如何發展，尙難斷定。若干工廠也許可以對這種反抗貢獻新的遠景和推動，但他們却已有筋疲力倦之象了。當我們執筆寫這幾行字時，巴黎正舉行一個廿四小時的新罷工。前天史大林黨領導的退伍軍人示威隊伍與警察發生正面衝突，繼續了數小時之久。警察開火並捕去兩個史派的議員。政府遂乘機沒收史大林黨的兩家報紙：「夜報」及「人道報」。爲了抗議警察的暴行及政府摧殘輿論，遂爆發了這次罷工。巴黎又沒有報紙和斷絕交通了。史大林黨的領袖們設法使這一事態不致擴大：他們竟匆匆決定選擇星期六來舉行罷工，事實上那一天許多工廠都休息了。

法國無產階級的力量每一次都表現牠的兇猛性質，但最嚴重的事情還是這個力量還不知道牠所要求的是什麼。這種局勢是有利於戴高樂派的。在最近的「共和院」（前參議院）選舉中（其選舉法的目的在剷除史大林黨），急進黨和社會黨合成一個新第三力量來代替人民共和黨和社會黨的舊結合。這次新的結合，其目的是與戴高樂相拮抗。參加法國人民團結運動的舊政客都退出，報紙上對此舉正大吹大擂，但實際上一點效果也沒有。戴高樂正在團結他的運動，在這次選舉中也幹得並不壞。他的選舉勝利是非常危險的，因爲這增加了他用合法手段走上政權的機會。

中國史大林黨之特質及其前途

紀芬

(編者按：這是紀芬先生論史大林主義的第五篇文章)

(一) 共產黨墮落的兩種過程

我們已指出過：當克林姆官爲了自保而不斷使自己的意識形態與世界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和解，因此使各國共產黨造成了永遠屈服於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政治影響的前提。這也正是牠們墮落的根源。不過由於歷史條件與國家社會環境之差異，牠們的墮落過程和後果也多少不同而已。大抵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因爲一方面有龐大的產業工人階級基礎，另一方面則帝國主義的超額利潤能順利地在工人階級中培養了一個工人貴族層，使廣大的改良派工人政黨才有存在的可能。共產黨是從社會民主黨的破產中產生出來的，牠當初的主要任務是乘乘俄國十月革命的浪潮，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從改良主義的泥沼中拯救出來，一直走向奪取政權，因此牠們各各與其本國的社會民主黨一貫處於對抗的地位。當共產黨本身已向改良主義投降時，牠便不免使自身經歷一種徹底的社會民主黨化。這就是說，牠與社會民主黨的關係，勢必從革命的對抗轉變而爲效忠舊秩序的鄰的競賽，逐漸轉移其基礎於工人貴族層，排擠牠的改良派競敵，用一種「新的改良主義變種」(這種新的改良主義主要是從克林姆官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神話中派生出來的)來支持殘破的資本帝國主義統治。因此，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共產黨的墮落並沒有根本改變牠們對內部的無產階級成份，只是使牠們的領導層與工人貴族的利益相適應，因而向他們大開門戶。

在落後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中，情形就有點不同。在這些國家中，因爲缺乏任何改良主義的物質基礎，因爲缺乏一個具有嚴格社會意義的工人貴族層，又因爲尖銳的階級衝突使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缺乏任何「合作」的前提，所以我們從沒有發現過一個認真具有勢力的社會民主黨，共產黨之出生和長大主要還是因爲牠們一開始就採取革命的姿勢，當牠們趨向墮落時，牠們使不可免與革命的城市產業工人決裂，向另一方面找尋牠們的改良主義的支柱——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在落後國中，這些小資產階級羣衆之易於接受改良主義的欺騙，當然並不是以其本國的物質基礎爲前提，而完全是出於他們自身缺乏堅定和明確的階級立場。共產黨之轉移其基礎於小資產階級羣衆，對於工人階級的影響總不出這個前途：使牠完全溶解於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氛圍中，成爲資產階級反帝運動或農民土地運動的「苦力」或「啦啦隊」。我們在東方的越南、印尼、緬甸和中國都可以找到現成的例子，

甚至在東歐的若干小國家中，我們也可以指出這種墮落的同樣過程。

(二) 中國共產黨之小資產階級特性

假如說，南斯拉夫共產黨是東歐各國共產黨之標本，那末，中國共產黨的墮落在東方各國共產黨中也自然成了一個模範的榜樣。我們大體上可以把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劃分爲兩個時期，以一九二七年第五次大會爲分水嶺，從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七年爲成長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內，牠一方面充滿了中國新生無產階級的朝氣和活力，另一方面則直接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鼓勵和援助，完全是一個年青的、向上的無產階級黨。從五卅運動直到上海暴動，在整個中國工人階級的革命高潮中，牠都成了一枝有力的槓杆。不僅如此，甚至在一九二七年中國中部的農民運動中，牠也成了一個組織者。假如當時沒有第三國際史大林派的機會主義領導，即使這一個幼稚的黨遭逢失敗，牠也最多經歷一九〇五年後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一同一過程——利用革命失敗的教訓來重新武裝自己。但不幸中國共產黨却一開始就受到史大林主義的最壞的教育，分嚐了第三國際墮落的一切惡果。牠最初被命令去充當資產階級的「苦力」，革命剛告失敗，又奉命匆促地去進行冒險主義的暴動。結果大多數有價值的幹部——黨的精華都被犧牲淨盡，使牠的生存機遇到無可補償的斷傷。當牠把城市的組織基礎完全斷送了之後，使被迫而撤退到農村中去，企圖利用農民的武裝來建立「工農民主專政」，這是一個無產階級開始墮落的無誤的指標。因爲脫離了城市無產階級的基礎，牠只能溶化於農民的落後環境中。所以從一九二七年以後，共產黨便在盲動主義與機會主義的惡性循環中一天一天的墮落而爲一個小資產階級農民黨。這可以從兩方面來測驗：

(一) 在理論和政治上，牠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哲學：牠認爲中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而革命的主要動力則是農民，其次是工人、小資產階級及民族資產階級。至於社會主義革命則被推到遙遠的「第二階段」；(二) 在黨的成份上則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黨員佔絕大多數。

* 參閱劉少奇在共產黨七次大會上的報告

(三) 不穩定的「左」「右」搖擺

這就是說，一種小資產階級的腐敗的機會主義政治已找到牠的相應的階

級基礎了。如果再仔細的分析一下共產黨在最近二十年間的內部狀況，我們將發現更豐富的特徵。本來在像中國這種小資產階級在數量上佔優勢的落後國度裏，長期的專制主義統治天然培養兩種政治的副產品出來：孟什維克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史大林主義的領導却賦予中國共產黨一個特殊的使命，把這兩種東西結合起來，用一種恒久的搖擺來調節牠們。我們在「解放區」的文獻中，發現一種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不斷打擊「左傾機會主義」與「右傾機會主義」，打擊「官僚主義」與「自由主義」；淺薄的看來，這種文句彷彿是一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安全瓣，足以調節「過左」或「過右」的傾斜，實質上，這却是無誤的反映着；在農民的基礎上，共產黨的統治是無法穩定的，牠不是屈服於下層農民的「左」的壓力，便是屈服於富農地主的「右」的壓力；上層官僚之利用馬克思主義的文句，只是不自覺地拿來記錄這一致命的社會震動而已。而解決問題的唯一應急辦法仍然不外依賴於上層來打擊下層，或者反之。這是一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庸醫法，與馬克思主義憑藉最徹底、最堅實的社會基礎——無產階級力量來解決一切問題的方法，毫無共通之點。毛澤東之流以為只需口頭上背誦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便可以保持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但他們却被迫而不斷地承認「黨內反映了大量的的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甚至資產階級與封建階級(?)的思想，也時常經過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分子傳達到黨內來。」*他們一方面以為馬克思主義至少可以保證他們自己不致遭受這些思想侵犯，另一方面他們自己却不僅在政治上保持「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而且在行動上也不斷遷就小資產階級的「過左」與「過右」的「意識」變化。社會的崩解和震動愈厲害，農民政權的基礎愈趨不穩定，則這種冒牌的「馬克思主義」領導的跳躍愈急促，我們只須指出這一點事實便够了：江西時代的土地改革還支持了差不多十年之久，但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的土地改革令，僅僅半年多便被取消了。在這種愈來愈頻繁的跳躍中，我們在「解放區」發現兩種離奇的犧牲者：「托派」和「國特」，他們的數量那樣多，出現又那樣綿延不絕，迫使我們除了用社會學的分析之外，便無法找出其中的真相；原來他們只是「左面」和「右面」兩種批評者的代名詞：一種犧牲者代表貧苦農民和少數工人的呼聲，另一種則代表農村資產階級的抵制。

在這種極端不穩定的基礎之上，使共產黨的官僚主義集中達到無可忍受的地步，一切民主主義都成了一种諷刺的具文，與這一官僚主義集中明顯地對照着的便是農民地域性、散漫性、和行會性所產生出來的「分離主義」或所謂「宗派主義」，這種「集中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恒久的鬥爭，反映在「解放區」的政治上便是中火集權的波拿帕特主義的企圖與地方割據的「獨立」趨勢；這一切都是小資產階級農民底無可否認的弱點，共產黨只是把這些弱點集中到牠自己的內部而已。

*參閱前揭書

(四)『民族理論』與『民族領袖』

一個無產階級或階級的另一重要指標便是轉向民族的保守主義。關於這一點，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已明顯的表現出來；毛澤東的所謂「整頓三風」，其最重要的傾向便是使馬克思主義「民族化」或「中國化」。本來史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學說已替各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準備好一個理論的前提，戰爭中蘇維埃的狹隘的愛國主義宣傳與各國共產黨之忙於「保衛祖國」更大大促進了她們的「民族化」或民族主義的離心傾向，第三國際的解散便是這種傾向的登峯造極的產品。特別是在落後國裏，因為共產黨更容易溶解於農民的民族保守主義中，所以一種特出的民族主義的理論系統，實質上是向民族的落後環境屈服的經驗，使逐漸完成。這種理論的前提是「特殊國情」，馬克思主義則只是充作這種「特殊國情」的唯理主義的解釋。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第七次大會(一九四五年)上所「熱烈慶祝」的「特出的、完整的有關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的理論。」俄國的社會革命黨及其前輩民粹派也會在俄國創立同樣的「民族理論」，企圖以此對抗馬克思主義的「教條」，結果歷史給了牠們以應得的懲罰。

與特殊的「民族理論」不可分離的便是「民族領袖」的僭妄的崇拜。這一點，在第七次大會的修正宣言中也大胆的完成了。人們居然規定：「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針」，而且在劉少奇的報告中還公然宣稱：「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從此以後，我們在「解放區」的一切出版物(包括小學課本和民歌)中，發現「毛澤東」已成了無可否認的「太陽」，由一種人工造成的僭妄的崇拜過渡到完全神話的趨勢已十分明顯，這一點在一種落後的農民環境中是不難辦到的，對於「真命天子」的嚮往，對於農民型皇帝的崇拜，本來就是中國農民的傳統落後意識。中國那些典型的農民暴動領袖(如李自成之流)的事蹟竟成了「解放區」通俗教育的最流行的教材，這也並不是偶然的事情。這是一種無誤的徵兆，證明人們爲了維繫散漫的、無常的農民信仰竟迫得乞憐於農民的最黑暗的「下意識」——這種階級的深度是很難預測的。中國共產黨之完成這一點當然也十分容易，牠只需從蘇維埃官僚方面搬借一套現成的材料便够了；在戰爭中史大林爲了維持「保衛祖國的熱忱」，也曾乞憐於彼得大帝崇拜，而史大林本身所享受的歌頌、讚美和崇拜則更可媲美於上帝。這是「民族理論」連同其「民族領袖」產生的無可避免的過程，在俄國可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爲什麼在中國或南斯拉夫不可以建設同樣的「民族社會主義」呢？那末在俄國可以產生一個史大林——一個民族的「太陽」，爲什麼在中國或南斯拉夫不可以產生一個毛澤東或狄托——產生同樣光耀的太陽呢？史大林當然是不願意聽到這種無法解答的質問的，因為他爲了克林姆宮的利益還想維

持他的偽善的「國際主義」，但毛澤東和狄托却沿着那條不可抗拒的邏輯道路走——一直高昇到與史大林同等的民族太陽神的地位，既然狄托已因此而與史大林破裂，我們當然無法懷疑毛澤東明天將會幹什麼。他的「民族領袖」地位愈被抬高，便愈傾向於充當「全民族」諸種矛盾的不可或缺的調節者，甚至為此與克林姆宮的主人決裂亦所不惜。

(五) 史大林黨的前途

至此，我們已把中國共產黨的特質、傾向、弱點及其階級基礎大體上已清楚說明了。現在留下來一個問題就是：一個墮落的小資產階級黨的軍事鬥爭何以能吸引如是廣大革命羣衆的擁護？牠的前途如何？最近華北幾個重大城市的攻佔，更加重這個問題的迷惑性。事實上，照馬克思主義者的眼光看來，這個令人迷惑的問題也是不難解答的。在中國，這個小資產階級政黨及其武裝鬥爭之迅速膨脹，無疑是依賴於兩個條件之上：資產階級政制之過份腐爛與真正無產階級領導之缺乏。這種力量雖不足以也不願意推翻整個中國資產階級政權機關，但牠却有十足的能力促進舊政制的瓦解和腐爛，光是這種作用已足夠喚起廣大羣衆的幻想，因為他們只能在現實的條件之下來比較和選擇自己的出路，羣衆永遠是走較少禍害的道路的。華北幾個大城市的攻佔，一方面證明資產階級軍事機構的稀有的遲鈍、腐敗與無能，另一方面却大大地提高了中共的野心，使牠更努力地走向「民族領導」的方向走，爲了達到這一點，牠已重新被迫而放棄了土地改革，重新着重的聲明保護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這就是說，重新向城市的「工商業家」伸手，希望他們相信中共的武裝將是他們的最有力的保鏢。這種新的背叛的跳躍又一次證明：沒有城市工人階級運動的支持，農村的階級鬥爭是無法進行到底的，貧農和僱農的力量將永遠在孤立的狀態中被出賣、被壓抑，史大林黨內反映下層利益的「左派」呼聲也將永遠得不到團結的機會，而牠的上層將永遠在最後關頭投降大資產階級。沒有城市資產階級的諒解和幫助，史大林黨領導的農民武裝要想佔據全國的大城市中心，是不可思議的。

但中國資產階級(包括中共的所謂「民族」資本家)本身也缺乏任何穩固的基礎，牠始終無法擺脫帝國主義，特別是美帝國主義的支持，牠在農村中與土地的利益連結得太密切了，牠一點也不能放鬆對農民的一切殘酷的、落後的剝削方式，正因為如此，她對農民的任何改革要求害怕到死。牠之不敢信任史大林的農民武裝，正如帝國主義之不敢信任史大林的紅軍一樣，並不是毛澤東或史大林的可鄙的投降還不足以博取牠們的信賴，而是中國的農民和蘇維埃的國有財產始終使他們不能忘懷，不幸毛澤東和史大林却正是各自從這兩種不同基礎的矛盾中生長出來的：毛澤東生長於中國農民運動中並代表了牠的矛盾，正如史大林宛如毒瘤般生長在蘇聯的國有財產上並受其一切矛盾影響一樣。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始終不肯放鬆對中共底軍事進攻的

原因。即使一部分資產階級偶然向中共點頭示好，但其動機也只在企圖利用這種外交的姿勢來增強他們與美國講價還價的地位而已。只有當中國資產階級遭逢城市工人階級革命的直接威脅，面臨不安協則喪失一切上層妥協的幫兇，把牠重新拉入「國共合作」的圈套中，充當資產階級欺騙和壓制工農的幫兇，但危機一旦緩和，資產階級就必然再度把牠當作榨乾了的檸檬般丟掉，於是新的破裂，新的內戰又要爆發。這是中國歷史與社會條件替這兩個階級——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註定了的命運，牠們不能解決中國的延宕任何基本問題，牠們將在永無出路的互相衝突中不斷斷喪中國民族的生機，延長一種腐朽入骨的舊制度的殘喘，最後把全中國民衆趕入第三次大戰的浩劫中去。這個時候，只有一個條件可以挽回這一個幾乎不可克服的厄運，這個條件就是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能夠產生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使自己在運動中及時復興，給廣大的貧苦農民打開一個光明的遠景，只有這一條條件之下，史大林黨的下層才能迅速擺脫腐敗的上層領導，牠的左派派員才能大膽地、自覺地成爲階級鬥爭的鑿子才在這個「民族的」農民黨中間擴大一條不可彌縫的裂隙，引起一種深刻的分化：少數的上層被拋到命階級走，一直奔向前人類解放的大道上去。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阿爾巴尼亞共產黨的危機

廣君譯

年青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底歷史，提供我們另一個證據，證明各國的史大林派共產黨正遭逢分化的危機，而全世界的第四國際運動則在無可抗拒地生長着。由何特(Enver Hoxha)提出、並經中委會一致通過的決議案，證實了黨內狀況。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以後便「偏向托洛斯基主義」，這責任則由那些領袖，如索喜(M. Xoxo)和克里斯托(P. Kristo)來負責。拉夫托派領袖方面反對馬克思主義、反蘇維埃、反對我們的國家和黨之基礎上準備起來的。這次會議的決定，大大混亂了和嚴重影響了我們的統一、我黨的領導和總書記，準備好基礎。」「這次會議，替我黨向托洛斯基主義的南斯拉夫領導者屈服，準備好基礎。」「結果，索喜同志(組織局書記)和克里斯托同志(政治局委員)便聰明地工作着，把南斯拉夫托派路線應用到我黨裏面來。」「錯經受過南斯拉夫托派路線極大影響，而且加以運用，但這些同志現已承認其們的黨籍。」「阿爾巴尼亞這個國家，雖然在史大林勝利了廿年之後，就被置於他底領導機關的軍事統治之下，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全被剝奪了；但一整代年青的共產黨領袖，而由於他們的階級本能，又由於馬克思主義的教育，(雖然受自史大林學校，當時加入第四國際的領袖宣佈稱：「當他們的政策及組織系統完全決裂了。據其中一位當時我們事實上已經托派是怎樣，不過還不自知吧了！」)

當時我們事實上已經托派是怎樣，不過還不自知吧了！」

信箱

關於美蘇第三次大戰諸問題的討論

第三次大戰是否可避免，戰爭爆發勝利將屬何方，戰後世界將往何處走？

編者先生：我是貴刊一個熱烈的讀者，尤其喜愛『信箱』。因為『信箱』內所討論的問題，不僅是時下任何刊物所不曾討論過的，就是貴刊的其他論文內也很少觸及的，可是這些問題又恰是我們要求改革現社會制度的青年人所最切需要知道的。現在我也有一個大問題，雖然各刊物時有論及，但很少看到有透澈的見解。我的問題就是關於美蘇第三次大戰的問題。

我近來同幾位朋友時常談到這個問題。但當談到這個問題，時總是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例如：有位朋友說：『第三次大戰是不會發生的，因為蘇聯及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另一位朋友却說：『美蘇的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兩個國家代表着兩種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當我們談到第三次大戰如果發生時，對於其後果的推測也引起了相反的意見。例如：第一位朋友即堅持：『就是第三次大戰萬一發生了，勝利必然在蘇聯方面，因為蘇聯是代表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第二位却認定：『第三次大戰的爆發，勝利將在美方，因為美國代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無論從生產力和武力的觀點看，都遠遠地超過蘇聯，何況它還有原子彈！』……最後談到中國在第三次大戰中的遭遇，其意見也各自不同。第一位朋友說：『中國將東歐化，就是說，中共將在第三次大戰中，甚至在這次大戰前獲得全勝，因而中國的東歐化是不可避免的』。但第二位却與之完全相反說：『中國在第三次大戰後將變成美國的殖民地』。我這裏所提出的只是他們的結論，而且僅僅是幾個重要的結論，他們的論據是很複雜的，而且好像都是『言之成理』，有根有據的。我對於美蘇戰爭雖然十分注意，但還沒有十分自信的見解。因而我對那些朋友們的分歧意見，雖然覺得都有未妥之處，但又提不出自己的正確意見來對抗他們，因此內心很感到苦悶。所以我現在特別提出底下幾個問題來麻煩先生：

- (A) 美蘇第三次大戰是否可以避免？
- (B) 如不能避免的話，將在何時爆發，其最後勝利究將屬於何方？
- (C) 人類經過第三次大戰後，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情形？

(D) 第三次大戰後的人類將向那裏走？

(E) 中國在第三次大戰中將遭何種的災難？中國將往那裏走，跟着蘇聯，還是跟着美國走，或者還有第三條路？那時的中共又將怎樣？

上面這些問題，或者先生認為過於遼遠，太不現實。但就最近國際及國內局勢發展的趨勢看來，第三次大戰的準備似乎異常緊迫的。因此在我主觀上認為這些問題急需加以理解。我相信：要求這種理解的人一定不少。還是望先生抽暇予以解答吧！謹致崇高的敬禮！

讀者 張志堅 十一月八日

志堅先生：在收到你的信差不多同時，我們還接到一些別的讀者們的信，其中所提出的問題多是有關於美蘇第三次大戰的。這就證明：現時急需要理解第三次大戰問題的人們確是不少。因此我們特就你所提出來的較有系統的問題加以解答，這同時也順便答覆了其他的讀者們。

『美蘇第三次大戰是否可以避免』？要正確地解答這個問題，必須首先正確地了解到美蘇戰爭的客觀原因及其真能避免的方法。你的一位朋友說：『第三次大戰是不會發生的，因為蘇聯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戰爭』。這是一種純粹主觀主義的武斷。假如『大戰』的『發生』是由『蘇聯及全世界的人民不要』來決定，那末，且不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不會發生的了！因為無論『蘇聯及全世界的人民』主觀上都是『不要戰爭』的。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已成了絕對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這將怎樣解釋呢？這顯然不是『蘇聯及全世界的人民不要』所能解釋得了的。實際上，這乃是資本主義發展到了垂死的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集團為了重新分割世界市場之一種必然的後果。要真正避免這種大戰的災禍，只有推動世界革

命走上澈底的勝利，以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別的任何方法都是不可能的。所以當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後，列寧即預指『凡爾賽和約』中已經埋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種子，因而他堅決地創立第三國際，準備領導世界革命走上勝利來消滅這個戰爭。而托洛茨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前夕，都是不斷地指出這個大戰的威脅與逼近，要避免這個大戰，只有世界革命的勝利，因而他不斷地進行世界革命來阻止它。但史大林在列寧逝世後完全背叛了列寧的遺教，發明了『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謬論，希圖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保持他所代表的蘇聯官僚階層的特權。說什麼『藉國聯的和平機關可以阻止戰爭』，或建立『和平陣線』、『民主陣線』及『人民陣線』等去反對『侵略陣線』或『法西斯陣線』，希圖以此來消滅戰爭。但結果恰好是幫助法西斯的希特勒（經過『德蘇協定』）發動了第二次大戰！單就第二次大戰這一慘酷的歷史教訓，便已充分證明：未來的美蘇第三次大戰絕對不是『蘇聯及全世界的人民』主觀上『都不要戰爭』所能阻止得了的。因為自第二次大戰後，美帝國主義的勢力已擴張到了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希圖將已經破爛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重新組織起來，恢復它所夢想的『繁榮』。可是第二次大戰後的蘇聯也大大地對外擴張了它的勢力圈，這在美帝看來當然是絕對不能容忍的。——它認定前者是它統治和恢復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不可忍受的障礙物，不管史大林如何向它表示已放棄了世界革命，如何要求『美蘇和平共處』（如史大林對史達森力稱：『美蘇兩種不同制度的國家是可以和平地共存共榮的』），但美帝總是堅決地準備着戰爭，企圖用原子彈來毀滅蘇聯。美帝國主義這種極端頑強的準備戰爭的傾向，絕非簡單出於杜魯門、馬歇爾或杜威、范登堡們的『好戰心理』（像史大林維辛斯基等詛咒他們為『戰爭販子』似的），而是由於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世界與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中間之不可調和的矛盾的尖銳化使然。換句話說，這是第二次大戰中加倍發展起來的美國生產力與同時加倍破壞的

世界市場間的深刻矛盾，促使美帝不能不堅持：只有從根推毀它認為在戰後唯一擾亂世界市場恢復的蘇聯，並將蘇聯化為資本主義市場之一部份，美國高度的生產力才能繼續維持和發展，否則它的生產力會爆炸起來炸毀它的整個社會制度的。杜魯門、馬歇爾及杜威們，僅僅是美帝這一傾向之自覺的與堅決的代表而已。倘使羅斯福不死，他對推毀蘇聯的態度也決不會下於杜魯門和杜威等的。因此，要想真正避免美帝進攻蘇聯的第三次大戰，仍然同以前可能避免第二次大戰一樣，只有世界革命的勝利才可思議，別的任何辦法都是不可能的。但史大林及其黨羽不但早已放棄了世界革命，而且還用極度可恥的機會主義與冒險主義來阻止、癱瘓和浪費這種革命勢力的發展。例如戰後的初期，史大林黨使是以極可恥的機會主義，在法意及殖民地和平殖民國家拼命拉攏資產階級，爲了和他們建立「聯合政府」，討好美帝，不惜盡力壓抑工農的革命；近一年餘來又以極愚蠢的冒險主義和機會主義結合，拼命進行軍事冒險或發動毫無政治目的的總罷工等，以癱瘓和浪費革命勢力。這在客觀上，不但加速了美蘇戰爭的到來，而且是大大地替美帝準備的反蘇戰爭清除了最重要的障礙。

你的第二位朋友說：「美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因爲這兩個國家代表着兩種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美蘇代表着兩種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自然是無可否認的真理，但絕不能因此便得出「美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結論來。因爲還有世界革命的勝利可以消滅這個戰爭。假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一長時期內發生的幾個大革命，如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一九三〇—三三年的德國革命，一九三二—三七年的西班牙革命，不是爲史大林的官僚機會主義所葬送，只要其中一個革命獲得真正的勝利，不但絕不會有美蘇的第三次大戰，就是第二次大戰的根因也早已被斬斷了，也許現時整個人類已踏上了真正和平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呢！即在第二次大戰後，假如史大林不是用機會主義阻礙了法意及一些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也許現時整個歐洲和其他

的資本主義國家已走上革命的高潮，美帝將自顧不暇，那裏還談得上反蘇戰爭的準備呢！就是在今天，雖然法意及越南印尼等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已遭受了史大林黨的社會主義與冒險主義的損害，但這些國家的革命勢力還大部份保存着，還有重新抬起頭來，扭轉時局的可能。不過我們同時也承認，史大林及其黨羽對於法意等國的革命之阻礙，實在是非常之強有力的，在這些國家內新的革命領導（第四國際黨）的形成及其作用，如果抵抗不住史大林黨的破壞作用，那末美蘇第三次大戰便無法避免了！

第三次大戰如不能避免，將在何時爆發？戰爭也像革命一樣，我們根據科學的分析，可以預測它爆發的可能性乃至必然性，但要預言它在何年何月爆發，却沒有可能。假如你一定會我們預測第三次大戰爆發的時期，則根據美國現已達到的戰爭準備程度看來，可以說並不遙遠，或許在今後兩三年內。因爲將來的美蘇戰爭，主動完全在美國。而美帝之發動戰爭，一般必須視其準備到相當的程度而定。現時美帝之所以還不敢發動戰爭，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法意的工人革命勢力尚保存；在軍事上，西歐的整軍（所謂足夠抵禦蘇聯陸軍進攻的五十師團）尚在開始；尤其重要的是：美國將來藉以用超空堡壘裝載原子彈轟炸蘇聯重要城市的空軍基地大部份還未建好（如在斯堪第那維亞及北非等地）。假如戴高樂在法國登台，壓平了法國的革命勢力；西歐五十個師團已經組織完成；北歐及北非等處的空軍基地大致建好；那時美帝對蘇聯的進攻就將立刻爆發了。但在美帝實行進攻蘇聯之前，除了繼續進行「冷戰」外，某種和平談判也是可能的。但如果沒有真正的革命勝利來干涉，任何和談妥協都不過是美帝藉以準備戰爭之一種烟幕而已。戰爭的準備總是依其邏輯加速地走向它的爆發點的。其最後勝利究將屬於何方？爲了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將你的兩位朋友對於這個問題所已經作出的結論，加以檢討吧。你的第一位朋友說：「就是第三次大戰萬一發生了，勝利必然在蘇聯方面，因爲蘇聯是代表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如果

以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和計劃經濟來對抗美國的帝國主義壟斷經濟，自然是「代表歷史前進」的。但異常不幸，現時騎在蘇聯社會主義財產制和計劃經濟上的政治制度，却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絕頂反動、野蠻和殘暴的史大林官僚獨裁。正因爲這個官僚獨裁，以致陷蘇聯於極危險的境地，而今日美帝之積極準備進攻蘇聯，正是這種危險之最尖銳的表現。爲要勝利地抵禦并擊破未來美帝對蘇聯的進攻，正如爲避免美蘇戰爭發生一樣，也只有及時發動世界社會主義的革命。因爲這個革命一經發動，美帝及其所領導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就要陷於癱瘓和解體的狀態中了。我們可以說，世界革命是蘇聯手裏的「原子彈」！但史大林官僚層之害怕世界革命却並不下於美帝國主義，因爲這個「革命原子彈」如果真正爆炸開來，不但要炸毀美帝國主義，而且首先被犧牲的將是史大林的官僚獨裁。也就正因此，史大林不但不敢發動世界革命去抗禦美帝的進攻，而且將不斷地用他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去破壞任何真正的革命的。而以破壞世界革命的史大林官僚獨裁控制下的蘇聯去抗禦美帝領導下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進攻，那末「勝利」便很難歸到蘇聯方面了。因爲無論就一般的生產力、人力和武器方面說，美帝所領導的資本主義世界都遠遠地超過了蘇聯，何況美帝手中還握有極可怖的原子彈呢！我們可以想像：如果美蘇戰爭一旦真正爆發，美帝的超空堡壘將從北歐、冰島、英國、北非及日本和沖繩島等基地載着原子彈去狂炸蘇聯所有的重工業城市，摧毀它的大部份工業生產和交通機構的，——在這種轟炸底下，蘇聯的全部經濟生活和對外軍事活動很快就要癱瘓下來了，怎能談得上「勝利」呢！

可是你的第二位朋友所說的「第三次大戰的爆發，勝利將在美方」——這一推斷也不是完全正確的。固然，以美國所代表的生產力和武力，尤其是它所佔有的原子彈來說，可能在軍事上戰勝蘇聯，摧毀史大林的官僚獨裁制。可是它却絕對無法把已經實現過了三十餘年的社會主義財產制復辟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舊軌道上去。這與法國布爾喬亞王朝雖

藉外力在法國恢復王位，但它無法將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資本主義經濟恢復到封建制度上去是一樣的。何況人類，尤其是歐洲的工人階級和殖民地的被壓迫羣衆在第二次大戰之後既已深深地感到不能忍受，如果再經過慘絕人寰的第三次大戰，那就更將無法忍受，而將要瘋狂地昂起頭來反對美帝所代表的腐朽透骨與殘暴無比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預言：美帝對蘇聯軍事上的勝利，將使它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遭逢着致命的危機。假如在第二次大戰中已爭得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霸權的美帝國主義尚無法恢復資本主義的經濟，穩定資本主義世界，則經過第三次大戰更大的破壞與消耗後的美帝，又怎能找到出路呢！

「人類經過第三次大戰後，究竟是怎樣的情形？」對這個問題是很難具體答覆的。我們現時只能根據歷史已有的經驗作如下的幾種推測：(一)戰爭，特別是由於原子彈及其他最新式武器的使用，所給予人力和物力的破壞與摧毀，一定是異常可怖的，亙古未有的，慘絕人寰的。尤其在蘇聯和歐洲方面，將遭到極度慘酷的浩劫。蘇聯的大部份工業將被摧毀，歐洲的經濟基礎將連根動搖，幾千萬的人民將淪為灰燼，絕大多數的民衆將忍受煉獄的恐怖生活！(二)史大林的官僚獨裁被摧毀後，跟着而來的是全世界史大林黨的瓦解，——在這種情形底下，史大林集團中一部份官僚可能投降美帝，但蘇聯的工農羣衆將在各個地方自發地暴動起來反對美帝及史大林的官僚餘孽，為保存社會主義的財產制而鬥爭；同時各國史大林黨的黨員羣衆經過這次極端痛苦的教訓之後，也將迅速地覺悟過來，尋求真正的革命道路。(三)各先進國的工人階級和落後國家的一切被壓迫羣衆，將深刻地覺悟到資本主義的存在，只能給他們以戰爭的毀滅、無比的恐怖、絕難忍受的痛苦和犧牲，因而將急切地提出徹底改革這一資本主義制度的要求，尋找革命的領導。(四)在這一情形底下，以第四國際為基幹的革命領導，將迅速成長起來，領導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及一切被壓迫羣衆向社會主義的前途邁進。

「第三次大戰後的人類將往那裏走？」如果我們前面關於第三次大戰後的情形的推測是可能的或可信的，則對於這個問題便已經給予解答了。那就是：第三次大戰後的人類只能往社會主義方面走，別的前途是沒有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已到了盡頭，它替社會主義準備起來的客觀條件已到了爛熟，經過三次極度慘酷的世界大戰，更表明它本身沒有繼續存在的任何理由，只能讓位於社會主義制度，人類才不致陷於毀滅而能往前發展；同時因為各國史大林黨在第三次大戰中不可避免地要遭逢毀滅，則二十餘年來阻害民衆走上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極大障礙物也就不復存在了。這時，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一切被剝削被壓迫民衆將可能迅速地團結到第四國際的旗幟下來奔向社會主義的前途的。這便是全人類走向真正和諧與繁榮發展的遠景！

「中國在第三次大戰中將遭到何種災難？」這也是很難具體答覆的。我們現在只能推想：其災難是異常之可怕的，也許有幾千萬人要被犧牲，全部的國民經濟要遭受空前的破壞，全體人民要過着地獄般的恐怖生活。因為第三次大戰在東方的主要戰場將是中國大陸，蘇聯的一部份飛機與陸軍將和美國所指揮的飛機與陸軍在中國大陸上進行慘酷的鬥爭。無須說，這種慘酷鬥爭的犧牲，絕大部份是要落在中國人民頭上的。至於第三次大戰後中國將往那裏走？那將由全世界的人類將往那裏走來決定。你的第一位朋友斷定「中國將東歐化」，那是根據於他認定「勝利必然在蘇聯方面」那個前提演繹出來的。但這全是空想的。雖然我們並不否認在第三次大戰爆發前，中國的東北，甚至華北有東歐化的可能，但根據我們前面對第三次大戰後的整個世界局勢的估計，中國是根本談不上甚麼東歐化的。而且根據前面的同一推測，你的第二位朋友所說的「中國在第三次大戰後將變成爲美國的殖民地」，也是謬誤的。因此我們以結論是：第三次大戰後的中國既絕不是跟着史大林統治着的蘇聯走，也不是跟着美國走，而是要同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和其他被壓迫民族走「第三條路」——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

至於你最後問：「那時的中共又將怎樣？」這個問題我們在前面已經順使答覆過了，那就是：這個黨也將同其他各國的共黨一樣，將跟着蘇聯史大林獨裁制的毀滅而分崩離析；其上層官僚也許投降美帝，但其下層羣衆還是會醒悟過來尋找新的革命出路的。因此我們又可以說：不管現時中共在軍事上如何爭得勝利，但當第三次大戰到來時，它是會烟消雲散的。而它現時依靠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所取得的某種勝利，只能是曇花一現罷了。

最後我們希望你同其他的讀者們特別注意：第三次大戰雖然很緊迫，需要我們理解它，但最最重要的還是：需要我們努力奮鬥，使用各種可能的辦法來阻止它。而阻止戰爭最有效的方法，則在喚起人民大眾了解第三次大戰對人民大眾的危險性和可怖的毀滅性，號召他們自己團結起來，用自己的革命力量盡可能地去阻止戰爭，這樣的阻止，在今天看來還是可能的；萬一戰爭無法阻止時，便以自己的努力去儘速結束戰爭，即準備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轉變美帝的反蘇大戰——這才是我們今後應集中全力去注意的根本問題，應從事的偉大工作。我們根據人類歷史前進的規律，堅決相信：人類的前途總是樂觀的，縱或美蘇第三次大戰不可避免，但人類的光明前途絕不會因此而有所阻礙。我們只一定要在歷史前進的火車頭上努力奮鬥，我們的努力一定是有結果而會獲得歷史的酬報的。

更正

上期第五頁上排末尾第三行的「出超」，實爲「入超」之誤，特此更正。

十一月十五日

新聲月刊(原名青年與婦女)第三卷第七期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所 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售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新聲

評四外長會議無定期休會

鏡微

這次在倫敦召開的四外長會議，經過了整整三個星期的喜劇性的談判之後，終於被宣佈『無定期休會』了！這還是外長會議本身完全陷入僵局之表露，而且是美國和蘇聯在聯合國機關內公然宣告破裂的第一聲。

這次會議破裂的直接原因，雖然是由於賠償問題，即所謂『各西方強國均反對蘇聯之要求提取德國生產物作為賠償』（路透社倫敦十五日電）的問題，但其根本癥結乃是美蘇間的基本利害在德國問題上之絕對無法調解的必然後果。因為華爾街主人戰後對外的基本政策，既在組織資本主義世界包圍蘇聯，準備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來摧毀它，則對於歐洲心臟的德國，特別是其西部的工業區，無論從經濟和軍事的觀點上，都須絕對加以控制，務使它成爲未來進攻的主要堡壘。但在

現吧了。

克里姆宮方面，既已放棄了世界革命而以『一國建設社會主義』自限，則爲了抵抗未來的帝國主義的進攻，也就不能不在德國，至少在它的東部，來建立重要的防禦陣地了。在美蘇統治層這種完全相反的企圖之下，對於德國問題的任何妥協當然絕沒有可能，遲早必然要引到破裂的。本年春天莫斯科的外長會議已經預告了這一破裂，這次倫敦的外長會議不過是將以前的預告加以實

義的包圍的。這樣，美國同蘇聯在歐洲大陸上的鬥爭便更將一天一天地短兵相接了！其次，由於德國問題的決裂，九很快就要影響到日本問題方面來。大概在不久的將來，美國將以更堅決的態度片面地『解決』日本問題，就是說，九

不管蘇聯反對與否，美國將聯合英國和壓制中國與日本『訂立和約』，把日本放在它的『合法的管轄』之下，從東方加緊建立攻蘇的主要堡壘。至於整個聯合國的機構，經過這次倫敦外長會議的破裂，已經完全暴露了它的無能與破產，再也不會發生什麼作用了；縱或它在未來還會召集一些什麼會議，那不過是在美蘇間的衝突進程中之一種純粹的外交粉飾而已。因此，我們可以說，這次倫敦四外長會議的破裂，又一次昭示着全世界被剝削和被壓迫的民衆們：要想阻止美國進攻蘇聯的戰爭，要想挽救全人類免於原子彈的浩劫，只有用自己的力量起來干涉，用自己的力量取得權力，把這個星球的舊制度根本加以改造，此外的道路是沒有的。

從援歐計劃看美國外交趨勢……紀芬
蘇聯幣制改革與取消配給制……紀芬
法義發生了什麼……劉乃光
法國經濟復興的極限……沈念譯
革命集團在法國的重新結合……伊華譯
從威爾頓事件看法國……伊華譯
革命危機在意大利……伊華譯
錫蘭普選中左派的勝利……伊華譯

論 評四外長會議無定期休會……鏡微
大鈔與郵電加價……韻覽
『行憲』前夕……流光

評『反蘇大陰謀』（書評）……旭東
中國社會性質的再討論（信箱）……世明

爪哇國際 革命集團在法國的重新結合……伊華譯
從威爾頓事件看法國……伊華譯
革命危機在意大利……伊華譯
錫蘭普選中左派的勝利……伊華譯

評『反蘇大陰謀』（書評）……旭東
中國社會性質的再討論（信箱）……世明

37年 1月1日

“憲行”前夕

政府當局已於十一月下旬「普選」出了「國民大會代表」，以準備召開「國民大會」，實行憲法。在「普選」前夕，據說「全國億萬之民，即將初次行使其有生以來最爲莊嚴神聖之選舉大權」，但既然如此，既然這是「今後中國民主前途興衰之所繫」，像同一中央社電訊所稱譽的，那末，全國民衆使該非常踴躍的參加投票了。可是「事實勝於雄辯」，一切美麗的宣傳，都掩蓋不了鐵般的現實。我們從各地「大選」報導中看到的，全都是「情形並不踴躍」，以及「冷清清」等素描；而大多數「選民」——尤其知識份子——之放棄投票，更是報紙所無法隱諱的事實。這是一個極大的矛盾，但牠是怎樣造成的呢？

這其實是不難解釋的。所謂普選，實即只是由國民、青年、民社三黨提出牠們的候選人，叫民衆投票加以認可吧了。民衆對此不感興趣，自然是他們不甘做「阿斗」的表現。難怪在憲法實施促進會反對「討價還價的黨派提名」時，主席孫科只能答稱：「提名是政黨內部之事」。這就無異承認普選是政黨內部之事了，因爲所謂普選也者，只見圈定和承認這三個政黨的提名而已。既然是「政黨內部之事」，則民衆無權過問，因之表示冷淡，那是理所當然的！

光流

但不幸事情還不僅限於「三黨包辦」的提名哩！依照民主政治的常識，根據歐美普選的先例，凡是到達一定年齡的男女國民，都具有選舉和被選舉權，每一政黨都享有參加競選的權利；而且，在實行普選之前，每一人民及其政黨都應完全享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信仰及人身等的一切基本自由。只當他們全部享有這些民主權利時，他們才有可能充分發表其政治主張，熱烈參加競選；而全國選民也才有可能認識清楚誰的主張是真正代表民衆謀福利的，因而投誰的票。這樣才算充分反映民意。所以普選的前提條件，是讓人民及其政黨充份享有上述的基本權利，沒有這些權利而侈談普選，那只是費錫者流的玩意兒吧了。

我們試拿這項前提條件去衡量中國今天的「普選」和「行憲」，那牠的真實價值是不難立辨的。

首先，關於言論出版自由，真可說是愈接近「普選」和「行憲」之期，其限度便愈被縮小了。據今年五月國立政治大學的新聞研究會季刊所統計，在過去二月間的全國新聞界大事中，搗毀封閉以及逮捕的事實竟佔十之八九。而「普選」前不久頒佈的新「出版法」，如十一月六日大公報社評所指出的，都是消極多於積極。條條規定的是如何防止或懲罰報館報人，却沒有一項說明如果報館報人之自由遭非法侵犯時，應如何保障。不得登載「意圖顛覆政府」，「妨害邦交」，「妨害本國及友邦元首名譽」等事，「這樣束縛下去，無異……把它變成爲一具歌功頌德的機器」。如此，今天中國「普選」和「實行憲法」前的言論出版如果稱得上自由的話，那顯然只是「歌功頌德」的自由了！

其次，成爲集會結社自由的諷刺畫的，就是不久以前民主同盟之被宣布爲非法團體，被迫停止活動。像民主同盟這樣溫和的政治集團，沒有武裝也沒有確定政綱，（當然更不必說激烈的革命的政綱了！）也不能存在，甚至連「行憲」前夕牠所能盡的粉飾「民主」的作用，也被乾脆拋棄；那末，「競選」更難於「青一色」化，但對於集會結社的自由，却未免太不調和了！

大鈔與郵電加價

在戰爭不斷進行、政治日益腐化、經濟不斷破產的情形之下，通貨的不斷膨脹，乃是不可避免的結果。此種通貨膨脹，宛如一種寒熱症，每隔一定的時期，必然要週期性地爆發一次的。而在每一次的通貨膨脹之後，貨幣籌碼又必然缺乏，當局爲着適應客觀的需要，只有增發大鈔。但每一次增發大鈔，必然又刺激物價的上漲，這是一種邏輯的循環。在這種通貨膨脹的情形之下，政府當局要想根本制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但假如稍能對物價的控制慎重加以考慮和處理，未始不可稍緩和一點，不致像現時那樣，有如脫了韁的野馬任其奔馳。

但政府當局每發行一次大鈔，一方面雷厲風行的發出禁令，甚至出動大批經濟警察來制止商人乘機抬高物價；可是同時在政府所直接管轄的公用事業方面，却每次跟着增發大鈔而宣佈漲價，而且一漲便是幾倍，這種情形，差不多成爲一種慣例，這次又是如此。據十二月十一日大公報中央社南京十日電：「關於中央銀行發出關金一千元，二千元及五千元一事……所望商民切勿藉此抬高物價，本部並已洽由地方政府及各地金融管理機構嚴密注意，倘有乘機煽惑擾亂金融情事，決予依法嚴辦」。但在同日報紙且在同一版上，又以大字標題：「郵電今日起加價，平信二千元；掛號五千元；電報電話價目均漲兩倍」。這是何等矛盾的熱鬧！

像這種矛盾的現象，是沒有任何理由可資解釋的。當局既然要在發行之後，制止商人藉此抬高物價；但爲什麼却於大鈔發行之同時，又宣佈郵電漲價呢？這不是很顯然的在領導着物價上漲嗎？當局的公用事業既然事實上已跟着大鈔而漲價，則

至於嚴禁罷工之三令五申，以及去年『憲法』之明定信仰只限於一種主義或宗教，更已早成定例。而關於人身自由，則最近于子三案及無數被非法逮捕監禁的事件，都是最好的例證，證明這項自由正在怎樣地被日益踐踏得不成樣子！這些事實太多了，誰能熟視無睹而已於言呢？又誰能否認牠們都已成了政府決心實行憲法的試金石呢？

但現在，隨着『普選』之後，政府已宣布決定在十二月廿五日正式『結束訓政』，『實施憲政』了！從這一天開始，全中國的人民都似乎給允許過一種『民主政治』的生活，給允許享有憲法上所規定的自由權利了！這一宣布，對於數千年來飽受專制政治壓迫的中國人民，該是何等『喜出望外』呀！不管人們所實施的憲法本身包含有許多的缺點，（關於這，本刊從前早已指出過了！）但能够有一部憲法來保障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不致再受『朕即國家』，『朕即法律』那樣專橫暴虐的統治，這總是值得鬆一口氣的。在去年通過的憲法上面，所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身體等基本自由，都已用『黑字寫在白紙』上了。（雖然被附了一條『限制』的尾巴！）在沒有如此隆重地宣布要實行這憲法以前，正如上面指出的事實一樣，政府已經不斷地侵犯了人民從憲法中所應得到的民主權利。但既然今天行憲的支票已經簽發，則人民便有充分權利，要求政府言行一致，予以兌現了！誰都知道畫餅是不能充飢的。中國人民所急需的並不是空言的允諾，而只是民主權利之真正得到保障。假如政府真有決心實施憲政，信守牠的諾言，那末，從這一天起，就應該用行動，用事實，來向全中國以至全世界人民證明：支票決不是空頭的。只有今後的事實然後能表現出政府『行憲』的誠意和決心！

不過，不管政府行憲的決心如何，中國今天急需召集真正普選的國民會議，實施憲政，却是無可置疑的。因為中國目前的根本難題太迫切需要解決了：遷延不決的戰爭，通貨膨脹與物價奇貴，廣大民衆的失業與貧窮，農民的大批喪失土地與死亡！沒有一個問題不是在急待馬上解決。能够解決這些國家根本問題的，只有全國民衆的覺醒、團結和行動。而能够幫助民衆覺醒和團結起來，推動他們去奮鬥的，就是由普選產生并具有全權的國民大會，經過牠來實行一切的民主改革，只有牠才能充分代表全體城鄉民衆的利益，反映他們的悲緒、慾望和要求，從而獲得他們的支持，有足夠權力解決一切問題。（像法國一七九二年的國民會議那樣！）這就是我們一貫所主張、並號召民衆爲實現牠而奮鬥的，因爲只有這樣的國民會議才能解決中國目前的生死問題。但去年已經召開過的和今天將要召開的國民大會都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因爲牠們都沒有經過真正的普選，產生民衆自己的真正代表去組成牠。但假如一個無能的射擊手沒有射中鵝的，決不能證明槍砲或射擊術的無用，而只表明這個人之無能和必須撤換吧了。當然，如果撤換一個人時還不能憑他本人的自動退讓來達到，則召集真正普選的國民大會，實施憲法，自然更不能由上面來欽賜了。牠必須由下層民衆的覺醒和爭取，才能真正實現的。今天人們要召開如此這般的『國大』，宣布實施憲政，這證明目前中國確具有這種民主的客觀要求；不然，人們也用不着這樣做作，企圖以此塞責了。但魚目到底還是魚目，假如要求得珠的人反得了魚目，當然是不滿足的，他們將繼續爲真正的目的而奮鬥，而這首先就需要揭破一切假『民主』的外衣了！

制止商人抬高物價的禁令，必然因不能折服人心而失其效果。因此，在當局於大鈔發行之後，雖然採取了一切『嚴厲』的措施，但結果米價却因大鈔的刺激從七十多萬元跳到百萬元大關以外，魚肉蔬菜及一切日用品亦無不隨之而高漲起來。已經不能生活下去的人民，怎能受得起這樣嚴重的威脅！

如果戰爭仍舊繼續下去，政治仍舊腐化下去，則這種週期性的通貨膨脹，勢必不能遏止，因而物價也將無限制地繼續增高，勢必釀成大災禍而後已。

（韻寬）

一 幕民主選劇

本市名律師張紅薇此次競選國大代表，在婦女團體中……當選第三名，後經本市選舉事務所主任委員吳國楨迫其退讓，另以龔蔚珍遞補。（按龔爲候補第三名）張因此種措施於法無據，故決向法院提起訴訟。——十二月四日上海大公報

謝

本刊爲了經濟關係，改出第九、十期合刊。這期間，又收到了讀者們許多的來信和捐款，表示同情和支援，除了已向幾位熱識的先生面謝外，現在我們還要向下列諸位函寄捐款的先生深致謝意：

啓

- 王金生先生十五萬元
- 方庭先生三萬元
- 潘克勤先生五萬元
- 洪藍先生五萬元
- 台灣王先生六十萬元
- 羅女士五十萬元
- 浙東溫先生四十萬元
- 李先生五十萬元

新聲

（原名青年與婦女）第二卷第九、十期合刊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陳景光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總經售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從援歐計畫觀測美國外交的趨勢

紀芬

羅斯福計劃擴大 Unite States 而為 Unite Nations 的規模闊大的理想，顯然已成了一種價付代價甚大而前途却愈來愈渺茫的奢望。敏感的政治家久已預言，美國在這次大戰中爭得這個舊資本主義世界的霸權，差不多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但不幸這種勝利却含有濃厚的歷史悲劇的意義，牠是在舊制度瀕於破滅的廢墟之上取得的。

戰後兩年來，展開於美國眼前的是三重的危機：第一，戰爭給了資本主義世界以毀滅性的打擊，從歐洲到遠東，差不多所有舊制度的國家都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政治上陷於嚴重的崩解過程中；第二，蘇聯的繼續存在，以及克林姆宮在歐洲和東方所進行的分裂運動，更加速了這一解體的過程；第三，上述兩種危機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市場恐慌，使美國的龐大生產力遭逢致命的威脅。戰後美國全部內政和外交政策儘管充滿經驗主義的盤旋和曲折，牠的一般傾向總是圍繞着這三種危機而發展的。

怎樣解救這個世界市場的危機？——這是目下白宮政治家們所苦心焦慮的生死問題，什麼『維護民主』，什麼『保持文明』，什麼『世道一心』全是一片哄騙小孩的謊言亂語。

在這次蹂躪全球的戰爭中，美國所最引以為自慰的是大英帝國的崩解、德國工業的無可挽回的摧殘及東方日本的屈服，一句話，戰爭使她的競爭者（不管處於敵國或同盟者的地位）通通倒下去了。但問題却在這裏：德國經濟的摧殘無異折斷了歐洲產業復興的脊樑骨，牠所招致和加深的經濟衰敗的災害，直到今天尚支配着整個歐洲。另一方面以大英帝國為首的幾個古老殖民帝國的崩潰却造成了東方殖民地的普遍紊亂、叛變和無止境的戰爭威脅。

羅斯福最初的計劃是幻想利用戰後的困難來屈服整個世界（包括他所愛好的史大林），他的聯合國，他的以美國資本為首的世界復興銀行，他的救濟機構，……通通都是他實現這個計劃的工具。但不幸當他的後繼者——杜魯門、貝爾納斯、馬歇爾之流——執行他的計劃時，却一步一步的發現：理想是灰色的，生活是常青的。一方面，羅斯福絕對想像不到這次戰爭對他所代表的舊制度，打擊得那樣致命和深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他也想像不

到克林姆宮的官僚們除了受帝國主義的壓力之外，還受蘇聯本國固有財產的壓力。他一相情願地以為經過借款之類的經濟壓力便可以輕易地迫使蘇聯官僚放棄對外貿易獨占權，這未免過於天真了，他不知道對外貿易獨占權的放棄就等於國有財產的傾覆，而蘇維埃官僚却是寄生於這個財產制度之上的。現在事實已證明，苛刻的借款條件已迫使蘇聯官僚絕望地轉而對德國，對東歐，對滿洲實行空前的工業剝除和搶掠政策，順便還進行種種威脅性的改革。這種政策不僅加深了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衰敗，而且憑空把歐洲割裂為兩截，使互相依存的工業地帶（西歐）與農業地帶（東歐）人工地分離，使整個歐洲工業，在舊基礎上復興和穩定更變成不可能。

這就是美國對蘇『強硬外交』的根源，同時也說明了戰後美蘇衝突驟然緊張起來的原因。為了穩定這個世界，必須藉第三次大戰毀滅蘇聯；蘇維埃國家的摧毀一方面可以在政治上解除革命的威脅，另一方面可以在經濟上使資本主義恢復一塊很大的市場——這就是今天在白宮統治者心目中已成定論的目標。美國的全部外交和國內的政策都已公開地以這個目標為指導觀念，不了解這一點也就無法懂得美帝國主義者的真正動機。

首先，美國靠了一道泛美洲的反共軍事公約把整個西半球團結起來。接着，牠便要用全力解除歐洲經濟和社會崩解的危機及因而引起的革命威脅，尤其是受革命疫病傳染最深的法義，喀斯貝里之流久已發出連續的呼救信號了。歐洲崩潰所造成的社會主義革命大災將是無法抵擋的，整個東方殖民地甚至連美洲也將迅速被大火淹沒了，這是美國必須挽救和穩定歐洲的原因。

第一次歐戰之後，美國對歐洲也盡過同樣的歷史作用，那就是實行有名的道威斯和楊格計劃，牠會緩和了德國經濟崩潰和革命的危機，造成一九二四——二八年的相對穩定局面。現在所謂馬歇爾長期援歐經濟計劃，只不過是過去計劃的翻版而已，牠的目的也在追求同樣的穩定。但我們必須不要忘記這幾點重要的背景：前一次大戰後的德國在工業上並沒有遭遇到像這一次這樣致命的報復和摧殘，她也沒有遭受到像今天這樣的分割；整個歐洲也並沒有被人工地分成兩截，她的經濟也沒有陷於像今天這樣難於挽救的破

產局面，這就是道威斯和楊格計劃成功的秘密，同時也是未來馬歇爾計劃難免遭遇破產的根源。

回憶過去二年來，美國對歐洲的援助也並不算少了，尤其是英國，她於戰爭結束之翌日便得到三十七億美元的大借款。但美國對於歐洲的拚命救助都或多或少被上面提到過的幾個因素抵銷了——那就是德國工業的瓦解、東歐的分立，與殖民地的動亂。這幾個因素使歐洲在經濟復興過程中必然遭遇一個不可克服的難題——糧食、煤、鐵及一般原料的缺乏。這種缺乏當然只好求之於美洲，結果每一次借款徒然給了美國過剩糧食與原料品一個傾銷機會，這也是過去數年來美國橫亘全世界貸款的主要意義。但美國的愈來愈驚人的出超額，在經濟學的意義上說來，並不是健康的徵兆，因為只有輸出而絕少輸入，勢必造成美國本身物資的耗竭和通貨膨脹，而實際上這種危機也已造成了，萬一舊世界短期內在經濟上還得不到穩定的機會，換言之，萬一東半球，以歐洲為首的經濟機軸繼續崩潰下去，則美國靠借款來維持的生產行程便告中斷，而含有破局意味的大恐慌便要來臨——這是美國統治者所日夜焦慮的大危險，同時也說明何以美國對歐洲的借款和救濟一次比一次還要急迫，規模也一次比一次大。

馬歇爾援歐的長期計劃現在雖然尚未執行，但最近杜魯門向議會特別會議所提出的緊急法案，已清晰的證實我們上述的意義了。他率直地指出在馬歇爾計劃執行之前，必須把歐洲，尤其是法、意今冬所遭遇的危急狀態加以解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要解救舊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美國人民必須束緊袴帶，重新回到戰時的有組織的飢餓生活，否則便有同時招致美國經濟破產之虞，這就是杜魯門提案後半截所謂反通貨膨脹的真實言語。美國的政策使我們很容易想起一個盲目的人在死巷中繞圈子。

即使我們假定未來的馬歇爾計劃，終於把歐洲某些國家（如英、法等）戰後得來的微薄的復興加以延續，但由此所喚起的市場問題，即歐洲資本主義國家與美國的商品競爭問題也必然使這個計劃傾覆，到時不僅歐洲經濟將重新被打擊，而美國的經濟危機也跟着爆發。所以歸根究底，美國對外的救濟計劃只盡了一種極輕微的延緩危機爆發的作用，這一點華爾街實在也知道得太清楚了，於是經濟援助必須而且只能與一般的備戰計劃相輔而行，或者更清楚的說，只能是後者之一部分。

現在我們也無須重複解釋，美國的拚命救助舊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

不管是臨時的應急的救助（如法意借款與最近對華的三億元借款）也好，是長期性的救助（馬歇爾計劃）也好，其主要目的還是企圖在新的戰之前夜，消滅革命的威脅，加強她的經濟、政治和戰略的據點。

我們相信上面所述的已順便解答了一個問題——何以美國致全力於援歐，而把遠東放在第二位？這正如在第二次大戰中，人們不斷責難羅斯福的同一問題一樣。焦急的中國當局是永遠不會了解白宮主人這種苦衷的——喪失了歐洲就等於喪失了一切！但這并非表示美國放棄中國，不是的，美國之樂於支持中國政府正如支持全世界各地所有陷於危急狀態中的資產階級政權一樣；所不同的只是緩急輕重之分而已。這一點也決定了中國的命運——她的救濟既然已被排在歐洲那個有點渺茫的馬歇爾計劃的日程之後，她將多份在痛苦的混亂和衰敗之中，被拖入未來大戰的屠場。

這就是美國對外政策的總趨勢，假如我們盲目地跟這個政策走，則中國以至全世界人民也就無誤地一直走到新的毀滅深淵中。幸而美國的政策遭逢着那樣巨大和複雜的、不可克服的障礙，在這些障礙當中，最富於爆炸性的便是歐洲和遠東的革命潛力，美國本身的龐大工人組織以及一個日趨成熟的新的革命領導的抬頭。現在意大利已處於直接革命的狀態，法國也開始從革命前夜走入革命狀態中，整個歐洲已逐步捲入革命與反革命的新決鬥中，這個決鬥將比之美國的備戰外交無比現實和具有決定性。假如美國必須經過組織歐洲來霸佔全球，則社會主義革命在歐洲全面勝利之日，便是全世界舊制度敲響喪鐘之時。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上接第七頁）清晰無誤的指示出蘇維埃人民在史大林官僚們的盲目的指揮之下，連一種含有可憐的計劃意義的日用品分配權利也喪失了。今後在分配方面，他們將完全依賴於商品市場，並受牠的法則支配、凌辱和剝奪，使分配的不平等現象漫無止境地加深；雖然這一法則往往受到官僚警棒的『調節』。這不是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巨大諷刺是什麼？

蘇維埃經濟危機的異乎尋常的嚴重性已到了爆發點了，計劃經濟已陷於危殆中，官僚的左右跳躍已完全失去『調節』的作用，只能愈來愈加劇這個危機的爆發。除非蘇聯的下層人民發動一個新的政治革命，把蘇維埃制度這個無能和愚蠢的寄生官僚統治埋葬，在真正的蘇維埃民主的光照之下，重新審定一個合理的經濟計劃，——除非蘇聯人民替歷史打開這新的一頁，否則十月革命的人類成果將被完全腐蝕掉了！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八日

蘇聯幣制改革與取消配給制之意義

紀芬

十二月十四日俄國蘇維埃部長會議及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聯合公佈一道決議，宣佈實行調換新盧布和取消配給制。這種『改革』之值得注意，不僅僅在於牠所引起的後果，而最重要的還是在於牠所暴露的危機——久已存在而且日益加深着的危機。

一 盧布危機的根源

首先，我們試研究一下這次『改革』的動機，據官方文告自己承認是在於解除嚴重的通貨膨脹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則是戰時消費工業的萎縮及希特勒大量發行的假盧布造成的。他們更大膽地拿戰時流行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通現象來辯護。一般資產階級報紙是慣於對蘇維埃官僚的每一步跳躍發生歇斯得里的反應的，牠們又把這一『改革』了解為『對抗馬歇爾的援歐計劃』，甚至『造成盧布的國際地位，足以和美元相拮抗』。事實上蘇維埃的通貨問題不僅僅發生於戰時，而蘇維埃官僚在這一問題上的跳躍也不是發生於今天，至於盧布之能否取得國際的信用地位，足以對抗、甚至超過美元，也不決定於一紙功令，而決定於對蘇維埃生產力的最後分析。

資產階級的庸俗的經濟學者拿蘇聯的假想的黃金存量來衡量盧布穩定之可能性。這純然是一種淺薄可笑的見解，現在誰也知道，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美國已操縱了驚人的黃金儲藏，但這仍不足以防止美元的歷史性的貶值。通貨的基礎；最後分析起來，不是存在於政府在某一時期內儲存的貴金屬總量，而是存在於本國的生產力的水準，以及生產各部門間，尤其是工業與農業生產間的關係之上。

蘇維埃生產是在沙俄一份殘破的遺產的基礎之上進行的，雖然經過了工業化的過程，但直到今天為止，牠的生產力的水準仍然遠落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後面。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於牠的經濟基礎過於落後，另一方面則在於牠處境的孤立，迫使牠不僅在國際上必須經過資本主義的交換方式才能獲得工業品的援助，而且在國內也必須至少部分地經過同樣的方式才能取得充分的農產品和原料品。在國內，『自由市場』的存在和擴大，以及一般消費品之恒久的缺乏本身就是蘇維埃經濟基礎的致命弱點，牠迫使蘇維埃人民對商品

經濟的依賴愈來愈厲害。而這種商品經濟的象徵就是盧布。蘇維埃的對外貿易是由政府操縱的，但這種便利並不能抵銷國家生產落後所造成的後果，牠只能以本已不足的農產品、原料品、一部分半製成品及黃金來交換資本主義的工業品，這種交換本身受到極痛苦的限制——一種落後的牽制，而且命定要依賴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連同牠的國際通貨，只有當蘇維埃經濟真正超過了資本主義的生產，牠才能够在世界市場上建立一種新的權威通貨和信用——不僅對抗、而且超過美元。

不幸得很，盧布的物质基礎還遠落在這個水準之後。但假如蘇維埃當局能根據一種健全的和諧的計劃經濟政策，發展蘇維埃的工業化和集體化，也許至少可以維持盧布在國內市場上的平衡和信用；工業各部門間、尤其是工業與農業間的和諧的、合乎節奏的發展，可以令國有經濟逐漸侵蝕私人經濟，縮小『自由市場』的範圍，這是穩定盧布的最不可缺的前提條件，而盧布地位的穩定和提高又是蘇維埃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對商品經濟勝利的最好的指標。但在過去幾個五年計劃中，蘇維埃官僚政策所表現出來的最大特點恰好就是打破這種和諧！瘋狂地鞭策重工業的發展，結果對輕工業，主要是對日用品工業採取輕蔑的漠視，百分之百集體農場的實現却造成人工的大飢饉。

一般物質基礎的貧弱與官僚的盲目的數字追求，以及工農大眾消費品的奇缺與工業化的瘋狂鞭策，發生了巨大的矛盾，這個矛盾的直接後果之一便是通貨膨脹，盧布的不斷貶值。那末，這種通貨膨脹，並不如官僚們所說，起於戰時，這個危機，遠在戰爭之前便像一條赤線一樣貫通於短短的全部蘇維埃經濟史中，戰爭只不過把過去的危機加以尖銳的表現吧了。

蘇維埃官僚掩飾這一危機的最可笑的藉口之一便是稱他普遍存在於戰時各資本主義國家，在這裏他們完全忘記了他們昨天關於『蘇聯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謊言了，假如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真的已取得『完全勝利』，牠應該比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更能抵抗通貨膨脹的襲擊，但不幸得很，當蘇維埃官僚迫得要用新的『改革』來對付盧布的危機時，我們還沒有見到美元採取同樣的政策。

另一個掩飾也同樣可笑。他們竟引證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對於沙俄盧布的整理。他們完全忘記了列寧是在新的經濟基礎上整理沙俄的欠債，而史大林却是在自己所造成的危機的基礎之上橫暴地剋扣他對於蘇維埃人民的欠債。關於這一點，我們馬上加以揭露。

二 在盧布「改革」中犧牲了誰？

官方法令解釋蘇維埃的「通貨改革」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同樣「改革」的最大不同就是：後者將「通貨改革」所引起的損失「轉嫁到勞動人民身上」，而前者則並不是以勞動人民為犧牲的。但假如稱這一「改革」對「勞動人民」全無損害，當然說不過去，所以同一法令又跟着解釋說，最大部分的損失由政府負擔，而人民所受的損害則只是小部分，而且還是短暫的。

現在我們把法令所隱藏着的真實意義加以揭發。

首先我們必須記得在這項「改革」工作開始之前夜，蘇聯國內，已發生了普遍的「擠購」風潮，這種風潮，現在官方歸咎於「投機份子」，事實上，只要有點常識的人就知道，在蘇聯擁有大量購買手段的人——所謂投機份子——只是那些享有特權的官僚，包括托萊斯的上層份子和集體農場中的「百萬富翁」，只有他們才深刻察覺蘇維埃通貨的危機，並甚至首先知道這一改革的來臨，那末當然也只有他們才是發動「囤積」和「搶購」的禍首，他們在「改革」之前，已預先把舊盧布換成貨物了，換一句話說，蘇維埃的特權官僚層早已在「改革」之前把損失儘可能的轉嫁掉了。

改革法令本身也不是在打擊投機的官僚，而是在「改革」所引起的損失中，儘可能進一步維護特權官僚的利益。牠雖然規定「目前流通中的以及民衆手中的貨幣」，以十對一換算，但對於銀行存款者及公債債權人都極力降低這個換算率，由一對三竟至一對一。誰也知道，在蘇維埃國家中持有巨額存款和公債券的只能是少數暴發戶和特權官僚。那些廣大的靠每月一百至幾百盧布工資和可憐的配給品過日的下層工農份子享受不到這種優待的。但手頭上持有盧布現款的人却正是廣大的下層消費者，他們是蘇維埃購買力的泉源，他們由於消息不靈通和缺乏特權，在「改革」前夜多數是來不及「購貨」的，因此他們也就是「十對一」的主要犧牲對象。

三 新的危機在醞釀中

蘇維埃官僚對廣大下層消費者的安慰便是：新的「改革」並不剋扣工資，

甚至以原樣數目的新幣來償付工資。另一方面，他們在法令中補充道，「取消配給制」與強力抑低「自由市場」的商品價格，却反而增加了工作者的實質工資。這是對於官僚的橫暴手段加以美化的企圖。不錯，因「改革」幣制而引起的損失，對於手持現款的消費者是暫時的，但由於同樣的理由，政府爲了「綏靖」下層消費者的不滿而施捨的小恩小惠，也是暫時的。任何略具經濟常識的觀察者總也承認，這次蘇維埃通貨危機的尖銳化，官僚們甚至拿來和第一次大戰後沙俄的盧布危機來比擬！是蘇維埃經濟底深刻危機的反映，我們更不要再忘記她發生於企圖緩和這一危機的第四個五年計劃實施的一年多之後！那末，官僚們突然採取這一政策也只是「一種跳躍式的應急政策，牠不但不能解決這一危機，而且只有在新的基礎之上準備一個新的爆發。

主要問題不是在蘇維埃下層工人們獲得一種與舊幣同等數量的新幣，而是在於用這同等數量的新幣能否繼續購買一定量的消費品。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又主要依賴於蘇聯的消費品工業生產能否滿足這一要求。依照新五年計劃的傾向看來，蘇維埃官僚所注意的顯然不是滿足廣大工農消費者的要求，而是繼續維持重工業的恢復和擴張政策，外來的戰爭壓力更加劇這一趨勢。那末，在消費品生產繼續奇缺的情況之下，取消可憐的配給制，把下層工農大衆完全投入商品市場中去，所產生的後果是不言而喻的。官僚們或許尚安慰他們說，我們還有一根警棒可以平衡物價。是的，官僚們已不止一次迷信一根警棒可以解決物價問題了，但這也只是抄襲資本主義波拿帕政制的手段吧了。一根警棒畢竟不是一根魔術棒子可以產生足夠的消費品來平衡市場價格的波動。許多新鮮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嚴峻的官定價格和警察手段只能將商品趕入地下，趕入黑市場中去——這是官僚制度的市場統一政策的唯一後果。這正如專橫的思想統一把反對派趕入地下活動一樣。我們敢確切的斷言：在「改革」法令頒布之翌日，在官定的「自由市場」之外，將必然產生黑市場的活動，而過去存在於「自由市場」與配給制之間的巨大價格差異將改頭換面出現於官定市場與黑市場之間，這是一種盲目的自然法則的活動，並不是官僚的警棒所能制止的。那末，廣大下層人民今天所得到的暫時的安慰將迅速喪失牠的價值，新的不滿與新的危機就必然要採取更猛烈的形式爆發出來。

配給制的取消與對商品市場關係的屈服給予我們一種更大的諷刺意義：牠不僅推翻了官僚們關於「社會主義天國」的神話，而且（下接第五頁）

法義發生了什麼

劉乃光

從十一月中旬起，法蘭西和義大利都相繼湧發了戰後第二次的革命浪潮。三百多萬的法國工人，風起雲湧地實行了總罷工！罷工的範圍不僅限於一個工業中心的城市，而且遍及於全國；罷工的工人不僅提出他們的經濟要求，而且佔領了一部份的工廠、政府機關和某些城鎮，與政府的軍警直接衝突，甚至激烈戰鬥起來。與此同時，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一百多萬的公務人員和教師等，也公然站到工人方面，參加了罷工的行列。這樣，工人階級的決心行動，以及小資產階級的不滿現狀而贊助工人，便非常明顯地表示出法國革命的客觀條件已經成熟，社會主義革命今天又在開始了！義大利的局勢也差不多是如此——雖然規模比較小些。

數百萬羣衆行動起來的革命局勢，絕不是共產黨一手所能造成的；這實際上只是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直接後果。因為連法國官方也已承認，法國今天正遭逢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這結果更造成了物價的奇貴；但同時工人的生活水準却長期被「凍結」在很低的一點上；（例如法國今天的物價指數是一三三六倍，工資却只有六五一倍。）而且，像義大利，失業工人更日見增加，竟超過了兩百萬的數目。因此，在增加工資及發給失業救濟金等要求不遂之後，總罷工便被激發起來了。

當然，革命局勢的醞釀並非始於今日。早在此次大戰結束之日，歐洲已普遍瀰起了第一次的革命浪潮。當時納粹政權猝然崩倒，資產階級的統治還來不及重新建立和穩定，羣衆的組織和武裝力量便已到處抬頭，在法、義、比諸國形成了革命狀態的兩重政權。後來僅僅由於資產階級得到各該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幫助，與之成立了聯合政府，才利用這政府去結束了工人的罷工和佔領工廠，解除了羣衆的武裝，摧毀了兩重政權。戰後第一次的革命浪潮就如此被鎮壓下去了。但戰後舊世界的經濟危機畢竟太尖銳了，太難於緩和了，以致工人羣衆的生活痛苦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加深。他們對現狀的不滿清楚表現在法國工人階級的行動中。當法國共產黨還在做聯合政府的迷夢，還未被趕出政府的時候，工人已不斷揚言要總罷工了。而今年春天國營雷諾汽車廠工人的罷工，便是這種暴風雨重新到來的信號，因為他們的情緒急遽的向左傾，竟不顧法共的阻止，不要法共的領導，也自發地起來鬥爭，這就表示法國工人的鬥志已重新激昂起來。因此，迫使法共也不得不稍為遷就工人的左傾，最少也在表面上要贊同工人的增加工資要求了。這一遷就使牠被趕出了聯合政府。但這也不是表示法共之轉向革命，因為牠遷就工人的急劇左傾，只爲的明天易於控制工人，使他們不要超過自己的頭，即是說，使他們只成爲自己重新加入政府的跳板，成爲自己和資產階級講價還價的籌碼，最後，且成爲脅迫美國讓步的莫斯科外交工具。爲了這一切的利益，法共在這次總罷工中，又一次地掌握了領導權。但也正因牠把工人的革命運動從屬於牠和莫斯科的利益，限制在牠底目的之內，所以牠不敢違反既定的「總路線」——改良的而不是革命的

國際
鱗爪

革命集團在法國的重新結合

法國社會黨的社會主義青年團，曾於去年八月間正式變成了獨立的組織，具有一個革命的鬥爭綱領，反對賴伐迪的改良派社會黨。同時，牠與那些不滿於史大林黨領導政策的戰士一起，在許多地方成立了「革命重新結合委員會」。這些組織都是在罷工中成立的，目的是在階級鬥爭的基礎上採取一致行動及研究綱領文件，以便制定政綱，提供給新黨作參考。

國際主義共產黨（第四國際法國支部）決定響應牠的呼籲，參加這些委員會，和他們一致行動，以準備在法國建立一個羣衆的革命黨。

這時，社會主義青年團曾邀請史大林派的法國青年共和同盟及托派的國際共產主義青年團，共同討論青年組織的團結事宜。但史派以其一貫的惡毒攻擊來拒絕參加；反之，托派的青年團則決定接受這邀請。因此，這兩個組織的聯合討論已在計劃，而行動上的聯合陣線也在進行了。

從威爾頓事件看法國

最近威爾頓的事件，顯示出法國目前的局勢：羣衆的不滿和史大林黨的叛賣政策。

事件的發生是這樣的：裝載着糖預備運往德國的貨船，在威爾頓給工會和史大林黨領導下的民衆攔阻了。政府企圖用軍隊駕駛貨車來運走，但又受阻於羣衆所建立的防禦物。整個區域處於戒嚴狀態，政府的坦克車也出動了。

最後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事情，糖便給搬走了。因爲史大林黨並不希求用公開的鬥爭去壓迫政府，他們只渴望經過此事而與政府談判，以獲得他們在選舉運動中可資利用的東西。他們在政府增加軍力時候，却儘是拖延等待，而在決定關頭又發出「錯誤的指示」，因而使羣衆疲倦了。

在這次反德的「威爾頓戰役」中，史大林黨熱心於最不名譽的盲目的愛國運動。牠號召羣衆停運一切糧食以

路線，不敢提出奪取政權的口號，以作為羣衆鬥爭的目標。但列寧在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書中說得很對：「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就是國家政權問題」。在全國總罷工、工人佔領了工廠及國家機關并與軍警戰鬥的高潮中，政權問題已由羣衆的行動提出來了。革命在這一頃刻就有如逆着急流行舟，不是前進便退後。就是說，這時如果有一種堅定勇敢的政策來領導，就會利用羣衆的高漲情緒，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一行動愈是堅決，則愈能把動搖的中間層（如城市小資產階級、農民及軍隊等）爭取過來。不然，懦弱無能和搖擺的政策，定將帶給羣衆以失望、動搖、沮喪，結果就只有潰敗和投降。歷史的經驗教訓，會不斷從正面和反面證明這點真理。例如：列寧在二月革命後堅決提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口號，以之爲鬥爭目標，結果領導成功了十月革命；反之，此次法義的總罷工，恰和其他流產了的革命一樣，就正因爲缺乏這種堅定、勇敢、正確的領導，沒有進一步的鬥爭目標（奪取政權），以致陷於無出路和徬徨之中，最後被資產階級的力量所擊敗。

但照理，當工農憧憬社會主義的出路而投奔「共產」黨的時候，法共曾經成爲法國最強大的政黨，即在今天也還擁有一百多萬的黨員；而義共的黨員數目據牠在今夏的宣布，更已有二百廿萬之衆，這比諸布爾塞維克黨員在十月革命前半年之只有數萬，或十月革命前夜之只有二十多萬，都是遠遠超過了的。以這麼龐大的主觀領導力量，配合起上述的羣衆情緒，奪取政權的條件本已非常成熟了。何況這時的資產階級正失去最主要的小資產階級（如一百廿萬的公務員等）底幫助，已陷於相當的孤立中，而中間政黨也沒有很強有力的組織，戴高樂的法西斯運動也還在團聚力量，還無力立即出馬作戰。（在這次總罷工中，他沒有自己的武裝隊伍公開與工人衝突，甚至一句話也不敢呼出來，便是事實的明證。）因此，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並不是穩定的。牠唯一的靠山固然是美國，但美國也不是萬能的救世主，美國最大的幫助是在經濟方面，而此種經濟的援助要能收效，則須先解決德國問題，即須獲得德國薩爾等地的煤和鐵，才能相當穩定法國的經濟，但德國問題却不是馬上能够解決的；而美援本身也有牠的限度，有牠所引致的不良後果。因此，這靠山並不怎樣可靠。總括一句話，革命的各種有利條件都已具備了，所不幸的只是牠的領導仍然落在錯誤無能的壞手裏，不能衝出莫斯科的改良主義路線，不能毅然提出奪取政權的革命政策，因此，革命的局勢便在共產黨這種猶豫不決中錯過了時機，羣衆的鬥志便在喪失最後的目的中渙散了，如此便給了資產階級反攻的機會，利用軍警的壓力，以及半吊子式的讓步，結束了這次戰鬥。從這裏就再一次地證明：「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列寧語）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雖然還掛着「共產」的羊頭，但實際上却在賣「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改良主義的狗肉。這種冒牌的「共產」黨，對於社會主義革命，天然只能盡一種制動機的作用，甚至鎮壓的作用了。全世界的工農大衆一天不脫離牠的領導，則人類歷史的危機也必然是無法解除的。每一個前進的工人和革命者，首先應該從此次法義革命的初步失敗中，接受這一點重要的教訓。

今天，許曼政府是一種波拿帕政制，他雖然已靠緊急手段把激動的工潮暫時壓下了，但這並非表示今後法義的政局便可平靜無事。相反的，工農羣衆的力量，在這次鬥爭中還未遭遇致命的打擊，革命的

反對德國，然而並不企圖繼續請工人停運軍火給越南的法國軍隊。

威爾頓事件的另一種表現，便是史大林黨呼籲的反應，比牠所預期的大得多，附近中心區的礦工們都跑到威爾頓來，所有暴動的要素都已具備了。

這些都是羣衆反對糧食缺乏的示威運動，而糧食就是經過羣衆面前運到繁盛的黑市場和投機中去的。

革命危機在意大利

新的革命浪潮正震撼整個意大利。饑餓、貧窮、法西斯勢力的復活，驅使意大利工農無情地反對喀斯貝里政府。法西斯的危機，迅速地在擴大，加深。據估計，有六十個地下軍事組織，都全副武裝準備發動內戰。最著名的集團，有反共解放軍，法西斯義大利社會運動，法西斯革命行動隊。他們最近的企圖，是集會王室，反動貴族，及法西斯派的力量，建立一個反革命的領導中心，用以推毀勞工運動，創造法西斯政府。

面臨如此尖銳的法西斯危機，史大林派仍繼續玩弄其叛賣革命的把戲。美國共產黨機關報攻擊任何對意大利局勢認係共產主義革命或內戰危機的一切報告。陶格利亞（意共領袖）亦惟史大林的機會主義政策是聽。他們在形式上允許慷慨陳詞，在實質上却作了革命運動的制動機。

雖然如此，意大利工農羣衆的示威運動，仍此起彼伏地蔓延着。九月八日約有百萬農業勞動者，在收穫期間發動罷工，要求（一）給失業者以工作（二）提高工資（三）反對無理開除（四）生活與家庭津貼。九月十六日，八十萬的鋼鐵工人，在與資方談判破裂之後，即刻開始了兩日的總罷工，另有五十萬的紡織工人在威脅着欲放下織機。一百十萬的公務員要求提高薪津。在卡塔薩洛，羅倫斯，福佐，麥亞拿諸城都受了罷工的影響，一個全國性的罷工工潮正在開展着，無怪乎羅馬教皇大聲疾呼「意大利國內的革命成熟了。時間的考驗已在這裏，即使是幾分鐘也能決定勝利，思考、計劃已成爲過去，現在是行動的時候了」。

激流仍將潛滋暗長，因為法義的資產階級今後仍然無力澈底解決國內的難題，仍然無力認真改善工農的生活，因而改善生活條件的鬥爭仍始終要爆發。從這一點看，目前的政府——從許曼到喀斯貝里，都具有短暫的過渡的性質。在美國的緊急援助下，法義的經濟危機固然可能暫時地相當緩和一下，因為目前的政府再可能延緩一個相當時期。但跟着緊急援助的失敗，飢餓的憤怒的鬥爭勢必重新激烈化；而在這個過渡時期中積聚了力量的戴高樂派，也勢將起來發動法西斯式的政變，以便澈底擊毀工人及一切民主改良政黨的力量。但另一方面，真正代表工農利益的革命黨派，（如直接號召社會主義革命的國際主義共產黨，）今天雖還未能及時生長起來，領導羣衆走上勝利之路，但往後的數年定將給予牠以有利的時機，去團聚力量，去吸收先進份子到牠底周圍，——這種先進份子，隨着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改良主義政策底日益破產，定將愈來愈多地轉到革命的旗幟之下來的。一句話，今天法義總罷工之被暫時壓下去，只是今後許多革命浪潮中的一個低波，戰後已開啓了一個長期的慢性的革命時代。決生死的鬥爭尙留在後面。人類今後一段長時期的命運將取決於這幾年間的決鬥，而這決鬥的結果則將取決於兩種力量在今後幾年間生長的快慢——法西斯勢力與革命的領導之生長間的競賽。假如，不幸的，這個革命的領導力量到那時仍未能強大起來，以致讓法西斯勢力重新得到勝利，則第三次大戰將很快會爆發，人類歷史將倒退幾十年，甚至退回野蠻時代去。但我們相信總的歷史前途（社會主義）決不會改變，而人類也不會再走這條自殺之路的。不過，要避免這一自殺的悲劇，那首先就必須從革命失敗中吸取教訓（如上面所指出的），脫離錯誤無能的領導，團集到真正革命的旗幟之下，才有可能了！

法國經濟復興之極限（上）

柏特列克·但尼爾著
沈念校譯

那不可救治的病症，如現時法資本主義所遭遇到的，幾乎已普遍地被公認了。三月間，法國的經濟部長腓立波警告道：『經濟與財政方面的災禍，正全面地威脅着我們。』賴瑪迪總理，沒有一週不聲嘶力竭地呼喊着：『假如計劃不能完成，法郎必將耗盡了。』四月裏，半官方面的國際評論家李普曼也提出警告：

危機在發展中，因為，沒有一個主要的歐陸國家——英法或德意——已自戰爭的瘡痕中復原，或者從其現有的生產手段及其生產所依據的計劃中看見了任何復原的希望。他們正企圖挽救危殆的存在，設法防止通貨的崩潰，並提高其現時生活的水準，但是，並不在增進生產上着眼，而只幻想着憑藉少量的資產，貸款，賠償，以及來自美國，加

拿大，或其他有支付能力國家的救濟配額金而已；

然而，從『解放』以來，法國確曾從其虛脫性的生產中開始復興——雖然是一種遲滯的，帶有癱瘓性的，且在極度嚴重的恐慌中渡過冬季的復興。這情形甚至使那些淺薄的觀察家們也相信，法資本主義確乎穩定下來了。但是，有權威的法資本主義與世界資本主義的發言人，却缺乏着信心並提出災禍性的警告。何以故？欲解答這個問題，必須先從一九四五年末到一九四六年，即當法國有最大可能轉變戰時經濟為平時經濟的時候起，一直分析到其現階段的經濟發展，才有可能。

一九四六年四月，第四國際大會通過了一個基

錫蘭普選中左翼的勝利

八、九月間，錫蘭島在新憲法下舉行的總選舉，業已結束了。第四國際印度支部——布爾雪維克·列寧黨，在國會選舉中，恢復其五席代表的地位。此次，布列黨的勝利，說明國際主義的觀點，在印度錫蘭的工農羣衆中，已獲得相當的擁護。蓋在競選中，布列黨純以第四國際的全部政綱在羣衆中到處耐心宣傳與解釋，最後並堅持錫蘭的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前途是與印度本部無產階級命運相連繫的，因而擁護印度工農移民錫蘭的國際主義立場。另一錫蘭托洛斯基派社會黨則在移民問題上與第四國際支部布列黨的意見不同，而更得到還未徹底覺悟的工人羣衆的擁護，居然贏得國會代表十席。由是觀之，國際主義派布列黨在競選中如稍能將其政綱降低，必無疑地可以獲得壓倒多數的擁護。反之，錫蘭共產黨（史大林派）雖然可憐地尾隨資產階級之後，但在競選中已表示其爲羣衆所唾棄了。茲將選舉結果列示於下：『聯合』國大黨（純資產階級政黨）四十二席；社會黨（另一托派組織）十席；錫蘭塔米爾國會派七席；印度塔米爾國會派六席；布爾雪維克·列寧黨（托派）五席；共產黨（史大林派）三席；工黨一席；無黨派廿一席。（伊華譯寄於十一月廿日）

本的政治文件。它對於法國的總前途，在如下的辭句中給指出來了：

遭受戰爭打擊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西歐國家的經濟能力之復原，將有如此的特徵——特有的迂緩步伐及長期停留在遲滯與萎縮的水平上。

經濟復興將表現得十分緩慢與無望……

關於法國問題的這種扼要分析，是依據於下列兩個基本事實的：一般認爲，戰爭不僅沒有解決了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那些絕望的矛盾，而且只有加深了牠們；其次，法國當前面臨着的一連串經濟上與財政上的危機，完全在真實的讀者面前暴露出來了。這裏，我們希望討論後一個問題。

一九四六年三月——設想到改良主義者，尤其史大林派繼續成功地阻止了法國無產階級起來行動

——法國工業復興之漸次遭受到技術上的各種困難，那是異常明顯的。首先是燃料與動力——最主要的還是煤；煤的獲得，由國外輸入加上本國生產的，期望為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這裏必須加以說明，所以拿一九三八年之生產指數作為一百，並不因為它是最正常的年生產，而只因為它是戰前的最後一年。其實，就法國說來，一九三八年還是生產不景氣的一年，其生產量較諸並不繁榮的一九二九年猶低四分之一。

這個期望（即煤產預期為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終於實現了，恰正由於史大林主義者，驅使法國羣衆，在其極度疲憊了的肩膀上，擔負起重建那搖搖欲倒的資本主義大廈使然。其結果，固如預期地，生產向上爬昇了一點。但不久，又如預期地，它即刻遭到潛在煤荒的打擊。一九四六年十月間，生產總指數達到最高峯，即相當於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八十九；在十一月，十二月，及本年的一、二月裏，生產指數又漸次降為八十七，八十三，八十一與七十九；直至三、四、五月間方稍回升到百分之八十五，八十七與八十九。其後，又因為罷工及煤與勞動力之缺乏，另一次生產的萎縮

發生了。由於冬季燃料的危機，跟着而來的將是生產的繼續下降，抑或轉變為一番景氣的現象，那全要看煤量供給的情形決定了。

三月間，由於史大林黨的壓力及利用德戰俘數十萬人充當奴隸勞動，因而使國內煤的產量上升到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一百零九，即自一九三八年三月至四月間增至本年三月的四百六十萬噸。四月裏下降至四百二十萬噸，五月又下降至三百九十七萬噸；到六月間，由於罷工，更大大下降了。因此，本年預期的五千二百萬噸恐不能達到了。依據最高的估計，一九四七年可能自美國進口的煤，總數亦不過八百五十萬噸。從其他國家來的——德、波、捷、摩洛哥、及荷、比、——至多只能增加了四百萬噸。本年煤的最高額是六千萬噸，與一九三八年之近於七千萬噸比較，顯然表示法國本年度的生產，由於煤荒，必然只相當於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八十六的才平了——仍設想史大林黨繼續扼殺工人運動與羣衆抗議——但由六月初的動象看來，正相反地，工人階級已開始擺脫史大林黨的控制了。六千萬噸這個數字，甚至較重建法國工業的蒙納計劃（Monnet plan）中所規定的七千五百五十萬噸還距離得很遠。別說從事廣大的復興工作，即

連保持一九三八年期內的水準也不可能了。無怪乎經濟學人在六月十九日寫道：『因此，蒙納計劃，一九四七年的標準決不能達到了。』

假使由於盟國在魯爾煤區問題上，改變其政策及美煤大量的進口，法資本主義打破了煤的難關，但相當一九三八年之百分之一百至一百十的勞動力問題之危機，又在埋伏着了。法國勞動力之分配是異常不平衡的。工業與農業生產的部門中，自一九三八年的一千三百二十萬人降至一九四六年的一千七百萬人（其中還包括五十萬戰俘），然而政府機關中的官吏，却從一九三八年的一百二十萬人升至一九四七年的一百二十萬人。本年年底，四十四萬戰俘勢必要解放了，還有二萬波捷籍的工人（包括八千礦工）也須遣散。依照蒙納計劃中的要求，每年務須增加勞動力二十五萬人。因此如欲防止勞動力之不足，須再添新的工役與農業勞工七十一萬人。法資本主義希望，意大利與阿爾及利亞的不安與混亂，將可驅使志籍勞工二十五萬人及阿籍勞工六萬人來法工作。但，直到今天，移民率依然很低；被誘至法國開礦的可憐的意國人，往往在數星期之後，又成羣地離去了；如使各種計劃都完成，單靠移民還是不夠。法國資產階級的「設計人」說過，應裁汰軍隊以獲得五萬新的勞工；但由於越南及馬廷加斯島的騷動，非之醞釀着恐怖的危险，已使裁軍成爲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了。（未完）

評「反蘇大陰謀」——一部說謊的「奇書」

旭東

——薩伊爾斯、卡恩合著，梁純夫等譯，新知出版社出版——

托洛茨基與史大林的鬥爭

我們從前面列寧對托洛茨基和史大林所表示的態度（請參閱前期十一至十四頁）中已明白看到：列寧在他的『遺囑』內會公然指斥史大林『太粗暴』和『不忠實』，堅持撤換他的總書記職位，聲明同他『斷絕一切私人關

係』，『認爲必須在政治上毀滅史大林』；而另一方面，列寧却贊許托洛茨基『在黨內關係上的光明磊落是絕對無可非議的』，推崇他『是現時中央委員會中最有能力的人』，絕對地信任他，并建議同他組成『一般地反對官僚主義，特殊地反對組織局』（史大林所操縱的機關）的『聯盟』；——這便無可否認地證明：列寧認定史大林乃是他的思想和革命事業的叛徒，而托洛

茨基則是他的思想和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了。可是『反蘇大陰謀』却編造了一些與此完全相反的故事道：

以反對派活動為基礎，托洛茨基根據『五人制度』在俄國建立秘密陰謀組織，這五人制度，是由賴利壽劃而由社會革命黨及其他反蘇陰謀家利用過的。到了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的地下組織已經是有力的和大有辦法的團體了。……

但是托洛茨基的陰謀工作不限於俄國國內……曾經駐德大使克利斯庭茨基，而與德軍勾結，接受了二十五萬金馬克的津貼。

列寧一死，托洛茨基公開爭權。在一九二四年五月黨的大會上，托洛茨基要求承認他是列寧的繼承人，而不是史大林。……

一九二七年俄國有作戰之憂的時候，托洛茨基又恢復對蘇聯的攻擊。……史大林責備托洛茨基……說「從張伯倫到托洛茨基的聯合陣線一類的東西，似乎正在組織中」……（上引見該書一七七—一八〇頁）

『反蘇大陰謀』的作者便是如此這般地將托洛茨基與英國間諜賴利的『五人制度』，德軍的『二十五萬金馬克』以及和『張伯倫的聯合陣線』聯結起來，構成托洛茨基『爭權』的『反對蘇聯政府』的『大陰謀』！但事實和證據究竟何在呢？『反蘇大陰謀』的作者絲毫沒有指證出來。甚至從該作者自己所敘述的、恰與賴利勾結陰謀反蘇的社會革命黨領袖沙文可夫的審判案中（見該書一一九——一二八頁），也找不出有關於沙文可夫及賴利與托洛茨基陰謀勾結的一句供詞或任何線索，這就充分證明『反蘇大陰謀』的作者之偽造，是何等地荒唐、卑鄙與惡毒了！

真正的歷史事實是：自從一九二三年秋季起，托洛茨基看到史大林之愈來愈無忌憚地背叛列寧的思想和十月革命傳統，愈來愈瘋狂地篡奪黨權和政權，確曾起而同史大林進行了嚴肅的鬥爭，而且此種鬥爭一直繼續下來，愈演愈烈。但這全是公開的、光明磊落的政治鬥爭，絲毫沒有什麼秘密陰謀可言，更絕對談不上反對蘇聯。相反地，這鬥爭正是代表列寧的意志，爲了保護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十月革命的一切傳統，而反對史大林所代表之官僚主義的背叛和陰謀篡奪的。『反蘇大陰謀』的作者既絕對避免提到托洛茨基反對史大林的此種『政治鬥爭』，而僅以純粹虛構的『反蘇陰謀』來蒙混，那我們便不得不將此種政治鬥爭的內容簡略地敘述一下，讓讀者有機會進一步來認識史大林的背叛和篡奪過程了。

在上面我們已經指出過：當列寧臥病時期，史大林便已在黨的各級機關遍植私人，團結官僚份子。同時，史大林又在經濟上拖延工業建設，向新經濟政策下的富農妥協。因此，托洛茨基便起而要求『黨的民主化』，反對史

大林官僚層的操縱黨權。并同時主張增加富農稅收作資本來提高工業水準，用廉價的工業品去交換農民的農產品，希望以此鞏固工農間的聯盟。這便是一九二三年末托洛茨基和史大林開始鬥爭的內容。

托洛茨基與史大林的這一鬥爭，雖在一九二四年初因列寧之死（關於列寧的死，我們現在有種種根據可斷定：是史大林所毒害的）而暫時中斷了。但到同年末，又因史大林發表『一國社會主義』的思想而重復激烈了起來。『一國社會主義』，實際上正是代表俄國新官僚層的一種反動的民族保守主義，對於馬克思和列寧的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乃是一種明顯的背叛，所以托洛茨基起而堅決地反對它，且因此形成了在後托洛茨基與史大林間一切思想和政策鬥爭的出發點。并且因爲史大林這種『一國社會主義』的背叛思想之過分露骨，即以前會同他聯合一起壓迫托洛茨基的季洛維也夫和加米也夫，也轉變過來反對史大林了。

從一九二五到二七年中間，史大林對中國革命採取了『四個階級聯盟』的政策，而托洛茨基則主張無產階級乘著民主革命的潮流走上政權；在英國大罷工中，史大林極力同英國黃色工會領袖們謀取妥協，托洛茨基則主張暴露那些黃色領袖們的背叛；在蘇聯經濟問題上，史大林堅持繼續向富農讓步，反對計劃經濟，托洛茨基則主張立刻進行計劃經濟以提高工業和推動農業集體化。但中國革命和英國罷工的悲慘後果，以及蘇聯富農勢力的生長，都完全暴露了史大林的機會主義的罪惡政策，而從反面證明托洛茨基的主張是正確的。但也正因爲托洛茨基的正確，於是史大林便更橫暴地更野蠻地不惜以開除黨籍，解除職權，乃至以流放監禁來對付托洛茨基及其共同奮鬥者了！

至一九二八年，史大林在國內遭到了富農的反抗，才被追地開始抄襲托洛茨基的經濟計劃，宣佈爲他的『五年計劃』。但在這一『五年計劃』中，史大林却從一極端走到另一極端，那就是：在托洛茨基的正確計劃上加上了種種冒險主義。這種冒險主義，在工業方面是專門追求數字，忽視質量及工人生活的改善，盲目地命令以四年去完成五年計劃；特別在農村集體化方面表現得最爲橫暴；史大林不管農民願意與否，完全用命令和刑罰強迫他們加入集體農場，結果致使千百萬的農民羣衆遭到毀滅的命運。因此，又引起了托洛茨基的批評。托氏認爲，在進行工業化時，必須謹慎地注意各部門間的相互聯繫，及其質量的提高，注意改善工人羣衆的實際生活等；尤其對於農民加入集體農場，絕不應採取強迫手段，（列寧會說過：『不要強迫農民』），而

應「由事實教訓而明白社會主義機械化農業之利益」(恩格思語)來誘導他們。

在國際上，史大林由於過去在中國和英國的極右機會主義之破產，於是也走到了極左的冒險主義；起初在中國革命失敗之後，命令中共建立「蘇維埃」與「紅軍」；隨後則提出了「第三時期」(意即資本主義已到了最後時期，隨時隨地可以進行暴動奪取政權等)的哲學，并附以「社會法西斯」(意即社會民主黨是同法西斯一樣)的主張。這時托洛茨基除了批評「第三時期」和「社會法西斯」的胡說之外，并且積極建議在德國(那時德國已踏進了革命的局勢)建立工人階級的反法西斯聯合陣線，準備奪取政權。但史大林始則堅持他的「社會法西斯」的胡說，反對與社會民主黨建立任何聯合陣線，迄至希特勒奪取政權時，他又命令德國共產黨不戰而逃；——希特勒就是這樣地獲得史大林的幫助而輕易地毫未遇到抵抗地踏上政權的！

以上便是托洛茨基和史大林從一九二二至一九三三這十年中間的政治鬥爭的簡史，這是有無數的史料可資證證的。在這期間，不但人們從沒有發見過托洛茨基及其所領導的一派有任何反蘇的陰謀，就是史大林自己也從不曾指出托洛茨基有過什麼勾結外敵反對蘇聯的證據，他只是重三復四地指控托洛茨基是以自己的「托洛茨基主義」違反了「列寧主義」而已。但事實已如我們上面所證實，背叛列寧的思想及其革命事業，并陰謀詭計篡奪黨權和政權的，正是史大林本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只須看十月革命的元勳，與列寧共同領導革命勝利的整個領導層，如托洛茨基、季洛維也夫、加米也夫、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等，到一九三三年時都已被史大林排除於領導機關，有的甚至被充軍，被監禁，就可充分明白了！

由此我們可以說：從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三年這一期間，史大林在政治上已經完成了他對於列寧思想的背叛，以「一國社會主義」代替了世界革命的國際主義，并以此葬送了中國和德國的革命；同時史大林并以陰謀、壓迫、開除、撤職、逮捕、監禁和流放等橫暴手段排除了一切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完成了他的「特爾米多」政變，轉變了無產階級專政為史大林個人的邦拉巴特(拿破侖)獨裁！這是歷史的鑄案，任何偽造都改變不了的。

莫斯科審判案的真相

史大林雖然在國內打敗了一切反對派，完成了他的背叛和篡奪陰謀，但此時却有一個真正的危險正開始從國外抬起頭來威脅蘇聯，那便是希特勒。

希特勒自藉着史大林出賣德國工人階級之助而攫取政權後，即以反蘇的十字軍首領自居，大肆宣傳。但史大林在希特勒這種反蘇宣傳的威脅之下，所異常感到恐怖的，不僅僅是納粹的外來攻擊，而且還有在他的格柏烏慘酷壓迫下的千百萬農工羣衆的憤懣和仇視。此種憤懣和仇視，在緊急關頭大有可能匯成一股洪流，把那些被打擊下去、被監禁和充軍的十月革命的領袖們重新湧到政治舞台上來，代替史大林。史大林根據他的自保本能和歷史經驗，當然很瞭解這一內在的最可怕的危險。因此史大林依照一切反動統治者所慣走的路徑，帶着歇斯里的態度，以百倍的決心來首先「消除內患」，來剷除一切反對他的布爾塞維克領袖了！這便是一九三六年至三八年莫斯科幾次大審判案之客觀的和主觀的根因。

但用什麼理由，拿什麼罪狀來進行「大審判」，來剷除這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領袖呢？史大林對於革命的歷史教訓雖屬茫然，但他對於反革命的陰謀詭計却是「胸有成竹」的。他或許不很知道法蘭西大革命中特爾米多黨人之迫害羅貝斯比爾，曾經捏造了「勾結外敵」的罪名；但他却親自看到過俄國二月革命後，美留可夫，克倫斯基及一切反革命者都曾一致瘋狂地誣陷列寧、托洛茨基和季洛維也夫等為威廉第二的間諜，「勾結德國陰謀反對祖國」，希圖「推翻臨時政府」，因而造成了「七月事變」(在事變中，列季被迫走入地下室，而托氏則被監禁了起來)。史大林就根據他這一親歷的「經驗」，只把威廉第二改換為希特勒，把已死的列寧名字刪去，於是「托洛茨基和季洛維也夫接受希特勒的命令和津貼，在蘇聯組織間諜網，進行陰謀反對蘇聯」的故事，便編製成功了！

所以在莫斯科幾次大審判案中，凡是被控告、被審判和被處死刑者的「罪狀」，都毫無例外地是「希特勒的間諜」，是「反蘇的陰謀家和叛徒」。但「罪狀」的實際證據又怎麼辦呢？史大林有握在他手中的全部格柏烏機構，他就直接命令這個機構，有計劃地有系統地并經過精細考慮地製造一套罪狀出來。然後再經過格柏烏運用極盡殘酷的手法，將被控告的「罪犯們」事先加以「訓練」，最後交給維辛斯基所主持的「法庭」去「公開審判」，讓「罪犯們」去「公開承認罪狀」，即以這種「罪狀」判決死刑或監禁等，——所謂莫斯科的大審判就這樣地完成了它的任務，而史大林深謀遠慮地剷除整代老布爾塞維克的圖謀也就如願以償了！

「反蘇大陰謀」這部「奇書」的全部用意，僅在替「莫斯科大審判案」

和謀殺托洛茨基的無比罪行作辯護而已。可是這部『奇書』除了將後來才發見的『希特勒第五縱隊』的罪名加在托洛茨基及其他被處死的老布爾塞維克頭上外，再沒有發明什麼。它反而把那些最愚蠢最荒唐且被完全證實為虛構的『罪證』又重抄了下來。這便證明說謊者也自有其限度，無論如何『精細』，總是逃不出其說謊的範圍的。現在讓我們舉出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來看看吧：

『奇書』第十九章標題為『飛奧斯陸』的一節內，全是描寫畢達可夫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從柏林乘飛機到挪威奧斯陸會見托洛茨基的故事的。在這篇被描寫的故事裏面，『奇書』作者不但將畢達可夫在柏林如何秘密地會見托氏的駐柏林代表史蒂納，如何同史蒂納乘坐飛機抵達奧斯陸城郊，以及如何同托洛茨基在一間小屋子裏會面寒暄的一切小節目都『精細地』描繪到了，而且還用對話將畢托的談話內容烘托出來，好像該作者是曾經親身參與其事似的。至這故事所告訴我們的主要內容是：

畢達可夫報告俄國內情形，……

托洛茨基一再表示相信史大林的國家，必跨台無疑。……

俄國的托派面對着這個選擇：如「不在史大林廢墟中毀滅」，便須立即以全部精神作全面的努力推翻史大林政權。在這千鈞一髮的鬥爭時刻，應該不躊躇地接受德日高級統帥部的指導和協作了。

托洛茨基現在向畢達可夫透露，過去他已「和德國國社黨副主席」進行長期談判。談判的結果，托洛茨基和德國簽訂協定，「一個絕對明確的協定」，納粹準備托派在蘇聯掌握政權……（見『反蘇大陰謀』二三七—二四一頁）

但『奇書』作者這篇關於畢托在奧斯陸見面談話的『故事』，雖然是根據於畢達可夫在法庭上的『供詞』而『精細地』烘托出來的，可是當畢達可夫還生存時，托洛茨基曾向莫斯科法院提出了十三個精細的問題，但一無答覆。那十三個問題中，每個問題都已經打毀了畢達可夫的神秘的旅行及其與托洛茨基的神秘會談了。同時，托洛茨基住在挪威的房東，國會議員克納德森及托氏秘書屋爾夫，都曾在報上聲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沒有任何俄國人去看過托洛茨基，因為托氏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是與他們同行的。最重要而且是絕對無可置辯的證據是：奧斯陸的航空當局曾發表了一個正式聲明，說「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沒有一架外國飛機曾落到他們的飛機場」。這便充分地絕對無可否認地證明：畢達可夫的『供詞』僅僅是格柏烏預先『訓練』和逼迫出來的謊言而已。然而『反蘇大陰謀』的作者竟將此種已完全被證實過的謊言寫

成專節，其卑鄙和惡毒固已登峯造極，而其愚蠢和可憐亦堪稱無與倫比了！但『反蘇大陰謀』一書在這方面的一切說謊，也全是受了『莫斯科審判案』的一切偽造的邏輯所決定的。實際上，莫斯科審判案中的『供詞』還有比畢達可夫的『供詞』更荒謬更愚蠢可笑的呢！例如：在一九三六年八月的審判中，有一位被告霍爾茨曼在法庭上供述說：

我與西道夫約好，於兩三日內會於哥本哈根，在勃立斯托旅館中會面。我從車站直接跑到約定的旅館，在門口的長椅上碰見了西道夫。大約十點鐘，我們到托洛茨基那裏去……

可是，霍爾茨曼口供中所提到他在「一九三二年某日」十點鐘與托洛茨基的兒子西道夫「會面」的這個「勃立斯托旅館」，早在「一九一七年」連牆根都被拆毀了！這裏暴露了霍爾茨曼的『供詞』是何等的虛偽與滑稽！然而莫斯科幾次大審判案中所有被告們的一切『供詞』以及『反蘇大陰謀』這部『奇書』中的一切描寫，都不過是由虛偽、滑稽和一些惡毒諷刺所編製成的傑作而已！

當世紀末期，羅馬的『宗教法庭』，曾以火刑逼迫偉大的科學家加里略公然在教庭主教及教長面前，宣讀并簽字於預先被人們寫好的自己罪狀的供詞，其中有這樣一段說：

我以誠懇的心與虔誠的信仰，立誓排斥、阻與痛惡上述的錯誤和邪說，懶那說便是以為太陽是宇宙之中心且是不動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動的。

但加里略從法庭「悔過」赦免出來的時候，却自言自語地說：「地球還是依舊圍繞着太陽為中心而自行轉動的」。史大林的『格柏烏法庭』，雖以百十倍的殘酷逼迫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領袖們宣讀并簽字於格柏烏預先替他們準備好的罪狀，并在『悔過』後還處以極刑，但那些被處刑的人們的心裏以及全蘇聯的工農大眾都知道，或甚至自言自語地說：真正背叛列寧的遺教，篡奪蘇聯無產階級的政權，危害蘇聯社會主義的發展的，正是那個『原告』——史大林！史大林並沒有發明什麼，不過將羅馬宗教法庭的傳統在新的技術下加以發揮而已，但真理并不因『宗教法庭』的迫害而有所改變的！

而且事實很快就帶着異常的諷刺證明：莫斯科審判案後不到兩年，那個曾經在莫斯科法庭上，以勾結希特勒陰謀反蘇為罪名來控告、審判及處決諸被告以死刑的幕後主持者史大林，却於一九三九年八月正式和希特勒簽訂『德蘇同盟協定』，幫助希特勒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且因此加速了納粹反蘇的戰爭，——這難道還不够說明史大林在莫斯科審判案中所加於諸被告的罪狀，正是他後來的實際行動的寫照麼？（未完）

信箱

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再討論

編者先生：關於前此請教社會性質問題的一封信，承您懇切而公開地答覆，不勝感激之至！我詳細地讀了您的答復之後，對於這一問題可說已獲得了個較為明瞭的觀念，并大體上認定您的指示是正確的，尤其是您對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說法之那種駁斥，更叫我心折。可是還有一些問題覺得不甚了然。這自然是由於我的社會科學的根柢太差，同時對於西方史，特別對於中國歷史發展及其當前的社會經濟情況很少研究，以致不能依照先生的指示來「舉一反三」。因此特將底下幾個不甚了然的疑問寫出來，再一次麻煩您：

(一) 先生說：「秦以後二千年，中國社會經濟在本質上很少改變，差不多處在一個停滯的狀態，或一進一退的循環圈裏，……」我對於秦以後的社會經濟發展史十分模糊。但記得在翦伯贊先生著的某一篇文章裏曾看到他說過秦以後的社會經濟仍然是有發展的，雖然每次農民暴動都打擊了那種發展，但社會經濟仍然是斷斷續續地向前進的。未知先生對翦先生這種見解有何解釋？

(二) 先生認為「要判定中國的社會性質，根據現代社會科學，必須觀察中國現時究以何種經濟佔支配地位。」這觀點我完全同意，因為只有根據這才不致流於機械。但先生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支配地位的實際情形，似乎尚未指出充分的證據，因此還不免令人懷疑。

(三) 先生指示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我是相信的，因為我到過許多鄉村，如浙東各縣確是如

此。但商品化并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建立在新式機械化的生產方法上面的。可是中國農村的生產方法顯然是「手工業式的」（這點先生在覆信裏也承認過的）。此種「手工業式的」生產方法似乎還談不上資本主義！

(四) 據許多農村經濟研究家的指示，好像中國農村的經濟是封建式的。因為中國的農村雖已商品化，但剝削的方法仍然是封建式的。例如：在地租方面始終還是實物地租佔優勢，有些地方甚至還殘留着勞役地租。由於這種情形，更由於我國的農民人口佔全人口絕對大多數，所以人們認定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前資本主義性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

前面這幾個疑問，也許在先生看來覺得很幼稚或煩瑣，但對於我們這些後進的青年們，尤其是對於我，倒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問題。希望先生在可能範圍內再予以指教吧！讀者吳世明十一月廿日

世明先生：你這次向我們提出來的「幾個疑問」，不但不能算是「幼稚或煩瑣」，而且對於進一步來理解中國歷史的發展及其社會性質是很有幫助的。因此也是我們樂於同你再度進行討論的。不過由於我們的篇幅十分有限，對於你這次提出來的疑問仍然只能給以簡單的解答，這是首先得向你及其他的讀者們道歉的。

(一) 我們說「秦以後二千年，中國社會經濟在本質上很少改變……」，並不是說秦以後二千年來的社會經濟毫無發展，只是說它在「本質上」很少改變而已。所謂「本質」是指那種「手工業

的生產方式」而言。中國自秦直到西方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輸入之前，這二千餘年中間，無論在都市和鄉村的生產方式上，無疑地都是很少改變的，即沒有超過「手工業生產方式」的範圍的。這一點，我想只要稍懂得現代政治經濟學的人們都不會否認。但除了這種「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本質」，「很少改變」之外，建立在這手工業生產方式上的經濟規模的擴大，農耕的深入，商業的發展，貨幣的廣泛使用等等。但這種「發展」只是「量」的方面，而始終沒有進到「質」的「改變」。至於你說翦伯贊先生「說過秦以後社會經濟仍然是有發展的」，不知翦先生所指的「發展」是屬於「量」的方面，還是「質」的方面？若指的是「量」的方面，那和我們所說的並沒有什麼矛盾。如果指的是「質」的方面，那就未免錯誤了！

(二) 「對於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支配地位的實際情形」，我們因為篇幅所限，確乎不會「指出充分的證據」。事實上，在我們這個小小「信箱」內，就是現在也還是無法指出充分的證據。但既然提到這一層，我們便不得不指出幾個要點來請你注意。大家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的骨幹是機器化的工業、交通及大規模的銀行業。機器化的工業在中國固然還很落後，但人們絕對無法否認，它確乎已經壓倒舊式的手工業生產了。例如紡紗和織布（這是人民大眾必需品的重部份），雖然在我們的鄉村甚至某些偏僻的小市鎮裏還存在着純粹的手紡機和手織布機。但就整個中國看來，可以說絕大多數人民所用的紗布是屬於機器生產的了。而且就是那些手織布機所用的棉紗，也絕大多數是由機器生產的，純粹手紡的棉紗，只能佔極不重要的補助地位。由此可充分證明：機器生產的紗布，在所有紗布的生產中是佔着絕對的支配地位的。其他如綢緞、呢絨等更是如此。此外，以生產工具來說，我們的農村所用的農具及各小城市中用的手工工具，雖然大多數還是手工製造的，但它們的主要原料如鋼

鐵，却幾乎全是現代的機器生產品（不用說這種鋼鐵絕大部份是由外國輸入的，但這是另一題）。從交通方面說，我們的鄉村和各城市都留著龐大數量的帆船、手車、甚至人挑的事實，是鐵路、輪船、汽車、乃至飛機等，在全國旅客主要物品運輸上所起的支配作用，也是絕對無可認的。至於新式銀行業在全國工商業及財政等關係上導演的決定作用更是無須說明的了。假如能將中國的現代工業，交通和銀行這些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在我們全部國民經濟生活上所佔有的支配地位的「實際情形」，耐心地詳細地加以考察，我相信「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佔支配地位」這一斷語是絕對不可動搖的。

(三) 你說「商品化并不一定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是建立在最新式機器的生產方法上面的。」這話如果以城市的工業經濟是對的，但以此來衡量農村經濟那就不正確了。因為農村經濟的新式機械化，只有在高度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才有可能。就是在高度資本主義發展國家裏，農業的機械化也往往遠落在城市工業的機械化之後。即以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美國來說，十八世紀七十年代（瓦特發明蒸汽機的時代），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整個世紀中間，雖然工業的機械化一步一步地前進，且已達到了高度的發展，在它的農業方面却一般地還停滯在手工業生產的狀態。這裏的原因，考茨基在他的「土地問題」書中已說得非常清楚。簡單一句話說，由於農村條件的渙散性和傳統習慣的保守性種種障礙，農業的機械化是最不容易實現的。所以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在其初期發展的階段裏，農業方面總比少應用機械的。如就整個的資本主義來說，只有十九世紀末機器才開始被運用於農業生產之中。此，我們判斷一個國家的農村是否資本主義化，不應以那個國家的農業是否機械化來作標準。因以機械化作標準，則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英國，及同一世紀八十年代前的法德等國，都不能說它的農村經濟是資本主義化的了。所以衡量農村是否

資本主義化，只須看它的土地及其生產物是否商品化就夠了。因為在封建社會裏，土地的轉讓一般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產物一般是自給自足的。到了資本主義時代，一切都可自由買賣，土地自不能例外。又由於工業生產完全是為了市場，且需要大量的原料和食糧等，因而就迫使農業生產（如原料及食糧的生產）不能不放棄自給自足而趨於商品化了。假如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上說，生產物的商品化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之表現。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結構是以「商品」為其最基本的組織細胞的。「資本論」之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從分析商品開始，其原因即在於此。

倘使我們前面所陳說的理由是正確的，而同時你又承認「中國農村經濟的商品化」是事實，則我們在上次覆信中以「農村經濟的商品化」和「我們已有了相當數量的工廠，交通和銀行等現代產業」配合着來斷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性的」，那就不能說有什麼錯誤了。但我得重復一句，我們的資本主義還是很落後的。

(四) 在地租方面，始終還是實物地租佔優勢，有些地方甚至還殘留着勞役地租。這當然是事實。而且在這種地租中尚保留着封建式的剝削性，也是毫無疑義的。但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中國社會的性質也是「前資本主義的或至少是半封建性的」，那就未免大錯而特錯了！讓我們試問：在「前資本主義或半封建的社會」中，能有像現時的海、天津、武漢、瀋陽、青島及無錫等許多大工商業城市的存在嗎？能有像平漢、粵漢、津浦、京滬、滬杭、平滬……上萬公里的鐵路交錯於國中嗎？能有幾千百隻輪船航行於海港與內河嗎？能有上十萬輛汽車和幾十架飛機飛往於地上和天空嗎？能有像中國、交通、中央及中農等那樣龐大的金融機關和永安、先施、新新、大新等那樣龐大的商業托拉斯嗎？能有像四大家族那樣的財富集中嗎？難道以上這些還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嗎？事實上，就我國某些工廠、百貨公司和銀行等之規模和技術言，就最新式的交通工具言，就財富之集中

言不但是資本主義的產物，而且已是最高度發展資本主義之表徵了。但假如人們只抓住這一方面而視其他方面，特別是農村方面之落後性，也可看出「中國社會的性質是金融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荒謬結論來的！（據我們知道，事實上確已有一位荒謬先生在作出這種荒謬的結論了！）

但我們必須知道，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是非常之複雜的，這乃是「綜合發展」的結果。它一方面保存着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沉澱物，如陳舊的土制度、封建式的剝削、手工業的生產、遲笨的交通工具（如帆船、手車及肩輿等）乃至游牧經濟等。但另一方面，它又吸收了西方資本主義中最高發展的成果，如大規模的工廠、百貨公司和銀行的組織及其技術，現代化的鐵路、公路和郵電等交通工具，最新式的建築物，乃至無線電、自動電及飛機等等。這在西方先進國家原是幾百年逐步展起來的，而在落後的東方國家却於短短幾十年便把它們移植過來了。正因此，東方的落後國家像沙俄、印度和我們中國，其社會經濟結構便與西方先進國家含有不同的特別錯綜複雜的性質了。正因此，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只有從這種「綜合發展」的觀點上出發才有獲得正確結論的可能。即是說，必須把中國幾千年遺留下來的最落後的四和從西方先進國家移植過來的最進步的東西加分析、比較和綜合的考察，看其中究以何者佔優或支配地位，然後作出社會性質的結論來。只是因地抓住最落後的或最進步的東西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都是機械的，因而是錯誤的，甚至荒謬。

最後，我們再重復一遍：中國的社會經濟不管怎樣落後還是資本主義因素佔支配地位的經濟，是城上商業關係支撐農業關係的經濟，因而中國社會性質一般說是資本主義性的。換句話說，中國是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此的落後，我們必有激烈的民主改革運動，同時由於它的資本主義獨佔土地改革等）走上社會主義的前途。（編者）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字第一二二七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五五六五號

每冊實售法幣七千元

新聲

英法同盟擴大的透視

【貝文】一日貝文在英下院的演辭及其所宣佈的外交政策，不但公然指責蘇聯，而且建議締結英、法、荷、比、盧五國同盟。這顯然是倫敦外長會議破裂的直接後果，是建立西歐軍事同盟的雛形，是美蘇外交衝突進展到軍事準備階段的发展。

這一同盟的締結，是跟着馬歇爾的援歐經濟計劃的發展而來的，它不但為華爾街所需要，而且顯然為它所策動。貝文的演辭和外交政策，不過反映美國反蘇的外交政策和軍事的準備而已。例如在貝文正式發表他的演辭之前兩日，美原子能國際管制計劃的起草人巴魯治，向正在審查馬歇爾援歐方案的參院外交委員會致辭中，便已建議歐洲國家成立經濟政治同盟，以減低歐洲對外貿易的關稅。巴氏特別著重地說：『歐洲受援國家，若不能一致準備為她們的獨立而奮鬥，那末美國縱使給予經濟援助也很難收效。歐洲國家如能樹立這種團結，美國就該允諾在她們遭遇侵略時，馬上出面保護』（見路透社華盛頓廿日電）。這就足夠證明，所謂歐洲同盟，實乃美國所需要和策動，貝文不過反映美國的意向而已。於巴氏致詞之同時，美共和黨外交顧問面他公開說明西歐團結乃馬歇爾方案的要點之一；同時又從反面暴露了西歐集團乃是反蘇之工具。而且這種西歐防守公約的締結，恰巧緊接東歐同盟網擴大建立以後，這又顯然證明是企圖以西歐集團來對抗東歐集團之具體表現。

此外，貝文這次的演辭和所宣佈的外交政策，亦充分證明他在美蘇矛盾日益尖銳的情勢之下，完全揭穿了其過去虛偽的中立面具，赤裸裸地唯美國的馬首是瞻。由此看來，美蘇的衝突，已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以美蘇為主要營壘的第三次大戰，是愈來愈具體化，愈來愈接近了！這對於整個人類，將是一個致命的威脅！

但要怎樣才能避免這一致命的威脅，避免原子彈毀滅的厄運呢？這是全人類應該嚴重注意和考慮的問題。依據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歷史的教訓，唯一有效的辦法，只有全世界的一切被剝削被壓迫的人民大眾，及時從現時改良的幻想和克里姆宮的機會主義的錯誤政策之下解放出來，澈底地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惟有它獲得最後的勝利，才能

——英法同盟擴大的透視——

——吳軍崛起在德國……流光

論「九龍事件」……裴光

經濟崩潰與改革幣制……竹雲龍

美國第二黨能帶來和平嗎……劉乃光

新的幻想與新的災難……紀芬

——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國際——法國應該建立工農政府……沈念輝

——你們的黨將如何解除英國的危機——

血濺九龍城（香港通訊）……招志堅

信——關於中國歷史發展問題……白雲山

——并評郭沫若對伯贊等的意見——

論九龍事件

光 翟

『九龍事件』，當本文執筆的時候，似乎已接近尾聲了。中英雙方都已在尋求一條趕速妥協的道路，為的是他們雙方都害怕中國民衆的鬥爭越過他們的頭。我們爲了一個定期刊物所限制，不能在事變之始來貢獻意見，而迫得於事變之末來作詮釋工作，實在覺得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唯一可以寬解的，就是這個事變是我們久已預言了的戰後中國的整個政局發展過程之一環，牠供給我們一個更新鮮的材料，藉以豐富我們對今後中國命運的診斷。

(一) 戰後中國的地位

我們簡單的把戰後中國的政局追溯一下，便不難了解最近半個世紀以來困擾中國的三大問題——民族、土地、民主權利——在一個更緊張、更絕望的基礎之上，仍然改頭換面的出現於中國民衆之前。土地問題與民主鬥爭曲折地反映在『共產黨』的農民武裝鬥爭以及一連串的學生運動中，而中國的民族問題——儘管中國被宣佈爲四強或五強之一，又儘管有些不够格的『馬克思主義者』稱之爲『新帝國主義』——仍然沒有解決，實在離解決還遠得很，從戰後三個連貫的鬥爭：反克林姆宮的示威（所謂『護權運動』）、反美軍暴行示威以及道次的反英示威中，我們可以無誤的診斷：中國仍處於半殖民地地位。舊的不平等條約取消了，新的不平等條約（『雅爾達協定』及其副產品『中蘇條約』、『中美通商條約』及許多尚未公佈的密約）却取而代之；租界收回了，但不僅大半舊的割讓地與租借地（香港、九龍和澳門）仍然保留在帝國主義者手中，甚至還在帝國主義戰爭密約的壓迫之下，喪失了新的領土（如旅順、大連等）。這就是一個不徹底的抗戰所造成的惡劣後果；中國民衆還必須犧牲更多的血肉來償付昨天的失敗和不徹底。只有在這種廣泛的辯證的歷史光照下，我們才能透切的了解這次新的反帝事件。

(二) 抗戰政策的後果

香港、九龍之繼續保留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本身就是中國政府過份軟弱和妥協的後果。因爲沒有一個堅決反抗帝國主義的政府能够容忍這種荒謬的現實：一方面在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却保持另一些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地位。這種矛盾的現象只有從中國政府一貫的畏懼民衆——依賴帝國主義之一方來反對另一方的投機政策中，得到確切的解釋。在八年抗戰中，中國統治者對中國民衆及其武裝表示極度不信任，打擊他們，壓制他們，而把全部希望放在美英的援助上面，結果雖然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却不得不對美英帝國主義和蘇維埃官僚，償付極高的代價，用新的奴役來代替舊的奴役。假如抗戰『勝利』之翌日，中國抗戰的領導者竟迫得承認『雅爾達秘密協定』，割棄了新的領土，並對美屈服，成立『中美通商條約』，則香港、九龍和澳門的保留顯然是戰中經過同樣的密約或默契保證了的。否則香港政府絕不致那樣大胆的在九龍濫用牠的統治權力，而最近中國政府也不致於那樣毫無爭辯地繼續承認英國對九龍的租借權，迫得以一種讓步的姿態來結束這件事。

(三) 香港對戰後中國的影響

第二次大戰後，太平洋的國際勢力關係起了極大的變化，這種變化反映在中國便是：美國代替了英

挽救當前正在進行的危機之爆發！（韻寬）

異軍崛起在德國

德國的工人階級，十多年來都過着希特勒治下的最黑暗日子，最後又遭受第二次大戰的巨大摧殘，他們的鬥爭便一直處於冬眠狀態中。但戰後，純粹政權垮台了，經濟的復興逐漸有希望了，德國工人的力量因此得以逐漸重聚；再加上各國工運蓬勃生長的刺激，他們的自信心也逐漸恢復起來。就在這個開始復興的基礎上，他們今天又爆發一次總罷工了。這次罷工最初起於英佔領區的十萬科隆工人，跟着是十五萬的魯爾工人，馬上又蔓延到美國佔領區，現在，巴伐里亞全境甚至有兩百萬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工人的情形很是『嚴重』，祇要一點小小的刺激』，便會爆炸起來了！

罷工的直接導火線是抗議英美佔領區當局的『飢餓配給』，因爲當局計口配給的食糧，只有麵包二五〇〇公分，肉類油脂都沒有。目前的糧荒問題已到了這樣的『極嚴重』地步，竟使英美佔領區當局公開承認，這是『戰事結束以來，我們實在初次遭遇的真正飢荒』。這飢荒的造成，甚至連英國的駐德公使也承認英國應負一部份責任。因此，『危急』的局勢便迫使貝文立即表示『嚴重關切』，立即向美呼籲從速將糧食接濟德國；而美國也不得不表示『極重視』這呼籲，同樣承認局勢的『危急』了。在德國工人這種爆炸性的情緒面前，美英當局除了對他們讓步，以較多的糧食來緩和他們的飢餓和憤怒外，恐怕很難有其他辦法了。這證明德國工人戰鬥的力量和意志仍然潛在着，且日益在生長。在歐洲工人階級向舊制度進行的生死鬥爭中，今天又新添進這枝德國的生力軍了。從此，舊制度統治者要想長期穩定歐洲的政局，不但更加困難，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且，他們將遲早要被工人階級趕出佔領區之外，甚至趕出這個星球之外哩！（流光）

小 啓

本期因稿太擠，臨時抽出旭東先生的『評』反蘇大陰謀』及沈念先生譯的『法國經濟復興的極限』兩篇續稿，留待下期刊登。

國的地位，掃除日本的勢力；蘇聯則起而操縱了東北，甚至華北；英國則抱殘守缺，退守香港，企圖從這個老根據地進行操縱華南，特別是廣東。兩年以來，英國在香港所進行的工作已充分表現牠的效果：她把香港變成爲唯一工商業繁榮的中心，靠走私和金融的操縱，使整個廣東變成香港的附庸，並經過廣東侵入中國中部和腹地各省。在這種威脅之下，華南以至整個中國的民族工業遭受致命的打擊，正常的商業活動被擾亂，手工業完全破產，關稅收入被減損，法幣更加速的貶值和失去信用（廣東一帶的民衆已逐漸視港幣爲當然的可靠通貨，而法幣則降爲零找輔幣）。更可注意的，配合着這種經濟的破壞作用，香港政府還或明或暗的，在政治上企圖助長華南的分離運動，英國的代言人早已公言：英國將把香港變爲民主的示範區，藉以吸引中國人民的注意。而與香港政府公開聯合的中國反對派人士也把香港視爲『民主的堡壘』，反對把香港歸還中國。所有這些事實證明『香港問題』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而是富於矛盾的、異常複雜的問題。

(四) 矛盾的積聚

首先，牠在中國所促成的經濟和政治的崩解，使中國政府及其後台——美國——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經濟加速崩解過程中，不僅僅廣大的工農民衆，甚至中小資產者也迅速趨於破產、失業、赤貧化，因而產生極大的政治不滿。廣東既然首當這一禍害之衝，一般民衆的不滿自然更富於爆炸性，何況這個地方還保有百餘年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傳統。

中國政府之突然派一大員——宋子文主粵，而他一登台即刻進行與港方談判走私及通商條約等重要問題，已反映這次事變所隱伏的矛盾之一面；但還有更深刻的另一面表現在普遍的『匪患』（讀作：農村騷動），城市工業破產所引起的不安，及統治階級的離心傾向（如李濟深等所組織的武裝叛亂）中，這簡直是整個中國的縮影。只有從這裏我們才能瞭解何以香港政府對九龍的一點點挑釁行動便喚起那樣大的反響，使沉寂半年的羣衆運動又重新爆發起來。

(五) 運動是自發的

目下一些淺薄的論客認爲這次示威運動純然是當權黨故意領導起來，藉以增強牠的外交地位的。這種觀察與他們過去對反克林姆官示威運動的分析同樣無知，彷彿一個極端孤立和畏懼民衆的統治階級還有勇氣去組織一個認真的羣衆鬥爭似的！這種觀點不僅是無知，而且客觀上還盡了欺騙的作用。事實上，這次『九龍事件』所引起的鬥爭是許多衝突積聚而成的，是無

可抑制的，自發的。假如慈禧太后這個老腐敗還曉得巧妙地轉變『義和拳』的農民騷動爲『排外運動』，則目前中國當局當然更懂得把一個無可壓制的鬥爭引向牠自己設定的河床之上，轉移牠的目標，把牠限制在狹小的意義中，利用牠作爲向英帝國主義講價還價的工具。

不幸，戰後中國所蘊蓄着的矛盾太複雜、太緊張，民衆運動不管在什麼形式之下爆發起來，牠總是迅速的擴展爲要求徹底政治改革的鬥爭，威脅現政府的生存，因而一轉瞬間便超過了『領導者』的頭。過去的經驗如此，最近這次『九龍事件』的事實也是如此。人們以爲廣州民衆可以安份地使他們的憤怒和不满、抑制在一個檢閱式的示威遊行隊伍中，但想不到却會像決堤的洪水一樣，造成『沙面事件』；在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學生示威行列中還聽到了『打倒政府』，『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賣國外交』之類的口號。這些事實表現在這次羣衆運動中，政治覺悟力已超出過去每一次鬥爭之上，迫得中國政府急忙要結束牠、壓制牠，因爲火已經延燒着他自己的手了。

(六) 史大林黨的作用

這個時候，我們又開始聽到當權黨方面埋怨『奸黨的利用』、『搗亂份子乘機興亂』等等。這種埋怨也是必然的，因爲牠既然無力控制這一運動，這一運動自然只有落在另一領導手中，不管這一領導是否更好。我們在這運動當中，也不難看出在野黨的活動，尤其是『共產』黨，牠是不會放過這一時機的，除非牠準備完全放棄羣衆的領導權。但假如我們認定這個黨一開始便積極地起來領導這一運動，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見解。我們一定不要忘記：史大林黨久已喪失了牠的革命性了，牠的成份久已改變爲一些缺乏鬥爭勇氣的小資產階級分子了，在連續的打擊之下，牠殘存在國民黨統治區域中的黨員大都採取消極的等待態度——等待『前方』的軍事勝利。這次羣衆運動的新爆發是出乎他們料想之外的，甚至是違反他們的意志的，正因爲如此，他們最初才對這一運動採取消極和觀望的態度，僅僅當羣衆的情緒繼續高漲，他們才被推動起來，企圖把這一運動轉變爲反美及政府的鬥爭。儘管這一轉變在客觀上合乎羣衆運動的邏輯，但牠却安置在兩個錯誤的基礎之上的：第一、史大林黨連同牠的附庸（如民主同盟及所謂『國民黨左派』）在香港正公開與英帝國主義聯合，破壞罷工，迫害工會的革命份子，甚至認爲香港是『東方的民主堡壘』，應繼續保留在英國手中。（就是在上海的學生示威運動中，我們也不斷聽到史大林黨份子的勸告，認爲不應過份着重收回港九

，因為英國在港九的統治畢竟較中國的統治進步等）；第二、史大林黨並不是企圖把這一運動徹底轉變為獨立的革命運動，牠只是設法使牠隸屬於牠的軍事目標與克林姆宮的外交利益之下，牠提出『打倒政府』的口號僅僅爲的是設立那個『共產』黨——民主同盟——國民黨左派的聯合政府，牠的加重『反美』的意義僅僅是爲的掩飾克林姆宮對中國被壓迫民衆所犯的罪惡。

在這兩個錯誤的基礎之上，史大林黨的領導必然也要迅速地轉變爲中國革命的障礙，因爲只要中國工農和學生羣衆的運動繼續向前發展，他們必然不滿於史大林黨與英帝國主義妥協，以及依賴克林姆宮官僚的叛賣政策，必然不滿於那個破產的『聯合政府』公式，必然不滿於那種不徹底的、反覆無常的土地改革和軍事冒險政策。

(七) 新的領導

經濟崩潰與改革幣制

竹雲龍

(一)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以來，商談了一年的美貸，仍未蒙美國金融寡頭垂允，依賴外債支持國內軍事的政府，一年餘來不斷掙扎於經濟總崩潰的邊緣；一九四七年雖屢次以行政手段處理經濟危機，但危機非但未能稍減，反而越來越嚴重。一九四六年年底的物價與黃金的漲風，至一九四七年二月實施『緊急措施』時暫告一段落，但不二月物價又繼續上漲；八月公佈『經濟改革方案』，也空空地鬧了一場，留下一些永遠辦不到的且也無意辦理的決議案（如徵用國外存款，徵收財產稅，沒收貪官污吏財產……）。十一月漲風更兇，政府又被迫公佈『經濟戡亂』法令，但這個政令的時效僅有十天，物價又以更瘋狂的姿態上漲。『陽關』前後，爲時不過十天，物價上漲一倍左右！這種漲風不但威脅工人和小職員，更威脅政府本身的存在，迫使政府允許按指數發給公務員的薪水。但是，一切事後編製的指數，總追不上物價，更何況編製的方法太不合理，因而在物價空前飛漲的時期，人心惶惶，怨言四起。郵電及公用事業的貼補政策停止以後，公用事業漲價的成數驚人，此種迫不得已的『高物價政策』，顯示當局已失去任何控制經濟危機的能力，只能坐視經濟崩潰的發展。

只有能超出於帝國主義、蘇維埃特權官僚層及牠們底中國工具的利益之外，不受其絲毫束縛的獨立領導才能滿足中國民衆的要求，才能引導他們走向獨立革命鬥爭的道路，完成他們的徹底解放。

這個新的領導不僅要求『收回港九』，還要求收回一切失地（包括澳門和旅順大連）；不僅要求『美軍』或『蘇軍退出中國』，而且還要求一切外國駐軍及行政官吏撤出中國（包括美、英、葡、蘇的）。在內政上，這個新領導不是要求半吊子的民主改革，而是要求徹底的土地改革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不是要求成立虛幻的『聯合政府』，而是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

戰後中國民衆革命運動既然一次比一次深入和普遍化，牠所要求的新領導自然一次比一次急迫，這也是客觀的邏輯使然，我們站在這次新運動的基礎之上，熱誠地準備與一切前進的革命份子完成中國民衆這個迫切的歷史願望——促成一個新的領導，新的革命黨！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經濟崩潰表現於紙幣之空前的發行與物價的追隨上漲，如此，不但『薪水階級』不能生存，生產事業不能活動（因爲代表資本的貨幣已完全失去其機能 and 社會信用），就是最新式的印刷機也不能扭負如此繁重的大量發行工作了！最致命的，還是後方的經濟崩潰不可避免的對影響軍隊的作戰力，迫使當局叫出『七分經濟三分軍事』的呼聲。可是『經濟戡亂』不能以槍彈解決的，所以最後，政府被迫重提改革幣制和向美借款問題了。

與官方有關的報紙（申報、新聞報、中央日報、正言報、……）一致主張火速改革幣制，他們把改革幣制手段描寫成無比的魔術一樣，以爲中國幣制一經改革，經濟危機會自然克服。以往態度較爲審慎的大公報，此次已不反對改革幣制，僅提出幾點『忠告』而已。從『輿論』看來，更從事實分析，現政府已下了決心，希望以改革幣制的手段來謀取短暫的穩定。

(二)

以什麼東西作爲改革幣制的經濟基礎呢？現政府所有的，已不足以應付危機，而穩定新幣的準備金（如黃金白銀等），却正是政府所缺乏的。國內既沒有新幣的基金，當然只能求之於國外，而國外可求的地方還只有美國。自從一九四七年王寵惠秘密要求十億美元借息遭馬歇爾拒絕後，中國政

府『自力更生』好幾個月，結果越來越不能制止經濟崩潰的趨勢。此次派派一九四六年黃金漲風的主角貝祖貽帶了改革幣制方案去美國，顯然一方面準備接受更苛刻的條件，但同時也必然以政治軍事危機威脅美國要求借款，美國爲了維持遠東未來戰爭中的與國（目前經濟侵略的目的地），雖然明知『弄不好』，但不得不依照一貫政策支持中國現政府，勿使她爲經濟危機所吞沒。按照目前的形勢估計，美貸之有實現希望已不成問題，問題僅在數目。三億？六億？十億？……？

許久以來，不少與政府有關的『經濟專家』或『名流學者』，都主張改革幣制，但意見仍不一致，有的主張金本位，有的銀本位，有的虛金本位，有的則乾脆主張加入美元集團與美元訂立一定兌換率。當然，最後一種辦法是人們所朝思暮想的，但從以往的經驗和教訓看來，人們絕難相信美國會肯答應且承認中國的新幣有穩固的定值價值，因而輕易允許與中國的新幣『聯姻』。

另一方面，未來美國貸給中國的新借款，數目是不會很大的，即令貸與相當大的數目，（如六億元，或十億元），也不能根本改變中國經濟的根本危機——日趨破產與赤貧化；正相反：中國越是倚求外力，越是向殖民地方面發展，經濟危機益發變成結構性的死症。

現政府的經濟政策，從屬於在朝執政黨既定的『國策』，而這個執政黨幾十年來總是與帝國主義結了不解緣，抗戰時期前門拒狼，後門引虎，以至弄成今日行將總崩潰的危局。在這危局鞭策之下，當局顯然已露『不擇手段』，但求目的』的窘態，其對改革幣制的希望，僅僅在取得暫時的經濟穩定；從官方經濟學家的口氣猜度，如果取得六億美元新貸款，可以發行一種新紙幣（大約是久已傳聞的『孫幣』），其基金可供政府一年的支出。我們已不難想像他們的結論：一年之中軍事勝利可以挽救一切危機了。

(三)

如果站在嚴正的立場上來研究改革幣制問題，首先，我們應當觀察：中國是否具備了改革幣制並穩定貨幣的諸種社會條件。第二、改革幣制既爲『復興經濟』的手段之一，改制後中國有無經濟復興或繁榮的客觀環境。

改革幣制的主要目的是：以新的優質通貨代替流行的劣質通貨，使物價穩定，使生產與消費過程中減少投機行爲以及其他非常的因素，使社會生活中有一定的極少變動的價值尺度，使全社會的生活能正常化。目前華南以港幣爲一切經濟行爲價值尺度，上海一帶則以美元或黃金爲尺度，『法幣』雖

有『國法』作担保，終於在實際的經濟活動中被擠入劣等貨幣的地位，失去價值尺度的社會機能了。這已是一年多來的事實！『法幣』之『破產』，主要原因就是國家收支不平衡被迫濫發無準備金紙幣的結果。因此，改制的首要社會條件，就是新幣的基金。其次，國庫的收支必定有新辦法使其平衡。第三、國際貿易的巨額入超及走私必須有新辦法使其完全停止。第四、國內的生產量與消費量之間，須有整個的統整計劃，彼此相調劑相均衡。

中國目下有沒有這四種改革幣制的社會條件呢？一種也沒有！連第一點起碼條件也沒有，如果美貸無着，發行新幣僅僅是對人民的新的掠奪而已。

再觀察實際的客觀的歷史條件，我們更看不到中國有任何復興的可能。美貸既是有條件的『買賣』，則中國今後將變成美國工業的銷貨市場和原料的供給地區，我國農業早已破敗得慘不忍睹，工業在美貨傾銷的前兩年中已搖搖欲垂，如果一旦美貸實現後改革幣制，不但一般囤積性或投機性的商人將無法生存，而工業也必然在『開放國際貿易、減低關稅壁壘』的打擊之下漸漸地倒下去。尤其是一個軍費支出佔全支出額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國家，一個實際支出額比預算額大七倍以上的國家，一個被貪污腐化的官僚制度癱瘓了的國家，一個戰火十年未熄目前更處處烽煙的國家，實在沒有經濟繁榮的客觀條件，因爲大規模的軍事鬥爭，耗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力，阻止且破壞了擴大再生產的一切可能。

(四)

獨立的經濟政策是一個民族國家獨立自主的基本條件，反之，中國現政府的經濟政策，一面求美貸取得暫時穩定，一面寄全部希望於無出路的國內戰爭上。在這樣的歷史關頭，改革幣制不過是人民所遭遇的幾百種災難中的一種，發行新幣，充其量也只能暫時延緩最後崩潰的時間。但是，如果一切客觀條件並未變更，則舊的危機將以更新的姿態出現，到那時，通貨膨脹將以高過今日幾倍的速度向『無量數』的邊際飛去。不脫離帝國主義的支配，不停止破壞國民經濟的內戰，中國實在無法避免結構性的經濟危機，幣制改革雖然可能發生短期的臨時的『強心作用』，却包含了更深刻且嚴重的危險因素。歷史從來不饒恕任何一個錯誤的罪行的！

新聲 (原名青年與婦女) 第二卷第十一期
 ▲每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陳景先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上海中正路五三七號
 總經售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一日出版

美國第二黨能帶來和平與繁榮嗎

劉乃光

前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最近曾公開宣布美國需要另組新黨，他本人則將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加今年的總統競選。這一宣布之值得我們注意，在於牠所引起的某些人底幻想——幻想牠真的會帶來和平、進步與繁榮，幻想昨天羅斯福『新政』時代會回來。爲了揭破這種幻想，我們必須把華萊士的第三黨底產生原因加以分析，把牠的政綱加以剖視，然後正確地預測牠的前途。

一 第三黨的產生

戰後世界的整個形勢，是美蘇間矛盾衝突之日益尖銳化。這種衝突貫穿了兩年多來的每一次聯合國大會和外長會議。最近由於倫敦外長會議之公然宣告破裂，美國之急需實施馬歇爾援歐計劃，及九國共黨情報局之設立以企圖破壞牠，都證明美國正在一步步走向第三次大戰。美帝國主義是不能不走向這種強烈的擴張主義的：一方面，牠國內的生產力已達到如此的高度，對壟斷市場的要求更加急迫；但另一方面，牠在大戰中所爭得的國外市場，却給戰爭破壞得那麽殘敗、狹小和紛亂。牠想恢復這個市場，但每走一步都覺得克里姆宮底國外政策在阻撓着。如此便迫得牠非另一次戰爭來企求打開一條出路不可。美國人民於是愈來愈被置於新的更可怕的戰爭威脅面前了！

但只有藉戰爭發財的獨占大王們才喜歡戰爭。他們在幾次戰爭中已獲得無數倍的利潤了。唯一遭受戰爭災害的却是廣大的民衆。戰爭本身及牠的後果，都只替他們帶來通貨膨脹、物價高昂、失業、貧窮與死亡，而不能給他們以半點好處。這事實，甚至村魯門也在第八十屆議會中承認了：『本國的通貨膨脹已在破壞着數百萬家庭的生活標準。糧食的費用太高，住屋的代價已達到驚人的地步。』去年許多美國家庭爲了貼補生活費用的不足，都動用了他們的儲蓄存款。此外他更指出『工資的增加趕不上批發價格，越不上生活費用。而一九四七年的公司盈利總額，却比一九四六年增加百分之三十五』。固然，一九四七年是戰後美國最繁榮的一年。但這和繁榮只表示大壟斷家利潤的增加吧了。可是壟斷勢力愈發展，則那些被排擠在夾縫中討生活的中小工商業者，便愈少立足之地。另一方面，失業軍在這一年中據說已減少到最低限度，但仍佔有四百萬人找不到工作。而工作者的實際工資，却給通貨膨脹一次次削減了，他們的民主權利也給反勞工法案等逐漸取消了。因此，他們眼見民主黨和共和黨都同一鼻孔出氣，同樣要把他們從一個戰爭帶到另一個戰爭，從一個災難帶到另一個災難；結果把一切痛苦都轉嫁在他們自己的身上，以圖挽救美帝國主義的危機。在這種困苦的生活

和新的戰爭威脅前面，他們的不滿和憤懣自然要表示無法忍受了，自然要重新幻想羅斯福的『新政』時代了。而更值得注意的，工人階級這時也開始傾向於獨立的政治鬥爭了。（如產業職工大會中之設立政治行動委員會，以及最近工人爲抗議政府的反勞工法而不斷舉行罷工、工大及勞聯對爭取政治權力的大會決議等）。這幾方面的不滿和願望，便造成了華萊士起來號召組織第三黨的有利條件，使他以羅斯福的繼承人自居，到處痛斥民主共和兩黨的『腐朽好戰』，提出他的『和平、進步、繁榮』政綱，對外反對擴張主義，適合一般民衆渴求和平的心理；對內反對壟斷政策以代表中小工商業者利益；此外，他主張提高工資、減小工時和廢止反勞工法等，更顯然是想討好工人階級，爭取他們的擁護，以便進而利用他們的獨立的政治鬥爭，甚至控制牠。當然，促成華萊士第三黨運動的，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那便是美國共產黨（史太林主義者）的捧場。牠替華萊士捧場的目的，一方面是由於企圖恢復羅斯福新政時代的聯蘇容共政策，以代替『杜魯門主義』；另一方面是想利用這一派『進步』的資產階級，來打擊范登堡等『反動派』，進而造成牠自己的勢力，替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服務。這便是華萊士能够得到那個共產黨員參加的美國進步公民會推舉爲總統候選人，以及組織第三黨的原因。

二 『和平』的政綱

華萊士宣稱第三黨的新政綱『決不以匱乏及戰爭爲目標，必須以組織和平來防止經濟恐慌及戰爭』。爲了達到和平，他『願請蘇聯及美國以客觀立場觀察所有歧異之意見，並消滅在兩方散播憎恨種子的人的偏見。世界今日所最需要者爲召開聯合國裁軍會議』。這位先生以爲美蘇間的矛盾衝突，並非由於兩種利益相反的制度間之不可調和性，而只是由於雙方缺少以客觀立場來觀察，只是由於雙方給散播憎恨種子的者的偏見所迷惑。他認爲召開聯合國裁軍會議，便可永保和平了。這位先生又顯然忘記了第一次大戰後的經驗教訓。當時的凡爾賽和約固然把德國的軍備完全解除，但這仍沒阻止牠從平地建立起最新式的武器來；而凡爾賽的國家也各自躲在『裁軍』的旗幟下加緊擴充軍備，走向新的戰爭，更是鐵般的歷史事實。這次莫斯科的外交家們雖然照舊把這個『反動的幻想』（列寧當時的評語）口號重掛出來，但很久很久也引不起人們的興趣了。不料華萊士仍然開不出比較動人的藥方，而只能追隨在莫洛托夫後面吶喊。至於他所提出的七點計劃，也不外乎主張聯合國成立一機構來處理貸款事，以及魯爾由四強國際共管等。其目的無非是想不用武力、而只用和平協議來解決美蘇間的矛盾衝突。這也不過是爲了追求

他在一九四六年九月的『和平』演說中宣示過的目的，即，『在友好和平的競爭之下，俄國的世界與美國的世界將逐漸變為相似，俄方被迫給予更多的個人自由』。(意思是使蘇聯和平地給資本主義同化)。

華萊士就這樣憑藉着『和平』的幌子，掩護他非副資本主義最忠實代理人的面目。他同時主張『用美國的財力物力去解決世界人民的要求，而不干涉他們所要選擇的政治經濟生活途徑』，這似乎是『進步的』；但大公報駐美特派員楊剛先生在通訊中仍沒有忘記指出：華萊士這主張的結果是『爲美國張目』的，因爲如此『則使世界上要求變革的力量不致於極度向左』。這即是說，把各國工農走向社會主義的變革阻止了。這個目的究竟是『進步』還是『反動』的呢？讓那些替他捧場的人們去答覆吧！但我們應該公允地補加一句：這並非像美國資本主義發言人所指責的，是華萊士在替克里姆林宮及共黨張目；反之，却是克里姆林宮及美國共黨在替華萊士的反動企圖張目哩。

但華萊士第三黨的政綱不但具有這種反動的企圖，而且還另具滑稽可笑的空想哩！他要求把專門的民主黨回到羅斯福時代去，實行一種『蘇聯式的』『和平』，尤其是想壓迫那些大醉國家分出一點麵包屑，給工人量放管管改良的殘羹，順便給一羣無告的中小資本家多留一點生有空間，不要過小小的夾縫也排擠掉。但這精窮無身叫過去昨天回來，是絕不可能的事。主要的原因在今天的美國『已非昔比』了。在昨天，先代老前輩們了窮人的財富，才讓羅斯福拋出十五億元的救濟金給失業者，但他最多也只能使失業的數字從兩千萬減至一千萬。這精窮的政象，即使在和富有的國家也不能無限限制地繼續實施的。何況美國今天所支配着的世界是一片殘破的廢墟，那周圍的國家都是嗷嗷待哺的孤兒，不復復五一些要削自己力量的窮人。那今天奪去窮人的幾十億元，去援救窮的衛星國底經濟危機，這種援助是更簡直像丟在無底的深淵中一樣，將是一分無了無休的消耗！因此，在這極其險惡的世界局面前，加上新的戰爭的準備，使和今天已再也無餘力實行羅斯福時代那樣奢侈的國內改良了。在目前這樣的經濟基礎上，這樣的政治環境中，即便羅斯福再生也是無能爲力的，他去要寸寸地奪門——共和黨今天的路綫的。華萊士要叫昨天回來，那就等於付手段拿月亮一樣，只能引人發笑吧了！

二 前途在那裏？

但即使在昨天那樣雄厚的經濟基礎上，羅斯福的新政也不能替美國打開一條新的出路，反之，羅斯福才人也不得不屈那於客觀規律的發展面前，不得不把美國帶到第二次大戰裏去。他的『新政』到了村魯門這不滿意手裏，便消失得毫無踪影了。這正如楊剛先生在美國通訊中所描寫的：『對力——對財勢力——因戰爭而更加強大，更加善於運用財力。對政派好像一支無主的聯軍，那皇軍已散。』如此充分證明新政府物質基礎早已沒有了。華萊士在如此無望的基礎上，要想對抗那一切的大財勢力，怎能不

令人生出『以卵擊石』之感？他在政治上顯然無力對抗大資產階級的壓力，恰如他所代表的中小資本家，在經濟上無力對抗大壟斷家的排擠一樣。既然華萊士的第三黨主要是代表中小工商業家的利益，要靠後者的支持，但後者在今天却已成了過時的、沒落的階級，此外又加上一個烏托邦的政綱，那末，第三黨運動之成了過時的、沒有前途的，也就顯然可見了。在這裏，我們附帶指出：楊剛先生拿當年傑佛遜的勝利來比擬今天的華萊士，以此相信後者是具有前途的，這就把時間倒拖了一百六十年，把一個運動的上升時代和沒落時代混淆不清！因此，人們不是盲目無知，便是有意欺騙了。

但或許有人會說，華萊士還有美國共產黨的支持呀！不錯，美共今天正誠心誠意在支持他。但不幸人們又把空閒弄錯了。華萊士是在美國而不是在法義！共黨的支持實際上只能使華萊士的運動遭受更大的壓力，陷於更孤立的困境吧了。因爲共產黨在美國是最不受人歡迎的。牠一貫都純粹是莫斯科的外交工具和應聲虫，隨着後者政策的轉變而轉變；在大戰中採取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路綫，在戰後又擁護克里姆林宮的掠奪、賠償等不名譽的外交政策；此外又加上格柏烏人員在美洲進行的綁架、暗殺等無恥案件經過不斷的暴露後，共產黨在輿論上受的打擊更大，而在最近勃起的反共運動聲中，牠所處的地位更不利了。這不但幫不了華萊士的忙，反而由於他與共黨連在一起，使第三黨裏的某些成份更加速地分裂出去。(如金頓和華爾綏等重要份子之脫離，這當然也同時證明第三黨成份複雜的弱點，以及美國自由主義者的無力)。甚至連產業職工大會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也公開宣布反對華萊士競選及不支持第三黨運動了。這對於華萊士第三黨，無疑是莫大的打擊。

最後剩下來而未決定因素是美國龐大的工人階級。這階級，就在美國社會生產上所佔的重要地位說，就牠那將近六千萬人的龐大隊伍說，最後且就牠在近年來的堅強組織力說，牠無疑是唯一能捍衛美國主義命脈的力量。只有牠才有能力推翻大壟斷勢力，制止美國走向新的戰爭。牠現在已開始傾向於獨立的政治鬥爭了。正因爲華萊士看出了這一點，才藉着美國共產黨底助力，以及唱着提高工資縮短工時等改良論調，企圖把工人階級這種傾向納入他的軌道，替他效勞。但華萊士這個企圖也是很難成功的。美國目前已迅速失去改良的物質基礎，而工人目前對第三黨之類的政治運動也並不感到什麼興趣。他們之參加政治鬥爭還是下一階段的事。到那時，像經濟危機等新的事變將刺激他們起來鬥爭，這些鬥爭將更帶飛躍性和劇烈性。在尖銳的階級矛盾中，不但沒了改良的餘地，而且工人也不會以改良爲滿足的，他們將組織獨立的勞工黨走向徹底的社會改革。而這樣名符其實的勞工黨，今天在美國已經開始醞釀，開始在工人中生長。工人今天所需要且爲明天所擁護的，正是這樣一個脫離資產階級影響的工人政黨。他們不應該而且也不會籠罩和擁護華萊士這個資產階級的第三黨。無論從那一個角度看，歷史留給華萊士第三黨的位置都未免太渺小了，牠那裏能帶來什麼和平、進步與繁榮？

新的幻想與新的災難

紀芬

——評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

毛澤東最近於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廿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上，發表了他的政治報告：『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這個報告包括幾點：第一，宣佈在軍事形勢上，中共已由守勢轉為無限制的攻勢；第二，實行土地沒收和分配；第三，實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政綱及其新『統一戰線』與『聯合政府』。這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反映了小資產階級農民的輕浮的樂觀主義，與史大林主義的特質；冒險主義與機會主義的新的混合。因為目前中共是中國第二大黨，而牠的基礎又是佔中國人口最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羣衆，牠的言論的影響當然足以產生極大的後果。一九二五——二七年，牠翻譯了史大林——布哈林的『四個階級聯盟』的腐臭的機會主義政策，在中國民衆中散佈了與資產階級共同完成『國民革命』的幻想，結果造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的大災難；一九二七——三七年，整整十年的盲動政策又散佈了簡單憑藉農民的武裝力量可以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實現『工農民主專政』的幻想，結果造成了江西農民暴動的全般潰敗與新的消沉；一九三七——四六年，另一個十年，中共又回到與資產階級聯合共同完成中國民族獨立，實現『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幻想，結果這一幻想於抗戰結束之翌日便遭逢幻滅，造成目前的武裝流血局面。現在這一災難尚未結束，毛澤東先生又創造一個新的公式——新的幻想，企圖『聯合工農兵學商的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及各地愛國份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只是過去中共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的翻版，既然過去每一次幻想總是產生一個大災劫，則這一次新的幻想，自然也跟着帶來牠的邏輯後果：新的災難。中國工農已差不多有兩個整代葬送於這些接踵而來的，人工造成的災難中，我們當然有充分理由，耐心地系統地揭破這種新的幻想，爲的是避免一個新的悲劇，把中國民衆引導到一條正當的革命道路上去。

一 爲什麼向「左」搖擺？

綜合過去一年來的經驗，中共政策的發展顯然已逐漸由「右」面向「左」

盤旋，這一盤旋的重要指標便是『由減租減息改爲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其餘如『沒收壟斷資本』，在『聯合政府』的公式中排出現政府所代表的『大資產階級』等，只是構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附帶要素。

據毛澤東的報告稱，中共這一土地政策的轉變已開始於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所發出的指示中。但他自己立即承認，正式有系統地實施這一轉變還是最近的事，即，直到一九四七年九月，整整過了一年零四個月之後，『土地法大綱』才在中共召集的全國土地會議中製定。這一點也與過去的政治事變相符合，中共之從『政治協商』轉向全面的武裝抵抗，完全是被動的，因而也充滿動搖的。直到資產階級已和牠公開破裂之前一分鐘，甚至在破裂之後一個短時期內，牠還保持強烈的幻想，希望利用莫斯科的後盾與武裝壓力可以取得資產階級的讓步和妥協——經過『聯合政府』及其未來的憲法來批准兩重政權與兩種武裝的合理存在。在這過程中，牠是沒有可能採取堅決的政策轉變的，武裝的抵抗僅僅是消極的『應戰』，完全缺乏有系統的防禦步驟，許多重要城市的喪失，固然其根本原因可以歸咎於農民武裝的缺點，但上層領導的妥協幻想和搖擺，其所負的責任也不較少；至於土地政策的轉變並沒有什麼顯明的跡象，我們僅僅見到某些『解放區』中，臨近決戰之前夜，爲了遷就農民要求的壓力，散漫地應急地採取不很徹底的沒收和分配（如蘇北）。

本來一個機會主義的領導，遭遇了破產和應得的懲罰之後，突然向「左」盤旋，希望以此「緩靖」下層的不滿，這也是一種普通的規律，這一點在過去的史大林主義路線中也表現得最精彩。但中共過去從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機會主義路線轉向盲動冒險，是突然而來的，毫無躊躇的，而最近這次轉變却充滿躊躇和搖擺。什麼原因？除了史大林主義領導之小資產階級性外，還有一個客觀的原因，那就是莫斯科的外交政策。我們知道在戰後兩年來，莫斯科正繼承戰時的機會主義外交路線，希圖尋求與美帝國主義妥協的道路，莫洛托夫的外交姿勢，史大林的『和平』談話，以及各國共產黨之追求『聯合政府』的官位，——這一切都在服務於一個目的：經過與世界資產階級的合作取

得美蘇的諒解。法共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鼓勵工人努力生產，壓制罷工，為的是爭取法國資產階級充當美蘇安協的橋樑。義大利「共產」黨也在追求同樣的目的。那末，我們就可以解釋，何以中國「共產」黨直到去年九月才正式採取「沒收土地」的政策，這個政策是牠與資產階級正面破裂的指標。一九四七年九月，是個象徵的月份，因為同在這個月內，歐洲的「九國共產黨情報局」也正式成立。法義共產黨之被排出「聯合政府」，以及牠們之從反對工人鬥爭轉而利用工人的罷工鬥爭，四國外長會議的破裂，莫斯科領袖的強硬恫嚇，以至最近南斯拉夫狄托元帥的戰爭聲明，希臘游擊政府之正式成立，東歐各國共產黨之逐漸操縱政府機關——這一切連串向「左」盤旋的姿勢都在服務於一個外交目的：假如不能經過合作，則經過羣衆的壓力與革命的威脅來迫使以美帝國主義為首的世界資產階級讓步，完成美蘇諒解的美夢。中國史大林黨的轉變只是這整個莫斯科外交政策轉變之一個環節，牠的目的也只在迫使中國資產階級及其後台的讓步，牠愈激昂的要「打倒獨裁政府」，便證明牠愈迫切地希望和這個「政府」成立新的和解。這已不是新鮮的邏輯；過去，自一九二七年以來，還有什麼黨派比中共那樣暴烈地宣告中國資產階級「永遠轉入反動陣營」，永遠和牠不可和解呢？但十年之後，自一九三七年之後，還有什麼言論比中共那樣卑屈地歌頌中國資產階級的合作呢？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而且必然復演於不久的將來，只有世界革命或戰爭才能把牠打斷。

二 中國革命的性質

中國革命諸問題自從提出於議事日程之上，迄今已差不多半個世紀，牠們之遲遲得不到解決本身已是一個悲劇；但今天徒然為逝去的昨天悲嘆，或單純的詛咒過去的失敗，也是無益之舉。對於一個實際革命者最重要的還是在過去歷史事變的光照之下，得出必需的教訓和結論，以作為行動的指標。

毛澤東先生從最近過去的歷史中得到什麼教訓出來呢？沒有。假如說有，那就是在每一次新的失敗後與在歷史的每一個新的轉捩點中，他總是把失敗責任諉諸於過去的領導或某一部分人，而他所製作出來的一套「新」的理論總之把過去已「死」了的事實，加以「裝」。

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共認爲中國革命自本質上反對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亦即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爲了實現這個革命，中國工農應該與資產階級建立長期的政治聯盟，合作到底，只有當這一革命完成之後，中

國無產階級才能談得到走上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一典型的孟什維克公式束縛之下，才發生了毛澤東在「報告」中所貶責的現象：「在一九二七年北伐戰爭到達最高潮的時期，我黨領導機關的投降主義份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我們應該補充一句：甚至對無產階級的領導權——芬），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東在革命失敗之後推諉責任於那個時候的「投降主義份子」，但如果我們的記憶力不錯的話，毛先生不僅在一九二五——二七年當中並沒有一句話指出什麼「投降主義份子」，而且他本人也是那時領導機關中的機會主義路線執行者之一。

一九二七——三七年，中共雖已猛烈地擺向冒險主義的極端去，並歇斯得里地宣布「中國資產階級已永遠轉入反動陣營中」，但牠仍然認爲中國革命的基本性質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爲了完成這一革命，仍然要依賴於「工農民主專政」，即，虛幻的小資產階級專政。這是孟什維克——馬丁諾夫的兩個階段論，用「左」的偽裝重現。在這一死的公式內，中共完全放棄了城市工人階級，退入農村，把全部希望寄托於農民的土地暴動和山上蘇維埃，幻想「一省數省首先勝利」，所謂「工農民主專政」只是一些散漫的孤立的農民政權，結果在缺乏城市工人階級的援助與遭逢資產階級的優勢壓力之下，完全瓦解。

一九三七年在莫斯科的命令之下，中共突然又從「極左」急劇跳向「極右」，用犬儒主義的詞句，恢復一九二五——二七年的舊公式。在抗日的藉口之下，牠仍然認爲中國革命的根本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於是「三民主義」從「反動的盾牌」仍然變爲「革命的原理」，「工農民主專政」的狹隘公式又大開門戶，歡迎一切抗日的資產階級，甚至「封建地主階級」加入。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發表的全部文獻都在證明：中國工農是可能而且應該忠實地在「國共合作」的領導之下，建設「三民主義共和國」的，沒有一個共產黨員敢於懷疑這一「合作」的忠誠，否則便「被指爲「托匪漢奸」之虞。正因為在這幻想中，才又發生了毛澤東今天才率直承認的現象：「在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反對了和這種投降主義思想——即指一九二五——二七年的機會主義——芬）相類似的思想，即是對國民黨人人民政權一步，信任國民黨超過信任羣衆，不敢放手發動羣衆鬥爭，不敢在日本佔領區擴大解放區與擴大人民的軍隊，將抗日戰爭領導權送給國民黨人」。同一的機會主義公式產生同一的機會主義後果，這已不等待毛澤東先生今天

來承認，早已在「一九三七年『國共合作』之初由一些優良的馬克思主義者指出過了。不幸得很，毛先生那個時候却正沉迷於自己所製成的死公式中，誣指別人的正確批評為『漢奸理論』，今天，在事變的殘酷打擊之下，才迫得從這種『漢奸理論』中抽出一點來解脫責任。但，過去的『投降主義思想』的負責人是誰？彷彿負唯一領導責任的毛先生過去是生活在真空中似的！

現在我們暫時結束了過去的不愉快的歷史檢討，我們試看一看毛先生今天所走的『新』路線。他在『報告』的第六段會加以完備的描寫，總括的說來，他認為戰後中國的經濟基礎是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的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慘酷教訓之後，毛先生似乎第一次把過去的『半封建制度』的破產公式拋棄了，他至少已承認中國的經濟是資本主義起着決定的作用了，雖然他仍然加上『封建』的形容詞。

但不幸得很，當毛先生從這個多少正確的大前提出發，進行描寫中國的階級關係與革命的性質和任務時，却仍然繞回他的機會主義的舊圈套中。他認為『這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不但壓迫工人農民，而且壓迫小資產階級，損害中等資產階級』。因此『新民主主義的革命的對象，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要消滅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與壓迫，改變買辦與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一切被束縛的生產力。被這些階級及其政權所壓迫與損害的小資產階級及中等資產階級，雖然也是資產階級，却是可以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或者保持中立的。他們和帝國主義沒有聯繫，或者聯繫較少，他們是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他還特別着重的，三番四覆的聲明：『新民主主義革命所要消滅的對象，只是封建主義與壟斷資本主義，只是地主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而不是一般地消滅資本主義，不是消滅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由於中國的落後性，廣大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甚至容許他們的『發展』。這裏必須附帶把一個名詞弄清楚，據毛先生自己解釋說，所謂『小資產階級』是指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小規模的工商業資本家，和『不僱傭工人或店員的廣大的獨立的小工商業者』。一句話，毛先生所追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實現除去『壟斷資本』的禿頭的資本主義。假如把我們時代倒推一個多世紀，在一八三〇年的法國，也許這個公式具有什麼實際意義。那個時代是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时代，法國中等資產階級（亦即工業資本家）還有獨立發展的廣大可能性，正因為這樣，推翻封建的財政資本家的統治才有客觀的基礎。現在，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之末，經過了兩次大戰的破壞和長期革命的震動之後，當整個資本主義已癱爛入骨，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爛熟，又正當壟斷資本已在國際規模上掛號一切，所謂中等資產階級及小工商業者甚

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失去重量的時候，毛澤東先生却幻想中國『資本主義』和『中等資產階級』仍有發展的餘地，最壞的，他還要領導數百萬的農民武裝，甚至整個中國的民衆去為這個虛幻的前途奮鬥！

毛先生的最致命的錯誤是把中國的經濟從整個世界資本主義中割開來，把牠放在孤立的條件下來觀察，重覆十九世紀末沙俄時代的『正統派馬克思主義者』和孟什維克的全部錯誤。孟什維克正因為孤立的觀察俄國的經濟，才得出資本主義尚有發展的餘地，工人階級應聯合和幫助『自由』資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機會主義結論。毛先生現在也把這全套陳腐的理論搬到中國來，雖然他用『中等』或『民族』的形容詞來代替『自由』。事實上俄國後來的發展證明：俄國革命的性質不取決於俄國本身的客觀條件，而且還取決於當時俄國與世界資本主義的關係——她僅僅是這一資本主義世界中最脆弱的一環，這就命定她的革命不能停留在她本國條件所規定的民主任務上，還必須與沒落的世界資本主義所規定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連結起來，這是全部革命不斷性的基礎。假如在本世紀初，在同樣落後的沙俄，歷史已這樣安排，我們有什麼理由在今天，經過了三十年之後，當兩次大戰已把中國和世界資本主義連結得那樣密切的時候，還要幻想中國革命可以孤立的進行，可以孤立的在普遍衰敗的臨死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創造一片『資本主義』的綠洲出來？

毛先生的第二個大錯誤是從第一個錯誤中發展出來的：他不了解落後國經濟的特點。首先他他了解落後國資本之趨向高度集中是兩個因素促成的：原始積累的缺乏與國外資本的壓迫。因為缺乏原始積累而陷於先天不足的狀態，再加上國外資本的龐大壓力，迫使幼弱的民族資本迅速集中起來，而這集中的完成假如得不到國家權力的幫助却又是不可可能的。這差不多是一切落後與落後資本主義國家的共通現象（從日本到中國）。落後國資本的集中過程是採取綜合的形式：他一方面必須與加倍野蠻的剝削手段連結起來，另一方面又必然使『獨立的』的土地所有者與中小資產階級迅速屈服於寡頭的『壟斷資本』，再經過牠與國際的金融巨人發生連繫。毛先生只曉得中國『壟斷資本』與帝國主義，與『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發生連繫，即只曉得落後國資本集中過程與野蠻的榨取關係相連結，他却完全不了解：這一過程是勢必剝奪了中小資本家發展的任何物質前提的。政治是經濟的集中：在本世紀一切落後國中我們從沒有見過任何有力的『自由』或『中等』資產階級政黨出現，以平衡大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抗。這皆因為這一個階級久已失去獨立的經濟地位與社會重量之故。不僅在落後國中，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也找不到這一階級的『獨立性』了。

毛先生希望在中國培養中小資本家的『獨立』發展的前途，創造一種沒有『壟斷』的資本主義經濟出來，這無異叫金融資本時代回到工業資本時代，叫逝去了的昨天回來。這種反常的幻想是一切過渡時代常有的，毛先生所代表的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幻想『資本主義的牧歌時代』回來，正如產業革命

之初，一般破產的小手工業者幻想『封建主義的牧歌時代』回來一樣，他們之企圖與蒸汽機作戰，正如唐吉阿德之企圖與風車作戰。

一個真正具有科學良心的人只能從我們上述的客觀分析中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革命一開始固然要肅清本國一切落後關係，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完成中國的民主任務，但由於中國資本主義關係與帝國主義及落後關係之密切連繫，民主任務徹底完成必然不可免要觸動資產階級（連同『中等』或『民族』資產階級）的財產關係，因而這革命必然是不斷性的，即從民主運動開始一直走到社會主義革命，與世界革命合流。這一公式是落後國底盲目的綜合發展律的自覺的表現。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任務既不是大資產階級，也不是中小資產階級所能擔任的，牠天然落在無產階級的身上。十月革命早已替我們指出了這條道路。

二 東歐的道路走得通嗎？

毛先生一定爭辯說，他之『中小資產階級的讓步並不是表明中共一定要單純的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是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所謂『新民主主義』國家照毛先生的描寫如下：

由於新民主主義國家手裏有着從官僚資產階級接收過來的控制全國經濟命脈的巨大國家資本，又有從封建制度解放出來，雖則在一個較長時間內在基本上仍然是分散的、個體的，但是將來可以逐步引向合作社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在這些條件下，這種小的及中等的資本主義成份，其存在及發展並沒有什麼危險，對於土地革命後農村中必然發生的新的富農經濟，也是如此。……新中國的經濟構成是：（一）國家經濟，這是領導的成分；（二）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這兩個字的字跡模糊，大概是『集體』或『合作』之類的字眼——芬）方向發展的農業經濟。（三）獨立小工商業者的經濟及小的與中等的私人資本經濟，這些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全部國民經濟，而新民主主義國家經濟的指導方針，必須緊密的追隨着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這個總目標，一切離開這個總目標的方針，政策，辦法都是錯誤的。

這是一條典型的『東歐道路』。史大林在戰後的東歐各小國中所造成的『制度』正是毛先生所描寫的：歸根結蒂，在基本的經濟關係上說來，這種所謂『新民主主義國家』仍然是資本主義性的，所謂『領導成分』的國家經濟與蘇聯的國民財產本質上不同，因為後者是經過社會主義革命的手段剝奪而來的，而前者則仍然落在以私財產為基礎的『聯合政府』手中。土地的沒收和分配不僅本身仍然是資本主義性的任務，而且還是在妥協的精神之下進行的。在這一點上，牠與十月革命的『土地政策還有很大的差別。毛先生自己也承認，『新民主主義國家』並不限制『農村必然發生的新富農經濟』。在土地改革過程中，毛先生還特別警告：『不能重覆一九三一至三四年期間所犯的過左的錯誤，地主富農不僅可以保持一部分財產和土地，而且不得藉『過高的勞動條件，過高的所得稅，在土地改革中侵犯工商業者』。『不以

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為目標，以近視的片面的所謂勞動福利為目標，是絕對不許重複的。』略為知道中國農村經濟狀況的，總也知道，所謂農村中的工商業者多數是與土地利益結不解緣，由富農地主兼任的。那末，今天中共所採取的土地改革政策顯然不願重複一九三一至三四年階級政策，而完全採取階級調和，對富農——地主——商人讓步的政策，雖然牠尚口口聲聲表示『堅決維護貧農及僱農的利益』。

事實上，毛先生完全不了解『新民主主義國家』在東歐是怎樣形成的。牠並不是一個先天的公試，而是史大林企圖抑制東歐的社會主義革命，與資本主義『民主同盟國』妥協的後果。為了明白這一點，我們不能不簡略的敘述一下東歐各國政局在戰爭末期以來的發展過程。一九四四年以後，當紅軍進入巴爾幹半島的時候，捷克、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德國、匈牙利和奧國，喚起一連串狂風暴雨的社會革命運動，工人佔領工廠，農民分配土地，產生蘇維埃式的地方委員會。這本來也是自然的現象，因為東歐甚至整個歐洲的『農羣衆』一貫就了解紅軍的到來是社會主義解放的先聲。但蘇維埃官僚却對這種社會革命的運動害怕入骨：一方面怕喚起紅軍及蘇聯本國下層工農的反官鬥爭；一方面又害怕失去『民主』帝國主義同盟者的支持。結果，史大林趕速利用紅軍的刺刀，迫使東歐的『農與資產階級妥協，成立『聯合政府』，把許多利益送回給『私人資本』，取消地方委員會的政權機能，使之完全集中到資產階級與『共產』黨聯合的中央政府手中。現在構成東歐所謂『新民主主義』制度的兩大重要成分：土地改革與產業國有化，完全是史大林不得不承認和保存下來的工農鬥爭的成果。有些地方，如德國和匈牙利，農民早已把土地加以沒收和分配；在另一些地方，如波蘭，農民只是簡單地把自己的土地加以分配；在德國佔領區、波蘭、捷克、和南斯拉夫，企業的沒收早已由工人階級實施，其餘國家的國有化也都是在工人階級的壓力之下進行的。但工農之沒收土地與資本家的產業本身就是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與蘇維埃化的重要步驟，蘇維埃官僚却把這兩大成果加以限制、歪曲，使之遠離私有財產制度的狹小範圍，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產生的根源。這種半吊子式的改革和從此產生的政制，總之是不穩定的，具有雙重性格的。牠時而遷就資產階級打擊工農勢力，時而依賴於工農勢力打擊過份跋扈的資產階級政派。但這些國家始終能暫時容忍這種矛盾的現象以及保持對蘇的親善則完全依賴於克林姆宮的壓力和紅軍的刺刀。

中國的現狀與東歐有一點是共通的：工農迫切的改革要求與中國史大林黨之企圖事先限制這要求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但除非在蘇聯紅軍直接佔領之下，否則中國不可能像東歐一樣實現毛先生的願望。首先，中共的農民武裝鬥爭，從一九二八年直到今天差不多整整廿年，牠所能盡的作用只是腐蝕中國資產階級統治的基礎，却遠談不到推翻牠，實際上牠的目的也不在推翻牠。牠的慢性發展與行情性的勝利並不足以證明牠的決定性作用，只是反映

現政制的過份腐敗。而腐朽的滿清也會助長風起雲湧的太平天國運動，並失去了南京；但這種農民運動和牠的武裝却終於敵不過內部的散漫性與強大帝國主義的壓力而趨於崩解。現在中共所憑藉的農民武裝即使到克林姆宮的聲援，也終歸不能超出牠的社會弱點（散漫孤立和缺乏獨立性）產生什麼奇蹟。還有一點必須注意：東歐資產階級之容忍土地改革與產業國有化，純粹是在紅軍的刺刀的威脅之下的；現在中國資產階級（包括中小資產階級）絕沒有任何理由能容忍中共的『土地改革』的，即便牠在一般妥協的精神下進行。這一點毛先生的『報告』也吞吞吐吐的承認：在現政府統治的區域之下，有『為數不多的』（19）一部分上層小資產階級與中等資產階級『存在着反動的政治傾向』，『反對人民革命』。甚至在中共的刺刀直接監視的區域也有『成份不純與作風不純的問題』，『許多地主份子、富農份子及流氓份子乘機混進了我們的黨，他們在農村把持許多黨的政府的與民衆團體的組織，作威作福，欺壓人民，歪曲黨的政策，使這些組織脫離羣衆，使土地改革不能徹底』。根據過去的經驗，假如一種現象已出現於中共官僚們的文件中，則這種現象必然千百倍嚴重於他們所承認的。總而言之，毛澤東先生要想使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農村的『地主富農』自願地響應他的『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將證明全是一種無稽的幻想。

**國際
鱗爪**

法國應該建立工農政府

法國，在現時危局下，唯有第四國際法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願請羣衆一致行動，號召總罷工並建立工農政府。它的機關報真理報刊載着反資產階級的政綱，直接提出（1）不賠償的工業國有化（2）工人管理工廠（3）組織罷工委員會與自衛委員會，反抗法西斯黨人的威脅。他們的政策是告訴工人們，只能依賴於他們自己的革命意志與革命力量。

自一九三四年以後，即當法國革命的危機開始以後，勃魯姆的社會民主黨，由於兩百萬工人的擁護與推送，走上了政權。但就在此基礎上，他們破壞了工農政府的建立，並轉而挽救資產階級政權於崩潰中。史大林派的法國共產黨始終將法國工人的鬥爭附屬於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他們始而與納粹法西斯分子妥協，繼而參加民族狹隘主義的白衛運動與高樂派攜手言歡，戰事結束後，他們擁護戴高樂爲法國領袖並在其政府中佔據重要地位，因而扼殺了工人們的罷工與一切革命行動。唯有國際主義共產黨，一貫地反對納粹的合作者——賴伐爾等，並同時打擊形式的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中共的『土地改革』是符合於中國農民當前的歷史要求的，這一運動客觀上足以引起廣泛的改革要求。但有幾種原因使我們不敢有賴牠的前途：第一，中共一貫在遷就莫斯科的外交政策，形成一種反覆無常的跳躍，假如過去可以在『抗日』的藉口之下，出賣了一九二八——三七年土地鬥爭，今天這一新的『土地改革』也可以，甚至必然充作明天美蘇妥協的外交零錢的，事實上牠的目的也正是如此；第二，中共缺乏一個中心政治口號，也不企圖用革命的政綱有系統的喚起全國、尤其是城市工人階級起來，牠只單單寄托幻想於農民武裝，這就必定無力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也無力保障『土地改革』的成果。這幾種原因連同上面的分析可以大致上規定中共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遠景；或者拖延到第三次大戰，亦作未來克林姆宮的哨兵；或者在可能的美蘇暫時妥協之下，作喜劇式的收場；或者當中國第三次革命（以城市工人運動爲骨幹）在某種因素的刺激之下重新爆發之時，迫使中國資產階級容忍局部的『土地改革』，對工農讓步，把中共拉入克倫斯基式的『聯合政府』，利用牠把羣衆迫回私有財產的界限之內，不管這個界限加以『新民主主義』或什麼『主義』的標誌。不管實現那一個前途，毛澤東先生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將證明只是新的幻想與新的災難！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民族愛國主義高樂派，視之爲階級敵人。

一九四七年的四月，是法國勞工運動的轉捩點。雷諾汽車廠的工人，首先公開反對史大林派的工會領袖。托洛斯基主義者，雖然在數量上尙很微弱，但顯然已在此大罷工運動中起了部分的領導作用。不管史大林派在法國工人運動中還有如何頑強的影響，但托洛斯基主義的思想已普遍地展開了。由於托派份子對其革命政綱的堅守與忠誠，已在工人中取得廣大的崇敬。最近社會黨青年團熱中於托洛斯基主義的政綱，並因而引導到兩黨青年團的合併，便是第四國際在法國的遠景之體現。

你們的黨將如何解救現時危機

去年八月間，英國全國著名的新聞評論周刊，邀請五個政黨的發言人來解答這個問題：『假如你們的黨掌握政權時，將如何解救現時危機？』被請的五個政黨即保守黨、自由黨、共產黨、獨立工黨與革命共產黨。讀者們最感興趣的必然是比較共產黨的代表波立特與革命共產黨的代表亨特所貢獻的意見罷！

（一）共產黨（史大林派）的答覆

克服危機，必須改變政策，與調換執行政策的部長們。否則，更多的金錢與更多的生產並不足以挽救它。宣佈主要的產業實施計劃經濟：如煤，電力，鋼，運輸，農業

，建築與建築材料及織物與衣服等部門。並立刻使鋼，運輸與電力之國有化。由嚴格的政府控制及工人的合作組成聯合生產委員會，消除生產的錯誤方法與低效率。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增加女工工資。集中力量生產，復員五十萬的勞工並立刻結束對美國大企業的投降。與帝國其他國家實行獨立貿易，藉以減輕金元的需要，擺脫美國的束縛，立即與蘇聯簽訂貿易協定。我們不應爲美帝國主義，而是爲了我們自己及前途而犧牲。

（二）革命共產黨（托洛斯基派）的答覆

我們解救危機的第一步，即號召工人階級無償的接收資產階級的基本產業，交由工人與技術人員共組的委員會管理與控制。一切計劃均經工人羣衆廣泛討論後實施，決不受任何工會官僚或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所操縱。一個革命政府應拒絕償還鐵道股票所有者的一〇二四萬萬磅，煤礦主的一六四萬萬磅，戰時公債投標者的五二五萬萬磅；並沒收資本家三二二六萬萬磅的戰爭利潤，剝奪其四十億磅的國外投資。利用此巨大數目來平衡國際貿易的差額，因而使國有化的產業得到喘息機會。放棄帝國主義的政策，搶救浪費在佔領德國，希臘與巴勒斯坦上所耗費的十九億磅，無量數的物資及人力。除非徹底推翻工農政府，否則一切利益的增加只是爲資產階級服務。（沈念譯）

血濺九龍城 (香港通訊)

招志堅

爲「九龍城血案」而激動的港穗居民底情緒，在「沙面事件」發生的晚上達到了緊張的飽和點。各大報出了兩次或三次號外。居民談論到深夜。香港居民，尤其是工人們，期待着更進一步行動，或者更正確地說，期待着國內政府底倡導，以使他們的積憤能够不受處罰地於明天發洩。他們認爲，有了政府做自己後盾，行動是沒有危險的。但電訊一個比一個使人失望。廣州當局，在「沙面事件」之後，立即向英領事方面表示歉意。激昂的情緒下降了。十七日晚上，一種焦慮的心情又支配了每個人。原來在血案發生之後一天，香港警察當局會口頭通知九龍城居民，限他們在一星期內遷出，違令者將強迫押上火車驅逐出境。十八日是期滿日子。十七日晚上每個人都在問：鑒於沙面事件，港府會進一步強令迫遷嗎？九龍城居民預先分得了全部救濟品，代表警告他們澈夜準備應變。但緊張的十八日畢竟安然渡過了。現在整個問題還懸在半空。羣衆既然趨於退潮，則最後線索無疑掛在倫敦與南京的官邸之中。

九龍事件與沙面事件，也許分別予以解決吧。在前一事件中，英國必能獲得九龍城治權（雖然會在一種掩飾之下獲得），這一點面子給中國（如安置九龍城居民等）；而在後一問題中，中國政府少不免要「代表」學生向英國道歉了。假如不幸如此解決，則居民當初爲什麼要流血呢？

九龍城，這一僅有三千居民的彈丸之地，一面靠近啓德飛機場，另一面則鄰近全港最華麗的住宅區；九龍塘。圍繞着牠的是整個的九龍租借地。爲什麼僅僅在這樣的一個地方發生一個什麼主權問題來呢？

據說，九龍城過去是古蹟之地，滿清某皇帝曾經駕臨該地。爲了保持「尊嚴」，雖然把整個九龍半島都租借給英國了，但滿清政府仍要保留着這一塊小土地。一八九八年的北京條約規定：「所有現在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就在這一條文之下，九龍城居民得視爲中國公民，而非大英帝國僑民。

話雖如此，但滿清政府和以後的民國政府，從沒有一件行政措施。土地呈報權，從沒有一件行政措施。土地呈報權，民產登記，在國內都舉行了，只有九龍城一地例外。九龍城居民三番四次到寶安縣政府（按九龍半島原屬寶安）去領糧印契均被拒絕。九龍城沒被視作領土，其居民沒被看爲公民。就在這種被遺棄的狀況下，五十年來，九龍城居民遂被香港政府不斷壓迫。英帝國主義者企圖以武力迫遷他們，已經數十次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日本帝國主義進攻九龍之前十五日，香港政府還派武裝軍警驅逐城內的居民。但過去每一次都因後者之堅決反抗而不成功。

去年一年之間，香港政府曾三次發出了遷出令。前兩次都失敗了。最

後一次命令的發出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七日。這時中港協定早已締訂了，而宋子文亦曾以「微恙」及渡聖誕節爲理由在其淺水灣別墅住了幾天。以後一切「糾紛」，「事件」與「血案」，都是從這次命令及其執行之下發生的。不一定需要銳敏的新聞記者，才懂得香港政府態度之堅決是誰給與的。

對香港政府十一月二十七日發出的迫遷令，居民絕無妥協表示。他們組織了居民代表會準備反抗。十二月廿九日發出第二次遷出令。居民堅決如故。一月五日，港府的鐵拳伸出來了。動員三十六輛衝鋒車，裝載着全副武裝及防毒面具的軍警二百五十名，向縱橫不及二公里的九龍城居民進攻。手無寸鐵的貧民，以石頭磚瓦作武器，反抗魔手。他們終於被迫後退了。在英籍警官的指揮之下，二百多個工務局工人不需數小時就拆毀了大半數茅屋，同時又逮捕了兩個居民代表。當時的情境，使人想起一九四一年英國兵士對日本軍隊的進攻底懦弱無能，又使人想起一九四二年被日帝強拆房舍後九龍城的一片淒涼景象。

九龍城居民仍不讓步。在大轟炸過後，他們立即從山坡上衝下來，利用被拆除的木器在廢墟上重建他們的臨時居址以禦風雨。中華民國的國旗每天早上仍慘然地懸掛在殘屋底上空。『九龍城問題』自此爲全國上下所注目了。慰問隊，救濟品相繼而來。一月十二日晨十一時三十分，在距九龍城不遠的紅磡差館（警局），停有十輛衝鋒車，數輛附有無線電之警車，三輛十字車，（顯然準備流血的了！）另有掛着籐牌（顯然是用以抵禦磚石

的）、警棍、催淚彈及長短槍之武裝警察百餘人，候命待發。八時左右，武裝人員即在九龍城東門口出現，直向居民會臨時辦事處進發，由港九代警務處長施巴路等會同大批武裝警察，擬將殘存的木屋拆除。轟動全國的所謂「九龍城血案」揭幕了。

居民羣起反抗，仍以石頭作武器，齊向警察擲去。一時秩序大亂，警察一度以東門口之三角小木屋作掩蔽，繼則手持籐牌警棍直衝。居民並不後退，繼續抵抗，相持十數分鐘。警官某下令開槍，卜卜之聲響激了整個九龍城。受重傷的居民倒下了，受輕傷的不知名的孩子（非居民）被羣衆拖開去了，但尚存者仍繼續抵抗。以劉子良張忠武等數十人構成的第一線任前鋒，其餘婦女小孩約三百人則在後方搬運石塊。在英勇的羣衆之前，手槍失了效用。催淚彈發放了。全城被毒烟彌蓋。居民被迫後退，扶老攜幼，挾着衣服棉被，向城南道退却。他們過去受敵人日帝屠殺不够，現在命該被「盟邦」掃射以補不足。『上帝一定爲他們祝福，因爲他們噴多了一次罪，死後就可登天堂了』。當時受傷者五人，三男兩女。接着警察就進行「衛生」工作：將九龍城毀爲平地。

十二月十七日，當九龍裁判司判定九龍城居民佔用公地的罪名成立並下令迫遷的一天，兩廣外交特派員郭德華自南京返港，宣布道：九龍城只是彈丸之地，中國政府不願因此而引起中英邦交發生不愉快之事。二十七日，他答覆居民代表的請求時說：『依循外交途徑向港府交涉，你們應冷靜從事，少安毋躁。』而他的秘書

區樵則勸告居民：『先行自己拆除，免干究治。』一月五日，屋拆了，郭特派員沒有告訴人家『交涉』結果如何。相反，當各報記者去訪問他時，他的秘書說：特派員病了，不能見客。

十二月廿五日，郭德華說：『現在建築木屋地帶之業權，正由廣東省政府飭屬查核中，倘之業權根據，即無法律立場，不能遂得中國政府之合法保障。』這是我們國家的外交官關於九龍城問題的綱領！郭德華先生沒有舉出任何根據去懷疑九龍城居民的業。就算居民霸佔公地吧，也是霸佔中國的公地，應受中國司法當局（對九龍城言應是寶安縣地方法院）的處置，為什麼當他們被英國的殖民地政府處置時，反而不能『邀得中國政府之合法保障』呢？為什麼在中國領土之內，中國公民之民事糾紛，要香港政府干涉呢？但想深一層，這並不奇怪。因為如果不是在幕後承認九龍城是英國領土之一部，絕不會稱其居民做『僑民』的。無怪要『先行拆除』，『免十』殖民地政府的『究治』了。

就是這位郭特派員，在血濺九龍城之後數天，得到我們政府的『景星勳章』。『某些幽默的人問：放催淚彈的警察那時才接到青天白日獎章呢？』

問題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當京滬學生準備游行示威時，政府發言人洪蘭友說：『希望各方對此事勿過份刺激，以免影響另一問題。』什麼問題呢？大概是中港協定吧。強行拆屋那天，一個香港官方譯員對居民大呼：『我們是得到外交部的協議來拆的。』這種宣傳的是與非，當然無法證實，但也足為觀察問題的資料之一。

居留香港的『民主派』，包括共產黨員，民盟盟員以及新近在港成立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人員——他們的態度也許為國內人士所急欲知道吧？華商報，就是這些人的機關報；牠為參加民盟的共產黨知識分子所主持。如在別的問題上一樣，華商報底態度足以代表整個『民主派』。

過去，華商報於宣傳政協路線底福首的。但近一年來，牠改變了。假如國內發生一個反美的運動，即令是微少的，華商報也加以大書特書。北平沈崇案，不僅發生時著論抨擊，甚至其『一週年紀念』華商報也為之寫社評。但對這次九龍城事件，華商報每天都以輕描淡寫的態度來報導，正如牠對去年的機工大罷工底態度一樣。連那黃色小報也以特號字標題報導九龍城血案了，但華商報沒有一句話是表同情於被迫遷的居民的。無怪在事情緊張的那幾天，連平時五分一份也沒人買的國民日報（我國政府機關報）也不斷起紙，而只有華商報在這幾天大跌特跌了。說句公道話：華商報這個自號愛國的民主派報紙，是全港華文報紙中最同情於香港政府的。

華商報僅有的論九龍城事件的社評，寫道：『無論如何，原非絕對不可以避免的不合理和不幸事件，竟在九龍城發生，以至擴大，總是極可遺憾的事。』牠連國民、華僑、星島、新生諸報也不如，絕沒有論述過九龍城究竟應是誰的領土。牠只祈求英國要珍惜中英兩大盟邦底『親睦的友誼』。牠們認為居民之態度堅決，是『有別具肺腑的頑固分子從中播弄』所使然。血案發生了，民主派仍沉默不言。

沙面事件發生了，華商報以大字作標題，說『CC派』發動反英示威。對沙面『英國朋友』的『被損害』，他們認為是『獨裁政府應該負責的荒謬舉動』。『馬叙倫說：『這次九龍事件（按即被迫遷居民的反抗及因而惹起的血案——記者），是南京政權對於香港政府有政治意味的企圖，而廣州事件，又是政府裏的某派製造出來，企圖打擊他的政敵』的『喪心病狂的行動』。華商報的『廣州通訊』說：『廣州的游行示威，』所有參加的所謂學生和工人，差不多全是正統的特務分子——尤其是CC的血緣分子。』

對於香港政府，因為羣衆對華商報的言論底不滿太明顯了，才迫得於事後一個星期，補了一個社評，在大罵『獨裁政府』，『無能賣國』和製造反英運動之外，『第一次公開對居民表示同情。』而郭沫若則深惜『香港政府底操切。』

十九日美聯社來了兩個電訊，一個自南京，一個自廣州。南京的電訊說，反英和反英同是共產黨的口號。廣州的電訊說，共產黨只反英，不反英，因此不相信反英示威是共產黨所號召的。華商報根本不登載第一個電訊，却以大字標題登載第二個。這是一個對香港政府的最好暗示：你們不要聽信謠言，我們是不會反英的呀！無怪馬叙倫代表民主派對香港政府說：『我們希望你們認清你們的盟友（指中國政府）是怎樣的一個無賴，同時也希望美國的明智人士也瞭解這個盟友是慣於賣友的。』好一幕難看煞人的爭寵劇！

香港的工人組織，多份在『民主派』的控制之下。在平時，如有什麼反美運動發生，他們一定開大會和募捐的。但對九龍城事件竟噤若寒蟬。工人自動要求工會辦事人發動募捐，組織後援會，但均遭拒絕。結果，這次對九龍城居民的同情與援助，完全為政府派所獨握領導權了。備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十三、十四兩天，在香港和廣州分別發現了一種不知名的團體所發的傳單，號召民衆獨立行動起來反對英帝國主義。同時從字裏行間，他們也是反對中國政府的。

為什麼以愛國自命的民主派會取這一態度呢？理由很簡單。除了中共佔領區之外，香港是他們唯一的避難地了。他們一貫就認為：香港是民主的『廚房』，如果香港交還給中國，華南的民主運動就會消滅；如果香港政府對『民主派』加以壓迫，民主運動就會遭逢打擊。他們一方面厭棄中共佔領地享受不好，另一方面又沒有勇氣在中國內地做反政府的工作。他們一定要討好英國，以換取牠給予民主派『對英國的主權』。這就是他們從來不敢反對英國的原因。這也就是他們不援助對香港政府的原因。這也就是他們不援助對香港政府的原因。這也就是他們不援助對香港政府的原因。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寄自香港

信箱

關於中國歷史發展問題的討論

——并評郭沫若翦伯贊等的意見——

編輯先生：貴刊前兩期「信箱」中答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深引起了我的興趣。像先生這樣科學地而又具體地來解釋中國的社會性質，實在是不可多得的！因為這些問題，在中國的學術界已經搞了二十幾年，一直沒有弄個水落石出，衆說紛紛，莫衷一是，我們青年人總是感到無所適從；雖然先生二次所解答的還很簡單，但已經足夠提供我們一個基本的與正確的觀念了。因此，我亦想冒昧地來提出一個關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因為這個問題，許多的歷史學家，同樣有種種不同的見解。在這裏，我無法詳細的列舉各家的論據，因為抄出來太多了，所以只將各家學者的意見，簡單地列舉於下：

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商代是氏族社會，西周是奴隸社會，春秋戰國是封建制度的開始，秦開始是典型的封建社會。以後他在「十批判書」中又重新修改，說西周及春秋戰國都屬奴隸制度。

翦伯贊先生認為殷商是奴隸社會，西周則為初期的封建制度，秦漢為中期封建制度。

侯外廬先生以為周初即為奴隸社會，通過春秋戰國直至秦漢之際才終結。

呂振羽先生確定傳說中的堯舜為女性中心的氏族社會，至夏商為男性中心社會，殷為奴隸社會，周代乃封建社會，秦代至鴉片戰爭之前為「變種的封建社會」，鴉片戰後則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

鄧初民先生說夏商二代為奴隸制度，西周起至鴉片之戰止是封建制度。

以上這些隨便列舉出來的關於中國歷史分期的見解，不但言人人殊，而且互相矛盾，真是令人莫知適從！希望先生對這些互相矛盾的見解，像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各種見解一樣，給我一個概括的解釋吧！此上并致崇高的敬禮！

讀者白雲山謹啓一月十一日

雲山先生：當我們剛與吳世明先生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之後，你不但對於我們的討論深感興趣，對於我們的解答亦表示同意，而且還提出了「關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來和我們討論，這不禁叫我們更加興奮起來！因為你這次所提出的問題，不僅是中國社會形式發展的基本問題，對於瞭解中國歷史發展含有決定的意義，而且恰好與我們同世明先生所討論的中國社會性質問題是緊相聯繫的。

不過，我們得首先向你聲明：你所提出的問題雖然使我們興奮，雖然我們很願意和你討論，但由於這問題所涉及的範圍太過廣泛，它的內容太過複雜，尤其是所謂各歷史學家們對於這問題的見解過份分歧和矛盾，像我們這個小小的「信箱」內實在無法加以詳細的解釋和批評。因此，在這兒我們只能極其簡略地，或者是粗枝大葉地下一評斷而已。

從你列舉郭沫若、翦伯贊、侯外廬、呂振羽及鄧初民諸先生對中國歷史分期的見解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中間最分歧的是關於殷商及西周、春秋和戰國時代的社會性質問題。例如郭主張「商代為氏族社會」，而翦、呂及鄧等則認定殷商或夏商為「奴隸社會」。郭、侯主張西周到戰國為「奴隸社會」，而翦、呂及鄧等則認為是「封建社會」。至於秦以後到清末的社會性質，上列諸人都是一致認定為封建的，其中稍異之點只是加上什麼「中期」，「下期」，「變種」或「變種」而已。如果以人的見解為主體來分界，郭先生代表一個立場，侯先生則完全站在這方面；翦先生代表另一立場，呂鄧兩位又不過追隨翦的立場吧了。因此我們只須將郭翦兩位的立場加以批判之後，其餘的錯誤見解就不攻自破了。

郭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主張商代為氏族社會的主要理由，是因為他認定在卜辭中發見的「兄終弟及」，「多父多母」及重視「祭祀」等是與母系氏族社會的傳統習慣完全相符合的，因此他說：「從這些事實看來，商代不明明白白是母系中心社會，而且那時代的家庭不明明白白是彭那魯亞的家庭嗎？」其實，郭先生所發見的「這些事實」絕非「母系中心社會」的現實，不過是從「母系中心社會」裏所遺留下來的一些殘餘的習慣和傳統的稱謂而已。

因為在同一卜辭中又發見出王、臣、奴、奚、及妾、媵、妍等文字，（這些也都是郭先生所承認所解釋過的）這不但充分證明商代社會發生了階級及等級的分化，且已證明婦女中的地位是很低落的。試問在「母系中心社會」裏能發生階級及等級的分化，且容許婦女的地位如此低落嗎？而且所謂彭那魯亞的家庭制，按照恩格斯的解釋，乃是母系中心社會以前，即「對偶家庭制」以前的一種過渡形態（羣婚制的最高發展形態）。如依郭先生斷定商代遺傳奉行彭那魯亞的家庭制，則商代社會還是在母系氏族社會以前的一種社會形態呢！由此又證明郭先生的見解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是自相矛盾和異常混亂的了！

關於西周的社會性質，郭先生說：「中國社會在西周的時候與古代希臘羅馬一樣，是一個純粹的奴隸國家」（「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證據呢，郭先生將詩經上的「僕」與「隸」等字都搜集了出來，加以牽強附會，甚至將「曾孫」、「公子」都釋為奴隸主，「田峻」釋為奴隸管理人；最後凡金文中關於「錫臣」的事，也解釋為賞賜奴隸。但郭先生不曾注意到：奴隸并非奴隸社會中的特有產物，早在父系氏族社會就存在了；在封建社會裏，家奴臣僕更是普遍的現象。郭先生在詩經和金文中搜集出來一些「僕」、「隸」及「錫臣」等，不過是當時封建社會的「家奴臣僕」吧了，這與古希臘羅馬以奴隸為主要的生產勞動是風馬牛不相及的。而且西周的歷史事實更無可否認地證明：自武王伐商後，即分封所謂先王後裔及其同姓和功臣等，達數十餘國，且建立了王、公、侯、伯、子、男、的完整的封建等級制度。讓我們試問郭先生：在古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裏，曾有過西周那樣的分封諸侯和封建等級制度嗎？絕對沒有。只在歐洲中世紀才有這樣的封建制度。郭先生聽到馬克思說過人類社會發展是由亞細亞生產方式經過古代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同時又看到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度是繼承古希臘羅馬的奴隸制而發生出來的，於是他就硬要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過程中找出一個奴隸社會的時代來，（像某些人硬要從中國歷史上找出一個亞細亞生產方

式時代一樣！)但郭先生不瞭解，像古希臘羅馬那樣的奴隸社會並不是任何民族或國家都經歷過，尤其不是任何封建社會都是從奴隸制度內發展出來的。即以歐洲的國家來說，只有南歐的意大利等國是從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的廢墟上產生，而中歐和西亞的德、法、英等國卻不會經過奴隸制的階段，而是直接地從氏族社會發展出來的。而且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指出的社會發展階段，並不是絕對的。例如亞細亞生產方式，便是假定的；後來莫爾干的『古代社會』出版後，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承認莫爾干所發見的人類社會在古代理都普遍經過氏族社會這一階段，因而恩格斯在其『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源』中便已放棄『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發展階段了。郭先生硬將西周描繪成爲奴隸社會，證明他一點也不懂得馬克思，只是一個可笑的圖式主義者而已。至於他在『十批判書』中又把春秋和戰國也說成爲奴隸社會，那就更加是笑話了！

郭先生從西周的史實研究中，知道郭先生的西周奴隸社會是一個烏託邦，可算是進了一步。但他仍脫不了郭先生的圖式主義，所以又在殷商時代去發明一個奴隸社會！但其主要根據也不過是因卜辭中載有不少的『奴』、『奚』等字，再從尙書找到一些同類的字眼，加以附會和虛構吧了。其實，郭先生同郭先生一樣不懂得奴隸制度是以奴隸爲生產的一種經濟制度，這在商代和西周一樣，是沒有任何可靠證據證明它存在過的。卜辭及尙書上的『奴』、『奚』等，只能表示已發生了奴隸，可不是奴隸制度。

至於郭郭兩先生都肯定自秦到清末是封建社會，這也是錯誤的。其錯誤根源是他們都不很理解什麼是封建社會。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自然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而其上層的政治建築則爲分散的互相對立的各級諸侯的統治。可是秦以後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從經濟基礎上說來，自秦直到清末，一般還是自然自足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但在政治上却已起了大大的變化。自秦始皇併吞六國而建立統一集中的君主專制後，以前那種分散的互相對立的各級諸侯的統治便

已終止了。往後，雖然劉邦會部份地恢復了封建制度(如分封某些功臣及同姓子弟)以之與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共存，但很快就發生了矛盾，以致始則屠殺功臣(即取消一部份封建諸侯的統治)，最後且釀成七國之變。所以至武帝便終於完全恢復了秦代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後來司馬炎也曾一度分封子弟爲分治的諸侯，但結果亦釀成八王之亂。總之，自秦至清末，經濟基礎雖是自然自足的，封建式的，但在政治上却是破壞古典的封建制後而形成起來的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此種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在歐洲正是所謂前資本主義時期的一種政制(如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英國，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法國)，這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形態。因此我們可以說，秦以後二千年的社會早已非純粹的封建社會，而是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形態了。也許人們由此會發問：歐洲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的過渡時期不過兩三百年，何以中國這一過渡時期延長至二千年？我們的答覆很簡單：各民族國家的歷史發展并非按照同一線或模型，而是各自依其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曲折地往前進的。埃及和印度也曾早在幾千年前就踏進了封建社會，但直至最近才轉入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這些古老的東方國家的停滯原因雖很複雜，但并非不可理解的。

前面只就郭郭兩位先生的見解加以簡略的評判，現在爲了稍明白表示我們的見解起見，讓我們替中國社會發展的形態來畫一粗疏的輪廓吧！

如果中國社會發展以已經發見文字(甲骨文)記載的商代爲標界，則我們可將商代以前的歷史劃爲史前史。這段史前史，根據已經發見的古物來判斷，大約已有五六十年。從周口店發見的『北京人』到鄂爾多斯發見的原始人化石及石器，代表著舊石器時代。而仰韶、沙鍋屯及齊家、馬廠沿等地所發見的石器骨器陶器和銅片等，代表著新石器時代。我們古籍上所保留下來的神話和傳說中的人物，如神農黃帝及堯舜等，大概是屬於新石器時代末期的。一些著名的氏族領袖或族長之類。就他們的姓名都

帶有圖騰制的遺跡看來，大概那些時代是屬於母系氏族社會的。由『禹傳子』的故事看，也許夏族就是從母系氏族轉變爲父系氏族社會的一個革命時代。我們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據現在所知，是從商代開始。商代在經濟上不但已經有了相當發展的農業和牧業，而且有了相當高度的手工業技術(如銅器)。同時階級也分化了。如王、臣、奴、奚等的等級表現，證明商代不但絕非母系氏族社會，而且已跨過了父系氏族社會的界限，孕育了封建社會的雛形，形成了軍事部落的國家。

繼商代而起的周代，乃是從軍事部落社會直接轉變爲封建社會的典型。武王之伐商，將黃河流域的幾百個氏族或部落統一起來，并分封了幾十個諸侯，建立了『以地方爲單位代替以血族爲單位』的眞正封建制度，這在中國歷史發展上無疑是一個偉大的革命。但周代的社會也是有它自己的發展的。西周可說是封建的形成時期，春秋是封建的繁盛時期，而戰國則進入封建的衰落時期了。

秦始皇摧毀了戰國的封建諸侯的割據和互鬥局面，建立了統一的集中的君主專制，因而得以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和集中指導全國的行政機關，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歷史上又一次的革命。因爲這乃是擴大國內市場發展工商業的第一個步驟。但因秦代還遠沒有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條件，以致秦後二千年來都停滯在一個過渡的階段裏，糾纏於定期的農民暴動和外來落後民族的侵略中而無由自振。

鴉片戰爭後，由於西方資本主義的侵入，中國社會經濟逐步地被改變，舊式的手工業生產逐步地被破壞，而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逐步地建立起來，這就迫使中國社會走向了資本主義的道路。我們可以說，從辛亥革命後，尤其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中國社會已經由前資本主義時期正式踏進了資本主義時期。無庸說，我們這個資本主義不但是很落後的，而且是很畸形的。

現在因爲篇幅所限，只能說到此地爲止，你如果認爲我們所說的過於簡略或有錯誤的地方，儘可提示出來，讓我們等待下次再談吧！(編者)

原名：青年與婦女

新聲

第二卷 第十二期

從東北局勢看中國前途

最近中共已集中全力向瀋陽等重要據點進攻，企圖將東北加以『東歐化』。隨着『鐵都』鞍山和營口等要地的失守，政府當局今天已承認遭逢了失敗。事實上牠在東北的所有重要據點都正陷於完全孤立中，對於這些據點，牠（甚至連美國）當然不願放棄，而要死力苦守。照目前情形看來，如果馬上沒有美國大規模的軍事援助，這些據點是很難保持的。但無論如何，一幕最慘絕人寰的爭奪戰，很快便要在東北揭開了！

這幕最可怕的悲劇，一方面固然反映出政府機構的過份腐敗無能；（因為牠倘若能實行進步的政策，如土地改革及給予人民民主權利等，則莫斯科及中共想把東北『東歐化』也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證明：中共此次全力進攻，完全是配合蘇聯在朝鮮北部成立新政府，以及在東歐（如最近的捷克）發動政變等行動，完全是跟着莫斯科的總路線走的。牠的不斷反覆跳躍，絕非前後一貫地以大多數中國工農的利益來決定。正因此，牠廿多年來領導的結果，都只使中國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犧牲，延長了他們的痛苦，同時也延長了腐朽的官僚統治的命運。

但由於中共最近在東北軍事上獲得某種勝利，難免會引起許多人對牠的所謂「想」，這種空想甚至與東歐的實際情況也是不符的。因為我們知道東歐之實行沒收土地及企業國有，並非由無力而空幻的聯合政權，而只是由工農羣衆先行實現，再由前者加以承認，而前者也只是在當地紅軍的刺刀直接威脅之下才加以承認的。不幸中共輕視工人階級的力量，而完全寄託幻想於農民的武裝之上；即使這種武裝力量在目前奪得了某些據點，但也只是一種行情性的勝利。既然『軍事是政治的延長』，則最後決定中共能否長久保持這種勝利，尤其是能否獲得最後的決定的勝利，就主要看牠有無一個澈底的革命政綱來定了。根據廿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尤其根據牠目前的新民主主義政綱、階級成份及牠對莫斯科的附庸關係來看，我們對牠的前途只能給予否定的答案。

從另一方面看，目前戰事還沒有達到決定的程度；政府軍隊的失利，勢必加強美國對牠的援助，因為連馬歇爾也已公開承認：中國『倘無援助便可能崩潰』，而崩潰則不僅中國成了東歐化，而且也使美國『在日本的處境極為

論	從東北局勢看中國前途……	流光
論	剖看捷克政變……	唯康
論	從片山到蘆田……	衛真
論	本刊兩週年的回顧……	韻寬
論	評中共對土地政策的轉變……	鏡微
論	甘地被刺與甘地主義……	紀芬
論	自由主義者住那裏去……	劉乃光
論	人類命運將決定於法國（巴黎通訊）……	曉星
國際	錫蘭國會中革命黨的姿態 美法四斯打戰托派集會 意共怎變背叛了意大利的工人鬥爭	曉濤譯
評	『反蘇大陰謀』（書評）……	旭東
論	中國歷史發展問題的再討論（信箱）……	白雲山

——再評葛伯賢等先生的意見

『新民主主義革命』重新寄與幻想。這其實是完全無稽的。因為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所主張的三個口號：沒收壟斷資本，沒收土地，以及實行東歐式的新民主聯合政府，都絕不能單獨由目前那種散漫的農民武裝來實現的。無論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或保證土地改革的實施，都只能依靠一個集中力量的工農政府來實行。中共幻想讓農民『的散漫武裝及『民族資產階級』的合作，來沒收資產階級的財產，這完全是一種空三

37年 3月5日

本刊兩週年的回顧

韻 覽

當兩年前的今日，在一個民主運動的潮流中，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新聲（原名青年與婦女）——以一種別開生面的姿態而誕生了！當它出世的時候，正是人們興高采烈地對世界的和平與繁榮，抱着美麗的幻想的當兒。人們將全部的希望，寄托於聯合國的機構之上，以為這樣的機構，是新時代國際和平的保險庫，而不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就這樣，人們以為一個『和平繁榮』的時代，一個『人民世紀』真的要到來了！以為『新民主主義』之花便要開放了！對於國內這一方面，人們則以全部的幻想，寄托於國共『和談』，希望由此促成『政協路線』和『聯合政府』之實現。所有號稱前進的刊物，都一致樂觀的論調來宣揚和讚美這一『光明』的前途。惟有我們這個刊物，它獨自以客觀的態度，獨特的眼光，一方面分析和批評對國際局勢的樂觀估計的虛幻性；同時則指出其正在潛滋暗長的新的危機——第三次大戰的威脅。在對國內方面，它不但堅決地說明『政協路線』和『聯合政府』沒有實現之可能，並指出其『最後決裂』之不可避免的途徑。但正因為如此，所以它也就不合乎一般行情的政治家們、官利主義者及一般幻想家們的胃口，他們不是說我們澆冷水，便是批評我們的論調太高。然而，事實畢竟太雄辯了，它對國際局勢的分析和估計，對國內局勢的剖解和透視，尤其對國共關係的觀察和論斷，都作了實言，都將得赴歷史的證驗。

首先，我們來檢閱它對戰後整個國際的分析和估計吧：在創刊號『戰後國際局勢鳥瞰』一文裏說：『戰後世界擺在全人類面前的，除了一般的糾紛、混亂、矛盾、痛苦、飢餓、死亡……這一切數不盡的困難和災難之外，就是種種勢力間的對立——蘇聯與美英的對立。新的戰爭和災禍，正在這一對立中潛伏着，生長着。這是人類最大的威脅，因為第三次大戰必然以原子彈作為主要武器的，毀滅人類的戰爭。可是，在另一方面，各國的民衆，尤其是英、法、美的工人，荷印、越南、印度、埃及的被壓迫民衆已經拾起頭來，已經為改善他們的地位，解除自己的鎖鍊而開始鬥爭了。』這短短的一段，對戰後世界局勢的演變及其趨勢，已經指出了一個清楚的輪廓，從那時起直到現在整整的兩週年，國際局勢的演變過程及其發展趨向，不是圍繞着這個輪廓在進行嗎？

當聯合國成立後，全世界的和平主義者，尤其是克林姆宮的僕從們，都一致強調着，這是真正的國際和平機構時，我們便首先堅決的反覆指出：第二次大戰後的聯合國，即第一次大戰後的國際聯盟之更壞的翻版，而且必然成為美帝國主義反蘇的工具。尤其後來在二卷七期『聯合國大會暴露出來的危機』一文裏，更有詳細而有系統的分析論斷。當人們認為美蘇可以和平合作，兩種制度可以共存共榮時，我們則時明白地指出：『美國正是代表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帝國主義的財產私有制度；蘇聯雖為史大林的官僚層所損害，但從其經濟制度上說，却仍是代表人類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共有財產的經濟制度。』後者與前者在本質上是絕對不可調和的，不是後者向全世界發展直取前者的地位而代之，便是前者終究毀滅後者。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律。然而史大林却將這兩種絕對不可調和的制度，強調可以和平合作，共存共榮，這充分暴露他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法則。』（見讀史大林與史達林的談話以後）。

尤其當人們宣傳戰後美蘇間的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否認第三次大戰的可能性時，我們更明白地指出：『戰後的美國，藉着她的金元和原子彈的威力，顯然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了，她的生產力較戰前增加了一倍以上，所以對於世界市場的追求也就愈益迫切，除了已經控制或正準備控制的市場之外，對

嚴重』，同時『在朝鮮的地位也將難以保持』，『可以危害美國的國家安全。』（美國新聞處華盛頓二月廿日電馬歇爾的談話）但美國援助的加強，就勢必使戰事拖延，甚至使戰事更加激烈化了。

戰事既然延長和激烈下去，交戰雙方又不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不能替中國人民打開一條出路，結果，人民的痛苦在今天已感到無法忍受（尤其是最近因東北戰事直接刺激起的物價瘋狂上漲，使已使『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則明天的痛苦就勢將更可怕，更難忍受，而且更無窮盡，那實在太令人不敢想像了。但悲觀與幻想都不能解決問題，消除痛苦！唯一的辦法，只有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動團結起來，干涉這個戰爭，要求召集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來解決國家的一切迫切和重大的問題（如土地問題，民族獨立及一般生活問題等），只有這樣才能得到真正的和平，使國內戰爭的威脅終結。（流光）

剖看捷克政變

捷克共產黨最近曾發動了一次政變，將捷克整個兒置於牠所控制的警察管理之下。於是這個東歐各國中唯一未入蘇聯完全控制的國度，這道素被看作東西歐間的橋梁，從此便完全東歐化，——在某種意義上恰切點說，受克林姆宮官僚化了！

這次政變最初起於國家社會黨、斯洛伐克民主黨和天主教人民黨閣員的辭職。辭職原因是由於共產黨違反大多數閣員的決定，控制了警察大權。而共產黨則乘機向貝奈斯總統提出哀的美頓書，強迫他接受三黨閣員的辭職，組織共產黨所完全控制的內閣。『如不接受則發動總罷工來擾亂全國的經濟』。這顯然是捷克在莫斯科總路線指揮下『向左轉』的有計劃行動，藉以奪取捷克的全部政權，使之純粹適合於克林姆宮的外交目的，來對抗那正在加強團結的西歐聯盟。

很快的，社會黨的貝奈斯便在這種巨大壓力下屈服，共產黨奪取政權的企圖算是成功了。這無疑將加強蘇聯在歐洲的勢力，有利於歐洲各國共產黨對抗西歐聯盟和馬歇爾計劃等活動，而對於美英自然是一個打擊。因此，美英法三強立即以罕見的方式，聯合發表了一道抗議書，嚴詞譴責捷克政變是建立一個『掩飾的獨裁制』，是危害了『自

於佔地球六分之一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的蘇聯，自然不能忘懷。爲了擴展她的勢力範圍，爲了穩定資本主義制度，她必須聯絡和幫助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來對付蘇聯。從援助希土反共法案到援歐經濟計劃，便是以金元的力量控制歐洲各國，築成她的歐洲反蘇堡壘，以威脅東歐，包圍蘇聯。不管史大林如何放棄世界革命；如何強調兩種不同的制度可以共存共榮；如何強調英美的美的矛盾，但美帝國主義者對於這一不同的制度是不能容忍的，她正在積極準備第三次大戰來毀滅它。這種趨勢，如果沒有世界革命來挽救，將會隨着時間的進程而逐漸發展下去，一直走到爆發點。『(見二卷八期第三次大戰與中國的前途)』關於這一問題，在七期『戰後世界矛盾及人類前途』一文中，也有詳細的分析和論斷，這裏不必多說。

我們對戰後國際局勢的分析和估計，除了上述一般的原則之外，對每一個發生的重要問題，都有詳明的分析和論斷，而這些分析和論斷，在事後看來，不但都符合客觀事實發展的邏輯，而且都成爲預言。例如『國際局勢之論在法國』一文中說：『法國走到一個交叉口了！一方面，工人階級已逐漸對這些改良主義政黨發生不滿，以致常以罷工來相威脅；另一方面，資產階級覺得這些當權的改良主義黨派既不能輕易馴服工人羣衆，又不能儘速恢復法國殖民地的「光榮」。因此，向兩極的運動便逐漸地在法國開展起來了：一方面，國際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代表着革命的要求，高聲喊出：停止同資產階級政客的勾搭，建立工農政府，無報償地沒收一切生產機關歸國有，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另一方面，戴高樂的集團代表着反革命的傾向，現在獲得杜魯曼的特殊鼓勵，更大叫其「停止法國的混亂局面」，反對憲法，反對多黨政治(即聯合政府)，希圖建立集中的聯邦制，以便恢復法帝國主義的「傳統和光榮」。這種向兩極的運動，今後將跟時間進展而愈演愈烈，不但法國未來的政局將全視這兩極運動中的那一種勢力獲得決定的勝利來決定，就是整個的國際局勢也將由此決定其歸趨。』最近戴高樂在市區選舉中的選票之急增，以及從社會黨分裂出來的革命社會主義行動派和青年團之與國際主義共產黨的合併，(見本期巴黎通信)便是向兩極發展的具體表現。我們由此更加確信，法國今後只有更加明顯的朝着這兩個方向發展，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走向和平幸福的坦途，便是戴高樂的法西斯勝利，走向第三次大戰；這對於整個國際局勢的發展和人類的前途，將具有決定的影響。

其次，對於國內方面，當本刊誕生時，正值民主運動方興未艾，我們對此却鄭重警告，『民主決不能靠恩賜，也不能幻想各黨各派上層的拉攏，只有靠人民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去奮鬥才能達到』(見創刊號婦女與民主)。同時，我們更具體地提出了一個基本的民主任務的政綱在創刊號『青年在民主解放路動中的作用與任務』一文中說：『民主任務的中心問題，就是對外徹底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讓國家獲得完全的獨立自主，以便自由發展自己的經濟，改革自己的政治，提高自己的文化；對內真正使「耕者有其田」，並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及高利貸，以便提高他們的生產力和購買力，擴大國內市場，發展城市工業，改善一般國民生活。此外，就是普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使一般勞動者從苦役的重壓下解放出來；實行國內弱小民族自主，讓落後的民族獲得自由發展的機會。』但要完成上述的民主任務，必須首先改革現存的一黨專政的官僚機構。所以一個『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的總的政治口號便在本文中提了出來，隨後更有詳明的闡述。正因為民衆還沒有能積極起來爭取民主，沒有按照我們所提出來的路線進行，所以民主只是曇花一現，澎湃一時，終於逐漸縮小其尺度，最後且有全部收回的趨勢。難道現在的情形，還不够證明我們的警告之正確嗎？

此外，當人們對和談及對馬歇爾抱着無限的希望時，我們說：『和談決不能解決問題。從戰後一年餘國共關係看來，自始至終即陷於「談談打打，打打談談」，或邊打邊談的狀態之中。經過前年九、十兩月的蔣毛「會談」，經過政治協商會議的協商；經過所謂第三方面的奔走斡旋；尤其經過「和平使者

由原則本身的存在」。皮杜爾更把這政變比作「慕尼黑危機後的顯而易見的危險信號」。這就明顯指示出：捷克政變已不可避免地大大加深了美蘇間的對立，使雙方方向美蘇戰爭爆發的危機點再接近了一大步！

我們應當記得：東歐(包含捷克)的人民，在納粹政權垮台後，曾經自動地起來奪取土地，佔領工廠，組織工廠委員會來管理生產，並把自己武裝起來。他們本來早已用行動表示要走上社會主義了。但當時史大林黨爲了克林姆宮本身的官僚利益，尤其爲了幻想與美帝國主義妥協，於是把自動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傾向加以遏抑，把當時已形成的兩重政權加以取消，把工農所爭取到的權利加以剝奪，企圖藉此去遷就資產階級的利益，和他一起建立聯合政府，再經過這政府去和美英做外交的買賣。但當他做完這種醜惡的背叛工作之後，他今天已逐漸發覺美國態度的堅決了，尤其是東歐資產階級之日益傾向美國，更使史大林黨覺得難堪。今天捷克政變本身暴露出東歐的政體就是極不穩定的，充滿矛盾的。這種尖銳的矛盾迫得史大林黨要痛苦地宣佈五黨聯合政府的破產，要借用總罷工等羣衆力量去彌補那些傾向美國的份子。這就充分證明史大林黨政策的動搖不定了。

但這政變的後果並不能徹底加強史大林黨的地位以對抗美國，這種加強仍是很有限的。因爲東歐的根本問題並未徹底解決，共產黨所實行的新民主主義，仍然讓私有財產制度存在着，而且還要極力壓抑工農的「過火」。舊的階級矛盾毫未消除，新的矛盾反而加上了。將來美國一旦向蘇聯進攻，東歐的不穩定政制首先就無法經得起試驗，今天仍然存在的資產階級巨大勢力將重新抬頭，而今天在執行新民主主義政制的小資產階級份子，在將來嚴重關頭也是不會替蘇聯服務的。因此想用這種半吊子的改良政制去對抗美國，防止其進攻，最後說來是沒有實際效果的。要有效地防止美國進攻就只有徹底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革，但這一着不但違反東歐資產階級的願望，而且還違反史大林官僚的願望，只有東歐的工農力量才能把牠實現。(唯康)

從片山到蘆田

本月十一日，日本的片山內閣，因閣中三黨「不能對政府政策意見一致」，提出了總辭職，十天後，經過衆議院全體會議的選舉，民生黨總裁蘆田均以二百十六票的票數，當選爲日本戰後第五任首相。

我們當還記得，去年五月，日本民衆把社會黨領袖片山哲推上了台代替了吉田，原是希望能因此獲救，脫離一

「馬歇爾的從中調解，但其結果，不僅兩黨從沒有停止過軍事衝突，而且每經過一次和談，戰爭即擴大一次，和談往往成爲新的進攻之煙幕，而最終的結果還是走向公開的決裂。過去的和談如此，今後的和談，當然亦不會產生什麼奇蹟。」（見一卷十一、二期合刊「從國共決裂到改組政府」）。

尤其當共黨對「政協」抱着美麗的幻想希望由此促成聯合政府之實現時，我們即明白的指出：「這個黨，自從背棄了原來所那膺的社會主義而信奉三民主義以來，在政治上即失去其靈魂，而成了統治階級的俘虜。於是，只有將一切的希望寄托於「孤注一擲」的軍事冒險之上，專憑武裝力量作資本，來和當權黨進行談判；並盡其遷就妥協之能事，高唱階級合作，新民主主義，希圖與當權黨實現一個政協路線的「聯合政府」平分政權。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已被一年來的事實擊得粉碎了。現在還有人一相情願的希望「政協」能够復活，這在明眼人看來，無異是希望一個奇蹟。」（見二卷一期「延安失陷後的國共前途」）。

我們對於這種陷人民於災難、痛苦深淵的戰爭，自始至終，總認爲不管在軍事上任何一方有某種勝利，終於不能解決問題，而且只有愈來愈熾烈，愈來愈全面化，勢必漫無止境的拖下去，過去是拖，現在是拖，而且還要繼續拖下去，把人民拖到飢餓與死亡，把整個國家的經濟拖向總崩潰的道路。這一論斷，從每一個關涉國內時事的短評和論文中都可以看得出來。經過兩年來，尤其是最近事實的證驗大已足夠證明我們這一貫的態度之正確了。

總之，我們兩年以來，在政治上無論是對國際和國內問題的分析 and 預測，都完全成了預言，事變的發展，竟完全按照我們所描繪出來的輪廓邏輯地在進行。這中間並沒有什麼秘密，只是因爲我們敢於面對着客觀的事實，敢於說真話的原故。雖然我們所說的，對於人們有點不舒服，對於那些幻想家們有點煞風景，但却成爲戳不破的真理。因爲任何機會主義的幻想，都必然在歷史發展的規律下被粉碎的，只有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和預測，才能經得起歷史和事變的考驗。

我們除了對國內外政局的分析和估計外，在理論方面，如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宗教、文藝的基本理論以及近代的學術思想，中國社會的性質，中國歷史發展，新民主主義等重要理論問題，都在『座談』信箱』或一些論文中，不但加以科學的分析與闡述；而且對各種不正確的或含有欺騙作用的思想理論都有客觀而正確的批評。此外關於青年的一些切身問題，如青年與政治、職業、戀愛、以及怎樣學習和正確的道德觀諸問題，亦曾在『座談』或論文中，加了頗爲詳盡而有系統的敘述與闡明。最後，我們這個小小的刊物，在最艱難與困苦的情形下，終於渡過整整的兩週年了！在這兩年的過程中，假若沒有同情者的援助與支持，沒有廣大青年讀者的推銷和捐助、鼓勵與督策，即使我們有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和勇氣，對於那麼多的困難，也仍然是很難克服的。因此，我們在回顧本刊兩週年時，最後還得向愛護本刊的同情者與援助者致最誠懇的謝意；同時，我們對自己也更加強了克服一切困難的決心，希望便我們這新起的聲音，繼續成爲中國前進青年心聲的共鳴！

評中共對土地政策的轉變

鏡微

最近（去年雙十節）中共中央正式公佈了一個『中國土地法大綱』，這表示該黨對於土地政策又來了一個『新的轉變』，這就是說，中共自一九三七年公開宣佈放棄土地革命而採取『二五減租』的妥協政策之後，經過了整整的十年，現在又似乎轉變到『江西時代』的老路線上去了。由於這一轉變，不但

切飢荒與貧困。戰後的日本民衆對改革的新要求太急迫了，他們誤信了這位「社會主義者」，而日本的太上皇麥克阿瑟呢，也樂於利用社會黨的粉飾來執行他那適合於階級利益的一貫的計劃。所以當社會黨以「社會主義」的花言巧語騙取民衆擁護登台之後，立即便完全成爲美國佔領軍及本國財閥的服務者，而把民衆的利益拋棄得一乾二淨了。過去八個月的政績已經充分證明：片山內閣不過是替資本主義利潤制盡了一種保護的作用，對軍閥的鬥爭盡了一種粉飾作用罷了。此外牠沒有做過什麼，也不能做些什麼。

社會黨當初既與資產階級政黨攜手組閣，依從盟國的氣息，早就斷定牠不是出來保護民衆的利益，牠既不是保護民衆的利益，又必定不能解決日本當前經濟的與政治的嚴重問題，因此，當牠盡了上述的反動作用後，只有重新讓位於財閥更忠實的代表人了。

吉田所領導的自由黨已經臭名洋溢，「民主」的場面在日本目前還要表演的，吉田照憲法常規雖有資格再度出山，但牠太醜陋了，還不適宜單獨表演此一角色，於是民主黨總裁片山均在參帥的示意下繼任了首相。片山的組閣是得到社會黨的支持的，當初片山的上台也是得到自由黨和進步黨的支持，這些「社會主義者」們和資本家的大臣們是如此通同一氣，我們由此應該看清了：他們中任何一種角色登台，都爲的是對付民衆。

組織中的新閣說仍以四黨聯合爲其基本方針，因此，將必是繼續執行麥克阿瑟所規定的「中間路線」了，也因此，我們可以斷言：不管片山內閣將收容些什麼關係，不管各黨派佔閣僚人數的比例如何，也不過是片山內閣的延續，同樣以美國輸入的「民主」爲標榜，從事箝制民衆，保護財閥利潤，維持美帝國主義的統治。所不同的，或許是外表上再來粉飾一下，容納幾個社會黨左派，而實際上則更放胆地爲財閥與美帝張目。

日本的民衆既不能從片山獲得什麼，自然不會希望從片山獲得些什麼，他們顯然更陷於無出路狀態，這並非因爲他們缺乏鬥志與力量，而是因爲他們沒有一個革命的領導，把他們領出深淵。這個領導的政綱必須與任何資產階級政黨及改良政黨的政綱絕緣，堅決要求撤退佔領軍，徹底改革人民的生活，主張成立沒有資本家大臣參加的工農政府，把所有產業無賠償地收歸國有，只有這樣才能替日本人民打開一條出路。否則，任何聯合內閣的更迭，都不是在於挽救危機，挽救人民，而是使他們的困苦生活條件日益困苦！（衛真）

共黨的下層份子或外圍份子大為興奮和幻想起來，而且一些所謂中間派的『政論家』們也予以極樂觀的評價，例如自稱代表中間派的施復亮先生，在他『評中共的土地法大綱』(載『時代評論』第五卷第九十八期)一文中便這樣地誇稱說：『根據這一文件而施行的土地改革，其力量將勝過『百萬雄師』，將有可能使中共在內戰中處於不敗的地位，甚至還有可能在積極短期內使中國的內戰形式發生根本的變化，因而使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根本的變化。』人們對中共這次土地政策的『轉變』，既然抱着如此的興奮、幻想和樂觀，因此我們覺得對它有從它的歷史變化上來加以檢討之必要。

本來，一個澈底的土地改革，像對外民族完全獨立一樣，乃是中國民族脫離陳腐的鎖鍊，走上現代化，走上真正復興的道路，走上一個全新的光明時代的先決條件之一。因為就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上說來，像現行腐敗透骨和殘酷無比的土地關係(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農民不是完全沒有土地，就是深感土地的不够；地租常在收成百分之五十以上；高利貸常從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百；在某些地區甚至還殘留着農奴式的勒索；至於苛捐雜稅更是聞所未聞；……)如不立刻加以改革，農業生產力不但絕對無法改進，而且只有加速倒退，因而農村經濟將激劇地奔上總崩潰之途，這反過來又勢必加劇城市工商業的破產！同時，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廣大農民羣衆，在此種土地制度的重重壓迫和慘酷剝削之下，在農村經濟急趨於總崩潰的打擊之下，不但原來牛馬式的生活再無法支持，就是連殘餘的生命也將日益瀕於死亡的掙扎之中了，這對於整個社會的存在無疑是一個致命的威脅！像這種異常悲慘和萬分危急的情形，除了少數冥頑不靈和極端反動的份子以外，凡是稍微具有現代經濟知識和政治常識的人們，都能理解，都會覺得有急加改革之必要。(甚至站在美帝國主義觀點上的馬歇爾將軍，也已感到中國農民問題的嚴重，認為必須加以改變，——見美國新聞處二月廿日電)實際上，中國的土地問題，和民族獨立問題一樣，已是一個過份延遲未決的民主任務的歷史問題，中國近半世紀以來一直陷於衰敗、混亂、痙攣和內戰的泥潭之中而無由自拔，其根因即在於此。因此，我們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土地問題乃是中國的生死問題之一。

但中國共產黨對於這一有關民族生死存亡的問題，究竟採取過什麼態度？最重要的是，它究竟用過何種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呢？

在第二次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中，中共雖曾提出了土地問題，但它始終沒有製出一個土地改革的革命綱領，而且爲了贏得資產階級的合作，甚至將自己變成了土地革命的制動機。其結果是：讓自己及整個革命遭到了極可恥和極悲慘的失敗，因而使中國民族也就從此愈益陷於帝國主義，特別是日帝國主義的猛烈侵略之中。

中共自第二次革命遭到慘敗後，完全從城市退到了農村，從極右的機會主義跳到了極左的盲動主義，這時才將土地改革搬上了議事日程，製定了『

土地法大綱』，實行了土地改革，并在山地上建立了『蘇維埃』和『紅軍』，希圖以此挽回它在第二次革命中所遭到的慘敗。但事實上，這只是以盲動主義來加深了以前機會主義慘敗的後果，并附帶地將自己(不僅在政綱上，且在構成份子上)完全墮落成爲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了。以致結果不但被驅逐於『實行土地改革』的江西根據地，且『自動地』向統治階級投遞降書，『自動地』放棄了土地革命，換句話說，即『自動地』以放棄土地革命(連同取消『蘇維埃』和改變『紅軍』番號在內)爲條件來換取了統治階級的『納降』。所謂『江西時代』的土地改革，也就這樣更可恥地和更悲慘地被結束了！

從此，中共的『土地法大綱』被放進了小手提箱，代之而起的是『二五減租』或『減租減息』及其與地主富農合作的改良主義的綱領。在整個的抗戰期中，將近十年來，中共的土地政策便是在這個改良主義的泥潭裏打滾。但它這次在土地問題上倒退的主要目的，也是希圖在抗戰中贏得資產階級的『合作』，希圖以此建立『聯合政府』，爬進政府的官僚機構中去進行『改良』。但結果是：在日寇投降的翌日，中共便被統治者看成一個人絕對不能容忍的障礙物了！於是『內戰』代替了『合作』，經過一個時期的『和談』插話之後，即經過一個準備階段之後，全面的決裂，也就是全面的戰爭，便公開暴露出來了！就這樣，中共又在一個新的歷史和地理條件底下，回到了所謂『江西時代』，因而『中國土地法大綱』又從小手提箱內被搬了出來！

我們從中共近二十餘年來對於土地政策的這種反覆無常的變化及其屢次的慘敗，已可得出幾個最重要的結論：(一)中共的土地政策，不是基於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而是從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立場出發，因而不但是不澈底的，而且常是動搖的，忽右忽左的。(二)正由於它的機會主義的立場，所以它的土地政策并不在於澈底解放農民，而只是藉以作爲與大資產階級謀取『合作』時討價還價的籌碼。因而當大資產階級需要它服務而表示一點好意時，它就出而抑制農民的土地要求(一九二五——二七年)或乾脆放棄了土地革命(一九三七——四六年)；當前者一脚踢開它之後，它便將土地革命搬出來當作一種威脅的姿勢了(如『江西時代』及現在)。(三)根據『江西時代』後的歷史經驗，中共的土地改革既已當爲換取統治階級的『合作』而成了『零找』，則它這次的『土地法大綱』也就很有可能變成未來謀取『合作』的犧牲。

如果我們將中共這次所公佈的『土地法大綱』稍微來分析一下，不但可以看出它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還充分暴露了它希圖與資產階級合作的機會主義傾向。例如它一方宣佈『廢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權』(該大綱第一條)，但同時又『承認自由經營買賣及在特定條件下出租的權利』，這就等於說，一方廢除舊地主的土地所有權，一方又承認新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因爲在『自由經營買賣』的條件之下，新地主不可避免地要生長起來的。前面的『廢除』與後面的『承認』，不但是一種矛盾，而顯然是向新興的地主，即『自由經

「營買賣」的資產階級表示讓步，謀取它們的「合作」。而且在十二條中更特別申明：「保護工商業者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不受侵犯」。這就暴露骨地表現是在向資產階級吊膀子了！中共在這裏，不但完全背棄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且完全忘記了俄國十月革命關於土地改革的教訓。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來，沒收舊地主的土地同時又「承認新地主的所有權」，并「保護工商業者的財產及其合法的營業」，這乃資本主義初期時代先進國家（如十八世紀末的法國）的故事，但這一故事早已被放進歷史博物館裏面去了。到了二十世紀，落後國家延遲的土地改革，如不將它同社會主義的建設前途（即土地國有化與工商業財產的國有化）密切地聯繫起來，則這一改革是不可想像的，俄國十月革命便是鐵一般的事實的證明。

而且，對於解決土地問題具有決定意義的，還不在於土地綱領之提出，而是在憑藉什麼階級力量及用什麼政權去實行此種綱領。俄國的社會革命黨（代表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也曾提出了一個適合於農民利益的土地綱領，但這個黨却幻想同資產階級合作或希望取得資產階級同意去實行它。其結果，這個黨不但沒有能實行它自己所提出的土地綱領，却反而加強了資產階級對於這個綱領的怠工。所以最後實行這個綱領的并不是社會革命黨自己，而是列寧和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而列托之所以能成功地實行了俄國的土地改革，其所採取的路線恰與社會革命黨相反，那就是：他們認定俄國資產階級由於與地主所結的不解緣，絕對無法去完成土地改革；要想真正完成此種土地改革，只有無產階級堅決地起來領導農民，并建立自己的政權，才有可能。但無產階級一經領導農民取得政權後，那就絕不能以解決土地問題為限，而要直接踏上社會主義建設的途程了。十月革命正是依照這一邏輯完成了它的歷史任務的。落後的東方國家，尤其是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國家，要想完成其土地改革，除了循着俄國的道路走，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中共這次公佈的「土地法大綱」，雖然多少代表了農民羣衆的要求，具有相當進步的意義，但它藉以達到實行此種大綱的總路線，即希圖與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政府」，發展民族資本主義的路線，却完全與十月革命的歷史教訓背道而馳，這在本質上仍然是俄國社會革命黨式、的即烏托邦式的。因此我們可以預先斷定：中共這次土地政策的轉變，不但絕不能幫助它開闢一個新的勝利的前途，就是要想藉此以打開它目前所陷入的僵局也

甘地被刺與甘地主義

甘地已死於一個年青的印度刺客之手，這個刺客據說是印度教的極端派，亦即不願與回教徒妥協的狹隘民族主義者。這件事之富於戲劇氣氛就在於牠剛好發生在甘地的絕食——最末一次絕食之後，而這次絕食的目的是企求

很少希望。因為這僵局是由它在歷史上所施行的一連串的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所造成的；更壞的是，這個黨很久以來就完全成了克里姆宮官僚獨裁者的外交工具，它自身沒有任何獨立性，它以往及現在的一切政策的「轉變」（連一切土地政策的轉變在內）全是在克里姆宮的指使之下進行的。而克里姆宮官僚獨裁者現時所處的地位，正是陷在一個極端狼狽與進退維谷的僵局裏。因為它一方既對第三次大戰極端恐懼，但同時又十分害怕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因而希圖以非驢非馬的「新民主主義」代替社會主義來阻止第三次大戰的到來。但事實上，「新民主主義」的本身，像以前的「人民陣線」主義一樣，不但是一種幻想，而且是克里姆宮陷於僵局之意識上的反映。所以最後分析起來，中共目前所陷入的僵局是由克里姆宮的僵局所派生出來的。中共既絕對無法脫離克里姆宮官僚獨裁者的羈絆，來根本改變它的政治路線，因而它也就沒有可能從目前的僵局中解脫出來而走向一個新的勝利的前途了。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中共這次所頒佈的「土地法大綱」及其所實行的土地分配，多少能够鞏固它在「解放區」的統治地位，加強它的軍事力量，并吸引現政府統治下已陷於土地飢餓的一些農民的嚮往；——但這一切總和起來，還遠不足以解除它現時所處的僵局地位。而且人們絕不要忘記，中共在「江西時代」也會頒佈過「土地法大綱」，實行過土地分配，但其結果仍然不免於慘敗與投降。由此就足以充分證明：單是有一個「土地法大綱」及在某些地區實行土地分配，其本身是沒有任何保證的。因為依照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要想保證在全國範圍內實行土地改革，便只有在城市無產階級領導農民取得政權的局勢之下才可能像。但中共恰好是背棄了十月革命的教訓。所以中共這次所公佈的「土地法大綱」及其在某些地區所實行的土地分配，除了重演類似「江西時代」的悲劇外，實在很難看出它有什麼光明的前途。而施復亮先生對中共這次的「土地法大綱」的公佈及其實施的意義極力加以誇張，也只是證明他不但不懂得俄國十月革命的教訓，就是連中共在「江西時代」的悲慘教訓，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

最後，中國的土地問題，無論站在農民本身的迫切要求上，站在全民族的生存和發展上，都必須急速地加以解決。但要達到這一解決，依照中共所走的路線是絕對不可能的，只有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才是「達到這一解決」之唯一可靠的南針！

紀芬

印回的「和平」的。這給了世人一個「完美」的印象：「甘地是犧牲的別名」，他與「和平的非暴力主義」相終始。於是從殺人的劊子手到一些改良主義的騙子都異口同聲的向他「致敬」和「追悼」了。連費邊派社會主義者蕭

伯納也十分感慨的嘆了一聲：『好人難做』。但十分奇怪，這件事從全世界的被壓迫人民方面所得到的只是一種冷淡的反應，這就無形中證明所謂『好人』並不是超階級的『道德完人』，甘地在全世界戰火瀰漫中受一切統治者與過時的改良主義者的愛好並不是偶然的，是含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首先我們必須瞭解甘地一生的思想行動，所謂甘地主義到底是什麼東西。據甘地自己在自傳中所描寫的，他的信仰總括起來可以說是：東方，特別是印度教所特有的苦行主義、度世主義與托爾斯泰式的不抵抗主義的混合物，他反抗西方文明的武器就是東方那種停滯和固結了的保守精神，所以他主張用手搖機來抵制開關的紡織機，用原始的手工業來對抗近代化的機器生產，他認為東方精神的優越就是可以用忍耐、和平和非暴力的自辱來感化壓迫者。一句話，他的哲學就是一部弱者的犧牲哲學，牠的階級根源與托爾斯泰主義同樣是：農民。在一切初期的農民運動中，當農民第一次從長期的愚昧和屈辱的狀態下走上鬥爭的時候，他們總是被沉重的保守主義所牽累，總是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可以搖撼龐大的壓迫機關，總是希望尋求和平的，較少犧牲的捷徑來博得統治者的垂憐。他們過去對專制皇帝，現在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也經過這同一的過程。事實上農民只不過是最典型的具有這種哲學的傾向吧了。其他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初期鬥爭也或多或少的通過這同一軟弱的過程。尤其是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牠對帝國主義與牠的祖先（中古的商人與行會）對專制皇朝一樣更愛好『和平』與『非暴力主義』，但資產階級之樂於接受農民的不抵抗哲學却有不同的原因：牠不僅在帝國主義面前，而且在工農面前也過於軟弱了，爲了保護自己的財產，她寧可自始至終採取『非暴力主義』來乞憐於帝國主義，也不願冒暴力革命、與帝國主義同歸於盡的危險。正因為這樣，甘地主義通過資產階級的市儈主義反映出來，更是一種透明的弱者的犧牲哲學，在強者方面是並不受這一哲學絲毫『感化』或『束縛』的。這一點可以從英帝國主義者（他們也是『登山寶訓』的信徒呀！）對徒手的印度工農的民族鬥爭，以及甘地所代表的印度資產階級對工人罷工和農民鬥爭的暴力鎮壓看出來。那末，甘地式的和平主義與其他一切種類的和平主義具有同樣的作用：把羣衆鬥爭納入『非暴力主義』的軌範中，爲的是利用牠來達到資產階級的反動目的，一旦當工農羣衆充分覺醒，企圖打破這一死的圈套時，甘地主義便轉變爲對工農的兇殘的絞索，把他們交給帝國主義的劊子手。殖民地資產階級之接受甘地主義並不妨礙（或者更確切的說：只是便利於）牠對工農的叛賣和屠殺。這就是農民政治哲學的最大弱點：牠非常迅速地轉變爲農民解放的絞索，甚至必然爲階級敵人所用。

甘地一生的政治行動就在說明甘地主義如何限制、出賣、絞殺印度民衆解放鬥爭的具體過程。從一九一三年他在南非所發動的第一次非暴力運動一直到他被刺爲止，每一次印度民族運動的新的高漲總是被限制在甘地主義的河床之上，而又總是當這一運動剛好沿着自己的邏輯，走上暴力反抗時，甘

地便下令停止，與英帝國主義進行妥協。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第一次大戰後自一九二〇年起，甘地在印度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這次運動完全出乎甘地的意外，一旦爆發之後，便遵循階級鬥爭的軌道走，由罷工、罷課、遊行示威，一直走向與軍警公開衝突。在哥拉克普爾，因爲警察向和平的示威者無故開槍，憤怒的羣衆竟焚燬了警察署，結果甘地立即下令停止不合作運動。甘地對於自己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大都是以這樣可恥的方式叛賣掉的。所以在印度，一般自覺的革命份子早已稱他爲英國的憲兵。

但甘地主義之能操縱印度的民族鬥爭僅僅限於這兩個條件：印度工農的覺悟力不足與革命領導的缺如。當到印度工農已了解和平的手段無法『感化』敵人時，他們將堅決的走向暴力革命之路。事實上，過去二十餘年印度民衆反帝鬥爭的經驗最好的說明這一真理：民衆總是希望帝國主義統治者能夠『和平的』退出印度，但後者的軍警却總是以『非和平』的暴力來答覆印度的徒手、善良的工農。那末，印度民衆雖然在甘地這一偽善的牧師的長期教養之下，他們却終於逐漸的認識了以『和平』的手段求獨立無異與虎謀皮，因爲帝國主義的無情的槍彈和凌辱教乖了印度的民衆：只能以暴力來驅逐暴力！這個時候，甘地主義在印度工農的眼中不但成了不可忍受的障礙物，而且成了帝國主義暴力鎮壓的幫兇。根據許多歷史事實證明：印度的民族運動自一九三八年以後已結束了過去的幼稚的軟弱的階段，牠已開始從和平鬥爭的階段轉入暴力革命的階段，正因為這樣，甘地主義便該當失去牠的歷史作用。但不幸印度民衆却缺乏一個正確的領導。資產階級，甚至平日在口頭上並不反對暴力革命的『左派』資產階級，因爲面臨一個真實革命的威脅，便趕忙團結在甘地主義的旗幟之下，希圖以此來限制印度羣衆的鬥爭，而一般的小資產階級的黨派，如大會社會黨與史大林黨等，則在『民主革命』的藉口之下，支持印度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這就給了甘地主義一個延長壽命的機會，使牠得以及時掩護資產階級，對大英帝國講價還價，並終於『和平』屈服於『自治領』的廉價『讓步』，而這一讓步顯然是以『巴基斯坦』及『印度斯坦』的『分治』爲代價的，後者所引起的悲劇性的鬭牆之爭完全暴露了大英帝國的目的：企圖轉變印度民衆一致的反英鬥爭爲自相殘殺的內戰，使印度工農半世紀以來所積聚的革命力量自行耗竭，替英帝國主義肅清未來重握印度權力的道路。這是甘地主義對大英帝國的最大的一次服務，使瀕死的大英帝國及其工具——印度資產階級能夠苟延殘息。那末，印、回雙方的極端民族主義顯然只是甘地主義底投降政策的副產品，甘地企圖又以『和平的祈禱』和『絕食』來緩和自己所造成互相殘殺的罪惡，但結果却死於印度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之手，這不僅是諷刺，而且還含有不可磨滅的歷史意義：甘地主義死了，印度民族革命底卑屈和荏弱的階段永遠完結了，今後印的階段將是印度民衆堅決地走上暴力革命的階段，新的革命領導將在這一階段中成長、成爲甘地主義的對立物，而這一新領導所依附的階級基礎，當然也是印度資產階級——甘地主義底使徒的對立物：無產階級！

自由主義者往那裏去

劉乃光

上海大公報於一月八日發表了一篇社評：『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跟着許多『自由主義者』都為文闡釋這個『信念』；而各地的報章雜誌也紛紛對牠表示意見。人們為什麼在此時此地提出此一『信念』，牠昨天究竟從那裏來，今天變成了什麼面貌，明天又將往那裏去呢？對此，我們願意趁這機會加以指出。

『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個人主義一樣，原是資本主義初期的產物。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從封建束縛下解放出來，進而為了在自由競爭中發展資本主義，於是提出了民主自由，要求發展個性。一七八九年法國第三等級喊出了『不自由毋寧死』的口號，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在推翻封建皇朝，以及發展初期的資本主義上，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曾經起了進步的歷史作用，那是不可否認的。但資本主義本身有牠的發展規律。自從戰勝舊的封建階級之後，牠很快便從自由競爭逐漸發展到托辣斯的獨占，獨占從此便排擠了自由競爭，極少數的獨占大王們便操縱了國內甚至國外的市場。生產力愈加停滯不前了，民主改良的範圍愈被縮小了；法西斯主義於是在某些國家起而戰勝了民主主義。即在人們所最誇耀的民主自由國度——金元帝國，牠的生產力愈是發展，那也只意味着獨占勢力的發展，以及自由競爭的被排擠。而戰後各國極度貧困之急需大量援助，更削弱了美國的物質力量，使她的民主改良範圍更加縮小。資本主義早已結束了自由競爭的時代，早已踏入獨占的垂死階段，經濟上早已殘敗不堪了。因此，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也早已耗竭了牠本身的歷史作用，今天絕沒有牠存在的物質基礎。假如牠們還存在，那只是徒有其名的裝飾品，即是說，已經成了獨占大王們的專有品了。對廣大的民衆來說，自由主義已成了無自由的表徵，民主主義已成了反民主的工具，個人主義已成了束縛個性的護符。牠們早

就該放進歷史的博物館去，而以集體主義——社會主義來代替了。只有實行社會主義的財產公有和計劃經濟制度，使每個人在經濟上平等，最大多數的人民才能得到更高度的民主自由，而他們的個性也才能得到盡量的發展。

這點真理，連大公報所代表的『自由主義者』先生們也不能完全否認。他們——雖然含含糊糊地——自認他們的『社會主義色彩也不淡』，自認他們的『自由主義者』畢竟還是『自由主義者』。所以他們始終把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對立起來，認為英美有前者而無後者，蘇聯有後者但無前者，因此主張兼收兩者之長，結論是讚揚中山先生之『偉大於三民主義』。他們顯然沒有了解：目下的蘇聯只是一個墮落了了的工人國家，只是由於世界革命接連失敗而使蘇聯陷於孤立，加上蘇聯本身的落後，生產品不分配，然後產生這一官僚層，完全剝奪了一切工農大眾的民主自由。史大林這種官僚主義顯然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布爾塞維克列寧主義。假如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蘇聯官僚層便無法再存在，而絕大多數人民便可生活在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裏，享受最充分的民主自由了。人們不能拿史大林的官僚主義去抹煞社會主義的偉大進步性，從而用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來對抗牠；這猶之乎不能拿一個兵卒之無能射中的戈矛去對抗牠一樣。而且，人們尤其不能將史大林的官僚主義與真正的社會主義混為一談。不然，那確是最大的可悲的誤解了。

但我們的『自由主義者』不但抱着這種誤解，而且還有更致命的弱點：他們竟自滿於『無意奪取政權，所以也談不到施政綱領』。『既沒有口號標語吸引羣衆，連其本身也沒有組織』。他們自認『需要集體行動的政黨，本質上並不適合真正自由主義者的口味』。反之，他們却在『本質上不崇信武力，換起打來連手都不會搗』。這些先生們竟如此自滿其『可憐相』，而毫不以愧對『先輩』為羞。

因為他們所不絕讚譽的『自由主義先賢』，如傑弗遜、林肯和羅斯福們，都有他們的政黨、政綱、而且執掌過政權的；他們所引為典範的一七七六年北美獨立戰爭，以及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都是羣衆以鮮血頭顱從事奪取政權的武力行動。但何以當年的『自由主義者』如此轟轟烈烈地行動，而中國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却只有這麼一副卑怯的『可憐相』呢？我們的解釋是：歷史時代完全不同了！因為當時正是資本主義向上發展的時代；而今天，資本主義制度却衰敗不堪，必須讓位於社會主義制度了；維護資本主義舊制度的各階級，都命定要沒落、死亡的；其中經濟上最沒有地位，最易向兩極分化的中小資產階級，則沒落得更快，因而在政治上也表示得更無力。不幸我們的『自由主義者』們恰恰是中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們被擠在國共兩大黨的夾縫中痛苦着，但又明知無力與牠們對抗，於是只能表示不要鬥爭，單以空談為滿足。因此，他們雖然列出許多政綱式的動人的要求，但這些要求都只是小資產階級的空想，與有科學根據而能實現的理想毫無共同之點；同時又無能力爭取其實現，那牠們便只好成了紙上談兵，不能產生任何實際效果了！

不過，我們承認：大公報所代表的這種論調，在此時此地提將出來，多少總反映出目前中國一般中小資產階級對現狀的不滿，對國內交戰雙方前途的失望，因而急切需求獲得民主自由。這種情緒甚至在工農羣衆中也逐漸在滋長着。大公報所反映的這種情緒和要求，無疑是一種進步的醞釀。我們固然衷心維護一切民主自由的要求，但我們認為這種自由不應成爲一種獨立的『主義』，而應包含在集體主義——社會主義裏面，今天除了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以外，中國的一切問題是無法解決的，民主與自由是無法充分得到的。但既然民衆對現狀的不滿，對交戰雙方的失望，對民主自由的追求，已經在增長，而且由輿論反映出來，那就更多一次證明：組織另一個革命的新黨，已比任何時候都迫切了。當然，我們不應忘記補充說明：這個新黨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的政綱、嚴格的紀律和堅決的行動，牠與目下的『自由主義者』所倡說的必須是完全不同的！

人類命運將決定於法國

（訊通黎巴） 星曉

當記者執筆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法國的暴風雨彷彿已過去，至少一般人的心理也比較弛鬆了一點。假如我們往繁華的巴黎大馬路閒逛一下，我們準可以見到酒館、旅店和咖啡館又充滿醉生夢死的狂歡，百貨商店裏陳列的都是上等的貨色，五光十色，應有盡有，光看這表面的一角，我們那能相信『第四共和國』在崩潰，在飢餓？但報紙上，街頭上，貴族沙龍和工人區的小茶館中都在激烈的辯論着一個問題：法國往那裏去？有人公然擁護戴高樂的『人民團結』運動；有人却認為只有走澈底的革命道路，成立法國的『工農政府』；大多數人尚在遲疑不決。但這一點却無可否認：承認現狀可以維持的人數越來越少了！這就證明法國現在的局勢仍處於巨大風暴的前夜，這個風暴將決定一切——決定法國和世界的命運！

國的重工業，這個脊樑骨現在已折斷了，東歐的分離和東方殖民地地的叛亂又奪去了農產品、燃料、原料的供應地和工業品的市場。這一深刻的危機表現在法國便是煤的恐慌，勞動力的

（一）法國危機的真相

要了了解法國局勢的嚴重性，必須首先了解戰後歐洲資本主義經濟的崩潰性的危機，法國的危機只是這一危機的一部分。誰也知道，歐洲資本主義的脊樑骨是德國的重工業，這個脊樑骨現在已折斷了，東歐的分離和東方殖民地地的叛亂又奪去了農產品、燃料、原料的供應地和工業品的市場。這一深刻的危機表現在法國便是煤的恐慌，勞動力的缺乏，市場的喪失，生活水準的降低。不錯，由於美國借款，共產黨和社會黨對工人的政策，法國生產，從一九四五到四七年，已抵達一九三八年年的水準，但牠的發展是極度不平衡的，而且自去年春以來便露出新的衰敗和下降。最值得注意的，這種生產的上升運動與工人生活水準的下降竟成反比例，這一點暴露法國經濟復興與所包含的特點：犧牲某一部門來重建另一部門，又一般的犧牲工人的利益來保持再生產的行程——這是一種病態和迴光返照的『繁榮』。

法國工人在這次總罷工之前，最低限度的工資每月不過七千法郎（等於十四英鎊），而一般物價較之一九四五年二月却增加了四倍以上；食糧除了少量的配給外，大都求之黑市，其價值之昂簡直只有富翁才買得起。工人所食的麵包大都是用苞米粉和馬鈴薯做的，粗糙難於入口；工人的孩子只能得到少量的牛奶，而且還是不定期的，甚至完全得不到。工人和一般小市民日趨貧困和飢餓了，往日工資的收入已絕對無法抵禦通貨膨脹的狂瀾。他們除了鬥爭外，便只有死亡。

但操縱了法國工人命運的政黨——共產黨和社會黨却告訴法國工人：束緊褲帶，努力生產；妄想挽救法國的舊制度！特別是共產黨，牠有系統的利用法國工人對蘇維埃紅軍戰勝的信仰，控制了法國的總工會，一躍而為法國最具實力的大黨，只有第一次大戰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聲勢才堪與媲美；但牠在戰爭中，用狹義愛國主義的口號，驅使法國工農去擁護戴高樂，戰爭之後，牠爲了示好於法國

資產階級，竟解散工人的武裝和工廠委員會，放棄奪取政權的機會，參加了戴高樂的資產階級『聯合政府』，企圖使正趨崩潰的法蘭西帝國重新穩定起來。牠居然反對工人罷工，認爲『罷工是托辣斯的武器』，而工人的『利益』則是服服貼貼地，束緊褲帶，努力增加生產！一個『工人』政黨那樣無廉恥地替資本家階級服務，恐怕還是破天荒的，即使一九一八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也望之却步哩！

經過一年多的試驗之後，法國工人逐漸明白：生產是『努力增加』了，但工人的實際工資却一天一天的減少，生活一天一天的惡化。一九四七年初，工人的憤怒情緒從國營雷諾汽車廠工人的罷工表現出來，這次罷工是自發的，完全脫離甚至反對史大林黨的領導，有一部份領導遺落入國際共產黨（第四國際法國支部）之手。這次鬥爭首先表現法國工人階級已開始行動、左傾，不惜越過保守的工會官僚的頭，牠是一個劃時期的信號。在這種威脅之下，敏感的資產階級知道現狀已難於維持，史大林黨的階級調和政策已無法控制工人的爆炸性的醞釀，牠便急劇向右轉，向戴高樂找尋援助，結果引起『聯合政府』的危機，共產黨被排出內閣。史大林黨被趕出『聯合政府』後，雖然還聲明繼續效忠於資產階級政府，但爲了平服下層的不滿，爲了保持工人的領導權，牠不得不向『左』轉。當然，在深刻瞭解國際政治的人士腦中，法共的向『左』轉絕不會喚起什麼幻想的。因爲牠無論如何旋轉，終歸是圍繞着克林姆宮的外交軸心，而這種外交的物質

基礎，則是蘇維埃官僚的利益。法共昨天參加『聯合政府』，公然替法國資產階級充當奴隸總管，爲的是企圖藉此『中立化』法國資產階級，使牠成爲美蘇妥協的『紅娘』，今天法國資產階級爲了挽救自己而犧牲了法共，擺向美國和戴高樂方面去，迫使法共要利用革命的威脅來壓迫法國資產階級及其後台——美帝國主義，迫使牠們和蘇聯妥協——目的是一個，手段則兩樣。從這裏我們就可以恍然大悟，法國的史大林黨並不是誠心在法國造成功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牠只是玩弄『革命』，把牠變成恐嚇資本家的稻草人，關於這一點我們往後就更明白。

（二）總罷工的經過

去年十月十九日法國舉行了全國市政選舉，戴高樂的『人民團結』派突然抬起來，人民共和黨之類的『民主』政黨則一落千丈，這表明資產階級中間政黨內的小資產階級已急劇轉向法西斯主義，企圖找尋一個新的出路。市政選舉雖不足以決定法國的政局，但牠却可以成爲法國政局發展的指標之一，使整個法國工人階級，尤其是先進的一層內，發生極大的警覺。一九三三年德國的悲劇會不會重演於法國？這是每一個覺醒的法國工人所最關切的生死問題。這種焦急的情緒使法國工人階級更難對現狀忍耐。十一月廿五日，正當四國外長會議集會倫敦，企圖決定歐洲的命運之時，法共操縱的總工會突然下令總罷工，這種偶合只能加以這樣的解釋：法共企圖利用法國工人的爆發性情緒來威脅美國，迫使她對蘇妥協，這又一次證明，史大林黨之領導法國工人鬥

爭並不是走上徹底革命的道路，而是企圖拿牠來充作莫斯科的外交工具。

這次總罷工的參加人數有三百萬工人，總工會發動這次罷工的口號是經濟性的：每月最低工資一萬零八百法郎，每隔三月按物價調整一次。但從這次總罷工的廣度和深度來看，牠已迅速地走向侵犯資產階級權力和財產的政治攻勢了。每一個工人都清晰的自覺到這次總罷工是一種決定性的鬥爭，是「不宣的內戰」，這可以從許多事實觀察出來。罷工工人到處沒收礦山、工廠、郵政局，有些村落也完全落入他們手中，成立蘇維埃式的地方委員會，分配糧食，維持秩序，控制城市的生活。甚至在巴黎，工人們也開始成立罷工的區域委員會，分配糧食給罷工者的家屬。聖愛丁尼的工人封鎖一切道路，佔領大多數重要工廠，十一月廿八日，十萬工人舉行示威，企圖佔據市政廳，政府第一次開動軍隊去鎮壓工人，但法國兵士却拒絕射擊，其中還有公然加入示威隊伍的。馬賽的工人則乾脆準備巷戰，建築障礙物，在工廠和船塢上面飄滿了紅旗。這不是革命的開始又是什麼？

(二) 資產階級的驚慌

鬥爭自有牠自己的邏輯，尤其是總罷工不是鬧着玩的。當工人階級走上總罷工的道路時，他們就表示已決心和資產階級決戰，因此總罷工必須有充分的準備，必須在明確的革命政綱之下舉行，與奪取政權的任務連繫起來，否則徒然耗竭工人的力量於經濟性的防禦戰中，必然招致失敗和消沉。法國資產階級也本能地察覺這一邏輯的發展，賴馬迪政府顯然無力應

付工人的攻勢，便匆促下台，讓位於許曼，許曼上台之後，立即一方面對工人作暫時的「讓步」——答應在巴黎每月增發一千五百法郎的生活費賞與金，其他地方則每月一千一百二十五法郎。另一方面他却急忙動員軍警，通過反勞工法案，與戴高樂的法西斯派通聲氣。許曼內閣的作用使我們不禁想起一九三三年前夜德國的布魯寧內閣，牠是一種過渡的、短命的波拿巴制，靠緊急法令，暫時平衡於工人階級與法西斯運動兩極所綑緊的走索之上，牠的歷史作用就是在兩種社會勢力決鬥之前，以「中立」和「超然」的態度，維持社會秩序，實際上則在替戴高樂的「人民團結」運動掃除障礙。無論如何，許曼內閣的性格本身已證明資產階級也在自覺地準備決戰了。

(四) 工人政黨的作用

但我們剛才已指出過：共產黨之領導這次罷工並不是在發動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而僅僅在於替克林姆宮的外交服務。這可以從牠對這次總罷工的草率態度得到證明。牠對這一鬥爭預先毫無準備，且缺乏任何具體的計劃和目的。史大林黨控制的法國總工會領導機關並不是在明確和具體的目標之下同時號召全國總罷工，而是進行一種游擊式的活動來浪費工人的力量。所有法共領導的各業工會，總是毫無組織的號召罷工，事實上差不多大都在工會正式號召行動之前，工人已有一部分人事先在罷工，有些場合甚至大多數工人已先於工會的號召而行動。

另一方面法共也沒有企圖爭取軍警的同情，雖然許多例子證明軍警已有

動搖甚至公然對工人表同情的象徵。但法共最大的罪惡還是自始至終把這一罷工限制於純粹的經濟要求之內，雖然鬥爭的邏輯已分明把奪取政權問題提出來。這一政策結果在最有利、最有成功可能的條件之下，阻止了工人階級進行決戰，引起混亂和迷失方向。總工會的副秘書長，法共領袖佛拉松公開聲明：這次總罷工僅限於經濟要求，政府誣指工人的鬥爭傾向暴動，是無稽謠言。他們竟把革命視為「無稽謠言」！你們能希望這個黨把法國工人階級帶到勝利之路去嗎？

在法國工人政黨中佔第二位的社會黨，牠在這次罷工中幹的勾當更臭氣薰天。牠害怕史大林黨的全能主義政制，但自己又不敢提出徹底的革命政策；牠指出史大林黨在追隨莫斯科的外交，但自己却去依附法國資產階級和美帝國主義。因此牠走得很遠，在去年十月間的市議會選舉中，社會黨右派的領導竟支持戴高樂的候選人，最近牠的議員還公然與資本家聯合通過許曼的反勞工法案。社會黨在總工會中的領袖是石屋，他領導的派別叫做「工人之力」(Force Ouvriere)。這個小組組織在工會裏與許曼政府裏應外合，進行破壞罷工，提倡復工運動和「工作自由」，牠最近在一次會議裏通過「不問政治」的決議，實際上在「不問政治」的掩飾之下，石屋先生却在實行資本家階級的政治！

地位，一時不能起決定作用，但前途遠大，關於這一點往後馬上就談到。

(五) 總罷工結束之後

十二月九日，法國總工會的史大林黨領導突然接受許曼的條件，宣佈投降。這種出賣並不希奇，因為法共自始至終就無心於革命；而且牠所招致一時的頹喪和混亂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假如我們認這次失敗就是最後一次，那也未免言之過早。法國經濟還在衰敗，法郎還在貶值，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還在繼續惡化。法國的危機距離解決還遠得很呢！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總罷工後法國的現狀。

法國資產階級已取得了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牠現在正擬利用反勞工法案作基礎，加緊牠的「備戰」，牠一方面實行「法郎貶值」，至少使這次罷工工人爭來的工資增加迅速失去價值，另一方面，牠正準備肅清軍隊和政府機關中的「不穩份子」，暗地裏資助戴高樂的反動勢力。華爾街的大亨們也明知許曼政府只是一種中間政制，牠遲早會被戴高樂取而代之的；據他們的最樂觀的估計，戴高樂將於今年三月上台。真是巧合，希特勒也是一九三三年三月上台的呀！但事情當然不會像美帝國主義者所設想的那樣「樂觀」，戴高樂的法西斯力量還在開始積聚的過程中，還遠談不到走上決戰的戰場，否則在這次大罷工中，資產階級不至於把戴高樂押在一旁，讓他小心的躲起來，不要被工人鬥爭的大火燒死。這次總罷工的失敗所造成的最壞的後果之一，便是中間階級開始對工人失望，這些小人物在「第四共和國」統治之下，已失去一

切改良的希望，他們不滿於現狀，焦急地要打開一條新出路，而工人階級的領導黨（法共和社會黨）却還要勸他們耐心等待，這無異把他們一個一個的推到戴高樂方面去，因為戴高樂的『打破現狀』的『革命計劃』正好符合這些小人物的幻想。問題非常清楚，假如下一階段，工人階級不能得到一個徹底的正確的領導，重新打開一個勝利的遠景，法國的中間階級將完全擺向法西斯方面去。下一階段法國的中心問題就是法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方面主觀領導形成的競賽問題。

(六) 工人階級的新醞釀

最近一年來法國政局的緊張事件，雖然在工人階級心中造成許多挫折的陰影，但也同時滋長了寶貴的警覺和向上心，這是喚起法國工人運動內部新分合的重要基礎。法國兩大傳統的舊工人領導——史大林黨和社會黨，尤其是前者，已開始喪失牠們在先進工人中的聲望，多一次叛賣就多一次教訓，喚醒戰鬥工人對牠們的認識。史大林黨下層工人幹部之開始叛離他們的上層領導遠在雷諾罷工時期已開始，去年十一月間巴黎地下鐵道工人罷工時，史大林黨的下層黨員竟公然違抗中央委員會的破壞罷工命令，站到罷工工人方面去。在最近這次總罷工中，史大林黨領導的總工會雖然宣告復工，而地下鐵道工人及非部的礦工均不遵守復工命令，繼續進行鬥爭。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就是罷工委員會中工人民主要求的不斷勝利，使許多史大林黨的官僚主義包辦完全失敗。另一個重要的現象就是史大林黨

的下層，甚至下級機關幹部也開始對工廠中的托派份子甚至對整個托派的黨全般改變態度，他們可以說是整千整千的開始了解托派社會主義革命政綱的正確性。史大林黨的演講者在工廠中現在也迫得要背誦托派的話，要求推翻現時的反動的、破壞罷工的資本家政府。托派的機關報——真理報在史大林黨的黨員中已得到許多同情，讀者，他們成羣的團結在散發者週圍，而在史大林黨影響的工人中，也第一次整百的包圍着一兩個托派，進行友誼的討論。總罷工的失敗，使罷工中積聚下來的這許多進步的成份在史大林黨內發生一個巨大的醞釀，這一醞釀在不久將來將採取明確的政治和組織形態出現，這對未來法國工人階級新領導的形成給予非凡的助力。

正因為在這一壓力之下，法共的上層已深感不安，遠在去年十一月間，法共領袖多萊士在中央會議中就公開承認：戰前的人民陣線政策是錯誤的，甚至在戰爭中法共也犯了人民陣線政策的同樣錯誤，竟與『反動份子』共同合作參加抵抗運動，『今天，這種反動勢力正結集在戴高樂週圍，進行反對工人階級和共和國的進攻。』但多萊士之承認過去的錯誤只是企圖『綏靖』下層的不滿和批評，他並沒有認真指出錯誤的根源：階級合作政策的革命形勢，斷送了一九四五年的奪取政權的時機，而且，還在繼續斷送今天的有利形勢。關於這一點，多萊士自己也承認，今天法共所走的道路仍然不外成立『一個政府，這個政府將盡全力保衛憲法和共和國反對』法

國人民團結』及一切圍繞戴高樂週圍的陰謀家。『換言之，法共還要維持階級合作政策，保護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和憲法。這就命定在不久的將來法國史大林黨內部的崩解。』

社會黨則遭遇更悲慘的命運，牠的整個青年團已宣布脫離牠，進行與國際共產黨談判合併，最近以社會黨三十四個重要幹部為首的左派也宣布與社會黨的改良派領導決裂組成『社會主義革命行動』派，牠宣布的政綱式宣言率直指斥黨內右翼的階級合作政策與法共犯了同樣的罪惡，末了牠主張工人階級共同行動爭取最低限度的工資，爭取按照物價增加工資，工人管理生產，保障民主權利，並建立一個『以整個工人階級為基礎的人民政府』。這個政府將大膽施行一切反資本家的手段。『忠實於馬克斯主義的教義，相信世界無產階級，懂得我們的鬥爭就是牠的鬥爭，建立歐洲和全世界社會主義合衆國』。這些主張簡直與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接近了，所以最近社會黨的左派也在進行與國際共產黨談判合併。

客觀的條件已充分證明法國工人階級新領導的形成已十分成熟了，社會黨與史大林黨的工人幹部和進步份子都或先或後的向國際共產黨結集，使牠成爲一個新的有力的軸心，與戴高樂的法西斯軸心相對抗。

(七) 國際共產黨

更值得注意的，法國的國際共產黨（第四國際支部）也在這一有利的客觀形勢推動之下，加強了自己的領導。關於這一點，在去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一日開催於巴黎的第四次全國代

表大會中表現得最清楚。參加大會的代表有一百五十席，內有一百十三席是具有表決權的。大會在政治上嚴格的檢討了過去領導機關對於戰後法國局勢的某種錯誤的分析和結論（主要的錯誤是強調一九四五年革命形勢錯過之後，資本主義經濟復興與政治穩定的可能性，因而着重工人經濟鬥爭與經濟復興的機械的聯繫，忽略了政治鬥爭與政權問題，並在策略上犯了遷就史大林黨的機會主義錯誤），以六十五票對四十八票棄權，否決過去領導機關的工作報告。大會中雖有種種傾向提出各自的決議案，但法朗克派（布爾什維克傾向）的提案却獲得四十八票的多數，而代表前屆領導機關多數派的提案則僅得四十六票，其餘兩種傾向則各得八票和十一票。

選舉的結果產生了新的領導機關，規定了新的政治方針，認定目前的時代是革命的時代，在當前形勢中提出總罷工為黨的中心口號。鬥爭的方針是使目前法國工人的鬥爭普遍化，並建立廣泛的工人聯合戰線，反對戴高樂建立『強大國家機關』的企圖。總罷工的口號與建立工農政府的口號連繫起來。（我們不要忘記，這一政策的確立恰好在法共十一月末發動總罷工之前夜。）

在組織問題上，大會並一致主張立即與社會黨青年團及其他與老黨破裂的革命派別進行合併。第一步指定人員進行與社會黨青年團完成充分的政治討論，迅速合併。

國際共產黨第四次大會清晰的指出，不僅客觀條件，甚至主觀條件也相應地成熟起來，促成法國工人階級

國際 鱗爪

錫蘭國會中革命黨的姿態

錫蘭國會在開幕時，盡力做效英國議會底「華麗的」儀式。總督高坐在上，誦讀演詞。陸海軍的高級長官也參加這堂堂的大禮。參議員與穿著鮮紅服裝的法官們則排列成隊，向議院前進。

但，倫敦時報也觀察到另一些情形。它宣稱：「這種儀式被六席屬於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的議員所斥責。他們在議院的另一室內舉行會議。」

「布爾什維克——列寧黨全體黨員拒絕這種可笑而更卑賤的「展覽」。

「派里拉，布爾什維克——列寧黨（第四國際印度支部）的領導者之一，被下議院選為參議員。在國會開幕典禮中，他的第一步舉動，便是要求廢除上議院，成立一院制的議會。派里拉是上議院中惟一的托洛斯基主義者。」

英國的法西斯打擊托派集會

牛津的莫斯萊的暴徒們於十一月廿七日發動了一次最無恥的勾當，聚合了他們的勢力，來攻擊托派一個公開的集會。當五十個工人與學生集合在牛津的一個會堂中紀念俄國革命，正諦聽着哈斯頓（革命共產黨書記）的演說時，頃刻間會場燈光突告熄滅。法西斯流氓們衝進了前廳，推倒講壇，並向聽眾散擲胡椒粉。於是引起搏鬥，一個女工會會員眼部受到傷害。

法西斯棍徒們終被聽眾趕出了會場，學校外面的大門也立即關閉起來，以阻止企圖闖入會場的數十個法西斯黨徒。這時可聽到「莫斯萊！」「打倒勞工政府」的呼喊聲。當不能再引起更進一步的擾亂，並且他們破壞團結的企圖也已受阻時，法西斯棍徒們高唱着「希望與光榮的土地」，散去了。於是會議仍在良好秩序中進行下去。

事後，牛津托派發出呼籲，要求成立一個包含所有各地工人組織的聯合保衛團。這呼籲已在各地工人及史大林黨的最優良份子中得到同情的反響。拉斯基大學的學生，已向着正確的方向走，第一次採取的步驟是成立反法西斯委員會，以便在牛津進行鬥爭。

意共怎樣背叛了意大利的工人鬥爭

由意大利史大林黨草率而成的全國性示威遊行，是欲

以之威嚇華爾街在倫敦會議中給予克里姆宮較大讓步的。這次示威結果却發現了史大林黨是怎樣地害怕革命鬥爭，至於領導羣衆為政權而作決定性戰爭的思想更談不到了。

意大利史大林黨誇稱牠有二百萬以上的黨員，他們在工會裏有着決定性的控制力。工人階級中百分之六十受他們的直接影響。七千個自治政府中有三千個是在他們的掌握中。此外他們更支配了二十八萬到四十萬的遊擊隊戰士

最重要的是：羣衆已重覆表示他們的願望是終結資本主義及與之俱來的悲慘、法西斯主義和戰爭。窮困的農業勞動者自發地佔據大的產業，並且企圖驅逐地主。同樣，產業工人也佔領了工廠，據有戰略的中心，與警察軍隊鬥爭，掌握了城市的統治機關——他們已竭盡全力，為的是推動史大林黨官僚階級領導工人運動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意大利的資產階級僅以拖延來維持政權。他們那個可鄙的政府（由聯合國戰勝者所任用的）也祇有二十八萬不到的武裝力量，（包括警士在內）而其中有些部分曾在緊要關頭表示他們對羣衆的同情。正團集中的法西斯力量仍是半隱伏着，還未能準備妥當以應付一次決生死的戰鬥。

可是史大林黨仍不願推翻這個可憎恨的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農政府。他們祇要有足夠的行動表明一下：他們握有權力可在意大利發動一個社會主義革命，便滿足了。意大利的羣衆，一旦感到制動機作用鬆懈，便會迅速地湧向前進。在米蘭，羣衆給喀斯貝里撤換市長一事激動起來，接管了全市一整天。工人和市民們於十一月廿一日佔領了戰略中心，表明他們已決心作一次殊死的鬥爭了。

當喀斯貝里命令米蘭的武裝隊伍行動時，却被後者回絕了。這些武裝隊伍不但射擊工人，反表示願與工人相團結。沒有經過一點流血，工人取得了意大利的支加哥。

如果這次光輝的勝利能夠擴展下去，在短期內即可有可建立工農政府。可是史大林黨非但沒有鞏固他們的陣地，再由此前進，反將米蘭當做一塊灼手的熱鐵般丟棄了。他們甘心情願地將政權送回喀斯貝里，於是這個資產階級的執政者立刻將三師團更「可靠」的軍隊開入市區。

史大林黨跟着還在羅馬扮演了一次三萬市民的大遊行。資產階級的通訊員整天在猜疑：也許史大林黨已決定奪取政權。但在遊行之後，史大林黨却遣送市民回家了。

史大林黨「恐嚇華爾街」的運動，在羅馬號召總罷工時達到了高峯。他們將罷工要求局限於三個條件：（一）懲罰前次示威遊行中犯射擊一個工人罪的警察；（二）撥款一百億里拉（一千七百萬美元）為公共事業之用；（三）須於聖誕節前分發紅利給羅馬八萬失業工人。

新的革命領導出現。我們相信在下一階段，這一新領導將在選舉中，鬥爭中，成爲一個新的強有力的軸心，以一九一七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姿態出現於政治舞台，代表國際無產階級表現一次新的奪取政權的最精彩一幕，牠的勝利將把整個世界的面目全般改變，使蘇維埃的史大林主義政制場台，使整個資本主義的壽命終結，替人類開闢一個新的無窮樂觀的遠景。那末，整個人類命運的問題在法國歷史的下一章中，將還原爲：國際共產黨的勝利還是戴高樂「法國人民團結」運動的勝利？

喀斯貝里內閣冷然地同意「審察」鎗擊事，撥款數億里拉抵充作公共事業之用，並考慮爲分發紅利給失業工人或許可能做到的一些事情。與此同時，它命令警察局用行動來對付罷工者。

史大林黨在罷工開始時並未顧及準備抵抗。警局將罷工的集團孤立起來，毆打並成百地逮捕他們。第二日，史大林黨突然宣告終止罷工，且聲稱這是一次「勝利」。

由此史大林黨表明他們是害怕工人羣衆的高漲情緒，和怎樣嘗試轉移鬥爭的目標，以便替自己的官僚利益服務。他們限制罷工工人的人數，甚至不敢號召在鐵路那樣重要的工會出來行動。他們努力將罷工的要求限制在最狹義的經濟範圍內。他們極力防止罷工鬥爭取得普遍全國的性質。當工人比史大林黨所希望的走得更快時，他們便慌忙停止鬥爭，並將工人已得到的讓步也捨棄了。

戰後意大利共產黨的迅速成長並非由於史大林主義的吸引力，而是由於意大利工人要學布爾什維克的典範，建立一個政黨的願望。事實已表明意共與這個典範太不配稱了。因此，史大林主義在影響上將遭受一個可怕的衰落。

在同樣的考驗中，托洛斯基主義的思想將以非凡的速度率得到信譽。她在意大利的支部最近已召開一個全國大會，表示忠誠於國際的領導，而牠的力量也在迅速生長中。這也是意大利工人階級未來勝利的巨大希望。（曉瀾譯）

新聲 (原名青年與婦女) 第二卷第十二期

編輯者 新聲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陳景先

通訊處：上海郵政信箱第一三三九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圖書公司

總經理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上海五洲書報社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五日出版

評「反蘇大陰謀」——一部說謊的「奇書」

(續完)

旭東

——薩伊爾斯、卡恩合著，梁純夫等譯，新知出版社出版——

史大林謀殺托洛茨基案的水落石出

史大林在希特勒的反蘇威脅之下，雖然利用「希特勒的間諜」及「勾結希特勒和日帝陰謀反對蘇聯」等「罪狀」，在莫斯科三次大審判案中，無比殘酷地剷除了國內整代的老布爾塞維克領袖們，但托洛茨基還巍然存在於國外，依然在墨西哥不斷暴露史大林的背叛和罪惡，並領導世界革命運動，這在他看來不但是不能忍受的，而且是十分危險的。因為史大林心裏很明白：他雖用盡一切惡毒的譏諷和陰謀詭譎、迫害和打擊了托洛茨基，但托洛茨基同列寧一樣，是十月革命的象徵，是這一革命傳統的保持者，他在蘇聯及全世界工農羣衆的眼中具有無比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威望，這威望在一個新的革命潮流中很可能變成不可抵抗的力量，將史大林淹滅下去！尤其在第二次大戰爆發後，在史大林親自勾結希特勒、幫助希特勒發動了這次大戰後，他內心裏更失去了平衡，更感到了恐怖，更害怕托洛茨基在戰爭造成的革命巨潮中，在蘇聯及國際工農羣衆的擁護下，回到蘇聯來復興十月革命的無產階級政權！這種恐怖心理便有如一個魔鬼推動史大林不顧一切地，欲斯特里地動員一切力量，特別是他的格柏烏系統來謀殺托洛茨基，來最後摧毀他的肉體！

因此於第二次大戰開始後，史大林即命令他的格柏烏在墨西哥佈置了一個龐大的謀殺機關，化費了幾百萬盧布，動員了幾十個精選的劊子手（連墨西哥共黨的領導人員在內），窺伺着謀殺的機會。一九四〇年五月廿四日對於托洛茨基住宅之大規模的襲擊（在這次襲擊中，史大林動員了幾十個格柏烏，用機關槍與盒子砲向托氏住房盲目地掃射至幾十分鐘之久）。便是史大林謀殺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嘗試。但在這次大規模的襲擊中，不僅沒有成功，反而暴露了史大林的謀殺計劃，暴露了墨西哥共黨領袖人物在這一謀殺襲擊中的卑鄙的罪行。（例如墨西哥共黨政治局委員之一的塞拉諾是這次襲擊的準備者，黨員西克伊羅是這次襲擊的直接領導者，那是由當時的墨西哥法院所證實了的。）於是史大林的格柏烏又採取了另一種謀殺方式，那就是

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法朗克·傑克遜個人的直接行刺。
傑克遜這次刺死托洛茨基的事件，是史大林處心積慮並動員一切力量所造成的後果，本來已非常明白，且已為國際輿論所公認，再沒有任何掩飾或否認之可能了。可是「反蘇大陰謀」談到「墨西哥的暗殺」時却有如下的描敘：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個歐洲的托派間諜，在旅行時用着法朗克·傑克遜的名字，搭乘法國郵船來到美國。傑克遜在巴黎大學讀書時候就經美國托派席爾維西·阿吉洛夫小姐的介紹，參加托派運動。一九三九年在巴黎有一個秘密的「第四國際局」的代表去找他，并向他說要他去墨西哥充當托洛茨基的一個「秘書」……傑克遜在紐約會到席爾維西·阿吉洛夫還有別的托派份子，并被帶往科姚肯，在那裏他替托洛茨基工作。不久傑克遜通知墨西哥警察局說：「托洛茨基派我赴俄，目的在蘇聯造成一種新局面……我的使命是敗壞紅軍士氣，並在軍工廠和其他工廠進行各種破壞工作」。

傑克遜却一直沒有去蘇執行他的恐怖使命。在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傍晚，在戒備嚴密的科姚肯別墅裏，傑克遜以長的鵝嘴鋤向托洛茨基頭部猛砍，殺害了他的領袖。傑克遜被墨西哥警察逮捕後說，他想和席爾維西·阿吉洛夫結婚，而托洛茨基阻撓這場婚事。爲了這女子，這兩人破口大罵。「爲了她，」傑克遜說，「我決定整個地犧牲了我自己」……（見該書一一七〇頁）

這便是「反蘇大陰謀」關於傑克遜刺死托洛茨基的經過的神話！但這段神話現在已完全由美國的路易斯·布登茲（Louis Budenz）戳穿了！

布登茲是美國共黨中央委員，兼該黨機關報「每日工人」的經理。由於戰後美國共黨內部的混亂和衝突，布登茲失望了，懺悔了，便投入了天主教會，并寫了一部名爲「這是我的故事」（一九四七年三月紐約 *Warner's* *Story House* 出版）來暴露美國共黨替史大林的格柏烏服務的秘密。而謀殺托洛茨基的秘密也就由此被暴露了出來。

據布登茲在他的「這是我的故事」中說，謀殺托洛茨基是從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就開始準備的。而擔任這一準備工作的，在美國共黨領導機關內就是他本人。他最初是與史大林派在美國的格柏烏領袖叫做「朋友里查」的接頭。里查命令他搜集有關托派的消息、照片、文件、住址、私人生活等。布登茲依照里查的命令工作了好幾個月。後來「朋友里查」代替了「朋友里查」，布登茲還是繼續工作下去。結果他經過他的好友羅維比·維爾找到了一個托派女同志席爾維西·阿吉洛夫，因爲她常在托洛茨基家裏出入。布登茲再把羅維比·維爾介紹於「朋友里查」。羅維比便慫恿羅維比·維爾（她也是美共黨員）

與席爾維亞·阿吉洛夫到巴黎去旅行，并經過羅比·維爾介紹傑克遜與阿吉洛夫，撮合他們成爲婚事。這樣，傑克遜這個格柏烏兇手便得以在墨西哥經過阿吉洛夫的關係走進托洛茨基的住宅，乘機來謀刺托洛茨基了。由布登茲在其懺悔中這種自我暴露，人們便可以看見『反蘇大陰謀』內關於『墨西哥的暗殺』一節內的那種描叙，是何等地卑鄙、惡毒和荒唐的虛構了！

事實上，『反蘇大陰謀』對於謀殺托洛茨基這種無比卑鄙、惡毒和荒唐的虛構，不僅是繼續莫斯科審判案的一貫的邏輯，而且是早已由格柏烏預先準備好了的。傑克遜被捕後由墨西哥警察局在其口袋內所發見的『供詞』，便是『反蘇大陰謀』內藉以虛構的原稿。史大林的格柏烏爲了掩蓋謀殺托洛茨基這一過份刺激人的罪惡，便預先捏造好一份『供詞』，說是『托派』自己對於其領袖的憤恨而謀刺的。可是這未免太兒戲，太掩耳盜鈴了！當傑克遜剛行刺托洛茨基後而陷於慌亂時，曾不自覺地悲叫道：『他們監禁了我的母親……。席爾維亞·阿吉洛夫同這事情是毫無關係的。……不，這不是格柏烏，我同格柏烏毫無關係……。』不，這不是格柏烏，我同格柏烏毫無關係，這不是等於說：『此地無銀三百兩』嗎！『他們監禁了我的母親』，這又明白告訴我們：傑克遜被派去行刺托洛茨基時，格柏烏將他的母親監禁起來作爲『人質』，迫使他必須達到目的，否則他的母親是要被犧牲的，——這原是格柏烏最殘酷的作風之一！如果我們將傑克遜這種不自覺的自我暴露和布登茲『懺悔』後的『自覺』暴露聯繫起來看，則史大林謀殺托洛茨基這一極端卑鄙和兇狠的案件，也就躍然呈現於每個人的面前了！

而且布登茲在他的書中除了暴露格柏烏謀殺托洛茨基外，還連帶指出了：一九三七年伊格那士·萊伊士（因他脫離格柏烏而轉到第四國際）在瑞士的被刺，同年美國共黨領袖之一普揚茲女士的神秘失踪（因他不滿意於史大林的領導），以及美國無政府黨領袖克諾·特勒斯加的被刺殺害（由於他向紐約大賠償法庭告發普揚茲係格柏烏所謀害），都是出於格柏烏的陰謀。由此更可充分證明：史大林的格柏烏對於其政敵及其反對者，是有系統地計劃地在全世界進行陰謀殺害的。

另一方面，當布登茲的書出版後已引起美國各黨派的強烈抨擊，尤其是約翰·杜威博士集合四十七個學者，簽名發表宣言，要求紐約法院檢查官傳訊前美共領袖布勞德、史塔塞爾、布登茲等，根據布登茲的書所暴露的種種事實來檢舉格柏烏對於托洛茨基、萊伊士、普揚茲及特勒斯加等謀殺案時，美國共黨機關報『每日工人』始則保持緘默，迄至好久以後才勉強作了一篇批評布登茲的『這是我的故事』的書評，但在書評中除了抨擊布登茲改信天主教外，絕對不會提到他書中所暴露的格柏烏的種種謀殺罪行，——單憑這一點，也就足夠證實布登茲書中所暴露史大林格柏烏對於托洛茨基等的謀殺，是一絕對無可否認的事實了！

經過布登茲的暴露，史大林謀殺托洛茨基的這一罪案，可說是完全水落

石出了！『反蘇大陰謀』這部『奇書』關於『墨西哥的暗殺』的神話式的描叙，同它前面關於畢達哥夫『飛奧斯陸』的描叙一樣，不過是又一次徒然暴露其無比的卑鄙、惡毒和荒唐的虛構而已。

『反蘇大陰謀』原來的根本目的，是企圖替史大林審判案及最後行刺托洛茨基的罪惡作有系統的『辯護』，但結果反而進一步暴露了史大林格柏烏的極端卑鄙和惡毒能事的『偽造』罪行！這或者就是所謂『欲蓋彌彰』吧！

史大林與蘇聯

『反蘇大陰謀』的全部敘述，都是把凡在政治上反對史大林的一切老布爾塞維克領袖，一切十月革命的元勳和內戰英雄，描繪成爲反對蘇聯的叛徒，爲希特勒或日帝的間諜，——這種描繪除了替史大林對一切政敵的謀殺辯護外，還無形中給了人們強烈的印象：『史大林是蘇聯的化身，是蘇聯的唯一代表者』。所以『凡是反對史大林的人，都是反對蘇聯的叛徒，是應該處死的』。因此在結束本文時，我們不得不將史大林與蘇聯的關係加以簡略的評斷。

大家知道，蘇聯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而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真實內容，在經濟上表現爲社會主義的國有財產制，在政治上表現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完全勝利。但史大林二十餘年來對於蘇聯給了他什麼影響呢？他首先背叛了十月革命的一切傳統和列寧的全部遺教，團結了一切保守的反動的官僚份子於其周圍，排斥并謀殺了一切布爾塞維克的領袖，因而將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轉變成爲史大林個人的邦拉巴特獨裁；其次，而且是最重要的，史大林製造了『一國社會主義』的反動理論，不斷地出賣了中國、德國、西班牙、法國、奧地利以及在這次戰前戰後其他許多國家的革命運動，陷蘇聯於異常危險的資本主義包圍狀態之中。因此，在史大林的統治下，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完全變了質，而它原來是推動世界革命的因素也被轉變爲障礙的因素了！現在蘇聯尚能保存下來的唯一因素就只有它的社會主義的國有財產制了，但史大林的官僚獨裁和障礙世界革命的動政策，如果沒不新的世界革命的勝利來衝破，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將不可避免地要被毀滅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史大林不但絕非蘇聯的化身，絕不足以代表蘇聯，相反地，他是蘇聯的背叛者，破壞者，掘墳者，總而言之，史大林及其獨裁統治的存在與十月革命所創造的蘇聯的整個制度和任務是不可調和的。

爲了保衛蘇聯的社會主義財產制，爲了復興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換句話說，爲了保衛和復興列寧時代的蘇聯，必須推倒史大林的格柏烏的統治，他的邦拉巴特的獨裁。因此，從政治上，從十月革命的傳統觀點上說，反對史大林，不但絕非反對蘇聯，而恰好是真正在保衛蘇聯，保衛十月革命的遺產。蘇聯及全人類未來的命運，將以這種保衛的成功與否來決定的。

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信箱

關於中國歷史發展問題的再討論

——再評翦伯贊等先生的意見——

編輯先生：看了貴刊上期答覆我所提出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問題之後，又使我發生了不少的疑問，主要的還是關於秦代的轉變及以後的發展問題。差不多所有的戰

前是典型的封建制度，秦始皇是最大地主，好像這一個時期已進入了前資本主義——即商業資本的時代了。據和五門的理，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諸侯的對；實行郡縣制，統一文字和度量衡，這一切行政機關；是不承認這些事實，而且有更多的理由，如統一幣制，統一度量衡，准許土地自由買賣，貨幣地租的出現以及法

治政策的實施，這裏就產生了兩個問題，（一）即以前所說的歷史事實出發，而他們的結論却不一致，為什麼先生却說這種變化是封建制度推進一步呢？其次（二）是秦代之引起如此巨大的變化，是建立在何種經濟原因之上？即是說：在秦統一全國之前，生產力已達到何種程度了？也就是說：怎樣站在經濟的觀點上來解釋秦代轉變的原因。

時代，則秦代以後的發展過程中，表現了許多與西歐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不同點，這些不同點，將作怎樣的解釋？例如：（一）中國何以如此「長期停滯」於商業資本時代，而不能如西方文藝復興以後之直接走上工業資本主義？（二）不斷的農民暴動，在西方是促使走上工業資本，而中國的每次暴動為什麼却在失敗中使農民陷入更悲慘的命運，工業資本萌芽的機會都沒有？（三）王莽與王安石之流，似乎是要為農民解決問題的，然而他們為什麼都失敗了？（四）落後的邊疆民族，為什麼常常是征服了較高發展的漢族呢？

限於篇幅，其他一些問題就留在下次再請教吧！此致 敬禮 讀者白雲山拜啓

雲山先生：你這次提出的雖然只是「秦代的轉變及以後的發展問題」，但這些問題對於了解中國歷史發展，特別是秦以後的「停滯狀態」，是十分重要的。因為這些問題正是近幾十年來一般歷史學家們最搞不清楚，因而對秦以後的歷史陷於十分混亂和誤解的根本問題。不過這些問題所牽涉的範圍仍然過於廣泛，所包含的內容仍然過於複雜，因此我們這次

的解答也仍然不免過於簡單，這是要請你原諒的。

你問：（一）何以同一的歷史事實出發，……為什麼先生認為秦代開始了商業資本的時代，而翦、周等先生却說這種變化是封建制度推進一步呢？其次，（二）秦代之引起如此巨大的變化，是建立在何種經濟原因之上？即是說，在秦統一全國之前，生產力已達到何種程度了？……

首先讓我們從第二個問題說起。「秦代之引起如此巨大的變化」，我們可以說，其「經濟原因」主要是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而這種商業資本的發展又是建立在農業和手工業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換句話說，「在秦統一全國之前，生產力已達到『超過於那種古典的純粹封建的自然自足的經濟生產之上了。這從先秦的許多古籍上可以找出充分的事實來證明的。而且近十餘年來凡是稍微認真搜集史實的研

究家們，差不多都一致提供了同樣的證明。即以翦伯贊先生來說，雖然他肯定「秦漢是中期封建社會」，但他在其「中國史綱」上所提供的事實和說明，却亦足以證實我們前面的判斷而無餘。例如翦先生在解釋「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構造」一章內開頭便說：「春秋戰國的歷史，從其本質上考察，可以說，就是莊園經濟過渡到佃耕經濟的歷史；同時，也是獨立手工業者與商人，從莊園經濟中發展以至成長的歷史。由於莊園經濟之解體與孕育於其中

的新的歷史因素之成長，遂使中國的封建社會走向更高發展的歷史階段」（『中國史綱』三五五頁）。而且翦先生根據這一提綱，並頗為詳細地描述了鐵器普遍應用之後對於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性的提高，勞役地租向現物地租的轉化，工商業都市的勃興，商業在更高的歷史基礎上的發展，商人地主勢力的抬頭……其結論是：「鬥爭開始了。新興商人以秦國為中心，組織了反對舊領主的政治運動，這就是歷史上所謂『連橫』。他們不僅要求封建混戰的停

止，要求商路的安全和通暢，並且根本要求割據局面的取消，因而使關稅幣制及度量衡獲得統一。尤其要求他們在封建社會內既有的地位之法律的承認，要求他們對於工業者的支解權之政治的鞏固，要求他們自己擁有權對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

民行使權力。一言以蔽之，他們要求封建的統治權，這個統治權，是以保護新興商人地主的權益為任務的統一的集中的政權」。因此他的最後結論說：「隨着秦代的統一，新興商人地主，便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抱笏登場了」（『中國史綱』一三五—一三五頁）。

「這樣看來，秦代的統一，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是一個主要的歷史動力。因為作為秦國政權之主要支持者的商人地主，正是從手工業中成長起來的一種新的歷史因素；秦代的統一，正是這種新的歷史因素之成熟。」（同上書二卷三九頁）像翦先生所提供的這些史實和結論，不是正好證實了我們前面的判斷嗎！我們這裏所要證明的只是一點，就是：翦先生對於秦以前商業資本的發展及秦代的商人地主政權未免稍微強調了一些。

至於翦先生（連周谷城先生在內）一方面既完全承認了，甚至多少強調了秦代的統一只是代表商人地主的的要求，秦代的政權只是代表商人地主的政權，而同時却又斷定「這種變化是把封建制度推進一步」，如果依翦先生自己的話來說，「秦代王朝，……揭開了中國中期封建社會的序幕。中國歷史，從這一時代起，就從初期封建制度走向專制主義的封建制度」（『中國史綱』二卷一頁）。像翦先生這種「斷定」，不但與他前面的「析和結論」矛盾，而且和人類歷史，尤其和歐洲歷史發展的事實和規律是完全違背的。因為：第一，翦先生既已承認秦代政權是商人地主的政權，是在摧毀封建領主階級的封建割據制度下所成立起來的統一集中的新政權，那怎能說它還是封建制度的政權呢？而且翦先生自己還說：「秦代的政府，就創造了商業資本走向全面發展的客觀條件。所以當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巡行各大都市的時候，到處都得到商人地主的歡迎」（『史綱』二卷四五頁）試問一個為商業資本創造

止，要求商路的安全和通暢，並且根本要求割據局面的取消，因而使關稅幣制及度量衡獲得統一。尤其要求他們在封建社會內既有的地位之法律的承認，要求他們對於工業者的支解權之政治的鞏固，要求他們自己擁有權對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及土地上的人

民行使權力。一言以蔽之，他們要求封建的統治權，這個統治權，是以保護新興商人地主的權益為任務的統一的集中的政權」。因此他的最後結論說：「隨着秦代的統一，新興商人地主，便在中國歷史舞台上抱笏登場了」（『中國史綱』一三五—一三五頁）。

「這樣看來，秦代的統一，城市手工業的發展，是一個主要的歷史動力。因為作為秦國政權之主要支持者的商人地主，正是從手工業中成長起來的一種新的歷史因素；秦代的統一，正是這種新的歷史因素之成熟。」（同上書二卷三九頁）像翦先生所提供的這些史實和結論，不是正好證實了我們前面的判斷嗎！我們這裏所要證明的只是一點，就是：翦先生對於秦以前商業資本的發展及秦代的商人地主政權未免稍微強調了一些。

